

中国考古学年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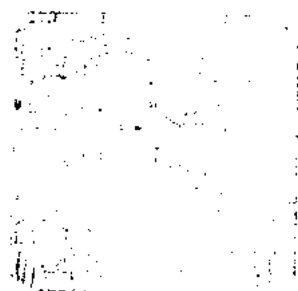
1985

文 物 出 版 社

26.3088
240[illegible]1

中国考古学年鉴

1985



中国考古学会编
文物出版社
北京

封面设计：阚文青

中国考古学年鉴
1985

中国考古学会编
文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85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850×1168 1/32 印张14.50

统一书号：11068·1469 定价：2.80元

已审阅
子居 10-03-13，13:23


中國考古學會
1979



目　录

考古学研究

1 古人类学与旧石器时代考古 黄慰文
10 新石器时代考古 严文明
23 商周考古 王世民 郭振禄
43 秦汉考古 叶小燕
61 魏晋至明清考古 段鹏琦
86 科技考古 孙　机

考古文物新发现

北京市

103 平谷县北埝头、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
104 北京市琉璃河西周遗址
105 海淀区二里沟唐墓
105 平谷、密云等县发现的古窑址

天津市

106 宝坻县歇马台战国遗址
107 蓟县抬头村早期辽墓
107 天津市发电一厂工地发现明代文物
108 天津市碑刻调查

河北省

109 平山县中贾壁新石器时代遗址
109 藁城县台西商代遗址
109 易县燕下都遗址
110 平山县中山灵寿故城
110 临漳县邺城遗址
111 邢台市省机电学校元墓
111 迁西、卢龙、抚宁三县长城考察

山西省

111 襄汾县解村旧石器时代遗址
112 襄汾县沙女沟村石器制造场遗址
113 和顺县窑湾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
114 晋东南、晋南和吕梁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114 洪洞县耿壁村新石器时代遗址
115 垣曲县古城东关新石器时代遗址
116 襄汾县陶寺新石器时代遗址
116 曲沃县方城新石器时代遗址
117 洪洞县侯村新石器时代遗址
117 朔县赵家口村发现两柄赵国铜剑
118 侯马市北坞村东周城址
119 朔县北旺庄汉墓

内蒙古自治区

120 敖汉旗兴隆村新石器时代遗址
120 清水县白泥窑子新石器时代遗址
121 额济纳旗西夏至元黑城遗址

辽宁省

122 营口金牛山猿人化石
123 东沟县后洼新石器时代遗址
124 兴城县仙灵寺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
125 绥中县姜女坟秦汉建筑遗址
126 抚顺高尔山高句丽山城址

吉林省

127 白城市靶场新石器时代墓群
127 前郭县青山头新石器时代墓葬
127 桦甸县江西屯新石器时代遗址
128 农安、德惠两县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129 德惠县北岭古代墓葬
129 集安县高句丽及渤海墓葬
130 浑江市永安渤海遗址
130 集安县金代遗址

黑龙江省

130 泰来县平洋砖厂青铜时代墓地
131 肇源县卧龙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遗址

上海市

132 青浦县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江苏省

133 江苏等地郑和史迹和文物的调查
134 东海县爪墩细石器遗存
135 昆山县少卿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135 苏州市横塘星火印纹硬陶遗址
135 苏州市上方山六号土墩石室
136 苏州市吴城春秋遗址
136 丹徒县背山顶春秋墓
137 苏州市内战国至宋代遗址
137 苏州市新庄汉徐福墓
138 南京市陆营汉墓
138 南京市郭家山东吴纪年墓
139 南京市前新塘村南朝墓
139 南京市司家山南朝墓
140 扬州市南通西路唐代城垣遗迹
141 扬州市蜀岗唐城遗址
141 太仓县双凤明墓

浙江省

142 绍兴市马鞍新石器时代遗址
142 余杭瓷窑商周原始瓷遗存
143 海宁县夹山商周土墩石室结构遗存
144 上虞县严村西周至明代墓葬及商代窑址
145 慈溪县彭东、东安乡西周至春秋土墩石室遗存
146 绍兴市马鞍乡战国、东汉、三国、西晋、唐、宋墓葬
147 金华市孟宅村唐代蟠龙罂窑址
147 金华地区唐、宋、元代的乳浊釉瓷窑
148 江山县唐至明代瓷窑
149 衢州市尚坨岗村宋代彩绘瓷窑
149 杭州市南宋临安城考察
150 绍兴县松林村南宋墓志

安徽省

150 含山县大城墩新石器时代遗址
151 寿县城关战国、西汉遗址
152 怀远县唐集汉墓
152 马鞍山市东吴朱然墓

福建省

153 闽侯县庄边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153 崇安县汉代城址
154 惠安县南埔五代窑址

山东省

154 郯城县黑龙潭旧石器时代遗存
155 临沂市青峰岭细石器遗存
155 微山县尹洼村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
156 菏泽县安邱堌堆龙山文化遗址
157 寿光县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堡遗址
157 长岛县北庄新石器时代遗址
158 益都县杨家营龙山文化和周汉时期遗址
158 济南市大辛庄商代遗址
159 临淄市乙烯厂丙醇工地两周墓地
160 济南市北齐祝阿县令道贵墓

河南省

161 巩县下西坡、临汝县中山寨新石器时代遗址
162 淮阳县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堡及其他时期遗迹
162 偃师县二里头遗址
163 偃师县尸乡沟商代早期城址
165 安阳市殷墟西区等地的小型墓葬
166 安阳市殷墟王陵区司母戊墓及其他墓葬
167 洛阳市瀍河西周车马坑
168 洛阳市东周王城遗址
169 新郑县郑韩故城的考古钻探与发掘
169 新乡市丁固城古墓群
170 洛阳市汉魏故城
170 偃师县杏园村汉晋唐宋墓地
172 洛阳市关林唐墓
172 洛阳市东郊史家湾后唐墓
173 新安县石寺李村的两座宋墓

江西省

174 九江市神墩商周时期遗址
175 高安县七星堆战国至明代墓群
175 乐安县发现元代窖藏瓷器
176 景德镇明清龙珠阁遗址

湖北省

176 宜都县城背溪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
177 宜都县枝城北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
178 宜都县花庙堤等四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
179 枝江县青龙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
179 宜昌市伍相庙大溪文化遗址
180 宜城县曹家楼屈家岭文化遗址
181 麻城县谢家墩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
182 宜都县茶店子等四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184 武汉市马投潭新石器时代遗址
184 黄陂县盘龙城商代遗址
185 沙市官堤商代遗址
185 长江西陵峡北岸的几处商周文化遗址
187 宜昌县小溪口商至战国遗址
188 宜昌市覃家沱两处周代遗址
189 麻城县白骨墩东周楚墓
190 江陵县联山的二座楚墓
190 江陵县九店砖瓦厂楚墓
191 汉阳县熊家岭战国墓群的发掘
192 广济县发现周代青铜甬钟和句鑃
193 江陵县张家山三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
194 鄂州市六朝武昌城遗址
194 武昌县斧头湖两宋窑群
195 武昌县元代南桥

湖南省

196 怀化市高坎垅新石器时代墓地
196 临澧县新石器时代遗址及战国两汉墓葬
197 常德市德山楚墓
198 古丈县白鹤湾战国楚墓
198 益阳县赫山镇东周墓
199 桃源县黄楚城战国西汉墓
199 耒阳县城郊春秋至元代墓葬
200 衡阳市茶山坳三国至唐宋墓葬
200 衡阳市郊王家湾明墓

广东省

201 曲江县马坝人化石洞穴发现打制石器
201 封开县鹿尾村新石器时代墓葬
202 海丰县田墘圩发现新石器时代玉器
202 博罗县出土春秋青铜甬钟
203 兴宁县出土战国铜编钟
203 五华县雄狮山汉代遗址
204 广州市郊沙河东汉墓

广西壮族自治区

205 隆林县那来洞发现古人类化石
205 田东县大索屯战国墓

206 合浦县发掘八座汉墓
206 武宣县勒马村六座汉墓
207 兴安县石马坪汉墓
208 贺县石壁湾东汉三国墓
208 南丹县里湖南宋至清末岩洞墓

四川省

209 广汉县三星一真武遗址
210 炉霍县充古村石棺葬墓地
210 茂汶县撮箕山石棺葬墓地
211 广汉县东汉"雒城"遗址
211 邛崃县什方堂"邛窑"遗址

贵州省

212 毕节县青场瓦窑新石器时代遗址
213 安龙县木科出土羊角钟
214 惠水县城关明墓

云南省

214 云南省文物普查
215 东川市普车河古墓群

西藏自治区

216 拉萨市曲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
217 乃东县钦巴村新石器时代遗存
217 乃东县普努沟古墓群
218 山南地区发现二十处古墓群
218 拉萨市查拉路甫石窟
219 乃东县吉如拉康寺
220 洛扎县色嘎古朵寺
220 拉萨市红山清代摩崖刻铭

陕西省

221 南郑县龙岗寺新石器时代遗址
222 岐山、扶风两县考古调查
223 靖边、榆林等县考古调查
224 耀县北村龙山及商代遗址
224 长武县碾子坡先周文化遗址
225 淳化县西梁家西周建筑遗址
226 长安县沣西西周洞室墓
226 长安县沣西西周双墓道大墓
227 铜川市王家河西周墓地
227 米脂县张坪村西周墓葬
228 凤翔县马家庄春秋秦三号建筑群
229 丹凤县古城村战国秦商邑遗址
229 铜川市枣庙春秋战国秦墓
230 泾阳县秦都咸阳望夷宫遗址
231 咸阳市黄家沟战国秦墓
232 西安市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
232 西安市汉宣帝杜陵遗址
233 定边县钟堌村、付圈村汉墓群
234 绥德县黄家塔东汉画像石墓
235 咸阳市西北林学院古墓群
235 西安市唐大明宫翰林院遗址
236 西安市田王镇唐韦仁约墓
237 铜川市黄堡耀窑遗址
239 甘泉县洛河流域唐至明代石窟
240 宜川县贺家沟北宋石窟
241 甘泉县雨岔乡李巴圪塄村金代瘗窟

甘肃省

242 秦安县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
242 天水市师赵村齐家文化聚落遗址
244 永靖县乌路塬和临夏县莲花台辛店文化遗址
244 合水县九站先周遗址
245 崇信县于家湾西周墓地
245 武威县韩佐五坝山汉墓群
246 河西汉代长城
246 陇西县西河滩元墓

青海省

247 玉树、果洛地区文物普查

宁夏回族自治区

248 盐池县张家场汉墓
249 灵武县磁窑堡西夏至元瓷窑址
250 银川市新市区西夏墓
250 贺兰山滚钟口西夏窖藏钱币
251 同心县发现西夏官印
252 贺兰山西夏石刻塔
253 贺兰山岩画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54 乌鲁木齐市柴窝堡细石器遗存
255 巴里坤县兰州湾子三千年前石构建筑遗址
256 乌鲁木齐市南山矿区古墓葬
257 巴里坤县奎沟古墓
257 尼勒克县奴拉赛沟两千年前铜矿遗址
257 乌鲁木齐市乌拉泊古墓葬
258 和静县察吾呼沟口古墓群
259 轮台县群巴克古墓
259 和硕县那仁克古墓
260 新沅、洛甫、和田、若羌等县分别发现两汉遗址、南北朝墓及藏文石刻

台湾省

261 恒春鹅銮鼻发现史前遗址

考古研究、文博机构一览

262 中央
262 北京市
263 天津市
263 河北省
264 山西省
266 内蒙古自治区
266 辽宁省
267 吉林省
268 黑龙江省
268 上海市
268 江苏省
269 浙江省
271 安徽省
272 福建省
272 江西省
274 山东省

275 河南省
276 湖北省
278 湖南省
278 广东省
280 广西壮族自治区
281 四川省
282 贵州省
282 云南省
283 西藏自治区
283 陕西省
285 甘肃省
286 青海省
286 宁夏回族自治区
28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88 补：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文博机构简介）

文物工作展览　学术会议

文物工作

289 全国文物工作会议
290 考古发掘工作汇报会议
290 文化部文物局举办十二期干部训练班

国内展览

291 全国出土文物珍品展览
291 全国拣选文物展览
291 陕西省博物馆调整充实珍贵文物展览
292 首都博物馆馆藏珍贵文物展览
292 天津市建国以来考古成果展览
293 广东出土先秦文物展览
293 广东省文物普查汇报展览
293 秦代兵马俑全国巡回展览
293 东晋王氏家族墓随葬文物陈列
294 车轱山出土新石器时代文物专题陈列在岳阳展出
294 中国古代妇女服饰资料展览

国外展览

294 中国秦代兵马俑展在日本巡回展出
295 紫禁城珍藏的清代乐器在美国展出
295 云南博物馆藏青铜器在日本展出
295 中国古代文明展览在南斯拉夫展出
295 中国历代陶俑在日本展出
296 中国中山王墓出土文物在法国展出
296 上海博物馆珍藏六千年的中国艺术品在美国展出
296 中国秦代兵马俑在瑞典展出

学术会议

296 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第二次会议
297 江苏省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
297 湖南省考古学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

298 内蒙古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座谈会
298 河北省文物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及第一次年会
299 全国首次商史学术讨论会
299 福建省崇安县汉城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学术座谈会
300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和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4年年会
300 秦俑发现十周年及秦俑研究学术讨论会
301 太湖流域古动物、古人类与古文化学术座谈会
301 江苏省吴文化第五次学术讨论会
301 人类学国际性学术讨论会
302 北京人发现五十五周年纪念会
302 元谋人发现二十周年纪念会
303 吉林省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
303 安徽省考古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
304 湖北省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

对外学术交流

305 王仲殊等出席日本第七次古代史讨论会
305 夏鼐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人类科学文化史》第一、二卷正副主编会议
305 中国文物考察组梁丹等去奥地利访问
306 三上次男为团长的日本出光美术馆代表团来我国访问
306 加拿大考古学者史密斯夫妇来我国访问
306 国际古代纺织史研究中心副主席里布夫人在京作学术报告
306 罗马尼亚考古、博物馆专家波巴·丹等来我国访问
306 美国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来我国讲学
307 日本陶艺家访华团圆城寺次郎等一行七人来我国访问
307 安志敏出席环日本海国际学术讨论会
307 缅甸博物馆代表团耶突等一行五人来我国访问
307 以江上波夫为团长的日本文化交流考古文物研究者访华团来我国访问
307 北京大学考古系高明副教授去美国访问
308 法国考古小组让戴尔等三人来我国进行学术考察
308 澳大利亚考古学者贝尔伍德来我国访问

本年逝世考古学家

309 于省吾 张亚初

考古学文献资料目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图书资料室
考古学书目

311 壹 总类
312 贰 田野考古资料
313 叁 考古学分论
314 肆 考古学专论
314 一 甲骨卜辞与古文字研究
314 二 商周铜器及铭文
314 三 碑刻
315 四 玺印封泥
315 五 其他
伍 美术考古
316 一 通论
316 二 古代雕塑与佛教美术
317 三 古代建筑
318 四 陶瓷与窑址
319 五 古代绘画
320 六 古代书法
320 七 古代工艺美术
321 陆 古代科学技术
321 柒 古代文化生活
321 捌 名胜古迹
322 附：1983年考古学书目补遗

考古学论文资料索引

327 壹 总类
327 一 综论
328 二 纪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发表一百周年
329 三 考古学史与考古学家传记
329 四 文物政策法令与文物保护工作
330 五 考古学方法与技术
330 贰 考古学分论
330 一 人类起源及旧石器时代
332 二 新石器时代
322 综论
322 黄河流域
333 长江流域
334 东北地区
334 其他地区
334 三 夏文化探索
334 四 商代
335 五 西周
335 六 东周
336 七 秦
337 八 两汉
338 九 魏晋南北朝
338 一〇 隋唐五代
338 一一 宋辽金元及以后
339 一二 其他
340 叁 考古学专论
340 一 甲骨文及古文字研究
341 二 青铜器与铭文研究
341 综论
342 商殷
342 西周
342 东周
343 秦汉及其以后

344 附：其他文字考释
344 三 碑刻
344 综论
344 秦汉——南北朝
344 隋唐五代
345 两宋
345 辽、金、元
345 明清及其他
347 四 简牍、帛书和写本
347 楚简及云梦秦简
347 汉简
348 帛书
348 吐鲁番、敦煌文书
348 五 玺印
348 战国——秦汉
349 隋唐及以后
350 六 钱币
350 综论
350 东周—汉
351 唐宋及以后
351 纸币
352 七 铜镜
352 八 铜鼓
352 九 度量衡
352 一〇 玉器
353 一一 其他
353 肆 田野考古资料
353 一 北京
353 二 天津
353 三 上海
353 四 河北
354 五 山东
355 六 河南
357 七 山西
358 八 内蒙古
358 九 陕西
360 一〇 甘肃
360 一一 青海
361 一二 宁夏
361 一三 新疆
361 一四 辽宁
362 一五 吉林
363 一六 黑龙江
363 一七 江苏
364 一八 安徽
364 一九 浙江
365 二〇 福建
365 二一 江西
365 二二 湖北
367 二三 湖南
368 二四 四川
368 二五 贵州
369 二六 云南
369 二七 广东
369 二八 广西
370 二九 台湾
370 三〇 西藏
370 伍 美术考古
370 一 雕塑
371 二 画像石、砖
371 三 陵墓雕刻
371 四 造像
372 五 石窟寺艺术
372 六 古代建筑
373 七 陶瓷器与窑址
373 论述
376 窑址调查发掘
377 窖藏及墓葬瓷器
377 藏品介绍
378 八 绘画
378 九 法帖与书法
379 一〇 古代工艺美术
379 陆 古代科学技术
379 一 农业

380 二 水利
381 三 畜牧
381 四 天文
381 五 矿冶
381 六 纺织
382 七 交通
382 八 医学
382 九 其他
382 柒 中外关系与文化交流
383 捌 宗教遗迹与遗物
383 玖 历史地理与名胜古迹
384 拾 少数民族地区考古与民族志
385 拾壹 古代文化生活
385 一 音乐
386 二 戏剧
386 三 其他
386 拾贰 学术消息与文博工作
387 拾叁 书刊评介
387 附：1983年考古学论文资料索引补遗

新发表古代铭刻资料简目

391 一 金文
391 殷代
392 西周
395 春秋
397 战国
397 秦
398 汉
399 东晋
399 唐五代
399 宋
399 元
400 明
401 清
401 附：金银器铭刻
401 唐
401 宋
402 二 玺印
402 战国
402 汉
403 魏晋
403 西秦
403 宋辽金
406 元明清
407 三 墓志
407 汉
4 7 南北朝
408 隋唐五代
409 宋
410 辽金元
410 明清
410 附一：墓石刻铭
411 附二：买地券
412 四 碑刻
414 附：造像刻铭
418 五 有铭砖
421 六 瓦当和瓦削文字
421 七 陶器文字

423 附：1972—1982年中国考古学书目

已审阅
子居 10-03-13，13:25

考古学研究

古人类学与旧石器时代考古

黄慰文

一 重要发现

在古猿和人类化石方面，1984年有两项发现最为突出。一是江苏省泗洪县松林庄新发现的森林古猿类化石，一是辽宁省营口县金牛山出土的人类化石。

松林庄的工作从七十年代就开始了。研究者将这里中新世地层中出土的古猿化石命名为双沟醉猿（*Dionysopithecus shuangouensis*,Li,1978）和江淮宽齿猿（*Platodontopithecus jianghuaiensis*, Gu and Lin, 1983）。1984年又在这里发掘到二十多枚牙齿和采集到一个带有三枚牙齿的下颌骨，为研究上述古猿提供了充实得多的新证据。这批材料是亚洲已知最古老的古猿化石，对研究猿类演化和从猿到人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金牛山原是东北地区一处重要的哺乳动物化石地点，早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就做过发掘和研究。1974和1975年，辽宁省博物馆、营口市和营口县文化局以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合作对该地点进行发掘，获得大量动物化石以及一些石制品、骨制品和用火证据。1984年9—10月间，北京大学考古系师生在这里进行教学实习时，发现了一具比较完整的人类头盖骨以及属于同一个体的肋骨、脊椎骨、尺骨、髋骨、手骨、足骨等化石。这样完整的材料在我国是首次遇到，对研究早期人类的体质特征具有重大意义。与人类化石共生的动物群包括曾见于周口店动物群的剑齿虎（*Homotherium ultima*），可能还有肿骨鹿〔(*Megaloceros*) (*Sinomegaceros*) *pachyosteus*〕，所以遗址的时代可能为中更新世晚期，距今20万年左右，即相当于北京人时代的后期。关于人类化石的体质特征，在已报道的材料中认为属于直立人阶段。但是，看过这些标

本的有关专家认为，金牛山的头盖骨虽然可以肯定不是近期人类，但已具有不少进步特征，例如头骨骨壁相当薄，鼻棘发育，上颌骨接近正颌型而不象北京人那样口缘突出，枕骨圆枕呈卵圆形而不像北京人那样发育成一条粗大的横脊，等等。根据上述特征，金牛山头骨与北京人差别较大，与大荔人头骨较为接近。

在旧石器方面，在云南、贵州、河北、青海、黑龙江、山东和江苏等地发现了许多新材料。云南的材料分别来自元谋、丽江和路南三个盆地。元谋的旧石器文化过去发现了两期，即以元谋人文化为代表的旧石器时代初期最早阶段文化和以四家村龙川江第二级阶地堆积中的石器为代表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原研究者定为晚期文化）。1984年，又在小横山龙川江第四级阶地砾石层中发现石器，时代可归入旧石器时代初期后一阶段。丽江盆地从五十年代起即在盆地内的河湖相砂砾层中发现晚更新世的哺乳动物化石、人类化石和少量石制品。1984年，又从相同的堆积物中采集到十六件石制品。惹人注目的是，石制品中有十件石球，它们和华北的匼河、三门峡、丁村、许家窑等遗址所出土的一样，而在华南则是头一次见到，从而为探讨华南和华北旧石器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有意义的材料（卫奇等：《丽江木家桥新发现的旧石器》，《人类学学报》3卷3期）。在路南盆地，早在六十年代初就在这里的巴盘江高出河面30—40米的阶地上发现了石制品，时代定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但是，由于几乎全部标本采自地表，又缺乏古生物学证据，所以人们对这批材料的性质和时代存在着不少疑虑。1984年的复查中，从阶地堆积中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石制品，因而使上述疑虑得以消除。而这个地点的时代可能比过去估计的还要古老一些。

贵州省的旧石器考古工作近年来开展较好。1984年，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贵州省博物馆联合考察的普定县白岩脚洞是一处比较重要的遗址。它发现于1978年，随后由贵州省博物馆做过几次发掘，获得一批动物化石和数以千计的石制品，但层位上还有不明确的地方：只在不含石器的下部地层中发现了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化石，而含石器的上部地层则只见通常的化石。1984年的发掘证实上、下部地层含同一个动物群化石。同时，用^{14}C测定取得距今12080±200年（第3层）和距今14630±200年（第5层）两个数据，与动物群的分析结果一致。

河北省北部的泥河湾盆地是华北早更新世地层的标准剖面所在，这里的地质、古生物和古人类、旧石器考察一直得到国内外有关学者的关注。1978年以来，在这里相继发现了距今约100万年、文化上可以作为北京人石器的先驱的小长梁和东谷坨遗址。1983和1984年，在这一带又先后发现了几处重要的石器地点，其中有泥河湾层中层位比东谷坨地点稍高的马梁、黄土堆积中的大田洼西沟、桑干河阶地中的板井杨家沟、益塔泉等。

辽阔的大西北是旧石器考古工作最薄弱的地区。过去虽然在青藏高原发现过几处石器地点，但多半缺乏可靠的地层根据。1982年，在柴达木盆地合作进行第四纪研究的中、澳科学家，于小柴旦湖高出今日湖面8—13米的湖岸阶地的表面上发现了打制石器。1983年，又采到一批标本。在1984年进行的一次专门的旧石器考古调查中，终于找到了石器的原生层位。根据^{14}C测定，石器地点距今3万年左右。令人感兴趣的是，小柴旦石器的类型和技术风格与华北旧石器有许多共同之处，反映了西北和华北旧石器文化的密切关系。

地处东北边陲的黑龙江省是华北旧石器和东北亚、北美旧石器联系的通道，因而人们对近年在哈尔滨西郊阎家岗发现的距今22370±300年的人类化石及文化遗物表示关注是理所当然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考古工作者和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地质、古生物工作者于1984年又对这处遗址进行了系统发掘。除了获得大批动物化石和一些石器外，还发现了似乎是人为的、由动物骨骼堆砌而成的“掩蔽所”遗址。

位于鲁南、苏北交界的马陵山，是伸展在沂河和沭河相夹地带的平缓丘陵。山顶及两侧残留有高出河面10—20米的第二级阶地堆积。在这些堆积的近旁地面上散布着大量制作精致的细石器，少数石器仍埋藏在堆积物内。它们的原料有燧石、石英、水晶和玛瑙等。近年来，江苏和山东的文物考古部门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大学等单位先后来这里采集了不少标本。根据初步观察，这批石器的时代可能属于晚更新世末期，是华北细石器向东分布的证据。

二 研究成果

举世瞩目的云南禄丰古猿化石的研究工作正在深入进行。吴汝康等的《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的形态特征及其系统关系——下

颌骨的形态与比较》和《云南禄丰晚中新世的长臂猿类化石》等研究报告（分别见《人类学学报》3卷1期和3期）。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对于腊玛古猿的系统位置的看法又有所改变。在1983年发表的报告中，根据颅骨的形态比较，认为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是同一类型的雌雄个体，它们“应被看作为现代猩猩的祖先”。同时，提出根据国际命名法，将腊玛古猿归入西瓦古猿类，改称西瓦古猿。在1984年的报告中，结论改变为：“禄丰的两类古猿都有不少特征与猩猩相似，因此它们可能与猩猩有较密切的关系，两类可能是同一类型的雌雄个体。但另一方面禄丰的两类古猿，特别是腊玛古猿又显示出一些与南方古猿相似的性状，因而另一种可能性是腊玛古猿是与西瓦古猿不同的类型，它比西瓦古猿更接近于人、猿的共同主干。”

在湖北建始发现的四枚臼齿化石，过去有人认为是南方古猿的。现经重新研究，认为这些臼齿从齿冠尺寸和形状等看，与非洲的有关材料对比，更接近于人属成员；与印尼早更新世有关的化石对比，与魁人等的很相似。从牙齿的演化趋势和变异性看，建始的臼齿以及印尼早更新世人类下颌骨化石更大的可能是代表一类时代较早的直立人(张银运：《鄂西“南方古猿”和印尼早更新世若干人类化石》，《人类学学报》3卷2期）。

贵州省桐梓县岩灰洞于1972年发掘时发现了两枚人牙，1975年发表的报告中认为属于早期智人。1983年野外工作中，从相同的堆积物里又发现了四枚人牙。对新材料进行研究和对老材料重新观察的结果表明，桐梓标本在大小和形态特征上，有少数性状近于早期智人，但更多的与直立人、尤其是北京人更为接近。因此，它的系统位置似应和较晚的直立人相当，建议改称桐梓猿人。另外，与人化石共生的动物群的时代也重新归入中更新世(《人类学学报》3卷3期）。

在安徽省和县人化石产地邻近的巢县，1982年在银山的洞穴堆积中，发现了一块不太完整的人类枕骨化石和大量哺乳动物化石。根据动物群的性质，这处堆积可分为两部分。下部堆积含长鼻三趾马（*Proboscidipparion* sp.）、巨剑齿虎（*Megantereon* sp.）和四棱嵌齿象（*Tetralophodon* sp.）等第三纪残余种类，以及拟豺（*Cuon dubius*）、小体型的貘（*Tapirus* sp.）和真马（*Equus* sp.）等，时代为早更新世。上部堆积含肿骨鹿(*Megaloceros pachyosteus*) 中国短吻鬣狗 (*Hyaena brevirostris sin-*

ensis）、貘（*Tapirus*）、真马（*Equus* sp.）和犀（*Rhinocerrotidae*）等，时代相当于北京人时代后期或稍晚，也可能晚于和县人时代。人类枕骨出自上部堆积，代表一青年女性。根据该枕骨骨壁较薄，枕骨曲度较直立人的为大，枕外圆枕不发育和具有类似于圆枕上凹的结构，很可能是代表一早期智人的枕骨（《人类学学报》3卷3期）。

甘肃省境内的陇东黄土高原区是中国第一批旧石器发现的地方。最近十多年来，陆续发现了不少旧石器地点。但是，人类化石很少发现。黄慰文等的《甘肃泾川发现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一文（《人类学学报》3卷1期），报道了一具不太完整的人类头盖骨。它代表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女性青年个体，在人类进化系统上处于晚期智人的地位。它所显示的人种方面的特征与蒙古人种相符。

尤玉柱等的《吉林前郭查干泡发现的人类化石与古生态环境》一文（《史前研究》4期），报道了1983年采自晚更新地层中的一根人类股骨化石。这是继榆树的周家油坊和安图月明镇的石门山之后，吉林省内发现的第三个人类化石地点。青山头的人化石与披毛犀—猛犸象动物群共生，^{14}C测定为距今10940±170年，时代属晚更新世末期。从股骨体的形态特征、中段腔的大小来看，青山头的材料与山顶洞人、下草湾人和柳江人一样具有一系列的原始特征，属于晚期智人。

在柳江人发现地的广西柳江县，1981年又从土博乡的一个洞穴中发现九枚人类牙齿化石，它们至少代表五个个体。李有恒等根据牙齿本身的特征和共生的动物群，指出它们的系统位置似应和柳江人相当，即属于晚期智人。所以，土博材料的发现，增加了我们对于柳江人的认识（《人类学学报》3卷4期）。另外，吴新智等关于柳江人身高的文章（《人类学学报》3卷3期），将柳江人的右侧股骨残段作了复原。然后根据华南人由肢骨测量身高的公式，如果柳江人股骨属于男性，其身高为156.69±3.74厘米；如果柳江人股骨属于女性，则身高可能约为152厘米。无论男性或女性，都比现代当地居民的平均身高偏矮。

旧石器方面，1984年发表了甘肃泾川，陕西大荔、禹门口和乾县，山西丁村，黑龙江昂昂溪，四川资阳和山西太原古交等地点的报告。它们中有些是老地点的连续性工作，而有些则是新的发现。

甘肃省泾川县牛角沟和合志沟，是继南峪沟、桃山嘴和陕西

省长武县窑头沟之后，在陇东黄土高原南端发现的另两个旧石器地点。这些地点出土的动物化石大体都属于萨拉乌苏动物群，时代应为晚更新世的晚期或中、晚期，即稍后于丁村遗址的时代。它们的石器工业的技术风格和以北京人文化为代表的小型石器传统比较接近。盖培和黄万波在1982年发表的关于长武窑头沟地点的报告(《人类学学报》1卷1期）中，曾提议建立“泾渭文化”，作为和以丁村文化为代表的“汾河文化”同时平行发展、但文化性质上差别很大的文化。他们在同一报告中还提出水洞沟文化可能导源于泾渭文化的看法。泾川报告的作者们对盖、黄上述论点持保留态度。他们认为窑头沟等地点既不与丁村文化同时，而又看不出水洞沟文化承袭“泾渭文化”的证据（《人类学学报》3卷1期）。

在1979年发表的吴新智等的报告中，大荔人遗址的地层自下而上分为十三层，底部的第1、2层不含化石和文化遗物，属早更新世。第3层以上属中更新世晚期，大荔人头骨化石、石器和哺乳动物化石等出自第3层（《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7卷4期）。1984年发表的张森水等的第二次发掘简报（1980年）中，报道了两个新的含化石和文化遗物的层位——第4层和第5层。该文作者认为，新文化层是“大荔人”文化延续的反映，表明在“大荔人”之后仍有古人类在那一带活动。由于第5层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和第3层的基本一致，它们虽有先后之分，但大体上仍属于一个时代(《人类学学报》3卷1期)。

韩城县禹门口遗址位于黄河右岸，是一处高出河床约30米的石灰岩洞穴遗址，1973年修建铁路时发现。从夹小砾石透镜体和灰岩角砾的黄土状粉砂层中出土了一千二百多件用燧石、石英和石英岩作原料的制品。共生的动物化石有犀牛、鹿和牛等。刘士莪等认为其时代为晚更新世，比许家窑文化晚，而略早于峙峪文化。这些基本上使用锤击法打片和修理的制品以小型为主，石器类型有刮削器、尖状器等,其中刮削器占了绝大部分。禹门口石器工业在技术和风格上与许家窑、峙峪文化等最接近，属华北小型石器传统(《史前研究》1期)。

乾县的旧石器产自黄土之下的砂砾粘土层中，和晚更新世的动物群共生。这批材料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一件用石英岩砾石制成的手斧。邱中郎指出，这是继蓝田县涝池河沟和蓝田县平梁之后，在渭河流域又一次发现手斧(《人类学学报》3卷3期）。如果加上丁村等地点，则这种欧洲旧石器

初期的典型工具在华北已经多次出现。

丁村是1954年发掘的一处重要的旧石器遗址。自1976年以来，又陆续作了发掘。在《史前研究》1984年2期上发表了1980—1981年发掘的材料。新的材料在动物群和文化遗物方面给这个遗址增添了新内容。动物群方面，增加了鬣狗（*Hyaena* sp.）和轴鹿（*Axis* sp.）。连同人类化石在内，使丁村动物群由原来的二十七种动物增至三十种。石器方面，除了三棱大尖状器、石球和砍斫器等具有特色的工具以外，新材料有一批尺寸较小的刮削器。此外，像端刮器、“修背石刀”、似船底形石核等，都是过去未见描述过的。

长期以来，人们都把“昂昂溪”与细石器联系在一起。但是，自1981年黑龙江省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第一队在那里的晚更新世地层中发现了一批旧石器之后，上述传统观念应予修正。旧石器制品包括一批锤击法打制的石核、石片、石叶、多种类型的刮削器（单边刃、双边刃、端刃、吻状、琢背等）、雕刻器（双刃、修边、复刃、双面、截顶等）和砍斫器。还有砸击法产生的两极石核、两极石片以及用间接打击法产生的细石核，一些石器也可能使用了压制法加工。上述石制品与普氏野马（*Equus przewalskyi*）、东北野牛（*Bison* 〔*Parabison*〕 *exiguns*）和原始牛（? *Bos* sp.）等绝种动物共生，^{14}C测定为距今11,800±150年。另外，测得来自当地含细石器遗物的全新世地层的两个样品分别为距今7,570±85年和4,820±80年（黄慰文等：《黑龙江昂昂溪的旧石器》，《人类学学报》3卷3期）。

在资阳人化石产地近旁，1981年在清理公路桥桥墩工程时，从地表以下7.5—8.8米的砾石层中翻出许多石制品。它们多数相当粗大，主要原料为石英岩，另有燧石和火成岩等。打击石片采用了锤击、砸击和“锐棱砸击”等方法。经加工的石器有刮削器、尖状器和砍斫器，以砍斫器为主。这批石制品与中国犀（*Rhinoceros sinen-sis*）、鹿（*Cervus* sp.）等化石共生，同层出土的“乌木”^{14}C测定为距今37,400±3,000年和39,300±2,500年。上述发现对解决资阳人化石的年代问题有重要意义（张森水等：《资阳人B地点发现的旧石器》，《人类学学报》3卷3期）。

古交遗址为一旧石器时代晚期大型石器制造场遗址，位于汾河右岸高出河面约100米的谷坡上。绝大部分石制品暴露于地

表，但少数被晚更新世马兰黄土所覆盖，并从黄土底砾层中发现若干标本，所以可以将遗址的时代归入晚更新世晚期。古交的石器工业和下游的丁村文化有一定的相似性。例如石制品粗大，黑色角页岩原料占绝大多数，打片使用锤击法和碰砧法，石器以砍斫器和刮削器为主，两面或交互加工的砍斫器占相当比例，等等。但是，古交石器也有不同于丁村石器的特点。例如，丁村的三棱大尖状器和石球不见于古交，而古交的加工较为精致的半月形刮削器和具有新石器风格的“舌形刮削器”、“凿形器”也不见于丁村。王向前、陈哲英认为，古交石器的发现填补了丁村文化和鹅毛口文化之间的空白（《史前研究》4期）。

三 关于年代学、古环境和石器类型学等方面的研究

刘东生、丁梦林继1983年发表《关于元谋人化石地质时代的讨论》一文(《人类学学报》2卷1期），提出元谋人的时代为距今50—60万年的看法之后，又在1984年发表《中国早期人类化石层位与黄土——深海沉积古气候旋回的对比》一文（《人类学学报》3卷2期），提出中国人类化石的时代：公王岭蓝田人为距今73—80万年；北京人（指北京人遗址的第1—11层）为距今59—12.8万年；元谋人、陈家窝蓝田人与早期北京人时代相当；和县人与晚期北京人时代相当；大荔人和丁村人与最后期的北京人时代相当。

陈铁梅等在《人类学学报》3卷3期公布了华北九个旧石器地点共二十六个样品的铀系法测定结果并加以讨论。他们认为：周口店第1地点(北京人遗址）第1—3层为距今$25.1^{+4.1}_{-3.1}$万年；周口店新洞人及其文化为距今13.5—17.5万年；山顶洞两个样品分别为距今1.9±0.1万年和2.1±0.4万年；大荔人为距今18—23万年；丁村人及其文化（以54:100地点为代表）为距今16—21万年；许家窑文化为距今10—12.5万年；萨拉乌苏文化及“河套人”为距今3.7—5万年；水洞沟遗址旧石器文化层的两个样品分别为距今3.8±0.2万年和3.4±0.2万年；河北迁安爪村石器地点两个样品为距今4.8±0.2万和4.4±0.2万年；小南海遗址第六层（最下层）的两个样品为距今2.14±0.13万年和1.89±0.15万年。

另外，陈铁梅等在1984年4期《文物》上公布了一些旧石器遗址的^{14}C年代测定结果。它们是：许家窑大于4万年；山西

省蒲县薛关为距今13,550±150年；辽宁省东沟县前阳洞为距今18,620±320年；广西桂林宝积岩为距今24,760±900年和12,980±150年；云南省呈贡县龙潭山二号洞为距今30,500±800年。

和县人遗址是位于长江中、下游的一个直立人化石地点。这个地点的动物群具有南、北类型混合的特点。近年，一些研究者根据动物成分及其生活习性分析，认为和县动物群反映一种比今日当地气候偏凉或寒冷的环境。徐钦琦和尤玉柱在《人类学学报》3卷1期发表文章，又将这种分析结果和深海沉积物对比，认为和县动物群的地质时代相当于海洋的O^{18}的第8阶段，距今约28—24万年。当时正处于一个寒冷期，正是气候变冷导致华北各地的北方类型动物多次向温暖的南方迁徙，结果产生了南、北混合的和县动物群。徐钦琦在《人类学学报》3卷4期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进一步指出：由于气候带南移，当时和县地区的年平均气温可能在10°—12°C，比现今约低3°—5°C；降水量似与今日接近，即比现今的华北南部地区（山东、河南、山西等地）要湿润些。

尤玉柱等根据吉林前郭查干泡青山头和人类化石共生的哺乳动物化石以及对剖面所作的孢粉分析（《史前研究》4期），得出查干泡一带1万多年来气候经历了湿冷—干冷—湿冷—干冷—温湿的变化。而青山头人生活时期处于湿冷阶段，植被为森林—草原环境，当时这里的居民可能过着以渔猎为主的生活。

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发现的石器地点数以百计，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研究材料。但是，我们对石器制作的技术和类型学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李炎贤关于石片台面分类和盖培对虎头梁石器工业中石核（作者称为阳原石核）的工艺程序的分析的文章（均见《人类学学报》3卷3期），是很有意义的工作。李文将中国旧石器工业中常见的石片台面分为零台面、刃状台面、点状台面、线状台面、天然台面、素台面（过去称光滑的台面、打击台面或打制台面）、有疤台面、有脊台面和修理台面等九类，作为一个初步建议提供同行们修改补充。盖文从动态类型学角度把阳原石核的工艺程序划分为四道工序和两个亚类型，论证了这种石核发生形态变化的机制。在工艺特征上，阳原石核与日本北海道的峠下型细石核相当，从而证明两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曾有共同的工艺思想。

四 出版情况

出版方面，由文物出版社出

版的《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已于国庆节和读者见面。该选集收入我国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贾兰坡的论文或著述摘录二十三种，计约四十万字。它为有关专业和非专业人员了解中国的旧石器文化、尤其是关于北京人、蓝田人、西侯度文化、匼河文化、丁村文化、许家窑文化、峙峪文化、鹅毛口文化以及中国细石器等专题提供了很大方便。另一部关于中国旧石器考古的重要文集——《裴文中科学论文集》亦已交付出版，不久后将由科学出版社奉献于读者面前。这部有四十多万字的文集收集了中国旧石器考古的奠基人、北京人第一个完整头盖骨发现者、已故裴文中教授的一部分重要著述，内容涉及旧石器考古、第四纪哺乳动物和第四纪地质等多方面。它的出版将是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一件大事。由贾兰坡、黄慰文合作编写的《周口店发掘记》，是继裴文中1934年发表的《周口店洞穴采掘记》之后的一部系统介绍周口店发掘史的著作。它根据大量未曾发表过的档案资料和作者（贾兰坡）的亲身经历写成，拥有大批珍贵历史照片。它是人们了解中国古人类学研究史的一部重要文献。该书的中文版和日文版已于北京人第一个完整头盖骨发现五十五周年（1929年12月—1984年12月）的前夕和读者见面。中文版由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日文版由外文出版社和日本经济新闻社在日本合作出版，书名为《北京原人匆匆来去》。此外，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有关元谋人研究的论文集《元谋人》。它汇集了有关元谋人化石、元谋人文化、元谋盆地的地层与第四纪冰期、元谋早更新哺乳动物群、元谋组地层的孢粉分析以及元谋盆地的细石器和新石器遗址等方面的论文十六篇，共二十八万多字。

新石器时代考古

严文明

1984年，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又有较大的发展，田野考古工作仍然保持较大的规模；发表资料有所增加，据不完全的统计，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的调查发掘报告和简报等将近一百篇，另外还有专刊；研究论文也较多，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对某些问题

的不同观点的讨论也比较活跃。

一 新石器时代早期

学术界对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研究仍然十分关注。一些调查发掘资料正在陆续公布，其中主要有《1979年裴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期）、《山东滕县北辛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期）、《河北武安洺河流域几处遗址的试掘》（《考古》1期）、《河南新郑唐户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3期）、《陕西临潼白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1期）和《宝鸡北首岭》（专刊）等。

裴李岗发掘资料主要出自墓葬，器类单纯，有千篇一律之感。报告将其分为上下两层，实际是代表早晚两期，但器物的变化仅是局部性的，表明其年代差距并不很大。裴李岗的石器主要有舌形石铲、有齿石镰和有足石磨盘三种，并有少量似细石器的刮削器。陶器则主要有平底碗、圜底钵、三足钵、双耳壶和筒腹罐等，一般为素面，仅少数饰篦纹、指甲纹、划纹或乳钉纹。这些特点同河北武安磁山既有相同或相近的一面，又有十分明显的差别。人们在权衡二者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时掌握的分寸不同，因而在考古学文化的划分上也有不同。有的划为一个文化即磁山文化或磁山·裴李岗文化，下面再分为磁山类型和裴李岗类型；有的则分为两个文化，即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同时认为二者有密切的关系。裴李岗遗址的年代，目前共测过六个^{14}C数据，其中两个明显偏早，一个偏晚，其余三个经校正为公元前5495—5195年，与密县莪沟的三个数据十分接近，大体上可以代表裴李岗类型的年代。

山东滕县北辛遗址已作为北辛文化的代表性遗址，但它的资料到本年度才全部公布。该遗址石器多打制，多斧、敲砸器和宽舌形铲，石磨盘仅个别的有足，有石镰和有齿蚌镰。陶器中最多的是垂腹圜底鼎、圜底钵、平底碗、双耳壶、筒腹罐和支脚等，纹饰主要有窄堆纹、篦纹、划纹和乳钉纹，有些钵口沿有红边。从总体风格看，与磁山文化有不少近似之处。发掘报告将其分为三期，并认为它与大汶口下层、王因下层和大墩子下层的部分遗物相似，属同一文化。实际上，与上述遗址相同的只是北辛晚期的部分遗存(如H32、H506等)，年代上与淮海地区的青莲岗期相当，应与北辛文化相区别。而北辛文化属新石器时代早期偏晚阶段，与磁山文化大体同时或略晚。

陕西临潼白家村是一处单纯的老官台文化遗址，由于它和其他一些遗址的发掘，引起了对老官台文化的性质、年代乃至命名等方面问题的讨论。因此，白家村遗址资料的公布，会有助于廓清某些疑团。

陕西宝鸡北首岭下层的文化性质也是人们普遍关注的。从《宝鸡北首岭》发表的资料来看，这个"下层"并不单纯。其中一部分属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如M9、M12等是），只有一部分是较早的（如M10），应该加以区分。而发掘报告将其统称为"北首岭下层类型遗存"并全部归入仰韶文化，作为半坡类型的直接前身，是不适当的。

此外，本年内还发表了一些讨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论文，主要有安志敏的《略论华北的早期新石器文化》（《考古》10期）、吴加安等的《汉水上游和渭河流域前仰韶新石器文化的性质问题》（《考古》11期）和郎树德等的《关于老官台文化的新认识》（《考古与文物》6期）等。

安志敏重申了他以前的观点，认为华北地区早期新石器遗存可分为三个文化系统：位于河南的称裴李岗文化，位于河北的称磁山文化，位于陕西和甘肃东部渭河流域的称大地湾文化。至于陕南汉水上游的则应称为李家村文化，与华北早期新石器文化不属同一个范畴。他还认为北首岭（按指下层）的三足罐等应属于仰韶文化早期，而不是大地湾文化。

吴加安等的文章也将陕甘的"前仰韶新石器文化"分为李家村文化、北首岭类型和"白家村一类文化遗存"，后者与安志敏所称大地湾文化的内涵基本相同。文章对各类遗存进行了较详细的分析，认为只有白家村一类文化遗存才是真正的前仰韶文化。以北首岭下层为代表的一类遗存（包括老官台、元君庙H406等）应称为仰韶文化的北首岭类型，它与白家村一类文化遗存在年代上不相连续，也没有直接的地层关系。而李家村文化是否为前仰韶文化，是否是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渊源之一，都是值得怀疑的。

郎树德等的文章回顾了老官台文化研究的历史，对它的文化特征、分期和命名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大地湾、北刘、老官台、北首岭下层等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均与仰韶文化有实质性的区别。它们之间也存在着阶段性和地区性的差别，因此要进行分期的研究。文章将老官台文化分为三期：大地湾一期的主要遗存、北刘下层、紫荆一期、元君

庙H403、H405等属于早期、老官台、元君庙H406和大地湾一期的部分遗存属于中期，而北首岭下层（按应排除其属半坡类型的部分）属于晚期。文章不同意那种把老官台文化隶属于裴李岗文化或磁山·裴李岗文化的观点，认为二者是地域相邻、时代相近，而分属于不同系统的两个文化，不能混为一谈。

二　新石器时代晚期

本年度关于新石器晚期文化的研究仍是做得较多的，无论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还是大溪文化，都发表了一些新的资料，也有一些研究性论文。

关于仰韶文化的调查、发掘报告主要有《铜川李家沟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与文物》1期）、《咸阳市、高陵县古遗址调查简报》（同上）、《甘肃秦安王家阴洼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考古与文物》2期）、《河北武安洺河流域几处遗址的试掘》（《考古》1期）、《内蒙古包头市阿善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期）、《陕西华阴南城子遗址的发掘》（《考古》6期）和《宝鸡北首岭》（专刊）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北首岭、李家沟、王家阴洼和南城子的发掘资料。

铜川李家沟是一处多层次和多期别的仰韶文化遗址，它的第一期属半坡期，第二期属庙底沟期，第三期属半坡晚期，第一期又分早晚两段，晚段即所谓“史家类型”的遗存。这一发现对仰韶文化的分期再次提供了同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相同的地层关系的证据，可惜发掘报告整理过于粗疏，遗物期属多有误植者。

宝鸡北首岭是一处大型的仰韶文化遗址，经过1958年8月至1960年12月和1977年10月至1978年6月两个阶段的发掘，共揭露4727平方米，发现房屋五十座、灰坑七十五个、窑四座和墓葬四百五十一座等，工作规模是很大的。其中除少量属老官台文化（下层的一部分）和仰韶文化的庙底沟期（上层的一部分）外，绝大多数是属于半坡类型的。

北首岭的五十座房基中除F27和F33略晚外，其余都是属于半坡类型的。分为三组：北组朝南，西组朝东，东南组朝西北，东边因临近河岸已经崩塌，看来原先是分组围成圆圈的，与临潼姜寨早期村落的格局大致相同。且西组和东南组均有一座大房子，这种情况也与姜寨相同。只是姜寨的小型房屋有方形和圆形两大类，半坡亦然，而北首岭只见一座圆房子，其余全是方形，显得更加整齐。这一村落格

局和丰富的墓葬资料，是研究仰韶文化社会性质及其组织结构的又一批重要资料。

秦安王家阴洼距大地湾遗址不远，1981年秋在该处发现了仰韶文化的墓地。整个墓地有六十三座墓，分为两组。西北一组有三十座长方竖穴墓和两座瓮棺葬，头朝东南；东南一组有三十座长方竖穴墓和一座瓮棺葬，头朝东北。二者紧相毗连，年代相若，均属半坡类型的晚期，应是两个具有亲密关系的人们共同体的公共墓地。这一墓地的资料对于研究仰韶文化的社会组织也是很重要的。

华阴南城子是一处庙底沟期的遗址。渭河流域这类遗址不少，但发掘报告多未正式发表。南城子的资料是发表资料中比较丰富的一批，对于认识渭河流域庙底沟期遗存的文化特征是有帮助的。这个遗址的陶器与河南陕县庙底沟有不少相同和相近的地方，也有明显的差异。如彩陶碗较少而敛口瓮（缸）和筒形罐较多，彩陶花纹中以迴旋钩连纹为主而缺少垂弧纹和凸弧纹等。因此不能简单地归属于庙底沟类型，应是与庙底沟类型同一时期的另一地方类型的遗存。

关于仰韶文化的研究论文，仅见吴耀利的《试论后岗仰韶文化的年代和分期》（《考古与文物》6期）。该文根据地层关系将河南安阳高楼庄后岗的仰韶遗存分为早中晚三期，并指出目前所测后岗^{14}C标本的年代均属中晚期者，故显得比半坡类型为晚。如果把早期的年代估计进去，可能是和半坡类型差不多的。

本年度发表的马家窑文化的资料有《青海民和阳洼坡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期）和《青海民和县阳山墓地发掘简报》（《考古》5期）。

阳洼坡遗址是1980年发掘的，据说文化层可分为两层，从遗物看确实有早晚之别。早期有双唇的环形口尖底瓶，侈口夹砂绳纹罐和饰花瓣纹的卷缘曲腹盆，饰圆点纹的敛口钵等，当属仰韶文化的庙底沟期。晚期是主要的遗存，与甘肃石岭下遗存大体相当，应属马家窑文化的早期。这个遗址如能正确分期，将对马家窑文化如何继承庙底沟期发展而来的问题提供重要的启示。

阳山是一处半山至马厂期的墓地，1980年和1981年共发掘墓葬二百三十座，墓葬的大小和随葬品的多少有较明显的差别。绝大多数为单人葬，也有二人、三人、四人和五人的合葬。葬式特殊，在可看清葬式的一百一十座墓中，俯身直肢葬占绝大多数，次为俯身屈肢、仰身屈肢、侧身屈肢

和二次葬，仰身直肢者仅有一座，这与过去发现的兰州土谷台、永昌鸳鸯池和乐都柳湾等半山、马厂期的葬俗很不相同。随葬陶器中除常见各类别外，尚有喇叭状陶器。它的中间为筒形，一头碗形，另一头喇叭形，两头相通，上下各有一环纽，备系带用。此器仅出于随葬品丰富的大墓中，推测是一种腰鼓。

关于红山文化的研究继续引起学术界的注目。发表的资料有《辽宁建屏县红山文化考古调查》（《考古与文物》2期）、《辽宁阜新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的发现》（《文物》6期）、《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发现玉龙》（同上）、《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1期），后者并同时发表了有关考古工作者的座谈纪要。论文则有《三星他拉红山文化玉龙考》（《文物》6期）和《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同上）。

喀左县东山嘴是我国新石器文化中首次发现的一处祭祀遗址。由前部的圆形祭坛和后部的方形祭坛组成，祭坛附近发现许多女性塑像，学者们认为与祈求丰收有关。在东山嘴遗址发现的前后，还曾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过积石塚和玉器窖藏，玉器中有龟、猫头鹰和猪龙等形象，其中多数也与祭祀有关。特别是建屏县牛河梁遗址发现数米高的女塑像和宗教性建筑物（可能是最古的庙），使得我们对红山文化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宗教信仰有了全新的认识，并将对今后全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给予有益的启示。

关于大溪文化的研究也有新的进展。本年度发表的资料有《秭归龚家大沟遗址的调查试掘》（《江汉考古》1期）、《湖北监利县柳关和福田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江汉考古》2期）、《天门龙嘴遗址调查》（同上）、《枣阳县雕龙碑遗址调查简报》（《江汉考古》3期）和《湖北王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2期）等。发表的论文有王杰《对大溪文化中几个问题的探讨》（《江汉考古》1期）和邵兴《论安乡划城岗遗址的两个问题》（《江汉考古》3期）等。目前关于大溪文化的特征与分期及其与屈家岭文化的关系等问题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些资料和论文将有助于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

三 铜石并用时代

近年来在龙山文化、齐家文化及其同时代的诸文化中不断地发现小件铜器，其中有些是红铜，有些是青铜或黄铜，人们推

测这时至少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期）。《考古》12期接着又发表了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第3296号墓中随葬的铃形铜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首次发现铜器》），其中含铜百分之九十七点八六，是纯度较高的红铜。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还有铅百分之一点五四，锌百分之零点一六，显然是原料中的杂质。由此可见，龙山时代其他遗址出土的所谓青铜或黄铜也不一定是人工合金，只不过其中的铅、锡或锌的杂质稍多一些而已。从技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它们都应是青铜时代前夕的产品。

早在三十年代初发现龙山文化之时，即同时在其典型遗址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今属章丘县）发现了夯土城墙，但学界对其城墙的年代多有怀疑。直至近年河南登封王城岗和淮阳平粮台龙山古城的相继发现，才引起普遍的重视，并把中国城市起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不过，这一工作还仅仅是一个开始，其后还将有许多新的发现和新的研究成果，本年度在山东寿光边线王的发现就是其中之一。边线王古城有很深的基槽，夯土中夹有许多龙山文化陶片，同时又被龙山文化的灰坑所打破，其年代应属龙山文化晚期的偏早阶段。平面略呈圆角长方形，东西宽180—190米，南北长约220米，面积40000多平方米，比王城岗和平粮台古城都大。在基槽中曾发现十一个奠基坑，坑中发现有人、猪、狗等骨架。目前该城正在继续发掘，仅已经发现的这些情况就足以看出其重要性了。

关于王城岗古城的性质的讨论颇为热烈。发表文章有杨宝成《登封王城岗与禹都阳城》（《文物》2期）、京浦《禹居阳城与王城岗遗址》（同上）、贾峨《关于登封王城岗遗址几个问题的探讨》（《文物》11期）、董琦《王城岗城堡遗址分析》（同上）、李先登《王城岗遗址出土的铜器残片及其它》（同上），对平粮台和王城岗古城同时进行研究的则有马世之《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古城址试析——兼论登封王城岗非夏都阳城》（《史前研究》2期）等。

杨宝成从五个方面分析了那种把王城岗城址看成是禹都阳城的论点，认为都是难以成立的。其中关键的有三个问题：一是年代不合，夏纪年本身就是一个尚待研究的课题，^{14}C年代又有误差，且一般应避免援引孤例。仅仅拿一个^{14}C年代同某些人对夏年的推算相扣合这种方法本身就不够科学，何况该^{14}C年代经校正后远远超出大家对夏年的估计

呢。二是地望难定，先秦文献未明记阳城所在，后人注解又有多种说法，不能肯定阳城必在登封。历史上同名异地的情况所在多有，不能因战国至汉的阳城在登封就断定禹都阳城也在同一地点。三是规模和遗迹性质不符，王城岗古城仅7000多平方米，比二里头一号宫殿基址还小，其中又无宗庙、宫殿建筑，左近也没有发现够得上王公贵族的墓葬，很难说是一国的都城，只不过是有防御设施的一般性聚落遗址。京浦则遍考古籍，认为先秦本无禹都阳城之说，即便王城岗是古之阳城，最多也只是禹避居之地而非国都。董琦和马世之也都认为王城岗不可能是禹都阳城。贾峨对杨宝成等的论点逐一进行了辩驳，认为王城岗古城在目前虽然还不能肯定就是禹都阳城，但也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至少是夏代初期或稍早的重要城址。随着发掘工作的进展，还会获得一些考古资料，对探索夏文化也许有所裨益。

关于铜石并用时代诸文化类型的划分，某些文化类型的分期、文化性质及其与其他文化类型的关系的研究文章也有不少。其中吴汝祚、杜在忠的《两城类型分期问题初探》（《考古学报》1期）将山东东部的龙山文化遗存（即两城类型）分为四期，大致反映了这一文化类型的全部发展过程。文章还从该类型与前承后继文化的关系及其与相邻的城子崖类型的关系的研究中，探索了两城类型在我国史前文化中的地位及其对古代文明的发生所作的贡献。方酉生《河南龙山、二里头与二里岗》（《考古与文物》3期）一文将所谓河南龙山文化分为后岗类型和王湾类型，二者处在同一发展阶段，已进入早期青铜时代（至少是它的晚期），属奴隶制国家夏王朝时期的文化的一个部分。梁星彭、陈超的《商县紫荆第四期文化遗存试析》（同上），将原来认为属龙山文化的紫荆第四期文化分为三组，认为一组属庙底沟二期文化，二组属屈家岭文化晚期，三组属客省庄二期文化。朱延平《〈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读后》和李健民《东下冯龙山文化早期遗存的再认识》（均载《考古》9期）两文都对东下冯“龙山早期”进行了分期，并都认为其中包含仰韶晚期和龙山早期的遗存，对于解决当地仰韶向龙山过渡的问题具有一定的价值。

关于湖北境内的龙山遗存，过去曾被命名为“湖北龙山文化”、青龙泉三期文化、桂花树三期文化、季家湖文化、长江中游龙山文化等，莫衷一是。王

劲、林邦存执笔的《房县七里河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江汉考古》3期）一文中，又提出了石家河文化的名称，并将其分为石家河类型、青龙泉类型、尧家林类型、季家湖类型、易家山类型等，惜未详论。

关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最重要的是大批玉器的出土和研究。发表的简报和文章有《1982年江苏常州武进寺墩遗址的发掘》（《考古》2期）、《上海福泉山良渚文化墓葬》、《江苏昆山绰墩遗址的调查与发掘》、《江苏常熟良渚文化遗址》、陈丽华《江苏武进寺墩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遗物》和汪遵国《良渚文化玉敛葬述略》等（均载《文物》2期）。此外，周南泉《故宫博物院藏的几件新石器时代饰纹玉器》（《文物》10期）介绍了几件清宫旧藏的良渚文化玉器。

早在本世纪初年，浙江北部一带即曾大量出土玉器，其中有些被古董商倒卖到国外。三十年代又出土不少玉器，但因未经科学发掘，地层关系不明，难于断定它们的年代。直到1973年才在江苏吴县草鞋山发现随葬璧、琮等玉器的良渚文化墓葬。八十年代初发现了更多随葬玉器的良渚文化墓葬，仅江苏武进寺墩第3号墓一座墓葬，就随葬玉璧二十四件，玉琮三十三件，玉管和玉珠四十件，另有玉镯、玉坠、锥形饰及玉斧、玉锛等二十余件。这样大量地随葬玉器的情况，在我国新石器文化中是仅见的。按照《周礼》"苍璧礼天"、"黄琮礼地"的说法，这些玉器大部分应属祭祀用的礼器，随葬这些礼器的墓主人应是掌握祭祀天地权力的祭司或氏族首领。鉴于当时的社会上已存在某种礼制，说明即将跨入文明时代的门槛。

四　专题研究

本年度关于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专题研究涉及到制陶工艺、玉器工艺、工具复原、作物鉴定、农业起源、人种成份和年代测定等许多方面。李湘生《试析仰韶文化彩陶的泥料、制作工艺、轮绘技术和艺术》（《中原文物》1期）介绍了他自己通过实验对仰韶文化彩陶制作工艺的初步探索，有不少新颖的见解。他认为手制陶仅包括手捏成型法一种，而泥条盘筑法、内模成型法、外模成型法和拉坯成型法都属于轮制的范畴，并且都是仰韶文化时期所采用的。换言之，他认为过去所谓慢轮修整并不限于修整，而是一种初级的轮制方法，而过去所谓轮制仅指拉坯成型一种是不够的。不过他所举仰韶文化中存在拉坯成型的例子还有进一步斟酌的必要。与此同时，山东省

博物馆的锺华南也通过实验的方法制出了很好的蛋壳黑陶并通过了正式鉴定。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是三十年代初就注意到了的，其工艺之精，见过的人莫不叹为观止。但在当时条件下究竟是怎样制造出来的，一直得不到科学的解释。锺华南从选料、制坯、修整到烧成，都尽量采用龙山文化时期可能采用的方法，其关键是用刀架旋削泥坯和用匣钵入窑煅烧，从而获得了满意的效果。

彩陶和黑陶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最重要的两类陶器，过去对其工艺的研究仅限于成份分析和物理性能的测定；现在通过实验的方法复制出来，使我们对于原始手工业的这一重要领域已经达到的技术水平有了切实的了解。这种现时被称为实验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在我国刚刚开始，其发展前途是十分乐观的。

汪遵国在《良渚文化玉敛葬述略》中研究了良渚文化的琢玉技术，认为当时已用石英砂做解玉砂，用含石英粒的砂石做磨轮，并可能已有简单的琢玉机。王仁湘和袁靖将河姆渡文化的蝶形器同白令海峡两岸埃斯基摩人的翼形器做了比较研究，认为是同一功用的东西，即是绑在镖枪后头做定向器，并且进行了画图复原（《河姆渡文化蝶形器的用途和名称》，《考古与文物》5期）。这种看起来很难理解的器物，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云翔的《锯镰辨析》（《文物》10期）对新石器时代和部分青铜时代的这两种有齿工具进行了分辨和正名，认为外弧背或直背、内弧刃或直刃、单面刃或双面刃、刃薄而锋利、齿牙小而不均匀并可以竖向装柄的为镰，而直背直刃或外弧刃、刃部厚度与体厚相近、不开刃或双面刃、齿牙较大而均匀并适于横向装柄的是锯。这些研究都是探索新石器时代的技术发展水平和经济生活所必需的基础性工作。

本年度发表的关于农业起源和新石器时代农业遗存研究的文章甚多。主要有童恩正《略述东南亚及中国南部农业起源的若干问题》、何炳棣《中国农业的本土起源》、张光直《中国沿海地区的农业起源》、张之恒《中国原始农业的产生和发展》和佟伟华《磁山遗址的原始农业遗存及其相关问题》等（分别载《农业考古》1、2期）。加上地方性杂志发表的资料和文章，总数达数十篇之多，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好现象。在这些文章中，有的对出土农业遗存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和分析，有的介绍了国外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对于中国农业的起源，一般地都做到了针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把以黄河中

游为主的旱地农业起源和以江南为主的稻作农业的起源看做是既有联系又不相同的课题分别进行考察，并尽量吸收国外的研究成果。有的文章把我国原始农业分为火耕农业、锄耕农业、发达的锄耕与犁耕农业三大阶段。这些都是有益的探索。

韩康信和潘其风的《古代中国人种成分研究》（《考古学报》2期），全面地总结了我国古代人种研究的成果，指出从人种形成直到近代，我国各族人民基本上属蒙古人种，新疆的某些高加索人种的成分是在十三世纪以后逐渐产生的，这种同其他人种相对隔离的状态，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和长期持续稳定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作者深知根据骨骼形态所划分的人种集团同民族共同体不是一个范畴，但显然认为人种集团对于民族及其文化的形成并非毫不相干，而是起着积极的作用的。他们认为，在新石器时代，生活在黄河中游的具有中颅型、高颅、中等面宽和面高、中等偏低的眶型、较宽的鼻型、比较扁平的面和上齿槽突颌、中等身高等特征占优势的居民可能与传说中的华夏集团有关。黄河下游的居民较前者颅、面更高，面更宽，鼻形稍窄，身体也稍高，并有颅枕部变形、人工拔牙和口颊含球的特殊风俗，大概和传说中的东夷集团有关。浙江河姆渡文化居民的长颅、较低的面、宽而很平的鼻骨等特征都有别于中原地区的居民。福建昙石山和广东河宕等滨海地区的居民可能与这种长狭颅型有更多接近关系。广西甑皮岩洞穴居民有很大的颅长，属典型的长颅型。其颅高稍低，低面、阔鼻，上齿槽突颌明显，也与黄河流域的居民有明显的差别，总的组合特征可能和华南的其他长颅类型比较相近。这些长颅型的居民比中原同类更接近于南亚或赤道人种，他们可能和传说中的苗蛮集团有关。但后者人骨资料比较零散，传说史料又不充分，难于做明确的结论。今后在这个地区的考古工作进一步开展后，必定会有更多新的发现，那时也许能够做到比现在更加细致的划分。

关于年代学方面的研究，继考古研究所编辑出版《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83年6月）后，本年度考古研究所实验室、北京大学考古系实验室和文物保护科技所实验室都公布了新的年代数据（《考古》7期和《文物》4期），总数达二百三十七个，是发表数目最多的一年。此外，安志敏发表了《碳14断代与中国新石器时代》一文（《考古》3期），全面地讨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年代学问题。

关于在考古研究中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的问题也有新的发展。蔡莲珍和仇士华发表的《碳十三测定和古代食谱研究》（《考古》10期）一文，介绍了国外利用碳13测定古代食谱的情况，并对他们自己所测定的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一系列标本的初步结果进行了分析。指出仰韶文化早期的居民可能有将近一半的食物是小米，到山西陶寺龙山时代的居民，这一比例已增至百分之七十，且陶寺家猪的饲料中也有较多的小米和谷糠。这同迄今为止在黄河中游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农作物遗存一直以小米为主的情况是一致的，同时也说明由仰韶到龙山的两千多年中，当地以小米为主的旱地农业生产有了显著的发展。在黄河下游，山东烟台白石村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贝丘遗址的居民食谱中没有任何C_4植物（小米为C_4植物之一），到大汶口文化晚期则已占约四分之一，表明当地新石器文化经济类型的变迁及其同黄河中游的差别。这一研究领域显然有着广阔的前景。我们期待今后能测量更多的标本，提出和解决更多的考古学课题。

朱乃诚的《概率分析方法在考古学中的初步运用》（《史前研究》1期）是现代科技方法应用于考古研究的又一例证。该文以陕西渭南史家仰韶文化早期的墓葬资料作为对象，运用概率分析方法对各个墓葬的相对年代进行了排比，并将其划分为六个阶段。用地层关系和器物类型的排比进行验证，大致是吻合的。不过这种方法要获得成功，必须有准确的地层记录，更必须对出土器物进行准确的分型分式。换言之，这种方法一定要同地层学和类型学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而不是取而代之，否则难于达到预期的效果。

五　理论研究及其它

有关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理论问题的探索已开始活跃起来。张之恒根据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对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及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特征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史前研究》3期，《考古与文物》1期）。他认为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存在着不同的形式，作为过渡阶段的所谓中石器文化只是某些特定地区才存在的，包含的时间也很短，很多地区实际上不存在中石器时代，由旧石器时代直接向新石器时代过渡。这个问题在国外也是有争论的，但多数人还是认为存在着一个中石器时代，作为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一个时期，至少在欧洲等地应

是如此（参见论文集："Mesolithikum in Europa"，Berlin，1981。）。关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诸要素中，张之恒特别强调农业的作用，认为农业是核心，农业的发展促进或制约着磨制石器、陶器和家畜的发展。这个问题自从V。G·柴尔德提出以农业发生为标志的新石器时代革命的命题以来便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认为在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应该把原始农业提到应有的地位。但发生时期的农业在考古遗存中是很难确认的，有人认为农业的发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的契机可以追溯到中石器时代乃至旧石器时代晚期；此外，世界上还有非常广阔的地带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甚至整个新石器时代都没有农业生产，那些地方仍然有少量磨制石器和陶器，有的也还饲养家畜。所以在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给予原始农业应有地位的同时，也不宜把它强调到过分的程度。

利用考古资料说明原始社会史的关键问题以及原始社会历史的分期研究仍然受到关注，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张忠培《母权制时期私有制问题的考察》（《史前研究》1期）、夏之乾《谈谈同性埋葬习俗》（《史前研究》4期）、范志文《试论原始社会史分期的几个问题》（同上）等。由林耀华先生主编的《原始社会史》（中华书局出版），也广泛地征引了考古资料。张忠培的文章从考察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埋葬资料及有关民族资料出发，认为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除公有制外，还存在着私有制，它是驱使母系氏族制度向前发展的动力，值得一读。

考古学首先是一门历史科学，它要通过实物遗存来研究古代人们的历史。这历史是具体的，包括不同地方不同时期的人们在各方面的活动，而不是几条抽象的规律。考古学家也要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但这不等于套用社会学公式。关于这一问题，夏鼐在《什么是考古学》（《考古》10期）一文中已经讲得非常清楚。可惜现在还有某些讨论原始社会史的文章，往往成为一种纯思辨性质的逻辑推演，或是从某种既定的模式出发去征引考古资料和民族志资料，把它们生揉在一起。这样的研究当然是没有说服力的，也无助于学科的发展。

商周考古

王世民　郭振禄

一　夏文化的探索

关于夏文化问题的讨论，前几年略显沉寂。1983年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将夏文化的探索列为中心议题之一，《文物》月刊（83年3期）又发表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简报及发掘主持人安金槐的有关文章，这一学术讨论随之重新活跃起来。讨论的重点，集中在王城岗发现的城堡是不是禹都阳城的问题上。

安金槐1983年发表的《近年来河南夏商文化考古的新收获》一文，曾说："王城岗龙山文化中晚期的城堡遗址，目前虽然还不能肯定就是夏代禹都阳城或禹居阳城的城址，但它是夏代初期的重要城址，似无大的问题。"随后，他在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中提出，王城岗遗址"是夏代阳城的可能性极大"。1984年，又以《夏文化的探索》为题著文，在《人民画报》4期介绍王城岗的考古发现，进一步肯定"王城岗古城垣有可能就是我国古籍上所说'禹居'、'禹都'的夏代阳城遗址"。至于论据则仍是：（1）王城岗一带属夏王朝统治的主要地区范围之一，（2）发现面积近1万平方米的城堡，（3）城内有许多夯土建筑遗迹和可能为这些建筑而设的"奠基坑"，（4）稍晚于城址的龙山文化晚期遗迹出土一件青铜容器残片，(5) ^{14}C 测定的年代相当于文献记载中的夏代早期。

杨宝成所写《登封王城岗与"禹都阳城"》（《文物》2期），对安金槐的五条论据提出质疑，认为：（1）"出现了城堡并不意味着出现了国家"，王城岗城堡的面积约7580平方米，比二里头早商一号宫殿基址要小，相当于商代中期盘龙城遗址面积的十分之一，城内并未发现大型建筑遗迹，附近又未发现大中型墓葬，"只是一座筑有防御设施的一般的聚落遗址"。（2）"铜器的出现并不是由原始社会发展到奴隶社会的重要标志"。简报中说出土铜片的H617属第四期，而城墙垒筑时间属第二

期，“两者之间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无法确切表明青铜时代与奴隶制社会以同一个步伐在豫西开始”。（3）“人祭这一野蛮的宗教仪式产生于原始社会，它是生产力低下，人们的愚昧以及对自然界屈从的产物，而不是阶级对立的产物。”龙山文化遗址中曾发现大量人祭遗迹，所用人牲属氏族或部落战争中的俘虏，王城岗遗址的发现也应如此。“即使进入奴隶社会后相当一个时期，被用作祭祀的人牲，其主要来源还是战俘，而不是奴隶。”（4）“目前要确定较确切的夏代纪年是困难的，”即使按史学界有争议的约公元前二十二或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十七世纪这种纪年，王城岗遗址经树轮校正的^{14}C年代数据（公元前2455±109年）也远远超过夏代纪年的范围。（5）“在先秦文献中，未提到过禹都阳城的地望，而凡讲到其地望所在的史籍，皆为后人所作，并且有不同的说法。……简报中举出在登封告成东北城山岭发现战国时阳城，也不能说明夏代的阳城必定在这里。”但是，杨宝成没有对王城岗遗址的性质正面发表意见。

贾峨为答复杨宝成的不同看法，发表《关于登封王城岗遗址几个问题的探讨》（《文物》11期），逐条申述遗址发掘者的意见：（1）王城岗城堡的面积虽然较小（约1万平方米），但整个遗址的面积较大（约20多万平方米），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新发现的偃师商城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遗址，“它的大城之中有小城的现象对于王城岗的发掘有很大启发”。（2）王城岗城堡的构筑年代，约当煤山一期或稍早；出土青铜器残片的H617，相对年代晚于煤山二期，结合煤山遗址二期灰坑所出坩埚上的冶铜痕迹，“可以证明中原地区的青铜铸造工艺已有一段发展的历史。”（3）王城岗城堡内并未发现王陵和宗庙遗迹，把奠基坑作为祭祀坑来对待，认为“其中的人骨架属于人牲，当为在氏族或部落中的俘虏”，这种观点是很难令人首肯的。（4）据推算，夏朝的年代一般认为是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十七世纪，或公元前二十二世纪到公元前十八世纪，史学界的争论再大，大体上没有超越这个年代范围很远；根据王城岗二期灰坑所出木炭的^{14}C测定数据，参考二里头遗址的上下限（公元前1900—1500年），“把王城岗古城堡的年代定在约当或稍早于夏代开国之年，也不是没有可能性的。”（5）列述《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一书中的有关考证，认为“禹都阳城的说法也不是不可信的”，

又说“汉代以后的文献材料，也并非对于研究三代文化毫无意义。”总的说来，贾峨对王城岗城堡性质的意见，大体维持1983年简报的提法，“目前虽然还不能肯定就是夏代禹都阳城或禹居阳城的城址，但它是夏代初期的重要城址，似无大的问题。”

讨论王城岗城堡性质的，还有京浦、董琦二位分别发表的文章。京浦所写《禹居阳城与王城岗遗址》（《文物》2期），首先分析有关的文献资料，认为“在禹与阳城关系上，《孟子》之说较妥”，即阳城为禹避舜之子的居处；继而分析王城岗城堡的情况，认为“如果将其作为夏代的都城，实嫌过小”，而应是禹或益的避居之地。董琦则根据王城岗城堡的建筑技术，比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显得原始，王城岗城堡的建筑使用期按^{14}C年代数据又已超出夏代纪年，因而它既不是禹都阳城，也不是禹时所筑之城；最后引证文献上有关“鲧作城郭”的记载，提出“王城岗小城堡有可能是夏部族首领所作之城”，“是文明史前夕的一座城堡”（《文物》11期）。

至于整个夏文化问题，过去一年没有发表全面论证的文章，只有殷玮璋写了《有关夏文化探索的几个问题》（《文物》2期），对二十多年来的探索性研究进行评述。他将历年的讨论归纳为七种意见，指出各家主要是对二里头文化的四期遗存是否可分，它们是夏文化还是商文化，抑或一、二期属夏，三、四属商，以及河南龙山文化与二里头一期之间，是否存在发展继承关系，彼此的观点截然不同。因此，当前迫切需要进行的一项工作是把历年来发现的资料尽快地、客观地、全面地公布出来，以便大家进一步分析比较，进行各种专题研究。随后，殷玮璋又以“探索夏文化的工作从何着手”为中心，多方面论述这一探索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认为：“一个文化可以跨越两个以上王朝时期，两个不同的文化也可能在某一王朝经历其交替、融合的过程”；“把有迭压关系的地层强调为两种文化之间有继承关系的地层学证据是没有意义的，有关文化之间的关系应借助于器物形态学的研究。”他又强调：“在中原地区当时并非只有夏商两个族或国家，有理由认为当时还有别的族或政治实体”；“关于夏商文化是否同源，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夏商两族在历史上是并存而略有交错的”；“夏可以包含族、国家、王朝、地域、文化等不同的概念”。该文提出这些颇具启发性的问题，有助于夏文化探索工作的

进一步深入。

殷玮璋本人对夏文化问题的看法，前曾在《二里头文化探讨》一文（《考古》1978年1期）中，提出二里头文化第三、四期遗存与一、二期遗存相比，在文化面貌上存在差异与变化的观点。认为“二里头三期遗存可能为汤都西亳的遗迹”，“具有一定特征的二里头下层文化”，有可能是我们探索中的夏代文化，或可说是夏代后期文化”。他在1984年新发表的《二里头文化再探讨》（《考古》4期），通过具体陶器、青铜器、其他遗物和遗迹的对比，进一步说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中出现的这组文化因素，与商代二里岗期遗存中的同类器之间在形态上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文中又举商周之际和周秦之间的器物变化情况为例，再次提出把二里头文化三期的变化“同汤伐桀、商灭夏的历史事件联系起来可能是合理的”。他又主张，“既然三、四期遗存中有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新的文化因素，那么确切地说，似有把三、四期遗存与第一、二期遗存为代表的文化加以区分的必要”。与殷玮璋持相似观点的，还有方酉生的《河南龙山、二里头与二里岗》一文（《考古与文物》3期）。该文认为：“二里头遗址的第三期文化正是商汤都西亳时期的物质遗存。而早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的一、二期文化则可能是夏王朝晚期的遗存。二里头文化的第四期则是仲丁迁隞以后的商代中期的物质文化遗存。”

与此同时，郑光在新发表的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7期）中，对二里头遗址几期文化的进一步区分，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提出一些新的看法。他主张二里头文化中变化较大的是一、二期之间，而不是二、三期之间，认为简报发表的Ⅲ区发掘资料，“反映出两者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其间的演变是渐进的”。又说：“二里头四期是与二里岗期下层同时的，并直接发展为二里头五期（二里岗期上层）”。

另外，赵朝洪《有关岳石文化的几个问题》一文（《考古与文物》1期），根据二十多年来山东平度县东岳石村、诸城县前寨、长岛县大黑山岛北庄及泗水县尹家城等遗址的发掘资料，通过典型器物特征、分布范围、地层关系及^{14}C测定数据等方面的分析，对东岳石村这种类型文化的特征、年代和族属等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探讨。文中提出，岳石文化在时代上晚于典型龙山文化，至于相对年代的下限，由于尹家城遗址曾发现相当于二里岗上层文化的商代遗存迭

压其上的地层关系，表明在泰沂山脉以西的地区不会晚至早商时期，而在胶东地区则延续的时间可能稍长一些。他又根据古史传说资料，古代居住在黄河下游和淮河流域的是夷人，直至夏商时期仍是如此，推断“岳石文化就是夏代至早商时期居住在现今山东（包括苏北部分）地区的夷人所创造”。岳石文化的性质虽然尚需在积累更多考古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它的发现和确认对于夏商时期历史研究的意义则是不言而喻的。

二 商殷时期

1984年发表的商殷考古新资料，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偃师尸乡沟商城的报道(《考古》4、6、10期)。1983年夏季发现的这座城址，北倚邙山，南临洛河，西距汉魏洛阳故城10公里，二里头遗址在它西南5—6公里。经考古所洛阳汉魏城队、河南二队先后钻探，判知城址的平面接近长方形，范围比郑州商城略小，南北现长1700米，东西最宽1215米，总面积约190万平方米。城墙用夯土筑成，除南墙已被洛河冲毁外，其他三面基本完整。目前已经找到七座城门和几条纵横交错的干道，又发现几处大型建筑基址。南部居中的一处基址，面积近4万平方米，为二里头一号宫殿遗址和王城岗城堡遗址的四、五倍；基址四周绕以夯土围墙，墙内有以宏伟宫殿为中心的建筑群。城址的规模表明，这既不是一般聚落，也不可能是方国城堡，而应是一代王都。

关于偃师商城的具体年代，《考古》6期发表的初步勘探和发掘简报曾根据所掘探沟断言，“商文化的二里岗期当是该城历史上的兴盛时期之一；在与二里岗上层相当的某段时间里，城墙曾作过修补；该城废弃的年代，约相当于二里岗上层晚期或更迟一些的时期。”同时又指出，“在偃师商城城墙夯土及地层中都发现了一些二里头类型的陶片”，这里“虽不敢说一定有属于二里头文化的城址，但存在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可能性似乎毋庸置疑”。正式发掘开始以后，这里又曾发现几座二里岗期下层墓葬打破城门路土的现象，使城址的年代下限得以进一步明确。因此，偃师商城无疑是一座商代前期的重要城址。根据《汉书·地理志》河南郡偃师县下有班固自注“尸乡，殷汤所都”，以及其他文献的类似记载，而城址中部又恰好有一条名叫“尸乡”的长沟东西横穿，两篇相继发表的简报作者段鹏琦、赵芝荃等同志都肯定，这座城址很可能是商汤所都的“西亳”。随后，赵芝荃又分

别与黄石林、徐殿魁联名发表《偃师商城的发现及其意义》（《光明日报》4月4日）、《河南偃师商城西亳说》（《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二文，认为偃师商城的发现，“不仅可以填补商代早期（夏商文化之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缺口，也将可以缩短对夏文化的认识距离。”至于偃师商城和二里头遗址之间的关系，则认为：“一种可能是偃师商城如若建于二里头文化三期，则它和二里头三、四期遗址同属商代早期。两地相距不远，应同属西亳的范围，只是建筑形制和使用目的不同而已”；“另一种可能是偃师商城如若建于二里头文化四期，那么就应当把夏、商文化之分界放在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间。偃师商城属于商代早期，二里头三期遗址则属于夏代末期，一兴一废，取而代之。”

彭金章、晓田合写的文章《试论偃师商城》（《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支持偃师商城为汤都西亳的观点，又有一些新的补充。他们根据安阳小屯所出甲骨文以武丁时期为最早，考古遗存中属于盘庚、小辛、小乙时期的遗迹、遗物较少，特别是殷王陵的营造也从武丁时期开始，认为丁山在《商周史料考证》一书中提出的“武丁始居小屯”的说法比较符合历史实际。他们又根据历史文献有盘庚曾经迁都偃师的记载，而新发现的偃师商城又曾于二里岗上层时期进行修补，认为这“有很大可能是盘庚时期所为”，进而推测“偃师商城与安阳殷墟在文化上应有其相互衔接的环节”。

但是，也有一些同志对偃师商城的年代和性质持不同看法，1984年发表过文章的主要有邹衡和郑杰祥。邹衡在《偃师商城即太甲桐宫说》（《北京大学学报》4期）一文中，提出偃师商城不是汤都西亳，而应是商代初年“太甲所放桐宫，乃早商时期商王之离宫所在”。他认为，历史文献有关伊尹放太甲的记载可信无疑，但对桐宫的地望则众说纷纭，其中唯偃师一说为清代以来多数学者所信从，城址的发现更可证实此说的不可易移。该文还认为，“由于偃师商城的发现，从另外一个方面进一步证明了郑亳说的可靠性。同时，又因为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都晚于二里头文化遗址，从而证明二里头文化二至四期已不在早商的年代范围之内，而是在夏年的范围了。”郑杰祥的《关于偃师商城的年代和性质问题》（《中原文物》4期）则提出，该城的建造和使用年代并不早于二里岗下层时期，而是建筑于二里头文化的

废墟之上，延用和繁荣于二里岗上层时期，应是与郑州商城基本上同时并存的商代早期重要城址之一。该文认为，偃师商城不大可能是汤都亳邑，应是商人灭夏以后建立的一座重镇，“它可以称之为商王朝的别都，而类似于周人在灭商以后营造的东都洛邑。”

关于郑州商城，《中原文物》1期发表了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收获。其中，城内东北部和中部偏南地方发现的夯土基址，长度都近40米，有的还有间距5.3米、直径1.1米的柱基槽，这是了解该城布局的新资料；城北一处制骨作坊遗址的二里岗下层堆积，发现一些非正常死亡的人骨架，有的有身无首，有的与猪骨架埋在一起，应是当时的祭祀遗迹；再有两个地点，在灰坑中分别发现一批较完整的二里岗上层和下层的陶器，有助于更好地进行郑州商代遗址的陶器分期。简报还提到，城内东北部商代夯土基址上面叠压的战国夯土基址中，发现一些带“亳”字的陶豆。杨育彬等根据东周时期殷人后裔的住地多有“亳社”的记载，认为“这里出土的‘亳’字陶文也只能与当时管城的亳社有关，不可能与‘亳城’有关”。换句话说，他们不赞成邹衡为提出郑亳说对郑州过去发现的同类陶文所作的解释。

为讨论郑州商代文化的分期和年代问题，李民在《郑州的商代文化》一文（《史学月刊》2期）中，将洛达庙晚期、南关外期、二里岗期下层和上层，以及稍晚的白家庄期，统统划归为商代前期，而将人民公园期归入商代晚期。他根据几处遗址的层位关系所确定的相对年代，^{14}C测定的年代数据，以及一般推算的商代积年，认为“郑州商代前期的，即属商代第二十个国王盘庚以前的时代，而人民公园期与殷墟早期相似，其时代大体与商代第二十三个国王武丁时期的或稍后的相当。”至于郑州商城的性质，李民仍认为是“仲丁所建的隞都”。仇祯的《关于郑州商代南关外期及其他》（《考古》2期），又提出“将南关外和二里岗下层的一部分置于早商或先商是不适宜的，它们同二里头四期皆属商代中期的一种文化发展期。”

1984年发表的安阳殷墟发掘资料，仅有孝民屯南地的一座车马坑，内埋一车二马，年代属殷墟三期（《考古》6期）。同刊又发表杨宝成的《殷代车子的发现与复原》一文。该文综合殷墟发掘五十多年来发现的十八辆殷代车子遗迹，并在分析过去几种复原方案的基础上，绘制了新

的复原图。杨宝成的《殷墟墓葬发掘与研究》一文（《殷都学刊》2期），在他本人及考古所安阳队其他同志近年所作殷墟墓葬研究（《考古》1977年1期、1983年10期，《中原文物》1981年3期、1983年1期）的基础上，再次进行简明的论述。他将殷墟墓葬分为五类：（1）带四个墓道的大型墓，已发现八座，都在侯家庄西北岗，墓主人应是殷代社会中的最高统治者——国王。（2）一般带一、两个墓道的中型墓，已发现二十二座，墓主应是殷代社会中的大奴隶主贵族，例如妇好墓。（3）长方形竖穴中小型墓，已发现约百余座，墓主应是殷代社会中的中小贵族奴隶主。（4）长方竖穴形小型墓，已发现约三千四百余座，墓主应是殷代社会中的平民。（5）无墓圹墓，墓主应是殷代社会中的奴隶。该文还曾谈到二、三类墓往往成群分布，反映了墓主生前有着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联系；又谈到四类墓可分成许多不同的墓区，同一墓区往往出土相同的族徽，应是不同族的族墓地。杨宝成并且认为，在殷代国王和贵族奴隶主墓中发现的众多殉葬人，有一部分应属墓主人的奴隶，成千座祭祀坑中的被屠杀的人牲也有一定数量的奴隶，他们生前大多是服侍贵族奴隶主的家内奴隶；而无墓圹的死者则大多是从事生产的劳动奴隶。

其他新发表的商殷或相当时期考古资料，陕西地区有耀县北村发现的商代遗址，所出陶器的形制和纹饰，与郑州二里岗相似，是除华县南沙村、蓝田怀珍坊以外，陕西发现的又一处商代遗址（《考古与文物》1期）；陕北清涧附近再次发现的商代铜器，有年代较早的高圈足盘和曲内戈，又出土曾见于陕西绥德、山西石楼的蛇首铜匕和金珥饰，具有相同的地方特色（《考古》8期）。

北方有河北蔚县壶流河诸遗址、唐山古冶遗址和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的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期，《考古》8期、9期），以及文启明的《冀东地区商时期古文化遗址综述》（《考古与文物》6期）。蔚县简报作者孔哲生等，将当地相当于中原夏商时期的遗存分为四个阶段，认为第一、二两个阶段的遗存，分别晚于本地的龙山时期、早于磁县界段营和新乡潞王坟，年代都在夏纪年范围内，其主体成份与“海河水系地区目前称之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存同属于一系统文化”；又有两种成份“分别与太行山脉东麓漳河流域地区的先商文化和太行山西麓汾河中游地区的考古文化有联系”；第三阶段遗存

与第一、二阶段的面貌既有相似之处，又有较大的差别，“其主体部分似乎受到某种因素影响而急剧变化”，目前在海河水系地区尚未发现类似的遗存；第四阶段遗存与前三段大相迳庭，显系不同系统的文化遗存，“大概是含有北方文化因素的早商文化或早商文化的北方变体”。文启明的文章将冀东（主要指唐山地区）一带相当于中原商时期的数十处遗址分为三种类型：(1)以滦南东庄店遗址下层为代表，所出器物与唐山大城山、昌平雪山、邯郸涧沟、磁县下潘汪等龙山文化遗址相近，是当地这个时期遗址的早期类型；(2)以唐山古冶遗址下层（即第三、四层）为代表，是当地这个时期遗址的主要类型，其早期阶段的器物与郑州二里岗接近，估计年代与之大体相当，晚期阶段要晚于二里岗；(3)以古冶遗址下层(即第一、二层）为代表，[2]大体相当于殷末周初。该文在谈到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关系时提出，冀东这类遗址的文化内涵与夏家店下层文化本不同源，它很可能是“受雪山及冀南龙山文化影响，并保持自身特征的一种地方文化。”这类文化极有可能从古冶类型往后，“完全为强大的周文化所融合，其中一部分或许发展为早期的燕国文化”。

三 西周时期

在回顾一年来西周时期的考古研究成果以前，有必要简单地介绍探讨“先周文化”的一些情况。所谓“先周文化”，一般理解应指古公亶父率领族众在周原定居到武王灭殷这段时间的考古遗存，而以高领乳状袋足鬲为其代表性器物。当然，为了探讨周文化的起源，可以追溯得更早，那是另一回事。前几年的有关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进展。1984年，尹盛平、任周芳合写的《先周文化的初步研究》一文（《文物》7期），又提出一些新的看法。他们根据陕西武功郑家坡遗址和扶风刘家墓地的发掘资料推断：“宝鸡地区曾经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青铜文化。一种是以联裆鬲为代表的先周文化；一种是以高领乳状袋足分裆鬲为代表的姜戎文化。它们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属于不同的谱系、不同的部族。周和姜戎两个大的部族居地相邻，文化上互相影响。”他们二位分别参与执笔所写郑家坡遗址和刘家墓地的发掘简报，也在《文物》同期发表。郑家坡遗址已发掘2千平方米，所出器物群中的陶鬲，见于发表的绝少高领乳状袋足鬲（仅一件），而联裆鬲（即“瘪裆鬲”）却有多种型式，作者将遗址分为早、中、晚

三期，认为晚期器物与张家坡遗址早期的相似，约当文王作丰时；中期器物与殷墟文化四期的相似，约当太王迁岐前后；早期的年代则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晚期至二里岗下层。刘家墓地已发掘所谓“姜戎”墓葬二十座，形制多属偏洞室墓，随葬陶器主要有高领乳状袋足鬲、双耳或单耳的直领罐等，其中十八座被分成六期（一、二、六期都只有一座），认为“一期墓葬的年代当与齐家文化比较接近，与二里头文化晚期相当”，“二、三、四、五期的时代为商代前期至周人迁岐”，“六期的年代当在西周文武之际”。作者又提出，刘家墓地的文化面貌自成系统，“有必要划分出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命名‘刘家文化’。辛店文化则有可能属于刘家文化的一个晚期类型。”该文还提到，刘家墓地呈现“五期之后迅速被周人的文化融合的现象”。由此看来，这两批发掘资料对于先周文化的研究，确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美中不足的是，两篇简报因篇幅所限，未能将郑家坡遗址分期的地层根据、刘家墓地中“姜戎”和西周两类墓葬的分布关系进行详细交代。大家迫切希望及早全面发表这些重要资料，以便更好地理解据以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进一步深入讨论。

陈全方所写《周原西周建筑基址概述》（《文博》1、2期），对周原地区近年发现的凤雏村甲、乙两组建筑基址及召陈村大型建筑基址群，从平面布局、营造技术、性质和年代、价值意义等方面，进行了概括的叙述。该文所述不同看法的详略表明，作者实际赞同凤雏建筑基址属周王室宗庙的可能性很大，召陈发现的则是一座大型的王宫遗址。李西兴的《从岐山凤雏村房基遗址看西周的家族公社》一文（《考古与文物》5期），对凤雏建筑基址的性质提出新的意见，认为凤雏基址的中心只有一庙，因而房主应当是士，又根据将基址中的甲骨窖藏作为房主是卜人的证据，推测“这家世职龟卜之士可能从西周中期以后不做卜官了，就把祖先保存的甲骨窖藏起来。”该文还以文献记载和民族学资料为主要依据，比附凤雏基址的布局，探讨西周家族公社的演变情况。

周原及其邻近地区新发表的考古资料，主要有扶风北吕村的一批周人墓葬（《文物》7期）。据报道，墓地东西长约500米，南北宽约400余米，发现的都是中小型墓葬，排列有序，没有叠压关系，随葬陶器的特征与郑家坡遗址一致。简报作者将其中有随葬器物的二百零四座墓分成六

期，认为它们的年代从太王迁岐以后不久，延续到厉王前后。另外，还发表了岐山县一些地方出土的齐生鲁彝盖等十多件西周铜器（《考古与文物》5期）以及宝鸡贾村塬出土的夨王簋盖等器（《文物》6期）。

丰镐地区，值得注意的是1983年在长安张家坡发掘的两座年代当在武王灭殷以前的中型墓葬（《考古》9期）。两座墓均为东西向，墓坑长3米许，坑底有殉狗的腰坑，葬具为一棺一椁，随葬品中都有高领袋足陶鬲，又分别出土百乳簋、弓形器及尾作歧冠形的曲内戈等殷式铜器。这些都是丰镐地区过去少见或未见的器物，为探寻当地先周时期的遗存提供了重要线索。马王村出土的一批西周晚期铜器，其中一件鼎的作器者为"鄦男"，表明许国国君的爵称确实象文献记载的那样是男爵（《考古与文物》1期）。

其他地方新发表的西周考古资料和有关研究成果也有不少。北京琉璃河西周时期的燕国墓地，1981—1983年共发掘墓葬一百二十一座、车马坑二十一座，简报报道了这些发掘的主要收获。其中，有墓室一端带墓道的大型墓，葬埋五辆车、十四匹马的车马坑；难能可贵的是第一次清理出西周木胎漆器的完整器形，大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西周时期髹漆工艺的认识（《考古》5期）。同刊还发表有殷玮璋所写《记北京琉璃河遗址出土的西周漆器》，对这些西周漆器进行专题讨论。山东滕县庄里西发现的一座西周早期墓葬，出土滕侯所作鼎、簋等有铭铜器，为判断西周早期的滕国地望提供了物证（《考古》4期）。日照崮河崖清理的两座随葬铜器的西周残墓，其中一座出土四件铭文有"厘伯"字样的铜鬲，表明该墓可能与东夷的莱国有关（《考古》7期）。杜在忠曾综合有关考古资料，写了《莱国与古莱夷文化初探》（《东岳论丛》1期）。河南南阳北郊一座西周墓暴露的铜器，带铭文的有两件，一件"南申伯大宰中爯父"所作簋和一件中爯父鼎（《中原文物》4期）。当地前曾出土申公彭宇簠等铜器，这次的发现进一步表明两周之际的申国就在南阳。李学勤为此写了《论仲爯父簋与申国》（同上）。平顶山市郊出土的四件应国铜器，也是一项重要发现（《文物》12期）。

长江流域的西周时期遗存，大家十分关注。江苏丹徒县大港镇母子墩发现的西周早期土墩墓，土墩底径30余米，高5米许，埋葬方式与江南其他土墩墓一致，所出铜礼器的形制和纹饰，既有与中原地区相似之处，又有不同

程度的地方色彩，同出的几何形印纹硬陶罐和铜矛等物则地方特征更为明显，为研究吴国早期的历史文化增添了新的实物资料（《文物》5期）。肖梦龙的《母子墩青铜器及有关问题探索》一文（同上），将这次发现的西周早期铜器，与历年来江南出土的几批青铜器结合起来，进一步分析它们在造型和纹饰风格上的两重性。该文认为，镇江以东的丹徒至大港一带，分布有较多的大型土墩墓，其中包括早年被平掉封土的宜侯墓，“应是早期吴国统治的中心区域”，并且试图根据现有考古发现，对“来自中原的吴国统治者周人”与当地土著的“荆蛮族”的融合过程，进行初步的探讨。湖北黄陂鲁台山的西周早期遗址和墓地，是长江中游的一项重要发现，发掘简报前已发表（《江汉考古》1982年2期），最近又有新的讨论。张亚初的《论鲁台山西周墓的年代和族属》一文（《江汉考古》2期），在根据器物形制对几座墓的断代有所修正的基础上，论述了这批墓葬的族属及其历史价值问题。M30出土的八件有铭铜器，至少有四件是公大史为姬㚤所作媵器，又有长子狗鼎与之同出。张亚初认为：“从西周铭文材料看，诸侯国还未设大史，大史仅见于王官。由此可见，M30之公大史，不是毕公高之子，就是召公奭之子，二者必居其一。”对长子狗的族氏也提出两种可能，并且将其看作公大史女姬㚤的丈夫，推测他们的南来可能与参加昭王南征有关。进而结合“安州六器”及近年湖北出土的其他西周铜器，指出“黄陂县鲁台山西周墓葬群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它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西周前期，这一地区是周王朝的直接控制的地盘”。湖北随县新出土的两批铜器，羊子山所出鄂侯弟尊等西周早期器，周家岗所出曾大保(?)簋等西周晚期器（《考古》6期），以及秭归官庄坪、当阳磨盘山等西周遗址（《江汉考古》1、3期），也都值得注意。高至喜的《论湖南出土的西周铜器》（《江汉考古》3期）、《湖南省博物馆藏西周青铜乐器》及《中国南方出土商周铜铙概论》（《湖南考古辑刊》2期）等文章，系统介绍了历年来湖南各地所出西周铜器的鲜明特点，指出这些铜器“基本上都出在湘水流域，又大多集中在湘水中游的湘潭、湘乡和衡阳一带”，即“与已发现的出印纹硬陶的商周遗址和出土春秋越式铜器及越人墓葬的区域大体吻合”，因而都是“古越族的产品，具体地说是扬越族的创造。何介钧的《湖南商周时期古文化的分区探索》一文（《湖南

考古辑刊》2期），则将湖南地区目前发现的商周时期考古遗存，区分为澧水流域和沅水下游、沅水中上游、湘江中上游、湘江和资江下游四个区域，对当时极其复杂的民族文化分布情况提出可供进一步讨论的探索性意见。

另外，叶万松根据洛阳北窑西周前期铸铜遗址的发掘资料，写了《我国西周前期青铜铸造工艺之研究》（《考古》7期）；蒋定穗根据她本人所作实际测量和测音资料，写了《试论陕西出土的西周钟》（《考古与文物》5期），都是很好的专题论文，本书《科技考古》部分已有介绍，这里不再重复。

四 东周时期

1984年新发表的东周考古资料和有关研究成果仍然较多。

齐国的墓葬，特别是大型墓葬，过去发掘较少。新近发表的临淄齐故城五号墓，是现已发掘的规模最大的齐国高级贵族墓葬（《文物》9期）。该墓位于齐故城大城的东北部，墓圹上部已被破坏，现存坑口长26.3米、宽23.35米，南面有斜坡墓道，方形椁室用石块垒砌而成，椁室以北又有长方形藏器坑，由于早年遭到严重盗掘，随葬器物荡然无存，仅在填土中发现一些殉葬家畜、家禽的残骨。大墓的东、北、西三面，还有连成一体的大型殉马坑环绕（全长215米），按已揭露部分估计，全部殉马可达六百匹以上。张学海、罗勋章所写发掘简报，根据殉马坑填土中的陶片，断定大墓和殉马坑的年代为春秋晚期，进而分析齐国这个时期的历史，推断墓主最可能是齐景公(公元前547—490年)。张学海的《田齐六陵考》（同上），又对齐故城东南10多公里的“二王冢”、“四王冢”进行考订。这些高大的方基圆坟，方基一般长宽100多米以至200余米，坟高数米以至10余米，规模之大非同寻常。该文认为这是田氏取齐以后的齐国陵寝，推测“二王冢”是侯剡和桓公午之墓，“四王冢”属威、宣、湣、襄四王，如此则“田齐八君除太公田和及王建墓不在此地，其余六君皆葬于此”。

山东沂水刘家店子发现的两座春秋中期墓葬和一座车马坑，墓主应属东夷的莒国（《文物》9期）。其中一号墓较大，墓口长12.8米，宽8米，椁室在墓底中部，两侧各有一个藏器坑；墓内发现殉人较多，仅南藏器坑上面就有三十余人；随葬器物有成套的鼎、鬲、簋、壶等铜礼器，编钟、编镈、錞于等乐器，器物的形制和纹饰有一定的地方特色。发掘简报根据该墓出土的兵

器有一件"莒公戈"，铜礼器中簋铭作"公簋"、壶铭作"公铸壶"，推断一号墓的墓主应是莒国国君，而与之并列、规模较小的二号墓则为莒国国君的夫人。一号墓所出铭文字数较多的铜礼器，作器者属于远在河南南部的陈国和黄国，当是通过某种途径传至莒国的。陈大丧史中高所作铃钟，九件一套，是同类铃钟中件数最多的一组。两件黄大史白克盆，与过去著录的黄大子白克盘（《两周金文辞大系》187）为同人之器。

河南光山县宝山寺发现的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合葬墓，是第一次科学发掘的黄国墓葬（《考古》4期）。该墓位于黄国故城东北10公里处，墓坑为带墓道的长方形竖穴，上部原有高约7—8米的封土。坑内有两个独立的椁室，左侧的底板较高，所出铜礼器的铭文均为"黄君孟自作行器"等字，右侧的底板较低，所出铜礼器的铭文均为"黄子作黄甫（夫）人行器"等字，表明墓主是黄君孟在左，其夫人在右。出土时，夫人棺的鲜艳彩绘仍依稀可见，并且发型保存尚好。分属二人的随葬器物，主要铜礼器的种类和件数相同，但属于夫人的铜器、玉器，总数较多，制作也较精美。这座墓的发掘，为研究春秋早期淮汉地区的历史文化和丧葬制度，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对于探讨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关系也有相当的作用。

河南淮阳原是灭于楚的陈国都城所在，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以后，楚又一度"保于陈城"。《文物》10期发表的淮阳马鞍冢、平粮台楚墓发掘资料，年代均属楚国以陈为其临时首都的时期，并且墓葬的规模较大，学术价值显而易见。马鞍冢是一处异穴合葬墓，两冢的墓坑均长、宽10余米，北侧一座东端有墓道，南侧一座东西两端都有墓道，由于早期被盗，两墓的随葬器物都已大部不存。但两冢西边陪葬的车马坑保存较好，北侧的埋藏八辆车、二十四匹马，南侧的埋藏二十三辆车、二十多匹马。发掘简报根据南侧的二号车马坑中，"有带铜銮铃、镶铜甲板的战车，有重舆华盖的安车，还有特小的游戏用的小车。车的构、饰件制造精致，尤以错金银龙首辕头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车马坑中还发现包括贝旗在内的六面旌旗。以上这些均表明墓主人的身份是相当高的。"它的主墓又是平面呈"中"字形的大墓，也是当时葬制相当高的规格。因而推测"马鞍冢的南冢的墓主人应当是楚王"，"北冢当为南冢的陪葬墓"。与马鞍冢相距300多米的平粮台已发掘楚墓二十多

座，发表简报的十六号墓是其中最大的一座。该墓墓坑长14米，宽10米许，东端有墓道，随葬的成套礼器和编钟、编磬均为陶质明器，为数较多的玉器制作尚精，铜质的仅镜、削各一件及摹拟金饼的四件铜饼，墓主的身分也不会很低。

江陵地区的楚墓，新发表简报的不到十座，都是一棺一椁的小墓，年代多属战国早、中期，仅张家山M201为战国晚期（《考古》6期，《江汉考古》1、2期）。陈耀钧根据江陵楚墓的发现，进行了铜剑的研究（《考古与文物》2期）。利用长沙和湖南其他地方发现的楚墓资料进行专题研究，有金则恭《湖南东周时期铜戈的分期及有关问题》、熊传新《长沙出土楚服饰浅析》（《湖南考古辑刊》2期）。黄展岳的《试论楚国铁器》（同上），则以江陵、长沙两地楚墓所出资料为主，兼及其他楚墓的发现。

浙江绍兴县坡塘M306，是第一次作过正式清理发掘的越国贵族墓葬，年代约当战国初期（《文物》1期）。这是一座有阶梯墓道和壁龛的土坑墓，墓坑的西南部在清理前已遭破坏，原来可能长、宽都是8米以上。棺椁结构因盗扰已无痕迹可寻，但随葬器物保存尚好。所出镳形盉、甗形盉及尊、缶等铜器，多具浓厚的地方色彩。铜质方形房屋模型，中有形象逼真的六个乐人，是难得的艺术珍品。各种玉器也制作甚精。同期《文物》发表的曹锦贵《绍兴坡塘出土徐器铭文及其相关问题》一文，对墓内所出两件徐国铜器、汤鼎和炉的铭文进行了考释；牟永抗的《绍兴306号越墓刍议》，则从墓葬形制、铜质房屋模型、国属和墓主人身分等方面进行讨论，认为墓主人有可能是越国相当于卿大夫的巫祝一类人物。新发表的越国文物，还有浙江鄞县出土的几件兵器，其中铜钺的面上饰“羽人划船”花纹，铜矛的骹部有凸起的“王”字，都是越族风格，铜剑则属中原式（《考古》8期）。关于越文化的研究，还有彭浩所写《我国两周时期的越式鼎》（《湖南考古辑刊》2期）等文章。大体属于越族的土墩墓，又在浙江衢州西山（《考古》7期）、江苏丹徒石家墩（《考古》8期）和无锡庙山（《考古与文物》3期）有所发现，年代或可早至西周。

江南地区还发现吴国故地归楚以后的墓葬。吴县何山的一座春秋战国之际墓，主要随葬器物除铜鼎、铜矛和原始瓷碗等器为吴越风格外，鼎、簠、盉、缶、匜等器均属楚式，其中盉的肩部

并有铭文“楚叔之孙途为之盉”八字，表明确为楚器（《文物》5期）。江苏武进孟河的一座战国中期或稍晚的墓葬，所出鼎、壶、勺等铜器的形制，与江陵、长沙同时期楚墓的发现一致(《考古》2期）。

陕西长武县上孟村秦墓发掘简报，是最近发表的唯一一批秦国墓葬资料，共有二十八座中小型墓和一座车马坑，年代与凤翔八旗屯秦墓相仿，属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考古与文物》3期）。陈平所写《试论关中秦墓青铜容器的分期问题》（《考古与文物》3、4期），以历年关中发现的三十多座秦墓为主要依据，将秦墓青铜容器分成春秋型和战国型两大器群（春秋型的下限延伸到战国早、中期之交，战国型则包括战国中、晚期和秦代），又将两大器群进一步分成五期、十组，详细讨论各期铜容器的组合、形制和纹饰方面特点，总结鼎、簋、甗三种典型器物的演进规律，对秦与山东诸国铜容器的区别也有所比较。宋治民的《略论四川的秦人墓》一文（《考古与文物》2期），将四川发现的战国至秦代墓葬分成两大系统，第一类是属于巴人和蜀人的船棺葬系统，第二类是属于秦人的中原文化系统。该文主要根据青川战国墓和荥经古城坪秦汉墓的发掘资料，从墓葬形制、随葬器物中的陶器和铜器，以及漆器三个方面，论证第二类墓葬有些地方虽然反映了楚文化的因素，但相比之下更接近于秦文化，因而应属秦文化的范畴，判定为秦人的墓葬。新发表的荥经曾家沟战国早期墓发掘资料，木椁结构和所出漆器都与青川战国墓一致，但随葬陶器多具地方特色（《考古》12期）。川南犍为县境发现的一座战国晚期巴蜀土坑墓，随葬品中除常见的巴蜀式剑、矛、钺等兵器外，还有一些过去少见的较完整的陶器（《考古与文物》3期）。王有鹏从犍为发现的巴蜀墓群出发，结合四川西南部其他几处巴蜀文化遗存，以及有关的文献记载，讨论了蜀人南迁的问题（《考古》12期）。

新发表的东周时期墓葬资料还有：山西长子县一处东周城址附近的八座中型墓，其中四座年代可定为春秋时期，应属晋国，规模稍大，墓坑长4米左右以至6米许，随葬成套的铜礼器及兵器、车马器，其中最大的M7出五件一套的列鼎，并有三人陪葬；另四座年代可定为战国中晚期，应属韩国，规模略小，墓坑长度多在4米以下，随葬鼎、豆、壶等陶制明器，有的墓所出鼎也是五件一套，并有兵器和车马器

同出（《考古学报》4期）。河北新乐县中同村的一座战国早期中型墓，应属鲜虞之国中山，椁室用石块垒筑四壁，并用石板封顶，随葬器物既有三晋式鼎、甗、豆等铜礼器，又有北方民族的虎形鎏金饰片（《考古》11期）。

东周时期边疆少数民族的考古研究，新发表的成果多属北方和东北地区，特别集中在青铜短剑方面。辽宁丹东地区出土的一批青铜短剑，属所谓“T字形柄曲刃式”（《考古》8期）。内蒙古翁牛特旗大泡子的一座青铜短剑墓，所出则为所谓“匕首式”（《文物》2期）。郑绍宗所作《中国北方青铜短剑的分期及形制研究》（同上），认为在不涉及文化属性的前提下，可将两个系统的青铜短剑，通称为“中国北方的青铜短剑”，但所论实际限于“匕首式”一种，过去曾被称作“绥远式”、“鄂尔多斯式”等等。该文以河北各地历年收集的五十一件不同时代、不同形制的标本为基本材料，参考过去见于报道的河北、内蒙古和山西所出二十二例，将其分成相当于商代晚期到战国的七期，进而指出“这些有明确出土地点的北方青铜短剑的分布，基本围绕蒙古大草原东南部边缘，包括晋、冀北部的广阔地区”，但这种青铜短剑不见于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同时，他又指出：过去被视作匈奴文化主要特征的锯齿纹，广泛流行于约当春秋晚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遗物，作为匈奴文化的装饰艺术应是由此继承而来；过去被视作匈奴文化遗物典型代表的“触角式”短剑，流行于春秋早期到西汉中期，秦代以后始成匈奴剑的特征。张锡瑛的文章，主要讨论我国北方和东北地区的“触角式”剑（《考古》8期）。他将“触角式”剑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吉林永吉县汪屯所出为代表的铜柄铜剑，使用年代当在战国中期以后至汉初，族属有很大的可能是秽貊；另一种是以辽宁西丰县西岔沟所出为代表的铜柄铁剑，使用年代为汉初至西汉中期，族属不大可能是匈奴，而倾向于东胡系统的鲜卑。刘景文的《试论西团山文化中的青铜器》一文（《文物》4期），主要讨论了过去被归入新石器时代的西团山文化的性质，指出西团山文化已跨入青铜时代，从整体看有其自身的发展过程，分布在广大地区的遗存应有早晚的不同。他认为，“西团山文化中的青铜器产生的年代大体应和其邻近的辽宁青铜短剑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年代接近或稍晚。”又根据^{14}C测定的年代数据分析，“西团山青铜文化的上限可能早到西

周初期，下限可能到战国末期”。

华南地区，发表了广西各地出土的一批先秦时期青铜器，其中有戈、矛、钺、剑等兵器及斧，有高圈足、双兽耳铜罍，以及甬钟和羊角纽钟等（《考古》9期）。报道者蒋廷瑜等认为：“广西的青铜文化是以输入中原青铜器作为起点的，在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下，得以逐渐发展，以致形成在器形和纹饰等方面既有中原作风，又具浓厚地方特色，并间杂楚滇文化因素的一种特殊的土著文化。……这种文化的开始形成，大约在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初期，至战国时期发展到鼎盛阶段。”蒋廷瑜又写了《羊角纽铜钟初论》（《文物》5期），推断“羊角纽钟流行的时代当在战国至西汉，即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它的分布地域“主要是在西江流域和红河流域”，“可以视为岭南越族的一种特殊乐器”。

此外，李学勤《谈文水出土的错银铭铜壶》（《文物》6期）和黄盛璋《盱眙新出铜器、金器及相关问题考辨》（《文物》10期）二文，论及战国时期燕国的容量问题。尚志儒的《先秦从死从葬制度初探》一文（《文博》2期），根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讨论春秋战国时代流行的不属殉葬的从死从葬制度产生的社会根源，以及从死从葬者的身分和社会地位。又发表曾侯乙墓编磬和皮甲的复原研究情况等等。这些都值得大家注意。

五　甲骨文、青铜器等方面的专题研究

1984年有关殷墟甲骨的研究成果，从考古学的角度看来，值得注意的仍是争论已有数年的“历组”卜辞断代问题。《古文字研究》第9辑发表的林沄《小屯南地发掘与殷墟甲骨断代》、肖楠《再论武乙、文丁卜辞》二文，都是1981年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四次年会上的论文。林沄对甲骨断代的研究方法，强调精密的字体分类，主张在重视书体一致的前提下，着重于总结各类卜辞特征性字形和用字习惯的特有组合关系。该文根据字体、钻凿、卜骨修治、记事刻辞等方面的分析，提出自组和宾组卜辞之间存在无法否定的过渡现象，自组→自历间组→历组一类→历组二类，是一连续的过渡系列；而不署卜人的无名组和黄组（五期），则是另一连续的过渡系列。他又根据小屯南地所出甲骨，提出“历组一类卜辞和宾组记事刻辞同版，历组二类卜辞和出组卜辞同版”，认为自历间组和历组都不可能是文丁卜辞，而无名组晚期才是文丁卜辞。他

对肖楠在过去讨论中主张历组为武乙、文丁卜辞的地层根据，也曾提出不同的看法。肖楠的文章，除进行称谓、人名、事类等方面的比较外，着重于甲骨出土坑位和地层关系的分析。他们主要根据1973年小屯南地的发掘情况，并且利用解放前的殷墟发现资料，考察甲骨出土的层位，以及各类卜辞的共存关系，认为在廪辛、康丁时期以前的地层和灰坑中没有发现“历组”卜辞，因而不赞成将“历组”卜辞订为武丁时期，仍主张属于武乙、文丁时期。

王宇信所著《西周甲骨探论》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对西周甲骨发现与研究的情况进行了初步总结。书中除概括地评述各家研究西周甲骨的论作外，一方面以较多的篇幅汇释洪赵坊堆村、长安张家坡、昌平白浮、岐山凤雏村、扶风齐家村五地先后出土的全部有字甲骨，另一方面又分析西周甲骨在整治、钻凿形态、灼兆、文字等方面的特征，并且根据凤雏甲骨中“王”字的变化、甲骨所载史迹及字形、书体，试作西周甲骨分期的探索。书末又附西周甲骨摹聚、重要文字索引及有关论著简目，以便检索。关于周原甲骨还有高明的文章《略论周原甲骨文的族属》（《考古与文物》5期）。该文认为周原甲骨中载有殷王先祖名号的卜辞，即学术界对其族属有争议的几片，“都是周文王被囚居于殷时所贞卜，在周原卜辞中有一部是随同文王归周时，从殷带回周原的。”

商周青铜器方面的研究，1984年发表的重要成果，首推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所编《商周青铜器纹饰》一书（文物出版社）。该书是在马承源的指导下由陈佩芬具体负责编成的。书中收录的青铜器纹饰拓片，绝大多数来源于该馆藏器，上起二里头文化和商代二里岗期，下迄战国晚期，共计一千零六幅。在编辑方法上，没有沿袭饕餮纹、云雷纹、重环纹……那种常用的类别，而是从纹饰的实际情况出发，按照构图特征进行归纳，分成兽面纹、龙纹、凤鸟纹、动物纹、火纹、目纹、兽体变形纹、几何变形纹、半人半兽神人、人物画像十个大类，大类之下再按图案结构的差异细分若干小类和式。同时，又附有较好的文字说明，每个大类的前面有一两千字或数百字交代该类纹饰的构图特征及其流行时间，所有图样都注明所据铜器的器名、部位和时代。马承源所写长约五万字的《商周青铜器纹饰综述》，更联系古代神话等方面的资料，详细分析各类纹饰图案结构的变化情

况，进而讨论商周青铜器总的发展阶段的特点，以及青铜器纹饰艺术功能的性质等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学者进行的商周青铜器研究，大都着重于铭文考释和有关史实的探讨，对于从考古学上研究青铜器形制和纹饰的演变却注意不够，尤其缺乏综合性的全面考察。上海博物馆的同志在对青铜器进行大量整理研究的基础上，编成这部资料比较丰富又易于查考的图谱性著作，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关于铜器纹饰还有陈公柔、张长寿合写的《殷周青铜容器上鸟纹的研究》（《考古学报》3期），在国内外学者有关研究的基础上，对鸟纹做了进一步的断代分析。该文选用二百三十三件殷周青铜容器所见鸟纹，将其分成小鸟纹、大鸟纹、长尾鸟纹三类二十五式，排列成表示鸟纹发展序列的图谱。他们在选用资料和分析问题时，注意到铜器的出土情况、器形、器群组合、主题纹饰和辅助纹饰、可资断代的铭文等方面，从而使鸟纹的发展序列得到更好的展现。再有杜廼松的《中国古代青铜器简说》一书（书目文献出版社），对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发展，作了比较全面简明的知识性介绍。

关于殷周有铭铜器的单篇文章，除前已提及者外，还有杜廼松《谈觥祖丁卣等三件商代长铭铜器》（《文物》10期）、刘启益《黄陂鲁台山M30与西周康王时期的铜器墓》（《江汉考古》1期）、李学勤《穆公簋盖在青铜器分期上的意义》（《文博》2期）、刘启益《西周金文中的月相与共和宣出纪年铜器》（《古文字研究》9辑）、尚志儒《秦人青铜文化初探》（《文博》1期）、张亚初《论楚公家钟和楚公逆钟的年代》（《江汉考古》4期）、刘彬徽《楚国有铭铜器编年概述》（《古文字研究》9辑）等多篇，分别讨论了不同时期铜器的断代及有关问题。其他方面，还有陈振中的《殷周青铜钁考略》（《江汉考古》3期）和《殷周的青铜锯》（《考古》1期），陈旭、杨新平的《商周青铜钺》（《中原文物》4期），郭德维的《戈戟之再辨》（《考古》12期），以及乌恩的《论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考古与文物》4期）。

另外，《考古学报》2期发表陈梦家于1962年写成的遗著《战国楚帛书考》对长沙子弹库楚墓所出帛书的性质提出独到的看法，认为是约当公元前350年前后的楚国“诸侯王的时宪”。

秦 汉 考 古

叶小燕

1984年共发表秦汉考古文章近二百篇，内容涉及秦汉长城的调查、秦都汉城的探索、帝陵诸侯王墓的发掘研究、画像石简牍的整理，以及其它综合性、专题的研究和少数民族考古等。

一　秦代

秦代考古主要在秦长城的调查、秦都宫殿的探索和始皇陵出土文物的研究诸方面获得较大的进展。

考古、历史学界对秦长城西端首起之处，长期以来争讼不已，主要有今岷县、临洮二说。陈守忠在《甘肃境内秦长城遗迹调查及考证》（《西北史地》2期）一文中，根据实地考察，提出秦长城的确切起点在今临洮三十里墩，东经渭源、陇西、通渭、静宁、包六盘山而北走，再经隆德、固原、环县而入陕北。恰好经过了《史记·匈奴列传》所云秦昭王时“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的三郡地。甘肃境内的秦长城应是秦昭王所筑，其时洮河以西、打碧河以北乃羌戎游牧出没之地，该长城拱卫了陇西郡治和秦咸阳西走至临洮的通道。巩如旭《秦始皇万里长城首起处遗迹求索》（同上），基本上持首起岷县说，认为现存起自临洮的甘、宁、陕秦长城乃秦昭王所筑，而秦始皇长城西起临洮，应在今岷县城西。作者实地考察后推测的长城路线是西出岷县，经临潭、卓尼而北，再经康乐、和政、临夏入积石山至黄河。秦长城西端首起处问题是考古学上一个重要课题。过去由于条件的限制，探求者多偏重于历史地理的考证或地面的踏察。虽然是有益的探索，但终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这个问题最终只有藉助于考古手段才能获得完满解决。

凤翔雍城是秦早期的都城，但宫殿的建筑一直持续到汉代。1982年曾对秦汉宫殿遗迹进行调查（《考古与文物》2期）。马振智、焦南峰在此调查的基础上写了《蕲年、棫阳、年宫考》（《陕西省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下简称《陕西省论文

集》，1983年底出版）一文，提出了雍城宫殿建筑的分布情况大概是：姚家岗一带的春秋宫殿区可能是“雍高寝”，马家庄附近包括一号建筑在内的春秋中晚期遗址是“雍太寝”，而铁沟、高王寺之间的建筑群遗址则是战国时的“雍受寝”，雍城南郊的雍水两岸，千河东岸也分布有宫殿建筑。在雍城遗址上发现有带西汉中期作风的“蕲年宫当”、“棫阳宫当”和“年宫”瓦当。“蕲年宫当”出土于雍城西南15多公里的堡子壕遗址。该遗址面积约2万平方米，在耕土层下为汉代建筑夯土层，再下为秦文化层。故此推定是秦汉蕲年宫址。蕲年宫是秦惠公为祭祀后稷，祈求丰年而建，沿用至西汉。蕲年宫址的确定，证明了古文献对蕲年宫位置的记载，唯《三辅黄图》引《庙记》云：“蕲年宫在城外”比较正确。“棫阳”、“年宫”瓦当在1962年亦曾发现，它们均出土于雍城南郊的东社、南古城—史家河一带。该处亦为一战国秦汉遗址。棫阳宫为秦昭王所建，沿用至西汉，可能是秦汉关中“离宫三百”之一宫。据记载，其位置有在雍和扶风两说，该宫当的发现证明在雍说是可信的。“年宫”史书付之阙如，尚待考证。

魏效祖《咸阳宫探索》（《陕西省论文集》）结合文献和考古资料对秦都咸阳及咸阳宫进行了研讨。确定在今咸阳西起石桥公社的何家、杨村，东经鸭沟、长陵车站、窑店地区，至柏家嘴，东西长约12公里，南北宽5公里，跨原滨渭分布着秦的一般遗迹、宫殿群和墓葬群。宫殿集中在东边的胡家沟至柏家嘴；墓葬分布在西边的毛王沟乃至烟王、鸭沟一带。宫殿和墓葬皆在原上。在这一地区出土了许多陶文，如“咸阳”、“咸阳里”、“咸原”、“咸宁”、“咸”等，足以说明这里就是秦的咸阳。咸阳宫位于咸阳原上诸宫殿之中心，东西长1000多米，南北宽300多寸，是宫殿中最大的一组，凹形高台建筑是其主体。它始建于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毁于秦亡之时。李光年《略谈秦都咸阳第三号宫殿建筑遗迹壁画的年代》（同上）认为第三号宫殿遗址东西坎墙上内容是出巡图的壁画应作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三十五年。

王学理《阿房宫辨正》（《考古与文物》3期），对《史记》等史籍中记述的阿房宫资料，提出不同的看法。如认为阿房宫应草创于秦惠文王时，始皇三十五年时只是作了改建和扩充；阿房宫并非行宫，而是体现圣治的朝宫；所谓阿房宫的规模只是营建

的蓝图并未付诸实现等。阿房宫遗址经调查位于今咸阳市东，西起毛王沟，东至秦兰池所在的杨家湾，北自咸阳北坂秦宫，越渭水，南到兴乐、阿房一线。

《汉书·地理志》云："华阴故阴晋，秦惠文王五年，更名宁秦，高帝八年，更名华阴"。呼林贵《秦宁秦县城和西汉华阴县城址位置考》（《陕西省论文集》）结合文献和调查材料考证，阴晋、宁秦、华阴三县从广义的地理概念言是相承的，指今华阴县和潼关县部分地方，然各自的城址都不在一起。阴晋位于华岳镇东1公里，在该处曾发现和发掘过一座战国古城。宁秦县在其东，即今华阴县城东8公里双泉南的原上。西汉时京师粮仓（又名华仓）建于其上，在发掘华仓遗址时曾获一块有"宁秦"戳记的砖块。华阴县应在今华阴西，纺车大队之西，王家寨之南，包括杨家庄西和南地。此处曾发现一东西长约1000米，南北宽约750米的西汉遗址。遗址上出土有"与华无极"、"与华相宜"等文字瓦当。遗址北有汉窑址，东北王道村一带有汉墓群。其地南遥对华山西峰，地望正合华山之阴。

赵康民《西安洪庆堡出土汉愍儒乡遗物》（《考古与文物》6期）报道了对秦始皇"坑儒"处遗址的调查情况。发现在临潼县洪庆、油王和西安汴家村一带有秦汉时期的铁生产工具、铜器、砖瓦以及房屋遗址。洪庆堡南有一山谷名马谷，当地人称坑儒谷，谷岸上有土塚名坑儒冢。由此可知，秦的坑儒处、汉之愍儒乡即在今洪庆堡一带。

对秦始皇陵出土文物的研究较前更为深入。程学华、周柏龄《秦陵彩绘铜车结构规格》（《文博》创刊号）一文将秦陵二号铜车各部位尺寸和《考工记》、《考工记图》、《车制考》记述进行了对比，指出实物和文献之间比数上的同异。同时提出铜车按一倍比例复原，对照文献记载的规格，秦尺一尺则用27.65厘米为宜。进而推论，秦曾两次统一度量衡，在尺度上，商鞅一尺值是23.1厘米，始皇时一尺值是27.65厘米。当然，这论点是否合于历史真实，尚待证实。陈孟东《秦陵兵俑衔级试论》（同上）认为秦陵三座俑坑中没有将军俑，而所谓的将军俑应分别是校尉俑、郡尉俑和司马俑；军吏俑应是军侯俑、卒长(或乘长)。二号坑俑着铠甲，当属常备兵；一号坑俑轻装，乃是郡县兵。王学理《秦俑军服考》（《陕西省论文集》）对俑的着装作了探讨研究。袁仲一《秦代徭役性的官营制陶作坊的陶文》（同上）则

将始皇陵附近发现的砖瓦上具有人名、地名、职名的陶文进行了分类，计有二十九种六十一件。认为这些陶文是为建始皇陵园从各县征调来的陶工，在陵园附近建窑烧制砖瓦时，在各自的产品上打的戳记。

袁仲一《秦中央督造的兵器刻辞综述》（《考古与文物》5期）研究了秦兵刻辞，认为秦兵器制造有两大系统，即中央或地方督造。秦始皇以前，主管中央兵器的制造者为内史下辖的雍工师、栎阳工师和咸阳工师。始皇时出现了少府辖下的少府工室和寺工，以及属邦辖下的属郡工（室）和诏吏等。秦的物勒工名制度可能始于商鞅变法，逐渐完善于惠文王到昭王时，而始皇时代刻辞格式已规范化了。秦兵、张占民《长铍初探》（《陕西省论文集》）对秦兵器铍作了探讨。

李孝林《从云梦秦简看秦朝的会计管理》（《江汉考古》3期），以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为研究对象，阐述了秦朝会计制度方面的成就、如秦简反映秦代已有严格的会计管理，用法律形式把会计制度规定下来，较西方早一千多年。在会计帐簿的基本结构方面已有类似“承、入、出、今余”的“四柱”应用，把“四柱”法的创始年代从宋代上溯至秦代。

二　汉代遗址与墓葬

汉代考古成就主要有长城关塞的考察，城址的调查和研究，帝陵、诸侯王墓和一般墓葬的发掘和研究，画像石（砖）的整理和研究。其中杜陵与长陵的发掘、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周易》的整理和研究尤为重要。

继秦筑长城后，汉代为了抵御匈奴，也修筑了万里长城。甘肃境内嘉峪关外，玉门、安西、敦煌以北的汉长城遗址，早为世人熟知。然在此长城之南亦发现了一段与之平行的长城却是近年来的事（《西北史地》2期）。这段长城分布于肃北蒙族自治县石包城乡境内鄂博山、鹰嘴山北麓。塞墙沿山麓要道东西向散布，长约80公里。墙用一层土石夹一层白茨或红柳筑成。底宽约3米，顶宽约1米，残高2至3米。今肃北汉属敦煌郡。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和太初四年（公元前102年）曾在嘉峪关外筑长城，它当为此时所筑。筑南北两条长城，可能是北防匈奴，南御羌。南北夹峙，形成走廊，以保护丝绸之路的安全。史载汉武帝遣光禄勋徐自为于五原郡筑城障列亭以备匈奴，世称之为“光禄城”或“光禄塞”。然对该城塞的地理位置颇多争议。李逸友

《汉光禄城的考察》（《内蒙古文物考古》3期）推定其在阴山山脉北靠近草原的后山地带。此处有两条长城，沿线有汉的亭障遗址。史念海《函谷关和新函谷关》（《西北史地》2期）论述了秦汉时著名雄关函谷关的建置、地理位置、环境及历史地位。函谷关始建于战国秦，曾是秦国的东门，至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杨仆迁关新安以前，一直是汉长安的屏障。经实地考察，关址在今灵宝县弘农河西岸王垛村。因关设在东起崤山、西至潼津的函谷之中而得名。

《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探讨》（《文博》创刊号）系杨宽1983年在日本的讲学稿《中国古代都城的起源和发展》中的一章。文中分析了汉长安城的布局结构是继承战国和秦代都城的制度而有重大发展，它对此后历代都城的设计建设有着深远影响。认为长安亦由宫城和大廓组成。长安城属宫城性质，宫室、宗庙、官署占全城面积三分之二。城乃座西朝东，在城外东部和北部有大廓。它们分别利用漕渠和渭水作为城壕，而且都有廓门。

早在三十年代，于青海省海晏县西北发现了三角城，据考证是王莽时所设置的西海郡址。最近在青海湖周围的考古调查中发现了与之有关的古城址，即尕海古城、南向阳古城、北向阳古城和立新古城（《考古》3期）。尕海古城位于海晏县。城址南北长463、东西宽435米，四面开门，门宽8米。现存夯土城墙残高4.8、宽11米左右。城内西南部发现有房屋基址。东北部地势较低，则是栓圈马匹或操练军队的广场。南向阳古城规模较小，南北长120、东西宽90米。城墙残高2.5米，仅一门开在西南偏南处。北向阳古城，南北长300、东西宽400米，城墙残高2—5米。南开一门，宽18米。城内有一条起自南门的中轴大道，道东为广场，西南有房屋基址。立新古城呈不规则三角形，周长140米，东开一门。这三座城位于刚察县。推测尕海和北向阳古城是西海郡治下的五个县中的两个县治，南向阳和立新古城是当时的驿站或哨所。

东汉雒城的地理位置至今未有定论，最近在四川广汉县南门外发现印有篆文“雒城”、“雒城城墼”的字砖（《四川文物》3期）。砖长45、宽22、厚9厘米。同出有东汉云纹瓦当、五铢钱等。时代当属东汉。它的发现为考证雒城位置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敖仓是秦汉时期著名的粮仓，在秦统一六国和楚汉争霸中都起过巨大作用。然其确切位置

仍是众说纷纭。荆三林等《敖仓故址考》（《中原文物》1期）结合文献和实地勘察，提出他们的意见。认为敖仓故址应在今荥阳县西北马沟村和牛口峪一带。该地区还发现了陶窑、窖（即地下仓）和盛粮的陶瓮（即露天仓）等秦汉遗址和遗物。

汉代帝陵制度的研究是汉代考古中一项重要课题。近年来对高祖长陵和宣帝杜陵都开展了考古工作，获得不少成绩。石兴邦等《长陵建制及其有关问题——汉刘邦长陵勘察记存》（《考古与文物》2期）结合实地调查发掘对长陵建制等进行了研讨。长陵位于咸阳原上。陵园略作方形，南北1000米，东西900米。四面有墙，以西墙保存较好，残高3米左右。陵冢位于陵园南部，刘邦冢位西，吕雉冢位东，相距250米。封土均呈覆斗形，大小形制略同。刘邦冢东西长165、南北宽145、高约30米。陵园内及其附近发现宫室寝庙建筑遗址六处。长陵陵邑设在陵园北，呈长方形。南、北、西三面有墙，东面无墙。史载“徙关东大族万家，以为陵邑”即是。奉祀陵寝的建筑也多在陵邑内。陵邑与陵园的关系，正是京城和皇宫的缩影。陪葬区在陵园东门外。陪葬者约有一百多人，现存留七十多个墓冢，位次排列整齐有序，直至泾河岸，绵延7.5公里。在长陵范围内发现有“长陵西当”、“长陵西神”、“长陵东当”及大量花纹瓦当和砖瓦等。

杜陵的考古工作是1982年开始的，通过调查、钻探、发掘，已大体上了解到它的布局和形制。1984年发表了1982年至1983年期间的工作收获（《考古》10期）。杜陵位于西安市三兆镇南。陵区范围东西3公里，南北4公里，陵园呈方形，每边墙垣长430米。墙中部各辟一门，陵墓居陵园中央，封土作覆斗形，底边均长175米，现高29米。墓四面正中各有一条斜坡墓道，夯土填筑。王皇后陵在杜陵东南575米。形制同杜陵而略小，称为“东园”。陪葬墓分布在陵园外东部和北部，尤以东南最为集中，现存封土的墓冢计五十九个。经发掘的杜陵陵园东门遗址南北宽84.24、东西进深20.57米。门址由门道、左右塾和左右配廊组成。均方砖铺地，周围有卵石散水。遗址上出有砖瓦建筑材料，中有“长乐未央”、“长生无极”文字瓦当。杜陵一号建筑遗址位于杜陵东南187米。经发掘，其夯土台基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51.2、南北宽29.6米。四周有廊，廊宽一般为2.1米。方砖铺地，廊外有卵石散水。遗址南北各三门，即东阶、中阶、西阶，阶呈斜坡状。

东西各一门，每门分左右门道。该遗址依位置和形制推测，当是杜陵陵园寝殿一类建筑。一号陪葬坑在杜陵北637米。坑平面近似方形，东西12.7、南北11.2、底深5.54米。其东有一斜坡坑道。坑由主室和东室组成，均由木板构筑，犹如木椁。主室东西长8.7、南北宽8.4米。又用木板隔成中厢和四个边厢。东室在主室东南，南北长3.2、东西宽2.35、高2.75米。陪葬坑严重被盗，主室出土有陶俑、小型铁武器、小五铢钱和四枚各重83克之金饼，东室出土两辆明器木车和小型武器。

广州象岗南越王墓的发现和发掘是考古界的一大成果。1983年曾发表简讯以飨读者，1984年又作了较详细的报道（《考古》3期)。报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该墓出土了许多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稀世文物，如铜框架漆屏风，刻有顺序数字的透雕卷龙形、龙形、朱雀形铜支灯，银蛇衔玉灯具，长方形平板浅蓝色玻璃，六山纹镜，漆绘人物画像镜，带托镜，放在漆木箱中的一套修治竹简的工具（计有斧、锛、曲柄铲、锄头、削、刮刀、带鞘刻刀、凿、锉、锯等共七十多件）。即使在中原地区这些文物也是罕见或未见，它在岭南出土更具有珍贵的研究价值。经过初步整理，该墓各室的性质用途逐渐明确，如主室是放置墓主棺椁的地方，主室后部为后藏室，东侧室是婢妾藏所，西侧室似为庖丁厨役之室，前室出土遗物多属木车构件，东耳室为放置宴乐用具之所，西耳室乃库藏之所。

刘文信《梁孝王墓地宫的建筑艺术》（《中原文物》2期)报道了对梁孝王墓的考察。梁孝王乃汉文帝次子，薨于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葬河南永城芒砀山上。然经历代破坏，墓上建筑已荡然无存，墓内亦盗掘一空。该墓凿山而建，系一座石结构平顶多室建筑群。由墓道、门卫房、墓门、车马室、享堂、主室、内侧室、客室、套间、回廊、角室及排水系统等部分组成。它们均分布于中轴线上及其两侧。东西长60余米，最宽处30余米，主室高4米多。该墓结构严谨，布局规整，体现了中国宫殿建筑严格的对称性。

徐州市东北洞山西北麓发现两座凿山而建的西汉墓。其墓主可能是某代楚王和他的王后(《文物》11期)。两墓平行，相距约10米。一号墓由墓道、甬道、前室、主室、耳室、侧室组成。全长61米，最宽处16.5米。除墓道外，总面积210平方米，已严重被盗。附近采集有铜釜、玉衣片

等物。二号墓位其北。由甬道和墓室组成，通长24.2米。随葬器物共一百六十七件。在铜器鼎、锺、行灯、盘、釜、勺上往往有“明光宫”、“明光宫赵姬锺”、“赵姬家”、“赵姬沐盘”、“王后家盘”、“王家尚食”等铭文。漆耳杯底部朱书“中宫□”、“灵平宫”、“□府”等。洞山顶部有南北长约60、东西宽30米较平坦地面，周有石墙遗存，并采集到汉瓦和陶片。此遗存当是祠庙一类遗址。从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推测，这两墓应属西汉中晚期。

近年来，在考古发掘中，多次发现黄肠题凑墓葬，引起了人们研究的兴趣。单先进《西汉“黄肠题凑”葬制初探》的看法是：题凑墓包括“黄肠题凑”、“外藏椁”、“便房”、“梓宫”等一套木结构的葬具，是“天子之制”，诸侯王也可享用。而一般诸侯若非帝王恩赐是不能僭用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下简称《考古学会论文集（三）》）

在山东临沂金雀山发掘了六座西汉中晚期墓。棺椁结构较为复杂。出土大量漆、木、竹器，其中的一件漆盒石砚和一支毛笔最为珍贵。漆盒石砚包括砚石、研石和砚盒三部分，盒中还存留有若干芝麻粒大小的墨丸。各墓出土的印章均为周姓，故推测该墓地是周氏家茔（《文物》11期）。

此外，还发表了河南、陕西、甘肃、宁夏、河北、湖南、湖北、广西、浙江等省发掘的墓葬资料，其中不少是具有重要价值的。近年来，在商邱地区的虞城、永城、夏邑、商丘等县陆续发现了西汉的石棺墓，它是否是豫东地区西汉墓的一个特点是值得考虑的（《中原文物》1期）。洛阳金谷园北邙山上发现一座西汉中期石椁墓，石椁上用朱书记数序，这在洛阳尚属初见（《考古》9期）。贵县风流岭和徐水防陵村分别出土了高大的铜马，高度均在1米以上，造型矫健，是颇为难得的珍品（《考古》1期，《文物》4期）。项城东汉墓中出土的三件釉陶楼，其中层设有表演舞乐百戏的外间和类似后台的内间，为研究中国舞台起源提供了实物资料（《中原文物》3期）。湖南长沙阿弥岭西汉晚期墓和溆浦马田坪西汉晚期、新莽墓中出土大量的滑石器。阿弥岭所出滑石灶、井、仓、鼎、磨、镜上刻有器物自铭，对汉代文物的研究有一定的价值（《考古》9期）。马田坪所出滑石器数量之多为它处所未见，在新莽时期墓中其数量甚至超过了陶器，成为主要的随葬品。其中滑石铺首

颇有特色（《湖南考古辑刊》二集）。庆阳西汉墓出土的有"彭阳"刻铭的铜鼎，咸阳征集的西汉"馆陶家"四连铜鼎和"王氏一斗"铜鼎都是很有价值的文物（《文物》4、10期）。《湖南资兴东汉墓》系一百零七座东汉墓的发掘报告，它为研究湖南地区东汉时期的文化面貌提供了重要资料（《考古学报》1期）。

姚仲源《浙江汉、六朝古墓概述》（《考古学会论文集(三)》）将浙江汉墓分为六期，并系统分析了各期的墓葬结构、随葬器物的组合和特点。宋少华《试论长沙西汉中小型墓葬的分期》（《湖南考古辑刊》二集）主要依据随葬陶器的组合、型式，并辅以钱币和铜镜将长沙西汉中小型墓分为四期。这都使汉墓的研究更为细致和深入。

画像石（砖）以其学术价值在汉代考古中占有重要的地位。1984年发表的资料有江苏、浙江、河南画像石墓和四川、河南的画像砖墓。江苏邳县缪宇墓（《文物》8期），规模较大，该墓原有墓园，四周砌以条石墙垣。墓室位于墓园北部，圆形封土下，由石条、石板叠涩砌成，分前室、后室和迴廊，总长7.20、宽4.65米。前室四壁上都有条石横额，上刻画像，内容有庖厨、宴饮、舞乐百戏、弋射、出行等。后室画像布置于门口两侧，内容有升仙、祥瑞、四神等。后室门上方镌刻墓志一方，说明墓主是"故彭城相行长史事吕长缪宇"，死于东汉桓帝和平元年，葬于元嘉元年，即公元151年。浙江海宁画像石墓在1983年已有简报，1984年发表了这批画像石刻的临摹线图，考证了画像的题材内容（《文物》3期）。南阳和方城发现的画像石墓都属砖石混作结构（同上）。在墓门、门楣、门柱等主要部位用石料，上刻画像，内容有庖厨、舞乐百戏、双辕牛车、武库、材官蹶张、历史故事、神话、祥瑞等，具有当地早期画像墓的特点。时代约为新莽至东汉初期。成都昭觉寺发现一座画像砖墓（《考古》1期），墓中埋有瓦棺六具。在墓室周壁上部嵌置一排画像砖，共二十三块。画面内容排列有序，墓道至前室右壁为出行车马、仪仗队伍；左壁为宾主见礼、宴饮、伎乐、弋射、收获、盐井；后壁是西王母和羽人。这种在墓室周壁嵌置完整内容的画像砖墓过去是未曾发现过的。扶沟吴桥发现一座新莽时的画像砖墓（《中原文物》3期）。画像内容有车马围猎、建筑、亭长、祥瑞等，在豫东地区却是首次发见。

至于画像石（砖）的研究，主要有刘志远等《四川汉代画像

已审阅
子居 10-03-13，13:25

砖与汉代社会》一书（文物出版社）。四川是画像砖的主要产地。迄今已出土不同题材画面砖七、八十种。它们大多出于东汉晚期的墓内，是研究当时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的珍贵史料。该书结合出土文物和文献，对一百余方画像砖内容分六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郡县制政治生活的侧影，（二）农业生活的画像，（三）城市、商业与水陆交通，（四）地主官吏的生活，（五）舞乐百戏的发展，（六）画像砖（石）中的神话题材。《密县汉画像砖》属图录性质。该书收有二百余幅空心砖画像。它们出自西汉至东汉早期密县的空心砖墓中，画像内容有凤阙楼阁、轺车出行、骑射田猎、侍卫门吏、神荼郁垒、龙凤鸟兽等，画像表现手法也有它的地域特点。

夏超雄《孝堂山石祠画像、年代及主人试探》（《文物》8期）与李发林《孝堂山石室画像旧拓校勘和墓主问题》（《考古学集刊》四集》）分别对著名的山东长清孝堂山石室画像内容进行了考释和介绍，同时提出对墓主的推测。夏文论证其墓主当是东汉第一代济北王刘寿；而李文推定是西汉济北王刘胡。夏超雄《汉墓壁画、画像石题材内容试探》（《北京大学学报》1期），吕品、周到《河南汉画中的杂技艺术》（《中原文物》2期）等则是以汉墓壁画和画像石画像题材为对象进行的专题探讨。

在孔望山最高处有一块天然大石，俗称“砚石”。大石长3.20、宽2米。正中刻有一直径40厘米的盘形凹，周围有八个椭圆形凹。对于它们的意义，说法不一。丁义珍《孔望山杯柈刻石考》（《文物》8期）依据洪适《隶续》所录《五君杯柈文》对洛阳上清宫方石上所刻杯柈描述，推断此处是东汉晚期人们祭祀东海君的杯柈刻石，是我国早期道教活动的遗迹。

三　汉简、帛书的整理研究

在汉简的整理和研究方面，1984年发表了较多的成果。

汉简《诗经》出土于阜阳双古堆汝阴侯夏侯灶墓中。它的发现是我国文学史和古文献研究中的大事。共有长短不一的残竹简一百七十余条。与今本《毛诗》对照，知其有《国风》、《小雅》两种。《国风》共存残诗六十五首，只是《桧风》未见。《小雅》则仅存《鹿鸣之什》中四首诗的残句。当初随葬时是否为一部包括了《风》、《雅》、《颂》的完整《诗经》已不得而知。参加该批汉简整理的胡平生、韩自强发表了《诗经》释文（《文物》8期），并研究了它的异文，推

断阜阳诗经不属于《汉书·艺文志》所云鲁申公、齐辕固、燕韩生、毛公四家诗中的任何一家，它也许是楚国流传下来的另一种本子。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和甘肃省博物馆编的《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共收文章十三篇，附曾发表的居延、敦煌马圈发掘报告两篇。文章中有不少新资料、新论述。在敦煌酥油土、玉门花海、额济纳河下游的汉代烽燧遗址上，武威磨嘴子、甘谷刘家山的汉墓中又有重要发现。酥油土简出于D38烽燧遗址，获木简七十六枚，内容有诏书、律令、檄书、日常屯戍簿册、字书、兵书、私人书啟等。形制有简、牍、觚、符、签、封检以及削衣等。时代主要属西汉昭、宣时期，下限可及王莽。就这批新简，作者探讨了西汉敦煌郡中部都尉所属侯官和侯望燧次诸问题。提出西汉时中部都尉应下属四侯官，即平望、破胡、吞胡、万岁，而无步广侯官。玉门花海简出烽燧上部的小屋中。计有木觚一、文字简九十枚。觚长37厘米，抄录共二百一十二字。其前半部为某诏书的一部分。后半部为书信。初步考证诏书为汉武帝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二月临终“遗诏”之一，简文有《苍颉篇》、《甲子表》及“元平元年”的纪年简等。居延是研究汉代边塞屯戍历史的重要地区之一，出土有丰富的汉简。考古工作者曾多次调查和发掘。该文集又报道了1976年对居延北部地区调查的收获。这次历时三个月，共调查汉代城郭、烽燧遗址八十三处，采集实物三千件，汉简一百六十四枚。汉简内容有历谱、俸廪、钱粮、名籍等，其中涉及烽燧名称十九例。纪年简多属西汉晚期哀帝和新莽时。通过这次调查，对汉代居延都尉所管辖的范围、城障烽燧布局、建筑规模、结构和保存现状有了大体的了解。同时作者对居延都尉驻所申明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应该是在K688城，而不在K710城。继1959年磨嘴子汉墓出土“王杖十简”之后，在武威又出土了新的“王杖诏书令”木简二十六枚。新简包括五个诏书令文件，较旧简内容丰富，是研究汉代尊老养老制度的重要文献。甘谷刘家山木简出于东汉晚期一刘姓墓中。共二十三简，有简文九百六十四字。内容是东汉桓帝延熹年间，宗正府卿刘柜关于宗室事上皇帝的奏书，以“宜令天下齐同其制”的诏书形式，颁发州郡奉行的一种官方文书。它反映了东汉顺、桓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为研究东汉社会制度提供了翔实的文献。通过对居延、敦煌

等地出土汉简的分析研究，初师宾、薛英群、徐乐尧、吴礽骧、黎泉、何双全诸同志在汉代边塞守御、装备制度、烽火制度、边塞制度、官文书制度、简牍书体等方面都有系统全面的阐述，有不少有益的见解。任步云《甲渠侯官汉简年号朔闰表》将一千多枚纪年简整理成表，并加考证，这对甲渠侯官的建制沿革，边塞戍守的研究无疑是很有用处的。

林梅村、李均明编《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文物出版社）汇集和重新整理校订了解放前在敦煌、酒泉两郡出土的几批汉简，主要包括：（1）1906—1908年英人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时在敦煌郡地发现的汉简等文书近千件；(2)1913—1915年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时在敦煌郡、酒泉郡地发现的汉简等文书二百余件；(3)1944年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赴河西地区考察时，在敦煌发掘出土的汉简四十余枚。这三批汉简文书都曾整理考释，并引起中外学者的重视和研究。该书作者鉴于这些报告和文字考释屡有错乱和矛盾，编排体例亦不一致，给研究工作带来诸多不便，因此重新予以整理。按汉简出土地点由西向东，每一地点依出土号由小到大，统一排出新的顺序号。又将各家刊布的简文顺序号与原报告出土号，逐一核对，制成对照表便于查阅。对旧简文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重新作了校订。对发现的汉代烽燧城障遗址以敦煌、酒泉郡所属的各都尉统辖地段为单位，一一予以叙述介绍。经过作者的梳理，眉目就较为清楚，很有利于汉简的研究。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已整理就绪，发表了《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并张政烺《帛书〈六十四卦〉跋》和于豪亮《帛书〈周易〉》（《文物》3期）。张先生在文章开头介绍了帛书的出土和整理情况。该帛书宽约49、长约85厘米。横幅界画朱栏、墨书。内容有《六十四卦》及《二、三子问》，共一百二十九行，作折叠式收藏。全卷折成高约40、广约10厘米的十六层，《六十四卦》叠在中心，保存较好。参考《周易》王弼注本及汉唐石经本可以复原。从字体观察，此卷盖写于汉文帝初年。文章对古代易卦的产生和演变做了精辟的阐述。于文将帛书分为三部分，即（1）《六十四卦》，（2）《六十四卦》卷后的佚书，内容是孔子和学生讨论卦、爻辞含义的记录。（3）《系辞》。共二万一千余字。并分析了它们的版本、内容和学术价值。

周世荣《马王堆三号汉墓地

形图古城邑的调查》（《湖南考古辑刊》二集）一文，报道了对“地形图”上所标八个古县邑进行实地调查的收获。现除桂阳、龁道尚需进一步核实外，营浦、舂陵、冷道、南平、桃阳、观阳六县均已找到当时的古城遗址。

四 专著和专题研究

综合性的和专题的研究呈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除上面介绍的以外，还有关于帷帐、钱币、铜镜、印章、陶器、农业等方面的论述。不少文章发前人所未发，颇多新意。

在论著中最为重要的，当首推《汉代考古学概说》。

此书系王仲殊1979年赴美讲授中国汉代考古学的讲演稿整理而成。它的英文版已于1982年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九篇，内容包括两汉都城长安和雒阳、汉代的农业、汉代的手工业、汉代的墓葬等方面。对于两都，作者着重阐述了城的形制、布局及兴废演变，分别论及了它们的建置、形状、城墙、城门、街道、宫殿、官署、宅邸、市肆、居民住地、礼制建筑、园苑，以及在建制上两都的相同之处和相异之点。在考察雒阳城的兴废时，指出北魏洛阳城的形制和布局，和两汉以来的都城相比，出现了划时代的变革，而为隋唐都城的建设开创了先例。阐述汉代的农业则着重农具、耕作技术、农产品的种类、农副业的生产，同时论述了因土地兼并加剧而出现的庄园经济的概况。阐述汉代的手工业则着重漆器、铜器、铁器、陶器诸主要领域中的生产情况和工官制度。指出漆器在汉代度过了它的黄金时代，是当时宫廷和贵族所珍贵的日用器物。铜器虽然在花纹、装饰上变得简素了，但铸造数量甚大，而且有不少新兴的铜器种类，铜镜进一步普及，它在考古年代学上具有较大意义。铁器已遍及生产、生活的各领域，是汉代特别重要的经济部门。陶器可分灰陶、南方的拍印硬陶、北方釉陶和南方硬质釉陶四个系统。政府也设有专门制陶作坊，制造专供宫廷和官署使用的砖瓦，在官营作坊中大量使用刑徒为劳动力。作者阐述汉代墓葬则着重墓制、葬俗和随葬品的演变，提出了西汉中期是开始重大变化的时期。

卢兆荫《略论两汉魏晋的帷帐》（《考古》3期）以考古资料为基础，结合文献记载对帷帐的渊源、种类、掌管官署和随葬情况，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认为我国古代帷帐至少可以追溯至东周时期，秦汉、南北朝是帷帐使用的兴盛时期，也是当时贵族厚葬的必备随葬品。帐构目前主要

出土于黄河流域的河南、河北、山东、甘肃等省，而广州南越王墓、贵县罗泊湾一号墓也有发现。隋唐以后墓中则未见，这可能和唐代以后建筑风格、家具陈设的变化，帷帐已不是殿堂宫室中的重要陈设有关。

钱币的专题研究也是秦汉考古中的一个重要课题。1984年除报道有马蹄金和半两钱、五铢钱、大泉五十、货泉的几处窖藏发现外（《考古》2、12期，《文物》1期，《中国钱币》1期），还发表了多篇论文。韩剑《试论中国古代货币标准化》阐述了我国货币标准化始于秦代，成熟于汉武时期，完成于唐代的观点（《陕西省论文集》）。吴镇峰：《半两钱及其相关的问题》（同上）综述了历年来半两钱出土概况，并根据出土的遗址或墓葬的年代，分别观察它们的特征，而且将部分半两钱实测其大小、重量，制表对比，从而取得断代的依据。研究是细致深入的，方法也无可非议。但是不足之处是其所依据的墓葬年代未必都很准确可靠，因此将所谓的"四铢半两"和"榆荚"钱均归入秦半两之中似乎仍需斟酌。该文对半两钱的始铸年代、秦国钱币铸行权、秦半两钱的购买力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戴志强、谢世平《"货泉"初探——兼论莽钱制作特征的演变》（《中国钱币》1期）将安阳收集的三千余枚货泉进行了观察、实测和分型，绘制了货泉重量统计分布图。作者认为王莽"货泉"可分为三型，而且代表了三个发展阶段，即Ⅰ型始铸于天凤元年，Ⅱ型则在天凤后期或地皇年间，Ⅲ型铸行于王莽前后至东汉建武十六年，亦即世所称的"光武货泉"。虽然分析的该批货泉非发掘品，但其研究却有一定的意义。傅举有《两汉铁钱考》（《湖南考古辑刊》二集）考述了考古发掘中所发现的两汉铁钱，得出结论：在汉文帝时期，产生了我国最早的铁钱——半两钱，此后又出现了五铢、大泉五十、大布黄千、货泉、有郭无文字和无郭无文字的铁钱。西汉后期、王莽都曾铸铁钱。公孙述所铸铁钱是采用王莽币式。东汉无文铁钱当是董卓所铸。而铁钱出现量的多少，与全国政局形势密切相关。就是说，凡是中央高度集权，全国统一之时，铁钱就很少；地方割据，群雄混乱之时，铁钱就较多，这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

铜镜在汉代已趋衰落的青铜手工业中却很兴盛发达。周到等《中国古镜装饰艺术概论》（《中原文物》2期）分铜镜的发展为四个阶段，即战国、两汉、隋唐、宋。于两汉铜镜阐述最详。对各

阶段的形制、工艺、纹饰的发展和特点也都作了分析。

洛阳汉魏故城东北隅、孟津县金村发现汉代铜铸官印六十三枚，印文“部曲将印”阴文篆刻，似同模所铸，未曾颁发启用（《文物》5期）。

在广州、望都、梧州、云梦出土的汉代陶屋或陶屋上常见有上圆下三角形洞孔，其位置都靠近门户或通道之旁，置于窗下、紧靠地面或楼板上。它的名称和用途一直未被人们所认识。张良皋《圭窬小识》（《文物》3期）考证，认为这应是“圭窬”或“圭窦”、“闺窦”、“奎孔”。其用途是窥望、防卫，便于清扫和通风。它适应席居生活，所以它的流行地域和时代也就是席居流行的地域和时代。

汉代釉陶在汉代陶器中是甚为特殊的，而且是中外陶瓷史研究者感兴趣的探讨对象。李知宴《汉代釉陶的起源和特点》（《考古与文物》2期）对它的起源、特点等作了探索。他首先否定了汉代的釉陶器是受东地中海沿岸包括埃及在内的罗马系釉陶影响而产生的观点。考古资料证明，汉釉陶大约是公元前二世纪中叶，首先在关中出现的。它无论在器物造型和花纹上，时代特征都非常清楚。地中海、埃及的铅釉陶中含有锰，而中国的铅釉陶中则未见锰的成分。再说中国在商代已有了高温釉即原始青瓷，釉已被认识。对于铅更不陌生，早已具备自己生产铅釉陶的条件。汉釉陶也经历了自身的发展过程，早期多为黄褐色，釉面不够光润。从宣帝至王莽时出现复色釉，在一件器物上同时施黄、绿、褐色釉。绿釉大概是从汉成帝开始的，其后成为数量最多，表现力最强的品种。在东汉晚期以后，釉陶便逐渐衰落。该文还借用化学分析说明汉釉陶的化学成分及特点。

1984年的《农业考古》和《中国农史》发表了根据考古资料研究汉代农业的多篇文章。

五　少数民族考古

少数民族考古的内容1984年比1983年涉及的面要广得多。主要有新疆的鄯善、姑师，青海的土著民族，北方的匈奴，四川、云南的“西南夷”等。

在新疆塔里木盆地东南端、米兰之东，调查发现一处古灌溉渠道（《考古与文物》6期）。该灌溉渠道系统由一条总干渠，七条支渠和许多斗渠、毛渠组成，呈一扇形由南向北展开，灌溉面积可达东西约6公里、南北约5公里。推测其时代是汉唐时期。据考证可能和汉时鄯善伊循城的屯田有关。

在新疆鄯善县西约45公里的火焰山北麓发现有姑师人的墓葬（《考古》1期）。其中八座已经发掘。其墓上都有长方形的石堆作为封土的标志。石堆一般长2.5、宽1.2、高0.2—0.5米。墓坑分竖穴土圹和竖穴偏室两种。它们都以尸床为葬具，尸床为木架式，形似木床，床上铺树枝条，有的还铺毛毡、羊皮褥子、毛织品，陈尸于上。出土有陶器、漆木器、小铜器、铁器、银器、玛瑙、骨蚌器、毛毡、皮革、毛织品等。二座土圹墓随葬品中有红色彩陶器而无铁器；六座偏室墓则无彩陶却有铁器。根据^{14}C测定数据，推测土圹墓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偏室墓则属西汉中、晚期，即处在车师前国的初期阶段。这种文化还遍布于东疆和北疆的乌鲁木齐、吉木萨尔、奇台、木垒、巴里坤、哈密、吐鲁番、托克逊一带。

帕米尔高原是东西交通“丝绸之路”南道的必经之途。新疆的同志曾两次到塔什库尔干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和试掘，均有不少的收获（《西北史地》2期）。

青海境内发现的汉墓有中原汉式墓和汉化了的土著墓葬。后者在葬墓形制和随葬品方面反映出汉文化的影响在逐日加深，东汉时就更为明显。互助县汪家庄发掘西汉晚期至东汉晚期墓十座（《青海考古学会会刊》5期）。从尚具本地民族特点的土洞墓和木椁墓发展为东汉中原式的多室砖墓，随葬品也有浓厚的中原文化色彩。但在葬俗和葬式上却较为复杂。葬俗表现为多人合葬（一墓十人）、男女合葬、单人葬。葬式有二次迁葬（或称扰乱葬、乱骨葬）、仰身直肢葬、侧身屈肢葬、俯身直肢葬等，而以二次葬为主要葬式。二次葬在青海地区的汉墓中较为普遍，它可能是一种羌人的葬俗，或风俗习惯略与羌同的诸胡葬式。在民和县发掘了五座东汉时期的墓葬（同上），其中清泉一号墓系“木室火葬墓”。墓主似一少年，仰身直肢，无首。其旁有两具经过截肢处理的人架，可能是陪葬或殉葬人。该墓在人葬后，经点火焚烧，再行填土夯实，是一种特殊的埋葬习俗。湟源县大华中庄发掘卡约文化墓地时，发现一座较为特殊的墓葬（同上）。墓形为长方形土坑，木棺，敛一成年女性，仰身直肢。随葬品中有近似长约文化的陶器和残铁刀。同类墓葬在海南龙羊峡也有发现，并伴出五铢钱。它们可能是从卡约文化发展来的土著民族的墓葬。

潘其风、韩康信《内蒙古桃红巴拉古墓和青海大通匈奴人骨的研究》（《考古》4期）对匈奴人种问题进行探讨、鉴定的颅骨

有出自桃红巴拉战国时期古墓二例、大通上孙家寨东汉匈奴墓三例。作者将此两组测定的结果同贝加尔湖和胡去尔图两组匈奴颅骨材料进行了对比。认为他们在体质类型方面都属于蒙古大人种的亚洲主干，但之间也存在一些差异。这种差异可能是匈奴不断地向邻族扩张，不同族属间的融合在体质上的反映。

崖墓是汉代四川流行的一种少数民族墓葬形制。也许是因为地区或时代的不同，它们之间也不尽一致。巫溪荆竹坝的崖墓位于大宁河上游支流东溪河西岸，河岸悬崖峻峭。崖棺置于横向呈平台状的狭长石墩上，高距河面100—140米。共有二十五棺，首尾相接，排列密集，两棺一组，或偶数多棺放置，两组间距15米左右。木棺系由整木挖成的底、盖套合而成。分析清理的一具棺中出土两个颅骨和铜带钩、镯，此批崖墓可能是西汉至东汉初的濮人遗存（《考古与文物》6期)。宜宾黄伞和涪陵黄溪崖墓属东汉时期。均是依山凿石而成。一般都有墓道、甬道、墓室、壁龛、小灶的设置。黄伞墓位岷江北岸的黄泥巴地坡、印子坡和渣口崖。东西绵延1900米，共发现一百七十四座。墓有单室、双室和多室。一座多室墓，墓口似木构建筑式样，面阔12米、通高4.30米。两侧各雕一阙，中立两柱，分墓口为三门。柱上有浮雕斗栱，门上方浮雕人、兽、斗栱、房檐、瓦当等。进门为享堂，进深1.50、高2.65米，亦有瓦垅和瓦当浮雕。其后开并排三墓室，构造复杂。这批墓的葬具有石棺和瓦棺两种。随葬品以各种姿态的伎乐俑最为突出（《考古与文物》6期)。黄溪墓位长江北岸，随葬品中有八件青瓷器，这在四川同类墓中是罕见的。它们可能是来自浙江的产品（《考古》12期）。

在云南祥云检村清理的一座石棺墓可能是属于嶲、昆明族的遗存（《考古》12期）。同类墓在祥云、弥渡等县发现约有十座，墓葬时代约在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

滇文化是分布于云南滇池地区的一种青铜文化。其存在时间大约相当于战国秦汉时期。自五十年代发现晋宁石寨山墓地以后，相继在安宁太极山、江川李家山、昆明呈贡等处都有重要的发现，使滇文化的面貌逐渐为世人所认识。昆明上马村和呈贡的再次发掘，又为滇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均见《考古》3期)。上马村五台山位昆明市北郊，昆明盆地的边缘上。清理面积180余平方米，得墓葬十三座。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无葬具，仰身直肢式。在随葬品组合中，一类随葬铜兵器、陶生活用具及装饰品；一类随葬陶纺轮和生活用具。前者应为男性墓，后者为女性墓，男女之间存在着自然分工。墓葬年代和呈贡石碑村西片第一期墓相当，即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是滇文化中早期墓葬。呈贡石碑村东片墓地和西片墓地仅一小路之隔。东片墓地俗称大荒地。共清理墓葬六十五座，面积计140平方米。墓葬密集，排列成行，墓向均朝东北，墓形、葬式均同上马村和西片的墓葬，亦无葬具。按随葬器物可分两期，一期墓未见货币和铁器，二期墓则出货币和铁器，年代分别属于西汉中期与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大荒地墓葬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组合与石寨山、李家山、太極山的晚期类型相近，属于石寨山类型。

在我国西南边陲四川岷江上游、凉山彝族自治州，云南洱海、滇池和贵州西北部一带，亦即汉代所谓“西南夷”地区，普遍出土一种铜柄铁剑。宋世坤《我国西南地区铜柄铁剑研究》（《考古学会论文集(三)》）将发现于上述二十多个地点的一百五十多件铜柄铁剑作了分析研究。首先作者按剑格形制分为四型，即Ⅰ型：无格型，Ⅱ型：三叉格型，Ⅲ型：一字格型，Ⅳ型：心格型。又依剑茎形制和花纹细分十一式。结合器物的年代得出结论：Ⅰ型、Ⅱ型1式时代较早，大约出现于战国晚期，至迟不晚于西汉前期；Ⅱ型2、3式，Ⅲ型4式流行于西汉前期；Ⅱ型4式，Ⅲ型1、2、3式盛行于西汉中晚期；Ⅳ型同中原汉式铁剑，时代最晚，早不过汉武帝时，晚可至东汉初期。该文又推测了西南夷地区使用铁器的时代，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民族和贵州地区夜郎民族至迟应在西汉前期；滇池地区则是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开始使用，西汉中晚期已普遍使用了。从这些分析中也可看出西南地区诸民族逐渐接受中原文化影响的过程。

魏晋至明清考古

段鹏琦

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

北魏初年，在平城以北、阴山以南自西而东设置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个军镇以防御柔然侵扰，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北魏代北"六镇"。以往的考古调查业已认定内蒙古武川县乌兰不浪土城梁为武川镇城，四子王旂乌兰花土城子为抚冥镇城，今乌梁素海西北大约60公里苏独伦公社根场古城为沃野镇城。1984年报道的考古勘察资料认为，固阳县白灵淖城圐圙古城即怀朔镇城，由此推断，察哈尔右翼后旂白音察干古城当为柔玄镇城（《考古》2期）。勘察中，对怀朔镇城作了铲探和试掘，所以，对它的了解比其他镇城要清楚得多。怀朔镇城位于大青山北麓西端，地控山后到达山前的孔道，无疑是一战略要地。其城建在两个相连的土丘上，五金河支河自东北向西南贯穿城区。大城平面略呈不规则五边形，东西1300、南北1100米，城垣板筑，地势低平的东南城角角楼基址犹存，北垣西垣南垣外侧建有马面，东、南、北三面城垣各设城门一座，城门间有街道相通。大城西北隅又建子城。子城和大城内都发现了多处建筑遗址。调查、试掘中，收集到一批石雕柱础、莲花瓦当、板瓦筒瓦、鸱吻等建筑材料，清理出土坯砌须弥座式彩绘佛座和彩绘影塑残件，后者在内蒙古地区尚属首次发现。从出土的石磨、铁犁、牛羊骨等来看，当时怀朔镇一带在经济上具有农业、牧业兼备而农业占一定优势的特点。

西晋帝陵之所在，文献记载略而不明，六十年代有人依据解放前出土之左棻墓志、荀岳墓志，推测晋文帝崇阳陵、武帝峻阳陵约在河南省偃师县南蔡庄一带，1984年发表的资料对此提出了异议。据新的勘察资料，1982年考古工作者在南蔡庄以北邙山南侧土名"峻陵儿"的山坡上，发现一处西晋墓地，有墓葬二十三座，1号墓规模最大，单独居于墓地左侧，其余墓葬规模较小，居于墓地右侧，分前后四排排列。左棻墓志即出于墓地最右边，有可能与晋武帝之峻阳陵有

关。由调查得知，与晋文帝陵有关的荀岳墓志并非如以往所说出于南蔡庄，而是出于南蔡庄以东约3公里的坟庄、潘屯之间。同时，在荀岳墓志出土地点以北的邙山上，也发现一处西晋墓地，由五座墓葬构成，其墓葬形制及排列方式与峻阳陵墓地相同。据其同荀岳墓志出土地点的相对位置推断，它很可能是晋文帝崇阳陵（《考古》12期）。

1984年公布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般墓葬资料，主要是官僚贵族墓，其大多数随葬品丰富，有明确纪年，有的保存有彩色壁画或漆画。

三国墓葬，尤其是魏、蜀墓，以往发现较少，新公布的材料中，有四川崇庆县王场公社五道渠砖瓦厂的蜀墓一座。这是一座长方形券顶砖室墓，由墓门、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墓砖饰斜方格纹，砖边饰波浪纹。出土器物多曾见于当地东汉墓，但形制稍有不同。墓中所出"直百"及"直百五铢"铜钱，为判断该墓的时代提供了物证。该墓墓室地面用黄土、砾石、青砖分六层铺筑而成，基础坚固且利于排水、防潮，是古代墓葬中比较少见的现象（《文物》8期）。新报道的东吴墓，分别发现于安徽、湖南、江苏和浙江。湖南望城县东吴墓（《文物》8期）位于白若公社黄泥大队，系一由前、中、后室构成的券顶砖室墓，墓砖侧面印钱纹、羽状纹及几何纹，随葬模印斜方格纹的硬陶器物及青瓷器。江苏镇江东吴墓共五座，有单室砖墓和多室砖墓两种，单室墓平面凸字形，多室墓由甬道、前室及左、右二后室构成，随葬品主要是青瓷器、陶器和铜器，一神兽镜上有"甘露元年正月五日时□日中造作明镜"的纪年铭文。收集品中还有一件带"赤乌"年铭的铜镜（《考古》6期）。浙江衢州市龚家阜东吴墓，为带耳室长方形券顶砖室墓，出有青瓷器及"建安二十四年"铭神兽镜等（《文物》8期）。金华古方清理东吴砖室墓五座，墓室平面有凸字形和十字形两种，M27墓砖模印有"甘露二年"及"甘露卿相"铭文。共出土青瓷器四十余件，还有带"永安七年六月三日将军杨勋所作镜"铭之神兽镜一枚（《考古》9期）。安徽南陵县麻桥东吴肖氏家族墓地，共清理砖室墓四座，墓室平面皆呈凸字形，随葬品除釉陶器、青瓷器、铜器以外，还出有碗、双层奁、长方盒、小圆盒、果盒、梳篦盒、尺、织梭、纺锭、线板、木方等漆木器。M1所出铅锡合铸买地券上有"赤乌八年十二月"的纪年（《考古》11期）。这批东吴墓的共同特点

是：墓砖上模印花纹，随葬品颇有汉代遗风，随葬较多的青瓷器。三国时期是我国青瓷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鉴于过去这一时期的实物标本发现较少，这些墓葬出土的百余件青瓷又有准确纪年，所以，它们对研究东吴青瓷制造业的发展状况及工艺水平显然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据研究，浙江出土的青瓷应是当地婺州窑的产品，而安徽南陵出土的青瓷碟，酱黄色釉上加点三组褐色斑釉，则是我国目前所见考古材料中较早的点彩器物。另外，安徽南陵出土的木尺、木方及其他漆木器还是研究东吴度制、用品及衣物名称和漆木工艺的宝贵资料。

两晋墓葬也颇有可述。安徽和县小周村西晋墓，系一由前、后室及壁龛构成的砖室墓，前后墓室均叠涩内收成券顶，结构较为特殊。墓砖上模印“太康九年”铭。随葬品主要是青瓷器、陶器和铜器，陶鳄鱼形镇墓兽造型逼真，两枚神兽镜中，一件有“黄龙元年五月壬申造作”的纪年铭（《考古》9期）。浙江金华古方的四座西晋砖室墓，墓室平面同当地三国墓一样为凸字形或十字形，随葬品以青瓷器为大宗。M25出土的人物镜，以孔子及弟子颜渊、仲由、子贡四人像为主体纹饰，颇为新颖。M30砖上模印“太康二年”纪年铭（同上）。江苏镇江西晋墓(《考古》6期)有土坑墓和单室券顶砖墓两种，共四座，随葬品同样以青瓷器为主。出土带纪年遗物三件：带“元康五年”模印纪年铭墓砖一件；刻划券文内有“元康元年”纪年（《考古》9期，读者来信指出，此元康元年应正之为永康元年）的李达地券一件；带“建兴三年”制作铭文的铜镜一枚。这些西晋纪年墓及其出土的青瓷器、铜镜都为西晋墓葬和遗物断代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标准。对镇江东吴、西晋墓出土青瓷器的研究认为，在东吴、西晋时期，青瓷器造型稳重端庄，仿生性强，纹饰多样，不拘一格。生活用品中不少漆器和铜器已被青瓷所取代。到西晋后期，青瓷风格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强调了形体的曲线结构，加强了釉色的亮度和质感，从而使瓷器的特长更好地发挥了出来。

新报道的东晋墓，如广东揭阳仙桥墓（《考古》10期）、浙江金华古方墓（《考古》9期），都出土了一批较为精美的瓷器，但较引人注意的是辽宁朝阳袁台子壁画墓（《考古》6期）。袁台子壁画墓，位于朝阳市区以南12公里处，是一座以绿砂岩石板、石条构筑的石椁墓，由墓道、墓门、墓室及耳室、壁龛组成。以

木棺为葬具。随葬品有陶、瓷、铜、铁、银器、漆木器等等，其中较重要的有瓷器十四件、漆木器十件和一套完整的马具。这套马具由前鞒銮饰、后鞒銮饰和銮具三部分构成，是国内仅见的几套马具之一。该墓壁画绘于墓室四壁及耳室、龛壁上，其作法是，先于石壁上涂一层黄泥，再抹一层白灰面，然后作画，敷红、黄、绿、赭、黑诸彩。现存壁画有门吏图、主人图、牛耕图、庭院图、奉食图、狩猎图、车骑图、骑马甲士图、牛车图以及太阳、月亮等共十九幅。有的一幅一个主题，也有连续几个画面表现一个主题者。主题鲜明，构图活泼，反映了东晋壁画艺术的水平。目前，象这样内容丰富、保存较好的东晋墓葬壁画颇不多见。

此外，在陕西华阴县西关清理了南北并列的两座古墓，发掘前地面上有圆形夯筑封土堆，及清陕西巡抚毕沅所立“前苻秦清河侯王公猛之墓”石碑一通。这两座规模较大的砖室墓，由墓道、前后墓室及前室之南北耳室构成，时代大约相当于东晋中晚期。墓虽被盗，仍出土铜、陶、釉陶、铁、金银、玉、玛瑙、象牙、琥珀等不同质料的器物及装饰品二万余件（《考古与文物》3期），是否王猛墓？虽不敢遽下断语，但其墓主为显要贵族则确凿无疑。1960年辽宁本溪市东小市镇发现一座两晋时期的墓葬。墓葬平面呈丁字形，以石块、石板砌壁，石板盖顶，墓底铺卵石，顶板上以卵石包封。随葬夹砂或泥质灰陶罐，鎏金铜带卡、鞍饰，铁衔镳及挂钩等。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兼具魏晋墓和高句丽墓的一些特点，陶壶所饰网纹和某些鎏金饰物还与鲜卑器物相似。目前虽不能肯定其为晋墓还是高句丽墓，但它忠实地反映了晋之玄菟郡与高句丽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密切交往和影响（《考古》8期）。

在新报道的南朝墓中，江西赣县官村营南齐墓，共四座，M 4墓砖上模印“齐建武四年”纪年铭（《考古》4期）；永修县爱华大队南梁墓，墓砖上模印“天监九年”纪年铭（《考古》1期）；浙江奉化县山厂大队南梁墓，墓砖上模印“天监□年”纪年铭（《考古》9期）；广东揭阳县平林村南朝墓，共三座，M 3结构复杂，平面呈“卅”形，为以往所罕见，M2墓砖上模印刘宋“大明四年”纪年铭（《考古》10期）。这批纪年墓的发现，为南朝墓葬和器物的编年学研究增加了新的断代依据；这一点，对以往发现纪年墓较少的江西省来说尤其显得重要。这批南朝墓大都随葬一

定数量的青瓷器，据研究，江西赣县官村营南齐墓所出青瓷器，地方特征鲜明，大约是洪州窑产品。而浙江金华古方南朝墓出土的瓷器（《考古》9期），应和当地东吴、两晋墓所出瓷器一样是婺州窑所产。江苏扬州地区邗江县包家大队清理出南梁画像砖墓两座（《考古》3期），墓砖上模印高浮雕及浅浮雕莲花、人物、怪兽、朱雀、人首鸟身像、小佛像等，这是南朝画像砖墓在苏北扬州地区的第一次发现。

广西融安，地处广西北部山区，是中原移民进入较晚的地方。这里发现的三座南朝刘宋、南齐墓，分别为长方形、“中”字形砖室墓和竖穴土坑墓，随葬铜器、青瓷器、滑石器。与周围地区相比，它们在形制和随葬品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地方特色，如墓室四壁多设砖柱，墓砖多素面，随葬较多滑石器等等。这些墓葬的发掘，对研究南朝时期这一地区的历史面貌，将有所裨益（《考古》7期）。

在湖南资兴县旧市、厚玉等地发掘晋墓二十四座、南朝刘宋——梁墓五座。这些墓葬的形制同长沙地区稍有不同，带有一定的地区性。随葬品以青瓷器为最多，计有上百件，经过整理研究，初步总结出了从晋到南朝湖南青瓷器发展的基本脉络（《考古学报》3期）。

新报道的北朝墓葬，较重要的有宁夏固原北魏墓（《文物》6期）、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文物》4期）、河北磁县东陈村北齐尧峻墓（同上）、河北吴桥北朝墓（《文物》9期）、山东临淄北朝墓（《考古学报》2期）。

宁夏固原北魏墓，为夫妇合葬墓。出土各类随葬器物中，有铜器四十件，波斯银币一枚。其男性死者用漆画木棺，经修整复原，其棺盖、前档及左右两侧棺板的漆画大部清晰可见。棺盖绘日月及东王父、（西王母）；前档所绘似墓主人饮宴；左右两侧棺板，上层分别绘舜、郭巨，尹吉甫、蔡顺等孝子故事，下层绘狩猎图。这些漆画以红色为地，以铁朱、石青、石绿、黄色调漆绘制，以彩色线或墨线勾勒，是继司马金龙墓之后又一件珍贵的北魏漆绘艺术品。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为一甲字形砖室墓。墓主茹茹公主，即柔然邻和公主，由于政治上的需要，五岁配予高欢第九子高湛。鉴于这种特殊身分，“送终之礼，宜优常数”，随葬品异常丰富。虽早年被盗，出土完整及可修复器物仍达一千余件，其中彩绘人物俑多达一千零六十四件，数量之多，为已知北朝墓之冠；此外，还有陶镇墓兽、陶禽畜及模型器、陶瓷

器、铁器、金器及两枚拜占廷金币。茹茹公主墓从墓道到墓室还保存着面积约150平方米的彩色壁画：自墓道入口处依次绘青龙、白虎；仪卫行列；镇墓威神及凤鸟、羽人。墓道地面两边绘花卉图案。甬道券顶门墙上绘朱雀及镇墓威神；甬道两壁绘侍卫。墓室四壁壁画题材以四神和描绘墓主人起居为重点，如北壁上层绘玄武，其下绘茹茹公主及其侍女共七人；西壁上层绘白虎，其下为侍女十人。画面壮阔，布局严谨，人物比例准确，服饰生动逼真，线条豪放，敷色艳丽，堪称北朝壁画的精品。以往所见东魏壁画墓，壁画皆已毁尽，东魏画迹，几乎一无所知，这一壁画墓的发现，填补了中国绘画史上的这页空白。通过该墓的发掘，对高欢义平陵及高澄峻成陵之所在也有所了解，从而纠正了《资治通鉴》等有关记载的失误。河北磁县东陈村北齐尧峻墓，出土陶俑较多，且甬道顶门墙上绘有彩色壁画。尧峻及妻吐谷浑氏墓志还保存了一些与东魏、北齐相关的历史资料。河北吴桥北朝墓，共四座，分属北魏、东魏、北齐时期，出土陶、瓷、金、银、铜、铁、玉质随葬品三百余件，类型也比较丰富。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北朝墓，是北朝名族清河崔氏的家族墓地。这里共清理了北魏、东魏、北齐墓十四座，其中五座出有墓志，它们是北魏孝昌元年崔鸿夫妇合葬墓，东魏元象元年崔混墓、天平四年崔鹔墓，北齐天统元年崔德墓、武平四年崔博墓。出土大量陶俑、陶动物及模型器，还有一批白陶器和青瓷器。在山东地区，象这样包含北魏、东魏、北齐三个朝代墓葬的家族墓地还是首次发现。墓地出土的大量随葬器物，为山东地区以至更大范围内北朝器物的编年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综合墓志及史籍记载初步整理出的清河崔氏（有关崔鸿的一系）世系，对北朝时期世家豪族势力的发展和北朝历史研究当有较高的资料价值。

河北黄骅县北齐常文贵墓有准确纪年（《文物》9期）；山东淄博和庄北朝墓出土有被认为是当地北齐寨里窑产品的碗、尊等青瓷器（《文物》12期），也应予以注意。

这一年报道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窖藏货币资料，有广西荔浦县兴坪大队出土的东晋以前货币及山东博兴县崇德大队出土的北齐货币。兴坪所出货币共约15公斤，其中有三国蜀汉币“直百”及“直百五铢”；孙吴币“定平一百”、太平百钱及小样太平百钱，还有东晋沈充所铸沈郎五铢等（《文物》11期）。崇德所出

北齐货币共约12.5公斤，全部为篆文“常平五铢”钱（《考古》11期）。

1981年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达茂联合旗出土窖藏金饰五件，包括金龙饰、金牛头鹿角饰和金马头鹿角饰三种，制作精美，后两种为过去所不曾见，或为北朝时期鲜卑族的遗物（《文物》1期）。

对魏晋南北朝时期遗物的研究，涉及到墓志、画像石棺、帷帐、铜镜四个方面。

1965年辽宁朝阳城北西上台村一座北魏砖室墓出土带鳖座石质碑形墓志一件，额题“刘戍主之墓志”，碑体四面连文，志文不长，但内容丰富，涉及北魏前期人口迁徙、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方面一些重大历史问题。曹汛在《北魏刘贤墓志》（《考古》7期）一文中，较翔实地论述了这些问题，并指出墓主刘贤系冒汉姓之别部鲜卑人，延和元年以后始迁住营州且充任低级官吏。据知，此种形制的北魏志还是第一次发现，在所有自称“墓志”的墓志中，它也是时代最早的实例之一。杜葆仁、夏振英考证陕西华阴、潼关所出北魏杨播、杨颖、杨阿难、杨泰妻元民、杨胤季女等六方墓志，整理出从秦汉至北魏弘农杨氏上下二十五代的谱系，为研究我国历史上的门阀制度提供了一个典型实例（《考古与文物》5期）。宫大中对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艺术博物馆藏洛阳出土北魏孝子石棺的绘画题材作了考释，以为左侧棺板所刻孝子“尉”，即汉汝南王琳，其人字巨尉。他指出，此石棺的石刻线画，从构思立意到构图安排，从写形状物到线条运用，都娴熟自如，较之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所记魏晋以降山水画的艺术手法还略高一筹（《中原文物》2期）。卢兆荫在《略论两汉魏晋的帷帐》（《考古》5期）一文中指出，我国古代使用帷帐一类器物至少可以追溯到东周时期。到秦汉，帷帐广泛使用，几乎成为帝王宫室殿堂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陈设，从而进入了帷帐的兴盛时期。他在文章里着重讨论了兴盛时期帷帐的种类，掌管帷帐的官署以及墓葬随葬帷帐的始末等问题，对与其相关的社会风习也作了较详尽的阐述。徐萃芳《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铜镜》一文（《考古》6期），从类型学的编年学的角度，将这一历史时期的铜镜分作三期：第一期，三国至西晋，大约相当于三世纪至四世纪初期（建安元年一西晋建兴四年）。第二期，东晋、十六国至南北朝前期，大约相当于四世纪至五世纪后期（东晋元帝建武元年一宋顺帝升明三年）。第三期，南北朝后期，大约相当于五世纪后期至六世纪后

期（北方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南方的齐、梁、陈），并分述了各个阶段铸镜业的发展情况及所铸铜镜的种类、特征。王仲殊在《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综述》（《考古》5期）中提出，日本的三角缘神兽镜既不是中国的魏镜，也不是中国的吴镜，但与中国的吴镜、特别是与中国长江下游会稽郡的吴镜有密切关联，这种关联表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是由中国的吴的工匠东渡日本在日本制作的。

高句丽考古，近年也取得了可喜收获。1984年发表的《集安高句丽考古的新收获》（《文物》1期）和《吉林、辽宁的高句丽遗迹》（《考古与文物》9期）两篇专文，全面而系统地回顾了关于高句丽的考古新发现和研究成果。这些发现及研究成果中，1984年新公布者，主要有以下几项：

近年，考古工作者对位于集安县城的高句丽都城遗址国内城重新进行了调查、测绘和试掘（《文物》1期）。调查确认，国内城原为一座版筑城垣的土城，高句丽迁都国内城的初期，曾沿用此城。迁都一段时间之后，依土城垣旧基修筑了坚固的石城，现存石筑城垣下部砌作规整、墙面平齐的部分，便是高句丽时期的石城垣遗迹。据实测，其城平面略呈方形，方向155°，东垣长554.7、西垣长664.6、南垣长751.5、北垣长715、周长2686米，垣宽7—10米。城之西北角、西南角、东南角有突出墙外的方台，似为角楼遗基；东北角呈弧形，不筑角楼，夹城角之东、北二垣上各筑马面一个。四面城垣外侧，均筑有马面，北垣八个，其余三面各两个。城之四面共设城门六座，东西各二，南北各一，城门外均有瓮门。在城中部之县运动场、县政府及公安局院内，都发现了高句丽房屋建筑遗址，三者在一条东西线上，东西范围约240米，或为同一组建筑。从规模及位置看，应是城内的重要建筑，也可能是宫殿的遗址。

1981年和1982年先后清理了集安县老虎哨和麻线乡的两处高句丽墓葬。老虎哨墓地共清理高句丽晚期中小型石室墓和洞室墓十七座，无论石室墓、洞室墓都包含单室墓和双室墓两种。在这些中小型墓中，普遍放置“迎门石”，是过去不曾有过的现象，说明高句丽晚期在葬俗方面出现了一种新的观念（《文物》1期）。集安麻线乡高句丽墓，包括上活龙村墓地和下活龙村墓地两部分。在上活龙村墓地清理积石墓、阶坛积石墓、封土洞室墓十四座；在下活龙村墓地清理积石墓三十四座。发现两个值得注意

的现象：（1）以往报道的高句丽早期积石墓，多大中型墓，坟垄平面多呈方形，墓圹位于坟顶。下活龙村积石墓的发掘表明，高句丽早期积石墓也有坟垄平面作圆形的，而且有的墓圹位置较低，与地面取平。（2）下活龙墓地有一批墓圹很小的积石墓，墓室不足容尸。这种墓葬过去尚未发现过，它意味着高句丽存在二次葬的习俗。另外，上活龙村墓地一些封土洞室墓出土亚字形铜镜，其年代大约为公元八世纪，它提醒人们，集安此类墓葬，部分应属渤海时期（同上）。耿铁华、林至德《集安高句丽陶器的初步研究》一文（同上），以随葬品中最常见、形制最富于变化的陶壶、陶罐为标准器物，将高句丽陶器分作与墓葬编年相对应的三期，由各个时期陶器在陶质、形制、制法等方面所显示的特征，总结出高句丽陶器从早到晚的演变、发展规律。这一研究同样表明，封土洞室墓应属于高句丽晚期，有些甚至晚到渤海时期。封土洞室墓数量甚多，上活龙村墓地发掘和高句丽陶器研究所提出的这一结论，对高句丽考古工作的深入发展将大有裨益。

1984年吉林文物工作队继简报之后发表了集安五盔坟4号墓的正式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期），公布了这一重要高句丽墓葬的全部资料。

二 隋唐时期

1984年报道的隋唐考古资料，涉及隋唐遗址的只有一些与州郡治所及交通有关的文物。唐内侍省令史堵颖墓志、右龙武大将军张登山墓志及西安西郊枣园村出土的唐初画家王定墓志，是关于唐长安临皋驿的重要实物。临皋驿系长安西行第一驿，过去有人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判定其在咸阳市东14.5公里。今据墓志考证，临皋驿应在今土门村西北约1.5公里的地方，从而纠正了《元和郡县图志》有关记载的失误（《考古与文物》3期）。1978年陕西高陵县白家嘴村出土正六棱形《东渭桥记》残碑一件（《考古与文物》4期），碑文对东渭桥形制作了形象描述，由此不仅了解到唐代渭河三桥之一的东渭桥的方位，而且从中得知，是桥建于唐玄宗开元九年，由京兆尹孟某领衔修建，参与此项工程的有京兆、高陵、三原、奉先、美原、华原、同官、富平等京畿之地的官民。河北石家庄市振头村唐墓出土云麾将军□太常卿乐安孙岩墓志一方，志云，孙岩于元和七年死于“恒府石邑县之私第”。恒府，指恒州都督府，治所在石邑。振头村古为石邑城址，可见“恒府”即在此地（《考

古》3期）。

1984年报道的隋唐墓葬，虽都是一般墓葬，但多数有明确纪年，随葬品也不乏贵重文物。西安东郊郭家滩隋罗达墓（《考古与文物》5期），为一土洞墓，出土陶俑五十三件，还出有象牙带钩和罕见的象牙笏板。据罗达墓志，其人死于开皇十六年，墓葬纪年准确，可作为西安地区隋墓及陶俑断代的依据之一。河南偃师县杏园的两座唐墓（《考古》10期），也为土洞墓。景龙三年李延祯墓，墓室四壁以木板围绕构成木椁，并以木板将椁室分作东西二部，东部置随葬品，西部建砖砌棺床，上置木棺。此种棺椁格局在唐墓中颇为特殊。墓内出土陶俑及模型器五十五件，还有漆器、铜钵、墓志等。会昌五年李存墓，除墓志外，出有玉质牛羊模型、盒、杯、罐、盘，石质熏炉、砚，铁质牛、猪、犁铧，白瓷罐和唾盂。还有铜印及印盒、铜匜、漆器、银器等。玉、石器造型优美，白瓷器质地优良，带印盒的铜印，印面阳刻篆文四字，似可读为“渤海图书”。如然，则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藏书印章。福建泉州东郊的两座唐墓，出土瓷器三十九件，发掘者以为系吉州窑所产。M1墓砖上模印“咸亨貳年”铭，对纪年墓较少的泉州地区来说，无疑是一项宝贵的资料（《考古》12期）。上海县诸翟发现的唐太和四年纪年墓（《考古》7期），除出土的瓷器外，墓志本身还为研究当时华亭县的地理位置提供了依据。河南淇县靳庄村西北，发现一座小型唐代砖墓，其时代大约相当于高宗武则天时期，墓室平面呈梯形，无墓道也无墓门，墓壁从第二层砖以上即开始叠涩内收，以侧立交错筑券成顶（《考古》12期），这种特殊结构的墓室，或为厝葬墓的一种形式。1979年浙江杭州三台山东麓发现一座五代砖室墓，具甬道及前、后室，后室平面呈船形，二侧壁皆砌有耳室、壁龛和壶门，结构较为复杂。随葬品中有一批青瓷器，器壁较薄，制作精美，青绿色釉晶莹滋润，被认为是吴越国官僚或者钱氏家族一般成员的墓葬，所出瓷器则为五代秘色瓷（《考古》11期）。1976年和1977年在广西钦州县青草大队和新明大队清理隋唐砖墓七座，依墓室平面可分作凸字形墓，前室宽短、后室窄长的前后室墓，具前后室、后室两侧设壁龛的“干”字形墓以及二墓室平行的双室墓四种，形制与广东韶关、英德、封川等地隋唐墓有许多共同点，地方色彩较浓。随葬品有青瓷器、陶器（多数为硬陶）、铜器、铁器以及玉笄、琉璃杯、金发

钗、金箔明币等。发掘者研究认为，它们是隋至初唐时期宁越郡首领宁氏家族的墓葬。宁氏祖籍冀州临淄，先祖人居蛮越，世为俚人首领，系南朝、隋唐时期岭南最大土豪之一，在传播汉族文化、促进汉族与俚人融合方面起过重要作用。宁氏墓葬的清理，将为研究南朝、隋唐时期广西钦州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提供丰富的实物资料（《考古》3期）。

新疆吐鲁番县建设大队唐墓出土永徽五年朱书灰砖墓志一方，志载安西都护府天山县南平乡董□隆母令狐氏，年八十有余，贞观廿三年诏授魏州顿丘县达安乡君，证明唐之尚老制度贞观廿三年以前已在西州地区施行（《文物》5期）。河北大名县万堤公社一座晚唐墓，出土唐魏博节度使何敬弘墓志一方。墓志硕大逾制，边长1.95米，志石及盖雕饰华美，为前所未见。志文述及此人生平，并涉及到平刘稹等重大历史事件（《考古》8期），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朝廷衰弱藩镇割据一方而尾大不掉的社会局势。

唐代金银器又增添了一批新资料，其中较重要者有：西安东郊枣园村窖藏（晚唐）所出折枝团花鎏金银渣斗、双凤衔绶五曲银盘、六瓣素面银碗各一件；同出的一件银铤，錾刻“乾符六年内库别铸重卌两”等铭文（《考古与文物》4期）。西安交大出土的晚唐套装银盒一套共二件（《考古与文物》4期）。西安南郊西北工业大学中唐窖藏所出双鱼宝相莲纹银盘、双鸿小簇花纹银碗、鸳鸯鸿雁折枝花纹银碗、黄鹂折枝花纹银盘各一件。双鱼宝相莲纹银盘底部錾刻铭文，标明其为朝议大夫使持节都督洪州诸军事守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江南西道观察处置都团练守捉及莫徭等使李勉的奉进品（《考古与文物》4期）。浙江淳安县朱塔晚唐窖藏所出高圈足银杯六件、平底银杯二件、笆斗形银盏一件、银壶盖（壶身散失）一件，还有一副多条银链组合而成的项链（《考古》11期）。

此外，洛阳博物馆征集的隋代画像镜（《中原文物》1期）、西安市文管会征集的唐“真子飞霜”镜（《考古与文物》4期）、新疆焉耆城子公社出土的唐龟形符（《文物》10期）、洛阳隋唐东都城出土的龟形澄泥残砚（《文物》8期）、北京丰台区林家坟推测为史思明墓出土的嵌金铁马镫（《文物》4期）、广东阳春县石望公社冶炼遗址出土的南汉石“乾亨重宝”钱范（《考古》4期），都是比较贵重的隋唐文物。1982年河南荥阳县城关镇大

海寺故址挖出隋五铢钱一万三千多枚，数量之大，实属空前(《中原文物》1期)。

这一年发表的论述性文章，有关于洛阳附近隋唐粮仓(《中原文物》1期)及隋唐官仓制度的(《考古》4期)，还有研究唐代陶瓷、纺织以及科技、文化遗物的。高至喜《长沙出土唐五代白瓷器的研究》一文(《文物》1期)，系统介绍了长沙地区出土的唐五代白瓷器物的种类、形制、胎釉特征，根据其出土情况认为，它们一般属于晚唐时期；并指出，湖南益阳赫山庙唐宝应二年岳州长史墓出土的一件白瓷碗，是我国南方有年代可考的最早的白瓷器，它表明南方的白瓷可早到中唐时期。至于长沙地区所出白瓷的产地，他认为除少数胎较细、釉白而闪青的唇口碗、花瓣口碟为早期定窑产品外，其余大部分可能为湖南所产。对长沙出土的带“官”字款白瓷器的产地，他认为很可能产于长沙一带或邻近地区。李辉柄《关于“官”、“新官”款白瓷产地问题的探讨》一文(《文物》12期)，分析了河北定窑唐、五代早期产品和入宋以后产品的特征，认为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湖南、浙江、辽宁所出唐以至宋辽时期带“官”、“新官”款的白瓷，除湖南出土的“官”款白瓷盒似为湖南生产的以外，其余这类白瓷均应是定窑的产品。蒋华《江苏扬州出土的唐代陶瓷》一文(《文物》3期)，将扬州出土的唐代陶器分作北方窑产白陶、彩釉陶和南方窑产印纹硬陶、釉陶两个系统；将扬州出土的瓷器分作北方窑产白瓷和南方窑产青瓷两个系统。从胎釉的质料颜色、施釉方法、使用范围等方面阐述了各系陶、瓷的不同特点，并对一些陶瓷器物的产地提出了推测性的看法，认为北方系釉陶(包括三彩器)很可能是河南、安徽等地北方窑的产品，而有些南方系青瓷器则可能为宜兴窑所烧造。关于白瓷工艺，他以为要烧成白瓷，一须将坯胎原料提纯，使高岭土白度增加；二得把釉料的铁素减少到一定程度。这些要求，在北齐时期已经出现，到了唐代才基本成熟。周长源《扬州出土的唐代水盂和水注》一文(《考古》8期)，介绍了馆藏扬州出土唐代白釉、青釉和彩釉水盂、水注二十余件，指出，唐代盛行的水盂、水注，不仅是文房用品，同时也是当时文化生活中的一种艺术品。扬州出土陶瓷、滑石质此类器已有百件，数量多，造型美，色彩绚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扬州文化发达的历史面貌。刘建洲《巩县黄冶窑唐三彩玩具的艺术特点》一文(《中原文物》

2期），分析了黄冶窑产三彩玩具的题材、造型、工艺技术，指出，这些三彩玩具题材多种多样，造型活泼生动，有的滑稽可笑，釉色绚丽多彩，既能给人以美的形象感受，又具有诱人的色彩，颇能引起儿童的兴趣和喜爱，在我国玩具史上应占有重要地位。科技方面还有武敏《吐鲁番出土蜀锦的研究》（《文物》6期）、王正书《川扬河古船结构的研究》（《考古》7期）、吴玉坤等《沧州铁狮的铸造工艺》（《文物》6期），详见本书《科技考古》部分，不再重复。

1969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古写本隋薛道衡《典言》残卷，王素著文进一步指出，《典言》是一部诏编的旨在裨益君道的小型类书。诏编《典言》的时间不在隋，而应在北齐武平三年至武平七年之间，撰者不可能仅薛道衡一人，实际情况应该是，由薛道衡主编，而由李穆叔、荀士逊、李若等分撰而成；但传入新疆的中原写本应是唐人写本，其抄写时间必在龙朔二年以前（《考古与文物》2期）。《唐代妇女的服装与化妆》（《文物》4期）及《千年古榻》（《文物》6期），还分别对唐代妇女衣服、鞋帽、发式、化妆和江苏邗江五代墓出土木榻的结构、工艺技术进行了较深人的探讨和考证。关于唐乾陵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云翔认为图中由南至北第二人并非日本人，而应是古代朝鲜人（《考古》12期）。对传世之“饭牛镜”的图象，罗家容指出，它不是宁戚饭牛，而是皇甫隆遇青牛道士封君达或者许由遇巢父的故事（《文物》7期）。

三 宋辽金元时期

1984年报道的宋代遗址有二：一是河北雄县发现的一条据说为北宋所开的地道（《文物》6期）。地道距地表深3.3米，由主道、藏身洞及内室构成，全长约30余米，是一项前所未见的古代建筑遗迹。一是北宋皇陵采石场（《考古》11期）。这一为修建巩县宋陵提供了大量石材的采石场，位于河南省偃师县南部前萝山前的一条山沟里，长约数里，沟壁满是采石留下的坑凹和錾凿痕迹，沟底散布着厚厚的一层废石料，在一水潭处且发现了当年导泉入采石场山谷的“导泉处”，这里的石壁保存着元符三年为永泰陵采石工程中导泉的题记。在附近山崖上还找到一处葬埋死难工匠的石龛。这也是一项过去尚未发现过的古代遗址。

新报道的宋代墓葬也有不少有价值的资料。江西铅山县莲花山北宋墓，为一方形石室墓，墓主吴氏葬于元祐改元十一月。随

葬青瓷器中有影青带碗注子一套，注、碗成套装匣钵烧成，系景德镇窑的产品，无论造型、釉色都是同类器物中的姣姣者(《考古》11期)。广东紫金县城郊高墩顶山北宋砖室墓，出土红褐色砂岩质石雕俑十三件，内中圆雕生肖俑六件、仰头俑、伏地俑、石狗各一件，浮雕龙、虎、凤、鸡各一件。以石雕俑随葬在广东省颇为罕见(《考古》6期)。江苏常州北环新邨北宋土坑木椁墓，出土银里漆盖罐、银里扁圆盒、银包口朱漆托子等漆器六件，夹罗漆片二片。银包口朱漆托子底部并有朱书铭文“苏州真大黄二郎”铺号字样，这是宋代漆器一次较重要的发现，从中可了解宋代髹漆工艺的高度水平，此外还可确定苏州也和杭州、温州一样具有生产漆器的行业(《考古》8期)。陕西汉中市北郊石马坡的两座南宋砖室墓，M1所出三彩龟座陶墓券的刻文有绍兴三十二年纪年。墓中出土一批带有浓烈唐三彩遗风的三彩俑和釉陶俑，还有影青瓷器、铜镜等等。铜镜素面，铸有“湖州真石公权炼钩照子”的铭文(《考古与文物》5期)。四川荣昌县沙坝子南宋墓以红砂岩砌成，右壁上阴刻淳熙十二年题记。墓室四壁的仿木建筑雕刻保存完好。据研究，此墓的仿木建筑雕刻基本上依据宋《营造法式》的规定，但其中一些构件也带有地方色彩(《文物》7期)。在江西九江市和乐安县也发现有宋代纪年墓(《考古》8期)。与上述宋墓相比更为重要的是湖南衡阳县何家皂山的一座北宋竖穴土坑墓。此墓葬具为一棺一椁，椁以红褐色石板构成，棺用檀木做就，棺椁间填满石膏。棺内男尸一具，浸泡在褐色棺液中，躯干完整，下肢皮肤尚稍有弹性。棺内随葬有铜镜、木梳、木砚、木笔、石砚、笔篓、草席等物，棺外出土纸画(武士)一幅。死者衣物被子等纺织品，已被扰动破坏，从取出的二百余件较大残片可以辨认出丝绵袍一件、丝绵袄六件、夹衣三件、单衣一件、裙五条、丝绵被一条、纱帽一顶、麻布鞋一双(《文物》12期)。据研究，用以制作这些衣被诸物的纺织品，绫罗居多，绢次之，素纱很少。对所出素纱、花纱、素罗、花罗、绫、绢、麻等各种织物进行组织结构及纹样的观察分析表明，此墓的纺织品种类多，纹样也比较丰富；其本色花绫小提花织物，多运用平纹与斜纹混合组织结构。在这类织物中，有几件用条杆粗细不同的纬线相间排列，细纬织地纹，粗纬花部织斜纹显花，织时用甲乙梭轮换交织，可能与文献所载织物“交

梭”、“双丝绫”类似（《文物》12期）。

河南孟津县张盘村出土北宋张某画像石棺一具，石棺前档浮雕门窗及升仙图；左、右棺板及后档阴线刻仙女及孝子烈女图，俨然一幅幅北宋世俗画，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但所刻二十四位孝子烈女，约有半数不在近世所传二十四孝之列（《文物》7期）。河南安阳天禧镇北宋墓，有彩绘壁画一幅，共画五人，一为叉手小儿，其余四人分执拍板、觱篥、笛及腰鼓。周到认为这是一幅宋代《散乐图》，图中所绘显然是支民间小型散乐队。它的发现，证明了宋代民间散乐的繁荣（《中原文物》1期）。廖奔对1983年报道的河南温县宋墓杂剧雕砖作了考证，认为此墓雕砖一为杂剧角色图，一为乐部图。杂剧角色图的五个人物形象，分别为末尼、装孤、引戏、副净、副末等杂剧的全部角色，只是象征杂剧演出，并非展示杂剧的演出程序。他指出，过去有人以为偃师酒流沟宋墓三块杂剧雕砖代表了杂剧演出的三段即艳段、正杂剧、后散段，是不对的。乐部图六人，分执杖、琴、杖鼓、笛、方响，其乐器组合应属教坊大曲乐，但不尽完备（《文物》8期）。

这一年发表的四川宜宾县双龙、横江两区岩墓调查简报，报道了沙河上游东部各条溪涧附近二十一个点、一百一十七座岩穴墓的情况：墓穴开凿在临河或山巅的陡峭岩壁上；墓口近方形；墓室呈袋状；墓顶多种，而以平顶最常见；墓口两侧普遍用浅浮雕手法雕刻人物及动物形象。此种墓葬盛行于宋，但元代仍然存在。与分布于叙南之他种形式的崖墓，如高县的直穴墓，高县以东的横穴墓及叙南的悬棺葬等相比，有不少共同点，也存在一些差异。据研究，它们都应是獠人的墓葬，但分属不同部族或支系（《考古与文物》2期）。

宋代窖藏金银器这一年报道了多起。浙江永嘉县下嵊公社1983年出土的窖藏银器较完整者五十一件，除一件兽面纹银碗外，余皆发饰。这些银饰制作精细，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和艺术价值。不少银饰上刻有银铺字号及人名，如“蔡景温铺”、“京溪供铺记”、“任士秀才造”，“余宣钱”、“陈宣教”、“施八郎”、“余定毅”、“城南周□□”，等等，对研究宋代金银手工业也颇有资料价值（《文物》5期）。此外，陕西扶风县上宋公社一座宋代房基内出土带銙、蹀躞等精美银质带饰三十四件；同县午井公社宋代院落内出土金镯、金耳环、银铤和充当流通货币的散碎银子，同县法门公社一

宋金时窖藏中出土银碗四件，高足银杯、银羽觞各一件，银铤一件及两件铜“条脱”（《考古与文物》4期）。湖北襄樊羊祜山出土具铭文宋代银铤二件（《文物》4期）。四川双流县出土窖藏南宋具铭文银铤六件、金银装饰品多件（《文物》7期）。

新报道宋代窖藏铜器，数量颇为可观，且多出于四川。如四川江油县旧彰明县城北街一次发现窖藏宋代铜器一百七十九件（《考古与文物》6期）；阆中县丝绸厂出土窖藏宋代铜器一百六十件，铜筷一百二十二副（《文物》7期），德阳县景福公社出土窖藏宋代铜器四十三件（同上），大邑县安仁镇出土窖藏宋代铜器十余件（同上）。1982年三台县县城一次发现宋代各型铜镜十二面（《考古》7期），这在铜镜发现史上也十分少见。

新报道的宋代窖藏瓷器主要有六批，四批出于四川。它们是大邑县安仁镇出土窖藏南宋影青及青釉、酱釉、玳瑁釉瓷器四十五件（《文物》7期），郫县红星公社出土宋代白釉、黑釉及影青瓷器六十九件（《文物》12期），阆中县丝绸厂出土南宋中期窖藏影青及青釉、白釉、玳瑁釉瓷器八十一件（《文物》7期），成都市出土南宋窖藏影青及黑釉、白釉、青釉瓷器一百一十六件（《文物》1期）。这些瓷器，当然不是同一窑口的产品，据研究，影青瓷器多产于江西景德镇湖田窑，白瓷器分别产于四川彭县磁峰窑及河北定窑，黑釉瓷器应产于四川广元窑，而玳瑁釉瓷器则可能来自江西吉州窑。1981年河北曲阳北镇发现北宋窖藏白瓷器十三件，有缸、碗、盘三种器形，多芒口，以刻花、印花手法制作装饰纹样，它们分别为定窑中期及晚期的产品（《文物》5期）。1972年甘肃华池县发现宋代窖藏青釉、黑釉瓷器六十八件，其中陕西耀州窑青瓷近六十件，是耀州窑青瓷在甘肃的一次重要发现（《文物》3期）。

两宋窖藏货币，见于报道的有：山东博兴县崇德村和相公堂村先后出土的三起。这三起货币共约30公斤，其中宋币近三十种，而且多为“对子钱”（《考古》11期）。安徽和县山王村出土窖藏铜币350余公斤，除少量汉唐钱外，多为北宋货币，计二十余种，其中也有“对子钱”（《考古》12期）。

新报道各地所出印章中，以浙江海盐县古镇澉浦出土的九方南宋铜质军印最为重要（《文物》9期）。这九枚军印的印文分别是：雄节第一指挥第三都朱记，殿前司平江府许浦驻扎水军第一将印，嘉兴府澉浦驻扎殿前

司水军第一将印，嘉兴府澉浦驻扎殿前司水军第四将印，金山防海水军第二将印，嘉兴府驻扎殿前司金山水军第二将印，嘉兴府金山防海水军统领印，嘉兴府驻扎殿前司金山水军统制印，沿海制置司定海水军第一将之印。这些军印的出土为研究宋代水军提供了一些新资料，弥补了《宋史》关于水军记载的失误和缺遗。这么多不同驻防区的军印之所以会集中到澉浦来，与德祐元年元军大举进攻、南宋水军节节败退的战争形势当有直接关系。

1976年浙江武义县岩坞大队一座宋墓，随葬器物除带“元丰六年”题铭之灰陶器外，还有一批青釉、黑褐釉及影青瓷器。李知宴等认为，浙江境内，尤其是金华地区有确切纪年的北宋墓不多，此墓的发现，首先为黑褐釉龙纹瓷罐这类很难判定时代的器物树立了一个断代的标尺；其次，此墓影青瓷器标本证明，南方采用扣烧法烧制影青瓷器，不像以前所说始于南宋，而是始于北宋后期。他们还认为此墓所出青瓷器应是婺州窑的产品，其制作水平，不低于越窑和龙泉窑；而黑褐釉瓷器可能是武义当地窑所烧造（《文物》8期）。

辽代考古的深入发展，已将辽代建国以前契丹人早期文化的探索提到日程上来。近年在内蒙古哲里木盟通辽县乌斯吐、扎鲁特旗乌日根塔拉和鲁北镇、库伦旗秦家沟各发现古墓一座（《考古》2期），它们虽分别为火葬墓、土坑墓和石棺墓，但随葬品皆以夹砂大口并有三、四层凸弦纹口沿的陶罐（乌日根塔拉无夹砂器物）和细泥盘口瓜棱腹陶壶为基本组合；与辽代器物显然有继承关系，其时代可能早于辽代，被认为是辽代建国前契丹人的墓葬。这种文化的墓葬和遗址，过去曾有发现，主要分布在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及辽宁中部地区。通过这次发掘，将这种文化的墓葬和遗址鉴别出来，从而建立了关于契丹早期文化的初步概念。张柏忠综合各地出土资料，对契丹早期文化陶器的陶系及代表器物的演变规律进行分析研究，并探讨了契丹早期文化同鲜卑文化的关系，认为契丹早期文化是继承属于鲜卑文化的根舍文化发展而来的（《考古》2期）。

1984年公布的辽代墓葬资料，分属辽代早期和中晚期。辽宁锦州市张杠村辽墓系辽代早期墓，共有石构墓和砖室墓四座（《考古》11期），M1为砖室墓，主室平面呈圆形，内壁影作出仿木建筑式样，其斗栱结构为“把头绞项作”，顶作穹窿式。M2为石构墓，墓室方形，亦为穹窿顶。葬具用石棺，石棺形制仿木

建筑，顶为五脊重楼单檐庑殿式，其下有束腰式棺座。棺之前挡内外皮及棺座束腰四周皆有阴线刻图像：前挡外皮中心刻半掩之双门，门缝中一婢半露；门外左刻男卫士，右刻侍女；内皮刻契丹男侍一。棺座四周分刻狗狐、牛驼、狐兔、羊马及瑞兽图。此墓石棺及线刻画都是珍贵的辽代文物。随葬品中还有一批白釉瓷器和铁制工具，对研究辽代早期社会经济，尤其是手工业的发展水平很有价值。内蒙古昭乌达盟敖汉旗北三家的三座辽代砖室墓，约属辽代中期或中期以后（《考古》11期），M1和M3保存了较大面积的彩色壁画。M1壁画面积约40平方米，保存状况较好，内容也较丰富，侍卫、散乐、出行、宴饮各种生活画面俱备。辽墓中少见的手鼓上绘狮子、雄鸡的图像，还反映了契丹人的一种习俗。在绘画技法上，也是现知辽墓壁画中造诣较高的一例。M3壁画面积约20平方米，艺术水平不及M1，但内容的价值却可与M1相比拟。画中的驼车为迄今所知的少数几例之一，有"刘三取钱"题记的二人撕斗画面，为辽墓壁画所仅见。属于辽代中晚期的吉林通榆县团结屯辽墓，系一较大的砖室墓（《考古》9期），墓室平面为不规则的六边形。近墓门二边甚短，其余三边却相当长，这种形制的辽墓为数不多。随葬品中的飞鸟云纹缠枝葡萄镜，也为辽代文物中所少见。北京八宝山辽韩佚墓，是辽代汉臣韩延徽后裔的墓葬之一（《考古学报》3期）。此墓为仿木结构砖室墓，墓室彩绘壁画。随葬品中有较多白瓷器和青瓷器，并出土韩佚及其妻王氏墓志各一方。据研究，所出十三件白瓷器有定瓷也有辽瓷，而柳条纹白瓷钵或为景德镇窑的产品。九件青瓷器，非北方所产，显属越窑系，可能是余姚上林湖一带所制，它们似亦属于秘色青瓷，也许是吴越国给辽国的贡品。韩氏家族是辽金时期北方的强宗豪族，根据韩佚墓志考订出的辽金时期这个家族的世系，同齐心《金代韩汸墓志考》（《考古》8期）所得结论完全相符，显示了在辽金统治者"胡汉分治"政策下，汉族强宗豪族与少数民族统治者相互勾结的历史史实。

在新报道的零散辽代文物中，内蒙古宁城出土的浮雕鲤鱼莲花纹三彩瓷壶（《文物》3期）、辽宁北镇县前园子出土的铜质犁范（《考古》11期）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和科学价值。

1981年，内蒙古霍林河矿区金代界壕边堡遗址的发掘，在整个金代界壕考察史上还是第一次，取得了关于金代界壕边堡的

结构及戍兵生活的许多珍贵资料(《考古》2期)。霍林河矿区位于哲里木盟最北端，其地正是大兴安岭南行主脉之所在，系一范围广大的高山草原地带。金界壕的霍林河矿区段作东北、西南走向，全长12.5公里。界壕由堤墙和壕堑两部分组成，一般来说，山岗处壕较窄、墙较低，平原处壕较宽、墙较高，并筑有马面，正当山口处除壕宽墙高外，还增设附壕小堡，并以之与界壕内侧之边堡相呼应。解剖表明，壕堑底宽2.8—4.1、口宽6—8、深约3米，堤墙底宽5—7.5、上宽2.7—3、残高2.5—3.5米。堤墙外坡陡、内坡缓，挖壕土筑墙，墙坚硬而无夯打痕迹，平原山口处墙外砌护石。矿区内共发现边堡四座，大都选在山口处界壕内侧之靠近缓山、平坦避风、视野开阔、水源丰富的所在，距界壕约1公里左右，堡与堡之间间隔约5—10公里。边堡平面多方形，每边长200米左右，堡墙板筑，附建马面、角楼和护城壕，堡内尚有内城和一些房舍建筑。它和壕堑、堤墙一起构成了一个严密的防御体系。遗址中出土器物主要是陶、瓷、铁、石质日用生活器皿和铁质农具、工具和武器，还有动物骨骼、炼渣及建筑材料等，表明界壕戍卒除守边作战外，平日还要从事农业生产、畜牧、筑房，间或也以射猎为戏。堡内可能有简易的锻铁手工业作坊。从瓷器、货币看，边堡与内地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1975年，在黑龙江省绥滨县黑龙江右岸高力河入口处一个辽代墓群清理墓葬十四座(《考古与文物》2期)，这些墓全是土圹火葬墓，无椁也无棺，与黑水靺鞨葬制有一定的继承关系，而与绥滨金墓有明显的区别，在墓地的选择和采用火葬等方面又表现出自契丹葬俗的影响。鉴于绥滨地区唐代为黑水靺鞨活动区域，辽时为黑水靺鞨后裔之一的五国部女真的繁衍之地，墓葬所出陶器、带銙、铁器、石器又表现了辽中叶以后五国部女真人的文化特征，因而推定其为辽中叶以后五国部女真人即奥里米部人的墓葬。这一研究成果，填补了自黑水靺鞨至金代女真人间物质文化史的空白。以此为契机，人们正逐步把五国部女真人文化遗存从渤海文化及辽金文化中区别出来，并确认黑龙江的同江、抚远、爱辉及苏联犹太自治州都有五国部女真的文化遗存，说明五国部女真人的分布地域及活动范围已达到黑龙江中游的广大地区。

山西长治市故漳村金墓，是一座金大定二年仿木结构的二次迁葬砖墓，主室内采用金墓常见

的整体粉饰的彩绘装饰。南壁绘门吏，其余三壁绘孝悌忠义故事。此墓仿木建筑开间大，所用普柏枋较厚，显然是金代盛行的移柱造和减柱造在墓葬建筑上的反映（《考古》8期）。山东滕县县城金苏珝墓，出土纪铭石一方，上有“大金承安四年”纪年。墓内所出无角双龙纹铜镜，纹样新颖，造型生动，堪称金代铜镜的佳作。死者使用原汉墓石椁，提供了金代葬俗方面的新资料（《考古》4期）。

此外，甘肃武威西郊发现西夏晚期砖室墓一座，出土白釉及黑釉瓷器三件，木板画一块，上绘男女立像各一。未见人骨，或为舍利塔墓（《考古与文物》4期）。

这一年报道了一批辽金官印，它们分别出于辽宁（《文物》9期）、吉林（《考古》11期）、河北（《文物》5期，9期）、河南(《考古与文物》1期，《中原文物》1期、4期)、陕西（《考古与文物》1期》)、山东（《考古》4期），总计约三十余枚。其中河北出土的金印中，还有两枚农民起义军的印章（《文物》9期）。

辽宁辽阳市调查发现的金《通慧圆明大师塔铭》，还是一件记载金世宗之母李氏贞懿皇后生平事迹的石刻资料（《考古》2期）。

1984年新报道的元代墓葬，有北京市密云县太子务的一座砖室壁画墓（《文物》6期）。该墓墓室下方上圆，穹窿顶，四壁上部影作普柏枋上绘斗栱，其下绘一周帷幕走水。壁面主要部分，北壁绘三开屏风一架，正中画心墨绘梅花竹石图，西壁亦绘三开屏风一架，东壁绘一架单扇屏风，画心绘人物。墓门正上方绘横匾，墨书“乐安之堂”四字。壁画内容表现了元代早期贵族室内陈设的大致情况，梅竹等题材作为单幅画的主题，这是一个时间较早的实例。

据报道，云南禄丰县石龙镇后山有火葬墓约四百座（《文物》8期），墓葬皆无封土，墓坑有圆形或方形土坑、方形砖石坑三种。其火葬方式是：将死者尸体焚化，当骨骼呈灰白色时，选取头骨及大块骨骼，用朱砂或金粉于其上写梵文经咒，顺序放入陶瓷罐内安葬。陶瓷罐造型、装饰都很精致。有的墓中放置红砂石质墓志。这种墓志已出土十余块，分别刻有“泰定”、“至正”、“宣光”等年号。研究认为，他们应是彝族的墓葬，时代约当元初至明初。

1984年报道的一处元代窖藏，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县哈金沟村（《文物》5期），出土白釉、

酱釉、青釉及影青瓷器、铁锈花瓷器、钧窑瓷器、龙泉窑瓷器、青花瓷器共八十六件。部分瓷器具有明显的地方特点，应属赤峰县缸瓦窑系统。征集品中，江西的两件元代釉里红玉壶春瓶（《文物》10期）和一件元代影青雕塑戏台形瓷枕（《文物》8期），都是可贵的元代瓷器工艺品。

新报道的元代铜印主要有湖北大悟（《考古》11期）、广东潮安（《文物》8期）、河北徐水、保定（《文物》9期）出土的官印，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出土的“祥州站印”（同上）。其中广东潮安出土的八思巴篆文“漳州路军民都总管印”，有人以为应释译为“漳州路总管府治中印”，并指出，目前所见八思巴文“治中”印，仅此一方，十分珍贵（《文物》11期）。此外，江西九江市区还出土至元三十年中书礼部造八思巴文篆书“江西等处行中书省烧钞库印”一方（《文物》10期），它和五十年代杭州所出元“昏烂钞印”一样，是有关货币管理制度的重要实物。

见于报道的其他元代零散文物，还有湖南慈利县的元代纪年铜鑪（《文物》5期）、山东沂水县至元五年铜权（《考古》3期）、西安的达摩渡海故事镜（《考古与文物》4期）等。

1981年文物考古工作者及科技人员在研究郑州市博物馆藏十七件铜模及坩埚的同时，在铜模出土地河南荥阳楚村进行调查和试掘，证明楚村为一处元代铸造作坊遗址，其地所出铜模无疑为元代物（《中原文物》1期）。鉴于犁镜模上有阴文编号“二”，所以推断，当时此类作坊可能由地方官统一管辖。研究者认为，铜模是在铁模、泥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用以铸造犁镜、犁铧、耧铧、莲花饰等各种复杂器形之铜模，兼具铁模、泥模的优点，它的使用，既可使产品规格化，又能简化制范工艺。同时由于其强度大，又适于制作细密花纹、锋利刃口，所以更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改善产品质量。研究者指出，铜模的使用，在我国铸造工艺史上是一件了不起的进步。

这里，还应提出的是，四川重庆江北明玉珍墓出土的《玄宫之碑》（《考古与文物》4期），记载了明玉珍的生平事迹，无疑是关于元末农民起义的一件弥足珍贵的文物。

四 明清时期

明祖陵，位于江苏省洪泽湖西畔，康熙十七年没于水。1963年以后水退，祖陵遗址才得以重见天日。1984年《考古与文物》2期发表的《明祖陵述略》一文，

对祖陵的平面布局及陵前石刻作了全面介绍。作者将祖陵与安徽凤阳皇陵、南京孝陵、北京十三陵作了对比研究之后指出，明代山陵制度，是在唐宋陵墓制度的基础上，经过明初的一系列改革才最后形成的。这种改革从皇陵开始，中经祖陵、孝陵而逐步完成。

1984年报道的江西南昌和平门外明昭勇将军戴贤夫妇墓(《考古》10期)，是一座弘治年间的墓葬，出土一批金质装饰品、金银钱币，还出有沉香木镂雕包金腰带及包金玉带各一副。沉香木镂雕包金腰带，表现了明代木雕工艺的高度水平，是一件难得的古代手工艺品。墓志所载成化年间两广、南赣和汀州地区农民起义的事实，也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广东南雄县麦家巷一座小型明墓（《考古》11期），顶部只有一层砖拱，拱上规则地排列着十多行青花瓷碗，碗扣置，碗外堆以石灰砂浆形成馒头状坟堆。所用瓷碗造型一致，碗壁拍印一圈“富”字，表现了一种颇有意思的葬俗。

1982年吉林通榆县兴隆山清理一座清代公主墓（《文物》11期）。该墓地上有陵园。墓室平面长方形，顶作圆锥形。墓内随葬品非常丰富，仅精美金、银饰品即有数十件之多，此外，还有金元宝、银铤、铜器、玉器、宝石、珍珠等等。据考证，这位下嫁外藩的公主，可能是固伦纯禧公主、固伦和敬公主和和硕淑慎公主等三公主中的一位。下葬时间，大约在乾隆、嘉庆年间。

这一年报道的其他明清文物中，青海乐都文化局旧藏明朝廷赐予乐都喇嘛教寺院瞿昙寺的两枚印章——宣德二年特赐主持修寺喇嘛绰失吉象印及成化年间所赐“广慧悟法净觉妙善翊国衍教灌顶戒定西天佛子大国师印”（《文物》9期），湖南澧县征集品南明唐王朱聿键藩封给朱敬一的“华阳王镇抚司之印”（《文物》11期），湖南永顺出土之清土司官印“永顺等处军民宣慰使司印”（《文物》7期），江西南昌发现的窖藏景德镇民间瓷器（《文物》8期），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瓜地生产队发现的南明窖藏铜器（《文物》2期），以及陕西黄龙县征集的李自成大顺国“永昌通宝”（《考古与文物》5期），都较有价值。

最后，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在新发表的跨越多个朝代的研究文章中，如杨泓《中国古代马具的发展和对外影响》（《文物》9期），邢捷、张秉午《古文物纹饰中龙的演变与断代初探》（《文物》1期），对魏晋南北朝及以后的有关文物都作了比较深入的探

讨和论述。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4期）更是涉及到了过去专家们较少深入研究的课题。

五 魏晋及其以后的佛教遗迹

北朝宗教遗迹和遗物的新资料种类甚多，有新发现的石窟、塔铭、造像、碑刻等等。河南巩县石窟寺1980年第三次修葺工程中发现北魏、东魏、西魏、北齐造像龛十一个及唐刻残《重建净土寺碑》一通，从残存碑文知道，该石窟寺北周建德六年被毁，直到唐武则天天授元年才得以重新修复（《考古与文物》4期）。甘肃省对泾川王母宫石窟（又称大佛洞）作了调查（《考古》7期）。这是一座窟室平面作方形的中心塔柱窟，窟壁分三层布置佛龛和壁画，其中心塔柱，下段为方形，四面各开一龛，龛内分别雕刻释迦多宝对坐、一佛二菩萨或一佛像；上段呈八角形，每面一龛，龛内雕刻一佛二菩萨；中心柱四角各雕一象，象身负塔。据认为，其开凿年代约在五世纪末至六世纪初（孝文帝太和末年至宣武帝永平年间），而以六世纪初的可能性更大。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新1窟，是1973年新发现的洞窟，这座中心塔柱窟，由前室、主室、后室三部分组成，窟内塑像虽损坏较多，但布局清楚，并有相当数量的壁画幸存。朱英荣以为新1窟的形制、壁画、塑像表现了克孜尔石窟早期洞窟艺术的典型特征。许宛音则认为新1窟属克孜尔石窟中心塔柱窟四个发展阶段的第三阶段，但两者都推断，其开凿时间大约在五—六世纪，相当于中原南北朝时期（《文物》12期）。许宛音还认为，新1窟是龟兹佛教史上比较开放、比较活跃、宗教思想有所变化时期的产物，它对于探索这一历史时期龟兹的佛教思想以及大乘教初期佛教艺术在龟兹的表现形式，都给予了有益的启示。吴焯还著文论证了克孜尔石窟壁画所表现的龟兹石窟艺术与中原绘画传统的密切关系（《文物》12期）。《中原文物》1期的署名文章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响堂山石窟。

在河南安阳县城西南宝山东麓，原有东魏名刹宝山寺，寺院已毁，寺址西侧尚存方形单层石造墓塔两座，二者造型大体相同。调查发现，在西塔门楣上镌刻着“宝山寺大论师道凭法师烧身塔”楷书塔铭，塔门东侧刻有“大齐河清二年三月十日”楷书题记（《文物》9期），它们对了解石塔的性质、时代以及著名高僧道凭在邺城一带的活动都有重要作用。

河南浚县城东大伓山东侧有

摩崖造像大佛一躯，对其成像年代，过去有两种看法，均以为系唐代造像。近年有人重新调查此像，据其造像特征及碑刻遗文考订其为后赵石勒时期所雕凿，并指出，如论证无误，则除连云港孔望山以外，浚县大佛是比敦煌、云岗、龙门现存任何一尊造像更早的雕刻艺术珍品（《考古与文物》2期）。

新发现的佛教造像，以山东博兴县出土者数量最大。仅1983年贾德村出土之一批北魏—隋代铜造像就有一百零一件（内有老子像一件），有铭文者四十四件，有明确纪年者三十九件（《文物》5期）；1981年还在该县河东村发现北魏—隋代铜造像五件（同上），两起共计一百零六件。此外，山西武乡县党城村出土北朝铜佛像七件，有纪年者六件（同上）。宁夏固原县新集出土北朝佛教造像八件，其中也有一件铜造像（《考古与文物》6期）。博兴县图书馆根据贾德村出土铜造像的造型、服饰、艺术风格、铸造工艺的变化，将其地所出造像分作三期：第一期，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年至太和二十一年；第二期，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至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第三期，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至隋文帝仁寿二年（《文物》5期）。丁明夷在《谈山东博兴出土的铜佛造像》（同上）一文中，论述了山东博兴大批铜佛造像产生的历史条件，并对这批铜佛造像作了类型学的研究，分北魏永平年间以前、以后、东魏、北齐—隋四个阶段，分析了不同时期造像题材、特征及铸造工艺的特点与演变。这方面的综合研究工作以前作得不多，他们的初步研究成果，对较大范围内佛教铜造像的编年研究将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1984年还报道了洛阳古代艺术馆藏北魏、北齐造像碑八通（同上）；延安地区洛川县、黄陵县发现的北朝造像碑十二通（《考古与文物》5期）；陕西药王山北朝佛道混合造像碑六通（同上），为研究我国宗教史提供了一批实物资料。

新报道隋唐宗教遗迹和遗物，有巩县石窟寺新发现的唐代造像龛（三十个）及唐《重建净土寺碑》残件（《考古与文物》4期），陕西陇县和千阳县发现的隋唐鎏金铜造像和青铜造像。陇县鎏金铜造像系农民耕地发现，共有天王、菩萨造像三件（《考古与文物》3期）；而千阳铜造像出于窖藏，有佛、菩萨等鎏金造像九十六件、青铜造像三件，一件青铜像上并有隋开皇五年题记，是唐代铜造像数量最大的一次发现（《考古与文物》5期）。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公布馆藏有

纪年隋唐造像碑四通（《文物》5期）。陕西省博物馆还发表了西安西郊唐墓所出中唐前后之手写经咒绢画（《文物》7期）。这件珍贵经咒绢画呈方形，中心部分绘三眼八臂菩萨与合什跪拜的供养人，四周每面墨书古梵文经咒十三行，边缘部分绘各种法器。据鉴定绢画内容属密宗系统。此件原装在一鎏金铜臂钏内戴于死者臂上，这表明它正是与语密这一密宗布教形式有关的口诵经咒。它的出土说明当时密宗信徒随身佩戴此物已成风气。这一年报道的宗教遗物，还有旧出于敦煌莫高窟的五代供养八臂九面观音像立幅绢画（同上）、山西临猗已毁宋代塔基出土的两幅五代绢画（同上）、西安市出土的唐礼佛奏乐图石刻佛座（《文物》10期）、陕西礼泉县赵村镇鼓形经幢（《考古与文物》2期），以及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反映道教内容的两件邛窑瓷碗（《文物》10期）等。温玉成、杨顺兴《读〈风穴七祖千峰禅院记〉碑后》一文（《中原文物》1期）认为，河南临汝风穴寺五代后汉乾祐三年《风穴七祖千峰禅院记》碑对研究中国佛教史颇有价值：该碑提出了风穴贞禅师为天台宗七祖这一与传统看法不同的观点；澄清了临济宗四世匡沼禅师在佛教史籍中被写作延沼的讹误，丰富了人们对天台宗与禅宗禅师相转化问题的认识。文章还表列出了订正后的天台宗四祖至八祖间的传承关系。

对宗教遗迹、遗物中一些有争论的问题，这一年也有一些新的看法发表。陕西省博物馆藏原华清宫朝元阁老君殿的白石老君像，过去或认为系唐代著名雕塑家元伽儿所作，或认为是唐玄宗请名工雕刻。雕成时间为盛唐开元年间。朱捷元、单晔认为，此像当系天宝七年之前或即天宝四年至七年间幽州佚名雕刻艺术家创作，而由安禄山进贡给唐玄宗的（《考古与文物》4期）。关于龙门石窟大卢舍那像龛的创凿年代、为谁作功德以及与武则天的关系等问题，温玉成认为，从前学者将开凿工程的起手年代定为咸亨三年，显然混淆了开工年代与武则天助资年代。他以为近年有人将开凿年代定在龙朔二年之前，比较可信。他推测，大卢舍那龛系唐高宗为太宗追福而建。至于卢舍那面像的造型特征，他同意王子云、温廷宽早年发表的意见，而否定有人所谓“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武则天形象的写照，或者说就是武则天的模拟像”的意见。对大卢舍那像龛崖壁间穿插的四十八身立佛像，他认为，此即唐内侍省高力士、杨思勗等一百六十人为唐玄宗造的阿弥陀

佛四十八事（《中原文物》2期）。

靳之林《对〈延安地区的石窟寺〉一文的订正》（《文物》12期），从澄清具体资料出发，对《延安地区的石窟寺》（《文物》1982年10期）在一些石窟之开凿年代、开凿工程主持者等方面论述上的失实之处，给予了必要的订正。关于山东长清灵岩寺罗汉像的塑造年代，在近年罗汉像修复工程中产生了新的看法，认为从像体内所出铜镜、铜钱看，有关罗汉像塑于宋嘉祐前后。作为西第十一尊罗汉胎骨的铁罗汉，当系纪念寺内某高僧（有可能是开山祖法定）所铸；铁罗汉铸于熙宁三年，其外包之泥塑罗汉像制作的时间当更晚（《文物》3期）。

科 技 考 古

孙 机

1984年，科技考古方面的研究仍然是硕果累累。

一 天文学

夏鼐发表《所谓玉璿玑不会是天文仪器》一文（《考古学报》4期），作者自谓这篇论文“为中国天文仪器史解决了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原来，自从清吴大澂将多齿三牙璧误指为《尚书·舜典》中的“璿玑”以来，经过劳佛尔和密舍尔等人的附和与引申，愈说愈玄妙。一件本来与天文学并无关系的玉璧，却被认定为“环极星的观测板”，成为天文仪器史上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此文根据发掘出土和调查采集的实物绘出牙璧谱系图，排列出其产生和演变的脉络，这就有力地证明这种玉器仅仅是装饰品，而不是天文仪器，更不能叫“璿玑”。对于被名家搞错、并造成较大影响的这类问题来说，匡谬正误、澄清事实，确乎是科技考古以至其他方面的研究中的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在我国天文仪器史上，最应受到注意的仪器其实是圭表。从上古到清代，新历的验证或改历的依据，往往都要通过对表影的观测。因此，中国古天文学或被称为靠测影起家。圭表测影技术的几个关键性的改革步骤都发生在元代，所以元代的圭表更为研

究者所关注。伊世同《元代圭表复原探索》（《自然科学史研究》2期），认为现存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大型铜制圭表的铜圭部件，就是元郭守敬监造的原件。这比同一作者于1978年提出的，认为铜圭是明正统年间依元代原式仿铸的旧说又前进了一大步。鉴于元代的圭表经郭守敬等改进以后，测影的精度大为提高，其成就可以说是达到了人类有史以来用圭表测影的峰值。因此，如果这一判断能够确定下来的话，意义之重大自不待言。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还提出了复原元代圭表、景符、阙儿等仪器及登封测影台原貌的具体设想。

二 度量衡

安金槐《商代的粮食量器》（《农业考古》2期），认为商代的陶大口尊既不能作炊器，又不能作饮食器，即便作为盛储器亦不方便。而其口沿上或口沿内往往刻有记数的铭文，与东周陶量的作法相同。所以作者推测它们是量谷物用的量器。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新说。李学勤《谈文水出土的错银铭铜壶》（《文物》6期），指出山西文水上贤村秦墓出土铜壶铭文中的“觳”，是战国时燕国的容量单位，相当一斗二升。觳下一级的容量单位是它的十分之一，相当于《小尔雅》中的溢。铭文中表示此单位的字黄盛璋隶定为絠（《文物》10期），但尚不能确认。对此器及其他标明容量单位为觳的燕器的测算结果，可知一觳约合1760—2000毫升。燕国量制过去所知甚少，通过对觳、絠系统的研究，或可逐渐得到廓清。

丘光明《我国古代权衡器简论》（《文物》10期），着重讨论了我国古代衡器由天平到杆秤的演变过程。作者根据对大量铜权实测重量的分析结果，发现秦、西汉和新莽时期的权重多为一斤的整数倍，误差均在允许范围之内，认为仍应作砝码使用；而东汉时期的权重则不统一，误差大大超过一般允许的范围，认为是当时砝码已变化为秤砣的重要标志，从而证明东汉时杆秤的使用已较普遍。但作者举出的“迄今所见最早的杆秤形象”，是“南朝画家张僧繇所绘执秤图”。然而此图系摹自《五星廿八宿真形图》，其底本的绘制者一般认为是唐代的梁令瓒。从服饰等方面的特点看来，这卷画也早不过唐代。所以它似乎比莫高窟254窟北魏壁画中的执秤图还要晚些。

三 农业

关于农耕和作物起源的问题，本年中发表了一些有份量的

见解。张忠培《原始农业考古的几个问题》（《农业考古》2期）认为，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存在着五个平行的考古文化系列群，它们的源头即大溪文化、河姆渡文化、老官台文化、北辛文化和磁山—裴李岗文化。要解决种植农耕在我国的起源，必须沿着这五个源头向前探索。童恩正《略论东南亚及中国南部农业起源的若干问题》（《农业考古》2期），则认为就水稻而言，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应为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可能在杭州湾一带，但更有可能是在纬度较南的云南和两广地区。认为中国境内或邻近地区有若干栽培稻起源地的说法，是与客观规律不相符合的。李昆声《亚洲稻作文化的起源》（《社会科学战线》4期）则认为，亚洲栽培稻起源于从中国浙江、福建、江西、台湾、两广、云南到中南半岛越南北部、缅甸北部、老挝北部、印度阿萨姆这一广阔的弧形地带。这里的原始居民是古代百越的先民，栽培水稻是由他们中的某一部落首先开始的。而这一地区中的中国浙江余姚河姆渡和桐乡罗家角，是已知的世界上最早的稻作遗址。但作者又认为，就云南而言，根据同功酶分析的结果，云南现代栽培稻的祖先很可能就是云南的普遍野生稻。而云南的植物资源丰富，加以地理、环境、气候等特殊条件，形成了一个作物变异的中心。因而栽培稻起源于云南的可能性很大。西北师范学院植物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出土的稷与大麻》（《考古》7期），报道了对这里出土的两种作物进行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的结果，证明这里出的稷即禾本科稷属的稷（Panicum miliaccum L.），与现代西北地区种植者无明显差异。这里出的大麻不仅与本地现代种植者相似，而且是已发现之最早的标本，证明大麻在我国的栽培历史已近5000年，黄河流域应是它的起源地和栽培中心之一。卫斯《试探我国高粱栽培的起源》（《中国农史》2期），根据作者发掘山西平陆西延村与盘南村汉墓时，在陶罐和陶仓中发现的高粱，以之与以前发表的考古报告中所提到的高粱相比较，认为大部分报告中的结论都较可信。从而推测我国在新石器时代已知栽培这种作物，我国有可能是高粱的原产地之一。

关于古农具，覃彩銮《从石铲遗存看桂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农业》（《农业考古》2期），介绍了广西桂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各遗址中大量出土的石铲，指出其装柄方式与畲相似，是当时普遍采用的有多种用

途的农具。因此当时这里的农业已由刀耕火种过渡到锄耕阶段。叶玉奇《江苏吴县出土的石犁》（《农业考古》1期），报道了在吴县光福镇可能属于良渚文化的地层中出土的一批石犁。其形体较大，平面近等腰三角形。与以前发现的这类标本不同的是，这里的犁面上残存着装柄的印痕和使用中留下的磨擦线痕，从而可以较准确地推知它是在松软的土地上进行浅耕的农具。而当进入青铜时代后，青铜是否用于铸农具，一直是研究者关心的问题。卢茂村《试谈安徽出土的青铜农具》（《农业考古》1期），介绍了安徽省历年出土的青铜农具四十件，提供了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的一些依据。进入铁器时代后，铁农具的广泛使用对于社会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后德俊《楚国铁器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李京华《河南古代铁农具（一）》(均载《农业考古》2期)，对这两个地区的早期铁农具作了比较集中的介绍和讨论。用于粮食加工的农具，在尤振尧等《泗洪重岗汉代农业画像石刻研究》（《农业考古》2期）中，发表了出现在这组画像石中的带磨拐和撑架的磨磨。使用这种磨时，由一人手执磨拐在原地前后推动即可，不必绕磨旋行，较为省力。以前只在南京邓府山1号晋墓所出明器、新疆吐鲁番十六国时代的墓葬壁画等材料中看到过这种磨，以为它要到晋代才有。泗洪画像石的出土，则可将它的渊源追溯到汉代。

关于家畜饲养，覃圣敏《从桂林甑皮岩猪骨看家猪的起源》（《农业考古》2期），根据这里出土的猪骨的鉴定结果：其中百分之八十五的死亡年龄都在二岁以下这一现象，再次强调指出这些猪是人类饲养和宰杀的家猪。猪骨出于此遗址的早期遗存中，其年代当在9000年以上。如果此鉴定可靠，则这里的猪骨比河姆渡、磁山等地所出者更早，是我国已知之最早的家猪遗骸。刘安国《湖北天门县石家河遗址出土的泥塑小动物》、许明纲《从出土文物看大连地区汉代以前养猪业》（均载《农业考古》1期），报道了两地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陶家猪。郑乃武《小谈齐家文化的农业遗存》（《农业考古》2期），认为甘肃永靖大何庄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羊似为绵羊。天门石家河遗址也出陶羊，尾较肥大，似亦为绵羊。它们都可能代表人工饲养的家羊。

四 纺织

本年中出版了陈维稷主编的《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科学出版社），这是我国

第一部论述自史前以迄清末的纺织技术的专史。近年来，由于古代织物多次大批出土，对于古代纺织技术的认识不断深入，这本书就是一次科学的总结。书中对各个时期的纺织原料、织染工艺、织物品种等，都作了系统的阐述。特别是织机，此书将从原始腰机、鲁机、斜织机、多综多蹑纹织机直到束综提花机的发展过程及工艺特点讲解得比较清楚，并附有织机结构和上机工艺示意图，使读者可以得到一个较完整的概念。书中提到的各类实物标本，多附图说明，称得上是一部资料丰富、论点清晰、图文并茂的著作。唯插图中偶有失检之处，如图Ⅲ4—2—1的“古代纺车”拓片，实为现代制作的旅游纪念品。图Ⅲ4—4—2的“三锭脚踏纺车”，系采自南宋蔡骃《新编古列女传》，该书插图与传世宋摹顾恺之《列女传图》颇不相同，应为南宋时重新绘制者，所以不能据以“证实晋代之前，脚踏纺车已发展到三锭”。图Ⅲ6—2—5～6的“染器”，实为盛调味品的食器，《吕氏春秋·当务篇》高诱注：“染，豉酱也。”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汉代染器，有“清河食官”铭文，更可证明其用途与织物染色无关。又此书所附图版，均用彩色印刷，颜色很鲜明，但有的地方似嫌失真。如图版25的“东汉蜡染花布”，本是蓝地、露棉布本色花纹，却印成深褐色地、棕红色花纹，与实物颇异其趣了。

关于自南北朝至唐代的纺织技术的论述，有武敏的《吐鲁番出土蜀锦的研究》（《文物》6期）。此文对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出土的织锦，选取标本，逐件分析。自织物的组织、经纬的密度、色彩的搭配以至图案的类型，均作了细致的描述。此文认为南北朝织锦仍沿袭汉代经锦的组织法。至于唐锦，此文所举的十二例，都鉴定为经线显花。特别是流入日本的著名标本“花树对鹿”锦，长期以来定为纬锦。在此文中也被认为是经线显花，排列比1:3，夹纬经二重，$^2/_1$经面斜纹织物。因此作者指出，唐锦中的斜纹织物（文中称为“Ⅱ型结构”）并非摹做外国，而是在我国平纹织物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是一个应予重视的论点。果如其说，则唐锦也是以经锦为主，而并不是以纬锦为主了，从而势将引起对唐代丝织技术的重新估价。此文后一部分认为吐鲁番出土的标本概属蜀锦。可是出土物本身并未提供直接证据。作者主要是根据东汉末以迄唐初，中原地区战乱频仍，成都地区则相对安定立论，认为织锦在此期间为蜀地所独有。但

耕织农桑是我国古代最基本的生产活动，黄河流域及长江中下游此时期虽屡遭战祸，但兵燹过后，生产当即陆续恢复。在这样广大的地区内，丝织业不可能长期陷于停顿。三国时蜀锦“称妙”，然而对提花机作出重要改进的马钧却是魏人。十六国时，《邺中记》所记邺锦名目繁多。《颜氏家训》赞誉南北朝末期“河北妇人”的“锦绣罗绮之工”。在《新唐书·地理志》中所记产丝织物的地区，则以河南道、河北道及江南道各州为最盛。所以，这些标本中虽可能有蜀锦，但如果认为它们全数是蜀锦，那就必须排除在此期间我国其他地区生产作为商品的锦，以及这些地区与新疆之间存在着交通往来这两种可能性。否则此说恐难以成为定论。

关于宋代的纺织技术的论述，有陈国安的《浅谈衡阳县何家皂北宋墓纺织品》（《文物》12期）。此文介绍了这里出土的二百余件（块）纺织品。其种类包括绫、罗、绢、纱、麻布等，花纹式样繁多。这是继近年福州黄昇墓、金坛周瑀墓之后，宋代纺织品的又一次重大发现。大庆市则发现了宋画《蚕织图》。林桂英等《宋〈蚕织图〉卷初探》（《文物》10期），认为此卷是宋高宗时翰林院依据楼琇所进《耕织图》摹出的《织图》。然而楼钥《攻媿集》所记楼璹原作的格式是：“织，自浴蚕以至剪帛，凡二十四事。事为之图，系五言诗一章。”与此图并不相同。此图中不止二十四事，并无五言诗，且不以“剪帛”作结。以之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所藏元程棨摹楼璹之本相较，亦有不少出入。恐是当时根据同一母题所作的另一卷画，不必目为楼图的摹本。但卷中“挽花”节出现的提花机，却是纺织技术史上的珍贵资料。宋代绘画中出现的织机很少。山西高平开化寺壁画中的织机形制简单。有花楼的提花机除了南京博物院所藏宋画《耕织图》上的一例外，此为第二例，所以弥足重视。

关于明清时代的纺织技术的论述，有区秋明等的《明代丝绸生产技术发展初探》（《浙江丝绸工学院学报》2期），文中刊出了浙江图书馆所藏明正统佛藏封面所用绫罗的组织结构图。一块深蓝色地的织金绫，是以$^{2}/_{1}$三枚经面斜纹为地组织，以$^{1}/_{5}$六枚纬面斜纹起花，使织物表面在深蓝色经面斜纹组织上显出同色的纬浮花纹。在此基础上再用扁金线织出金色团花，效果端庄富丽。陈娟娟的《明清宋锦》（《故宫博物院院刊》4期），分析了故宫所藏明清时织造的宋

式锦。作者指出，这类锦的织造技术实际上和宋代已不相同。它采用地经与纹经分开的双经轴装置，由地经织经斜纹或平纹的地组织，以"特经"连接织物表面显花的纹纬和不起花沉于背面的纹纬。起花部分特经与纹纬交织组成平纹或纬斜纹。编织时长跑梭和分段换彩的短跑梭或特跑梭配合。特别是其中的细锦，多以短跑梭织主体花，以长跑梭织几何地纹。短跑梭的数量多，分段换色的技法灵活，有时纬丝色彩可用到二十多种轮迴换织，但不增加厚度，不产生色条感，技艺极为高超。

五 矿冶

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早期铜器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社会使用金属的开始，是文化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因而一直为研究者所关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首次发现铜器》一文（《考古》12期），报道了在陶寺3296号墓中发现的一件用纯度较高的红铜铸造的铃形器。此墓虽然没有地层关系和随葬陶器，但根据它在墓地中的排列和所出人骨的^{14}C年代（经树轮校正和同位素分馏效应校正，为公元前2085年左右），可以证实这是一座公元前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墓葬。所出铜铃形器从器形上看也属于中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的遗物。这就在我国已知之郑州牛砦、临汝煤山、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等地出土的龙山文化遗物中，以及西北地区出土的齐家文化遗物中所发现的有关用铜的资料之外，又增加了一项重要的标本。

铸造铜器是我国商周时代最重要的手工业。关于周代的铸造工艺，有叶万松的《我国西周前期青铜铸造工艺之研究》（《考古》7期），作者根据洛阳北窑村发现的西周前期铸造遗址所出陶范、熔炉炉壁等遗物，对当时的制范工艺和熔铜设备进行了探讨。作者着重讨论了采用分铸法和多片合范法的泥型铸造，认为这是我国古代青铜铸造技术的重要特征。作者并绘出了西周早期大型竖式熔炉的复原图，它由圜底钵形的炉底，上接数层炉圈组成。炉壁是垂直的，在下半部设四个鼓风口，至少用四橐鼓风。熔炉内径为1米左右，复原图上通高约3.5米。根据对炉壁耐火材料熔点的测定，炉温达1200—1250°C，完全可以满足熔铸青铜的要求。目前，商代的大型鼓风竖炉尚未能复原，因此本文所提供的西周熔炉的情况，在冶金史上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由

于其规模宏大、遗存丰富，集中反映了我国早期铜矿开采和冶炼的水平，所以素为人所瞩目，对它的研究工作一直在继续进行。周保权《试论铜绿山古铜矿的生产水平》（《江汉考古》4期）认为，虽然据矿山地质勘探和考古调查所掌握的资料，整个矿区还有大量古矿冶遗址未发掘。但清理过的井巷已有四百多个，采空区已达100万立方米以上，当时掘进的深度已达60余米。其井架的支护技术已有相当水平，在发掘中很少见到井巷倒塌现象。早期的支架用榫接方式。晚期不但已改用搭接，支护构件已较规范化，尺寸基本一致；而且是在地面上统一制作好再运到井下使用的。根据古矿区发现的炼炉和炉渣堆积估算，其累计产铜量不下8—10万吨。而就目前的认识看来，这里是一个生产粗铜的原料基地，所产之铜铸锭外运，并不在当地铸造器物。卢本珊等《铜绿山春秋早期炼铜技术续探》（《自然科学史研究》2期），则研究了铜绿山的炼铜炉，鉴定了筑炉材料的化学成分和岩相，测定了它们的耐火温度，并分析了其配制状况。证明这时的竖炉在材料和结构上已具备耐高温、有较高的高温耐压强度、耐液态金属和液态渣的侵蚀、导热性小等优点。在炼铜工艺方面，当时采用的原料已不仅是孔雀石，赤铜矿、辉铜矿、斑铜矿等均已入炉冶炼。而且当时是将这几种矿石配合使用的，说明冶铜工人已掌握了配渣技术。又由于这时采用的是还原熔炼法，氧化矿一次熔炼，直接得到粗铜。现代要求粗铜的含铜量为百分之九十二至九十五，铜绿山粗铜的含铜量已达百分之九十二点三二至九十三点三九；从这个数字亦可见其技术水平之一斑。

为了满足使用的需要，我国古代有些青铜器在铸造过程中曾经淬火，这是田长浒根据对铜镜样品的分析而察知的（《中国古代青铜镜铸造技术的分析研究》，《成都科技大学学报》3期）。作者指出，虽然我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有铜镜，但对商代铜镜的分析结果，知此时的铜镜仍以铸态组织为主。可是秦汉时的铜镜就有了（$\alpha+\gamma$）或（$\alpha+\beta$）的二相共析体，还发现有针状的β'马氏体组织，其布氏硬度一般在300以上，说明铸镜时经过淬火处理。这样，再加以研磨和抛光，才能使铜镜表面平滑光亮，“须眉微毫可得而察”。此外，我国古代对青铜器的表面处理技术也有卓越的成就。始皇陵兵马俑坑与满城西汉墓出土的无锈青铜镞，都曾发现其个别标

本表层含铬，但由于未完全排除铬来自埋藏环境的可能性，所以未能最后确定这是不是当时有意识地进行的钝化处理。田长浒在《中国古代青铜兵器铸造技术发展的分析研究》（《成都科技大学学报》1期）中，报道了对几件不同来源的、具有深绿色覆盖层的铜剑所作的能谱分析和X线分析的结果。据能谱分析，证明标本表层有Cr（KαKβ）锋，内层没有这个Cr锋线。通过X线衍射分析，判明表层薄膜中含的是三价铬化物Cr_2O_3。说明这类铸件是经过铬盐处理的。这对于进一步探讨上述问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当然，如能采用经科学发掘、埋藏环境与时代断限均较明确的标本进行分析，则得出的结果将会更具有说服力。

关于铁器的冶铸。上述李京华《河南古代铁农具》一文中，发表了大量战国至南北朝时代的铁农具的金相分析结果。这是自1980年以来，对河南省出土铁器进行金相普查的收获。作者指出，早在战国早期本地区已出现铸铁脱碳技术，至汉代基本得到规范化和普及化，并且又有新的提高。而到了中世纪时，我国出现了若干著名的特大型铁铸件，本年中考察了河北沧县五代铁狮与湖北当阳宋代铁塔的铸造工艺（吴坤仪等《沧州铁狮的铸造工艺》，孙淑云《当阳铁塔铸造工艺的考察》，《文物》6期）。具有复杂外形的铁狮是用五百块外范拼合，用几十吨铁水，以明浇式与顶铸式结合的方式浇铸的。铁塔则是以合范法浇铸出分段构件后，再逐层叠搭而成。两者的材质都是生铁，但铁狮是灰口铁，铁塔则是麻口铁。

关于炼钢技术的研究，本年中也有新的成果。韩汝玢等《中国古代的百炼钢》（《自然科学史研究》4期），发表了1978年徐州出土的东汉建初二年（77年）“五十湅”钢剑的金相鉴定结果。在剑身断面上观察到高低碳层相间的分层现象，数目近六十层。这是继1975年在苍山出土的永初六年（112年）“卅湅”钢刀的断面上，观察到其夹杂物的分层近三十层之后，又一次看到汉代锻造的钢铁刀剑的分层数，与其铭文中的湅数基本一致的现象。作者认为：湅数“可能是指叠打后的层数”；“反复地加热锻打，会使钢的组织致密，成分均匀，夹杂物减少、细化，从而能显著提高钢的质量。”由于国内已出土的记明湅数的此类标本极稀少，所以这两个例子所占的百分比已经很大，其鉴定结果应带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又由于湅字的本义指丝帛的濯治，与冶金无关，所以铭文中的湅是一个

借字；在这里应是"潋"字之省。《说文·支部》："潋，辟潋铁也。"张协《七命》："万辟千灌"，李善注："辟谓叠之"。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中说：潋是"取精铁折叠锻之，愈锻愈善。"正与作者的看法相合。汉代铜器铭文中也记有湅数，然而其字当是炼，鍊之假。汉《冀州从事郭君碑》："服职锻湅"，可证。《说文·火部》："炼，铄治金也。"义为熔炼。因知刀剑与铜器在铭文中虽然都称自已经过多少"湅"，却分别指"潋"（折叠锻打）和"炼"（熔化精炼）这两种不同的工艺而言，内涵迥不相侔。不过钢件在反复锻打的过程中，含碳量不断变化，须由匠师适当掌握。故尔刀剑的湅数似乎只能代表其加工的程度，而不能代表固定的质量标准。

此外，李敏生《先秦用铅的历史概况》（《文物》10期），对我国古代这一使用得相当广泛的有色金属进行了研究。作者举出偃师二里头后期灰坑中出土的纯铅块与夏县东下冯四期灰坑中出土的铅锡青铜镞等早期铅件为例，证明我国用铅不晚于公元前二千年。商代以降，含铅的金属器物更比比皆是。铜合金中加铅，不仅能降低熔点，提高铜液的流动性，利于铸造，而且能改善青铜的脆性。铅的大量使用，是中国古代青铜合金的特点之一，与欧洲、西亚等地早期青铜中含砷、镍的情况不同，显然是自成一系的。

关于非金属矿物如煤的开采利用，本年中也发表了研究成果。煤炭工业部《中国煤矿史》编写组《中国古代的煤雕及其在煤炭开发利用史上的意义》（《自然科学史研究》1期），根据对各地出土的自新石器时代至南北朝的煤精雕刻品所作的分析，认为早在新石器时代，我国可能已经发现煤的可燃性。至迟在西周，我国已经能够采煤和用煤作燃料。两汉时期是我国用煤史上第一个繁荣时期，而不是用煤的初始阶段。

六　交通工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殷墟西区发现一座车马坑》（《考古》6期），发表了在这座车马坑中发现的一辆商代的独辀驾两马的车。至此，殷墟累计共发现的车马坑已有十六座，商车十八辆。杨宝成《殷代车子的发现与复原》（同上），对殷墟出土商车的结构作了分析，并对石璋如的复原图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河南淮阳马鞍冢楚墓发掘简报》（《文物》10

期），发表了在淮阳发掘的两座战国时代的大型车马坑中出土的资料。1号车马坑中有车八辆，马二十四匹。2号车马坑中有车二十三辆。两坑共出车三十一辆，是近年来在古车方面的重大发现。两坑中出土的车多为独辀，但也有个别双辕车。除双辕车驾一马外，独辀车则驾二、四或六马。从车型上看，有战车、安车及供游戏用的小车。战车有在车軨上遍装铜甲片的，为出土古车中所仅见。其中的安车装椭圆形车盖，重舆，和始皇陵2号铜马车的形制相近。两坑均未经扰动，各种车具都在原来的位置上，为今后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

关于骑乘所用马具，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朝阳地区博物馆文物队、朝阳县文化馆《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文物》6期），发表了该墓出土的一套完整的马具，包括木芯包革的前后鞍桥、双马镫、衔镳和大批铜铃饰、垂饰等，总数达一百七十件。其中的双马镫是我国已发现之最早的实物。马镫的起源是国内外学术界关心的问题，杨泓《中国古代马具的发展和对外影响》（《文物》9期），对此作出系统的论述。指出从长沙西晋永宁二年墓，到安阳孝民屯154号墓，到朝阳袁台子东晋墓，再到北票北燕冯素弗墓的出土品，大致显示出马镫由发生到初步成熟的过程，由初起的单镫发展到较完备的双镫。而成熟的马镫的使用，标示着骑乘鞍具的完备，从而为甲骑具装的产生，提供了技术基础。作者认为，我国古代骑乘用马具的发展，大略可分成产生（战国末至秦汉）、发展（两晋南北朝）和成熟（隋唐以后）三大阶段。包括鞍、镫在内的完备的马具，则是在发展期中完成的。公元四世纪初是其发展的关键时期，安阳孝民屯晋墓和朝阳袁台子晋墓出土的成套马具，恰好提供了马具发展的关键时期的典型实物标本。

交通工具方面，还有王正书《川扬河古船结构的特征及其历史意义》一文，（《考古》7期），指出上海郊区川扬河出土的唐代初期古船，船底的中段独木是一条退化了的独木舟，再在两舷加接木板以增大容量，这种结构形式是从独木舟向木板船发展必不可少的第二阶段。

七　硅酸盐制品

本年度可以说是古代硅酸盐制品研究的一个丰收年。《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二）》（《景德镇陶瓷》总26期）两书，收载了古代窑址

调查或发掘报告五十余篇。其中有的是新发现的古窑址，也对若干已发现的重点窑址作了复查或清理发掘。在这两种专集之外，各刊物上还发表了不少篇有关的文章。通过调查发掘和测试研究，不仅对古窑的年代分期、产品种类、造型装饰以及窑口识别等方面加深了认识。而且对古窑的类型与演变，原始青瓷及白瓷的产生与发展，汝、郊坛、哥、龙泉等名窑的工艺特点，青花瓷的起源和色料来源等陶瓷史上的重大问题，也提出了新的见解。

我国已知之最早的陶窑是在新郑裴李岗渠东区发现的。赵世纲《裴李岗文化的陶器制作工艺》（《景德镇陶瓷》总26期）对这座陶窑作了介绍。它是在地下挖掘而成的，有火膛、火道、窑箄和窑室。一次可烧制陶器十余件。窑温已达960°C。证明我国制陶工艺远在8000年前，就已达到一定的水平。叶万松等《洛阳东周至唐宋时期的陶窑概论》（同上）总结了洛阳地区陶窑的发展情况。指出，春秋时期洛阳地区的陶窑仍以小型、设窑箅者为主。到战国时期，陶窑形制开始发生变化，窑箅逐渐被台式窑床所取代。与此相关联的变化是烟道从窑顶移向窑后壁，出现了窑两侧壁上的火道，以及后壁上的排烟孔，后壁外侧的烟道、烟囱等装置。及至西汉后期，烟道结构又从单烟道发展到多烟道，多者可达五股。与置窑箅的陶窑相较，这种台式窑床陶窑可以大幅度地增加窑容量，提高了产量。又由于烟囱自窑顶移至窑后，又从单烟道改进为多烟道，使窑内的热量分布均匀，从而提高了烧造质量。而在我国南方，却很早就出现了另一种更进步的窑型——龙窑。据报道，本年5月在浙江上虞发掘了两座年代约当商代晚期的龙窑（《光明日报》6月23日1版）。据浙江省文物研究所鉴定，这是我国已发现之最早的龙窑，距今约有3000年。朱伯谦《试论我国古代的龙窑》（《文物》3期），对自春秋战国至宋元的龙窑遗址作了分析研究。指出龙窑的发展变化是：窑身由短到长，窑室由矮到高，窑门从无到有，坡度由陡到平缓，结构逐渐完善。龙窑造价低，热利用率高，而且装烧面积大。又由于其窑壁较薄，冷却较快，所以很适合烧制青瓷。因为青瓷以氧化铁为主要着色剂，需在还原气氛中烧成，并在烧成后快速冷却，以减轻铁的二次氧化，保持较纯的青色。由于龙窑具有上述优点，故被长期沿用，并由它发展、派生出阶级窑。

关于原始青瓷，黄石林《龙

山文化中出土的原始青瓷》（《景德镇陶瓷》总26期），报道了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遗址T202、206、208、209、210的第二层中出土的原始青瓷二十余片。其胎骨呈青灰色，质坚硬，有气孔，不透光。器表施青绿色薄釉，有光泽，颜色不纯正，或青中泛黄，或黄中泛绿；但胎釉结合较紧，无脱釉现象。根据同一地层中所出石灰面的^{14}C年代为公元前2080年（树轮校正），所出木炭的^{14}C年代为公元前1950年（树轮校正）；故可确知，距今4000年前，黄河中游地区已能烧制原始青瓷，这也是我国已发现之最早的原始青瓷。张剑《洛阳西周原始瓷器的探讨》（同上），根据对洛阳北窯西周墓群出土的大量原始青瓷的分析，认为以前提出的北方原始瓷系由南方传入之说值得商榷。作者指出，洛阳西周原始青瓷代表北方系统，釉色以淡青为主，兼有深绿和黄绿；而当时南方系统的原始青瓷的釉色则是以黄绿和酱褐色为主。从器形特征上看，洛阳等地出土的西周原始瓷器，与陕西长安张家坡、岐山凤雏村、扶风杨家堡、河南浚县辛村等地出土的商周原始瓷的器形基本相同，而与南方江苏丹徒烟墩山、南京市，安徽屯溪，福建福清等地所出者，在器形和种类方面却有很大区别。

关于白瓷，高至喜《长沙出土唐五代白瓷器的研究》（《文物》1期）中，指出湖南地区早在东汉时期已开始烧造白瓷。湖南省博物馆所藏长沙东汉墓出土的白釉瓷珠和白釉瓷鍑，火候较高，已基本烧结。然而此后直到唐中期以前，南方的白瓷生产处于停顿状态。自安阳北齐范粹墓出土白瓷后，一般认为白瓷的烧造地点主要在我国北方。但北齐白瓷窑址至今尚未发现。1982年在河北临城陈刘庄发现了一处烧白瓷的窑群，应为隋代的邢窑，这是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白瓷窑址。杨文山《隋代邢窑遗址的发现和初步分析》（《文物》12期），对这里出土的器物、窑具和窑膛遗存作了介绍。从隋邢窑、唐邢窑到北宋定窑，白瓷生产在北方一直很盛。本年中发表了一批在定窑遗址附近出土的定瓷（妙济浩等：《河北曲阳北镇发现定窑瓷器》，《文物》5期），上面刻印的大部是宫廷御器所用的龙纹。其中的印花云龙纹大碗，釉色白中闪黄，口径26.4厘米，厚仅0.2厘米，是定器中已发现之最大的碗，可反映出定瓷的水平。此外，在四川彭山瓷峰发现了宋代烧白瓷的窑址，陈丽琼等《四川彭县瓷峰窑调查与试掘的收获》（《中国古代窑址

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作了介绍。瓷峰窑起于北宋，南宋时臻于极盛。其产品的造型、釉色、胎质等均与定瓷接近。虽水平稍逊于定瓷，但瓷峰窑采用以支托托起碗底的重叠覆烧法，成品不出现定瓷那种芒口，是其装烧技术的优越之处。

关于我国古代若干名窑的工艺特点，本年中也发表了研究成果。郭演仪等《宋代汝、耀州窑青瓷的研究》（《硅酸盐学报》2期），据汝窑贡瓷，即所谓官汝瓷之有代表性的残片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其蓝青的釉色和温润如玉的乳浊感的形成，不仅与化学成分如SiO_2/Al_2O_3比及磷含量有关；还与其较低的烧成温度，缓慢的冷却，在釉熔融之前先烧弱氧化焰，后阶段控制为还原焰等工艺因素有关。陈显求等《南宋郊坛官窑与龙泉哥窑的陶瓷学基础研究》（同上），对杭州乌龟山郊坛窑址出土的瓷片及故宫所藏传世哥窑瓷片作了分析，证明郊坛官窑釉与龙泉哥窑（指龙泉出土的黑胎开片青瓷）釉异常接近。这两种釉的物相是钙长石呈粒状或针状晶体，残留石英和直径较大的气泡。呈玉感的釉，钙长石含量在百分之五以上，钙长石、颗粒石英和釉泡三相总量均大于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低于此，就使釉趋于透明，失掉了如玉之感。而传世哥窑釉与元大都哥窑相似，特别是钙长石针晶的大小很相近，比郊坛官窑和出土龙泉哥窑釉中的粒状或小针状的钙长石晶体大得多。这对解开传世哥窑之谜，又是一个进展。李虎侯等《龙泉青瓷中微量元素的活化分析》（《硅酸盐学报》3期），发表了利用反应堆产生的热中子进行活化分析，测定宋、元、明三代龙泉青瓷中的微量元素——稀土金属铈（Ce）、镱（Yb）、铕（Eu）及稀有金属钽（Ta）和铪（Hf）的含量的结果。这就为龙泉青瓷找到了特征元素，为古瓷的鉴定提供了科学依据。

关于青花瓷，张志刚等《扬州唐城出土青花瓷的测定及其重要意义》（《中国陶瓷》3期），根据扬州唐城所出青花瓷枕片釉中的主要着色元素是低锰的钴料，并含有一定量的CuO（0.09%），釉中钙的含量，胎中的SiO_2/Al_2O_3比等测试数据，认为这一标本的化学成分与唐三彩相接近，其烧造地点应在河南巩县一带。赵光林《关于青花瓷器的起源和发展》（《景德镇陶瓷》总26期），认为早期青花瓷的产地不在景德镇。对于扬州青花瓷片的产地，他也倾向于是在巩县烧制的观点。欧阳世彬《釉

上青花技术与青花的定义》（《中国陶瓷》1期），也认为唐三彩中的蓝彩与青花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青花瓷直到元代才臻于成熟。关于元青花所用色料的来源，迄今尚无明确结论，研究者众说纷纭。陈尧成等《元代青花瓷器的研究》（《中国陶瓷》4期），根据对十二件元青花标本检测结果，认为云南玉溪窑元青花所用色料是当地产的钴土矿石。景德镇元青花色料是含高铁低锰的铁钴共生矿，与印度的辉砷钴矿及 smalt（西方产的一种含钴的蓝玻璃）的成分均不相同。要确定这种色料的确切来源，还须对各种类型的钴矿作进一步地研究。

关于玻璃，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4期），是近年来研究我国古代玻璃史的力作。作者对建国以来出土的西汉—北宋的二百余件玻璃器皿，通过形态观察和成分分析，分为国产与进口两类。作者举出的最早的国产玻璃器皿是满城西汉墓出土的玻璃耳杯、盘，成分属于铅钡玻璃系统，铸造成型。五世纪时中亚工匠传入吹制技术，定县北魏塔基出土的国产玻璃瓶、钵，就是吹制的。此后的玻璃器皿，也以吹制者居多。至隋代，我国传统的铅钡玻璃转为高铅玻璃（含氧化铅百分之六十以上），更适于吹制。此时西亚的钠钙玻璃和铁棒技术也传入我国。虽然，自汉至北宋，国产玻璃一直以铅玻璃为主，但在隋唐时我国也曾生产钠钙玻璃。至于进口玻璃、汉代由海路进口了罗马玻璃，魏晋南北朝时期罗马玻璃还有从陆路输入的，隋唐时期从陆路输入萨珊玻璃，宋代则从海路进口伊斯兰玻璃。由于此文主要研究玻璃容器，没有将大量出土的玻璃珠等饰物作为讨论的重点。但作者仍然提出了两广出土的汉晋玻璃珠饰，可能是当地或东南亚地区用草木灰为助熔剂制作的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看法。至于生产玻璃的窑址，我国于1982年首先在山东博山发现，共约二十座，时代为元末明初。对出土标本的分析表明，这里生产的是钠钙玻璃，但K_2O、Al_2O_3和F^-的含量较多，是由于以长石质矿物为主要原料，以硝石和萤石为助熔剂和乳浊剂之所致。这种配方具有中国的特点、与西方中世纪使用的玻璃配方不同。

八　乐器和乐律

自从曾侯乙编钟出土以来，研究工作开展得很活跃。关于打击乐器，本年度中发表的文章有蒋定穗《试论陕西出土的西周钟》（《考古与文物》5期），此

文从纹饰、组合与音律几方面对陕西出土的西周钟进行考察，对八十七件发掘出土的西周钟作了分类和时期序列的排比。作者进一步指出：西周中晚期的编钟一般是八件一套，从第三钟起都使用侧鼓音，并在鼓右部分刻铸鸟纹为标志，每钟的正鼓音和侧鼓音之间大都成小三度音程关系，即分别为羽、宫或角、徵二音，因而形成由四声骨干构成的音阶特点。对西周编钟的这些认识，有助于说明曾侯乙编钟产生的历史基础。与曾侯乙编钟同出的编磬近年作了复原。湖北省博物馆、科学院武汉物理研究所《战国曾侯乙编磬的复原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文物》5期），发表了复原这套编磬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首先，作者确定了古代制磬的“鸣石”是一种石灰岩。并根据《晋书》中的线索，在距随县不远的襄樊市郊，采到合用的石料。其次，根据磬铭中阶名与编号的关系，证明这套编磬是由低音到高音，按半音关系排列的。并通过实验和计算确定了每块磬的实际音位。在复原件的制作过程中，结合《考工记》的记载，进一步认识了磬面的光平度与发音的关系。找到了其最佳的敲击部位。以及磨“旁”、磨“端”在调音中的作用。最后复原出来的编磬，音色清亮，音域广阔，具有三个八度，最高音与现代钢琴最上一键（C_8）相同。其丰富的半音显示了旋宫转调的功能。复原磬与曾侯乙编钟复制件合奏，金声玉振，鸣和相应，重现了我国古乐在乐律和乐器制作方面所达到的水平。

除打击乐器外，我国古代管乐器的产生也很早。最原始的管乐器可能是骨哨，其次就是埙。尹德生《原始社会末期的旋律乐器》（《西北师院学报》3期），认为，从西安半坡的无音孔（或一音孔）陶埙出现后，到甘肃玉门火烧沟的三音孔陶埙，到河南辉县琉璃阁的五音孔陶埙，当中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作者认为，从火烧沟陶埙的发音可以看出，我国的五声音阶至少在这时已经形成。至于更进步的管乐器，如篪，在曾侯乙墓也曾出土。出土时外观尚完整，惜竹肉均已朽失，无法吹奏。初步复制出的篪，只能吹出平吹音，无法奏出丰富的泛音。尹维鹤《篪探》（《乐器》1期）指出，由于篪的两端是闭口，所以必须把首尾闭口与吹孔及尾孔的距离调整好。经过作者实验改进，并摸索出吹奏篪的一套指法，遂使这件古代乐器得以复原。它的音色：高音亮而不燥，低音似箫而动听，具有自己的特点。

还应当提到的是，据报道，

1920年在敦煌古玉门关外发现的一枚木简，最近被鉴定为汉代的乐谱（《光明日报》1月22日1版）。这枚简上有“元嘉二年”（152年）纪年。鉴定者牛龙菲认为，它和现存日本的《天平琵琶谱》属于同类，鉴定者且已试译为现代乐谱。这是我国已知之最早的乐谱。

九　其它

本年度中科技考古工作还有许多成果应当介绍。如王振铎《燕肃指南车造法补证》（《文物》6期），作者在文中再次申明燕肃指南车的齿轮组织应属具有离合装置的定轴轮系，而非差动轮系。后者在我国宋代以前并不存在，甚至明王徵《奇器图说》中也未提到过。科技史界前辈学者的深思熟虑之说，应对今后这方面的复原工作有指导意义。赵其昌《〈析津志〉所记元大都窋斗式机轮水车》（《文物》10期），据《析津志》的记载复原了十四世纪中叶发明的一种提升井水的水车。这种水车在以后的文献中长期失载。周国信《古代壁画颜料的X射线衍射分析》（《美术研究》3期），报道了用X线衍射分析敦煌莫高窟、敦煌西千佛洞、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庆阳北石窟、嘉峪关魏晋墓画砖等多处古画，得出了当时使用的色料成分。由于在工作中曾辅以X线萤光分析和化学分析，因而其判断较准确。这项成果，对于古代壁画的保护、修复和复制，均极有价值。再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技术室对曾侯乙墓所出皮甲胄的制作工艺的探讨（《讨论东周时代皮甲胄的制作技术》，《考古》12期），也是本年度中发表的一项出色的成果。其他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考古文物新发现

北京市

平谷县北埝头、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平谷县文保所

北埝头遗址位于县城西北7.5公里，燕山南麓的错河南岸，面积约6000平方米。5月上旬，普查队在北埝头村西社员的取土场发现了陶片、红烧土块和“灰土圈”。据现场调查，取土场地表已被挖掉1.5米左右，文化层仅剩下30—40厘米。经过清理，在被破坏的15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了十座半地穴式房子遗迹。有些房子的大小、布局还比较清楚。房子的平面多为圆形或椭圆形，直径一般在4米左右。房内居住面有被火烧过的痕迹。中央有一个或两个较大的筒形深腹罐，罐内存有灰土及较多的木炭碎块，可能是用作取暖或烧饭用的。门道多数开在房子的南面。有的房子还发现了柱穴。出土器物主要是陶器和石器。陶器的种类比较简单，均为手制，典型器物有大口深腹罐、圈足碗和支架等，多数陶器的外表施有纹饰。纹饰以压印的“之”字为主，还有篦点纹、刮条纹、戳刺纹等。陶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还有少量的泥质红陶，在相当数量的陶器内羼有滑石粉。石器有石斧、石凿、石磨盘、石磨棒、盘状器和细石器。

上宅遗址位于县城东北19公里，泃河以北一里许的山前坡地上。面积约5000平方米。发现时已被烧砖取土严重破坏，清理面积约40平方米。发现陶器三百余件，石器二百余件。陶质以夹砂褐陶为主，其次是泥质褐陶与泥质红陶。陶器以钵为主，有深腹、敛口、圜底及少量的红顶钵等多种形状，其它还有罐、碗、杯、陶球、支脚等。纹饰的做法与北埝头遗址基本相同，但花纹的种类比较多，除各种“之”字纹、篦点纹、划纹之外，还有八字形组成的大三角纹、波折纹，篦点纹组成的三角纹、丁形纹等。石器以盘状器的数量最多。其次有

石磨盘、磨石、磨棒、石斧以及柳叶形细石器、石片等。还有几件装饰品，其中的一件石雕小猴，雕刻得维妙维肖。其余几件坠饰，也十分小巧雅致。

根据上述两个遗址出土的器物初步推断，它们的年代上限可能晚于磁山文化，下限早于仰韶文化，属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较晚阶段。两遗址内出土的木炭，经北京大学考古系所做的^{14}C年代测定，校正后，均在6500—7000年之间。

据初步观察，这两个遗址的文化特征都比较明显，具有一些独特风格，但其中某些方面又与辽宁的新乐下层文化、红山文化以及河北磁山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它的发现，不但以新的资料丰富了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内容，而且为研究我国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的考古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郁金城　王武钰）

北京市琉璃河西周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春、秋两季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工作队

本年度进行的发掘工作，分两部分：

（一）墓地的发掘：全年共在京广铁路东西两侧的墓葬区发掘了3000多平方米，共清理西周时期的墓葬三十多座，车马坑两座。其中有六座中型墓，其余都是小型墓。这些墓葬的形制、葬具、葬式等与近两年发掘的墓葬基本相同。铁路以西的中型墓的填土及二层台上，多有牛、羊、狗的头骨及肢骨，路东则少见。这批墓葬中有四座中型墓出土了青铜礼器，以M1149的规模最大，随葬品也最为丰富。墓室长5米多，宽3米多。葬具为两棺一椁。在墓主头前的二层台上，放置着十四件青铜礼器，种类有：鼎、鬲、甗、簋、爵、觯、尊、卣、方罍。还有一件器口，盖、底为铜质，器身为木质的壶。墓主脚端二层台上，放置着四件漆豆。墓室内有大量蛤蜊壳和贝随葬。

（二）城址的发掘：为了搞清董家林古城的年代以及城墙的结构，我们在城墙保存得较好的古城西北角进行了发掘。共开探方十二个，发掘面积为650多平方米。北城墙西缘清理出近30米，还清理了三十多个灰坑和三座房基。

城墙宽10米左右，残高1米，上下是由墙体、内外“护坡”构成。城墙外有壕沟。主墙体夯窝

密集，夯层清晰，质地紧密。系采用分段版筑法修建的。在墙体残存的顶面及剖面上，可看到分段夯筑的隙线。隙线的旁边有很多柱穴，内有木质朽痕，有的木柱之间还发现横置的档板痕迹。这些木柱和档板位于不同高度的夯层中，表明它们是随墙体的增高而被陆续埋置的。内外“护坡”土质较紧密，但未见夯层和夯窝。外“护坡”底部挖成不甚规则的台阶，并发现很薄的路土。据此，外侧“护坡”的形成很可能与建城墙时向上运土有关。城墙外的濠沟深2米多，沟底有10厘米左右的路土。

城墙内侧的“护坡”被西周时期的文化层叠压，并被西周时期的灰坑和房基打破，可知城墙的修建年代应不晚于西周。（王鑫　黄秀纯）

海淀区二里沟唐墓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北京市文物工作队

海淀区二里沟进出口大楼在院内修建资料楼时，于地下发现唐墓一座。墓葬坐北朝南，方向正南北。墓室四壁用绳纹灰砖两卧一立砌成。顶部由于坠毁，结构不详。墓室平面四壁略向外弧，南北直径3米、东西直径2.8米。墓室的北半部为生土棺床，棺床宽约1.5、残高0.35米。棺床与地面均为土质，在清理过程中未见有铺地砖痕迹。墓道开在南壁正中。西壁结构与墓室相同。顶为船篷状券顶，由于现场条件所限，未做清理，尺寸不详。

该墓由于被盗，随葬器物已无，仅有少量残破陶片。墓主人东西向仰卧于棺床正中，骨架已腐烂。在墓室靠近墓门处，出有墓志一合，用汉白玉刻成，长宽为52×52厘米，上盖为伏牛状，中间篆书，“茹府君墓志铭”，四周阴刻十二生肖，下底楷书志文22行，为“兵马使充使宅将茹知，乾符五年秋季月下旬五日终于蓟县通肆坊私第，庚子正月乙卯朔七日辛酉奉迁府君于幽都县刘砸。”（朱志刚　洪欣）

平谷、密云等县发现的古窑址

调查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北京市文物工作队

本年进行的文物普查中，又在平谷县的夏各庄乡东大台、刘

店乡的胡家店和密云县卸甲山乡的庄窠发现古窑八处，其中夏各庄东大台六处，刘店乡胡家店一处均属战国时候的陶窑，庄窠一处从出土的陶瓷残片看，应属金元时期的民间粗瓷窑。另外，在平谷县刘店乡寅洞村北还发现许多炼制陶瓷釉料的坩埚和少量辽金时期的瓷片，据估计这里也应是一处古窑址。在宣武区东琉璃厂西口路南修建工程中，发现长8米，厚1.5米的火烧土层，并出土很多明清时期黄绿两色的琉璃建筑构件，据分析这里应是文献中记载的琉璃窑。（赵光林）

天津市

宝坻县歇马台战国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10月

工作单位：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部

歇马台遗址位于宝坻县城西南4公里的一条依稀可辨的古河道北侧，面积约5万平米。大部分被民舍覆盖，只有村西是空地。近年村民取土，破坏严重，故对该遗址进行了保护性清理，发掘面积200平米，获得三种文化堆积。

第一种为战国遗存。地层在整个遗址都有分布，但在发掘区内只有零星发现，出土物有加砂红陶釜、明刀币等战国文物。发现七座竖穴土圹墓和一座瓮棺葬。随葬品有五种情况：一是两个加砂红陶直腹平底柱足鬲（燕国鬲），年代可早至春秋晚期；二是一或两个灰陶三足器，同出战国型铜带钩；三是鼎、豆、壶、盘、匜加一个底部削成三足状的灰陶小罐，战国常见；四是一或二个三足状小罐；五是一铜带钩。

古河道岸坡上的一条探沟内，在一座汉代瓮棺下，发现互相叠压的六座小墓和二座陶窑，二座小墓在窑上，二座在窑下。陶窑似专烧网坠。小墓圹穴浅而窄小，随岸坡倾斜，皆无随葬品，近似乱葬。

第二种是张家园上层类型遗存，文化层最厚处1米，未发现居住遗迹。出土陶器群有两个特点：一、较多流行交叉拍印绳纹和方唇外迭口沿，❸器形硕大的高裆袋足平跟鬲十分引人注目。二、夹杂较多中原文化系统的西周陶鬲残片，表明了这类遗存的年代。

此层下有一座东西向的墓葬，与南北向的战国墓不同，随葬玉、铜等质料的圆环八个，具有戎狄文化的特点。

第三种是张家园下层类型遗存，文化层最厚处1.35米。清理出不规则的灰坑三个，略呈椭圆形，圜底，共同特点是坑内堆积都由一层黑灰土一层黄土叠压堆成。陶器流行竖行细绳纹和黑衣磨光，常见器类有敛口鼓腹袋足鬲和折肩锥足鬲等。器物有早晚差别，和大厂大坨头F_1、F_2相类。出土双翼青铜镞一件。

上述分别和张家园上、下层相似的两类遗存，皆不见细石器，和蓟县张家园、围坊、大厂大坨头、宝坻牛道口等常见细石器的情况有异。（韩嘉谷　梁宝玲　沈勇）

蓟县抬头村早期辽墓

发掘时间：1984年12月
工作单位：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部、蓟县文物保管所

蓟县穿芳峪乡抬头村村民挖菜窖时发现辽墓一座，该墓为砖砌圆形仿木构建筑，分墓门、甬道、墓室三部分。墓门南向（偏西5度），宽0.7、高1.3米。甬道券顶，长0.9米，中间用方形和长方形浅沟纹砖封堵。墓室圆形，穹窿顶，顶部早期破坏。直径3、残高2.1米。在墓壁上砌出二窗、四柱、四朵斗栱和一圈屋檐。窗在墓室的东西两侧，直棂式，高0.8、宽0.4米。柱在门的两侧对称排列，相距0.8米，由三块竖砖砌出，宽0.18米。柱头各承托单抄单下昂五铺作斗栱一朵，斗欹出顱，栱有券杀。斗栱托屋檐一圈。檐上墓室由素面砖斜向平砌，逐渐内收成穹窿顶。此种造型为辽墓流行的形制。

随葬品仅见一组陶制明器，约三十余件。有注壶、长盘、莲花口杯、三足炉、陶剪、盏托、灯台、陶匜、钵、桶形罐等。封门砖内侧出一件残瓷碗。其中注壶盘口、长颈、短流，长盘为花瓣口均与辽代瓷注壶、长盘的造型相近。瓷碗白釉显黄，大敞口直壁，厚圈足，平底，亦是宋辽早期的特征。（魏仲明　邸明　李经汉）

天津市发电一厂工地发现明代文物

发掘时间：1984年11月

工作单位：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

古部

在天津市发电一厂施工工地西部，出土了一批古代文物。文物埋藏于地下7米多深的地方，分布范围约300平方米。出土物包括有制作细致的青花瓷碗、青花瓷杯，还有釉陶韩瓶、红陶钵、筒瓦、方砖、铁矛、船钉、铁菜刀、木梳等，以瓷器为多，其中完整瓷器六件。一起出土的还有人骨和兽骨。这里地处大直沽，元代以来即是天津的主要码头之一。从出土物和周围环境分析，应是一处古代遗址。据鉴定，其中的青花瓷一部分厚朴凝重，显具明末特点；一部纤巧精致，又有清初康熙的风格。结合其它文物特征可以断定，这批文物的时代当在明末清初。在天津市区内出土成批文物这还是第一次。（沈勇）

天津市碑刻调查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部

天津市的碑刻调查，经过普查和拓碑二个阶段，于1984年完成。发现碑碣一百八十通，墓志铭三十六方，塔记四块，幢记八件，其它三件，共二百三十一件。其中东汉一通，宋辽金元二十二通，明清民国二百零八通。大部分墨拓。

这批碑刻资料数量多，内容广泛，有些是珍贵的史料。例如，明嘉靖二十九年《重修三官庙碑》记载了天津得名的缘起。碑载“我朝成祖文皇帝，入靖内难，圣驾尝由此济渡，因赐名曰天津，筑城凿池，而三卫立焉”。是天津城市发展史的重要资料。蓟县元大德八年《御衣局记》记叙了在蓟县城内创办官手工业作坊——御衣局的经过。对工人来源，作坊规模、主要产品记载颇详，是研究天津手工业史不可多得的资料。现存碑刻资料对辽金以来市区县的学校教育、道路交通、商业活动、金融贸易、水患水利、公益事业、民俗及黑社会的猖狂活动，都有翔实的记载。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碑刻中保存了大量地名和人物资料。涉及到的人物一千多个，几乎包括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其中大部分不见经传。

碑刻的造形，如蓟县清嘉庆四年《关帝庙重修碑记》独具特色。该碑方柱状，由碑帽、碑身和碑座组成。碑帽为庑殿顶，雕出的枋、椽、瓦、脊、滴水、吻兽生动逼真。须弥座四面分别雕

出莲花、菱花和狮子滚绣球。通高3.31米。（李经汉）

河北省

平山县中贾壁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7—9月
工作单位：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遗址位于县城西北1公里处的冶河西岸之台地上，面积约为5000平方米。此次发掘揭露面积200余平方米。发现陶、石、骨、角器近二百件。文化层厚50—100厘米，遗存比较单纯。由于发掘面积小，除发现一些灰坑外，没有发现其它遗迹。遗物以陶器为主，器形主要有：罐、盆、钵、碗、壶、瓮、缸等。在部分泥质陶器上施红彩，花纹主要有：叠人字形纹、三角纹、网纹、菱形纹等，另外还有部分“红顶式”钵、碗、盆。石器方面主要有石斧、石凿、石刀、石镰、石镞等。骨器有针、锥、簪、铲等。角器有凿、锥等。据初步整理，遗址的年代大体相当于“大司空类型”的偏晚阶段。

藁城县台西商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7—12月
工作单位：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这次发掘面积共计300平方米。所获遗迹主要有灰坑、灶、柱洞、陶窑、水井、祭祀坑和墓葬等，其中一眼水井保存较好。出土遗物共计一千二百零八件，其中小件器物较多，还有卜甲和卜骨也较多，釉陶又有新的出土。特别是发现了一件商代陶塑人像和一些陶文，是很难得的。

易县燕下都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9—12月
工作单位：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这次发掘了高陌砖厂，东沈村6号遗址，发掘面积共500平方米。高陌村地层简单，文化层薄，出土有板瓦、筒瓦和铜镞。东沈村6号遗址发现的遗迹有房基，灶、灰坑、井和几座汉墓。遗

物以鬲、瓦、罐最多，还有釜，并有骨器、鱼、鸡骨和鹿角等。

平山县中山灵寿故城

发掘时间：1984年7、10月
工作单位：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这次在灵寿故城发掘九号和五号遗址。九号遗址为居住址，发掘面积1036平方米，发现的主要是一些灰坑；出土遗物共计五百七十七件，其中陶器三百八十件，骨器八十四件，铜器十五件，石器八十九件，铁器九件，主要器形大多为陶豆，少量的为罐、碗、盆、甑等。数量较多的是建筑所用的筒、板瓦，瓦当。另外还发现一件陶量、两枚铜印，以及一些铜器、铁器、石器和骨器。五号遗址为冶铁遗址，发掘面积300平方米。主要遗迹也是灰坑；出土遗物共一百四十四件，其中陶器五十五件，瓦当四十二件、陶范八件、石范三件、石器十二件、铁器二十一件、骨器三件。出土的铁器种类不多，主要是锛、凿、铲；陶器种类也较单纯，主要有罐、豆、碗、盆等器形，还有瓦当，以素面半瓦当占绝大多数。另外，还出土有大量铁渣。

临漳县邺城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队

在1983年对邺北城金凤台、铜雀台和城墙的勘探基础上，继续对邺北城的北城墙，以及城内的街道、夯土台基进行勘探与试掘工作。

经勘探，邺北城的北城墙又向东探出一段，确定了邺北城北城墙的位置。探明了邺北城由建春门至金明门的东西大道，大道将邺北城分为南北两部分。探明了从南城凤阳门、永阳门、广阳门三门分别向北的南北大道。同时对城内的夯土台基进行勘探，在宫殿区内探明了夯土台基十四座，其中多数在水面以下。

在勘探的基础上对城墙进行了解剖发掘，了解了城墙的宽度、高度及其结构。并对两处台基进行试掘，了解其保存情况，发现台基、柱础、散水和水沟等遗迹。（顾智界）

已审阅
子居 10-03-13，13:25

邢台市省机电学校元墓

发掘时间：1984年11月
工作单位：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墓在河北省机电学校南部，砖砌筑，由墓道、墓门、甬道和墓室四部分组成，全长9.5米。该墓虽早年被盗，仍出土一些瓷器、铁器、金器、骨器、漆木器等。随葬器物共计十八件。其中瓷器七件，有四足炉、莲花碗、白瓷盘、罐等，均残。铁器有马镫、剑、釜。金器为装饰品。骨器有镊子、小刀、酒杯、雕刻艺术器等。另外又出土墓志一方，上书："大元特授嘉汉大夫处州路总管兼管劝农事颜公之墓。"

迁西、卢龙、抚宁三县长城考察

考察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这段长城行经的区域，西起迁西冷口，东达秦皇岛市九门口，包括了桃林口、界岭口、青山口、义院口等著名关口。除响山一带山高林密尚未完成考察工作外，全年共调查实测长城体117.8公里，敌楼二百九十座、烽火台二十八座、墩台三十二座，房基九十四处，跨墙台四十一处，关口十五处，营城十二处，城址、堡、寨十八处，战台二十一处，碑碣四十三块。此外，还发现了一些零散文物，如石炮、石雷。考察中还发现一些老边墙，所属时代尚待研究。

山 西 省

襄汾县解村旧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为配合南同蒲铁路复线工程，在县城西南的解村电灌站附近，发掘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地点。发掘地点位于汾河左岸，南距丁村2公里。剖面厚60余米。岩性自上而下大致分为四层：

黄土层，含4—6条古土壤，

中上部袋状砾石层中含石器，厚约40米。

砂层，颗粒纯净，含丰富石器以及马、牛、鹿等零星哺乳动物化石，厚约2米。

灰黄色泥灰质粘土层，厚约12米。

砂砾层，以砂为主，斜层理发育。在下部砂层中含零星石器及较多的动物化石，经初步观察主要有纳玛象、犀牛、野马、斑鹿、鼢鼠以及鱼类和厚壳蚌等，可见厚度约8米。

解村剖面所处的地貌部位，为汾河下游第四级阶地。从地层地貌以及所含的动物化石诸方面分析，该剖面的地质时代当属于中更新世中晚期，其文化时代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后一阶段。

剖面的三个层位中，均发现有旧石器，但以紧接黄土层的砂层为最丰富和最典型，在大约100平方米的范围内，获得石制品二百余件。石制品均系角页岩质，棱角锋锐。石器类型主要有刮削器、砍斫器、三棱大尖状器及石球等。石器的加工和器形，与丁村文化颇为接近，应属于同一文化体系。

丁村遗址于1953年发现，次年正式发掘，经研究，确立了“丁村文化”和“丁村文化期”。丁村文化的时代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长期以来，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在丁村遗址中一直是个空白。中更新世地层中旧石器文化的发现，不仅丰富了丁村文化的内涵，而且对于进一步探讨“丁村文化”的承袭关系，提供了科学证据，同时，还将丁村一带古人类发展的历史提前了一个地质时代。（向前）

襄汾县沙女沟村石器制造场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10月

工作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遗址位于襄汾城关沙女沟村东约1.5公里的塔儿山西脉。在目前所调查的李沟、青杨岭、六家嘴等地，大约7、8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断续有石器发现，其中以大堎堆山南坡最为集中、丰富。在长宽大约1000×300米的范围内，石制品密集叠压，俯拾皆是。石制品分布在由灰黑色角页岩构成的山坡上，厚度一般在数十厘米，最厚可达4米左右。到目前为止，在文化层中还未发现任何磨光石器或陶片。

文化遗物为石核、石片和石器，均系角页岩质。石核分为规则状和不规则状两大类。规则状

石核主要有漏斗状和似柱状，个体较小；不规则状石核，无固定台面，个体硕大，其数量最多。石片宽大于长者居多数，台面为劈裂面者约占一半以上，打击点多数清晰。打击石片采用锤击法和摔碰法。

调查中所获石器主要有石锤、砍斫器、刮削器、手斧、尖状器和矛头等类型。石器的修理主要采取锤击法，多数石器修痕深凹，刃口陡直，刃缘不甚平齐，除手斧等少数标本向两面修理外，多数则由劈裂面向背面进行单向陡直加工。石器的主体是尖状器和矛头，二者占石器总数的三分之二左右，其中矛头数量最多，器身修长，两侧对称，器形稳定，是遗址中具有代表性的器物。手斧及直刃刮削器中一些标本，似为新石器时代遗址里石斧石刀之雏形。

沙女遗址的石制品、普遍棱角锐利，其中石核石片数以万计，而石器所占比例甚小。山坡上裸露的原生角页岩上的打击痕迹表明，这些岩石就是当时人类就地取材制造石器的原料。据此，它无疑是一处石器制造场遗址。通过对石器及其堆积性质的观察，初步认为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后一阶段。（向前　占杨）

和顺县窑湾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

发掘时间：1983年9月

工作单位：山西省晋中地区文化局文物工作站

遗址位于东经113°49′，北纬37°15′。海拔1249米。溶洞地质构造为寒武系白云质灰岩。洞口宽20.8、深13.25、高6米。坐落于清漳东源清河岸二级阶地上，距现今河床岸边10余米，高出河面7米。

洞内堆积被扫羊粪者大部清除，现只少量残存，厚5—140厘米。共七层，从底部往上1—6层为棕红色粘土夹砾石，钙质颗粒层。其底部有深黑色灰烬，含哺乳动物化石，人工打制石器，烧骨及碎骨片。第7层为现代淤土层：含灰色、红褐色素面陶片，磨光石斧等物。哺乳动物化石计有：马、水牛、野驴、鹿、披毛犀等十余种。石制品约千余件。原料绝大部分是白色石英岩，占总数百分之九十以上，其次是黑色燧石及砂岩。石器除几件砍斫器及石锤外，其它器形均小。其中用石核制成的漏斗形尖状器，研磨器和石球约占总数三分之一以上。骨器有骨刀，骨片尖状器，犬齿作的骨针等，人工打碎的骨片上万片。

从以上情况看，其文化时代可能属旧石器时代晚期范畴。　（吴志清）

晋东南、晋南和吕梁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调查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为配合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和学术课题研究，在四个地区的考古调查中，发现了一批新石器时代遗址。

晋南地区：除复查了垣曲县的下马、磨头、北堡头、南堡头、小赵、下亳城、上亳城等遗址外，又新发现了宁家坡遗址。

宁家坡遗址面积为90,000平方米，文化层厚3米左右。采集到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尖底瓶、彩陶盆、钵和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斝、釜、灶、鼎等残片，内涵十分丰富。

忻州地区：在定襄县发现了白村、下汤头两个遗址。白村遗址面积60,000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达2米，采集到相当于"东下冯"时期的鬲、甗、三足瓮、豆、斝等残片。下汤遗址面积30,000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50—100厘米，采集到具有龙山时代特征的鬲、甗、盆、敛口瓮、折肩罐等陶片。在五台县发现新堡遗址，遗址面积80,000平方米，文化层堆积50—100厘米，采集到具有龙山时期特征的陶鬲、罐、盆等陶器残片。

吕梁地区：在交城县复查了瓦窑遗址。新发现的有坡底、瓷窑、玄中寺三处遗址。据采集到的遗物初步判断，坡底遗址为龙山时期的堆积，也有仰韶文化时期的陶片，瓷窑、玄中寺二遗址属龙山时期。在交城、文水两县交界处发现了广兴遗址，采集到罐、盆、豆等陶器残片，也有彩陶片，其时代属东周和龙山、仰韶三个时期。

晋东南地区：在武乡县的石门乡附近称为"牛鼻子湾"的地方，发现了石磨盘、石磨棒，其形态与磁石出土的同类器基本相似。时代当为新石器早期。（海金乐）

洪洞县耿壁村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现时间：1984年2月
工作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耿壁遗址位于赵城东北5公里的汾河东岸阶地上，面积约5万

平方米。文化层的一般厚度在40—80厘米，从采集的陶片中能够辨认器型的有钵、尖底瓶、罐、盆、釜等。陶器制法一般采用手制，器壁厚薄匀称，质地细腻坚硬。以细泥质红陶为主，夹砂红陶和灰砂褐陶次之。纹饰主要有线纹、篮纹和附加堆纹。彩绘花纹有由宽带、弧线、钩叶圆点等图案所组成。从采集的双唇小口尖底瓶、钵、盆以及彩陶花纹来看，应属仰韵文化庙底沟类型。

垣曲县古城东关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垣曲古城镇东关遗址在东关外沇河西岸的河旁台地上，总面积约为30万平方米，本年度春秋两季发掘1000平方米。共清理灰坑一百五十一座，陶窑二座，房址一座，墓葬十一座。这一遗址主要内涵有仰韶、庙底沟二期、龙山、东周各阶段的遗存，以庙底沟二期遗存最为丰富。

第一发掘区发现的主要遗迹是各阶段的灰坑，分布极为密集、打破关系复杂，有不规则形、袋形、锅底形几种。有的庙底沟二期袋形坑很大，底径约6、深5.6米。这样大型的灰坑尚属少见，说明当时生产力的发达水平。各阶段的灰坑中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骨器和陶器，为确立这一遗址的分期，进一步认识晋南地区新石器文化的面貌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有的灰坑中发现有厚约5—15厘米的炭化谷子，也有的灰坑中出土了树籽等自然遗物。这一发掘区还发现了三座东周墓葬，长约3、宽约2米。已发掘的一座挖至十三米时到达潜水面，暂停发掘。在三座墓北部的东周文化层中发现猪、狗、羊、牛等骨架，推测可能是祭祀的牺牲。此外还发现了晚于庙底沟二期的方形房址一座。

第三发掘区的地层堆积与一区大略相同。本年度发现一座庙底沟二期阶段的方形横穴陶窑。

第四发掘区发现了一座庙底沟二期阶段小型墓葬，长约1.8、宽约0.6米，无随葬品，仰身直肢葬。（佟伟华）

襄汾县陶寺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省临汾地区文化局

今年对遗址进行了第13、14次发掘，揭露面积近2,000平方米。

在居住址Ⅲ区开5×5米探方三十三个，实际发掘面积750平方米，清理房基十座、陶窑二座、灰坑六十一座，包括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两种性质的遗存。此外，还有陶寺晚期的小型墓葬二十座。这些分散的小墓，应是居住址废弃后所埋。从出土陶器观察，这里发现的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同夏县东下冯、芮城西王村遗址的同类遗存时间相近，大致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早期阶段，它与陶寺类型龙山文化之间有明确的地层叠压关系，但并不衔接。

在墓地Ⅱ、Ⅲ区新开10×10米探方十二个，发掘面积1,200平方米，发现墓葬近三百座，清理了二百五十座；又在1983年发掘的探方内，清理上年遗留的墓葬三十座，合计二百八十座。其中，有中型墓九座，余为小型墓，出土了一批陶器和彩绘木器。在一座中型墓的生土二层台上，殉埋猪下颌骨十组共一百三十副。通过这一年的发掘，对墓地的分区和排列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早、中期墓排列相当整齐，头向一致，并有依性别分排埋葬的现象；晚期最后一阶段的墓，不再形成大的横排，而是分成若干组，可能属于家族茔域性质，表明社会组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高　炜）

曲沃县方城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省临汾地区文化局

遗址位于曲沃县东北约17公里的方城、小巨、古巨、南石之间，面积约300多万平方米。方城、小巨属曲沃县曲村公社，古巨、南石属翼城县里砦公社。1984年揭露面积约300平方米。清理灰坑十六个，以带长颈的漏斗状圆袋形较多见。清理房址四座，其中白灰面地面建筑二座，

这种房子都是圆角方形，四周有厚约80厘米的夯土墙，居住面的白灰分两次涂抹，下层白灰夹草筋，上层白灰很纯净，总厚度约0.5厘米。居住面都经多次更换，最少的也有四层。使用面积在16平方米左右。圆形和圆角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各一座，使用面积约在14平方米左右。清理墓葬二座，土坑竖穴仰身直肢单人葬，无随葬品。复原陶器数十件。从遗迹遗物看，属中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晚期。

洪洞县侯村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现时间：1984年2月

工作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侯村遗址位于赵城东南3公里，面积约4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度约1—3米，可辨认的器型有鬲、斝、罐、盆、瓮、豆、异形三足器等。从采集的器物看，种类虽不多，但文化内涵很值得重视。陶质较硬，陶胎较薄，器形也比较规整。主要为火候较高的泥质灰陶和磨光黑陶，夹砂灰陶也占有一定的比例。纹饰主要有绳纹和篮纹。以平底器和三足器为主，其次则是圈足器。无论从陶质、纹饰和器形来看，它们都具有陶寺类型的风格。

异形三足器的发现，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它可能是早期的鼎，是否合适，有待于在实践中修正。侯村遗址的发现，无疑是山西考古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收获。

此外在遗址上还采集了一些打制石器，它们所用的原料和打制方法基本一致。类型有刮削器、尖状器和砍斫器，其时代不会晚于龙山文化，或许有更早的可能性。

朔县赵家口村发现两柄赵国铜剑

发现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山西省文物局

两柄铜剑从小平易乡供销社废品收购站所收废铜中检得，经过多方调查，得知铜剑是由县北7.5公里小平易乡赵家口村出土的，出土详情不明。

两剑（编为甲、乙）形制相同，剑身两面为平脊，双刃锋利，柄呈扁平形，无首无格，近首端有一小圆孔。甲剑完整，全长33.5、宽3.4、剑身长23.4、柄长10厘米。乙剑柄首端稍残，全长30.3、宽3.25、剑身长23、

柄长7.2厘米。两剑中央平脊下方皆镌刻铭文两行，铭文笔道细如毫发，书写秀丽。甲剑铭文十九字，由右至左竖读，（乙剑同）文曰：“四年，相邦春平侯，邦左库工师长身，冶尹□执剂”。乙剑铭文十七字，文曰：“四年，郯相乐□（驿），邦右军（库）工师长庆，冶事息擘事”。两剑背面平脊下方因锈蚀严重，未能看出有无“大工尹”等刻铭。从甲乙两剑铭文内容看，均属战国时期赵国之剑。关于赵国春平侯剑，在以往发现的三晋兵器中数量较多。此剑是目前已知我国发现的第十五柄春平侯剑。郯相乐驿剑，属首次发现。（戴尊德）

侯马市北坞村东周城址

发掘时间：1983年9月至1984年12月

工作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北坞东周城址系东西并列的两座古城，位于侯马晋国遗址的东北部，除进行全面钻探外，曾在东城西部发掘5115平方米。

两座并列的古城，方向均为15°左右。已湮埋地下1米许。西城近方形，边长约380米，城墙宽4—6米。东城呈长方形，东西长约530米，南北长约580米，城墙宽8—10米。两城相距约10米，之间为一条大路。根据发掘情况判断，时代皆属侯马东周晋国遗址时代。西城大体包括早中晚期；东城较晚，大体包括中晚期。

城内经钻探，西城探出建筑遗迹十二处，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东城已探出建筑遗迹十七处，总面积约20,000平方米。其中大型建筑五处，总面积约18,500平方米。如F25位于城中部，四周有围墙，东西长约58米，南北宽约52米，南墙中部有门，主体建筑呈凹字形。F19在F25以南120米，四周有围墙，南部已破坏，东西长64米，南北残长80米。主体建筑呈曲尺形。

发掘项目及主要发现如下。

1.东城西部一般居住址的发掘，发现灰坑九十个，灰沟六条，窖穴二十二个（圆形十八个，肾形四个）、灶六个，房子二座，小型建筑基址二处。

2.东城西南角一组东西并列三座大型建筑基址，形制结构基本相同。北部有围墙，向西与城墙连接，向东残断。此次对其中两座及部分围墙进行了发掘。（东部一座已被原有铁路破坏。）基址深距现地表0.7—1米。柱础以上部分已破坏无存。三座建筑

东西间距均为16.5米，南端有相连的厅式廊，已发掘出十八个柱础。主体部分为长方形，方向大体与城一致，南北长约58米，东西宽约16米，墙基宽约2.9米。内部排列两行柱础，少部分柱础石尚存，每行十一个，东西间距3.7米，南北间距4.5米，距夯墙3.2米。门设于南北两端，南端两侧各一门，门道宽约2.8米，每门两侧各有两个柱础。北端中间一门，门道宽3.4米，两侧各有两个柱础。初步推断这三座建筑可能属仓库类。其构筑方法仅承重部分挖槽夯打，墙体直接承重，是国内时代较早的实例。

3.东城西北角、西城东北角和东城西南角进行了发掘解剖，对城墙的时代及构筑方法有了初步了解。东城西北角呈缺角状，缺角部分南北长6.4米，东西长12.6米。靠西侧另有一平面长方形的夯土建筑贴附在城墙上，南北长约5米，东西宽约4米，周围有活动硬面。西城东南角亦呈缺角状。可能与加强防御有关。

从以上发掘与钻探情况可以看出，北坞古城保存较好，布局比较清楚，为研究东周晋国城市布局、建筑情况以及当时的社会生产、生活状况提供了新的资料。（罗新）

朔县北旺庄汉墓

发掘时间：1983年至1984年
工作单位：山西省文物局平朔考古队

现已发掘汉墓一千四百余座。这批汉墓属于两汉四百余年间的墓葬。其中，属西汉前期者有一定数量的小型土坑竖穴墓，属中晚期者有为数较多的中小型木椁墓和小土洞墓。还有许多大致属西汉晚期至东汉前期的土洞木椁墓，其形制为其他地区少见。东汉一般多为土洞墓和砖室墓。有两座墓各出土一件有纪年铭文的器物，一件为西汉成帝元延元年（前12年）漆匣（器物已朽），一件为西汉宣帝五凤二年（前56年）铜质“成山宫”行灯，为这批墓葬的分期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关于葬式葬俗，西汉前期墓为单人葬，中晚期为夫妇同茔并穴或同穴合葬，东汉墓均系同穴合葬。葬式一般为仰身直肢，少数为屈肢葬，还有少数特殊的葬俗，即母子合葬（婴儿抱在母怀中），男女同棺合葬，一个成年与一个少年合葬。还有三座孕妇墓葬和一座难产产妇墓葬（胎儿下肢露在母体外）。

各类文物共出土一万二千余件。以陶器占多数，计有六千六

百件，器形有壶、罐、盒、鼎、灶、井、盘、案、耳杯、勺等，其中有一定数量的彩绘陶器。出土铜器二千二百零五件，有鼎、壶、甗、甑、洗、盆、盘、钔、熏炉、镜、灯、镇器、弩机、戈、带钩、偶车马器等，其中胡人伎镇、四神温酒炉、龟鹤熏炉、百乳镜和各类铭文镜制作工艺非常精美。出土各式铜印章一百零二枚，是这次发掘重要收获之一。印章多属私人名章，也有个别官印及少数画印与成语印。名章中以王、秦二姓者居多，杂姓较少，可知当时这一带主要为王、秦两大家族的墓地。另外，还出土钱币一千八百余枚，除少数三晋布币和汉初半两钱外，多数是西汉五铢，也有少量东汉五铢。（戴尊德）

内蒙古自治区

敖汉旗兴隆村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夏季和秋季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

本年度主要发掘1号遗址Ⅱ区的东部。共发掘半地穴房址三千多所、灰坑一百四十多个和一段围壕。根据出土遗物初步判断，围壕和大多数房址及灰坑，属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似可将其称作“兴隆洼文化”。遗址曾发现红山文化遗存打破兴隆洼类型文化。围壕的现象，为确定这种文化在当地的年代下限提供了地层根据。已发现的各种遗迹和遗物，为深入了解兴隆洼文化的聚落布局特点及器物群等问题建立了基础。在10号遗址发掘的三间半地穴房址，亦属兴隆洼文化。

此外，4号遗址发掘的一间房址和一个灰坑，则属于另一种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其器物群与迄今所知的诸文化类型显然有别，这是尚需进一步探索的新问题。（朱延平）

清水县白泥窑子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6—9月
工作单位：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考古室

本年度在A、L两处台地上继续进行发掘，共揭露625平方米。由于在L点第2层发现新的第四种

文化，那么以往报道的白泥窑子第四种文化就应顺序改称第五种文化。如此，白泥窑子遗址五种文化的时代序列当为，第一种文化相当仰韶早期，第二种文化相当半坡晚期，第三种文化介于仰韶与龙山之间，第四种文化相当龙山期，第五种文化属青铜时代。A点位于白泥窑子部分，发现的房址五座，属于第一种文化。

L点位于白泥窑子沟东侧，其南有本年发现的六座房址、十四座窖穴和一条防护沟。主要收获是：一、在第2层发现斝、鬲、甗、盉、豆、折肩罐等陶片和BLF4"白灰面"房址，当列为白泥窑子第四种文化，时代大致为龙山期，亦即大口一期；二、发现了白泥窑子第二、三、四种文化的三叠层关系；三、以往对白泥窑子遗址第二种文化的认识，仅凭地面采集的遗物，此次除发掘出同类遗物外，还发现房址、窖穴、防护沟等遗迹，尤其是它的防护沟，系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中目前所知最早的防护设施。（崔璿）

额济纳旗西夏至元黑城遗址

发掘时间：1983和1984年

工作单位：内蒙古文物工作队

黑城位于额济纳河左河道下游，西北距达来湖波镇25公里，当地蒙古人称之为哈拉浩特。该城创建于西夏，元代扩建为亦集乃路，元末明初渐废。现今城墙仍高达10米有余，瓮城、马面、角楼、城堞保存基本完好，城内遍地都是废墟和灰堆。本世纪初，俄国人科兹洛夫、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等在此盗掘，获得大批西夏文、汉文以及其它文字写成的文书。解放以后，虽曾在此作过一些调查和小型试掘，但大规模地正式考古发掘，这还是第一次。

发掘重点主要在城内，包括大面积揭露晚期城市布局和开挖探方了解地层堆积情况，以及城垣的勘探和测量。同时还发掘了分布在黑城外围的几处墓地。一共清理房屋等建筑基址二百八十七间（所），发掘墓葬七十余座，总面积达一万一千多平方米。出土了一大批具有研究价值的文物，特别是大量文书残卷和残页、丝织品残件、元代纸钞等有机质文物，尤为可贵。部分文书集中出土于焚烧殆尽的总管府"档案库"内。文书中有公文、书信、契约、诉状、帐册、医方、日历、典籍、佛经等，多数为汉文，也有少量西夏文、畏吾

体蒙古文、八思巴文、藏文、波斯文等。城内还出土有天元二年铜印一方，系北元时期极为珍贵的文物。

发掘查明，黑城为早、晚两座城址叠压在一起的，早期的城垣被圈在里面，为西夏时期创建的城址。外围大城乃是元代扩建的亦集乃路故城。该城在北元宣光年间尚有人居住，天元以后渐废。

揭露的城市布局，当为亦集乃路晚期模式。城内主要大街、官署、寺庙、民居、店铺等布局，基本上都已搞清，结合文书中的有关记载，对研究元代中小城市的建制，无疑是一批极为珍贵的资料。元末，扩廓帖木儿（王保保）曾据守甘肃一带抗拒明廷，黑城为其重要基地之一，学术界对北元史实了解甚少，黑城的发掘将有助于开展对北元历史的进一步研究。（郭治中）

辽 宁 省

营口金牛山猿人化石

发掘时间：1984年9—10月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考古系旧石器时代考古实习队

金牛山位于辽宁省营口县（大石桥）永安乡西田屯村西，沈（阳）—大（连）铁路东侧，是一座拔地而起的孤立的小山，海拔69.3、周长1240米，面积不到半平方公里。

1974年，营口市博物馆进行文物普查时，在金牛山的东南坡发现了一处含有洞穴—裂隙堆积的动物化石地点，编号为A点。当年和1975—1976及1978年省、市文物考古部门联合先后进行过四次发掘，已挖到距堆积表面深约11米余的第6层，获得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人类用火遗迹和少量的石器。

1984年9月27日，旧石器时代考古实习队在继续下挖第6层时首先发现了猿人的髌骨化石，以后又陆续发现手、足骨化石。10月2日，在手、足骨化石东南约1米处，又发现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猿人头骨（缺下颌骨）化石，并在其附近找到尺骨、肋骨和髋骨残块，接着又清理出当时人类的居住面，包括叠压在一起的大量动物骨骼和牙齿、因敲骨吸髓打碎的动物骨骼和直径约半米的烧土、烧骨、炭屑等用火遗迹。

根据和猿人头骨同一层发现

的肿骨鹿和以前发掘在上部地层中发现的剑齿虎等动物化石观察，这个洞穴下部堆积的时代应为中更新世晚期。铀系法测定的年代大于二十万年。

猿人化石材料计有：头骨、脊椎骨、肋骨、尺骨、腕骨、掌骨、指骨、髋骨、跗骨、蹠骨和趾骨等共五十余件。属于人类发展这一阶段的化石资料，大多数都是国内外首次发现。据鉴定，全部人类化石材料代表了一个成年不久的男性个体。

金牛山猿人化石的发现，对于研究当时人类的体质特征，如脑的发育、胸廓的形状、直立姿势、行走步态、前臂的运动和手的灵活程度，从而研究其对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即研究人类发展这一阶段的历史和他们向智人过渡的情况，都提供了极为珍贵和可靠的资料。（吕遵谔）

东沟县后洼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3—1984年

工作单位：辽宁省博物馆、丹东市文化局、东沟县文化局

遗址位于该县马家店乡三家子村后洼屯东的果园台地上，面积约15,000平方米，文化层厚为1—2米。发掘面积为1935平方米。该遗址有上下两个文化层，发现房址遗迹四十五座，灰坑十九个，生产工具五百多件，可复原陶器三百多件。

后洼下层文化：陶器以含滑石粉夹砂红褐和黑褐陶为主，饰压印席纹、之字纹、网格纹、人字纹和少量刻划纹，器型有直口筒形罐、小口鼓腹罐、矮领广肩壶、碗、钵、勺、杯等。生产工具有石斧、石磅、石镞、石网坠、磨盘、磨棒、陶片网坠、陶片纺轮。装饰艺术品有雕刻滑石人头像和各种动物像。房址大小不一，大房址方形半地穴式，门朝东，室内中间有石块砌的灶址，周壁和室内有柱洞。小房址为圆形，直径在3至4米左右，中间有石块砌的灶址，周壁有柱洞。窖穴为圆形。

后洼上层文化：陶器以夹砂红褐和黑褐陶为主，含滑石粉少，器壁较薄，纹饰主要是刻划斜线纹、横线纹、人字纹、网格纹、点纹，器型有侈口深腹罐、小平沿深腹罐、高领圆腹壶、折腹碗。生产工具有打制石球、石网坠、石镰、石磨盘、石磨棒。装饰艺术品有陶塑人头像。

后洼下层文化虽与辽南小珠山下层文化有一定联系，但又出现不少新器类，有很多不同点，

因此暂称“后洼下层文化”。后洼下层文化的年代应在六千年以上，它是目前辽东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较早的一种文化。后洼上层文化是辽东地区新发现的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在海城、本溪、宽甸等地均有发现。它具有一定分布范围，其年代应在五千年左右。后洼遗址中出土不少滑石和陶塑的人头像和动物像，雕刻细致，造型生动，是罕见的艺术珍品。后洼遗址的发现，为研究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朝鲜半岛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关系提供了新资料。（许玉林）

兴城县仙灵寺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5—11月

工作单位：辽宁省博物馆

遗址位于县城西南，文家乡仙灵寺村西30—50米高的小山丘上。整个遗址呈不规则的长方形，南北长150、东西宽117米，现存面积17,550平方米。发掘从遗址东部边缘开始揭露面积800余平方米。发现有三个不同时期的文化堆积、遗迹和遗物，即金元时代，魏营子文化类型，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存。

发掘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半地穴式房址八座，其中三座保存完好。有长方形和圆形两种，面积均在15—20平方米之间。F_2房址内发现两个圆形柱洞，周壁及底均粘有以防柱头腐烂的碎陶片。灶址设在中央，地面平整，并经火烧。还揭露出同时期的两道残石墙和两段排水沟。在T4-5两个方内，发现了叠压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之上的魏营子文化类型的明确地层。并发现同时期的窑址二座。获得一批施附加堆纹花边的陶鬲口沿和许多印有三角凹纹的直领广肩大型红陶瓮残片。在第二、三排方内发现金元时代的圆形直壁平底窖穴二十六个。据初步统计获得不同时期的文物八百余件。其中有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青铜器五件，即铜耳环二件，铜环一件，铜镞一件，铜刻刀一件。石器二百六十二件，骨器三十八件，陶石网坠二百九十六件。还发现有玉饰、石贝、卜骨等。复原陶器五十余件，器类有甗、鼎、鬲、瓮、罐、盆、盘、豆、杯等。在文化堆积的最下层，发现的植物种子，有完整的榛子和油黑发亮的菜籽。

通过对仙灵寺遗址的发掘，使我们对锦州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内涵有了个初步了解，魏营子文化类型地层及其遗物的发现，为该文化类型的存在找到了

科学根据。这是研究夏家店下层文化、魏营子文化类型以及夏家店上层文化之间的关系的非常重要的资料。仙灵寺遗址出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五件青铜器，是东北三省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器，这是研究东北地区青铜文化的出现和发展以及和京津、中原地区的文化关系的难得的珍贵资料。（高美璇）

绥中县姜女坟秦汉建筑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辽宁省博物馆及有关市县文管所部门

山海关外约15公里的渤海之滨，有一簇礁石耸立在海面上，俗称"姜女坟"。文物普查时在姜女坟附近海岸，发现多处汉代遗址。1984年省、市、县组成考古队，试掘了墙子里、黑山头、止锚湾三处遗址。

墙子里遗址，主体是一方形人工夯土台，边长40米，四壁板筑陡立，筑于现地表下3米，筑高8米，方向南偏西5°，正对海中礁石姜女坟，相距约400米。夯土台之立面，全部用细沙堆护。夯土台上有建筑遗迹，遗存有大型柱础石。较大的一个长75、宽55厘米，呈不规则方形，础石周围有大量红烧土。遗址出有汉代云纹圆瓦当、"千秋万岁"瓦当，秦代几何纹半瓦当和夔纹大瓦当。夔纹瓦当复原一件，与始皇陵所出的相同，当面为大半圆形，直径52、高37、瓦尾长68厘米。还出了一些带有陶文戳记的碎瓦片。该遗址的范围和布局尚不清楚。

黑山头遗址，位于墙子里西2公里的海岸高台地上，是一处西汉时期大型望海建筑址，地势高敞，拔高19米。其南百余米海中突立两块礁石，人称"龙门石"。遗址在台地顶部，因施工遭破坏。主体建筑有土台基高约0.5米，在台基上，东西横列五个单元建筑，通长40、宽12米，土墙瓦顶。还有前廊、庭院、迴廊和斜坡土路。面积约2,000平方米（40×50），是一处多级台基的建筑群。发现成排柱础石六十余块，贮水井窖二个，排水管三条，大型花面空心砖三块。空心砖复原一块，长129、宽31、厚17厘米。

止锚湾遗址，位于墙子里东1公里，也是一处海岸高地。出土有汉代板瓦、筒瓦、云纹瓦当、花面空心砖等，也出有陶文的碎瓦片。

三处建筑遗址的时代相近，约当秦汉时期。这些建筑以"姜

女坟”为中心，构成一处相互关联的建筑群体。各建筑规模宏大，用料精致，非一般郡县所能办到，当是皇家级别建筑。《史》《汉》记载，秦始皇、汉武帝都曾东巡碣石。据此推测，这些建筑当是秦皇汉武东巡的“行宫”之类建筑，海中耸立的自然礁石——“姜女坟”就应该是古代碣石。（王成生）

抚顺高尔山高句丽山城址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辽宁省博物馆

在1983年的工作基础上，又在东城的西边缘新开一个发掘区，编号为FG84Ⅳ区，揭露面积1250平方米，一般下掘30厘米左右即为基岩，且许多探方内没有任何遗迹。

在Ⅳ区，揭露出高句丽时期的建筑址，一类是在基岩上整修后凿以柱洞，用灰白色粘土夯平地面，再加盖利用；另一类是用稍经加工的石块在原地表垒砌成墙，每个单位的房址内都有一曲尺形的烟道（取暖装置）、石臼和贮藏用的埋在地下的陶瓮。在一灰坑内，出土了十五件陶器、铁器和石器等。

1984年出土的文物比较丰富，已经复原的陶器计有盆、甑、瓮、盘、碗、壶、罐、器盖，纺轮和陶球等约百余件。铁制兵器种类繁多，有腰刀、矛、小刀、削、铲、甲片、蒺藜、弩机以及各式镞等约近五百件。建筑构件有铁钉、铁拉手、铁折叶、筒瓦、板瓦、瓦当、绳纹方砖和长方砖以及莲花纹和忍冬纹砖等。石器种类不多，有磨制光滑的石球、黑耀石三角体和砥石，也有石臼杵出土。出土的铜币除一枚隋“五铢”钱外，皆为唐代的“开元通宝”铜钱。这些建筑遗迹和丰富的出土文物，为我们深入地探索高句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都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孙力）

吉林省

白城市靶场新石器时代墓群

发掘时间：1984年8月
工作单位：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墓群位于该市西南约5公里的靶场中。这里地势平坦，南临白洮公路，发掘面积为600平方米。共清理墓葬五座。墓葬皆为土圹竖穴墓，没有葬具。从现存情况看，埋葬深度较浅，地表距墓底的深度仅有40—60厘米。皆为一次葬，但葬式较复杂。有单人仰身直肢葬，还有二人合葬和三人合葬（一成年男人与两个小孩）头向不一致，有北向，还有东向。随葬品较丰富。细石器、骨器量较多。有一座墓随葬近百件。细石器主要有长条石片、刮削器、镞、石柱等。骨器主要有骨锥、刀柄、骨角。磨制石器有环状石器、石斧等。随葬器物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一柄完整的骨柄石刀。该刀系用鹿角制柄，前部有一凹槽，内嵌一排压琢精致的长条石片。这是吉林省发现的最完整的一柄。同时还出土了几柄，尚有缺损。

墓群的年代当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偏晚一些，距今约4,000年。（刘景文　王侠）

前郭县青山头新石器时代墓葬

发掘时间：1984年7月
工作单位：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青山头位于该县穆家乡查干泡南岸。清理了一座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墓葬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葬式为单人仰身直肢。随葬品有白石管和一些骨器。人的骨架较完整，有一定程度的石化。（刘景文　王侠）

桦甸县江西屯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5月
工作单位：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遗址位于濒临第二松花江的

一座山坡上，面积约15,000平方米。遗址因多年垦殖，水土流失严重，文化堆积已被破坏，大量的石器暴露在地表。在地表下20--40厘米，还能见到一些红烧土痕迹。遗物有石器和陶片。石器有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打制石器为多。打制石器器形较大，加工粗糙，有石斧、石锄、石铲、石锛。磨制石器有长方形石斧、石锛、叶状石镞等。一种两边斜磨起脊刃部扁薄的大型石锛，很有特色。石器都取材于江边的河卵石，还发现一些稍做加工的石器半成品。遗址还出土一些大小不等的黑耀石刮削器。陶片数量较少，无完整器物。大部为夹砂红褐陶。口沿多为直口，器底多平底，有少量瘤状器耳。

遗址的年代为距今约3000余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刘景文 王侠）

农安、德惠两县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调查时间：1984年4—5月
工作单位：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遗址多位于第二松花江支流的二级台地上，散布的遗物颇多，其中包括大量的陶片和少量的石器、骨器等，内容丰富，对了解本地古代文化提供了一批新资料。经初步整理和与已发表的文献资料比较，将采集的遗物大体上分为六个文化类型（见《北方文物》1985年1期）。兹简述如下：

A类型：因仅发现于农安县左家山遗址，故又称“左家山类型”。

陶质有两种，即夹蚌砂质陶和砂质陶，前者的数量相当于后者的五倍。均手制，泥圈套接，火候较低，多呈褐色。前者以素面陶为主，而后者则以纹饰陶为主。纹饰可分为划的和压印的两种。前一种有直线人字纹和之字纹、回纹、三角纹和菱形纹；压印的有弧线之字纹、连点纹等。之字纹有横行、竖行和斜行的，与新乐Ⅰ期文化的同种纹饰作风相近。器形有罐、钵、碗等，其中有一件已经复原的筒形罐，通高30厘米，上施直线人字形划纹等，制作比较规整。属于该类型的还有若干磨制石器和骨器等。

B类型：发现于大青嘴、二青嘴等地。

陶质与A类型相近，同时又有区别。此外还有少量红衣陶。主要器形有罐、钵、碗等，器壁较薄，形体一般不大。此类型相当于吉林市郊古代“文化一”及“第二松花江流域新石器时代”

部分遗存。

C类型在德惠、农安两县均有发现，其内涵大体上相当于已知的西团山文化遗存。

D类型仅发现于农安县境内，相当于“汉书文化”（“白金宝文化”）遗存。

E类型的遗物与我专业1974年在田家坨子发掘的F1出土物相同，并与吉林市郊古代“文化三”有密切关系。

F类型在德惠、农安两县均有发现。虽然陶片数量不多，但是陶质、纹饰和器型都较特殊。最突出的特点是器物口沿以下施有切压锯齿状的泥条堆纹，与已知的“勿吉—靺鞨陶器”上的堆纹有相似之处。

总之，A、B和F类型的发现是这次调查的主要收获。前者的发现，对研究第二松花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显然是一批重要材料；F类型的发现，则为进一步研究“勿吉—靺鞨陶器”及其与该类型的关系，提供了实物资料。（徐光辉　陈全家）

德惠县北岭古代墓葬

发掘时间：1984年6、7月
工作单位：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墓葬二座，所在地东距松花江1.5公里，北距饮马河0.5公里，在一处土岗的南坡。墓葬开口仅距地表15—20厘米，皆为无葬具的土圹竖穴墓。一座头向西北，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另一座为二次葬，墓向为东南西北向。随葬品只有成组的陶器。陶质为砂质陶，手制，器表打磨光滑，多为素面或只饰弦纹。器耳和镂孔发达。富于特征的是豆和罐。豆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大敞口浅盘；另一种是敛口鼓腹矮罐式。两种豆的外腹壁上多饰瘤状或桥状耳。豆把较高，近喇叭状，上面有成排的三角形或圆形镂孔。陶罐为多敛口鼓腹小平底，腹部有对称的桥状竖耳。这种形式的陶器及其组合，在吉林省还是首次发现。至于认识这种文化的完整面貌，还有待今后的工作。墓葬的年代约在战国到汉之间。
（刘景文　王侠）

集安县高句丽及渤海墓葬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为配合公路建设和修筑江

堤，清理墓葬一百三十六座，其中有高句丽时期的积石墓和小型封土墓，有渤海时期的封土洞室墓。较大的积石墓有边箱，内放随葬品，这是过去的高句丽积石墓所不见的。出土器物四百四十件，有金、银装饰品，铜鎏金装饰品，铁器和陶器。铁器中鱼钩数以百计，陶器中网坠较多。

（刘景文　王侠）

浑江市永安渤海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遗址在浑江上游的汤河边上，为渤海时期的村落。发掘面积425平方米。发现房址六座、灰坑三十三个、灶址十四处、出土各类文物近千件，其中陶器十七件，其它小件器物二百七十三件。陶器中以两件斜口器为罕见。（刘景文　王侠）

集安县金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为配合修筑江堤，发掘1,500平方米。共有上下两种文化层。上层为金代四处房址，出土三十余件陶器和瓷器以及钱币。在房址中发现了取暖设施。下层为高句丽文化层，有零碎陶片和灰色瓦片。未发现重要遗迹。

（刘景文　王侠）

黑龙江省

泰来县平洋砖厂青铜时代墓地

发掘时间：1984年7—9月

工作单位：黑龙江省文物考古队

墓地东距平洋镇约2公里，分布在一条南北走向的土岗的北部，共计发掘九十七座。

墓葬形制均为土坑竖穴，多呈长方形，略呈方形的系埋葬人数多者，仅两例。中小型墓占绝对多数，小型墓一般长1.06—1.9、宽0.4—0.95米，中型墓长

2—2.5、宽0.5—1.3米之间。多无葬具。方向大体自270°至360°。葬式可分一次葬和二次葬，单人葬和二、三人的合葬，也有一次葬和二次葬共存于一墓的现象。一次葬和二次葬并行。单人一次葬的数量远远大于合葬墓。一次葬者基本为仰身直肢，头向西北。二次葬的墓中有的个体骨架堆放有序，肢骨、肋骨、髋骨等摆在下面，其上置头骨。就墓主性别和年龄而言，无论单人葬还是合葬，抑或一次葬，男女老少单独和共处一墓的例子都有。二次葬的同一墓中也不分性别年龄。

出土遗物总计达一千五百余件，青铜制品约占半数以上，主要为小件饰品，生产工具或兵器，如锛、矛、刀、镞等极少。其次是玉、石、金、银等各种质料的装饰品。骨镞型制相当多，骨弭亦有发现。石、铁器微乎其微。陶器近总数的十分之一，施红衣或彩绘的占一定数量。陶器组合基本为壶、钵（碗），一次葬墓多摆放在头骨上端。70号墓出土的鸭形三足器，腹部由篦点组成连续矩形图案，造型比较奇特。该墓地出土的三块动物纹青铜透雕牌饰引人注目。一块是鎏金立马纹，一块为虎口衔兽头纹，另一块可能为奔鹿纹。三块牌饰均无边框，前两块已近图案化，后一块具有写实风格。还有两组成套的饰件，十分难得。50号墓四十岁左右的男性墓主胸骨上端是一块鎏金立马纹铜牌，铜牌左侧相连两枚绿松石珠，其下衔一块长方形金片；右侧缀一枚骨环，下亦衔一块长方形金片。金片下再串以长圆铜管和灯笼形铜管相间的铜饰件，沿肋骨两侧直到髋骨下端，无一缺失。28号墓2号女墓主胸部的一条半月形饰带是由十八枚齿状饰排列组成的，从饰件背面上下两个细小穿鼻推测，应是缝缀在衣服前胸的。

墓中盛行殉牲习俗，经鉴定有马、牛、羊、狗、猪、兔等。初步判断是一种属于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的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杨志军）

肇源县卧龙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9—10月

工作单位：黑龙江省文物考古队

卧龙村位于肇源县西北71公里，地处松嫩平原中部、嫩江下游左岸。遗址在村西南南北西三面为湖泊所围的岗地上，高出湖岸20余米，面积约2万平方米，揭露面积400平方米，清理半地穴式房址三座、土坑竖穴墓三座和各类灰坑三十个。

遗址文化堆积较薄，据出土遗物及地层关系，可将遗址分为两期。第一期以筒腹高裆鬲及夹蚌末陶筒形罐为特征，属于这一期的遗存较少。第二期以大口矮裆鬲、束腰支座以及红衣陶器为代表，并出土了小件铜器。发掘的大部分遗存都属于该期。

遗址文化堆积中大量的鱼蚌残骸和在生产工具中占较大比例的鱼镖、鱼钩、网坠等，反映了当时捕捞业在经济生产中占主导地位。另外，还发现了较多的狗、猪、牛、羊等动物骨骼，表明畜牧业亦较发达。

据初步研究，卧龙遗址第一期文化特征接近松嫩平原青铜时代的白金堡文化，时代大体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西周中期至春秋时期。第二期遗存从文化面貌上看，接近松嫩平原的白金堡文化，时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战国至汉代的汉书二期文化。

通过对卧龙遗址的研究，可以丰富对松嫩平原古代文化的认识，有助于解决其青铜—早期铁器时代的文化分期问题，进而为确立古代文化编年奠定基础。

（乔梁）

上 海 市

青浦县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3年12月—1984年1月

工作单位：上海博物馆考古部

发掘5×10米的探方二十个，面积1,000平方米。通过这次发掘，主要收获有：

一、搞清了福泉山这一土墩的形成。根据T11地层的断面来看，在表土层下的第1层灰黄土层中包含有四千余年前的晚期良渚文化墓葬；第二层灰黑土层中有大量6千年前的马家浜文化、个别崧泽和良渚文化遗物；第三层黄土层有早期良渚文化遗物。这三层都是经过翻动的堆土。第4层黑土层有5千多年前崧泽文化的墓葬和遗物；第5层青灰土层，是属于马家浜文化晚期至崧泽文化早期的遗存；到底层是灰白色的生土层，遗址和墓地的堆积厚达7.8米。根据第1、2、3层的土色和土质杂乱、时代颠倒的情况来分析，这是一座良渚文化时期人们堆筑的土山，与埋葬比较特殊的良渚古墓有关。

二、合计发现了古墓葬五十

七座，其中新石器时代晚期崧泽文化墓葬六座，良渚文化墓葬六座，战国墓三座，汉墓四十座，唐宋残墓各一座，出土石、玉、陶、瓷、铜和料器等九百余件。

崧泽文化墓葬中，五座系平地掩埋，一座有长方形浅坑，有土坑的一座T8M4以二块凹弧形的大木上下盖合作葬具，葬具外侧随葬陶罐、豆各一件，葬具内人骨尚能辨别痕迹，头向南，在头前有陶罐、豆、盘、杯和玉环各一件，右手旁有石斧一件，足后有凿形足陶鼎一件。随葬器物具有崧泽文化晚期特征。平地掩埋的T8M3为三人合葬墓，中间一具仰身直肢，系成年男性，左右二具都向中间侧身，作依偎状，右侧个体是少年，性别无法确定，左侧个体是儿童。这种以男性为中心的葬式出现，为探讨福泉山崧泽文化时期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良渚文化墓葬中，有四座保存完好，二座被后期严重扰乱，有三座发现明显的土坑痕迹。如T21M4一座，土坑长400、阔170、深390厘米，坑口露于灰黄土层下部，坑内有二具南北向的葬具痕迹，木板条纹清晰，并有硃红色彩，葬具内人骨亦仅能辨认痕迹，头向南。随葬器物，右侧一具有陶鼎、豆、罐、壶，玉璧、璜、佩、坠、珠、管、斧、锥形器、带钩以及石斧、刀等；左侧的一具有陶壶、罐和石斧等。象这样大型而又保存完好的良渚墓葬，在江浙一带尚不多见，而且每座都有大量精美的玉器随葬，说明这里是良渚文化时期人们的一处特殊葬地。

战国墓三座都用土坑埋葬，在表土层下打破包含良渚文化遗物的灰黄土和黄土层，例如其中一座T25M1，深2.72米，西部陪葬有泥质灰陶鼎、豆、壶、盒各二件，罐一件，鼎呈长耳、高足、扁腹带盖，具有楚器特征，壶也仿制铜器；东部为人骨架，头向北，头顶和左侧有大、小玉璧各一件。三座战国墓的发现，对于研究楚灭越以后的上海地方历史有重要作用。（孙维昌）

江苏省

江苏等地郑和史迹和文物的调查

考察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上海大学考古与博物

馆专业

为迎接1985年纪念我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首次下西洋（明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公元1405年7月11日）五百八十周年，上海大学文学院（原复旦大学分校）历史系与上海市航海学会合作，在1984年内对国内尚存的有关郑和的史迹和文物进行了一次较全面的调查和研究。他们先后分赴郑和的故乡云南晋宁、第二故乡江苏南京，以及其它与郑和和郑和海航有关的地点江苏太仓，福建长乐、莆田、泉州、厦门，山东德州，陕西西安，北京等地，与有关的专家、文物考古工作者举行了座谈，拜访了郑和的后裔，实地调查了有关的史迹和遗物，拍摄了大量的照片资料，制作了一套彩色幻灯片，完成了《郑和史迹文物选》和《郑和研究论文资料选》两书（即将由交通出版社出版）。（袁俊卿）

东海县爪墩细石器遗存

发掘时间：1984年春季
工作单位：南京博物院

遗址位于东海县山左口大贤村西南2公里的爪墩山南坡。遗址面积约3万平方米，表面为厚不到1米的土黄色亚砂土堆积，覆盖在晚白垩系王氏组（K_2W）中——巨厚层细砂岩岩层之上。

地表采集和试掘出土的石制品近二千件，其中以间接压制法产生的细石器为主，直接打制法制成的石片石器较少。制作石器的石料多用燧石、石英砂岩、脉石英，少数为水晶、石英。这些石料绝大部分取自遗址附近的冲积砂砾石层。

细石器的主要类型有楔状石核、柱状石核、锥状石核、船底状石核、刮削器（其中以圆头刮削器数量较多），石核式刮削器、尖状器、石镞、石钻等，细石核和石镞的石坯也占有一定比例。石片石器有刮削器、尖状器、石球、砍砸器和石锤等。

爪墩遗址为远古人类加工石器的场所。文化层内虽未发现共存的动物化石和其它可资测定年代的材料。但由于未发现陶器和磨制石器，石制品的加工技术和石器的类型与山西下川文化比较接近。因此爪墩细石器遗存的年代可能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后一阶段。（张祖方）

昆山县少卿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苏州市博物馆、昆山县文化馆

由于开拓千灯—石浦公路，将少卿山劈去一半，暴露了良渚晚期的墓葬，出土了玉琮、玉镯、玉斧等珍贵文物，随即进行了调查和试掘。

遗址原面积为40000多平方米，现被严重破坏。仅存300多平方米，高8米。离地表近4米还是文化层。有崧泽中晚期、良渚早期和良渚晚期的堆积。（钱公麟 朱薇君）

苏州市横塘星火印纹硬陶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秋
工作单位：苏州市博物馆

遗址系在运河拓宽工程中发现。地层堆积如下：第一层为耕土层，出土了汉、六朝、唐宋时期的遗物；第二层为黄土层，出土西周、春秋、战国的遗物；第三层为黑炭层，无任何遗物；第四层为灰黑土层，出土商及同上海马桥四层相同的大量桔皮红陶器残片及鼎足等遗物。

遗址面积相当大，范围将待今后进一步调查核实。（钱公麟）

苏州市上方山六号土墩石室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苏州市博物馆

六号墩是苏州市西南12.5公里的上方山楞伽塔寺塔西山脊上的第六个墩。1981年经过清理发掘，本年又进行第二次。墩高7.15米，底部面积42×28米。墩中西部内有一石室，室前有通道。石室顶部由大、小石块犬牙堆积而成，上为十块大石块压顶为盖。室内最高5.5、连顶高6.15、长9.6、宽为1.84米。通道长10、宽1.8—2米。其石室南壁和顶盖大部分倒坍。方位252°。

出土遗物有几何印纹软陶罐、硬陶坛、罐和原始青瓷的瓿、罐、盘、壶、鸡形壶、豆、盂、器盖及红陶纺轮等三十四件。

遗迹壁上有烟炱、泥条盘筑的灶、木炭、兽骨等。

六号墩是目前太湖流域山脊

上所发掘的土墩石室中最大最高的一个，且其后壁处于墩的中间。（钱公麟）

苏州市吴城春秋遗址

发掘时间：1983年4月—1984年1月

工作单位：苏州市博物馆

遗址位于市郊横塘镇西南磨盘山上（今上方山）。这里历史上曾有“鱼城”、“吴城”的记载。1983年调查时发现有整齐的夯土堆积，同年4月开始对该遗址进行试掘。

该城的东、南两部分早已被开采石头破坏，残剩西、北两部分。城墙依山而筑，残高4.15米（指试掘探沟中夯土城墙堆积高度），全为夯土堆积而起。在试掘过程中发现了夯土层、圆形夯窝，出土了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陶片和小件石器等。这些夯土层，土质坚硬，结构紧密，层次分明，建造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由于试掘范围较小，对该城的建筑风格和布局还很不清楚，就其城中出土遗物和建造的某些特点来看，其建造时代大约为春秋时期。（朱薇君）

丹徒县背山顶春秋墓

发掘时间：1984年5—8月

工作单位：南京博物院、镇江市博物馆、中山大学考古专业、丹徒县文管会

背山顶位于丹徒大港镇西南约3公里，墓葬即位于该山的顶部。土墩（即封土堆）底径34、高5米。去掉土墩，即现出平面呈刀形的土坑竖穴墓室，随葬器物主要出自刀把形的墓室内。

墓内出土遗物大小共计四百十三件，绝大部分为青铜器，主要遗物有铜编钟一套（七件），铜编镈一套（五件），石编磬一套（十二件），铜鼎三件，铜缶二件，铜錞于三件以及铜车马具和兵器等。其中有铭文的铜器十五件（包括全部铜钟、铜镈及铜鼎、铜缶、铜戈各一件）。

钟、镈铭文相同，均为七十二字。从铭文中可以看出这批铜器既有徐器，又有吴器。在研究春秋后期吴王世系，吴国和徐国的关系上，这批铜器的出土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纪仲庆）

苏州市内战国至宋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苏州市博物馆

本年度配合基建对城内的遗址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发掘，主要遗址有城西南盘门三景遗址，面积达1,000平方米，地层分四层，分别有战国至汉、唐各时期遗物出土。道前街遗址，在城东西横贯的马路的西侧，长约1公里，宽10米左右，最深到8米。暴露地层分三层，出土遗物包括汉、六朝、唐、宋以来的遗物。东吴纺织厂遗址在城中，面积约为300多平方米。地层分三层，最深达5.5米；出土遗物包括汉、六朝、唐、宋以来各时期的遗物。其他诸如城东北丝绸印花厂、新苏纺织厂、大公园的遗址，都出土了不同时期的遗物。通过对这些遗址的发掘和调查，使我们更进一步了解苏州城的建城年代和其发展。（钱公麟）

苏州市新庄汉徐福墓

发掘时间：1984年5月

工作单位：苏州市博物馆

墓葬位于苏州城西北约4公里新庄新村中的一土墩之下，土墩高4.5米，径约20米。在土墩挖到齐地表时，发现一座竖穴土坑墓。上面封土没有夯筑痕迹，在其左右上方各发现一小型土坑汉墓。在距墓底80至90厘米处发现8至12厘米厚的灰层。

其墓为双人合葬墓，长3、宽2.6米；方向185°。有西边厢和脚厢。棺及人骨架已腐烂，仅见红漆皮。东棺发现铁刀、剑各一和泥印章一块，正面镌刻“徐福”二字，反面为“徐中孺”。

边厢、脚厢共出土青铜锫、盆、釜、匜等六件；釉陶罐、锫、壶、鼎、盒、钫、灶、甑、釜、仓、屋、灯、洗、匜、耳杯、勺、樽、薰及腹部有蓖纹的瓮等四十二件；另有漆器均已腐烂，仅见漆皮，形状为耳杯和盘。

新庄是苏州城西汉墓群较集中的一个地区。已发掘达数十座之多，从各墓出土情况比较，此墓是最完整的，其年代约宣、章时期。（钱公麟）

南京市陆营汉墓

发掘时间：1984年2月28日—3月8日

工作单位：南京市博物馆

墓葬位于大厂区长芦乡陆营大队陆中小队（扬子乙烯工程工地），为西汉晚期的长方形土坑竖穴木椁墓。该墓一椁单棺二厢，木椁长3.16、宽2.6、高1.40米，椁板厚0.20米，木棺用整木凿成。

该墓共出土釉陶、陶、漆木、铜、铁、玉石等质地的随葬器物十九件，其中自棺内出土的一把剑具保存犹好，剑茎绳索缠绕，剑鞘髹漆如新；一件铁斧，铁质较好，虽已逾时近二千余年，然锈蚀极轻微。还出土汉半两，带“半星”、“一划”及剪轮等各类五铢钱一百枚。

南京市大厂区与南京城隔江而望，以往在其邻近的仪征、扬州及盱眙和安徽天长等地区，曾发现过大批的汉墓，该汉墓的发现填补了汉代文化在这一区域上的空白。（周裕兴）

南京市郭家山东吴纪年墓

工作时间：1984年6月18日—7月7日。

工作单位：南京市博物馆。

郭家山位于南京北郊，南距中央门1.5公里，北距幕府山1公里，为六朝东吴、东晋两时期重要的墓葬区。该墓系用长30，宽15，厚4厘米的长方形青砖砌成。墓分前、后两室。平面呈双“凸”字形。方向南偏东20°。墓全长7.60米。前室穹窿顶，长2.40、宽2.40、高1.15米，设左、右耳室。后室券顶，长3.60、宽1.75、高1.10米。地砖二层，斜铺呈人字形。随葬遗物有：青瓷扁壶、罐、虎子、水注、碗、陶屋、灶、罐、碗、金指环、钗、铜钵、钱、铁斧、臿及地券等四十余件。这批出土的器物中如：青瓷扁壶，虎子和蛙形水注，制作精致，釉色晶莹，均为东吴青瓷器中的精品。另外，该墓所出的一方砖刻地券，不仅对了解墓主人身份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而且对器物的断代也增添了新的依据。

附地券文：“□□立武都尉吴郡陈重今于莫府山下立起冢宅从天买地从地买宅雇钱五百东至甲乙南至丙丁北至壬癸西至庚辛

若有争地当诣天帝若有争宅当诣土伯如天帝律令。永安二年十一月五日券”。（阮国林）

南京市前新塘村南朝墓

发掘时间：1984年12月22—27日

工作单位：南京市博物馆

该墓位于尧化乡前新塘村尧城生产队南面的小山坡上。墓平面呈凸字形，墓室两壁及后壁微外弧。券顶，青灰砖砌成，方向63°，全长8.23米，分甬道和墓室二部分。甬道中段两壁残存门槽，原先当有木门。室内砌有棺床和石板铺成的祭台。墓室左右后三壁共砌有五扇直棂假窗，窗上又各有凸字形壁龛。墓曾被扰乱过，但器物组合仍完整，计有瓷质的碗、盏，陶质的灯、香熏、凭几、俑、盘、钵、勺、耳杯等三十余件。其中陶灯，由座盘、灯柱、盏托、罩子等四部分组成，并由小瓷盏套在盏托内，结构合理，造型优美。为本地区所少见。该墓对研究南朝时期墓葬的器物组合有一定的意义。（陈兆善）

南京市司家山南朝墓

工作时间：1984年9月6—17日

工作单位：南京市博物馆。

司家山位于市南郊中华门外15公里，地属雨花区，铁心乡。为南京地区六朝墓葬较集中的区域之一。该墓系用长34、宽17、厚4厘米的素面长方形青砖砌成一座平面呈“凸”字形的砖室券顶墓。方向165°。墓室长5.12、宽2.23、高3.15米。墓室采用三层平砖，一层竖砖侧立的砌法，共七组，上面再用三层平砖，一层侧立的楔形砖起券。墓室的左、右壁各设直棂假窗二个，后壁一个，上均置双“凸”字形小龛。墓室地面的后半部设砖砌棺床，上置四块石质棺床，左、右各二。甬道长2.38、宽1.23、高2.35米，采用三层平砖，一层竖砖侧立的砌法，共六组，上面平砌三层，用楔形砖起券。地砖共三层，斜铺呈人字形。随葬的遗物有青瓷盘口壶、鸡首壶、碗、陶俑、盘、钵、镇墓兽、石俑、祭台、墓志等二十余件。其中一件长方形、半圆首的石质墓志（志文全部风化泐失），以石龟为趺，形状和南京地区保存在地

面上的梁代神道石碑相似。墓内随葬以龟为趺的墓志，在梁、陈之际规模较大的墓中曾有过发现，但为数极少。这种墓志应是地面神道石碑的缩影，和墓主人的身份、地位有关。根据墓葬结构和出土器物的特点，该墓的时代大约在南朝初期。（阮国林）

扬州市南通西路唐代城垣遗迹

发掘时间：1984年8月

工作单位：扬州博物馆、南京博物院

扬州博物馆在扬州市南通西路基建工地发现古代城垣砖包墙遗迹，砖墙厚1米，自下而上收分砌成，所用城砖长40、宽20、厚5厘米，部分砖上有戳印铭文，如“歙州”、“常州”、“楚州”等，其规格和铭文书体与以往扬州唐城遗址考古发现的唐砖相类。鉴于这一城垣遗迹，位于明、清时期扬州旧城南城墙外缘，当南门大街外即旧城南门宠江门东侧附近，推测其时代不晚于宋，以唐代遗迹可能性为大。经过近4个月的发掘，目前已揭露面积约2,000余平方米，发现的遗迹有东西向，长约80、宽约8米的扬州唐城南墙土城垣遗迹；南门门道一侧及其门道附近内外砖包墙垣遗迹；有位于门道之外，其平面为长方形的砖包瓮城遗迹；有距南门门道约60米，凸出城墙体的马面遗迹。据其地层叠压关系，唐代扬州南门故址为宋、元、明、清历代所沿用。其中诸如北宋初年扬州南门的凸出墙体的砖包城墙及其散水，宋元明清时期层层相叠，关系清楚的砖砌路道，都较好地保存着。尤其是瓮城门道遗迹建筑用发券形式，而不用过梁，这在全国来说，尚是最早的实例。

扬州唐城南门及其瓮城遗迹的发现，有着重要意义。以往，关于扬州城范围的记载不一，如日僧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扬府南北十一里”，而北宋沈括则记载扬州唐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今人在研究唐扬州城范围时则分歧更大；这一遗迹的发现，不仅为研究扬州唐城的南界提供了可靠的考古学资料，而且对于扬州城建城史和古代建筑史等方面，都提供了新的资料。（王勤金）

扬州市蜀岗唐城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5—7月、9—11月

工作单位：南京博物院

南京博物院结合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田野考古实习，在扬州市蜀岗上铁佛寺一带进行了两次发掘。第一次试掘了110平方米，第二次发掘490平方米，两次共发掘600平方米。探方位置主要布在扬州蜀岗上古城的南缘，古邗沟的北侧和西侧。共分为三个发掘区：一区在铁佛寺正南，二区在铁佛寺西南，三区在铁佛寺东北。

文化层堆积，一、三区均厚2.5米左右，主要为唐、宋时期的堆积，二区文化层厚达4.5米，包含有汉、唐、宋、明各个时期的堆积。发现的主要遗迹有初唐、中唐、晚唐至宋的砖铺房基各一座。其中以三区发现的晚唐至宋的房基规模较大，出有莲花纹瓦当和大量戳印有“官”、“官人”、“官田”、“官林”等文字的瓦片。可能是一处官衙或私邸建筑。此外还发现与冶铸有关的唐代炼炉遗迹六处，唐代小砖窑遗迹一处，东汉至六朝砖片和唐代土井各一口，墓葬十六座，其中除一座为东汉瓮棺葬外，其余均为北宋和明清的小墓。

这次发掘对研究扬州古城的范围、布局、兴废等问题提供了一些新资料。

1.根据沈括《梦溪补笔谈》，铁佛寺一带正当唐代作坊桥的附近。此次发掘发现了唐代的冶铸和砖窑遗迹，可以印证。

2.铁佛寺后面的高阜曾被人疑为唐代子城的南墙，这次在这一带发现了汉、唐文化堆积层和房屋基址，证明这一带不是城墙。发掘者根据对地形的观察，认为这一带的子城南墙可能尚在其北部堑壕的北岸，不过尚有待进一步证实。

3.发掘区密集北宋和明清小墓，说明这一带在北宋曾一度荒芜，明、清之时扬州城市全部转移蜀岗以下，这一带已成为荒郊僻壤。（尤振尧　谷建祥）

太仓县双凤明墓

发掘时间：1984年8月

工作单位：苏州市博物馆

清理的墓葬属明崇祯年的施贞石夫妇合葬墓，墓为浇浆木椁

墓。

墓中除一般随葬器物外，还出土《古今孝》、《居家必用大全》、《尺牍清材》和《□字文汇体》等四部古籍。（钱公麟）

浙江省

绍兴市马鞍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4--7月

工作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遗址位于绍兴市以北17公里处的马鞍山西北坡下，北濒杭州湾。遗址范围约6,000余平方米。本年度发掘400余平方米，获得编号器物一百二十余件，出土文物中石器有箭头、刀、凿、耜冠、戊、砺石等；玉器有管、珠、锥形饰、镯等装饰品；陶片以夹砂红陶、泥质灰陶和泥质黑皮陶为主，纹饰采用镂孔和附加堆纹手法，其余均为素面，器形有鼎、甗、鬶、豆、罐、盆、盘、壶、杯、瓮、器盖等，并发现红底黑彩的彩陶片三片（为一件壶的残片）。据野外初步认识，陶器以横断面呈“丫”字形足的鼎，形式多样的豆和大圈足的盆组成最常见的器物群。

从出土物分析，马鞍遗址的文化面貌与良渚文化有较多的相似之处，与河姆渡文化的后续关系如何有待工作的深入探讨。马鞍遗址的发现和清理，对古越文化的探源提供了重要线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金衢盆地商周原始瓷遗存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金华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通过文物普查（复查）和抢救性发掘，在金衢盆地，发现以印纹陶为特点的遗址、遗存共一百九十五处，大部分均伴出有原始青瓷。抢救性发掘中出土了一批完整的商周原始青瓷器，商晚期有豆；西周早期有尊、筒形罐、盂、罐、豆等；西周中期有尊、盉、簋、罐、盂、豆等；西周晚期有盉、盂、盘、豆、鼎、罐、碗等；春秋战国有筒形罐、罐、碗、杯等。

各时期装饰特点，商晚期器

型以小型为主，均素面无纹饰；西周早期器型品种增多，纹饰以通体弦纹为主，并流行贴饰双小泥饼；西周中期除承袭上期纹饰外，出现刻划纹饰，如弦纹、篦纹、篦点纹、网格纹，曲折纹等，贴粘装饰出现S形泥饼；西周晚期通体弦纹和双小泥饼装饰消失，流行刻划纹饰和S形泥饼装饰；春秋战国时期的小型器物多素面，内底多旋纹；大型器物体表拍印几何形纹饰。

工艺特点：胎质均用瓷土，早期原始瓷胎，颗粒较粗，呈灰白色，因此成型后胎壁较厚。西周胎质有较大改进，已采用淘洗方法，胎质较细，器型器壁较薄。成型方法：采用泥条盘筑，然后用慢轮修整；工艺商代较粗，西周以后较规整；春秋以后出现大型器物，如簏形罐等。釉色，商至西周早期均为青釉；西周中期以青釉为主外，出现褐釉，釉层前期较薄，西周中期后较厚。施釉工艺，西周早期已出现内外满釉器物，外底心用泥点支烧的较先进的工艺。（金华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海宁县夹山商周土墩石室结构遗存

发掘时间：1984年10—12月

工作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发掘地点位于海宁县表花镇以东5公里的夹山村与镇东村交界处的审坟山（海拔106米）和夹山（海拔91米）山脊上，向南远眺可见杭州湾，相距约5公里。当地估计原有土墩五、六十座，这次经踏勘调查，尚有三十四座，统一编号为“海夹D1—D34”。本次发掘了十七座（海夹D1—15、D17、18），分布在长约0.5公里的审坟山山脊上，两墩之间相距最远者约百米，最近者墩底相连。此类土墩或土墩石室结构遗存，是指在山脊、山顶上突出地面的土墩，这些土墩有的仅用泥土堆封起墩；有的先用大小不等的块石砌叠成长弄状的石室，再封土起墩。土墩的外观一般成椭圆形隆起，其大小、高低较悬殊，大者如D1，墩底最大径达40米左右，高达5米；小者如D12，墩底直径8米左右，高仅60多厘米。在每座墩内都发现了以印纹陶、原始瓷为主的器物，有的还有少量夹砂陶、泥质陶、磨石、线垂、小件玉饰品等。主要器形有瓮、罐、豆、碗、盂、钵等。时代跨度较长，大致从商周之际至春秋中晚期。往往在一个墩内有不同时期的遗物。

本次发掘初步收获如下：

一、土墩的分布排列似有一定的选择。这里的土墩都位于山脊的峰脊上，平缓地段排列紧密，陡坡处则空缺。土墩的方向绝大多数是东西向，封门朝东或朝西则无定规．总之绝大多数与山脊走向垂直相交，仅有D15与山脊平行，呈南北向。在土墩的位置上大多能望到杭州湾、钱塘江口的水域。

二、有石室土墩和无石室土墩错杂分布，内涵一致。由于我们对这里山脊上尚存的全部土墩统一编号，逐一发掘，一座不漏，确证有石室土墩和无石室土墩是错杂分布的。已发掘的十七座墩中七座有石室，十座无石室。而在封土结构、包含遗物等方面基本相同，说明两种形式的土墩在内涵上是相同的，似乎仅在有否构筑石室上有所不同。

三、我们对每个墩的封土采取了发掘遗址文化层的分层剥揭法，从土质土色变化上注意封土的层次划分，发现并找出了同一墩内的不同封土层的范围，确证了同一墩内有相互叠压或打破的不同封土层，这一现象的确立为判断不同时期的遗物和器物分期找到了可靠的科学依据。

四、绝大多数直接封盖器物的封土是灰白色或深褐色的“混凝土”，极其坚硬，渗结到岩缝、器内。这种“混凝土”透水性极差、密封性强，显然不是就地取用的原土。是本次发掘中发现的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新情况。

五、本次发掘共获得遗物四百余件，以原始瓷和印纹陶为大宗，约占百分之九十，基本器物组合为印纹陶瓮、印纹陶罐和原始瓷豆（或原始瓷碗、原始瓷盂），各类器物在器形、纹饰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发展演变关系。从地层关系和器物变化两方面为这类土墩石室古遗存的分期、内涵等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上虞县严村西周至明代墓葬及商代窑址

发掘时间：1984年6—8月

工作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墓葬位于上虞县城之东南5公里的凤凰山。共清理西周—明代的墓葬二百零四座，出土文物约一千三百余件。

战国墓葬占本次发掘的百分之二十五。其形制除一座系石室结构外，余者皆为竖穴土坑墓，形状绝大部分为长方形，亦有凸字形或不规则者。这类墓往往开

口较低，一般不超过50厘米，从保存较好的M115来看，原有较低的封土。墓的规模有大、中、小三种，以大形墓为最多，小型墓仅二座。一般大型墓规格为450×250厘米左右，墓内随葬品皆在数十件以上。最多者达一百二十余件而中型墓只有二十件左右，小型者仅二——三件随葬品的排列各异，大型墓一般皆置于前、中、后三处，以前或后处放置最密集；中型墓往往置于墓室的一侧或一端。从结构上看，大型墓有的挖墓道；有的墓室内筑有二层台或铺有草木灰，而中、小型墓则往往不见。各类墓的组合基本一致，一般为泥质的带盖罐、盆、盘、罐、鼎、盉、匜、羊角器、瑗等；硬陶罈、杯、原始瓷罐、碗、碟、杯等。

汉墓形制可分为竖穴土坑和砖室墓两大类。其中土坑墓内往往发现有熟土二层台，一般高30—50厘米，宽40厘米左右，此种形制的发现，为研究汉代土坑墓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发现的窑址，全长5.50、残高0.20、宽1.40米，窑内窑外皆发现窑渣、硬陶片等，陶片火候较高，器形有圜底器和平底器，纹饰多为回纹和曲折纹或席纹和绳纹的组合纹饰，亦有单一的回纹或水波纹等。从出土的陶片、窑炉结构看，可能是商代的龙窑。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慈溪县彭东、东安乡西周至春秋土墩石室遗存

发掘时间：1984年3—6月

工作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发掘的土墩及土墩石室遗存十一座，出土文物近二百件。

土墩遗存二座，外貌均呈椭圆形，其中1号墩中有器物四组，2号墩有器物二组。较为重要的是，发现有的器物出土于浅坑，坑壁用石块筑成。还有的土坑前有通道，坑底铺小石块及木炭。这些迹象在以往发现的遗存中尚属罕见。各坑出土器物多寡不一，以原始青瓷为主，印纹硬陶次之，泥质陶、夹砂陶较少，主要器形有罐、罍、盉、鼎、豆、碗、盂、纺轮等。各组器物年代有早晚之别，早者约为西周早期，晚者约春秋前期。

土墩石室遗存发掘九座。其封土边缘一般都砌有石坎，石室通道口再以巨石封堵严实。早期石室的出土物以原始青瓷居多，晚期以泥质黑陶为主，还有印纹硬陶，残铜器、玉器等。主要器形有罐、坛、盆、盘、钵、鼎、

甑、器盖、角形器、碗、盅、璧、纺轮等。上述土墩石室遗存的年代自春秋中期到战国晚期。

这次发掘，是我省对钱塘江南岸这类石土墩遗存第一次探索性的科学发掘。发掘的结果证明：这类遗存的分布地域确已跨过钱塘江，决非太湖平原所仅有，这将为宁绍平原和杭嘉湖平原以及苏南地区同类遗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绍兴市马鞍乡战国、东汉、三国、西晋、唐、宋墓葬

发掘时间：1984年3月

工作单位：绍兴市文管会

古墓八座，清理前各墓已遭程度不同的破坏。

两座战国墓，位于市桥村的凤凰墩。两墓结构相同，均为椭圆形土坑墓，墓底筑实，墓内填较松软的灰土，未扰乱。一墓随葬有原始瓷碗三只；另一墓随葬有印米筛纹陶坛三只，印纹陶盘、陶罐各一只。

东汉墓一座，位于市桥村的乌龟墩，系砖室墓，墓室呈长方形，墓壁由绳纹砖平放叠砌而成。墓道口前凸，但已残。该墓出土水波纹原始瓷锺三只，青瓷双系罐一只，直腹陶罐一只。

三国墓一座，位置同东汉墓，是砖室墓，墓室呈长方形，绳纹砖平叠砌成，有前凸的墓道口，但已残。随葬有青瓷双系盘口壶二只，青瓷双系小罐一只，青瓷碗六只，青铜鎏金马蹄残件一件，五铢钱若干，青瓷龟形水注一只，青瓷盆一只。

两座西晋墓，位置与战国墓相同。两墓皆为长方形砖室墓，墓壁叠砌而成，有墓道口，墓平面呈“凸”字形。一墓仅随葬青瓷碗一只，另一墓随葬有青瓷盘口壶一只，青瓷碗一只，五铢钱若干。

唐墓两座墓结构相同，都是长方形砖室墓，墓壁用平砖错缝叠砌，墓砖一端饰有半朵宝花，墓门用二砖横铺错缝砌成，后壁一砖横铺，墓底铺成人字形。两座墓位置不同，一座位于市桥村的凤凰墩，墓内仅随葬玉璧底碗一只，另一墓位于市桥村的乌龟墩，墓中随葬有双复系盘口壶一只，青铜簪一件。

宋墓一座，位于市桥村的凤凰墩，系双穴砖室墓，条砖错缝平砌而成，其中一穴已残。该墓随葬有小圈足白瓷碗一只，带巴素面镜一面，韩瓶一只。（绍兴市文物管理处）

金华市孟宅村唐代蟠龙罂窑址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金华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窑址位于村南二百米处，西临武义江，西北距金华市区7公里。

孟宅窑品种有大、小蟠龙罂，各类罐、瓶等，大蟠龙罂，蟠龙装饰系用泥条贴粘，龙体扁平，用指甲或一半小竹管压成鳞纹。小蟠龙罂，龙体用泥条贴粘，然后用手指捏压而成。这类产品，体形高大，高达54—58厘米；施青釉或青黄釉，近底处无釉；胎质原料有两种，一种用瓷土，呈灰白色，用于小型器物。一种用粉砂岩，因它可塑性大，呈紫色；这种原料的应用，是继南朝婺州窑以来的传统工艺。

孟宅窑从其现状来分析，应是龙窑，窑具有喇叭形垫柱、垫珠两种。（金华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金华地区唐、宋、元代的乳浊釉瓷窑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金华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本年度新发现乳浊釉古瓷窑共二十六座。分布在龙浙、金华、衢州、义乌、常山、武义、浦江、东阳、盘安等县市，其中唐代早期六座，宋代三座，元代十七座。

唐代早期窑址：产品有各式盘口壶、罐、盆、瓶、钵、碗、盏等，各窑釉色以月白色乳浊釉为主，天青色次之；并兼烧小部分褐瓷。

宋代窑址：产品有执壶、盘、碗等，均为青瓷与乳浊釉合烧的窑炉；乳浊釉瓷，以月白为主，天青，天蓝之一；造型与同期青瓷完全相同。

元代窑址：产品有花盆、三足鼓洗、鬲式炉、执壶、瓶、水注、高足杯、盘、碗等产品。乳浊釉瓷釉色以天青为主，天蓝次之，月白更次之；如金华铁店窑采用二次上釉；名窑中兼烧小部分褐瓷；其中衢州市管家塘窑堆积中有带“至元二年”铭文的豆脚残器。

婺州窑系中乳浊釉瓷装饰，唐代多重造型，仅用弦和贴粘竖系或横系。运用釉色作装饰是其独有风格，如方坦窑盆、碗等产

品，多在口沿内外饰大块褐色圆斑；罐一类多饰于腹部。宋代产品与青瓷一样重纹饰，运用划花、刻花等技巧。元代产品纹饰，有手制捏塑贴粘和模印装饰。

婺州窑系中乳浊釉瓷首先创烧成功乳浊釉瓷，主要原因：1、唐初社会安定，促进了瓷业生产的迅速发展。2、制瓷工艺技术源远流长，特别在东晋青瓷褐斑点装饰和窑变现象的基础上进一步的突破，而创烧成功乳浊釉瓷。3、自然条件的优越，制瓷原料丰富，交通方便。

婺州窑系中乳浊釉瓷窑的发现，得知我国乳浊釉瓷生产时代提早到唐代早期，并为中国陶瓷史研究增添了新内容。金华铁店窑的调查，为南朝鲜新安沉船出土"钧窑系"文物，找到了具体窑口。（金华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江山县唐至明代瓷窑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江山县古瓷窑址集中分布在江山港及其三条主要支流西侧的沿山地带，其中尤以碰河乡、三井口乡为密集。经调查，在碗窑村窑区范围内发现二十四处窑址（编号为江y1—y24）。三井口窑区范围内发现九处窑址，（编号为江y25—y33）。在江郎与陈家庵各发现一处，分别编号为江y34、y35。由于历年来修筑水库沿山开渠，兴建民房住宅，碗窑村窑区的窑址大部分遭到程度不等的破坏，编号江y6的窑址，实际已荡然无存。在调查过程中，我们曾对编号为江y21的窑址残部作了局部性清理。

江山县有古瓷窑址不下五十处。其烧造的起迄年代大致为唐代至明代。宋代及其以前的瓷器产品可以明确地划归为婺州窑体系，宋、元时期则烧造一种以青灰色釉为显著特征的瓷器制品，其器物的形制、装饰手法、烧制工艺均明显有别于前一类型。后者的几处窑址中发现与青白瓷制品同窑合烧，而且兼烧部分黑釉制品。还发现青花瓷窑址二处，时代均为明代或稍后。在三井口至窑塝一带，发现年代较晚的几处窑址中烧制着明确仿龙泉窑系的产品，质地粗厚，制作草率，约当明代晚期。

碗窑村窑区与三井口窑区不仅地理上有间隔，而且烧造时代上有明显的时间差异。前者明确地受到婺州窑影响，宋代以前可以看作婺州窑分布地域之一。后

者则仅见灰青釉制品和后期的仿龙泉制品。

碗窑村窑区烧造青白瓷器，其年代可能始于元代或早至宋代晚期；究其渊源，可能与江西及福建的瓷业有关。（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衢州市尚圪岗村宋代彩绘瓷窑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浙江省金华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窑址位于村西北1公里处，当地名叫冬瓜潭的山坡上。窑床从东沿山势向西延伸，山势东低西高，为一座龙窑，窑床南侧为堆积层，厚约1米，是一座青瓷与彩绘瓷合烧的窑炉。

彩绘瓷产品，有执壶、瓶、盘、钵、壶等，以彩绘手法来分，一种用紫褐色釉，在器物上绘制缠枝、菊花、牡丹、鱼等纹饰，绘制手法一般较粗犷，生动活泼。施釉方法是，先彩绘，然后浸青釉，为釉下彩。一种在器物上先刻划花纹，在刻划纹饰中间，部分填以紫褐彩釉。

彩绘瓷在婺州窑系中，宋以前未发现过这类古窑址，所以衢州市冬瓜潭窑宋代彩绘瓷的发现，可能是受湖南长沙窑的影响，结合当地历史传统制瓷工艺而烧制成功的。（金华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杭州市南宋临安城考察

发掘时间：1984年春、秋两季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

1984年主要工作是皇城钻探和配合基建的发掘。

皇城城墙的钻探：1984年春，在1983年冬地面调查的基础上，钻探皇城，并在几个关键部位试掘，确定了南宋临安城皇城东城墙和北城墙的位置，北城墙自万松岭路南侧的山坡向东到馒头山的东北角，东城墙沿馒头山的东麓往南到今杭州铁路装卸机修厂内。城墙的钻探工作尚未结束。通过试掘，了解到城墙的夯筑方法。

杭州卷烟厂内宋代建筑遗迹的发现：年初与年底，在杭州卷烟厂进行两次抢救性发掘。年初发掘，面积500平方米，揭示面

宽17.8、进深18米的三开间的地面铺砖建筑遗迹。年底发掘，面积600平方米，发现用长方砖与方砖铺设的建筑地面遗迹，周围有砖砌的排水设施，两处建筑遗迹南北相距约10余米，时代均为南宋，其建筑方法一致，应属同一组建筑。建筑规模宏大，决非一般民居。其地处六部桥附近当与六部有关。

望仙桥南宋铺砖的清理：为配合中东河综合治理工程，在望仙桥至新宫桥之间的中河东侧开了三条探沟，在距地表深2.8米处，发现一南北向的砖砌道路，砖路用长条砖横侧竖砌，宽2米多，路面略呈弧形，两旁均有水沟，路西是平整坚硬的泥地面。中河，与砖路间距约15米。望仙桥东至新宫桥一带，文献记载为高宗的德寿宫，史称“北内”。这条砖路铺砌整齐，路下又有40厘米厚的路基，规模、气魄较大，时代属南宋，很可能与德寿宫有关。（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

绍兴县松林村南宋墓志

发掘时间：1984年11月

工作单位：绍兴市文管会

墓葬在村东约1公里的山岙缓坡上，两边屏山，当地俗称“金畚箕”，系砖室墓，条砖错缝平砌而成，墓向西，已遭破坏，无随葬品。墓志紧靠墓穴正面，青石质，长方形，高87、宽65、厚7厘米。楷书，正文十四行，每行二十七字。

据墓志，墓主全大节（1161—1229年）绍兴东浦人，先被“授武翼郎”，又“特添差两浙东路兵马都监绍兴府驻札”，疾终“赠左武大夫”、“吉州刺史”，并得“赐兰亭曲水之右山为茔”，后迁葬于此。

墓志背面亦有楷书铭文，全文共八行，每行十五字，记载了墓主的迁葬因故及玄孙辈对墓主的颂词。（绍兴市文管会）

安徽省

含山县大城墩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3—5月

工作单位：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巢湖地区文管所、
含山县文物组

遗址位于含山县城北15公里，面积约2万余平方米。这次是1980年以来的第四次发掘，发掘面积150平方米。文化层相当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商代文化、周代文化、战国文化及隋唐时期文化。出土遗物有石、陶、青铜、骨、玉器等一百多件。在相当于龙山晚期的地层中发现一件小青铜刀，刀的形制较原始，同时还发现有较多的颗粒状铜锈。在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地层中发现成片的碳化稻谷。稻谷颗粒清晰，粒大饱满，可大体分辨出籼稻和粳稻两种。在商代地层中发掘出一座较完整的陶窑，陶窑有窑壁、烟道、窑柱。还发现了商代的卜骨和陶器上刻写的文字。遗址出土的陶器种类多，基本是生活用具，这些陶器较强地反映了地方性文化特征。含山大城墩第四次发掘，为我们研究江淮地区原始文化的族源、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以及古南巢国的文化提供了一批实物资料。（张敬国）

寿县城关战国、西汉遗址

调查时间：1984年3—6月
工作单位：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寿县博物馆

遗址位于寿县城关镇东南，包括城关镇。面积约20平方公里。遗址范围内发现建筑遗址、陶管井和墓葬区等战国、汉代文化遗存。在十里头、吴家嘴、丘家花园等地有大面积瓦砾堆积和红烧土、灰坑。柏家台南的一建筑遗址，东西残长32、宽约10米，已发现前排石柱础五个，以及平铺的素面方砖和饰四叶纹、几何纹的空心砖。陶管井较密集地分布在东关电灌站、南关集一带，一般深3—6米，陶井圈高40—80厘米，直径40厘米左右，壁上有渗水孔二至四个。墓葬区有一段时期内聚葬在特定地点的倾向，经钻探试掘，初步探明，春秋墓葬区在城西南西圈一带；战国墓葬区在城西寿西湖至双桥一线和城北北山；汉代墓葬区在城东柏家台、东津渡、吴家嘴、胡圩、钱家滩一线。以上这些调查发现结合丘家花园一带曾出土鄂君启金节、大府铜牛及郢爰等文物，对澄清楚都寿春城地望问题提供了资料。（丁邦钧）

怀远县唐集汉墓

发掘时间：1984年11—12月
工作单位：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怀远县文物管理所

墓葬位于怀远县西南30公里的唐集区平阿山的东面山坡上。封土残高4米，占地面积30×30平方米。封土为红色粘土，经夯筑，土质坚硬，层次分明，夯层厚10—20厘米，夯窝清晰，圆夯直径8厘米。

墓为长方形土坑竖穴石椁墓，在石头山上凿成的墓坑，方向正南。墓坑长7、宽5米，墓底距地表深5.65米。墓道为梯形，在墓室的南面，由一个斜坡一个平台相继组成。因有建筑物阻碍，墓道只做了4.2米。石椁均由厚25—45厘米的方形或长方形大小不等的粗糙巨石从四面叠筑而成。石椁长4.85、宽3.10、高2.6米。

此墓有两个盗洞，墓道西侧的盗洞未盗到底。墓坑西北角的盗洞直盗进石椁内，椁盖被砸烂，椁内填满淤土、葬具、骨骸无存，随葬品仅剩下铜熏炉、铜带钩、透雕玉饰各一件，另有五铢钱、铁棺钉若干。根据墓室结构和出土器物特征来看，该墓时代可能为东汉时期。（杨鸠霞）

马鞍山市东吴朱然墓

发掘时间：1984年6月9—23日
工作单位：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马鞍山市文化局

墓葬位于马鞍山市雨山乡安民村马沿岗，墓顶距地表2米，墓室全由青灰砖砌成，分为甬道、前室、过道、后室四部分，总长8.70米，最大宽度3.58米。方向正南。前室四隅券进式顶，后室双层拱形券顶，墓壁采用三顺一丁砌法，铺地砖两层，呈人字形交错平铺。砖的模数基本统一，长40、宽19、厚6厘米，其上模印篆书“富且贵至万世”等言语。随葬器物大多放在后室和过道中，依质料可分为瓷器、陶器、铜器、漆器、竹木器、玉器等类，计一百四十多件。漆器数量最多，有案、盘、奁、盒、虎子等品种。重要的随葬器物有彩绘人物画大漆案、大漆盘、小漆盘、漆砂砚、漆凭几、锥刻戗金漆盒盖、犀皮黄口羽觞、卣形青瓷壶和漆槅等。案、盘人

物画的内容为宴乐、杂技场面和行孝故事，人像旁大多有题榜，辅助图案采用行云和动物、植物花纹，许多漆器背面有“蜀郡造作牢”等字样。墓中出土十多件名刺和谒，上面墨书“丹杨朱然再拜问起居故鄣字义封”。由名刺和谒，可确定墓主为朱然。朱然是东吴大将，官至左大司马右军师，封当阳侯，死于赤乌十二年（249年）。朱然墓的发现，为六朝时期的绘画艺术、书法、葬制、漆器工艺、青瓷生产以及人们的精神信仰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是六朝考古史上一次重要的发现。（丁邦钧）

福建省

闽侯县庄边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春季

工作单位：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继续上年发掘，进一步明确新石器时代晚期昙石山文化的内涵应是昙石山遗址的中下层，其文化特征：晚期陶器以夹砂灰黄陶、泥质灰陶为主，早期陶器有夹砂黑胎红衣陶、细砂红陶和泥质红陶。常见器形有釜、杯、壶、豆、罐、簋、盘、碗，制作方法有轮制或手轮兼用，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磨制不精，器多细小，尤以小石锛颇具特色，此外还有少量骨镞、骨锥和蠓壳制作的刀、铲。遗址中发现的六十三座墓葬，随葬大批完整和可复原陶器，是研究葬制和制陶技术水平的珍贵资料。八座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的土坑墓打破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入葬，随葬的仿铜陶制鼎、豆、壶、盒和玉璧等礼器，反映了闽越文化与毗邻地区的交融关系。

崇安县汉代城址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崇安汉代城址高胡南坪建筑群基址继续扩大发掘面积2000余平方米，建筑群基址的平面布局基本暴露，在殿堂基址的南面清理出大门、门房和通道遗迹，东侧外露出两处不相联接的排水陶管，北侧斜坡下深处有一口用陶

井圈建造的水井，西侧的廊屋基址和西南面的西厢房基址亦已全部显露，出土物除大量西汉板瓦、筒瓦、瓦当和印壁纹空心砖残片外，陶制生活器皿为数不少，还出土一件刻有"河内工官"铭文的完整铜弩机。

惠安县南埔五代窑址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窑址位于惠安县北面，窑基大部被开荒生产破坏，出土残器均为青釉罐、壶之类，质地较粗糙，釉层多剥落，这种器形曾出土于福建晚唐至北宋初期的土坑墓葬。

山 东 省

郯城县黑龙潭旧石器时代遗存

发掘时间：1984年10—11月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

遗址位于山东省最南部与江苏省交界的马陵山西坡，郯城县东南约20公里，西距沭河约4公里，海拔高度约70—75米。发掘地点在黑龙潭南侧，共开探方（沟）十五个，发掘面积224平方米，全部挖到基岩，深度为距地表1.35—3.30米。马陵山基岩为紫红色砂岩，属白垩纪。基岩之上有一层风化壳，呈粉砂状。其上的土层堆积大致可以分为三层，最下一层为红色粘土，此层中未出石器，只有极少量动物化石，石化程度较好，因较碎小，故不辨种属。中层为灰色亚粘土或粘质砂土，出土数量较多的动物化石和一部分打制石器。动物化石经初步辨认有象、犀、牛、鹿等。打制石器有石核、石球、砍砸器等，器形较大，制作较粗。上层为黑灰色或深灰色土，富含腐植质，含砂量较多，砂的底部往往有成堆的石块或石片，其中一部分是经加工制作的细石器。此外，在遗址附近的地面及南北两侧均有细石器分布，采集到的有典型的船底形、楔形及半锥形石核、尖状器、刮削器、镞形器以及水晶、玛瑙质的细小石叶等。马陵

山是在中更新世的造山运动中形成的。其上的中、下层堆积的地质年代约当晚更新世，上层为次生堆积，形成年代较晚。因此，中层出土的打制石器应属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这是继山东沂源、东海大贤庄、日照竹溪村和秦家官庄之后发现的又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的地点。对研究我国华北地区旧石器的分布及其特点具有一定的意义。（韩榕）

临沂市青峰岭细石器遗存

发掘时间：1984年5—6月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

遗址位于临沂市东南约20公里，为一漫坡状土丘，东距沭河约2公里，是沂、沭两河冲积的分水岭，海拔高度约65—70米。发掘地点位于遗址的中部和南部，共开探方七个，发掘面积112平方米，发掘深度为4.30—5.30米。含细石器的地层为自然堆积，成因为河相冲积。地质年代属全新世，距今约在1万年左右。遗址上部为一汉墓群，还有岳石文化的遗存。含细石器的地层可以分为三层，上层为棕红色粘质砂土；中层为细砂和粘土交互叠压层，具水平层理或呈波状分布；下层为棕灰色粘质砂土。在表土层下至距地表深4.60米处均有细石器分布。总共出土细石器及石片、石料约3,000件。其中有比较典型的船底形、锥形、楔形、柱形、石核等，另外，还有尖状器、刮削器、尖刮器、雕刻器、镞形器、细石叶以及石片、石料等。选用的石材主要是石英、燧石、玛瑙、水晶及变质岩等。约占总数五分之一以上的细石器是比较密集成层分布的。小者在不到1平方米范围内有七十件，大者在不到4平方米范围内有一百五十件。此外，还发现在一片不大的范围内有炭屑灰烬之遗留。但是否为火烧之痕迹以及是否为人类用火之遗迹，则不能完全肯定，尚需作进一步的研究。青峰岭是继临沂凤凰岭之后发掘的又一处地点，为研究山东以至华北细石器遗存的分布及其特点又增添了一批新资料。（韩榕）

微山县尹洼村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

发掘时间：1984年9—11月
工作单位：济宁市文物管理处

遗址位于该县驩城乡尹洼村北100米处，1981年6月文物普查时发现。遗址东西长约500米，南北宽约400米。遗址中心部分略高，文化堆积厚约1.5米。此次配合公路施工工程对遗址进行部分发掘，发掘面积500多平方米，清理了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十九座，均为小型墓葬，一般长2、宽1米左右，随葬器物一般10件左右，最多的也仅20余件。出土的随葬陶、石、骨器共200多件。陶器以灰陶为主，红、黑陶次之，器形有鼎、鬶、罐、壶、盆、豆、高足杯、小杯、器座、器盖、背壶、环等，陶器以素面为主，部分磨光和附加堆纹、镂孔。石器有铲、斧、刀等，骨器有锥、针等。这批墓葬的发现，对于研究大汶口文化的分布、分期等具有一定的价值。（吴文祺）

菏泽县安邱堌堆龙山文化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秋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菏泽地区文展馆

揭露面积210平方米，获得从龙山时期至晚商逐层叠压的地层材料。发现龙山房基十二座。分布密集，有圆形和长方形两种，有的门前有夯土散水、北壁为内外双层墙。有商代陶窑一座，保存较好，残高2.4米，火膛连同窑门通长3.21米。窑箅以上的窑室为上细下粗的圆袋形，残高1米左右。

所获文化遗物有龙山时期的陶罐、盆、甗、甑、鬶、碗、器盖、豆和瓮等，外部形态与豫东龙山时期同类器物相似。稍晚于龙山时期的陶器多厚胎，夹砂陶器制作多较粗拙，泥质陶器则多磨光，外形精巧。器类有子母口罐、深腹盆、鼓腹罐、甗、豆和碗等，陶质、纹饰和形制都与龙山时期的陶器迥然不同。商代陶器以鬲、甗为最多，还有盆、豆、罐、瓮、罍、钵等，形制与中原商文化陶器基本一致而又略具地方特征。此外，还出土龙山时期石斧、石锛、石凿、石镰、蚌镰、陶纺轮、网坠、骨针、骨笄等，稍晚于龙山时期的骨镖、陶网坠、商代空首铜斧、铜镞、骨鱼叉和骨环等一百五十二件。

上述材料为揭示和研究鲁西南新石器时代至晚商的文化面貌、文化发展序列、文化性质以及当时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提供了重要依据。（王迅）

寿光县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堡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5月，9—12月。
工作单位：山东省文化厅益（都）羊（口）铁路工程文物考古队

遗址位于县城西南12.5公里的边线王村。为配合铁路工程，进行了发掘。发掘工作分两次进行，第一次在5月，对遗址进行了试掘，第二次从9月下旬开始到年底结束。发掘面积近2,500平方米，龙山文化堆积有两层。下层属龙山文化中期阶段，上层属于晚期阶段。商周之际，这里继续有人居住，但因平整土地，文化堆积已荡然无存。战国时期，这里是墓地，这次发掘了几十座战国墓，绝大部分都被盗或无随葬器物。

边线王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是发现了一座龙山文化中晚期阶段的城堡遗迹，由于平整耕地，该城堡目前只剩下围墙的基槽部分，原地面上的围墙和城堡内的文化堆积已基本上不复存在。根据对围墙基槽遗迹的钻探与发掘，知城堡平面近似圆角梯形，北面小，南面大，东边长175、西边长220、中部宽225米，面积约44,000平方米，除西南角和南面被村庄所压，南边东端因挖土被破坏以外，基槽的其余部分保存完好。目前只发掘清理了基槽的西南角和东北角，槽口宽4至7米不等，深2至3米左右，基槽壁不规整，有的部位呈斜坡形，有的部位呈台阶形；基槽内的填土经夯打，夯层厚薄不匀，夯窝呈圆形弧底形大小不一。在东北角西侧的基槽填土中，发现有人和兽的骨骼，其性质尚不能确定。基槽填土中出土大批龙山文化中期阶段的陶片。基槽被龙山文化晚期的灰坑所压。这为城堡的修筑时间，提供了初步的地层依据。

（张学海）

长岛县北庄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秋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等

这次进行的是第四次发掘。新发现三十多座房屋基址，均属北庄一期。不少房屋地面有埋人现象，其中有一座房屋埋一女性，房中摆放有石斧、石磨盘、陶鼎、陶壶、陶觚形杯等许多器物，居住面中间还放着一个鸟形

鬶，鸟头为柄，鸟尾为流，两旁有小翅，足部甚矮，很象在海面游动的水鸟，十分生动。还发现一些墓葬，有单人的，也有二人、三人乃至十四个人的合葬的，多无随葬品。由于几年的发掘，这个遗址的原始村落已有相当一部分被揭露出来，对于复原原始公社的生活，了解当地原始文化的面貌都具有重要意义。（严文明）

益都县杨家营龙山文化和周汉时期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3—6月

工作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遗址位于益都县城西北约25公里，西距临淄齐故城20余公里，为举办田野考古短训班在此发掘800平方米。文化堆积达3—4米，分属三个时期：早期属龙山文化晚期的遗存；中期属晚商、西周春秋时期的文化堆积，并有战国墓；晚期为汉代的建筑遗迹。先后延续时间甚长。从已揭露部分的堆积看，主要属于西周、春秋和汉代。发现了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的圆形窖穴，有的直径达4米多，窖底有成层的粮食腐朽痕迹。上层的建筑遗迹，既有位于遗址北边的高台夯筑基址（俗称凤凰台），也有遗址南部的小型夯筑基址。遗址周围地下发现有夯墙，槽宽10米，南面有门，夯墙平面呈长方形，遗址在齐城以东20公里，是否属两周至汉代的邑区或驿站遗址，目前尚不能肯定。（张学海）

济南市大辛庄商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9—12月

工作单位：山东大学考古专业

遗址在济南市东郊大辛庄村东南百余米的蝎子沟两岸，是山东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发掘前，曾请山东省文物考古所作过普遍铲探。为进一步摸清遗址内涵和文化堆积的分布情况，曾分三处进行试掘，共开探方三十九个，发掘面积为849平方米。

地层堆积情况。三个试掘点所揭露的文化层基本是一致的，深度一般在1米上下，包含有三个文化层。有个别探方深达4米以上，但包含物大体一致，包括了从商代中期（二里冈上层文

化）至战国晚期几个大的文化阶段。其中商文化是遗址的主要堆积，个别探方曾发现有汉初的遗迹遗物。

主要遗迹。试掘所见房屋，有半地穴式和先挖基槽再立夯土墙的地上建筑两种；窖穴多圆形和不规则形；井则多圆角方形，深达6米以上。

陶器组合及其特点。大辛庄遗址的陶器，以绳纹灰陶为大宗，早期地层中有较多的夹砂红陶、褐陶，以后各期红褐陶渐少。陶胎大致经历了一个由轻薄向厚重、粗硬变化的过程。表面纹饰，则是由细绳纹和中粗绳纹向粗绳纹发展的。陶器组合表现了一定的稳定性，从早到晚主要器类有鬲、甗、罐、瓮、尊、盆、簋、豆等。在炊具中，斝、鼎绝少发现，鬲是主要炊器。鬲的形态，一般都分裆较高，实足尖也较长，内沿面多有一道凹槽。从早到晚，鬲体高宽比例的变化，基本上与中原陶鬲的演化规律相符。这里的粗柄豆较多，且早期多假腹、深盘、折沿尖唇；后期多真腹豆，圈足变粗矮，浅盘、直口平沿，做工也明显地不如前期精细光滑了。

生产工具多见石镰、石刀和蚌铲，石斧、石铲少见。骨器多镞和匕。骨笄，早期为圆锥式，后期有"鸡头式"。其他如卜骨、卜甲，均有较多发现。

沟东墓葬区的发现。这次试掘，仅沟东即发现商墓十六座，均属附腰坑的土坑墓，北南向，排列有序。商墓中出铜容器的一座，铜器组合为爵、觚、鼎，另外有戣一、陶器二。出陶器的墓，组合形式为鬲、豆、罐（盆），或鬲盆（罐）。

上述诸方面，似可看出大辛庄遗址为代表的济南地区商文化，既包含有中原商文化的某些因素，又有着自己的地方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辛庄遗址的早期地层中，素面夹砂褐陶占有一定比例。这一陶系，器类简单。从陶质、陶色到制器过程中器表的处理，都与尹家城二期文化（岳石文化）的作法相似，但在器物造型方面，又有了变化。这些现象，为我们追索尹家城二期文化的去向提供了线索。

（徐基）

临淄市乙烯厂丙醇工地两周墓地

发掘时间：1984年5—7月

工作单位：山东省文化厅齐鲁石化总公司乙烯工程文物考古队

临淄乙烯厂丙醇工地位于临淄区驻地辛店的西南方，在齐鲁石化总公司第二化肥厂南邻，墓地在“丙醇”工地东部，东西宽约200余米，南北长约80米左右，墓地北部被第二化肥厂所压，范围不清，在丙醇工地部分共探出两周墓葬四百余座，5至7月先后发掘了三百二十一座。

这批齐墓的年代从西周晚期到战国时期，保存完好，只有个别被盗扰。这批墓的墓向绝大部分为东西向，只有少数南北向。墓室结构除竖穴土圹外，还有少量洞室墓，流行生土二层台和壁龛，春秋前期墓和西周墓多腰坑，坑内殉狗，随葬陶器组合为鬲、豆、罐，鬲、豆、盂（盆）、罐，鬲、豆、盖豆、盂（盆）等，组合稳定，而器形演变脉络清晰。对研究临淄地区齐墓的分期和齐文化具有重要价值。（张学海）

济南市北齐祝阿县令道贵墓

发掘时间：1984年10月

工作单位：济南市博物馆

墓葬位于济南市马家庄南约100米处。基建工程中发现。墓葬为青石页岩砌筑的单室墓，有甬道和墓道。方向朝南。墓道平面呈梯形，上窄下宽，其北端深2.8米处为挖洞式甬道。甬道南口用三块不规则的石板封堵，门墙上绘有猛虎兽面。墓室平面略呈梯形，北窄南宽，四壁用不规则的青石页岩砌筑至1.5米时，开始向内收叠涩，聚成穹窿顶。高3.20米，面积10余平方米。南壁中部辟一门，四壁及顶部涂抹一层厚薄不匀的白灰，然后以赭、朱等色和黑墨勾勒绘制壁画，大部分保存完整。顶部绘日、月、星辰的天象图；四壁绘制车马出行和人物。笔法简练，线条流畅；人物造型比较适度，神态栩栩如生。出土遗物有青瓷碗、细颈无釉瓷瓶、灰陶盘、“常平五铢”铜钱等。墓志一合，载明墓主人系北齐祝阿县（现长清县境西北）县令道贵，死于天统五年（569年），葬于武平二年（571年），终年七十六岁。（济南市博物馆）

河 南 省

巩县下西坡、临汝县中山寨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春、秋两季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

春季发掘的巩县下西坡遗址，属巩县夹津口乡铁生沟村，揭露面积200平方米，发现圆形窖穴一个。这里的地层情况比较简单，共两层，都是裴李岗文化堆积。出土陶片不多，有泥质红陶、夹砂红陶和个别灰陶。陶质比较松软，能复原的器物仅篦纹圜底钵一件。还有三足钵、双耳壶、盆、罐、和鼎等碎片。石器出土的不多，主要是采集品，有石斧二件，石镰三件，石铲八件（内二件为有肩铲），石磨盘三件（内一件无足），石磨棒三件（与磨盘不共出），磨石三件，弹丸二件，陶纺轮一件。此遗址因附近砖厂烧砖取土，已遭受严重破坏。

秋季发掘中山寨遗址，位于临汝县城东南约7.5公里。揭露面积150平方米，发现有裴李岗文化和仰韶文化的窖穴，战国时期的水井等遗迹。地层大体上可分三层：下层为裴李岗文化遗存，出有石镰、石铲、石磨盘（无足）以及泥质和夹砂的红陶片；灰陶很少见。器形有圜底钵（有的饰弧线篦纹）、三足钵、双耳壶、双耳罐、角把罐、篦纹罐、鼎足（上端有五个椭圆形凹窝）、三足器残足（断面呈三角形的矮足），以及绘有黑彩菱形纹的彩陶等。其中角把罐、鼎足、三足器残足和彩陶等均为首次发现。值得注意的是下层出土陶片的火候都比较高，陶质不象裴李岗、莪沟等遗址那样疏松，而与仰韶文化却很相近。中上两层均属仰韶文化堆积，出有盘状器、打制石刀（椭圆形或两侧带缺口）、磨制石斧、钵、盆、罐、尖底瓶、釜、鼎、器座以及彩陶等。但中层彩陶比较简单，多在碗、钵的口沿饰一道黑彩；上层比较复杂而且多带白衣，使用黑彩或红、黑两色兼施。纹饰有条纹、圆点、弧线三角、涡纹等，另外也有一些秦王寨类型的纹饰，但从总的情况来看，接近庙底沟类型的比较多。

中山寨遗址的两种遗存，无论从陶质和某些器形的变化观察，都具有明显的连续性。这将

为裴李岗文化向仰韶文化的过渡，提供一些重要的线索。（郑乃武）

淮阳县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堡及其他时期遗迹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本年继续进行的大面积发掘，是为了搞清北门的结构和在城址内寻找建筑遗迹。揭露面积2,000平方米，其中600平方米清理到底。

一、搞清了北门的结构，北门位于北城墙的中部稍偏西一点，是夯土墙的缺口，没有门卫房的设置，门道宽2.25米，北端微向西折，缺口内有棕色路土，从地层叠压和出土遗迹、遗物看，此门为平粮台第四期文化时使用。

二、清理各类灰坑六十座，其中龙山文化灰坑六座，西周至战国灰坑四十五座，汉代灰坑九座。龙山文化的灰坑均打破城墙的内坡，出土陶器有鼎、罐、甑、豆、圈足圆盘、碗等，其中以镂孔磨光黑陶陶豆为精。

三、清理战国夯土台基一处，该台基位于古城址内东北部，面积约100平方米，夯土筑成，上部地面已被破坏，西部、东部、北部被汉墓打破，台基南端有一条东西向的排水道，排水道系用板瓦铺底、筒瓦镶边的阴沟，西高东低。

四、清理各代墓葬六十一座，其中周代瓮罐葬五座，战国墓三座，秦墓一座，西汉前期墓五座，武帝时期墓一座，西汉晚期墓四座，新莽墓四座，东汉墓六座，宋代墓三十一座（大部分是小孩墓）。这批墓葬除二座被盗外，余皆保存完整。通过1984年的发掘，从地层上解决了平粮台各期墓葬的分期问题，出土了一大批珍贵文物，如战国彩绘陶器，秦墓中的泥俑，带钤印文的西汉前期陶器，武帝时期的二百多件夹纻胎漆器，西汉晚期墓中的大批青瓷和印章，新莽墓中的戴在手指上的铜顶针、投枪和瓷器，东汉墓中的瓷罐、铁锄、锛、矛等。（曹桂岑）

偃师县二里头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春、秋两季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本年在二里头遗址Ⅳ区清

理四处较完整的二里头二期铸铜遗迹（其中两处继续1983年的工作）。其形状皆为长方形，最长者有16米左右，宽者6米左右。它是由许多层路土叠压堆积而成，每层路土内有若干片红烧土面、成片的铜绿锈。在路土层中还有些分布不太规则的柱洞，并夹有少量铜渣、铜片、铜坩埚残片。在铸铜遗址周围的灰坑中，则有更多的块状铜渣、小件铜器、铜坩埚残片，多量的木炭和一些陶范。多系当年从铸铜遗址中清理出来倒在灰坑中的。在铸铜遗址中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遗址中的各层路土与一些成人和小孩墓交互叠压、打破，这种关系可反复出现若干次。这种同时发生的现象在居住址中是还没有见过的。

本年还清理了墓葬约六十座。在Ⅳ区铸铜遗址区内，清理墓葬四十余座，可分成南北二区。南区是接着1983年继续清理，成人墓头均向南，儿童墓头多向西，向东及北者较少。北区成人墓中除一座头朝南外，其余头均朝北。儿童墓的情况基本同于南区。两区的儿童墓多集中在本区铸铜遗址之北沿。墓葬的时代，多数为二期，少数属三、四期，儿童墓皆无随葬品，成人墓多有随葬品，然其多寡不一。多者可达十余件，皆属二期。其中有些器物的造型和制作相当精美。

Ⅵ区所清理的十余座墓葬（基本为小型墓）中，有三座墓出有铜器、玉器、绿松石串珠及镶嵌铜牌饰、陶器、漆器和海贝等等。其中M11出土物最丰富。此三墓皆属四期。随葬品中的铜斝是二里头遗址第一件发掘品，铜爵多有短柱。这些铜器皆有陶器与之共存，为铜器分期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随葬货贝有达七十枚者，数量之多，实属初见。

在Ⅴ区的发掘中，在地层和实物上为二里头五期（二里冈期上层）提供了更多的资料，使我们获得了新的认识，进一步证明四、五期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上述发现，不仅使我们在认识二里头遗址，而且在认识商文化发展序列、分期，在认识郑州及偃师商城的时代、性质上都是很有意义的。（郑光）

偃师县尸乡沟商代早期城址

发掘时间：1984年春、秋两季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

本年发掘面积共约3,200平方米，其中包括宫殿、城门基址各一处，灰土遗址二处，并对东城

墙作了局部解剖。另外还清理商代灰坑五十五个，墓葬十二座，获得了相当丰富的实物资料。

宫殿基址：偃师尸乡沟商城的南部分布着多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位于南部居中的一处规模最大，长宽均在 200 米左右，编号为1号基址（J1)。钻探表明，J1内又分布着数座形制迥异的夯土建筑，第4号夯土建筑(D4）位置在J1中部偏东处，春季工作已把这座夯土基址完整地揭露了出来。

J1D4是一处以正殿为主体，东、西、南三面有庑,中有庭院、南有主门、西有侧门的成组建筑。正殿、三庑皆由夯土筑成，庭院内满是淡黄色路土。正殿台基呈长方形，东西36.5、南北11.8米。台基现仍保存着高出庭院地面约0.4米的台体，下面有约1.6米厚的夯土基础。台基的南缘，出四座长方形台阶，台阶一般尚保存着三层踏道，两侧用石板围砌。三面庑基形制大致相同，以东庑为例：平面呈长方形，南北全长25.4、东西宽约5米。朝庭院一侧有一排南北向柱洞，柱下放置础石，间距一般为2.5—2.7米。后缘为夯土木骨墙。基址上面有四道东西向夯土隔墙，把东庑隔为五室。每室面阔、进深一般为4.5米。在基址的南北两端，共发现三处用石板围砌成方腔的排水道。在清理基址过程中，发掘了三十八座商代灰坑，有的灰坑直接破坏了基址。灰坑的年代均为二里冈上层时期，这表明D4基址的建筑使用年代应早于二里冈上层时期。

城门基址：1984年秋季发掘的城门基址位于东城墙中部偏南处（编号D2城门）。D2城门形制与X2城门基本相似，但上部结构保存较差。门道全长22、宽2.4—3米，两侧为木骨墙。门道内仅残存少量的路土。但在路土下面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大型石砌排水道。排水道由石壁、石底与木盖板组成，木盖板压放在两侧的石壁上，盖板与路土之间施30—50厘米的草泥土。木盖板已腐朽，但灰痕清晰可见。两侧石壁用不甚规整的石块垒砌，形成竖擽，间隙处以木骨加固。底部铺石层层相叠，状若鱼鳞。水道呈方腔，宽二米，从盖板灰痕判断，原水腔高度为1.5—1.8米。水道西高东低、落差明显，城内废水可顺利通过水道排出城外。经钻探,这条大型水道全长800余米，西部直接与宫城相连。

秋季在城址南部的勘查中，又发现六处夯土建筑基址。基址多分布在宫城的周围，大者数千平方米，小者百余平方米，形制各异。众多的夯土基址集中在城址南部，表明这一带可能是当时

的宫殿区。（赵芝荃　刘忠伏）

安阳市殷墟西区等地的小型墓葬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

本年度配合基建共清理殷代墓葬二百五十余座，其中殷墟西区一百八十座，苗圃北地四十二座，大司空村二十座，高楼庄南地十座。大部分是小型墓葬，只有西区的M26和M1713较大、出土物也较丰富。

M26是秋季发掘的，属殷墟四期。墓室长3.4、宽1.88、深6.85米。墓内殉葬动物甚多，腰坑内和墓室填土中各埋一狗，椁盖上埋有牛头骨四个，牛腿二只，羊一只，羊头骨三个，猪头骨一个，狗三只，狗头骨五个，计二十具动物个体。

该墓共发现随葬品七十九件，其中陶器二件，器形有觚和爵；青铜礼器十二件，器形有觚、爵、尊、鼎、毁、卣、罍；铅礼器二件，器形有斝、鼎；其余为青铜武器、车马器和玉石器。

M1713是夏季发掘的，也属殷墟四期。墓室长3、宽1.56、深4.7米。墓内二层台上殉三人，均为少年。腰坑和填土各殉狗一只。又在椁盖上埋牛、羊腿各一。二层台上埋牛盆骨一只。

该墓随葬品共出土一百二十件，其中陶器十件，青铜器九十一件，玉石器十一件，此外还有骨饰、蚌饰等。出土的陶器有觚、爵、盘、罐、罍、壶等。青铜器中有礼器十七件，计有觚、爵、鼎、簋、斝、盉爵、甗、盉、尊、卣、盘等；其余为武器和工具。

墓中出土的青铜礼器中，在三爵、一鼎、一簋、一盉爵（鋬内和盖内）等六件器物上皆铸有铭文，而在其中五件器物上的铭文中，皆有“亚鱼”或“寢鱼”符号，应是墓主人亦即作器者生前的称谓。其铜鼎的铭文最长，计三行二十一字，全文为：“壬申王锡亚鱼具，用乍兄癸尊，在六月唯王七祀，翌日。”从铭文的字体特征及体例来看，与属帝辛时期的邲其卣、邑斝相似，因此可以推断此墓当属帝辛时代。

过去见于著录的传世铜器中，有纪年铭文，并可确指为帝辛之器的，大概不下十件，但是，属科学发掘，并有大量陶器、铜器同出的属首次。因此，该墓的发现，对研究帝辛时期的铜器乃至帝辛时期的历谱，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杨宝成）

安阳市殷墟王陵区司母戊墓及其他墓葬

发掘时间：1984年9—12月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

该墓位于王陵区东区，M1400大墓正南约40米处，编号为84AWBM260。墓口上有一层厚约10厘米的殷代层，墓道口上有一座祭祀坑（M255）叠压．该墓又打破五座较早的祭祀坑。

墓道上口宽4.1—4.4、长24、底深6.7米。呈斜坡形。墓室为长方形，口南北长9.6、东西宽8.1、深8.1米，方向185°。墓壁光滑平整，部分地方留有挖墓工具痕迹。一类为双齿工具（耒）痕迹，一类为镢(石)工具痕迹。填土中，发现八把头呈勺形的木锹，又曾发现两件石夯锤（残），应为造墓所用工具。

该墓共有六个盗坑，有古代的，也有近代的。其中包括1939年3月盗出司母戊鼎时所挖的坑，因而墓内遭到极大的扰动。

墓室内有椁室，长5.4、宽4.1、高2米，四壁各用九根直径约23厘米的圆木构成，椁底用24块宽约22、厚约8厘米的木板铺成，椁盖和棺皆已被破坏。

墓底有一方形腰坑，内殉一男性成年和一狗，并随葬一件大玉戈。

墓内所埋人和动物骨架大部分被扰。初步统计，该墓所埋祭牲和殉人个体约三十七具，所埋动物有马、牛、羊、猪、狗等，因骨骼零乱，个体已难以统计。

墓道中部填土中埋人头骨二十二具。在墓室和墓道附近发现有祭祀坑三座，其中一座(M133)为1976年春发掘，另一座（M179）为这次所发掘，两个坑内分别埋无头人骨架八具，另一座（M256）尚未发掘。这三座坑皆属M260的祭祀坑，坑内所埋人架应属在墓主人下葬后举行的祭祀活动时所屠杀的牺牲，其头骨和躯体被分别埋在墓道填土内和两侧祭祀坑中。

墓道底部的方形殉葬坑中埋人骨架四具，身首全躯，有葬具，并有铜器、玉器、骨器等随葬品。椁上部填土中埋有约六个个体的人骨架，无头骨。棺、椁之间约埋有五个个体人骨架，身首全躯。

该墓大部分随葬品被盗走，特别是大型重器被洗劫殆尽，残存的四百多件小件器物亦被扰乱。其中有铜礼器残片七件，青铜武器四十九件，车马饰七十三件，玉、石器七十件、骨器二百五十一件，还有牙器、金叶、贝

和蚌饰等。陶器皆残，鬲和豆属殷墟第二期器形。出土白陶九十一片，可复原的有簋和尊。

该墓墓形大，有大型椁室，众多的殉葬人和动物，说明墓主属殷代大贵族奴隶主。该墓又埋葬在殷王陵附近，表明墓主应为殷王室的重要成员。

因司母戊方鼎出自该墓，故可以推断该墓墓主人即为母戊，即乙辛周祭卜辞中的妣戊。从墓中出土的陶器器形来看，该墓属殷墟第二期，即武丁晚期至祖庚、祖甲时期，其时代与妇好墓相近。

发掘司母戊大墓的同时，还发掘了四座祭祀坑和一座中型墓。该墓编号M259，墓口小底大，呈覆斗形，墓室长3.9、宽2.2、深3米，方向190°。该墓曾遭近代盗掘，棺已被破坏，墓主人骨架被扰乱，属成年男性。该墓内共发现人牲十五个体。东部二层台上六个，西部二层台上八个，一件铜甗内盛一个。M259的两侧各有一小型长方坑，东部一坑（编号M258）中埋六具无头人骨架，西部一坑（编号M261）中埋八具无头人骨架，两坑中所埋躯体数目分别和M259东西二层台上所埋人头数目相当。墓室填土中还发现一具无头人骨架，与放置在铜甗中的人头骨可能属同一个体。这十五具身首分离的人骨架，应是在墓主人进行安葬活动过程中被屠杀的奴隶。

在西部二层台的北侧，埋一儿童，骨架已朽，应属墓主人的殉葬人。墓中共殉狗六只，墓室填土中埋狗一只，南二层台上埋狗二只，东、西、北二层台上各埋狗一只，此外北二层台中部还埋一牛腿。

墓室随葬品大部已被盗走，残剩器物十二件，大都摆放在四面二层台上，计有青铜圆鼎、盘、甗、觚（残）、爵（残）、钺各一件，戈三件，锛二件，陶罐一件。其中出土的青铜圆鼎、盘、甗，器形较大，纹饰精美，为近几年来殷墟发掘品中之精品。圆鼎底部有一图形铭文，从出土的一件陶罐及三件完整铜礼器的器形来看，该墓时代为殷墟第二期。（杨宝成）

洛阳市瀍河西周车马坑

发掘时间：1984年8月

工作单位：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发掘清理西周车马坑四座，其中两座遭近代严重破坏，另两座保存比较完整。

一号车马坑位于T2第三层下，为长方形竖穴，总长6.2、最宽处3.7米，方向0°，车马坑东

侧和西北隅分别被战国墓葬和西周灰坑所破坏。该车马坑内放置两辆车马。北边的一辆为二马一车，马头南向并被南边的车马的车箱所叠压，二马踡局俯卧于长方形小坑内，其中东侧的马头被一圆形小坑所打破，坑内出土许多箭镞。马头部填土经夯打，夯层厚约3厘米。车箱为长方形，全部髹漆，目前尚未清理。南侧的亦为一车二马，另殉一犬。马头南向，踡局俯卧于填土之中，马头部饰铜当卢，铜泡等马饰，并出土有铜銮铃，铜车軏等车器。马之北端置车箱，箱为长方形，长1.2、宽0.72米，箱下压有车轴和车辕木痕，在车箱前部两侧各置铜戈一把。

五号车马坑位于T1第三层下，为长方形竖穴，总长3.7、最宽处3.3米，坑内埋四马一车一犬。马南车北，四马并列，四肢踡局俯卧于长1.9、宽0.65、深0.60米的长方形小坑内，马头部均饰有铜当卢、圆泡等马饰，并出土有铜軏、铜辕饰、銮铃等车器，马坑四周均有席痕，车箱被盗扰，破坏十分严重，形状不明，车箱的前部放置铜兵器，西侧为钺、戈、剑，东侧为矛。车箱后部殉犬一。（叶万松 余扶危）

洛阳市东周王城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本年在王城范围内，发现大量东周墓葬，仅东南部近6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就发现五百余座。出土有陶器千余件；石、玉、水晶、蚌、骨器千余件，铜器五十余件，墓葬分布密集，一般都成组排列，可见在东周时期这里又是一处规模较大的族葬墓地。在东周王城范围内我们还清理了汉、唐烧窑，东汉粮囤。此外还在王城东南部发现有汉代炼铁炼渣，出土残陶范上千块，同出还有铜渣、炉壁、陶管等，此外还发现有汉代烘范炉一座。烘范炉残长1.95米，为砖坯竖砌而成，在炉底部发现有木炭灰和陶范。

在东周王城东南部，还发现马坑两座，一号坑葬马六匹，二号坑葬马四匹，时代当为东周时期。（余扶危 叶万松）

新郑县郑韩故城的考古钻探与发掘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新郑工作站

全年配合基本建设工程，共计钻探25,000多平方米。探出东周及汉墓五十余座，夯土台基七处，大型的夯土遗址1,800余平方米，中型的有150余平方米，小型的10—20余平方米。探出灰坑一百三十个，水井二十四眼，文化层三百余平方米。同时，又发掘东周墓葬四十二座，汉代墓葬三座，东周灰坑一百一十六个，冷藏窑一座，水井二十五眼，夯土遗迹四处，揭露面积七百余平方米。出土文物七百二十五件，其中铁、铜、石、骨等生产工具一百零四件，陶礼器、生活用器和建筑材料四百零九件，铜器六件，玉石玛瑙装饰品四十六件，瓷器十件，骨、铜装饰品十七件，陶文五十余字，陶筹码和符号一百零八个。（蔡全法）

新乡市丁固城古墓群

发掘时间：1984年4月20日—5月14日
工作单位：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新乡市博物馆、新乡地区文管会

墓地位于新乡市西南5公里的丁固城村西北高地上。共清理古墓七十五座，其中战国墓七座，出土器物四十五件；汉墓三十六座，出土器物二百余件；宋墓十九座，出土器物四十四件；因无出土物而不明时代的土圹墓十三座。战国墓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口大底小，填土经过夯打；没有壁龛和二层台，随葬品放置在人骨架的一侧；皆单人葬，葬式有直肢和屈肢，头向除一座朝东外，余皆朝北。其中五座墓的随葬品基本一致，为鼎、豆、壶、小壶、匜、盘或浅盘豆的组合，一般豆、壶和浅盘豆每墓各出两件，余皆一件。另外两座墓，一座只出一件陶豆，另一座无随葬品。M43出土五件印有“陶其”戳记的陶器，为研究魏国陶文和手工业生产增添了资料。汉墓一般形制较小，除一座为竖穴土圹外，余皆作单室的土洞或砖券墓。皆单人仰身直肢葬，人骨头向与墓室方向相一致，绝大多数朝北，只有两座朝东。随葬品多为陶器，有罐、壶、瓮、仓、灶、

釜和盘等，一般不逾十件；五铢钱八十余枚，皆属西汉宣帝五铢形制。惟M54随葬"新莽货泉"钱一枚，在这批汉墓中时代最晚。宋墓有竖穴土圹、弧顶砖券和叠涩攒尖顶三种。前两种一般随葬一件褐釉瓷罐和几枚铜钱，时代从北宋早期到晚期都有。后一种从形制上又可分为六角形、方形圆角和鸭身形墓，皆为二次迁葬，一般没有随葬品。其中鸭身形墓形制特殊，墓室仅长约1.2、宽0.7、高0.8米，属砖室墓中的最小型。（孙新民）

洛阳市汉魏故城

发掘时间：1984年春秋两季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队

本年春季发掘了洛阳汉魏故城北城墙上的一处马面遗址。现存马面为一方形夯筑台基，包括两个时期的建筑遗迹，其早期遗迹，夯土中出有绳纹板瓦、筒瓦残片，当属魏晋时期；晚期遗迹包在早期遗迹周围，夯土中出有黑色板瓦残片，应属北魏时期。据铲探，现存高出地面的城墙也非一个时期的遗存，而早期和晚期马面遗迹正是各自附着在与其时代大体相当的城墙遗址外侧。由上述现象判断，洛阳汉魏故城的马面始建于魏晋，北魏时期在魏晋旧基上予以增修而加以利用。从而基本上解决了该城马面的出现年代及沿革问题。它表明，洛阳汉魏故城是迄今所知内地历代封建都城遗址中使用马面最早的实例。

六十年代初，曾在城北发现一段长约1,000余米的北魏洛阳外郭城北城墙遗基。本年秋季，又在城西故长分沟内侧找到了4,000余米长的北魏洛阳外郭城西城墙残基。目前北魏洛阳外郭城的勘察工作虽然尚未全部完成，但从已知现象中，不仅可以肯定北魏洛阳外郭城城墙的存在，而且对北魏洛阳外郭城的形制也有了大概的认识。这一收获说明，在从汉魏至隋唐都城平面发展演变的进程中，北魏洛阳城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中间环节。（杜玉生）

偃师县杏园村汉晋唐宋墓地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考古所河南二队

墓地位于县城西2.5公里，西距洛阳汉魏故城10公里，东距

尸乡沟商城半公里。北枕邙岭冲积扇，南望洛水。

这片墓区是我队配合首阳山电厂基建工程发现的。厂区占地七百余亩。在厂区范围内，经过钻探，共发现古墓二百余座。在1984年内已清理九十八座。

东汉墓二十七座。几乎全部是东汉晚期大型砖室墓，中、小型墓极少，未被盗掘的亦极少。墓向以坐北朝南为主。从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看，大致可归入烧沟五型墓范畴之内，年代大致属汉桓帝至汉献帝之间。可分为三种型式：

Ⅰ型：横前堂单室墓。形制与烧沟M143相同，在墓道前方开设一横向墓室，墓道与墓室呈垂直相交。此型汉墓方向无规则可循。

Ⅱ型：横前堂单后室或双后室砖券墓。前堂横置，后接棺室。此类墓一般有宽长墓道，宽大横堂，设置石门，因此一般形制较大，估计墓主生前官品较高。方向以坐北朝南者居多。

Ⅲ型：横前堂、横后室砖券墓。横前堂之后，通过甬道，衔接横后室。后室形制与前堂大致相仿，方向又与前堂平行，形成所谓“干”字型墓。

由于东汉墓大部被盗，所以出土物并不丰富。陶器有壶、鼎、盒、奁、仓、瓮、罐、博山炉、灶、杯、案、樽及猪圈、水井的模型器等。铁器有铁剑和铁钱、钱剪。漆器有漆奁、漆盒。其它有铜钱。

在东汉墓葬中，有两座墓葬出土器物无别，但墓葬形制与其余各墓相去甚远，有方形前室，左右各开一耳室和一个长方形后室。与洛阳16工区正始八年曹魏墓形制相仿，估计这两座墓也距曹魏不远。

西晋墓十五座。多数为方室掏洞墓，墓室内长方形砖铺地，四壁砌几行长方砖。这批西晋墓的特点是，墓道又宽又长，墓道两壁分级收缩。墓方向以坐东朝西为主，坐西朝东的少见。南北向的不见。西晋墓墓室不论单室，还是前后两室，均为掏洞墓，墓室顶以上是生土。用砖起券的很少发现，有的墓形制很大，前后室两道石门，但仍仅后室用砖起券。出土器物以牛车、牛骨、酒柜、镇墓俑、镇墓兽、多子槅、四系釉陶罐、陶灯、兽形灯座、圆案、鸡、狗等器物为主，器类和形制与洛阳西郊晋墓所出基本相同。

唐墓三十二座。保存较好，有墓志的十四座。最早的为景龙三年（709年），最晚的为大中七年（853年）。这批唐墓随葬品较为丰富，陶俑类有镇墓兽、马俑、驼俑、牵夫俑、文官俑、

武士俑、男侍俑、女侍俑、侏儒俑多种。金银器有鎏金银勺、鎏金铜镜、鎏金银胭脂盒、银碗、金戒指等。铜器有铜灯、铜镜、铜匜、铜钵、铜印、铜钱等。陶器有三截罐、小口瓮等。瓷器有瓷壶、瓷盘、唾盂。玉器有玉碗、玉杯、玉罐、玉盘。另外还有铁牛、铁猪、石熏炉、铅罐等。三彩器有文官俑、豆、砚、杯、双龙壶等。

另外还发掘宋墓十一座，明墓九座，时代不明的二座。（徐殿魁）

洛阳市关林唐墓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共清理唐墓五座，其中C7M59为横列土洞墓，由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成，墓室居北，长4.60、宽2.10、甬道长2.00、宽1.20、墓道长7.50、宽1.20米。该墓经盗扰，随葬器物大部出土于甬道中，计有唐三彩盘、陶马、陶骆驼、陶镇墓兽等十四件，其中三彩盘造型精巧，彩色艳丽，为唐三彩器中之精品。（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洛阳市东郊史家湾后唐墓

发掘时间：1984年10月11日
工作单位：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该墓位于洛阳东郊史家湾村机瓦厂，在备土工程中发现的。墓内出土纸质经券一张。该墓破坏严重，据现场调查清理，复原墓室长2.60、宽0.90、深距现地表2.80米。在现场清出人头骨一具，头向北；在头骨东侧清理出双耳陶罐一个。

出土纸质经券宽29.5、高38厘米，经文为梵文，系雕版印刷而成。在经券左侧还雕版印刷汉字三行，其中末行刻有“报国寺僧知益发愿印施，布衣石弘展雕字”。其下为毛笔书写“天成年正月八日徐殷弟子圂□记”。据此，可断该经券的时代为后唐天成二年（927年），距今已一千余年。该经券保存良好，完整，且雕版字体工整、清晰，不仅是我国佛教史而且是我国印刷史研究的极为重要的资料。（余扶危　叶万松）

已审阅
子居 10-03-13，13:26

新安县石寺李村的两座宋墓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李村1号宋墓为仿木结构壁画墓，墓葬可分为墓道、墓门、甬道和墓室四部分，总长9.4米，墓道居南，现存长度4.8米，为斜坡阶梯式。墓门通高2.1、进深0.76米，为仿木结构，门额部分置一斗三升四铺作斗拱，两铺作间嵌方形匾额，上刻阴文："宋四郎家处宅坟……宣和八年（即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二月初一日大葬记"。甬道作拱形券顶，在甬道两侧立面上浮雕孝子图四幅。甬道经三阶梯进入墓室，为八角形，边长1.25米，墓室高约4米，墓壁作须弥座，座上浮雕花式，六边形壁柱八根，莲花座莲花柱头，斗拱部分开始向中心收分，斗拱为一斗三升十六铺作，斗拱上即为穹窿顶，交界处饰一周莲花瓣。墓室浑体彩绘，其作法是先用石灰质物刷涂一层，然后于其上作彩绘。斗拱部分主要花纹为牡丹、云纹，墓壁上有各种花饰门窗浮雕并彩绘图案，主要有墓主人宴饮图、伎乐图、厨作图和牡丹图等。

2号墓亦仿木结构壁画墓，可分墓道、侧室、主室三部分。侧室开在墓道东壁上（高出墓道底部0.41米），为长方形拱形券顶，地面为砖平铺，壁上作门窗装饰。主室居墓道北端，由墓门、甬道、墓室三部分构成。墓门为拱形砖券，进深31厘米，砖瓦封门，门额部分饰斗拱，一斗三升三铺作，甬道为砖拱券，无任何装修。墓室八边形，通高3.30、边长1.10米。墓室七壁须弥座，六边形壁柱八根，无柱础石，莲花柱头，斗拱部分开始向中心收分，斗拱为一斗三升十六铺作，斗拱之上为八角攒心顶。墓室浑体彩绘，其作法同M1，斗拱部分为云纹，墓壁七面有各种花饰门和窗浮雕，并绘有牡丹、猫以及墓主人的生活图五幅。墓室内横陈棺木两具。（叶万松　余扶危）

江 西 省

九江市神墩商周时期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12月—1985年1月

工作单位：江西省文物工作队

遗址坐落在新合乡境内，呈土墩型，顶面平整，高出稻田5—10米，面积共25,000余平方米。经钻探得知，文化层保存较好，一般厚2.5—3.5米。试掘工作计开5×10米深沟两条，计100平方米，初步了解遗址的地层情况。除第一层为耕土层外，第二层A、B均为周代堆积，但有早晚之别；第二层C具较浓的商文化因素，出土物也较丰富；第三层年代较早，由于出土物不多，文化性质尚待研究，或可暂称先商时期堆积。

第二层A，包含物主要是附耳甗形器、足外侧带纵沟之高锥足鬲、直环耳器以及极少量矮柱足器等；纹饰有间断绳纹、回字纹、曲折纹、漩涡纹，以及勾连雷纹、菱形凸棱纹、菱形回字凸棱纹、复线菱形纹、变体雷纹与回字纹组合等。

第二层B，出土遗物与第二层A相差不大，但带纵沟高锥足鬲、附耳甗形器、直环耳器等较少，而中原式连裆鬲（浅袋状锥足，足尖有的外撇）、大口深腹盆、喇叭形圈足豆和缸形器、折肩器等较多，纹样有大块菱形回字、直线和三角形刻划纹与圆圈纹组合、交错绳纹、勾连雷纹、曲折纹、漩涡纹、带状绳纹等。另外还出土少量石质铜锛范、双翼铜镞，及铜渣。

第二层C，出土物有颈腹分明或高大于宽之绳纹袋足鬲、大圈足大盘豆、高领罐片、缸片、带附加堆纹鬲等，鬲足大都是足尖外撇，有的包裹或后安实足尖痕迹明显；纹饰主要是粗绳纹，尚未见间断绳纹，还有剔刺纹、S形纹、云雷纹及与叶脉纹组合等，遗物既具有德安石灰山商代遗址文化因素，又有万年类型商代遗址文化的某些特征。

第三层，出土遗物不多，已见大袋足鬶、子母口泥质红陶豆和浅盘豆、壶等残片及凿形足，以及采集的侧扁足浅盘鼎、泥质灰陶矮圈足壶等。

高安县七星堆战国至明代墓群

发掘时间：1984年6月—8月
工作单位：江西省文物工作队、
高安县博物馆

七星堆墓群位于高安县筠阳镇近郊，该墓地分布范围约1平方公里，在此范围内原有三十余个大土堆，由于历年取土只存十二个。每个土堆底部周长约400、高约8米，其下均有不同时代的数十座墓葬。战国、西汉、唐代多为土坑墓，东汉、晋、南朝和宋、元、明时代多为砖室墓。其中唐墓的数量较多，也是江西发现唐墓数量最多的一个点。出土文物较丰富，从以往收集和这次试掘所发现的随葬品累计达二千五百余件。遗物有陶、瓷、铜、铁、玉、金银器等，较珍贵的有战国的青铜剑、西汉青瓷鼎、青瓷钫、雕塑蛙形青瓷器、草叶纹铜镜；东汉的黑釉瓷、铜弩机；唐代洪州窑瓷器、方形铜镜；五代的白瓷器；宋代景德镇的影青瓷器、吉州窑的窑变黑釉瓷器等品种。

该墓地墓葬数量多，出土文物较丰富，时代延续较长，它对于较系统地研究江西地区古代埋葬习俗提供了资料。

另外，据文献记载，高安在西汉开始置建成县，但建成县治在何处，至今未有定论。这次试掘还发现在该墓群范围内有汉代大型建筑的废墟，有成片的碎瓦当，有拍印精美的大块花饰砖。从这些建筑构件和一大批历代墓葬的发现，为寻找建成县治所在地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线索。（刘诗中）

乐安县发现元代窖藏瓷器

发掘时间：1983年1月
工作单位：江西省文物工作队

乐安县城北寨上县物资局基建工地发现一处瓷器窖藏，窖藏系土坑竖穴，距地表深约1.5、宽0.4米。出土瓷器有龙泉釉双鱼印纹盏、高足杯，景德镇窑卵白釉印花碗，共计一百一十七件。其中完整器三十三件。

卵白釉印花碗多为回纹缠枝牡丹、回纹双凤、四飞雁等，空隙间多印有“枢府”、“福禄”、“福寿”、“禄寿”款。釉汁匀净，体薄透明，制作精工，可与元代高安卵白瓷相媲美。象这样多达一百余件且多有“枢府”款的窖藏瓷，是江西的首次发现。各式卵白釉碗底足多有墨书“德

星"、或"德星桥"款。（余家 栋）

景德镇明清龙珠阁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12月—1985年1月

工作单位：江西省文物工作队

本年度进行的是第二次发掘，在阁基内计开探方两个。北面T1揭露面积为10×7米，揭示出亭基遗迹一座，宽5.4、左长5.35、右长5.7米。左、右两侧有砖柱石各三个，用窑砖铺底、交错铺叠两层，呈弧拱形。亭为三向墙。亭西侧探方至地表层为4.05米厚。出土多弘治款青花碎瓷片。南面T2为5×7.7米，至地表层为7.72米。至3米深处发现墙基一道，残高0.56—1.12米，长2.68米。出土有成化、弘治、正德款瓷器碎片。

龙珠阁遗址属珠山明清"御器厂"的一部分。据《浮梁县志》记载："珠山在景德镇之中，独起一峰，高数十仞，绵亘数里，峰峦遥列，俯视四境。……明称纛山，后为御器厂镇山。"龙珠阁遗址的发掘，对于进一步研究明清御窑厂的烧造历史提供了一大批实物资料。（余家栋）

湖 北 省

宜都县城背溪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4—5月

工作单位：湖北省博物馆江陵考古工作站

1983年冬，在湖北省宜都县城关之北约10.5公里处的吴家岗发掘了城背溪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今年对该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这次共开探方四个（T7—T10）。其中，南区开三个方，T7在一级台地上，T8、T9在二级台地上；北区开T10一个方，在一级台地上。发掘面积共60平方米。

南区一级台地上的T7和北区一级台地上的T10，文化堆积均是从二级台地上随江边的崩塌滑动下来的断层，涨水[illegible]，都被淹没在江中。其中一部分文化层已经错乱，但还出土了较多的陶片、石器和动物骨骸，其中包括了一部分能复原的陶器。南区二级台地上的T8、9，均紧靠江边

断面上，在这两方之间有一座明清时期的窑址，此窑址打破了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层。T8、9的地层可分为四大层，其中第三、四层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层，文化层最厚处近2米。在第四层下，叠压着一条灰沟（G1），灰沟又打破了一个灰坑(H1）。G1为东西向，并由西向东倾斜，应是当时自西向东注入江中的一条排水沟。H1是不规则的锅底状，是当时的垃圾坑。在第三层、第四层、水沟和灰坑中都出土了较丰富的陶器、石器和动物骨骸。这次发掘出土的陶器、石器的特征与去年出土的一致，陶器的主要器形有罐，釜、圈足盘、双耳罐、扁壶、钵、碟和支座等，并出土了去年未见的三足器（有少量鼎足）。从T8、9的第三层和第四层（包括水沟和灰坑）出土的遗物初步观察，已有一定的发展变化，因此这次发掘对于城背溪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分期，具有重要意义。而具体的分期工作还有待于整理工作完成以后。（杨权喜　陈振裕）

宜都县枝城北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4—5月
工作单位：湖北省博物馆江陵考古工作站

枝城镇在宜都县东南15公里。遗址位于枝城镇北门外西北200余米，北临长江，西距蒋家桥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200余米，南面为较平坦的长江冲积平原。遗址在长江边狭长的冲积平原北端。

长江从西北向东南流经蒋家桥遗址，在枝城北遗址转向东流，因而遗址被江水冲刷十分严重，现存遗址范围在沿江边宽约30、长10米，面积约300平方米。这次在遗址的东北部开5×5（25）平方米的探方二个，共计50平方米。

这二个探方的堆积基本相同，可分为五层：第一层耕土层；第二层近代淤积层；第三层扰乱层，出有瓷片与房屋的大石条墙基和水沟；第四、五层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层，并有二个形状不太规整的灰坑，开口均在第四层下，并打破第五层，出土文物相当丰富，主要有石器、陶器等。石器有打制石片和石斧等。陶器以圜底器最多，还有相当数量的圈足器、平底器和三足器。主要器型有深腹罐、鼎、圈足罐、釜、支座、尊、盘、钵、碟、杯、双耳罐和小口扁壶等，其中有二十余件可以复原。这批

陶器全是手制的。陶质以夹砂红陶和夹炭红陶最多，夹砂褐陶较少，并有少量夹蚌壳陶等。纹饰以绳纹最多，素面次之，戳印纹和刻划纹均较少。还有小口瓶、罐等一些陶器的器表与圈足盘的圈足上涂有红陶衣、黄陶衣。

宜都县枝城北遗址出土的陶器，与宜都县城背溪遗址发现的陶器特征基本一致，但并不完全相同，例如枝城北遗址出土的三足器较多。而深腹陶罐、鼎、小口瓶等，均为城背溪遗址发现的陶器中所未见；又如枝城北的陶钵、罐等器表外涂红陶衣较多。所以两者的年代并不完全相同。这对于城背溪类型的文化之研究，具有重要价值。（陈振裕 杨权喜）

宜都县花庙堤等四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湖北省博物馆江陵考古工作站

1983年冬的考古调查中，在宜都县境内发现了金子山、花庙堤、孙家河和栗树窝子等四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今年这四处遗址遭受长江洪水冲刷，破坏严重，于是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总计265平方米。

这些遗址可分为两类。现分别介绍如下：

第一类：有宜都县花庙堤、孙家河和栗树窝子等三处遗址。它们都在长江南岸的长江冲积平原上，地势较平坦，因长江的江水常年冲刷，遗址破坏严重。这类遗址的地层堆积，一般可以分四层，第一层表土层（耕土层）；第二层淤积层（厚达2—3.5米）；第三层商周文化层；第四层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层。这层出土的器物，主要有石器、陶器和兽骨等。石器有石斧、石片等。陶器有陶釜、罐、钵、支座、盘等。还有鱼骨、鱼牙、蚌壳和一部分兽骨。

第二类：有宜都县金子山遗址一处。它位于临近长江南岸的一座小丘陵的山坡上，遗址高出地面约15—25米。这个遗址的地层堆积较单纯，在表土层下面就是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层，而且文化层较薄，最厚处仅1米左右。出土物有石斧、石球和石片等；陶器有釜、罐、钵、杯、支座、盘等。

今年发掘的四处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物虽然比较少，但其陶器特征明显，与宜都县城背溪遗址有许多相似之处，说明它们都是同一类型的文化，其时代

都应早于大溪文化。（陈振裕 杨权喜）

枝江县青龙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12月

工作单位：湖北省博物馆

青龙山遗址位于长岭乡青龙村西南1公里处的小丘陵上（约高出地面20多米），东南为枝城长江大桥，南、西、北三面为枝（江）宜（都）公路大桥形环路，南距长江约0.5公里余，隔江与宜都县枝城镇相望。

枝江县青龙山遗址，是1978年枝江县文化馆调查中发现的，遗址现存范围在小丘陵的中部，东西长约30米，南北宽约17米。这次在现存范围的遗址东南部与东北部开探方两个（5×5平方米）、探沟三条（2×10平方米一条、2×5平方米二条），扩方2×2平方米，共计114平方米。

青龙山遗址的地层堆积可分为四层：第一层为耕土层；第二层为近代扰乱层，出有现代瓷片、铁器及现代房基的石块、石灰坑、煤渣层等；第三、四层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层，并清理三个灰坑，出土文物比较丰富，主要有石器、陶器和动物骨骸等。石器有石斧、石片等。陶器以圜底器、圈足器较多，平底器很少，三足器未见，主要器形有罐、釜、支座、盘、钵、双耳罐、小口壶等。因尚未整理，在工地发掘时大约有十余件陶器可以复原。这批陶器全是手制的；陶质以夹砂红褐陶最多，泥质红褐陶和夹碳红褐陶也占有一定数量；纹饰以绳纹为主，素面陶以及刻划纹，镂孔纹较少，还有一些陶器的器表涂有陶衣。

遗址出土的陶器，目前未经整理，从发掘中初步观察，它与城背溪类型的陶器较为接近，它的相对年代应早于大溪文化，而属于新石器早期文化范畴。（陈振裕 杨权喜）

宜昌市伍相庙大溪文化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6—9月、10—11月

工作单位：湖北省博物馆江陵考古工作站

伍相庙遗址座落于进江溪溪口的东部山丘坡地上，东南距宜昌市约33公里，遗址周围被淤砂所覆盖，淤砂层厚达3米左右，

在地面上难以找到文化遗物。通过钻探调查，遗址范围仅保存200平方米左右。6月至7月，10月至11月先后开5×5米的探方四个，面积为100平方米。

伍相庙遗址的文化层分成四大层，第三层为东周文化层，第四层时代属西周，第五层时代属商代，第六层时代为大溪阶段。仅发现西周时期的灰坑一个。出土的东周遗物有少量陶鬲足、豆柄和罐片；西周遗物有褐陶绳纹罐、磨光黑陶暗纹粗柄豆、鹿角；商代遗物主要有敛口小底罐、螺丝壳形尖底罐、灯座形器和红陶缸片。大溪文化遗物比较丰富，除一部分石器以外，有较多的陶器，可复原的计有二十余件。这些陶器的陶质以夹炭或夹蚌壳，黑色或褐色胎，外涂红陶衣为主要特点，器形有圈足碗、圜底罐、圈足罐、折腹豆、鼎形短足鼎、盂形器、折沿瓮、器盖和支座等。其中支座数量较多，制作精细，形式较特殊，还有一件完整的彩陶圈足罐，质地较硬，陶胎近白，彩为黑色，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

伍相庙遗址不但发现了大溪及商代、西周与东周文化互相叠压的地层关系，而且获得了一批具有一定特点的大溪文化陶器，这批资料在西陵峡北岸是十分难得的，它对于了解三峡地区的古代文化面貌以及探讨江汉地区与川东地区的古代文化联系，都有重要价值。（杨权喜　陈振裕）

宜城县曹家楼屈家岭文化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9—11月

工作单位：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为配合襄（阳）沙（市）公路扩修工程，我校考古专业80级学生对曹家楼遗址进行了发掘。该遗址在宜城县小河乡詹营村西北，东距县城12公里。面积约两万平方米。此次发掘600平方米，文化层厚0.5至1.5米。遗址北部是新石器时代墓葬区，南部是新石器时代居住区。居址基本上被较密集的东周墓葬和明清墓葬所破坏。

新石器时代墓葬揭露近十座，比较集中地分布在遗址北部。以仰身直肢葬为主，除个别墓有一两件随葬品以外，余皆无随葬品。还发现同时的瓮棺葬十余座，在墓葬区和居住区都有发现。一般由两个折沿罐相扣作葬具。个别瓮棺内有随葬品。

目前正在进行室内整理，出土物有少量石器和较多碎陶片，

能复原的器物很少。可见器形的陶器有“红顶钵”、折沿罐、高领罐、宽沿盆、浅盘豆、圈足碗、小足碟、扁足鼎、澄滤器、双腹碗、双腹豆、高圈足杯、凹底罐、喇叭形杯等。陶质以灰陶、黑陶为主，红陶较少。文化性质初步确定为屈家岭文化。根据地层和器形变化，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陶质多夹细砂，晚期多泥质。双腹器、高圈足杯、凹底罐等器形都是晚期才出现的。盆、罐早晚有变化。

该遗址地处鄂北，但地方特点仍较突出。如较多的“红顶钵”、宽沿盆等可能受北方仰韶文化或早期“中原龙山文化”的影响。生活用器以折沿罐为大宗，双腹器不发达，高圈足杯少，不见屈家岭文化的彩陶器和彩绘纺轮。这些特点为了解屈家岭文化与仰韶文化晚期或早期“中原龙山文化”的关系；以及屈家岭文化的分期和地方类型的划分提供了新的资料。

东周时代的墓葬发现十多座，均为小型墓葬，都有随葬品，棺椁、人骨架均已腐烂。时代包括春秋和战国时期。器物基本组合是鬲、盂、豆；鼎、敦、壶等。（武大考古教研室）

麻城县谢家墩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11月

工作单位：湖北省博物馆江陵考古工作站

遗址位于麻城县西南约35公里，东部为举水冲积平原，与举水相距约3公里，东距汉（口）麻（城）公路约150米。隶属于麻城县良种场砖瓦厂。

遗址高出东面平地约6—8米，大部分已被破坏，现存面积约800平方米，这次试掘共开5×5米探方五个，加上扩方，发掘面积约为140平方米。

遗址的地层堆积分为四层。第一层扰土层，出有近、现代砖、瓦、瓷及石筑墙基。第二层龙山文化层，遗物主要为鸭嘴形鼎足、镂孔磨光黑陶豆柄、夹细砂红陶弦纹深腹盆、罐口沿、碗、平底器、圜底器的残片及石斧等，陶片以夹砂红褐陶最多，灰陶次之，黑陶最少。陶片多素面，纹饰为篮纹、绳纹、方格纹。陶片多残碎、能复原的器物更少。第三、四层为屈家岭文化层，土质坚硬，夹有较多的红烧土块。第三层陶片较丰富，都为碎片。同出有少量石斧、动物骨骸、木炭等。陶片火候低，易碎，易起层脱落，能复原的器物

很少。能辨认器形的主要有灰陶纺轮，夹炭黑胎红衣陶钵、盘、圈足碗、足形支座。陶片以夹炭夹砂黑胎红衣陶为主，黑褐陶次之，灰陶极少。陶片多素面，以细绳纹较多见。第四层出土遗物较少，主要为碎陶片及少量石斧，陶器不能复原，有圈足器、平底器及罐口沿，陶色以红陶为主，炭黑胎红衣陶减少。纹饰多素面，有少量细绳纹。

遗址内第一层下有灰沟一条，打破第二层。出土遗物甚少。

屈家岭文化晚期墓葬一座，打破第三层，为第二层所压，墓葬头向北，呈不规则的长条三角形，长约2.6米，不见坑壁，内有残骨架一具，尚存牙齿数枚及部分下肢骨，葬式为侧身曲肢，左腿伸直，右腿内屈。随葬陶器十五件，除一件陶杯放于腿骨关节处外，余皆呈半环形放置头部。器形有宽扁足、双腹盆形鼎、折腹杯、宽沿盆、簋、盘、豆、壶、罐、盘等。

麻城地处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处，五十年代曾在距此遗址约4.5公里处的岐亭调查发现过屈家岭文化遗物，但以后一直未进行过考古工作。这次试掘的出土遗物尚未整理，虽然遗址内陶器能复原的极少，但地层内的墓葬文化特点较明显，从而粗略推断出其相应年代。通过这次试掘，无疑对中原和长江流域文化的认识及屈家岭文化的分布地域提供了一份新的材料。（杨定爱）

宜都县茶店子等四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3—5月

工作单位：湖北省博物馆江陵考古工作站

1983年底，湖北省博物馆江陵考古工作站业务干部和北京大学考古系实习师生在清江口一带作了一次考古调查，发现有一批重要的古文化遗址遭江水严重破坏。1984年3月至5月，湖北省博物馆江陵考古工作站配合北京大学考古系研究生毕业实习，对清江口一带面临江水冲毁的四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进行了一次考古发掘工作。

茶店子遗址　位于县城西北约4公里的清江北岸、南店溪南岸，隶属于红花套区后江沱乡。遗址周围地势平坦，文化层一般被厚达3米左右的淤土所覆盖，估计保存面积约600平方米。根据文化层暴露情况，在遗址西部开5×5米的探方两个，4×5米的探方一个，1×4米的探沟一条，发掘面积共74平方米。该遗址文

化层较厚，最厚处有2.2米，发掘时共分成十一层，一至二层为近现代层，三至十一层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发现残房基二座、灰坑二十九个，灰沟一条。出土遗物除少部分石器以外，主要为陶器，可以复原的完整器物近百件，其中主要器形有灰陶扁足盘形鼎、红褐陶釜形鼎、红褐陶篮纹釜、浅灰陶圈足盘、红褐陶方格纹高领罐、褐陶盆形甑、褐陶器盖，还有研磨盆、镂孔豆、灰陶钵、碗和纺轮、网坠、陶鸟、陶龟等。

王家渡遗址　位于县城之西约8公里处，遗址分布于一台地上，范围约200平方米，发掘50平方米。文化层一般厚约1米左右，可分成四小层，即第三至第六层，均属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层。共发现灰坑四个，灰沟三条，出土的陶器主要有褐陶篮纹釜、浅灰陶圈足盘、红褐陶方格纹高领罐、灰陶高柄豆和陶人等。

鸡子河遗址　距茶店子遗址较近，即在茶店子遗址东南方的清江岸边，距离约1.5公里。该遗址大部分已被清江水冲毁，现存遗址又被防水堤压着，范围大约为100余平方米。发掘沿江边河堤开了四条探沟，面积为74平方米。文化层仅有一层，即第四层，厚35厘米左右。没有发现遗迹，出土陶器主要有红褐陶篮纹扁足鼎、褐陶篮纹釜、灰陶镂孔豆、浅灰陶粗圈足盘、方格纹高领罐、研磨盆、红陶杯、褐陶器盖和纺轮等。

蒋家桥遗址　位于宜都县枝城镇之北约2公里处，紧靠长江边的二级台地上。遗址被江水冲刷殆尽，根据江边断面文化层保留情况，在二级台地上开5×5米的探方二个，在一级台地上开3×5米的探沟一条，发掘面积为65平方米。蒋家桥遗址，地层堆积有三层，即表土层、淤土层和文化层，其中淤土层厚达3米以上，文化层一般仅厚50厘米左右。共发现灰坑一个，沟二条。出土遗物不太丰富，主要有石器和陶器两类，其中陶器能复原的有褐陶篮纹釜、褐陶方格纹柱足鼎、褐陶篮纹高领罐、浅灰陶素面圈足盘和镂孔豆等。

以上四处遗址的发掘资料，目前还未经系统整理，从已经修复的陶器来看，其特点与去年本县石板巷子的陶器特点相同，是鄂西地区同一类型的“龙山”阶段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杨权喜　陈振裕）

武汉市马投潭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6月
工作单位：武汉市文物管理处

马投潭位于武汉市东西湖区三店农场马投潭村之南，北距三店中学0.5公里,东南与东西湖区加工厂一堤相隔。遗址的中心是一个高6—8米的土墩，墩顶东西长90、南北宽85米，面积约7650平方米。保存基本完好。

从土墩西南侧断面上观察，扰土厚约30—50厘米，下面文化层厚2—4米，西南角的文化层厚达6米,夹有大量兽骨和贝壳，估计原是堆积废弃物的垃圾堆。遗址内涵较丰富。采集的石器标本有打制的不规则石片一件，小型磨制石斧一件。陶器有泥质澄黄陶、泥质灰陶、泥质黑陶和夹砂褐黄陶等等，采集的标本有三角形扁鼎足，圆柱形长鼎足，豆的喇叭形圈足，高领罐口沿、卷沿罐口等等，多以素面为主，镂孔也较常见。还采集到两片彩陶片。

文化层中夹杂有较大的红烧土块，硬度较大，火候较高。遗址中有较多的动物遗骨，采集的标本有鹿角、兽骨、兽牙和贝壳。石化程度不高，应是当时渔猎经济的遗存。陶器标本中的扁鼎足，圆柱鼎足均是所谓“湖北龙山期文化”的典型器物，但从彩陶的纹样和陶豆的形制分析，其上限似可早到屈家岭文化中晚期。

黄陂县盘龙城商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湖北省博物馆盘龙城考古工作站

本年度，配合当地水利工程，在王家嘴、杨家塆等地，开掘探方十一个，发掘面积共525平方米。在杨家嘴清理商代小型墓葬四座。在王家嘴围堤外之南，对去年已发掘的作坊遗迹有进一步的认识，遗迹形制作长条沟漕形，并发现圆形炉灶一个，直径约1米。用途有待进一步弄清；在围堤之北，发现夯土房基一座，并有石础十多个。形制及结构有待继续清理。又发现灰坑一个，出土青铜器六件，玉器二件，石器一件；在杨家塆遗址发现坑形遗迹一个，出土青铜器二十一件，陶器三件，硬陶三件，玉器三件；杨家嘴的四座墓葬出

土有青铜器十一件，陶器十三件，玉器二件。经初步统计合共出土较重要的文物大约六十八件。（陈贤乙）

沙市官堤商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夏
工作单位：湖北省博物馆江陵考古工作站

1984年1月，在沙市市区东北部的荆沙棉纺厂兴建综合大楼工程中，发现了古代陶片，经考古调查，是一处商代文化遗址。它距1981年发现的周梁玉桥商代遗址约1公里许，附近的老地名叫官堤，因此定名为官堤遗址。

官堤遗址大部分已被早年兴建的荆沙棉纺厂厂房所破坏或覆盖，保留下来的仅是遗址的边缘部分。

1984年夏，为了配合该厂基建工程，经过钻探，选择了文化堆积最厚处进行了发掘，共开了5×5米的探方四个，扩方1×2米，发掘面积共102平方米。

在发掘的范围内，文化层可分成三层，第一层为表土。第二层是后代扰乱层，出土物主要为商代陶片，也夹有少量近现代陶瓷片，并出土一件铁斧。第三层为商代文化层，仅厚30厘米左右，土质较结实，包含物不丰富，出土了少量的商代陶片。

发现的遗迹仅有小型的锅底状圆形灰坑五个，除H1、4被第三层所压，打破生土层以外，其余均被第二层所压打破第三层或同时打破生土层。灰坑内填土为黑色，质地松软，包含物不多，有碎陶片和少量烧骨出土。

官堤遗址所见遗物为陶片，能复原的器物仅四件，即鼎二件、瓮一件、缸一件。其它器形还有釜、罐、罍、杯、甑等。主要炊器为罐形鼎和釜，此外还发现一件鬲足。主要纹饰有方格纹和绳纹，还有刻划纹、附加堆纹、乳钉纹和旋纹等。

官堤遗址与周梁玉桥遗址相距不远，从出土陶器特点分析，文化特征和时代两者大体相当。（杨权喜　陈振裕）

长江西陵峡北岸的几处商周文化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湖北省博物馆江陵考古工作站

为配合长江三峡水库的建设工程，在西陵峡东段太平溪镇至三斗坪镇的峡谷两岸发现了相当

丰富的商周文化遗存，其中上磨垴、小溪口、西湾、大燕子坪、伍相庙、路家河、中宝岛、苏家坳、周家坡等遗址中，都有这个时期的遗物发现。对上磨垴、西湾、苏家坳等遗址进行了试掘。

上磨垴遗址　位于宜昌市之西北约35公里、太平溪镇之东约1公里多的山脚下，地势较陡，并有现代房屋和涧沟通过，保存情况不好，在钻探基础上，开5×5米的探方四个，发掘面积100平方米。T1在涧东，T3—T4在涧西。地层堆积分五层：第一层表土层，第二层淤砂层，第三层扰乱层，第四层、第五层商周文化层。在T2—4内发现房基(F1)一座，此房基被第四层所叠压，打破风化的砂岩层，房基为不规则的石块所垒砌，呈长方形，但仅保存了房基的北、东墙基的一部分，北墙基残长11.85米，东墙基残长3.55米。墙基宽50—65厘米，残高25—30厘米，墙基上保存20厘米的黄土墙，并有倒塌现象。T1—4的第四、五层出土的陶器以绳纹褐陶为主，也有少量方格纹红褐陶，陶片中主要有圆锥形长鼎足，鬲和甗的足，鼎、罐或鬲、甗的口沿，豆柄、杯、敛口小平底罐和红褐缸片等，还出土少量的小石碎、石镞、骨针、骨锥、铜片和鱼骨、鱼齿、蚌壳、兽骨等。

西湾遗址　位于上磨垴遗址之东约1.2公里的山沟里，其东100米左右有进江溪，南距长江约500米，高出长江的二级台地约50米。遗址位于一条沟涧旁边，周围荆棘丛生，范围约长20、宽5米。发掘面积30平方米。地层堆积有三层，第一层表土层，第二层淤砂层，第三层商周文化层。第三层又分成A、B、C三小层，但没有发现任何遗迹，出土的遗物主要为陶片。陶片特征与上磨垴出土的相似，其中主要器形有鼎、罐、豆等。从地形观察，此沟涧旁的文化堆积是当时从高处滚落下来的，因此遗址的主要部分应在高处的山间，经长期雨水的冲刷已被破坏无存。

苏家坳遗址　位于西湾遗址之东约6公里，它与秭归县茅坪镇隔江相望。该遗址保存情况也不好，在一级台地上长约100米的范围内，都可以找到商周遗物，但由于地势较陡，较平的地方都为水田，已很难找到文化堆积。发掘在遗址的东部进行，先划5×5米的探方二个，后因破坏了江岸对农田不利，故放弃了一个方。发掘的结果，文化堆积有两层，但属断层，上层属东周，下层属商至西周。东周遗物有陶鬲、盆、豆、筒瓦等。商至西周的陶器有鼎足、鬲足和器口沿，

还有较多的鱼骨等，陶器特点与以上遗址出土的相近。

通过这次调查和试掘，不但使我们了解到长江西陵峡东段商至西周时期的文化遗址十分密集，而且初步看到商至西周时期三峡地区的文化面貌与鄂东地区的文化面貌差异明显，这为探讨商至西周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古代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杨权喜　陈振裕）

宜昌县小溪口商至战国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夏

工作单位：湖北省博物馆江陵考古工作站

小溪口遗址位于长江西陵峡中段的北岸，隶属于湖北省宜昌县太平溪镇，西北距太平溪约1.5公里。早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就已经调查发现了该遗址，从七十年代初开始，湖北省博物馆、宜昌地区博物馆等单位又对该遗址作过多次复查和试掘工作。根据湖北省博物馆1972年至1973年的调查资料，小溪口遗址分布范围较大，面积约3000平方米，除暴露有大量东周陶片以外，还发现过冶铁的炉渣。1980年宜昌博物馆曾作过一次试掘，出土的陶片属东周时期。

1984年夏，为配合三峡水库的工程进行了第一阶段的发掘。发掘前经过钻探调查，原来遗址保存的范围，大部分已塌于江中，主要是修葛洲坝水库时搬走了岸边的大石块所致。这次发掘在现存遗址的边缘部分进行，在不同的方位共开方四个（T1—T4），面积为85平方米。

东部的T1在表土层以下即见生土，表土层内有少量东周陶片，文化层已被近年改田所破坏。中部的T2、T3文化层最厚处可达2米以上，一般可分成三层，第二、三层都为东周文化层。西部的T4在一级台地上，江水上涨时则被淹没，文化层堆积较薄，是从坡上滑动下来的“断层”。包含物主要是商至西周时期的陶片。

四个探方都没发现遗迹，出土遗物主要为陶器，还有石器和少量铜小件。陶器还没有整理和修复。从陶片来看，商至西周时期的陶器以红陶为主，纹饰有方格纹和绳纹，主要器形有厚胎缸、敛口小底罐、灯座形器、鼎和甗等。东周时期的陶器以灰陶为主，也有较大比例的红陶，主要纹饰为绳纹，可辨认的器形有鬲、甗、鼎、罐、豆、盂、盆、

瓮、筒瓦等。

小溪口遗址虽然已遭受严重破坏，但这次发掘的情况表明，其遗址上限可到商代，下限延至战国，残存的范围长约100米，往西与商至西周时期的上磨垴遗址仅相距50—100米。可见，小溪口一带是商周时期长江西陵峡地区一处重要的居民聚集地。出土的商至西周陶器的特点和东周陶器的特点，差别甚为明显，前者其文化性质还需探讨，而后者显然属楚文化系统。这对于研究楚文化在三峡地区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杨权喜　陈振裕）

宜昌市覃家沱两处周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6月
工作单位：湖北省博物馆

覃家沱遗址　东距宜昌市30余公里，与三斗坪镇隔江相对，位于长江北岸的第二级台地上，海拔高度80米左右。遗址东西长近300米，南北宽20—50米。开2×4米探沟二条，2×6米和2×2米的探方各一个，共发掘了32平方米。地层堆积分为三层，第一层灰黄色表土，较松散，厚20—70厘米；第二层浅灰色河砂堆积，厚20—30厘米；第三层周代文化堆积土，厚50—70厘米，上部土色黄褐，下部灰褐（多灰烬），文化遗物多出在该层。出土陶器有鼎、鬲、豆、罐、盂、碗等多种。陶系以夹砂褐陶为多，泥质灰、黑陶次之，其他较少。纹饰以粗、细绳纹为主，弦纹、刻划纹、压印纹和附加堆纹等都较少。除陶器外，还出土了一些兽骨和鱼骨以及少量的铜器残件。

黄土包遗址　紧靠覃家沱遗址东面，只隔一条小河沟（张金壤），亦在长江北岸的第二台地上。遗址面积东西长近200、东北宽近30米。开1×5、1×10米探沟各一条，4×4、3×3米探方各一个，发掘面积40平方米，地层堆积与覃家沱遗址近似，亦分三层，土质土色也差不多。但这里的第三层除发现大量周代文化遗物外，还发现锅底形灰坑三个（口径1米左右，深0.5—0.55米），在该层的下部还发现少量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物。周代遗物主要为陶器，其他有兽骨、鱼骨、鹿角和石器等物。陶器几乎全为残片，可看出器形的有鼎、鬲、釜、豆、罐、盂、？甗以及小平底器等多种，其陶系与覃家沱遗址相同。

至于两处周代遗址的具体年代，从卷沿、有颈、腹微鼓、最大径在腹的中上部、足上粗下细

呈圆柱形的高裆绳纹陶鬲，和盘壁多斜弧、柄空至顶盘、圈足呈喇叭形的素面陶豆，以及足为上粗下细的圆柱形、底为圜形的绳纹陶鼎来看，应为西周晚期到东周之际。

黄土包遗址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从打制或打、磨兼制的长方形石斧和一部分素面的泥质薄胎红陶或加红衣的钵、碗的残片以及一块上有条状黑色彩绘的橙黄陶片来看，显然都是大溪文化的特点。过去有人说在三峡一带，大溪文化的遗址都发现在江南岸，不见大溪文化过长江。现在已弥补了过去峡江北岸的这一空白。而且也为探索鄂西三峡地区的古代文化同楚文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新线索。（王善才）

麻城县白骨墩东周楚墓

发掘时间：1984年9、11月

工作单位：湖北省博物馆江陵考古工作站

为配合麻城县宋埠镇砖瓦厂生产取土，在白骨墩发掘东周楚墓六座，出土陶、铜、玉等各类文物二百六十余件。

白骨墩位于麻城县西南的李剑乡、大圣山村，东距宋埠镇约3公里，举水在墓地东面约1.5公里处自北向南流过，东面约200米为麻（城）红（安）公路。墓地西、北面是一片连绵不断的小丘陵。白骨墩的六座墓葬就在这平原与丘陵相交处的一高出东南面平地约6—7米的小土丘上。

墓葬分布密集。都为长方土坑竖穴墓，其中三座填有白膏泥。其中最小的一座坑口约为2×1米，最大的一座为10×7—6米，一般长3—5、宽2—4米。最小的一座其时代为春秋中期，未见葬具；其余五座墓的年代均属战国中期或中期偏晚，其葬具均为一棺一椁，棺椁形制均与江陵地区同时期的楚墓相同。墓向均为东西向，仅春秋墓一座为南北向。

这些墓的随葬器物除一座春秋墓，有鬲、豆、罐外，其它五座墓都随葬有一套或二套较全的仿铜陶礼器，即鼎、敦、壶；鼎敦、钫或鼎、盒、钫；另加豆、盘、匜、勺、高足壶等，并有铜兵器剑、戈、矛、镞等。其中一座还出有青铜礼器鼎、敦、壶一套及一件印纹硬陶罐。另一座还出土了铜车马器、车害、马衔、盖弓帽等。

麻城地处鄂东北，与河南、安徽二省交界。原来一直未进行过考古发掘，此次所发掘的六座

墓葬就其规模而言，有二座为中型偏小。其出土文物如铜礼器和仿铜陶礼器都是成双成对。墓坑均为长方土坑竖穴，填土中有填白膏泥，棺为悬底弧棺。这些都与江陵地区的楚墓相同，但也有其地域性差别，如器形、变化特点与鄂东地区所出相近。出土的一件印纹硬陶罐江陵地区则不见。（杨定爱）

江陵县联山的二座楚墓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湖北省博物馆江陵考古工作站

江陵纪南城西北约12公里的马山区裁逢乡联山林场渠道上的二座楚墓座落在一片高低起伏连绵的丘陵之中。1982年曾出土大量丝绸的马山砖瓦厂一号墓就在其东面约1公里。

这两座楚墓在土丘的东面和南面近坡脚处。二号墓底长约3米，宽约2米，坑内填五花土及青灰土。葬具均为一棺一椁，已大部或全部腐烂。一号墓出有铜鼎和勺，陶簠、钫、罍、匜，木镇墓兽、耳杯，玉璧、玛瑙环等十三件。二号墓随葬品大多为铜器，分上、下二层堆放，计有铜鼎、敦、壶、盘、匜、勺、剑、戈、镞等三十三件及漆耳杯和残竹简各一件。

经调查，该墓地仅渠道线上已暴露出墓口而尚未发掘的墓葬尚有五座，且分布集中。附近还有有封土堆的大型墓葬。（杨定爱）

江陵县九店砖瓦厂楚墓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湖北省博物馆江陵考古工作站

江陵九店砖瓦厂在楚纪南城东北约2.5公里，为配合该厂生产取土工程，自1981年以来，连续对这片墓地进行考古发掘工作。1984年发掘楚墓三十五座，除一座无随葬品外，共出土文物四百二十八件，其中陶器一百六十八件，铜器一百六十六件，其它漆、木、玉器九十四件。

这批墓葬墓坑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有宽窄之分；有的带有斜坡墓道。其中二座春秋墓葬墓坑宽大，椁底中部设有腰坑，内有完整狗骨架一具。其随葬品均为陶器。填土为二种：一种上部填五花土，下部填白膏泥或青灰土，另一种只填五花土。葬具为

一棺一椁者居多，单棺者次之。M439葬具为一棺一椁，木棺制作精细，为长方盒形榫卯结构，棺身和棺盖上有大型的铜铺首衔环十二个。

随葬器物为仿铜陶礼器的最多，随葬铜器的墓和随葬日用生活陶器者偏少。仅随葬日用生活陶器的墓葬时代一般较早，属春秋时期。器物组合以鼎、簠、壶，鼎、敦、壶二套加盘、匜、勺者较为突出，随葬一套礼器的如鼎、敦、壶或鼎、簠、壶的仍是成双、成对出土。还有个别墓葬出有铜质车马器。出土文物中一件漆樽制作甚为精细，保存较好，堪称同类器中之精品。（杨定爱）

汉阳县熊家岭战国墓群的发掘

发掘时间：1984年6—10月

工作单位：武汉市文物考古队、汉阳县文化馆

熊家岭位于汉阳县新农乡城头山大队，西北距汉阳县城3.5公里，北距汉水1公里，南距新农乡及汉沙公路2公里，原为一座小山包，现是武汉市第八砖瓦厂的取土场。1984年初，该厂在挖土时多次挖出青铜剑、矛和马衔等，6月至10月，汉阳县文化馆和武汉市考古队先后进行过两次调查工作。共清理战国墓葬六座，出土随葬品二百一十余件。

六座墓葬均属竖穴土圹墓，墓葬规模不等，开口面积小者为1.8×2.2平方米，大者为6.6×8.9平方米，连同墓道通长1.9米。深度均在1.6—5米之间。墓葬方向为北偏东80—86度。葬具均已腐烂，从残存的腐朽痕迹可辨明原来有棺有椁，小墓的椁只一厢，稍大的墓的椁分三厢，一厢中置棺，两厢中置器物。随葬的漆木器已全部腐烂，现在仅有较大面积漆皮。出土的成组的仿铜陶礼器，主要为鼎、敦、壶、豆，其中小墓出两鼎，稍大墓出四鼎，偶有少数簠、盘、勺之类。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火候较低，往往触手即碎。青铜器主要为兵器和车马器，有剑、矛、戈、钺、戟，各式箭簇、马衔、车辖、铜珠、虎形饰、带扣、带钩等等。玉石器有带钩、玉璧、玉管和玉璜。另外，还出有四枚紫色玻璃珠和一件双系青瓷罐。其中，虎形饰、螭形带扣铸物象形，车辖、带钩等器物上纹饰精美。玉饰中以一件管、一件大璜和一对小璜组成的佩饰都具有一定价值。玻璃珠和青瓷罐也给我们提供了探讨早期玻璃和早期青瓷的实物。

六座墓全分布在不到50米见方的台地上，较密集。各墓的椁或为一厢、或分三厢，出两件陶鼎或四鼎，证明墓主是楚人，而且身份等级不高，约相当于平民或士。陶礼器组合为鼎、敦、壶、豆，则年代应在战国中晚期。这批墓葬，大约与北距此地1公里的城头山东周遗址有密切关系。

广济县发现周代青铜甬钟和句鑃

发掘时间：1984年2月9日
工作单位：湖北省博物馆

广济县航运公司的一艘挖沙船，在县城（即武穴镇）以东约4公里的长江航道上进行挖沙疏航作业，从水面以下约19米深的江底沙中挖出青铜甬钟和句鑃二十五件。当时，甬钟和句鑃裹在沙里被分别装在开往该县城和江苏省南通市的运沙船上。除一件甬钟是在挖沙现场发现外，余皆先后在广济和南通的卸沙场上发现。

这批甬钟和句鑃，计有甬钟二十三件，句鑃二件。均锈蚀较严重，表面呈赭红色。甬钟除个别的甬把或钟体残损较甚外，余皆基本完整；句鑃完整，仅局部有裂痕。

甬钟大小不等，可分为二型五式，各式皆大小相次。均作长体短甬，长枚平景，两铣斜直，舞作两面坡形。甬中空，不与钟腔通，衡面封闭。枚分上、下两节（仅一件的枚是分三节），正面的枚径略大于反面的枚径。钟壁较薄，内壁上有不明显的音脊、音槽。钟体横截面作合瓦形。钟的正面饰变形蝉纹、回首夔纹、双夔龙纹、窃曲纹、云纹等；舞饰卷云纹或素面；钟的反面和甬把上一律为素面。最大的通高52.2厘米，重22.15斤；最小的通高21.1厘米，重2.2斤。其中有三件钟的钟体两侧带龙形扉棱；六件钟的正面有十八个枚，反面有十二个枚；一件钟的正、反两面各十二个枚。

二件句鑃为一大一小，素面，实心甬，平舞。此外，形制与甬钟相同。大的一件通高25.2厘米，重2.55斤；小的一件通高22.1厘米，重2.2斤。

根据甬钟和句鑃的形制与纹饰，推测其年代为春秋早期前后。（梁柱）

江陵县张家山三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

发掘时间：1984年1月

工作单位：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

1983年12月至1984年1月，在江陵县城荆州镇西约1.5公里的江陵砖瓦厂所辖张家山战国秦汉墓地，清理了三座汉墓（编号247、249、258）。

三座汉墓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没有墓道，方向均为东西向，墓坑四周均用青膏泥填实。三墓的葬具均为一椁一棺。M247，墓坑长3.48、宽1.58、残深1.2米，椁室由头箱和棺室两部分组成，长3.29、宽1.40、高1.15米，棺长1.9、宽0.6、高0.66米。M249，墓口长4.42、宽2.84、残深1.84米；椁室长3.30，宽1.86，高1.46米，由头箱、边箱、棺室三部分组成，棺长2.02、宽0.67、高0.73米。M258，因破坏严重，棺椁结构不清。三墓的椁室内均积满淤泥，尸骨腐朽无存，葬式不清。

三墓共出土器物一百六十余件，计铜器二十件，有鼎、扁壶、蒜头壶、锺壶、洗、罍、鍪、虎子、盘、甑、盆、勺、匕等十四种，大多保存完好；特别是青铜虎子，龙凤纹洗是汉墓中首次出土的稀世珍品。陶器共十五件，有小壶、圜底罐、小罐、盂、甑五种。杂器五十余件。漆器七十九件。

特别重要的是，三墓中共出土竹简一千六百余枚，M247出有竹简一千二百余枚，计《遣册》四十余枚、《历谱》十九枚。五部佚书：《脉书》八十余枚，《引书》一百三十余枚，《算数书》一百八十余枚，《盖庐》五十余枚，《奏谳书》近二百枚。更为珍贵的是该墓还出土了汉《律令》五百余枚，其主要内容有“繇律”、“爵律”、“户律”、“金布律”、“津关令”、“贼律”、“盗律”、“捕律”、“告律”、“亡律”、“传食律”、“赐律”、“行书律”、“钱律”、“置吏律”、“史律”、“均输律”、“具律”、“效律”等约二十八种。它较之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律十八种》内容更丰富、更全面。M249出土竹简四百余枚，其主要内容为《日书》，M258出竹简五十八枚，内容为《历谱》。这批竹简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保存之完好，在考古发掘史上都是罕见的。大量西汉律令的出土，是研究先秦史和西汉王朝社会制度各阶级关系的极其珍贵的原始文

献，是一部在地下保存了两千多年的汉代法典。

三座汉墓的年代，根据出土的《历谱》和汉律令内容的研究，以及三墓出土器物的比较，相去不远，即西汉初的吕后二年至文帝五年。（陈跃钧）

鄂州市六朝武昌城遗址

勘察时间：1984年5—6月
工作单位：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

本室部分教师和研究生，结合《鄂城六朝墓》考古报告的编写，再度勘察了湖北鄂州市市区东部的六朝武昌城（俗称吴王城），并重点调查了现存地面上的城垣与城濠遗迹。目前仅南城垣有三小段夯土墙余留在地面上，总长300米左右，最宽处50米左右，最高处近5米。南城濠的河床平均宽80米，大体上保存河床面貌者长700米左右，其中有水面者270米，俗称濠塘。结合1981年湖北省博物馆的钻探结果，可以进一步证实六朝武昌城为一东西长约1000米，南北宽约500米的长方形城池，南、东、西三面城垣外均有宽50—90米的城濠，北垣筑于江岸上，以江为池，现已崩坍，江滩上散布着大量六朝砖瓦及陶瓷碎片，曾发现过九处井窖遗迹。

7月，又协助鄂州市博物馆整理了1981年以来在吴王城内先后发现的三座古井的发掘资料。根据井的结构和出土遗物，可以初步确定江滩上发现的北垣1号水井属于东汉中晚期至孙吴早期；南垣内的2号水井属于孙吴早中期；南垣内的1号水井属于两晋至唐宋时代。而1978年发现的鄂钢古井，（载《考古》1978年5期）则应属于孙吴中晚期。（蒋赞初　戴宁汝）

武昌县斧头湖两宋窑群

发掘时间：1984年5月
工作单位：武汉市武昌县文物普查队

武汉市武昌县文物普查队在位于武昌县西南部的斧头湖东岸，又新发现了一批古代窑址。目前已统计的三十九座中，有馒头形窑堆三十四座，龙窑五座。主要分布在安山、法泗、范湖、河垴四个乡的八个大队，尤以白泥湖（斧头湖的一个分汊）沿岸更为集中。

窑堆体积较大，现存的馒头形窑堆有的高约12米，底部直径在15米左右；龙窑一般长度在30—40米之间。可见当年生产规模之大，时间之长。窑堆中露出的遗物相当丰富，以各类陶器为主。釉色有绿、青、黄、黄褐、黑等。胎质一般呈红褐色，较疏松。常见的器物有各类带流罐、橄榄形罐、平底碗、矮圈足碗、注子和缸形器等等。常见的窑，具有筒形匣钵和带5—7个乳钉的支圈。烧制的方法是以叠置仰烧为主。

窑址延续的时间较长，主要的使用年代在两宋，部分窑址可能上溯到五代，至于缸等器物可能已至元代。各处窑址的内涵也不尽相同，例如，法泗乡窑堆采集的罐，形体较丰满，多带有管状流，平底碗采用以数个泥丸支垫的方法；安山乡窑堆采集罐，流多开在罐口沿上，少见管状流；范湖乡的碗为矮圈足，支具是带5—6个乳钉的支圈，还出有注子。这些差别大约是因时间早晚的不同而形成的。但各窑堆标本的胎质、釉色诸风格大同小异，应归为同一窑系。另外，在汉阳县东荆河沿岸、武昌县梁子湖一带以及咸宁市、鄂州市等地，也有此系统的同类窑址发现。

武昌县元代南桥

发掘时间：1984年4月
工作单位：武汉市武昌县文物普查队

武汉市武昌县文物普查队在贺站乡大屋饶村东面的古港上，发现一座单拱大石桥。整个桥身长36.7、宽6.3米，桥拱跨度为6.9米，桥身距水面高约10米。在桥拱顶面的中部，由南向北竖刻有一行十四字："至正九年己丑春江夏南桥一力鼎"。证明此桥名曰南桥，建造于公元1349年，属元代晚期，距今已有630余年。

南桥桥体的外壳，原是用红砂石板砌成，石板长65、宽40、厚12厘米左右，以石灰勾缝。桥体中部则填以黄土和乱石块。桥顶部用大石板铺成路面。桥身两侧是用红砂石条砌成的驳岸，石条长80、宽35、厚15厘米左右，每层石条都是采用两横一纵的"丁字形"砌法，以求坚固。该桥保存尚好，仅桥身处有部分石块坍塌。

南桥是武汉地区现存年代最早，且有确切年代可考的桥梁。在大屋饶村所藏的《饶氏宗谱》中，有"东山公阡陌云连，外则

特建南桥，内则重修宗庙”之语，可知该桥是由饶东山始建。在桥西头南面，今嵌有一块“康熙三十六年”青石碑刻，可知此桥在康熙年间曾经修整，现在桥身上的十几块青石，约即是当年补入者。

据当地老人言，在京广线和汽车公路未修前，此地曾是由武汉南下咸宁的古道。（武昌县文物普查队）

湖南省

怀化市高坎垅新石器时代墓地

发掘时间：1984年10—11月

工作单位：湖南省博物馆

遗址在高坎垅。发掘面积约500平方米，出土成人墓葬四十九座、瓮棺葬二座。墓坑多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底距现有地表1米左右。生产工具石器有斧、凿、刀、铲、纺轮和陶纺轮。生活用具多为实用陶器，有罐、钵、碗、簋、豆、杯、瓮等。器形较大，轮制，多为黑皮陶系，有的饰有凸、凹弦纹。另有少量彩陶器皿，此外有玉璜、玉铲、石镯、石璜等。

从出土文化遗物的种类和特征分析，初步认定其文化属性，仍未超出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范畴。其中出土的曲腹杯、圈足碗、豆等器物与屈家岭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也有属于华南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常见的有肩石斧等器物。此外，出土的大型单耳罐，形制特殊，似为当地地方文化的固有风格。这处墓地的发现为研究我省湘西地区的原始文化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同时也填补了湘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贺纲）

临澧县新石器时代遗址及战国两汉墓葬

发掘时间：1984年11—12月

工作单位：湖南省博物馆

临澧县古代文化遗址大多分布在澧水和道水流域地区。由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澧水两岸经过土地平整，遗址破坏严重，或夷为平地，或埋入地下。九里乡邱桥村邹家山遗址，现存面积18000平方米，有屈家岭时期墓葬及龙山时期文化堆积，部分暴露

的木桩可能为屈家岭时期或更早的木构建筑。城关镇梅溪村梅溪桥遗址面积达165600平方米，主要是龙山时期和东周时期的文化堆积。在一百零二个文化遗址中，面积在10000平方米以上的有三十一处，包括大溪、屈家岭、龙山、商、周等各时期的文化遗存，并为追溯当地早于大溪文化的新石器遗存找到了一点线索。

墓地大多为战国两汉时期的墓葬，共六十七处，墓葬约五百座。九里乡茶场二十三座有封土堆的战国墓群，最大封土堆的直径为40米，高12米。陈二乡金家村九姊妹堆的战国墓群，高大的封土堆形成绵延起伏的九座小山包。两汉墓葬有土坑墓和砖室墓。（刘茂）

常德市德山楚墓

发掘时间：1983年12月—1984年12月

工作单位：常德地区文物工作队

墓葬分布在沅水支流枉水西岸的岗地上，共发掘一百四十五座，都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口多大于墓底；少数墓设斜坡墓道，部分墓设长方形或半圆形头龛，或兼有生土二层台。三座墓葬具保存较好，均为一棺一椁。

这批墓共随葬铜、铁、陶、漆木和琉璃器等一千一百余件，珍品有桥钮长方形铜镜、铜砝码、彩绘木俑、彩绘漆方耳杯、双虎头船形漆木琴、髹漆皮甲以及记事竹简等。陶器组合大致有罐、钵、豆以及鼎、敦、壶或鼎、盒、壶三种。年代约为战国时期。

出土竹简的楚墓，墓坑为长方形竖穴，口大底小；底长3.8、宽2.5米。葬具为一椁一棺。椁外填白膏泥，椁室长2.6、宽1.3、高1米，分棺室、头箱、边箱三部分，各部间有隔板并有门相通。棺为长方形平底，外黑漆内红漆；长1.9、宽0.5、高0.4米。

椁室中出竹简两支，均长67.6、宽1.05、厚0.3厘米。一支有三十二字，一支有二十二字，记叙了楚王对墓主的一次赏赐，系记事简。

随葬品还有铜剑、铜戈、铜砝码、铜天平盘、彩绘木俑、彩绘漆方耳杯、双箍漆奁、双虎头船形木琴、木梳、木篦以及陶鼎、敦、壶、豆等。（董国安）

古丈县白鹤湾战国楚墓

发掘时间：1984年7—9月
工作单位：湖南省博物馆、湘西自治州文物工作队

墓葬在古丈县白鹤湾第二中学基建工地，共六十四座。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大都有头龛，少数有二层台和斜坡墓道。出土陶器二百余件，陶器组合有绳纹圜底壶、钵、豆和鼎、敦、豆、壶两大类。个别墓出土簋形器。鼎、敦、豆、壶多有黑衣，有的着以朱、黄彩绘，色彩艳丽，纹饰精美，火候高。耳、腿、纽均做成阳榫与器身斗合，结构牢固。出土铜兵器三十八件：其中剑十九件，以圆茎空首式和双箍式居多，一件为扁茎柳叶形，与巴式剑类似，一件扁茎折肩，出土时剑首与茎相分离，形制与广西平乐银山岭战国墓的Ⅳ式剑相似（《考古学报》1978年2期235页，图三〇）。铜矛七件，两件銎部有三环耳，也与巴蜀矛相似。铜戈八件，内一件有虎斑纹，一件有铭文。铁剑四件，最长的达80厘米，最短的仅有30厘米，为柳叶形剑。出土铜印四件，两件为肖形“白虎”印。此外还有四山铜镜、鹅形带勾、磬、砝码、水晶环等。这批墓葬的形制和陶器组合特征，应属于战国时代的楚墓，而文化遗物以楚文物为主，也包涵了一些地方土著民族特征的文化遗物。（吴铭生）

益阳县赫山镇东周墓

发掘时间：1984年4—6月
工作单位：益阳地区文物工作队、益阳县文化馆

在益阳县赫山镇基建工地，清理了二十一座东周墓。这批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坑有长方形和窄长形两类，部份有斜坡墓道。陶器组合以鼎、敦、壶、豆较多，少数墓为罐、钵、豆。铜兵器有剑、戈、矛、镞和镦、镈等，另有铜鼎、镜、带钩、砝码、印章以及错金壶盖。琉璃器有璧、珠，还有四件铜格铁剑。

出土的铜鼎，其中三件为越式鼎，错金壶盖，工艺精美，保存完整。四件铜格铁剑出土于窄长形二层台墓中，与罐、钵、罍形陶器共存，这是益阳地区首次发现时代较早的铁兵器。（盛定国）

桃源县黄楚城战国西汉墓

发掘时间：1984年9—10月
工作单位：常德地区文物工作队、桃源县文化馆

墓葬在桃源县黄楚城狮子山，共七十座，都未经扰乱，并有多组打破关系。陶器组合主要有六种：鬲、钵、罐，鬲、钵、壶、豆，鼎、敦、壶，鼎、盒、壶、钵，鼎、盒、壶、钫，鼎、钫、壶、灶。铜器有剑、戈、矛、镞等兵器及铜镜。另有滑石器、漆皮甲、料珠等。年代约从战国早期至西汉晚期。

这批墓葬未经扰动，又有多组打破关系，器物形态变化清楚，对于探讨战国至西汉的墓葬分期，是一批极好的资料。（郑元日）

耒阳县城郊春秋至元代墓葬

发掘时间：1984年6—12月
工作单位：湖南省博物馆、衡阳市文物工作队

为配合基建工程，在城关与城郊一带的长广公路、陈家窝、齐家岭等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清理从春秋战国至唐宋元时期的古墓葬二百四十五座，出土文物近一千五百件，

在这批墓葬中，春秋战国时期墓葬共五十八座，墓葬形制都是竖穴土坑，其中个别墓的长宽比例为5:1左右，一般长宽为3:2或4:3。出土器物有铜、陶、料、玉和铁器，铜器中以兵器居多，出土的铜鼎，属于南方古越族的风格。西汉墓二十九座，出土遗物一百七十六件，东汉墓八十六座，出土遗物八百四十六件。西汉墓主要是土坑墓，东汉墓主要是砖室墓，出土遗物主要有铜、陶、料、琉璃、玛瑙、铁器，铜器中出土有各种纹饰的铜镜，大都保存完好。三国至南北朝的墓葬三十六座，出土遗物九十二件，出土器物以青瓷器为主，有完整的鸡首壶。唐宋墓葬三十六座，出土遗物六十九件，比较重要的是在一座宋墓中出土有少见的银质口罩两件。（熊传新　冯玉辉）

衡阳市茶山坳三国至唐宋墓葬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湖南省博物馆

为配合基建工程，分别在耒水两岸茶山坳一带的石村，朱家山、黄泥岭等地发掘从新莽至唐宋时期的墓葬七十七座。其中新莽墓一座，三国时期十座，晋墓三十座，六朝墓十九座，唐墓十座，宋墓七座。以上除三座宋墓为竖穴土坑墓外，其它七十四座均为砖室墓，小部分保存完整，大部分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墓葬形制除个别有甬道的外，其它都为长方形单室砖墓。出土遗物二百九十三件，计有铜、金、银、料、琉璃，陶器等。晋墓中出土大量釉色青绿的青瓷器尤为重要，器形保存也较完整，在湖南晋墓中尚少见。（冯玉辉）

衡阳市郊王家湾明墓

发掘时间：1984年3月
工作单位：湖南省博物馆

在衡阳市郊三大米厂工地，即长湖乡王家湾宋它堆发掘一座明代墓葬。葬具密封，木质保存好。棺内有一具男尸，浸泡于棺液之中。男尸身高1.67米，经医学部门解剖，肌肉有韧性，右肩、肘、腕等关节松弛，手、足指甲完好。头发呈灰白色，结髻于脑后。男尸身着丝、棉、麻丝织物九层，头、脚两旁分别置放长袍六件。随葬品有陶缸五件、木梳两把、铜镜一面、香囊与小金属各一件。随同该墓出土的还有墓志一方、刻有“宋公讳应琇，湖广衡州卫人，洪熙乙巳年（1425年）……生，正德戊辰年（1508年）殁，终年八十四岁……。”出土的男尸和服饰，为研究明代防腐和服饰提供了重要资料。（冯玉辉）

广 东 省

曲江县马坝人化石洞穴发现打制石器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曲江县博物馆

1984年8月23日，曲江县博物馆黄志高在民工清理土方过程中，发现两件砾石打制石器，其中一件为长形砍斫器，器身长17、宽8.5、厚5厘米，刃沿长13.5、裂面2.5—5.3厘米。另一件为扁圆形砍砸器，器身直径9.5、刃沿长5.5、裂面2.6—4.9厘米。这两件石器发现于与出土马坝人化石的裂隙距离约8米的粘土扰乱堆积层中，与石器同层出土的尚有大量古脊椎动物的碎骨、牙齿化石，经初步鉴定有：食肉类的犬属、西藏黑熊、大熊猫、华南虎、南方猪獾，奇蹄类的华南巨貘、中国犀牛，长鼻类的东方剑齿象、纳玛象，偶蹄类的猪、鹿、羊、牛等。这些脊椎动物的组合特点与1958年马坝人出土地层的动物群组合成份基本一致，地层岩性亦较相似。从石器打制方法原始、器形粗糙推测，新发现的两件砾石砍斫（砸）器，很可能是与马坝人同时期的石制工具。果如此，这一新的发现就填补三十多年来马坝人石器文化的空白，同时也为研究广东旧石器文化的来龙去脉提供实物证据。（宋方义）

封开县鹿尾村新石器时代墓葬

发掘时间：1984年9月上旬
工作单位：广东省博物馆、肇庆地区文化处、封开县博物馆

该墓发现于封开杏花区鹿尾村对面山岗顶部。因水土流失，仅有一南北向的长方形土坑墓底部，长3.3、宽约1米，墓底有一层厚2—4厘米的黑烧土硬块和灰土。较为特殊的是墓底的两头及中间，各挖一长方形小坑，中间的宽90、长42、深24厘米，两头的略小些。三个小坑内均放置随葬品，且保存较多的烧穴时的竹、木炭条和灰土。随葬品有石锛二件，穿孔小石钺、矛、镞各一件；石琮一件、石镯二件；陶器有鼎、豆、圈足盘的残件。石

钺、镯、陶器与石峡文化墓葬第三期的同类器特征相近。经广州地理研究所中心实验室对该墓出土的竹木炭样品作碳14测定，年代为距今4030±120年。从随葬器物看，墓主当属男性。

石琮及这种文化类型的墓葬在封开县是首次发现。石琮通高7.4、上下端射高0.8—1厘米，射径上端7.1、下端6.6厘米，内孔径上端6.1、下端5.9厘米。四面中间各一道直槽，直槽两侧各雕刻横向的凸弦纹，角边相连，两组半纹饰，每组有两个小圆圈纹，组成简化兽面纹，内孔打磨光滑、刻工精致。两件石镯磨制亦颇精美，高3.2—3.4厘米、外径6.4—7厘米，其中一件为大理岩，光润如玉，并有斑纹。

封开县这座墓葬的发现，对探索石峡文化的分布或去脉，以及北江与西江新石器文化的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杨式挺）

海丰县田墘圩发现新石器时代玉器

发掘时间：1984年5月

工作单位：广东省博物馆

海丰县田墘区农民在田墘圩东面盐场挖贝壳时，发现玉器四件，玉器色泽湖绿，属软玉类的透闪石。器身轮廓研磨规整，器表光洁。其中玉琮二件，长方柱体，内圆外方，琮面以减地法凸出四块方座，以四角为中线饰兽面纹，在横棱和圆圈之间刻划工整细浅的雷纹，高8.5、外径7、厚0.5厘米。玉环二件，环径6.7、高1.4、厚0.5厘米。玉器发现地点附近无其它文化遗物。海丰玉琮的质地、纹饰与良渚文化的玉琮相似，其制作年代可能与之相近或稍晚，这为研究广东与东南沿海地区古代文化的交往提供了新的资料。（毛衣明）

博罗县出土春秋青铜甬钟

发掘时间：1984年5月

工作单位：广东省博物馆

博罗县分庄区陂头乡大沥散屋村农民黄来久，在其住宅旁边的坡地挖水沟时，于距地面深约20厘米处先后发现了七件青铜甬钟。

这七件甬钟，其中六件为一组，大小相递，形制一致。均作高甬，甬部中空，干旋齐备，每面各有十八个细长的枚。背面无纹，舞面及正面篆部、鼓部均饰

勾连雷纹；三件较大的甬钟甬部有用云雷纹组成的三角形纹；钲部则除最小一件为素面外，其他的亦饰勾连雷纹；两边篆枚用较疏的小乳钉围绕。以其大小为序，1号钟通高50.9厘米，重10.75公斤；2号钟通高43.2厘米，重8.9公斤；3号钟通高36.8厘米，重5.9公斤；4号钟通高30厘米，重3.2公斤；5号钟通高27厘米，重2.75公斤；6号钟通高22厘米，重1.8公斤。其中4号钟和5号钟出土时分别置于2号钟和1号钟内。

另一件甬钟外形与上述的大体相同。衡口略缺，旋已毁损，亦有十八个细长的枚。正背面均无花纹，钲篆间及篆与篆之间均有细密的小乳钉作界线。残高24厘米，重2.15公斤。出土时置于3号钟内。

这些铜钟的花纹多见于春秋时期，钲篆间装饰花纹的形式，亦主要见于战国以前。博罗这批青铜甬钟的年代，大致可定为春秋时期。根据这些铜钟出土时为层叠式堆放，推测是属窖藏的遗物。这批文物现由博罗县博物馆收藏。（邱立诚　黄观礼）

兴宁县出土战国铜编钟

发掘时间：1984年3月
工作单位：广东省博物馆

兴宁县新圩区大村乡鬼树窝崩岗高约80米，山为红色沙土，草木稀疏，水土流失严重。1984年3月27日，因山土崩塌，当地群众在岗南坡约30米高处，发现了青铜编钟共六个。钟作圆筒形甬，月牙形于，正面有枚三组十八枚，其中五件大的钲部饰稜形纹，最小一件钲部饰三角形纹，篆部饰斜线纹；鼓部均饰二组勾连雷纹。背面素面，有枚三组十二枚，上部和舞部多开有长方形孔。最大一件重14.25公斤，通高50.5、舞长21.5、宽15、铣距25.5厘米。最小一件重7.75公斤，通高38.1，舞长16、宽11，铣距20.5厘米。（杨少祥）

五华县雄狮山汉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12月—1985年1月
工作单位：广东省博物馆、五华县博物馆

遗址位于华城区狮雄山，试掘面积250平方米。开探方七个。

文化层堆积最厚达1.8米。地层中可见烧土、炭屑及含石块的柱洞等遗迹，在西南面的平台上，有一条长20多米，宽1.5米左右的用角砾石块、河砾石块铺砌的通道，石块上下叠压有零碎的绳纹瓦，估计是当时的一条建筑道路。

出土遗物中，有大量的板瓦、筒瓦。板瓦均为绳纹，有直线和斜线等。板瓦一般长51、弧宽42厘米；筒瓦有大小两种，大者饰间断粗绳纹，小者饰直线或斜线细绳纹。瓦当为卷云箭镞纹，其中有的中圈内有篆文。其他遗物有陶盆、盂、盒、罐、豆、釜、圈足器、器盖、纺轮、网坠以及残铁镞（?）、锄（?）、残石器等。陶器纹饰以方格纹为多，方格纹中有带各种形式的戳印纹，其他还有篦点纹、水波纹、弦纹、绳纹等。

该遗址出土的陶器及花纹，可见于广州西汉墓。据此，遗址的年代，大体亦属西汉时期。五华县在汉初时属龙川县辖，据史料载，赵佗曾以龙川为兴王地，在五华山下筑长乐台行宫。狮雄山即位于五华山下的盆地之中，南临五华河，山高约50米。试掘及勘探情况表明，这里是一处较大型的建筑遗址。该遗址的发掘，将为探寻西汉时的长乐台遗迹提供重要线索。（邱立诚）

广州市郊沙河东汉墓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广东省博物馆

该墓为中字形券顶砖室结构。墓向71°。券顶全部塌毁，甬道已遭破坏，前室长2.30、宽2.30、残高1米左右，后室高出前室20厘米，长3.30、宽1.60、残高0.55—1.08米。墓壁用双层平砖砌筑，墓底顺铺平砖。砖的一侧有几何形戳印纹，随葬品主要放置于前室，棺具及人骨架均已腐朽无存。

该墓出土的随葬品共有六十件。铜器仅见铜镜一面，余为陶器，有鼎，壶、釜、碗、盂、耳杯、奁、熏炉、灯、车、匏勺、勺、仓、井、牛圈、女俑，人面兽身俑、牛、羊、猪、狗、鸡、鸭等器物。其中人面兽身俑，在广州汉墓中较罕见；牛圈模型器比较完整，形态生动别致，以往在广州汉墓中发现的畜圈栏大都附设于房屋的一侧，单独的畜圈器物尚不多见。（尚杰）

广西壮族自治区

隆林县那来洞发现古人类化石

发掘时间：1984年7月

工作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那来洞位于隆林县城西北约34公里，北纬24°53′11″，东经105°7′42″，海拔约800米，洞在红岩山半腰，高出当地公路约50米，洞口向西。洞南有一条小河，流入南盘江。洞口高约7、宽约8、进深130米。洞分前、中、后三个洞室，在后洞室黄色粘土堆积中发现人类右上、下第二臼齿各一枚，动物化石有巴氏大熊猫、剑齿象、古豺、弥猴、中国犀和熊等六目十四种，是第四纪生活在华南洞穴中的常见动物，其地质时代应属更新世晚期。

两枚人牙，从其颜色、尺寸大小、石化程度和磨耗情况来看应是同一个体，其年龄在二十五岁左右，根据牙齿的咬合面光滑、各齿尖嚼面没有明显的齿脊、齿尖圆钝等特征，显示了它们的进步性，属于智人阶段。（彭书琳）

田东县大索屯战国墓

发掘时间：1984年2月

工作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林场工人在祥周公社大索屯南面的虎头山上挖树坑时挖出两件青铜器。自治区文物工作队随即调查清理，在两座墓中收集文物九件，计有铜剑三件，铜叉形器二件，铜矛一件，铜斧一件，玉镯一件，陶罐一件。

这两座墓，皆是竖穴土坑墓，无墓道，建在山顶偏北一侧，两穴相距约10米，均东西方向。墓坑开口在地表平面，用原坑土回填，间杂以河石，经过夯实。墓底铺一层白沙土。墓葬破坏严重。保存稍好的一穴，长4、宽2、深约1.60米。两墓的随葬品数量悬殊，其中一墓仅埋一件陶罐。两座墓都发现有人骨碎块。从墓葬所出的文物来看，与1977年该县锅盖岭战国墓出土的器物基本相似，说明这两座墓的年代为战国时期。（蓝日勇）

合浦县发掘八座汉墓

发掘时间：1984年11月至12月

工作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

这批汉墓规模不大，属中小型墓葬。四座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另四座是凸字形或十字形砖室墓。四座墓留存有封土。六座墓带斜坡墓道，内有一座墓的墓道下端口伸入墓室1米。土坑墓的回填土有两种：一种是只填五花土，有二座；另一种是上部填五花土，下部先在椁室四周附一薄层白膏泥或灰白膏泥作保护层，然后再在膏泥保护层外填黑泥或五花土，有二座采取这种做法。

四座砖室墓均早年被盗，遗物很少，且大都破碎，主要是陶器，有罐、碗、钵、屋等。四座土坑墓未遭盗扰，随葬品完整。其中小墓的随葬品全是陶器，有罐、壶、釜、钵、盆、器盖等六种。中型墓的遗物比较丰富，以陶器为主，陶器组合有鼎，罐、五联罐、四系罐、壶、匏壶，井、灶等三种；还有铜酒器、铁器、滑石器、琉璃器、玛瑙、水晶等。按它们的组合和用途可分为实用器类和明器类。

根据随葬品来推断，四座土坑墓的年代，一座是西汉中期，另三座是西汉晚期。四座砖室墓，均是东汉时期。

这批墓葬遗存的器物共计一百六十二件。其中的铜罍、磨刀石、龟形琉璃器及一些暂不知器名和用途的滑石器，皆为广西汉代墓葬中前所未见。墓中以磨刀石随葬，是战国时期西瓯民族的葬俗之一。西汉墓中有磨刀石，为探索西瓯民族西汉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及其归宿，提供了新的资料。（蓝日勇）

武宣县勒马村六座汉墓

发掘时间：1984年9月

工作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勒马汉墓在三里公社勒马村北部，1981年10月普查时发现，今年分别在南北两段各发掘了三座墓。六座墓均为竖穴土坑墓，南段墓室呈长方形，墓长4、宽1.8—2、距地表深2.5米；北段墓室略呈正方形，墓长5—6、宽4—6、距地表深2—2.5米，其中M5的北、东、西三墓壁还有25

厘米宽的二层台。南北两段墓室底部都挖有器物坑，深15—20厘米。墓室底部结构以北段M5最为特殊，其墓底都以大青石铺设，在西墓壁与北墓壁衔接处，掘一遂洞器物坑。遂洞高50、底宽40厘米，顶作拱状，器物布满其间。两段墓向均坐北朝南，唯独M5坐南朝北。出土器物：南段三墓共十四件，其中M1空无一物，铜器有盘、奁、釜、壶，陶器有壶、罐、盖鼎；北段三墓出土器共四十四件，铜器有簋、盉、碗、镜、釜、钱，陶器有纺轮、壶、盖罐、炉、带角钵，杯、钵、奁、唾壶、房屋、灶，银器有手镯、戒指，另外尚有铁刀、调料石片、玛瑙饰件、料珠饰件等器物。从以上出土器物特点分析，南段墓内出土的铜盘、铜奁、铜壶、陶盖鼎具有西汉时期特点，故墓葬年代当属西汉；北段墓内出土的陶屋、陶灶、环首刀以及玛瑙“工”字形饰件是广西东汉墓中常见的器物，故北段墓群的年代应属东汉。

武宣县地处古牂牁江下游，秦时属桂林郡，秦末汉初属南越国辖地，汉武帝元鼎元年设中溜县。这些墓葬的发掘对于研究广西越族文化及历史具有参考价值。（郑超雄）

兴安县石马坪汉墓

发掘时间：1984年9月

工作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兴安县文物管理所

石马坪古墓群位于兴安县城西南20公里处，在湘、漓二水的古运河灵渠岸边。1983年已发掘十四座，今年在原发掘区附近继续发掘十一座。这十一座墓中有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六座，带斜坡形墓道的土坑墓二座，砖室墓三座，出土器物二百多件，包括铜、铁、陶、瓷、琉璃、滑石，玉等质料的随葬品。时代最早的为西汉中期，最晚的为东汉晚期。其中第21号墓规模较大，墓室长4.8、宽4.2米，前有斜坡形墓道，椁室内有东西并列的两具木棺残迹，出土随葬品八十二件，包括铜器三十一件，铁器十件，还有陶器、琉璃、玛瑙、金饰、玉印等，出土铜钱近千枚，除五铢钱外，还有“大泉五十”，时代属西汉晚期。第20号墓是带斜坡墓道的长方形券顶砖室墓，随葬品有陶器、青瓷器、铜器、铁器、玛瑙珠等，所用墓砖侧边有几何形图案花纹，其中许多券顶砖印有“永平十六年作”或“十六年”铭文，为该墓的年代提供了

可靠依据。

龙山湾古墓群和茅坪古墓群都属于湘漓公社，在县城北约5公里处，靠近湘江支流漠川的南岸。龙山湾古墓群清理四座，其中二座土坑墓，二座砖室墓。出土陶器、青瓷器、铁器三十余件，时代分别属于东汉、晋和唐代。茅坪古墓群清理三座，都是砖室墓。出土陶器、青瓷器、铁器、琉璃珠等二十余件。时代为东汉至东晋。（蒋廷瑜）

贺县石壁湾东汉三国墓

发掘时间：1984年10月

工作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贺县文物管理所

墓群位于贺城乡寿峰村石壁湾西南的芒楝岭上。这次清理发掘了十一座墓葬，其中七座土坑木椁墓、二座砖室墓、二座石室墓。土坑墓中有一座是砖木合构墓，一座是双室墓，五座为单室墓。石室墓和砖室墓墓室已全部崩塌。其中仅有一座砖室墓未被盗，余三座都经不同程度的盗掘。这十一座墓，除一座较小外，其余均属中型墓，普遍都有斜坡式墓道，但墓道都很狭小。二座砖室墓平面呈“凸”字形，带短甬道，墓室用青灰二色花纹砖砌筑，花纹向着墓内，券顶。石室墓二座均利用天然风化石块错缝平砌，纵横不定、石块较平直的自然面向墓内，形成整齐的墓壁，据发掘时观察，为穹窿顶。

这十一座墓的随葬品大多置于墓室的前端或甬道部分，有一座墓的随葬品排列于墓道中。所出有铜器、铁器、陶器、瓷器、玛瑙等，其中以陶器为主，依次为铜器、瓷器、铁器、玛瑙。其基本组合为：陶罐、陶釜、陶碗、陶盒、瓷罐、瓷壶、环首铁削（或铜削）等。有的墓还出铜釜、铜镜、铜鉴、五铢钱、铁斧、铁臿、铁凿、铁锯、刮刀、陶屋、纺轮、陶牲畜俑、泥生肖和玛瑙珠饰等等。根据这批墓的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推断，年代应为东汉晚期和三国时期。

三国时期，广西地属孙权的东吴。有关东吴时期的文物，广西过去发现很少，这次大量的出土实属首次。（覃义生）

南丹县里湖南宋至清末岩洞墓

发掘时间：1984年3月

工作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

馆

岩洞葬主要分布在白裤瑶族聚居的里湖公社的怀里、化果、纪后、仁广、瑶里、董甲六个大队内。洞内棺材，一种搁在一个"井"字形的架上，架顶多饰有牛角、矛、刀、鸟和人头等装饰，以牛角形居多；另一种搁在两条横木上，两头上、下、左、右呈"十字形加栓。棺内尸骨少则一具，多则七具。根据棺内尸骨数目和各骨的位置，里湖岩洞葬是直肢合骨群棺葬。采集的随葬品有织物残片、木枕、牛角器、扁担形器、铜镯和瓷碗等。织物中有巾、衣、裤、裙；包括纱、绢、绮、罗、缎等丝织品。

采集颅骨三十一个，其中男性十四个，女性十五个，小孩二个；肢骨十七副，其中女性十副。年龄最小的为五—七岁，最大的五十五岁以上，二十—四十五岁的个体最多。

根据随葬品和当地实行土葬的时间初步推断，这群岩洞葬的时代为南宋至清末。（彭书琳）

四 川 省

广汉县三星—真武遗址

发掘时间：1980年至1984年

工作单位：四川省文管会考古队、广汉县文化馆

遗址位于广汉县城西10公里，现属南兴乡三星村和真武村地界。1980年起，对三星堆等遗址进行过三次发掘。共发现房屋遗址十八间，灰坑三个，墓葬四座，陶窑一座。根据地层、遗物和碳14测定，确定这是一组新石器晚期到商周时代的遗址群，是早期蜀文化最大最主要的一处古遗址。

1934年继续配合基本建设在真武村西泉坎工区和三星村三星堆工区进行了两期发掘，并对整个遗址群进行了全面复查。全年发掘面积520平方米。

在西泉坎发掘区发现了房屋基槽和大量烧土，由于扩方未完，房屋数量和全貌尚不清楚，但从结构看是与三星堆相同的方形房子。西泉坎发掘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找到了前几年发掘的四期文化遗物的直接叠压关系，并从文化特征上与新凡水观音衔接起来，对于建立早期巴蜀文化的发展序列具有重要价值。

三星堆1984年抢救发掘了300余平方米，这里属于低洼的

废弃坑，没有发现重要遗迹，但出土了相当数量的二期或三期文化的典型器物，构成了遗址分期的重要单元材料。在三星堆土堆下部发现了一层文化堆积，初步确定土堆为人工堆积而成。经复查，整个遗址群东西长约2000—1600米，南北宽约1000—1200米。在遗址群的东部和西部，也有两条类似三星堆情况的土埂堆积，它们是否早期的城址或建筑基址？准备在1985年的工作中做进一步的探索。（赵殿增）

炉霍县充古村石棺葬墓地

发掘时间：1984年5月—8月
工作单位：四川省文管会考古队等

墓群位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西20公里的充古村，今年共抢救发掘了石棺葬二百七十五座。

这群墓葬排列整齐，方向一致，没有打破和叠压关系，是一处典型的氏族公共墓地。墓葬结构与过去川西地区发掘的石棺葬基本相同，即用薄石板做成棺壁及棺盖，少数墓葬用石块砌成，也有个别土坑墓。葬式较为繁杂，有直肢、屈肢、侧肢、踡踞等多种。出土器物一千多件，器型与过去发掘的石棺葬随葬品有较大差异：陶器极少，小型装饰品和小型工具很多，特别是出土了上千件的细石器，更为罕见，此外还出土了一批毛、麻织品。装饰品中的各类项珠、手镯、牌饰具有浓郁的石棺葬文化特色，还出土了带柲的弯柄铜戈、鱼尾形铜戈、骨针、骨管等珍贵文物。

这批石棺葬的时代推测要比过去川西发掘的战国、秦汉的石棺葬要早，可能上溯到西周、春秋时期。发掘墓葬数量是历来石棺葬考古工作中最多的一次。为石棺葬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赵殿增）

茂汶县撮箕山石棺葬墓地

发掘时间：1984年9—11月
工作单位：四川省文管会、阿坝州文管所、茂汶县文化馆

墓地位于茂汶县城北3公里、高出岷江河谷100米的半山腰上。墓葬均依山而葬，头向山顶（东北方），排列整齐有序。今年配合砖厂取土发掘了石棺葬六十二座。

这批墓葬均用薄石板做棺壁

和盖板，与过去发掘的石棺葬形制不同之处是棺内多数有头厢，随葬品放在头厢之中，个别石棺分为上下两层。葬式多为仰身直肢。随葬品共三百七十多件。陶器居多，除了常见的双耳罐、单耳罐等器形外，多数为夹砂红陶小罐。此外还有铜牌饰、骨饰、玛瑙珠等物。

茂汶是川西北石棺葬分布最集中的地区，可能是该文化的中心地带。撮箕山墓群的时代与过去发掘的城关石棺葬早期（战国）相当或更早，是该地石棺葬时代较早的一个墓地。（赵殿增）

广汉县东汉“雒城”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1月、6月

工作单位：四川省文管会考古队、广汉县文化馆

1984年1月，位于广汉县城东南角的导航站在基建时发现有“雒城”字样的汉砖，6月，广汉西门的国营旅馆内也出土了同样的砖。为配合基建进行了两次发掘，共清理出砖包城墙长达70多米，初步弄清了城墙的时代、走向和大致结构。

城东南角的一段，断断续续清理出55.6米，城墙残高30—80厘米，墙体为泥土分层夯筑，夯层厚6—8厘米，墙残宽2.5米。在夯土墙外侧，用砖包砌一层。砖上多有“雒城”、“雒官城墼”两种字样。从夯土中出土的器物、钱币，以及城砖的字体，可以确定此城的时代为东汉时期。

城西门的一段，已清理出长18.3米的城墙，结构与城东南角的一段相同，但更为完整。夯土城墙宽约8.7米，字砖包在城墙内侧，最高处尚存十一层砖，砌法整齐有秩。

汉代发现砖城不多，《水经注·浊漳水》记载：“邺城……饰表以砖”。从调查情况看，此次发现的城应是汉代广汉郡治“雒”，其位置、城墙走向大体与唐以后的汉州城重合。“雒城”遗址的发现，对我国城市建造史研究及广汉郡历史的探索，都具有重要价值。（赵殿增）

邛崃县什方堂“邛窑”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2月至5月、9月至12月

工作单位：四川省文管会考古队、邛崃县文管所

什方堂“邛窑”遗址位于四川邛崃县城南2.5公里。今年进行了两次抢救性发掘，共发掘面积2,760平方米，清理出“龙窑”四座，唐代民居建筑基址一组，出土各类文物标本上万件。

什方堂处在南河南岸，沿河分布着十三座窑包。这次发掘的是3号和5号窑包以及其附近地区。清理出的四座窑炉均为斜坡式龙窑，由火膛、炉身、烟室等部分组成。较完整的一座长27.4米。窑炉内广泛使用匣钵，其中一座窑内有两排匣钵尚未扰动，对研究“邛窑”的烧造工艺很有价值。

民居遗址在5号窑包的南侧，叠压在三座窑炉之下。目前已清理出房基五间，连成一组，形成一个有天井的院落。房屋均为砖石结构，地面有砖铺和泥铺两种。其中4号房为正厅，座北朝南，有台基、散水沟，前面有梯步，四周有石柱础，面阔7.6、进深5.8米。这组民居遗址处于窑场之中，叠压在早晚期的窑炉之间，推测是与窑场有关的一组特殊建筑物，对研究古代建筑和邛窑历史都有重要意义。

两期发掘共获得文物标本五千多件，种类和数量都大大超过了过去收集的文物，并且有明确的层位和年款，是研究“邛窑”产品及断代的重要资料。

“邛窑”史书没有记载，本世纪三十年代军阀在此盗掘，才为较多学者所知，因其产品具有地方特色，故命名为“邛窑”。五十年来中外专家多次来此调查，邛窑产品也广泛流传国内外，并为学术界公认为唐代前后川西地方窑的代表。但邛窑遗址一直没进行过发掘。这次是第一次科学考古发掘。（赵殿增）

贵州省

毕节县青场瓦窑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7—9月

工作单位：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

遗址在县城西北45公里的青场区青场镇瓦窑村，北距云南镇雄县城仅28公里。遗址在乌江上游六冲河支流吴家屯河西岸的三级阶地上，下距今河面20米以上。

发掘共开探方十一个，揭露面积约200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1.70米以上，最深处距地表近3米。由于表层厚，遗址保存较

好，发掘部分基本未受后期扰乱。遗址中发现有柱洞、火塘等居住遗迹，房屋为半地穴式，火塘共发现八处，均为不规则圆形，直径0.4—0.6米。窑址发现一座，保存较为完好，其构造与今日黔西北地区之露天小窑基本相似，有火孔、风道。发掘时火孔中尚装满木炭。

出土遗物以石制生产工具和陶制生活用器为主。生产工具多数为磨制，有石斧、石锛，穿孔石刀、砺石、石范等；打制工具有石锤、石砧、石片、石核和利用卵石打制成的网坠等；并出土有较多的烧石；另有若干陶制的纺轮。网坠出土数量较多，同时又出土有若干兽骨、兽牙，表明渔猎仍是当时人们的重要生产活动。

生活用器以陶制的炊器和盛储器为基本内容，以夹细砂红陶和泥质磨光黑陶为代表。纹饰施于颈部以下，有绳纹、刻划纹、方格纹、网格纹、圆点纹、涡纹、回纹、叶脉纹等；刻划纹多施于肩、颈部，叶脉纹均在器底；以细绳纹为普遍，占总数的二分之一强。器形多小平底，有部分圈足器，未见三足器，出土有锅庄石。可复原的器物有夹砂红陶罐、磨光黑陶壶等。

遗址中还出土了一批装饰品，有磨制精美的骨簪、陶制的管饰、环饰等。

青场遗址的出土文物虽然表现出较多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但遗址中出土的石砧，在我省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兴义猫猫洞、普定穿洞等遗址中，均有出土。遗址中又出土有石范及少量铜、铁等金属，表明此遗址受到邻近地区先进文化的影响，已经使用金属，其绝对年代较晚。（席克定）

安龙县木科出土羊角钟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

该钟出土于化力区停西乡木科，为椭圆形，上窄下宽，顶部有两对称长方穿孔，顶端竖立两羊角形钮。通高37、底长21、底宽16厘米。目前，这种羊角钮铜钟仅在云南、广西、广东发现，贵州尚属第一次出土。据文献记载，战国秦汉时期，安龙县系夜郎国领土。这件羊角钮铜钟的出土，为探索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提供了新线索。（宋世坤）

息水县城关明墓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

该墓系一小型长方形土坑墓，由于墓外密封极佳，墓内出土了一具保存完好的男性湿尸，并出土纺织品二十六件和《历书》六册。纺织品有棉、丝两种，均系服饰，其种类有补服、长袍、棉袄、夹袄、短衫、夹裤、单裤、裙、腰带、护膝、帽、靴、袜、袋等，还有垫被一床。六本《历书》保存完好，字迹清晰。其中包括明万历十九年至二十二年各一册，万历二十三年二册。（宋世坤）

云 南 省

云南省文物普查

普查时间：1981—1984年
工作单位：云南省文物工作队

自1981年下半年起，经四年的努力完成了全省文物普查的任务。除了省文物工作队全力以赴参加工作外，全省约有2,400余人参加了普查，一共调查落实各种不可移动的文物项目五千三百零五项，其中古生物化石地点和古人类遗迹二百五十四处，古文化遗址七百一十七处，古墓葬七百二十八处，古建筑及纪念性建筑一千四百五十四处，碑刻、崖画、摩岩石刻等二千零六十处，帝国主义侵华遗迹九十二处。这是云南省文物调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收获最为丰富的一次。

在古生物和考古学方面的主要收获有：1.晋宁夕阳区发现侏罗纪恐龙足脚六百多处，经初步鉴定，其中包括三个新属，七个新种，具有重要价值。2.昆明呈贡龙潭山、昭通闸心场大过山洞、个旧阿蚌村发现古人类化石。其中龙潭山发现完整骨架，经测定为距今5万年左右的早期智人。3.嵩明、寻甸、镇康、耿马、河口、丽江、保山等地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保山塘子沟发现距今8000年左右的“中石器时代”遗址，在云南尚属首次。4.发现新石器遗址三百多处，比普查前增加两倍。根据不同的文化内涵和分布情况，目前可以确定云南存

在六种新石器文化和四种不同类型。即：鲁甸马厂文化，晋宁石寨山文化，宾川白羊村文化，元谋大墩子文化，云县忙怀文化，耿马石佛洞文化。四种类型是：维西戈登村类型，双江忙桥类型，麻栗坡小河洞类型，红河勐龙类型。新发现的遗址中昭通鲁甸的野石山面积达20万平方米以上，有半竖穴式建筑遗存和夯筑土台的墓群；耿马石佛洞是一大型洞穴遗址，洞穴内有文化层堆积的面积达3000平方米。5.发现青铜时代墓地百余处和数处金石并用时期遗址。除常见的滇池、洱海区青铜文化外，在元江—红河流域发现一种以红河牛皮寨为代表的新的青铜文化类型。而昭通发现的水井湾古墓群，出土物与贵州威宁相近，可能与古代的濮人有关。6.威信、牟定、禄丰、金平、广南、澜沧、孟连、腾冲、镇康等地发现铜鼓。7.永仁菜园子、元谋大墩子发现新石器时代石棺墓，而青铜时代石棺墓在姚安、南华、祥云、宾川、巍山、南涧、弥渡、中甸、德钦、维西和怒江州的大部份县都有发现。8.在保山金鸡将台寺，保山市郊诸葛营发现大型东汉—蜀汉时期的建筑遗存，诸葛营还发现有蜀汉纪年的墓葬，为我们研究永昌郡和博南古道提供了重要物证。9.腾冲发现南诏时期建筑遗存；云龙、腾冲发现大片宋元时期火葬墓群，其中云龙等地保存了大批梵文碑刻；剑川石钟山石窟狮子关梵僧石雕发现大理国"盛德四年"题记。10.思茅澜沧县勐况乡发现元代"整控渡摩岩"石刻。俗称"思茅之碑"，道光《云南道志》有载，方国瑜先生进行了初步研究，但一直没有找到地点。（邱宣充）

东川市普车河古墓群

发掘时间：1984年底—1985年初
工作单位：云南省文物工作队、
东川市文物管理所

古墓群位于东川城西北12公里，金沙江支流小江的西岸，海拔1400米，东距小江约800米，墓地高出小江水面约200米。揭露面积200平方米，共清理墓葬三十九座，出土一批珍贵历史文物。

墓葬分布密集，叠压、打破关系复杂。墓向西北，形制皆为竖穴土坑，一般长2、宽1、深0.6米，部分墓穴用石块垒边。未见封土或其它标志。随葬品有铜器、铁器、石器和陶器，计约一百八十余件。青铜器所占比例较大，种类有戈、矛、剑、镞、

斧、削、匕、爪镰、首饰、扣饰、镯和铜铃等。还出土一块溶炼过的铜渣。铁器有爪镰、矛及环首刀。石器有爪镰、珠、管和砺石器。陶器有罐、盘、杯和纺轮等。陶质多夹砂灰陶，夹砂红陶次之。陶器纹饰有叶脉纹（多饰于底部）、刻划纹、锥刺纹、乳钉纹、篦纹。敞口鼓腹小平底罐是最为典型的器物。经初步考证，墓葬年代大致在西汉时期或可晚至东汉初期。

这批资料，对于研究东川地区古代历史有重要价值。出土的炼铜渣，证明至迟到西汉时期，当地的冶铜业即已存在并具有相当水平。各类器物，在造型、质地、纹饰等方面，与滇池地区青铜文化有较多的一致性。（熊正益）

西藏自治区

拉萨市曲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

调查时间：1984年11月

工作单位：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

拉萨市北郊曲贡村遗址南距拉萨市约5公里，分布在曲贡村和军区总医院北面的山坡下端，遗址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保存现状较差。调查中试掘4×5、2×1.7米的探方各一个，试掘面积23.4平方米。揭露出灰坑两座，窖穴一座，晚期石棺墓葬一座。窖穴平面呈圆形，一侧有一级小台阶。

调查时采集和试掘中出土的遗物较多，包括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骨器、陶片、兽骨等。石器中打制石器占绝大多数，质料多系灰角岩，种类较多，有双肩石铲、长刮器、双边刮器、弧刃刮器、尖状刮器、盘状敲砸器、柱状敲砸器、球状敲砸器、两侧打缺口网坠等，琢制石器有石磨盘，磨制石器有玉碗。陶器均为手制，个别器物加慢轮修整，泥质陶、夹砂陶各占约半，陶色以灰褐为主，其次为磨光黑皮、褐、红褐色，以磨光黑皮陶最具特色；陶器纹饰盛行刻划纹，锥刺纹、锯齿纹、弦纹、附加堆纹，三角形假镂孔等也是常见的纹饰。器物组合以罐、钵、碗、豆、壶为主，只见圜底、圈足，不见平底、三足器，耳较发达。骨器种类也较丰富，有针、锥、匕、镞、刮削器等。

曲贡遗址的原始文化具有明

显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可以确立为西藏境内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有别于卡若文化的独特文化类型。（张建林 更堆）

乃东县钦巴村新石器时代遗存

调查时间：1984年7月

工作单位：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

在乃东进行普查时，先后从亚堆区曲德公社、温区钦巴村两处征集到磨制石器三件、磨制玉器一件，并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在钦巴村找到一处小范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位于雅鲁藏布江支流温河西岸的坡地上，范围约1800平方米。未发现统一文化层，散见灰坑五处，暴露出灰层、木炭、烧骨。对一已遭严重破坏的灰坑进行了清理，发现红烧坑壁和木炭堆，估计此灰坑为半地穴式居址。征集到的四件石、玉器中，有两件石锛出于钦巴村遗址灰坑近侧，其余一件玉磅、一件石斧分别自雅堆区曲德贡四队和温区车门公社征集。以雅堆区征集的玉磅最为精美，绿色玉质，通体磨光，刃锐利，一端钻孔。乃东征集的磨制石器和钦巴村遗址的发现，提供了在西藏寻找新石器文化遗存的一个重要信息。（张建林）

乃东县普努沟古墓群

调查时间：1984年6月

工作单位：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

乃东县昌珠区桑珠德庆公社普努沟古墓群大致可以分为十二组，共计三百二十三座墓，散布于普努沟北侧山坡和洪积扇面上，分布面积约1平方公里。其中，一至四组的一百零五座墓分布在北侧的七个突出的小山坡上；五至十二组的二百一十八座墓分布在北部的洪积扇上。整个墓群中，封土宽端边长在10米以上的大型墓有十座，多数墓为小型墓。这次清理的六座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为竖穴石砌单棺，第二种为竖穴石砌多棺，第三种为竖穴石片棺。六座墓葬共出土器物二十八件，包括铜片饰、铜铆接片、铜带扣、铜圆饰片、铜钵，铁镞、铁带扣、铁铠甲片，石斧、穿孔石器、穿孔石片，陶罐、陶三联鋬，以及竹筒残片、漆片、穿孔绿松石饰物等。普努沟墓群的文化特征非常明显，应当是吐蕃时期的藏人

墓葬。（张建林）

山南地区发现二十处古墓群

发掘时间：1984年5—8月
工作单位：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

继1982年在朗县发现列山吐蕃墓群之后，去年在乃东县又发现了二十多处古墓群。这些墓群分布在贡布日山北麓、赞塘村西、玛尼山坡、上东嘎村东洪积扇上端、雄拉山上、普努沟洪积扇北侧、察如村西南山坡、嘎泉下、红墓山内侧山坡、布里加布沟洪积扇上、颇章区哈拉嘎公社五队地段、永不拉康南部山脚下、亚堆区曲德贡旁的山麓间、温区加赛山坡上、切龙则木山脚的窄长地带上和结桑村北，连同个别零星墓葬共计有一千零七十二座墓。墓群绝大多数属吐蕃时期，一般背山向川分布，分布地点多系较平缓坡面。大多数墓群还以比较高大的梯形墓作为布局的中心，将其置于较高或者最高的地方，其他中小型墓葬则围绕此墓比较有规律地分布。墓葬封土（石）平面形状百分之九十以上为梯形，圆形和方形者很少。梯形封土（石）堆以长边为正面方向，一般面向坡下。封土（石）堆四边砌以厚70厘米左右的石墙，中心填以土石。大型墓葬的封土（石）边长为40米左右，其外表以夯筑一周高大土墙为特点，夯层中往往夹有贝玛草，和琼结藏王墓颇多相似之处。

为了解墓葬内涵，普查队还对一些被水沟截割行将破坏的墓葬作了抢救性试掘，除见有人骨架外，还出有一些石、陶、铜、铁器等随葬品。陶器以圜底、鼓腹、短颈、卷唇者居多；铜器有铜钵和铜告身等。墓圹和墓棺类型较多，但皆系竖穴石棺。石棺有石块砌筑和石板拼制之分，以前者为多。棺多较小，有些仅容屈体一人。

这些墓群面积大、数量多，但盗掘较甚，大多数墓葬被盗一空。对盛行天葬之邦，这些墓群的发现和进一步发掘，无疑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张仲立）

拉萨市查拉路甫石窟

调查时间：1984年10月
工作单位：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

查拉路甫石窟位于拉萨招拉

笔洞山（又称药王山）东麓。为支提式窟，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面积约27平方米。窟内有中心柱和转经廊，其上共有七十一尊造像，除两尊为泥塑外，余皆石刻雕像。造像一般较小，大者不盈1.3米，小者仅有0.25米。其题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我国早期石窟寺的一般造像，一类为西藏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松赞干布、文成公主、禄东赞等和菩萨群造像，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和浓厚的民族风格。石窟造像大体可以分为三期：唐代早、中期，宋元时期，元明时期。查拉路甫石窟菩萨造像的风格与我国其他地区石窟的造像风格差别较大，而与印度犍陀罗石窟寺艺术的风格十分接近。查拉路甫石窟材料的公布，不仅填补了西藏石窟艺术的空白，扩大了我国石窟寺遗址的分布范围，而且说明，西藏有可能是我国石窟寺艺术传入的另一途径。（何周德）

乃东县吉如拉康寺

调查时间：1984年5—6月

工作单位：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

吉如拉康全称扎玛尔吉如拉康（拉康，藏语“佛堂”的音译）是我国西藏地区吐蕃王朝赤德祖丹时期（704—755年）建造的一座古寺，为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之一。

吉如拉康位于乃东县温区格桑乡，现占地面积982平方米。寺院现存建筑基本分属五个时期，而以建于八世纪的释迦佛堂为最珍贵。

释迦佛堂基本保存完好，座西朝东，宽8.8、进深7.65、高6.5米，开间三、进深三。佛堂建筑属密梁平顶藏式结构，梁柱斗栱硕大古朴，柱头结构摹仿内地建筑一斗三升结构，于大小斗栱之间精心高浮雕出三升形象，风格颇为独特。释迦佛堂附有转经迴廊，转经迴廊属密闭式，无窗、狭窄，呈典型的吐蕃时代风格。

释迦佛堂四柱柱栱正面皆线刻精美图案，图案中龙、虎形像是内地自汉迄唐雕画神兽灵异的风格，而在藏地建筑中为仅见，是内地工匠参与该建筑设计、施工的令人信服的佐证。

佛堂泥塑彩绘一佛八弟子二力士二供养人，除佛系坐像外，皆为立像。立像一般高3米。这批造像风格古朴典雅，服饰处理颇有唐风，许多特征表明基本属八世纪造像。二供养人形像颇殊，皆着菩萨装，其中男供养人

为金面，推测是赤德祖丹赞普和金城公主形像。

吉如拉康的发现为我国建筑、雕塑历史及汉藏兄弟交往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材料。（张仲立）

洛扎县色嘎古朵寺

调查时间：1984年7月

工作单位：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

色嘎古朵寺位于西藏洛扎县色区，该寺的主体建筑“色嘎古朵”为一方形碉楼式九层佛塔，1077—1084年间建。塔内有隔层，每层间有木梯。每层有房两间，有门相通；东间小，住人；西间大，供佛。北墙有凹槽，塔门开于槽底。七层西墙外，八层南北两墙西侧，分别有两挑木伸出，木上砌石，推测因塔的隔墙偏东，在西、南、北三面砌石使塔保持力的平衡。此塔早年虽经维修，但墙体未动，梁、檩、椽百分之八十以上为原物。这种方形碉楼式样，内设隔墙，一面筑凹槽，且里面住人的佛塔，为藏式建筑，看不到印度、尼泊尔及内地汉式建筑的影响。

寺内还有与塔同时的“嘎瓦久珉”建筑和十六世纪建成的“十柱殿”、“杜康”等建筑。在寺内发现了很多藏文手抄本佛经，经^{14}C测定，其年代分别为九、十一、十三世纪。还发现有早于九世纪的写经。寺内现存许多壁画和唐卡，其中相当一部分风格独特，形象生动，笔法流畅，以“色嘎古朵”第五、六层一部分和第四层的壁画尤为古朴。（仵君魁）

拉萨市红山清代摩崖刻铭

调查时间：1984年12月

工作单位：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

在布达拉宫所座落的红山东侧断崖第一、二、四台阶处新发现了七处清代摩崖刻铭。其内容与清朝政府对西藏用兵有关。“功垂百代”摩崖刻铭位于第四台阶，外刻边框，形制如汉式碑，此刻铭为李麟所刻，记载了康熙五十九年征剿侵入西藏的准噶尔的中路清军征战情况。“异域流芳”摩崖刻铭位于第一台阶，形制同上，除八句四言赋颂扬清兵剿灭侵入西藏的准噶尔部的功绩，其余为康熙五十九年进

藏清军南路将领的记名。"安藏碑记"摩崖刻铭，位于第四台阶，有部分文字被坏，记述的是康熙五十九年清军驱逐入侵的准噶尔部、安定西藏之事。"雍正六年摩崖刻铭"，位于第二台阶，形为长方，是钦差吏部尚书查朗阿所刻，简略记载了雍正五年西藏上层贵族之间发生争权夺利的武装冲突、六年清兵进藏安抚的情况。还有两处被人破坏，仅留残文；另外一处雍正七年的刻铭，为四言赋，颂扬雍正六年清军安抚西藏的功德。清朝政府对西藏用兵共有五次，这七处摩崖刻铭共涉及二次进兵的情况，为研究清政府用兵和统治西藏政策，提供了新的资料。（仵君魁）

陕 西 省

南郑县龙岗寺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3年至1984年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水考古队

龙岗寺遗址位于石拱乡爱国村西北的岗地上，岗地西依梁山，东北临汉江与汉中市隔江相望，东南为缓坡和断崖，形成了一条东西蜿蜒数公里、南北宽约100—500米、高出江面约50米的土岗，形似长龙，故名"龙岗"。遗址主要分布在岗地东端的台地上，东西长约500、南北宽约50米，总面积约25000平方米，是汉江上游地区保存较好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龙岗寺遗址发现于1959年。从1983年秋开始进行正式发掘，截止1984年底累计共开探方四十四个，发掘面积2000平方米。发掘资料证实，该遗址早期为李家村文化遗存，目前共发现成人墓葬五座、窖穴十多个，出土了一批遗物。中期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遗存，共发现陶窑一座、窖穴一百二十多个，成人墓葬四百三十三座，瓮棺葬十五个。墓葬十分密集，最多的有十多层叠压或打破关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仰韶墓地。墓地周围为较密集的窖穴群所包围。这种墓葬密集分布和多层叠压打破以及墓地周围为窖穴群所包围的现象，在其它同类遗址中尚不多见。墓葬排列有序，头均向西北。随葬器物丰富多彩，计出土玉器、石器、陶器、骨器、角器、蚌器、乌龟及装饰品三千余件。其中磨制精致的玉铲和长达48厘米的石铲为首

次发现。陶器数量多，器型复杂多变，大型的彩陶大口尖底器也为少见。该遗址晚期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及龙山文化遗存，均出土于扰乱层，未发现遗迹。

龙岗寺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如下：

1.在汉江上游再次发现李家村文化--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一龙山文化的地层叠压关系，为研究汉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系列，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文化关系，提供了新资料。

2.首次发现完整的李家村文化墓葬，为进一步探讨李家村文化提供了新资料。

3.发现了较完整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墓地，其墓葬之多、分布之密集、随葬器物之丰富都是少有的，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有关问题的研究提供更加丰富的资料。（魏京武　杨亚长）

岐山、扶风两县考古调查

发掘时间：1983—1984年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岐、扶二县是周原所在。为积累探索周文化渊源问题的资料，沿沣河及其支流太川、美阳、七星、横水、雍里、西沟诸河两岸进行了考古普查，主要收获如下：

两县境内共发现古文化遗址八十处，在已初步分类的四十九处中，包含两种和两种以上文化的遗址共二十一处（仰、龙、周七；仰、龙六；仰、周三；仰、龙五），单一文化遗存二十八处（仰八、龙九、周十一）。

面积较大、堆积较厚的遗址有：

仰韶文化：岐山城关乡仓颉庙，孝陵乡曹交陵，北郭乡周公庙，扶风城关乡飞凤山，黄甫乡王家台、唐家河。

龙山文化：岐山益店乡魏家河，孝陵乡太慈、原东沟、原西沟，青化乡翟家，扶风城关乡飞凤山、案板坪。

周文化：岐山北郭乡庙王村，城关乡帖家河，扶风城关乡段家原。

周代墓地：帖家河暴露近百座，周公庙暴露数座。

上列诸遗址多为几种文化共存。

调查中，有些遗址属首次发现，但破坏严重。如岐山故郡乡底寺龙山遗址，断垣上堆积丰富，水库修建却使其支离破碎。还有一些遗址从暴露情况看很小，象扶风召公乡官位头，岐山

麦禾营乡杨柳村，但采集的遗物却很重要，也较罕见。这类遗址推断可能系破坏殆尽，也可能被覆盖在地层较深处。

仰韶文化遗址从遗物看包含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西部陕西龙山文化出土物包含着一些齐家文化特征。周代遗存具有早周文化特征者居多。（魏遂志）

靖边、榆林等县考古调查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今年下半年，对陕北地区的靖边、榆林、横山、米脂、子洲、绥德等县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李家崖文化、周文化以及战国、秦汉古遗址共计八十多处。

仰韶文化遗址，全属庙底沟类型。陶器有口沿外饰带状黑彩的敛口钵，红彩网纹敛口钵、双唇小口尖底瓶、圆点钩叶纹彩陶盆、夹砂红陶罐、瓮等。石器有斧和刀，多数为磨制，打制器很少。在个别遗址中还发现石叶、石镞刮削器和石核等细石器。

龙山文化遗址，一种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另一种与神木石峁龙山文化遗存相似。在前者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有白灰居住面的房子。陶器有鬲、斝、侈口细颈小底瓶、豆、盆、罐、瓮等。陶质为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两类，有极少的红陶和磨光黑陶。纹饰多篮纹，次为绳纹、附加堆纹等。石器有斧、刀，绝大部分是磨制，打制的极少。从陶片看，该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与晋南同类文化相似，但也有地方特点。后一种龙山文化，在时代上晚于前者。陶器有鬲、斝、三足瓮、侈口细颈折肩罐、盆等。陶质有夹砂和泥质两大类，全为灰陶。纹饰有篮纹、方格纹、绳纹、附加堆纹等；方格纹多于绳纹。

“李家崖文化”，是在陕北北部新发现的一个考古学文化，其时代为商周时期。除清涧县李家崖古城堡遗址外，在绥德、延川等县也发现了该文化的遗存。陶器有鬲、簋、豆、甗、三足瓮、盆、罐等。陶质分夹砂、泥质两大类。除极少的红褐色陶外，全为灰色。纹饰除素面外有绳纹、云雷纹、划纹、三角形、菱形几何纹、指甲纹和附加堆纹等。石器有梯形短体石斧、纵断面呈“逗点”状石刀等。还有类似于商的圆钻，椭圆形凿孔的卜骨。

这次调查发现了四处周文化

遗址和一处墓地。遗存的时代，上限大约到西周中期左右。

大批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现，为陕北开展史前考古提供了重要线索。李家崖文化的发现，填补了该地区商周考古的空白，对于研究商周时期活动在北部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有着重要意义。（吕智荣）

耀县北村龙山及商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9—12月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考古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遗址位于陕西省耀县县城北部约30公里处的北村东面，东临王家河川道，西依北村塬，南、北两侧为沟壑，遗址范围东西约1000、南北约500米。分布有仰韶、龙山、商代等各个时期的遗存，尤以商代遗存为多。发掘中揭露面积274平方米，清理商代墓葬三座、灰坑二十二个、陶窑一座，龙山灰坑两个。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有鬲、盆、豆、罐、大口尊、毁、甗、小口瓮、敛口瓮，花边罐、器盖和鼎等。还有较多的石器(斧、铲、刀)、骨器(针、锥、簪、镞)和卜骨。

龙山灰坑为袋形，出土陶器中的单把鬲和三耳罐等和客省庄二期的大体相同，商代的墓葬及灰坑和郑州二里岗期的相同，遗物所反映的文化面貌和郑州商代前期的文化面貌亦基本一致。但也有其本身的特色，如锥足内折极显的鬲、小口折肩瓮、假腹豆、花边罐等都不同于郑州二里岗和殷墟的同类器物，陶器纹饰亦有特色。北村遗址的发掘，为解决关中地区商代考古学文化的面貌及其序列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徐天进）

长武县碾子坡先周文化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工作队

本年度共揭露遗址面积约1400平方米，发现仰韶文化陶窑五座，灰坑近十座。先周文化深土窑式和半竖穴式房屋基址七座，窖穴和灰坑约三十多座，出土先周文化遗物种类和数量都比较多，常见的砍伐、敲砸工具有斧、锛、凿、锤头和锤斧等多种，均属石制品。农业生产工具有铲和刀两种。手工业生产工具有制骨的各类大小不同的磨石，

以及纺织和缝纫工具铜锥、骨、角锥和陶纺轮等。狩猎使用的有骨、角镞。生活用具以陶质器皿为主，多为残片。器形有甗、鬲、甑、簋、豆、盂、罐、尊和瓮等，其中以鬲、豆、盂罐和瓮等器最为常见，这与西周时期常见的陶器器类是基本相同的。此外，属于宗教信仰遗物的卜骨出土数量也比较多，其特征是牛肩胛骨未去臼角，有钻有灼而无凿。

另外今年还发掘一百七十二座墓葬，其中先周墓葬约一百四十座，其余是西周和东周墓葬。上述先周墓葬中有六十六座位于遗址北边不远的高出遗址约45—50米的梯田里。墓内所出陶器与居址所出同类陶器形制相同，说明它们是同时期的遗存。其余数十座先周墓葬，是在遗址中的第一发掘地点内发现的，它们都打破了先周文化居址堆积，由此证实这些墓葬比居址的年代要晚一些。

根据上述发现，碾子坡先周文化遗存大致可以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包含有居住遗存和墓葬，其年代约略稍早于周先王古公亶父时期，大致与殷墟第二期文化相当。晚期只发现墓葬，迄今已发掘出一百多座，它们约略是周人迁岐前夕或稍晚的文化遗留，其年代约相当于殷墟第三期文化。（胡谦盈）

淳化县西梁家西周建筑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春季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多年前，西梁家的农民曾交出文物多件，有铜削、铜镞、铜泡、铜鼎及陶器鬲、罐等，据观察分析，这些器物应是西周墓葬中的殉葬品。经本年调查，发现该村断崖上灰坑灰层遍布，征集了一批具有早周文化的陶器，可识别器形的有鬲、罐、盆、盂、甑、大瓮（三足瓮）、豆、甗等，陶质以夹砂灰陶、泥质灰陶为主。遗址经农民挖窖、筑路、平整土地，陶片俯拾皆是；在村西靠近深沟约100余米的高坡上，拣拾到筒瓦、版瓦、乳钉残片六块，筒瓦饰黻黼纹、主题花纹磨光，带乳钉的板瓦饰绳纹，与周原所出完全相同，陶质也皆同于周原所出，只是较小较薄一点。

这里的周瓦是继长安沣西、周原宫殿建筑用瓦发现以来的又一重大发现。（魏遂志）

长安县沣西西周洞室墓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工作队

本年度发现的一批洞室墓，其时代约在西周早期至西周中期。洞室墓形制在沣镐地区西周考古工作中还是第一次发现。这种洞室墓的形制结构具有显明特点，它以长方形土坑竖穴作墓道，墓道底斜向偏在一侧的洞室。洞室呈长方形，穹形墓顶，内置棺椁葬具，多用横向木板封门。这类洞室墓有南北向，也有东西向，洞室在竖穴的左侧或右侧，尚无定例。葬式多为仰身直肢，随葬遗物以鬲、罐为主，放置在棺外头部，器形和组合与常见的西周早、中期墓葬基本相同。这些洞室墓与同时的土坑竖穴墓杂置在同一墓地。相邻的几座墓葬，时代早晚也基本相同。

这类洞室墓在甘青地区的半山、马厂、火烧沟类型文化和卡约文化墓地中均有发现。1981年，陕西扶风周原地区的刘家村也又发现了几十座。刘家村发现的洞室墓明显早于沣西地区的洞室墓，它们之间可能有承袭关系。洞室墓在周原和沣镐地区的发现，丰富了西周时期墓葬的内涵，这对研究探讨先周文化的形成及其与甘青地区青铜文化的密切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卢连成）

长安县沣西西周双墓道大墓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工作队

近年来，在陕西长安张家坡发现一处面积较大的西周墓地，南北约400米，东西约600米。在墓地范围内，经探明的西周各个时期的大、中、小型墓葬约一千五百余座。目前，这片墓地正在有计划地进行科学发掘。

今年在墓地南部发掘一百余座墓葬，其中有一座大型的西周墓葬，南北向，有两条墓道，南墓道长而宽，北墓道短而窄，总长35.6米，墓室为长方形土坑竖穴，深约9米左右。葬具三重：两椁一棺。南北墓道之中埋葬木车数十辆，这些木车都是被拆散后埋入的，车轮叠置在墓道正中部或立放在墓道两侧，车厢与轴、辕则放在墓道或椁盖上。此墓被盗掘，但仍出土不少玉器、

铜车马器、骨蚌器等。

在此墓的东南有几座车马陪葬坑，在墓室东西两侧各有一座中等规模的墓葬。两墓均被盗掘，但东侧的一座墓中，还残留了几件青铜礼器。其中有邓中牺尊和井叔钟等。井叔和邓中与这几座墓葬的关系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根据这几座墓葬中出土遗物分析，它们的时代接近，约在西周中期偏晚阶段。

这种有南北两条墓道的西周中字形大墓在沣西地区尚属首见，大大丰富了张家坡西周墓地的内容，这对研究西周时期的墓葬制度、等级关系以及确定沣京位置、布局都具有重要意义。（卢连成）

铜川市王家河西周墓地

发掘时间：1984年11、12月间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考古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墓地位于铜川市北郊王家河乡的东北面，西临王家河，东依赵家塬。因修铁路取土，墓地遭到严重破坏，现剩墓地面积约10×25平方米，揭露面积约200平方米，共清理墓葬二十座。时代分属西周中、晚期和春秋时期，其中有马坑两座（属西周，分别埋葬两匹和四匹马）；铜器墓两座（西周晚期，有铜鼎和车马器）；陶器墓十一座（随葬品有鬲、盆、罐）；无随葬品者三座，空墓两座。

墓葬形制均为竖穴土圹式，多为东西向，有的西周墓有腰坑，葬具多为单棺，铜器墓有一棺一椁。西周墓的葬式均为仰身直肢，头向东；春秋墓的葬式均为屈肢，头向西；西周墓的随葬陶器组合为鬲；或鬲、盆、罐；春秋墓亦同，西周墓的陶器和沣西张家坡出土的西周中晚期的同类器物相同；春秋墓的陶器和凤翔等地出土春秋秦墓的同类器物相同；也应该是秦人墓葬。

王家河墓地的发掘，为了解关中北部地区西周、春秋时期的文化面貌增添了新的材料。（徐天进）

米脂县张坪村西周墓葬

发掘时间：1984年6月

工作单位：米脂县文管所

试掘墓葬五座，都为竖穴土坑墓。出土的随葬器物有陶鬲、陶豆、陶罐以及青铜戈、刀等。根据这些器物的形制特征，墓葬

的年代应为西周晚期。

凤翔县马家庄春秋秦三号建筑群

发掘时间：1984年2—10月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在马家庄1号建筑（宗庙）遗址之西500米处，发现了3号建筑群。3号建筑群居于秦都雍城中心部位，方向北偏东28°，东西长326.5、北端宽86、南端宽59.5米，总面积21,849平方米。建筑群四面有围墙（称为周城），周城之中有三道隔墙将周城划分为五座院落（曲城）。

五座曲城由南向北纵向排列，每座曲城之南墙正中均开设城门。第一座曲城呈长方形，面积3,068平方米，南墙正中有宽8米的一座门，城内未发现建筑遗迹；第二座曲城平面呈梯形，面积2,970平方米，南墙正中有宽2.8米的一座门。城内中部并列两座建筑，每座约200平方米；第三曲城呈梯形，面积5,074平方米。南墙正中有宽4米的一座门。城中心有一面积约586平方米的一座建筑遗迹；第四曲城呈长方形，面积3,570平方米，南墙正中有宽10米的一座门，城内未发现建筑遗迹；第五座曲城呈长方形，面积5,590平方米，城内以品字形排列三座形制相同的建筑，每座面积均为374平方米，南墙正中有宽7.6米的一座门。

按照《周礼》关于匠人营国朝寝居中，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布局原则，3号建筑群恰在秦宗庙之右，应是朝寝建筑。这座朝寝建筑每座曲城有一道城门，与经文上所说的天子有皋、库、雉、应、路五门制度谙合；第五曲城内品字形排列的三座形制相同的大型建筑，疑即为路寝、左右路寝；第三、第四、第五三个曲城，应是外朝、治朝、内（燕）朝之所在地。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先秦朝寝建筑，是继秦公陵园、秦公宗庙之后秦国考古的第三次重大发现。

这座建筑的发现，在解决朝寝周城之长度，曲城与五门之争，朝寝周城与廓城关系，五门定名，三朝及宫寝布局等方面，提供了新的资料，同时对研究周秦宫寝制度，周秦城市总体规划，春秋秦的社会性质及其文化都有着重要意义。（韩伟）

丹凤县古城村战国秦商邑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5、12月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古城遗址南北长约1500、东西宽约1000米。遗址的中心在今古城的北半部。地面上遍布瓦砾。

近年来共获得遗物百余件，其中主要有：青铜剑十余把，长铤三棱形铜镞十余支，铜带钩一件，"商"字、鹿纹、葵纹、凤鸟云纹等各种半瓦当、圆瓦当十多个，还有板瓦、筒瓦及豆、罐、盆、鬲等陶器残片若干。

根据出土器物，特别是瓦当、板瓦、筒瓦的纹饰、制法及青铜剑、镞的形制，参照关中等地区同类器物的分期断代，古城遗址的文化内涵主要是战国秦的遗物，有少数遗物的年代可以推迟到秦和西汉时期。从地理位置、文化内涵等分析，古城遗址可能是战国时代秦国著名改革家商鞅的封邑，西汉时期沿袭此地设置商县。（周苏平　焦南峰）

铜川市枣庙春秋战国秦墓

发掘时间：1984年7—8月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枣庙村位于铜川市北关东北6公里处的河西北岸台地上，铜川市铝厂扩建厂房时发现了部分墓葬。经发掘，清理了二十五座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墓。

这批墓葬排列密集，分布规则。除两座南北向外，皆为东西向。死者头西足东，全部采用屈肢葬式：有的仰身屈肢，有的侧身屈肢，下肢均蜷曲特甚。墓葬平面呈长方形，墓室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长约2.5、宽约1.5米。墓室四壁垂直平整，有熟土二层台。未发现壁龛和洞室。葬具均为木质，由腐朽痕迹观察，大多数采用一棺一椁的制度，个别墓为二椁一棺。随葬器物多放置在头前棺椁之间，个别小件置于棺内。

出土器物多以陶器为主，有鬲、盆、罐、大口罐、囷、壶、茧形壶等。铜器均为小件，有削刀、镯、带钩和襟钩等。比较特殊的是出土了一批未经火烧的泥塑器物，有囷、大口罐、豆、杯、鼎等。另外还有彩绘泥塑狗、鸟、牛、羊、环、柿蒂形饰等物。更为重要的是发现了五件比较完整的彩绘泥塑人俑。泥塑人俑形体约为真人的十分之一。采

用圆雕手法，基本上具备了古代传统雕塑艺术中的堆、塑、贴、刻、挖、捏等手法。眼、眉、衣纹服饰等用不同颜色点绘描画。真实感较强。它带有春秋战国时期雕塑艺术的原始性，它应为秦陵陶俑雕塑艺术的先驱。（呼林贵）

泾阳县秦都咸阳望夷宫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望夷宫遗址位于泾阳县东南8里，泾河南岸的余家堡的东北处，南与秦都咸阳1号宫殿遗址遥望，相距16里。由于历年泾河冲刷，致使南岸崩塌，形成高约60米的断崖。宫殿建筑夯土基址在断崖上断续分布，时有暴露。遗址东西分布约2里，南北最宽处有100多米。在余家堡村东600米处，发现了一个大型的宫殿建筑夯土基址。经钻探了解，基址东西长98米，南北宽34米，距地表深0.75米，耕土层以下30厘米有大量的红烧土块，还发现一根直径15厘米左右的焚木遗迹。夯土层厚6—8厘米，夯窝径8厘米左右。该基址中部较厚，为3.2米，四周较薄，为1.1米，显系战国以来盛行的高台建筑夯土基址，与已发掘的秦都1号宫殿、2号宫殿等的夯土基址相似。

除此而外，还在地表上采集到大量的秦代遗物，计有葵纹瓦当、云纹瓦当、素面瓦当；回纹空心砖、素面空心砖以及回纹方砖、太阳纹方砖、素面方砖；还有外饰绳纹、内饰麻点纹的筒瓦和外饰绳纹的板瓦。值得提出的是，在余家堡北临断崖处还采集到两块槽形板瓦的残片，通体饰有绳纹，一端大，一端小，高5.5—5.8厘米不等。这种板瓦，以前在凤翔雍城马家庄遗址曾出土，在秦都咸阳还属首次发现。

余家堡东南200米，是一片汉代建筑基址。从地表到地层断面发现大量的汉代遗物，其中有回纹空心砖和回纹方砖，云纹瓦当，外饰绳纹、内饰麻点纹的筒瓦和外饰绳纹的板瓦等。并采集王莽“货泉”一枚。

望夷宫是秦都咸阳的主要宫殿之一。《三辅黄图》曰：“望夷宫在泾阳县界，长平观道东，北临泾水，以望北夷。”余家堡遗址的位置正与望夷宫大体相合。（尹申平）

已审阅
子居 10-03-13，13:26

咸阳市黄家沟战国秦墓

发掘时间：1984年3—5月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咸阳秦都考古工作站

继1975、1977和1983年三次清理黄家沟战国墓六十九座之后，今年在墓地砖瓦厂大量取土的同时，再次清理出同时期墓葬五十四座，并获得陶、铜、铁、玉等各类随葬品一百七十余件。

这次清理的墓葬与前三次一样，均属战国时期中、小型平民墓，有竖穴和洞室两类。

竖穴墓　共十一座。皆为口大底小的长方形土坑，其中M19和M52设有壁龛。长方形土坑又分狭长与宽敞二式：狭长式竖穴形体较小，墓壁上下较直，墓底一般留有生土或熟土"二层台"。如M32，墓口长2.54、宽1、深1.80米。墓底有熟土"二层台"，底长2.30、宽0.76米。宽敞式竖穴平面略呈方形，墓型较前者为大，墓壁向下收分明显，截面呈斗形。如M22，墓口长4、宽3.2、深3.5米。墓底留出生土"二层台"，台四壁宽40—70厘米不等。墓底长2.40、宽1.20米。这类墓葬除M19为三人合葬外，余皆单人葬。葬式有仰屈、侧屈和仰直，前者二座，后者一座，侧屈者五座（余三座不明）。头向东者六、向西者四、向南者仅一座。

洞室墓　共四十三座。按其结构，又分偏洞和直洞两类：偏洞墓共七座。洞室位于竖井的横侧，与竖井并列，其洞室地面略高于竖井底。如M31，竖井长3.40、宽2.52、深3米，洞室长2.08、宽1.30、高1.20米，内置一棺，头设壁龛。直洞室位于竖井之一端而小于竖井。此类墓共三十六座。如M29，竖井口长3.60、宽2.80、深4.30米。洞室位于竖井之西，洞室长2.8、宽1、高1.05米。内置一棺，北壁设壁龛1处，土坯封门。洞室墓均为单人葬，葬式有仰屈、侧屈和仰直，前者七座，后者二十一座，侧屈者十座（五座不明）。头向东者十五座，向西者二十座、向北者六座、向南者仅一座。

五十四座墓出土随葬器物共一百七十余件，其中二座已被盗掘，六座空无一物，其他四十六座的随葬物，多则十六件，少则一件，似无一定规则。随葬品中陶器有缶、罐、釜、鼎、盂、壶、盒、瓮、豆、钵、甑、盘等。铜器有戈、镦、镜、带钩和印章等，铁器有锸、削、剑、釜等，

玉器有璧、琢、璋，另外还有“半两”铜币和料珠等。

从随葬器物的类型以及墓葬形制，与以往关中地区出土的战国秦墓基本一致，故时代应属战国中期至秦统一时期。（陈国英）

西安市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秋季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

本队曾于1981年对未央宫的天禄阁、石渠阁和沧池遗址进行勘探，又于1981—1982年对未央宫前殿北面的2号宫殿遗址（可能是椒房殿）进行大规模发掘。本年秋季，则对未央宫四门中南、北司马门进行勘探。

未央宫南墙东起约850米处，即西安门西北，有一道宽约8米的缺口，应是南司马门，门道北面有一条道路，宽约8米，通往宫内。在门道两侧发现有殿台建筑遗址。在未央宫北墙西起约1300米处，天禄阁建筑遗址东北约60米处，有一道宽约10米的缺口，应是北司马门，门道内有一条道路，宽约10米，往南可通往前殿建筑遗址的东侧，往北与直城门大街相连接。在北司马门内东南，发现有宫殿建筑遗址。通过未央宫的勘查，并确定了南司马门、北司马的位置，为今后发掘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李遇春）

西安市汉宣帝杜陵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杜陵工作队

本年度发掘了汉宣帝杜陵5号、6号遗址和孝宣王皇后陵园东门遗址。

杜陵5号遗址位于杜陵东南，其西与杜陵1号遗址为邻。5号和1号遗址在同一院落之中。

5号遗址可分为三大区，即：西区、东区和北区，东、西区在南，北区在二者之北。

西区包括殿址一座，院子三座，门址两个。殿址是5号遗址的主体建筑，在西区南北居中的地方，殿址台基呈长方形，东西长18.5米，南北宽15.5米。台基东西两边为廊道。殿址北邻3号院，南邻5号院，5号院之南为6号院。三座院子均为长方形。西

区的西门在殿址西北部，与1号遗址东门二者东西相对。西门有左右门道，中以隔墙分开。南门址开于5号址南院墙之上，正于6号院南部中央。南门为斜坡门道，门道两边筑成护坡。门道与护坡之上均铺方砖。

东区包括院子四座和小房子四组。院子四座为4、7、8、9号院。4号院在东区北部，西邻3号院。7号院在4号院西南部，西邻西区殿址东廊道。8号院在7号院南，西邻5号院东廊。9号院在8号院东南，位于东区南部。小房子四组，第一组包括房子两间，位于6号院东邻，东区西南部；第二组包括房子三间，位于8号院北，西邻西区殿址东廊；第三组包括房子两间，7号院位于两间房的南北之中；第四组包括房子八间，位于东区东部，北邻4号院，西邻7、8、9号院和第二、三组房子。第四组房子中有的规模较大。在第二组和第四组房子内，发现了窖穴三个，其中出土遗物有汉代货币、铜饰件、印章和谷物、动物骨骼等。

北区包括三座院子、一间房子和东门址。三座院子由东向西并排分布，东部的10号院为南北向的长条形，西部的1、2号院为东西向的长方形，院子之间或为隔墙，或为廊房。房子位于10号院东北，东邻5号遗址东院墙，南为东门门道。东门址开于东院墙之上。

5号遗址东院墙之外有南北向铺砖道路，内有地漏、砖铺水道和五角形水管等地下排水设施。

杜陵6号遗址位于孝宣王皇后陵西南部，殿址台基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39米，南北宽27米。南边一门，北边二门，东、西各一门。东、西门均为左右门道。殿址台基四周有廊，廊地面铺方砖，廊外有卵石散水。

孝宣王皇后陵东门遗址位于皇后陵东，门址通宽89米，由门道、左右塾和左右配廊组成。门道中部，左右有夯土门墩，其两边分别与左右塾台基相连。门墩将门道分为内外。左右塾上各有隔墙遗迹，将其各分成内、外塾。左右塾的内外塾还各有内外便门一个。（刘庆柱）

定边县钟坬村、付圈村汉墓群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定边县文化馆文物组

钟坬村在安边镇东北约4公里，付圈村在定边镇西5公里，两处共发现墓葬近百座。从地形观察，墓葬遗址围绕长城直向定边

县城东北延伸，墓地接连，都在土坡沙漠地带，长达50—60公里。北靠内蒙古地界约20公里。大多数墓室是用青灰色绳纹砖砌成的长方形，有双室、三室、四室之分，由墓道、墓门过洞、后室几部组成，墓门多向东偏南。墓室内发现的随葬物品有汉五铢铜钱、汉大泉五十铜钱、铜制弩机、衔镳、铜博山炉、石制镇方和各种不同类型的陶罐、陶壶、陶仓、陶灶等。据判断，这两处墓葬遗址可能与公元前121—99年期间西汉抗击匈奴的军事驻地有关。（王祁福）

绥德县黄家塔东汉画像石墓

发掘时间：1984年上半年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黄家塔，亦名卧虎岭，距绥德县西约2公里，1983年县基建局营建石窑时始发现多座石室墓，编号M1—M8。县博物馆将M5、M6、M7就地保护，其余随工程清理；今年上半年基建中又相继发现M9、M10、M11、M12。清理了其中四座（M6、9、11、12）及一处乱石坑。

四座石室墓中除M11未镌刻画像外，共出画像石三十六块，计M9二十二块，M11九块，M12五块。墓葬形制分单室、前后室、前后室加右耳室三种。M6有题纪，刻隶书“王圣序万岁室宅永元十六年十二月一日祖下”十九字，东汉和帝永元十六年，距今1881年。M9墓门外填土中出象牙章一枚（1.8×0.8厘米），一端阴刻“王禧”二字，一端阴刻“李野”二字，皆大篆体，同出小件器物还有玉璜、铜箍等，系盗墓者遗于填土中的。目前尚难确断此印章系墓主人之所有。

画像石内容以出行图、狩猎图为主，描绘墓主生前活动。墓门多绘神话图象、如东王公、西王母、三足乌等，兼画宴乐、杂耍和图案装饰等。均为平雕，笔道粗犷，刀法娴熟。画像石的制作过程是，先以绘画摹本用墨线勾划在打磨平整的石板上，然后镌刻。刻成后，填以砾红、铅白等色彩。

从王圣序墓与前年清理的有题纪的墓主皆王姓来推测，此墓地应为王姓家族的宗族墓地。

（魏遂志）

咸阳市西北林学院古墓群

发掘时间：1984年4月
工作单位：咸阳市文管会

古墓群在西北林学院丙型Ⅱ号楼基建施工的钻探中发现。在约1000平方米面积内，清理出汉墓十六座，唐墓五座，出土文物有汉代的铁剑、铁釜、铁铲、铁锯、铜镜、“半两”铜钱，陶碗、陶壶、陶罐等。还有唐代的塔式陶罐，铜饰件等共约100多件，这些出土遗物中，汉代彩绘陶盒、陶盨、红陶带柄釜是少见的，陶盒、陶盨均用对比强烈的红、黑、白三种颜色组成“S”形波折纹、弦纹等各种图案。陶盒为钵形，盒上有盖，盖有圈顶抓手，既可作盖，又可作碗使用。盨的体型矮，腹径大，敛口，腹部有折沿，圜底下有三马蹄形足；口上俯扣侈口大碗，碗底有三个小眼，是用锥或刀有意刻成的透气眼，碗上也有彩绘花纹，这些都是专作陪葬用的明器。红陶釜体型小巧，直口，鼓腹，圜底，肩部有銎形柄，柄长10厘米，底有烟炱，是煎药用具。这批墓葬是西汉早期的家族墓群，象这样完整的汉墓群体在关中地区也不多见。五座唐墓中，有两座为夫妇合葬墓。（高忠玉　赵彩秀）

西安市唐大明宫翰林院遗址

发掘时间：1983年10月—1984年7月。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城工作队

翰林院遗址位于大明宫西城右银台门以北的西夹城内。夹城东西宽55、南北全长900余米，翰林院占据了夹城南部长达400米的一段。这次只发掘了南端100余米，共发现建筑遗址五座，及砖道、甬路等遗迹。五座建筑遗址（编号：F1—F5）中，有三座（F1、F3、F5）居夹城之中，南北排列整齐，形成一条轴线；两座位于西侧靠近夹城处，为座西向东的廂房。各遗址被破坏得比较严重，但版筑的夯土台基都还清楚，各台基高出当时地面0.5—0.7米不等。

1号遗址的台基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23.3，南北宽15米，约为广五间，进深三间的厅堂建筑。

3号遗址在1号遗址的南侧，

相距18.8米，中间以砖道相连。3号遗址的台基接近方形，东西长23.8、南北宽20.3米，为广五间、进深约四间的厅堂遗址。

5号遗址在1号遗址的北侧，其西端与西侧2号厢房遗址的中部相接，呈丁字形。若分别计算，5号遗址东西长为28、南北宽10米，与南侧的1号遗址相距仅2.6米，其中间有南北相对的阶道，阶道宽为9米多，可能是一通往南北的过厅建筑。

2号遗址在5号遗址的西端，遗址南北长47米多，东西宽8.5米，这次只发掘了其南部34米长的一段，其余待以后续作。

4号遗址位于3号遗址的西侧，其北与2号遗址相距18米多。这次只发掘了北部24米长的一部分，墓址东西宽与2号遗址同，也是8.5米。遗址的南部为现在建筑所压，未能发掘。

翰林院的门，开在南端东侧宫城墙上，此门址于1959年作过发掘，是一个门道，宽5米多，进深8米多，有磨制光整的石门槛两道。据记载此门建筑高大，有门楼。文献中称之为“翰林门”，也名“复门”；又因其在右银台门之北，故当时称翰林院的学士为“北门学士”。

以上所发掘的翰林院南部的建筑遗址，从其规模和布局看来，1、3号遗址是这一遗址内的主要建筑，2、4、5号遗址则是配置的附属建筑。据文献记载：“开元二十六年（738年），于南院别置学士院，……学士院南厅五间，翰林院北厅五间，中隔花砖道，承旨居北厅东第一间”。这一记载与上述发掘的遗址布局形制很相似，从遗址所在的位置看来，这次发掘的当是翰林院的南院遗址，其中3号遗址即所谓的南厅五间，1号遗址则是翰林院的北厅五间。而在5号遗址以北部分则为翰林院之北院也未可知。以上为翰林院南部的发掘情况，翰林院北部的遗址尚待进一步发掘究明之。（马得志）

西安市田王镇唐韦仁约墓

发掘时间：1984年5—8月

工作单位：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两墓位于西安市东郊灞桥区洪庆乡田王镇、铜人原畔，距城约17.5公里，唐代属雍州万年县洪庆乡。

M1土圹竖斜刀把墓。墓道作斜坡式。顶部开凿天井三个，东西两壁各有壁龛二个，龛口有木门痕迹。墓道及天井两壁原涂有白灰，过洞有壁画均脱落。土

坯封门，被盗洞打破。前庭顶部下垮，从上壁残留部分看拟为穹顶，并有木门痕迹。墓室底部距地表12米，四壁原有壁画，现绝大部分脱落。棺床经扰乱，葬式不明。棺床下用青石条铺底，东南两边各用0.14米宽的磨光青石条线刻云、兽图案、为棺床底部边沿装饰。石条下接缝处均垫单砖一排。

M2为王氏墓、墓葬结构同M1，唯多一天井，二个小龛。砖封门。前庭有砖式门坎。前庭西壁有一隧道通向M1前庭，将两墓接连起来。

出土器物计有：三彩武士俑，文官俑，镇墓兽，男、女侍俑，男、女陶俑，骑马俑，乐俑及家禽模型，铜镜，铜剪刀，贝链，白釉瓷注子，白釉小瓷盒，蚌饰，青釉四系罐，铅马蹬，铅马镳，铁锁，墓志等。

墓志载韦仁约字思谦，京兆杜陵（今长安）人，其先由吏部尚书高季辅荐为监察御史。曾弹劾中书令褚遂良赃贿事，罢遂良为同州刺史，及褚遂良重入为吏部尚书乃出补秦州清水县令。“垂拱初，封博昌县男，同凤阁鸾台三品。转纳言……”。墓志与《新唐书·韦思谦传》载大体吻合。子承庆、嗣立均为宰相，嗣立传谓“父子并为宰相，世罕其比”。以永昌元年（689年）九月二十八日遘疾，卒于承义里弟。证圣元年（695年）岁次庚寅一月七日迁窆于铜人原旧茔之后，终年七十九岁。

王氏讳婉字贞徽、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韦仁约继室，嗣立生母，承庆继母。以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八月十二日遘疾，终崇政里弟。次年归附于铜人原之旧茔，年七十一岁。

从这次清理出的器物中，三彩武士俑、文官俑、镇墓兽，形体高大，釉厚，服饰、造型俱佳，当为三彩器中的精品。男、女俑，骑马俑均具有初唐时期的风格、特点。两方墓志又为我们考证史籍、补充史料提供了实物资料。（保全 达宏）

铜川市黄堡耀窑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9—11月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耀窑考古队

本年发掘面积998平方米。清理出唐代土窑洞作坊三座，唐三彩试烧小炉一座，宋代砖砌窑洞作坊一座，宋代瓷窑两座（一座已残）、贮藏瓷器的窑洞窖藏一座。

三座唐代的土窑作坊，并排

挖筑在漆水河北岸崖边砂土层中，侧面筑有阶梯土路可登河岸台地。土窑作坊宽1.8—2、长4—5、残高1.8—2米，顶部呈圆拱形，室内地面低于窑门约1米，门下设有三级石铺阶梯踏步。在窑洞内放置有坩土泥、拉坯转轮、陶缸和瓷调料盆等作坊具。

唐三彩试烧小炉设在作坊窑洞外边侧，用砖砌成，内抹泥土，炉体很小，只能用来试烧低温三彩釉。

宋代砖砌窑洞作坊，位于1号窑之西北，形状和大小与唐代土窑作坊相近。四壁以河卵石块奠基，下部利用废匣钵垒砌，其上高1.7米处用长方形砖顺砌，砖壁之上开始起券。起券处间隔砌出椽眼，以安置椽木和蓬顶。券顶用特制的内凹外凸的楔形砖竖砌而成。室内一侧设有长2、宽1、高约0.3米的砖砌火炕，还有可利用火炕余热砌筑的烘干矮台设置。两者共用一个烟筒，砌于室外。在室内出土有大陶缸、转轮部件、凉坯具及其他作坊具。

两座宋代瓷窑（一座残）均系北方采用的馒头窑。火门内依次设圆弧形火膛、平台窑床、倒焰式烟道和两个并列的烟囱。平面呈马蹄形。与以往发现的黄堡宋窑的区别在于火门下设有较大的通风道，既可通风，又便于除渣，窑炉结构更加科学。

此次发掘清理，出土了完整和比较完整的唐宋金元各时期的黑、白、青瓷一百多件，窑具和作坊具数百件，瓷片数万件。不少器物系首次发现，如唐素胎蹲狮盖五足熏炉、唐黄釉犀牛、唐黑釉葵口圈足碗、宋葵口刻花牡丹青瓷盘、宋青瓷温瓶、宋印花水波鱼纹青瓷小盏、金白釉黑彩高足杯、元青瓷双龙瓶等，均属耀瓷罕见之品。这些精美瓷器的出土，在品种、器物种类、造型及装饰工艺上都丰富了耀瓷的内涵，为研究耀瓷提供了重要资料。

这次发掘，首次在耀窑遗址发现了唐代作坊、唐三彩试烧小炉。首次发掘出大批的唐三彩和唐代琉璃瓦。它是继全国原有的唯一生产唐三彩的巩县窑之后，发现的另一座唐三彩窑。它的发现，确定了唐长安城及其附近帝陵和达官贵人墓葬所出的著名于世的唐三彩烧造地就在铜川黄堡。所出的唐代低温彩陶，均用瓷土做胚，先烧出素烧胎，再装饰低温彩釉二次烧成。这次的出土物，有素烧器、单彩器、多彩器和滴有三彩釉的三角形支烧垫饼及长方形耐火砖等。器物有注子（执壶）、葫芦瓶、高足灯、枕、水盂、罐等生活用具和模型明器，还有犀牛、虎、马、骆

驼、骑马人物等陶塑造型。彩釉有棕红、黄、绿、蓝数种，以铁锈红和铜绿最常见，钴兰釉发现较少。

唐代的琉璃瓦只见到筒瓦，长28、宽11厘米，呈半圆形筒状，一端带有莲瓣纹瓦当，另一端带有2.5厘米宽的瓦头，在距此端3厘米处留有一个穿孔，便于连接和固定。琉璃瓦均用坩土制成，凸面光滑施以低温绿釉，背面露胎但有布纹。还发现了一些未施釉的琉璃瓦素烧胎残片，说明它的制作工艺与唐三彩一样，也是二次烧成。这是我国首次在窑址内发现的唐代琉璃瓦。它的发现，不仅确定了唐长安城内多年来发现的唐琉璃瓦的时代，也确定了它的产地。还说明耀窑不仅是一个烧造瓷器的重要窑场，而且也生产陶建材。

以往学术界一致认为黄堡耀窑创烧于晚唐。这次发掘表明，其时代应提前，从现有资料看，至少应早到中唐以前。（禚振西）

甘泉县洛河流域唐至明代石窟

勘察时间：1984年5月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甘泉县文化馆

今年共发现石窟八处，金代题记三处：

1.桥镇乡方家河唐代石窟：现存十二个窟龛，风化非常严重；1—7号窟龛，基本形制为长方形浅龛，有回字形佛台，组合为五尊。一般宽0.6、进深0.32、高0.66米；8—12号窟龛形制为马蹄形、穹窿顶，基本组合为五尊。第8号窟为九尊，主尊为善跏趺坐，宽0.82、进深0.7、高0.98米。这两组石窟可分为二期，1—7号窟为唐代初期；8—12号窟为盛唐时期。

2.桥镇乡刘老庄唐代石窟：现存三个窟龛，均为方形浅龛，穹窿顶，最大的一窟宽1.02、进深0.50、高1.00米，基本组合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主尊为结跏趺坐。其年代大致开凿于初唐。

3.桥镇乡孟家坬唐代石窟：孟家坬村后发现唐永隆二年小龛，其平面为方形、穹窿顶，无佛台，组合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较为特殊的是胁侍均立于双圆柱之上。石壁上残留壁画及墨迹。此窟的发现，为研究这个地区的石窟分期提供了依据。

4.桥镇乡孟家坬石宫寺石窟：这是甘泉县洛河流域最大的一处石窟群，现存六个石窟，除

第5号窟外，均为明以后开凿的石窟，窟内已无遗物；第5号窟为主窟，平面为正方形，正中有方形佛台，佛台上有四根石柱。宽5.55—5.88、进深6.18、高3.90米。左、右两壁对称，各开三龛，分别雕刻观音菩萨、太上老君、释迦多宝对坐。后壁雕凿七佛；前壁两侧各雕一立佛；佛台中央为三世佛。但经后代修饰。窟顶为八卦顶。其造形比例适中，风格质朴，刀法熟练。

5.下寺湾蛇家河沟宋代石窟：现在二窟，主窟宽3.45、进深3.65、高2.15米，平面方形，八卦顶，正中为一佛台，佛台上放置九尊青石圆雕造像；其造形丰腴，具有盛唐风蕴，左壁正中有两排十六个小空龛，可能是罗汉龛。

6.雨岔乡介滩窑子宋代石窟：现存一窟，宽4.68、进深4.83、高2.70米，平面方形，八卦顶，正中有一佛台，左右壁下部有一排罗汉像，风化严重。前壁门口两侧各有一天王像。窟内四壁雕满千佛。

7.雨岔乡老君寺北魏、明代石窟：现存八个窟龛，除1、2号窟龛外，均为明代石窟。1、2号窟形制为马蹄形穹窿顶浅龛，1号窟为拱形龛楣，双莲花龛柱，主尊为结跏趺坐，施禅定印，佛座前有双狮，两侧有二供养人、二菩萨。龛下题记大部分已分化，为魏书体。1、2号窟时代根据其风格，可定在北魏晚期。

8.石门乡石门石窟：现存二窟，第1窟平面为方形穹窿顶，有回字形佛台，组合为一佛二弟子，右壁有“□祐二年五月二□日”的题记。第2窟为方形平顶，未开凿完，其观音菩萨造像风格与石宫寺石窟相同，其时代可定在北宋晚期。

9.府村乡石马河石窟：现存十五个窟龛，为明代开凿的道教石窟群，基本形制为长方形，八卦顶，宽2、进深1.8、高1.2米左右。风化严重。

此外，在雨岔乡锁崖窑村、下寺湾香林寺，石门乡马超洞分别发现金代贞祐元年，贞祐二年、三年，皇统四年题记。

这一带石窟的详细调查，丰富了陕北石窟寺的资料，对研究这一带宋、金战争史，以及这个时期的文化，宗教等问题又提供了新的资料。（张燕）

宜川县贺家沟北宋石窟

发现时间：1984年6月　　工作单位：宜川县文化馆

石窟位于贺家沟村东的石崖下，有北宋崇宁二年的纪年，窟内共有大小石佛一百五十尊，其中十五尊风化不清、较大的佛头均被破坏，大部分小佛保存完好。

石窟进深2.96、宽2.11、高1.85、洞口宽1.10米。最大的佛高89厘米，最小的佛高12厘米。北壁刻有文殊、菩贤、地藏王，东壁刻有天藏神、迦奢、罗汉，东南角刻有释迦佛和善神，西南角刻有阿弥陀佛、善神，西壁刻有罗汉、圣神；窟北、东、西壁最下方刻的是十八层地狱故事。佛像旁并刻有各施主拾艮造像文字记载。（宜川文化馆）

甘泉县雨岔乡李巴圪塄村金代瘗窟

发现时间：1984年6月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金代瘗窟一座。窟距地面高6.10米。其结构由前廊、门道、窟室三部分组成。前廊为仿二层木构楼阁建筑，下半部线雕门、窗及栏板，宽5.17、高3.43米；面阔三间，正中雕刻大门，两侧次间上半部各雕一棂格窗，檐柱上有普柏枋，上有柱头斗栱四朵、补间斗栱一朵，均为一斗三升，柱头方上雕出七朵简单的斗栱，再上雕刻楼板和平坐栏杆。上半部为阁楼，即是窟室前廊，宽4.5、进深0.76—0.80、高1.82米，正中为窟门，左右两壁开龛，左龛为道教造像，组合为一天尊、二胁侍、二童子、右龛为佛教造像，组合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供养人，龛上部刻有二飞天。门口两侧为六棱石柱，窟檐斗栱均为一斗三升。门道宽0.78—1.03、进深1.44、高1.30米，有门坎。窟室面阔一间，进深三间，宽3.00—3.58、进深8.54、高2.42（第一间），2.96（第二间），1.87—2.50（第三间）米。第一间进深2.30米，两侧下部有二层台，两壁浮雕十六罗汉群像；第二、三间两壁均无雕刻，下有一冂形二层台。其顶部雕刻在陕北较为少见，前、后两间顶部为平棊，以鸾鸟衔草、龟背纹，四程破瓣纹、八瓣团花等图案组成，中间顶部为穹窿顶，图案分为四层，中心为规矩纹；第二层为飞天，第三层为荷花和双首鸟身、单首鸟身的迦陵频迦；第四层以折枝牡丹、云头纹、忍冬纹、荷花等相间图案组成；顶与四壁相接处刻有壶门。雕刻技法为浅浮雕加阴线刻，线条较为柔和，造像风格较为呆硬。

窟内遗物全部扰乱，经清理之后，未发现标准纪年物，经鉴别，二十二付散乱尸骨中，女性为十四具，男性为八具，均为成年。尸骨腐烂程度不一，估计这批尸骨入葬时间应有先后差别。

此窟题记已风化，根据其雕刻风格及附近金代遗迹判断，此窟应开凿在宋代晚期至金代，偏于金代。

这类瘗窟在我国发现不多，金代瘗窟属首次发现，所以此窟在学术研究上有较为重要的意义。（张燕）

甘肃省

秦安县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6—8月
工作单位：甘肃省文物工作队

1984年是该遗址连续发掘的第七个年度，主要发掘任务是进一步了解上一年发现的编号为F901的仰韶文化晚期大房子周围的情况，同时为下一步F901的保护性建筑工程创造条件。发掘面积235平方米，发现白灰面房址二个，灰坑五个，出土少量陶、石、骨器。在发掘中，首次发现了类似镇原常山遗址下层的文化遗存和这类遗存的地层叠压在仰韶晚期文化层之上，为研究这类遗存与仰韶文化的相互关系提供了确凿的地层根据。

大地湾遗址至本年度结束田野工作，共发掘面积达13,700多平方米。（甘肃省文物工作队）

天水市师赵村齐家文化聚落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队

在1983年发掘的基础上，今年工作的重点是在遗址的东部发掘区（即Ⅲ区）。于第二坡形台地上发现了齐家文化房址二十四座，大部份保存完好。根据房址布局情况，可分两组：第一组十六座，位于第二组房址西北部。除三座房址单独排列外，其余十三座均围拢成卵圆形，其中一座门向朝南，十二座门向彼此相对。卵圆形中央有一空地，东西两端各有一缺口，可能是氏族成员来往行走的通道。第二组八

座，均围拢成半圆形，其中一座除门向朝东北外，余门向皆朝南。以上诸房址有两座为圆形半地穴式，余皆为长方形半地穴式。从地层打破关系观察，前者早于后者。

圆形房址的特点是：先在地下挖一圆形竖穴，竖穴壁即是房子墙壁，房子地面坚硬，似经拍打。居住面中央有一圆形灶址，灶址内有红烧土和灰烬，灶面由于长期火焚，非常坚硬。长方形门道在房子之一侧，呈竖穴或阶梯式。长方形房址的特点是：平面呈圆角长方形，伸入地下的房子墙壁均向内倾斜，居住面坚硬，似经夯实。地面中央有一圆形灶坑，坑内充满红烧土。有的灶坑上还放置鬲或斝等粗陶器，显然是当时人们所用的炊具。在房子之一侧伸出长方形门道，门道分竖穴、阶梯、斜坡式三种，以前两种居多。部分房子口部发现有柱洞，柱洞分布房子四隅或边缘部分。这些房子内部从墙壁、居住面一直延续到门道后半部，均抹一层白灰面，光滑平整。今按圆形和长方形房址的不同类别，各举一例叙述之：

F25是一座圆形半地穴式房址。坑口距地表深约1米，方向250°。房子平面略呈椭圆形，口底相若，壁较直。南北长3、东西宽2.6、深0.90米。房子西南侧有一长方形阶梯式门道，阶梯高出居住面0.30米。居住面较硬，硬面中部为一圆形灶址，灶面焦黑而硬。

F17是一座长方形半地穴式房子，坑口距地表深约1.30米。方向正南北。房子平面略呈圆角长方形，墙壁向内倾斜。其南北长约2.30、东西宽约2.20、深约0.40米。居住面中部有一圆形灶炕，直径0.62、深0.10米，坑内充满红烧土。房子全部均用白灰面抹平，厚约0.02米。居住面白灰层下有一层生土硬面，厚约0.30米。房子南侧伸出一条长方形门道，长1、宽0.70米。门道下有一生土台阶，高0.35米。房子周围边缘有柱洞七个，排列对称整齐。

建国以来，考古工作者在甘青地区考古发掘中，齐家文化墓地揭露的比较多。如甘肃永靖大何庄、秦魏家，武威皇娘娘台，青海乐都柳湾，贵南尕马台等地，但房址发现的比较少，即使在甘肃秦安寺嘴坪，永靖大何庄遗址中有所发现，也是比较零星不成组的。因此天水市师赵村遗址首次发现的这批比较完整的白灰面居住房址，对研究齐家文化的村落布局和建筑技术方面增添了新的内容，同时对探讨齐家文化的渊源以及与陕西客省庄二期文化的关系等问题提供了不可多

得的实物资料。（谢端琚　赵信）

永靖县马路塬和临夏县莲花台辛店文化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甘肃省文物工作队、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

马路塬遗址，属永靖县砚塬乡。莲花台遗址，属临夏县莲花乡。这两处遗址均在刘家峡水库区南北两旁的台地上。

马路塬遗址，发掘300平方米，文化属辛店文化姬家川类型。发现遗迹多为灰坑。出土有陶器、石器、骨器等遗物。其中从两个灰坑采集的炭素标本，经过测定，距今3160—3360年。

莲花台遗址，过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曾经作过发掘。这处遗址一部分已被库水淹没，现还残存一部分。1984年清理辛店文化墓葬十九座，依据层位和打破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期。中、晚期属于姬家川类型，早期比较接近青海民和山家头，但仍是辛店文化的遗存。

综观甘青地区辛店文化，依其发现的考古资料，现可分为山家头、姬家川（甲组）、张家咀（乙组）三个类型。通过这两处遗址发掘说明辛店文化序列是：山家头⟶姬家川⟶张家咀类型，相当于夏商周时期。（张学正　蒲朝绂）

合水县九站先周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5月1日至6月19日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考古系、甘肃省文物工作队

九站遗址位于蒿嘴铺乡九站村，东距子午岭约15公里，西南距合水县城约50余公里。遗址座落在合水川（一名县东川）北边的台地上，北依马家塬，正好夹在河谷之中。遗址东西长约1,000米，南北宽约300—400米。墓地在山坡上，东西断续约有800—900米，南北至少有200米宽。

此次发掘遗址75平方米，墓葬八十座，出土陶器七百余件，铜镞、陶纺轮等小件器物将近三百件。陶器质地绝大多数为夹砂质，粗疏易碎，火候低。以红褐色居多。器形有双耳罐、壶、单耳罐、鬲、豆和钵等。另外，在完整器中还有少量的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质、色、形等与关中西周陶器一致。铜器有戈、钏、镞、铜泡和短剑等，没有容器，

装饰品有骨串饰、玉珠等。生产工具有石斧、石锛、石刀。此外，还有陶纺轮、石纺轮及骨锥等。

从遗址所出的先周和西周器物看，该遗址的年代从商末可以延续到春秋战国乃至汉代。主要堆积是商末到西周阶段的。

墓葬的器物绝大多数属于所谓寺洼—安国文化，但也有先周和西周文化的器物。依据后者，大致可以推断出寺洼—安国文化在该遗址中，从先周晚期一直延至西周晚期。

此次发掘对于寺洼—安国文化的分期、年代、地方性特征和该文化与先周、西周文化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有一定的意义。（王占奎　水涛）

崇信县于家湾西周墓地

发掘时间：1984年6— 11月

工作单位：甘肃省文物工作队

于家湾村属崇信县九宫乡，西距县城4公里，汭河从西向东流至泾川县注入泾河，县城在汭河的南岸，于家湾在河之北岸。

墓地在村庄东头的二级台地上，这个墓地于1980年文物普查时发现，1982年曾经试掘过。1984年进行全面铲探，面积达9600平方米，钻探出二百四十六座墓（包括马坑三座），其中清理发掘六十六座，形制除一座土洞墓外，其余都是竖穴土坑墓，有棺椁，部分墓坑前面有壁龛，一般大墓为4×3—8.6米，中型墓为3.5×1.1—5米，小型墓为2.2×1—1米。这批墓葬多数早期被盗，出土器物不太丰富，除海贝、蛤蜊、蚌饰等一千多枚外，还有陶、玉、石、骨、青铜器二百二十四件，其中较重要的铜器有鼎、簋、觯、戈，耳形钺、镜以及陶器中的高领分裆袋足鬲、卣、黑陶抹光罐等。

这样大的西周墓地分布也十分密集，在甘肃还是不多见的。（魏怀珩）

武威县韩佐五坝山汉墓群

发掘时间：1984年8— 12 月

工作单位：甘肃省文物队、武威县文管会

墓群位于县城南16公里，属韩佐乡辖，与出土过《仪礼》简册的汉代墓地磨嘴子隔河相望。1983年修建砖厂时发现。分布面积约100万平方米，墓葬六百余座，经正式发掘者六十座。时代上起西汉王莽末，下至东汉晚

期，以东汉初期为最多。墓葬均为斜坡通道的长方形土洞单室墓。形制大小不一，最大的墓室长4、宽2、墓道长14米，距地表深12米；最小的墓室长3、宽1.5、墓道长8米，距地表深3米。大型墓多为夫妻合葬，小型墓为单人葬；以合葬者居多。葬式以仰直为主，亦有俯身者。墓葬大部分被早期盗掘，少数保存完好。出土文物共五百六十余件，有铁、铜、木、漆、陶、丝织品、粮食等。其中以龟形铜灶、木牍、木质鸠杖、帛书为重要发现。另外，彩绘壁画墓一座，画面绘在墓室四周，面积16平方米，内容为生活饮宴、舞蹈、狩猎场面及老虎等，色彩鲜艳、笔法熟练。这批汉墓的发掘，对研究汉代河西地区的历史、地理、农业、风俗葬制、养老制度以及美术史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同一墓地，除上述两汉墓葬外，还清理了马家窑文化晚期墓葬一座，出土彩陶四件；魏晋墓葬二座；西夏墓三座，出土了少量陶、瓷器。（何双全）

河西汉代长城

调查时间：1979年—1985年

工作单位：甘肃省文物工作队

根据文献记载，汉武帝于元狩二年（前121年）后、元封四年(前10年)前后、太初三年（前102年）、天汉年间（前100年以后），在河西分段修筑长城烽燧。自1979年以来，经数年调查，行程6千余公里，对河西汉长城的起迄地点、走向、结构、城鄣烽燧布局等有了基本的了解；并在敦煌县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进行了试掘，出土汉简一千二百余枚，实物三百三十余件。长城调查，除个别地段外，已大部分完成；汉简等实物资料，现正进行室内整理。河西汉代长城的调查与研究，不仅对于深入探讨汉代边塞防御制度，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研究汉与匈奴、汉与西域、汉与羌的关系史，对于研究汉代河西四郡建置年代、地理位置，以及“丝绸之路”的走向等，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吴礽骧）

陇西县西河滩元墓

时间：1984年7—8月

工作单位：甘肃省文物工作队、

陇西县文化馆、定西地区文化局。

西河滩遗址，位于县城西郊2.5公里。西北铝加工厂建于遗址西南部，墓葬发现在建筑区西沿的高台地。共清理元墓八座。

这八座墓为一家族茔域，分三代排次。墓室多为正方形，墓顶八角形，系仿木构建筑。墓门向东，拱顶，方向在45至55度之间。四壁仿木构件的斗栱、屋檐、门窗、角柱，镶嵌于壁的孝子故事传、童子闹莲、花卉、纹饰等均为模制雕刻。

4号墓为长方形，墓顶坍塌，无木构设施。墓门拱顶，高1.82、宽1米。室之南、西、北三壁嵌模制牡丹、童子闹莲图案，不甚规范，似为以所具模砖凑合建成。室内葬女尸一具，随葬品置室之南北两侧。

八座墓大多被盗。2、4两墓室顶塌陷。8号墓虽被盗，但墓室保存完好。墓内出土条砖制成带座刻字灵碑一件，中题“巩昌——灵”，右侧题“管军千户”。这一家族茔地，应为元代初期，尚有宋墓建筑特征之遗风。

出土器物：铜镜、铜洗等十件；瓷器二十件，为碗、盏、碟等；陶器二十余件，大都破残，有罐、水注等；骨器一件；耳坠一件等；木器均因淤泥浸蚀腐烂，呈灰状，有洗架、木案等。

8号墓因墓室保存完整，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经省、地、县研究决定，搬迁至县人寿山新建公园保存，供古建、艺术和地方史研究的实物史料。（任步云）

青海省

玉树、果洛地区文物普查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青海省文物考古队

今年对青南高原玉树、果洛两个藏族自治州进行了文物普查，对其古代文化有了一定的认识。

玉树地区：陶器文化多发现于南部的玉树、称多、昂欠三县。除称多县歇武、玉树县唐达外，主要分布于昂欠县的巴米、沙松、巴卡勇、东日供、吉哈、娘买等地。在香达发现石棺葬。采集陶片多为碎末、可辨器形者多属罐类。以素面夹砂粗陶为主，还有少量泥质红、灰陶，个别泥质灰陶饰有绳纹。

佛教文化，曾有寺院达一百七十座，多毁于1958—1960年，部分重建。这些寺院分属于黄、红、花、白四个教派。建筑风格大同小异，通常为汉（飞檐斗栱）藏（平顶出檐）合式结构。其中以玉树巴塘文成公主庙为最著名。

在玉树巴塘来巴沟发现岩刻一处。内容有佛像、飞天、古藏文颂词等。佛像、飞天为阴线刻，古藏文为减地浮雕。风格为中唐以后作品。

果洛地区：发现古城堡、古墓葬和居住遗址各一处。

大武乡古城呈长方形，东西120、南北100、基宽5米。城内东北角有30×15米的内城。地面牧草覆盖，未见遗物，时代不详。

江日堂古墓，底径10、高6米，呈“冠”状。顶部灰色筒瓦残片，似曾有建筑。以墓为中心，外有径90、110米两道围墙。传为蒙古贵族之墓。（青海省文物考古队）

宁夏回族自治区

盐池县张家场汉墓

发掘时间：1984年8、9月

工作单位：宁夏博物馆考古队

八座汉墓已遭不同程度的破坏。墓葬形制有土洞墓、土坯室墓、石室墓和砖室墓，均为单室拱券顶和长方斜坡墓道，多以土坯、砖、石封门。

清理的八座墓葬除自然塌陷外，大多都被盗扰。在M3内清出较为完整的两副人骨架。为仰身直肢葬，属男女合葬墓。其余的墓内人骨散乱，葬式已难辨明，从棺痕的位置和人头骨及骨骼的数量分析，墓室内多为单人葬或男女合葬。

八座墓葬内出土的随葬品多寡不等，一般放置在棺前或者棺侧。种类有陶、铜、铁、石等器，还有盐块、鸡蛋壳等。诸如陶罐、壶、偏壶、方壶、鼎、博山炉、焦斗、魁、盘、灶、仓、釜、甑、铜甑、销、勺、带钩、铺首、印章、衔镳、当卢、害、盖弓帽、环、管、泡钉、铁灯、棺钉等。张家场汉墓从墓葬形制到随葬品的时代特征，同宁夏吴忠县关马湖汉墓比较，其时代略早，大约是在西汉及至东汉初年。

值得注意的是这批汉墓的东

北1公里，有一座被流沙埋没的秦汉古城，据考为汉代朐衍县故城址。因此，张家场汉代墓葬应与秦汉时期的朐衍县城有关。在古城址东十余公里是一道盐川，内分布数湖，采盐业历来就享有盛名。其中著名的白池(即今北大池)就位于古城址东北十公里。据载，盐池县一带在汉代就已开始产盐，并设有盐官。在这批汉墓内出土的实物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许成）

灵武县磁窑堡西夏至元瓷窑址

发掘时间：1983年11月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工作队、宁夏博物馆

窑址位于县城东约35公里处，在灵武—磁窑堡煤矿公路的西侧，距今磁窑堡镇约4公里。大河子沟河在窑址西侧流过。此地有丰富的煤矿和瓷土矿。这些都为烧瓷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窑址面积很大，东西长约800余米，南北宽400米左右。在此范围内到处散布着瓷片和各种窑具碎片。文化层厚度约2—3米。在窑址西端的南坡断崖处暴露几座残窑，尚保存部分火膛、窑室和烟囱。在窑址的其它地方亦发现数处窑炉残迹。

此窑产品极为丰富，有白瓷、黑瓷、褐瓷、黑釉剔花瓷、绿釉剔花瓷、白釉刻花瓷、外褐釉内白釉瓷、外褐釉内白釉刻花瓷、外褐釉内青釉刻划花瓷和黑釉瓷制建材等。器形有碗、盘、扁壶、瓶、罐、盆等。此窑产品特点是挖足深，底薄，外壁施釉不到底，白瓷施化妆土。产品中以剔花瓷和白瓷较精致。窑具发现有带孔筒状匣钵、喇叭形窑具、工字形窑具、环形支钉、垫条等。从所发现的瓷片看出，碗、盘均为叠烧，内底留有沙圈痕或涩圈痕。

根据调查所采集到的标本初步推定，此窑烧造年代以西夏至元代为主，明代继续生产。产品中较精致的剔花瓷、白瓷和建材等应是西夏时期的。

灵武县唐属灵州，地处西北交通要冲，西通凉州达西域，北至西受降城通塞北。西夏主继迁曾以此地为都城，到德明时迁都到距此不远的兴州(今银川市)。以后兴州、灵州为西夏王朝之东、西二京。灵武地理位置重要、交通便利，对此窑产品远销极为有利。在宁夏、甘肃、内蒙等省区的很多地点均发现有此窑产品。因此，从西夏以来灵武曾是西北地区的一个重要生产瓷器

的中心。

灵武磁窑堡瓷窑址的发现不仅将对西夏王朝（1038—1227年）的物质文化研究提供可贵的实物资料，而且填补了我国瓷窑分布的一个空白点。（马文宽）

银川市新市区西夏墓

发掘时间：1984年10月
工作单位：宁夏博物馆考古队

这四座西夏墓葬的埋葬方法非常独特。即先在地面挖一不规则的土坑，然后在坑内修砌长宽在1米左右的小型砖墓，方砖铺地，单条砖侧立砌壁，白灰或黄泥勾抹砖缝。砖墓室内垫土二分之一厚时，将盛放骨灰的罐（或碗）打破置于墓室中间，再用土填平，上面铺盖青条砖封顶。坑内埋葬骨灰的砖墓修砌完毕，即将土坑填实。地面是否起冢尚不得而知。

四座墓内出土殉葬品多寡不一，计有陶制砚台、小盆，瓷器有碗、盏、罐，以及宋代货币“祥符通宝”和“元祐通宝”等。其中出土瓷碗、盏的形制和烧造风格与灵武崇兴出土的西夏窖藏瓷器完全相同。

从这四座砖墓的规模小和出土殉葬品较少的现象分析，应属于西夏时期一般平民阶层的墓葬。过去仅在贺兰山东麓发掘了少数西夏皇室陵墓和勋臣贵戚的陪葬墓，对西夏时期中、下阶层的平民墓葬是首次发现。尤其是这四座砖墓中埋葬骨灰，证明西夏时期的党项民族流行火葬，这对研究西夏历史和当时的社会风俗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许成）

贺兰山滚钟口西夏窖藏钱币

发掘时间：1984年9月
工作单位：宁夏博物馆研究部

发现的这批钱币，总计125公斤，二万九千余枚。经初步分类清理，计有西汉、隋唐、五代、两宋、辽金和西夏等十四个朝代的六十多种钱币。若按币形特点、币值大小、书体不同细分，可达二百多品。其中最早的是西汉吕后的八铢“半两”，最晚的是西夏神宗的“光定元宝”。从西汉以来的一千四百多年中，主要流通的诸如“半两”“五铢”“开元通宝”“周元通宝”以及北宋的各种钱币，这里都有。同一窖藏出土如此丰富的品

种，在考古发现中是不多见的。

在这批钱币中，五代十国后汉的“汉元通宝”，前蜀的“天汉元宝”“光天元宝”“乾德元宝”，南唐的“唐国通宝”，辽代的“清宁通宝”“咸雍通宝”“大康元宝”“寿昌元宝”“乾统元宝”，北宋的“庆历重宝”，金代的“正隆元宝”“大定通宝”，南宋的“隆兴元宝”，都是不多见的钱币，比较珍贵。

占有一定数量的西夏钱币，是这次发现的重要收获。除“天盛元宝”、“乾祐元宝”、“天庆元宝”、“皇建元宝”和“光定元宝”五种汉字钱外，还出土了极其珍贵的西夏文“大安宝钱”、“乾祐宝钱”和“天庆宝钱”三种。这些钱币轮廓规整，字迹清晰，制作精美，反映了西夏的冶金铸造工艺水平，是研究西夏货币的直接实物资料。

西夏钱币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汉字行书“乾祐元宝”，篆书“光定元宝”。在此之前，无论钱谱文献著录，还是考古发现，汉字钱皆为单一的真书。这种行书、篆书钱还是第一次发现，说明西夏受北宋影响，也流行对钱。在近三万枚钱币中，这两种钱各有一枚，是极其珍贵的孤品。

在这批钱币中，北宋钱币约占全部钱币的百分之八十五。它与1979年和1980年在贺兰山榆树台、大风沟西夏窖藏出土的钱币品种相类。综合其他西夏墓葬、遗址、窖藏多出土宋代钱币的情况，说明西夏虽然自己铸造钱币，但实际流通和使用的主要是北宋钱币。这在宋、夏经济关系中是很重要的。

滚钟口位于银川正西，俗称小口子，是宁夏著名风景区。这里距宁夏都城兴庆府（今银川旧城）仅七八十里。沟内有多处西夏建筑遗迹，沟口南面是著名的西夏陵，这里是西夏人民经常活动的地方。“光定元宝”系西夏神宗李遵顼所铸，神宗最后一年距蒙古灭亡西夏仅有五年时间。这批钱币，很可能是逃避蒙古“锋镝”的西夏难民埋藏的。（牛达生）

同心县发现西夏官印

征集时间：1984年6月
工作单位：同心县文管会

同心县文物管理所在新庄集乡征集到西夏官印一方。官印原装在一个双耳白瓷罐中，1963年秋，为该乡中学会计在附近荒滩上挖甘草时所得，并珍藏至今。官印铜质，方形抹角，长柄有

穿，造型规整。印身边长5.4、厚1.1，连柄总高3.5厘米。印文白文，上刻西夏九叠篆文“首领”二字。背款刀刻西夏文，左侧四字“依力𗁅𗂧𗄊𗅉”，是党项族姓氏，右侧四字“自掌施纪”。柄端刀刻西夏文“上”字，以示印文之上下。

据查各地文博部门收藏及印谱著录的西夏官印约有一百一十多方，分为六字印、四字印，而以二字印最多。视印主地位之高低，印身大小参差。背款一般左刻姓氏，右刻年款，是珍贵的资料。同心西夏官印，左刻姓氏，右刻“自掌施纪”而无年款，是西夏官印中的孤例，为研究西夏典章制度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双耳白瓷罐圆肩鼓腹，高31.6厘米，也是西夏文物珍品。（牛达生）

贺兰山西夏石刻塔

调查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宁夏博物馆考古队

贺兰山石刻塔，是石嘴山市文物普查时发现的。其中涝坝口刻塔二座，大枣沟内刻塔五座。

涝坝口位于石嘴山市（大武口镇）西北15余公里。在沟口北岸的山坡、崖壁上并排雕塔两座，皆为喇嘛式，造形相同，由塔座、塔身、塔顶三部分组成，每座塔体呈三角形，以西边刻塔为例。三层须弥座上为覆斗形塔身，腹下中间开方龛，高30、宽34、深33厘米；宝珠塔顶上置一小三角体塔刹，象征“十三天”。塔体通高2、底宽1.2米。东边刻塔为五层须弥座，塔体通高1.8、底宽0.95米。两座刻塔表面遗有白灰残痕，可知塔体原以白灰抹壁。

大枣沟石刻塔，位于石嘴山市（大武口）西北6公里。在沟谷南崖雕刻五塔，均为浮雕喇嘛式，大小略异，造形相同，由塔座、塔身、塔顶三部分组成。塔体呈三角形，外侧用阴刻线构画背光。刻塔皆为三层须弥座，塔座第三层的中间开龛，称“眼光门”，可能原为供置佛像用。塔身呈覆斗状。塔顶由刹座、刹身、刹顶三部分组成，宝珠衬托天盘的刹座，上置三重宝珠相轮为刹身，刹尖以“十三天”收顶，形似反扣着漏斗呈三角体。最大的刻塔通高2.66、底宽1.6米。其中5号刻塔的刹座天盘下遗有抹壁的白灰层，上施朱彩，说明这些刻塔原以白灰抹壁，并施以朱彩构图，后经风雨剥损。这种白灰层上涂朱彩的做法，在

西夏陵园的神墙壁面和青铜峡百零八塔的塔体表层（指原始层面）均有所见。贺兰山石刻塔的塔体造形，亦与百零八塔的风格相近，并且显得粗糙古朴。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大枣沟石刻塔附近多为西夏遗址。据载，西夏时期国内盛行佛教，同时也风行喇嘛教。综上分析，贺兰山涝坝口与大枣沟石刻塔的刻制年代，当在西夏时期或者元代。（许成）

贺兰山岩画群

调查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宁夏博物馆考古队

继1983年贺兰口与大岱沟发现的两处古代岩画之后，又在树林口、黑石峁、归德沟、大西蕃口、小西蕃口、苏峪口、回回沟、口子门沟、二龙山等地新发现十余处古岩画群。

树林口岩画，位于石嘴山市（大武口镇）西北约25公里。岩画分布范围以树林口为中心南北延伸，长达约5公里。初略估计约在千幅以上，主要内容刻画有鹿、羊、犬、驴、人物狩猎等图形。

黑石峁岩画，位于石嘴山市（大武口）西北10余公里。在山峁的顶端发现岩画六十余幅。主要内容有放牧、群鹿、双人舞、狼、犬等图形。

归德沟岩画，位于石嘴山（大武口）西南10余公里。岩画分布在沟谷两侧山脊坡地的岩层剖面上，南北绵延约1公里，计有岩画五十八幅。内容主要以马、犬、羊为最多，还有骑马出牧图，另外就是山间常见的野生动物，如野鹿之类。在这些岩画中间，还有一些题记，如“大喜大吉”“天坤有神地下人”等，推测当与古代的巫卜有关。

大西蕃口岩画，位于银川市西北60余公里。自沟口迤西1公里多长的沟谷北岸崖壁上刻有十七幅岩画，内容有类人首图形和牛、马、鹿等动物图形。

小西蕃口岩画，位于银川市西北65公里。岩画分布在沟口北岸山坡的巨石上，约有百余幅。内容较为丰富，有弯弓射猎、人兽相博、人物骑马，以及牛、马、羊、犬、狼等图形，图形刻画很小，结构紧凑。

苏峪口与回回沟岩画，位于银川市西北45公里。岩画分布在苏峪口沟谷两岸的巨石岩壁上，岩画近二百幅。这批岩画内容，类人首图形约占二分之一，其余皆为牛、羊、鹿等动物图形，还有狩猎祈祷的画面以及鱼的图形。

其中的一幅牛图，高1.01、长2.01米，通体采用双线槽勾画，形象十分雄壮。

口子门沟岩画，位于青铜峡县城西南60公里。口子门沟内共发现三处规模较大的岩画群，分布范围长达10余公里，初略统计约有数百幅。主要内容有羊、犬、鹿、马、骆驼、狼、人物、骑马等图形。其中较大的一幅，石面高1.9、宽2米，上刻二十多个图形，似为一幅《归牧图》。在这幅岩刻的左上角有横竖两行题字，字迹不清，似为西夏文。

双龙山岩画，位于中宁县石空乡黄羊村西1.5公里。贺兰山南端的双龙山直隶墩下，在山坡岩层的断面上，发现岩画约数十幅。内容有羊、驼、犬、人物等图形。

贺兰山南北绵亘250余公里，历史上曾经是我国北方诸少数民族驻牧和狩猎的地方。岩画的内容题材，都是反映古代人们的牧猎活动，以及山中各种野生动物的情况。（许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柴窝堡细石器遗存

发掘时间：1984年10月

工作单位：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遗存位于乌鲁木齐市东南50公里，地处天山山谷中部，共两处。

第一处，在柴窝堡湖东一公里左右的戈壁湖滩连接地带。石器多暴露在湖滩一侧无植被的白褐色黄土层表面。在东西宽300米左右，南北长约1000米的范围内，采集到石器标本四百余件。

第二处，在柴窝堡湖西南约4公里，这里植被较稀疏，土层含碱较大，在长约1000米，宽约100米的范围内，采集到石器标本二百多件。

两处均以细石器为主体，多为典型的传统细石器如石核、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石镞等。石核有圆锥形，圆柱形，船底形和楔形，台面多平整光滑，周缘上翘，核身留有窄长条疤痕。其制作方法，一般是将砾石块打去一段，修整成坯，利用劈裂面作台面，使用间接打击法剥下窄长条的石片。这种石片在这里发现很少，多为残段，少数有明显的使用和加工痕迹。

刮削器有圆头短身、圆头长

身和凹刃、弧刃、双边刃等，将打下的石片用间接打击法进行第二步加工而成，以劈裂面向背面加工的居多，少数是向劈裂面或两面加工的。而尖状器、雕刻器、石镞等，多也进行过第二步加工。遗存点上还采集到很少几件通体加工石器，有石叶、梳状双刃石刀，可以看出其加工工艺已达到成熟阶段。

遗址区内见少量粗大石器。多为大石片打制而成，也有用板石、砾石块为料，有砍砸器、尖状器和刮削器，但所占的比例很小。

在整个采集点上，没有见到一件磨制的石器，只见到少量的夹砂红、灰陶片，彩陶片，但在遗存点附近发现有晚期的古墓群和古遗址，这类陶片和细石器似非共存。

柴窝堡细石器，初步观察，比较七角井、罗布泊、阿斯塔那一带的细石器似乎具有更为原始的特征。（邢开鼎）

巴里坤县兰州湾子三千年前石构建筑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城西6公里的兰州湾子一带，发现古代石结构建筑遗址多处。其地貌特征是直径约20—30、高3米左右的巨型石堆。此类石堆在伊吾军马场、奎苏、石人子等处也都有发现，当地老乡称之为“青疙瘩”“白疙瘩”。其地理位置均在天山北麓靠近山脚地势较高处。

这次发掘的石堆，下为巨石构成的大型建筑，面积近200平方米，石墙厚达3米，近底部成坡状铺展，残墙高近2米，分隔成前后室。主室居南，面积达100平方米，底部见柱洞，柱洞内残存木柱残段。北面有附室，南、北并列，有门道彼此联通，由附室向东开门。建筑用材选自山前遍布的巨型卵石，大者长达1.5米以上，宽、厚超过50—60厘米，壮劳力四、五人也难以搬动。但内侧墙面平整，颇费匠心。遗址曾经三次住人，均见灶坑及地面，最后毁于火。建筑遗址内除发现大量烧炭、灰土外，还出土了大型圈足铜鍑、环首小铜刀、双耳鼓腹红陶罐、彩陶罐、陶锉、马、羊骨料、鹿骨、多件大型磨石和大量石球、炭化小麦粒。不见铁器。磨石大者长1米多，宽、厚10厘米，因长期使用，中部严重下凹成马鞍形。

遗址内还曾出土大量散乱人骨及完整骨架。经鉴定，个体达十七人。除两个明显为成年男性外，余均系未成年婴幼儿及老年妇女。具有蒙古人种特征，一件头骨上见巨型外伤创洞，明显属非正常死亡。遗址底层木炭经碳14测定，其年代为距今3285±75，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王朝末期。

这一发现说明：早在距今3200年前，巴里坤即已有大型铜器，处于青铜时代。其石构建筑规模非凡，似非一般民居，或已进入文明。明显有农业经济存在。冬小麦与羊、马、鹿等饲养家畜及狩猎的野兽，同为人们的生活资料。（王炳华　伊弟利斯·阿不都　邢开鼎）

乌鲁木齐市南山矿区古墓葬

发掘时间：1984年10月

工作单位：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这批墓葬共发掘二十二座。均有河卵石封堆，封堆是圆形或方形，有的封堆四周还砌有石围垣。墓室均为竖穴石室，大多为椭圆形，少数为矩形。墓口用卵石或原木覆盖，墓底铺卵石或木板。以丛葬为主，人架从数具到十数具不等；个别墓中亦见单身葬。葬式有仰身直肢、侧身屈肢、俯身葬和二次葬等多种。少数墓在主室一侧还砌一小石室、均葬一小孩，小孩头戴毛质网状发套和毡帽，脚穿毡靴，显得十分突出。

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其中又以彩陶为大宗。其次为木器、铜器。个别墓中见小件铁器。陶器均手制，皆夹砂红陶。器形有罐、杯、壶、釜、盆等。其中高圈足单耳彩陶盆颇具特点、在新疆早期考古文化中还不多见。彩陶图案主要是倒三角纹、网纹、菱形格纹、涡纹，以及用斜线组成的几何图形案等，风格和鱼尔沟、吐鲁番艾丁湖、善鄯苏巴什等地所见基本相同。木器有盘、盆、纺轮，以及供取火用的钻孔木条等。铜器有小刀、耳环、马衔等。出土的一件圆形带柄小铜镜不仅见于乌拉泊水库区古墓，同类镜子在伊犁地区战国前后的墓葬中亦有发现。

墓葬中普遍殉葬较多的羊头、马头、牛头等兽骨，反映了畜牧业经济在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从文物特征和埋葬习俗看，这批墓葬应是广泛分布于吐鲁番盆地周围的古代车师民族的遗存，其时代属于原始社会末期阶段，相当于中原春秋战国时期。（张玉忠）

巴里坤县弯沟古墓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新疆考古研究所

弯沟位于县城西南4公里，发掘的四座古墓沿沟谷分布，地表为块石围成的石圈，直径4—5米。墓葬形制为土坑竖穴，其一为竖穴偏室。均为单室，长约1.4—2、宽0.5—1.4、深1.5—2米。土葬，葬式有仰身屈肢、仰身直肢，头西脚东、面北。有二次葬。两座墓内木质葬具已朽。随葬品主要为陶器、骨器、铁器、料珠、贝币等。陶器手制，火候不高，主要器形有罐、杯。多附单耳，或有堆纹。并见羊、马骨。

出土人骨经初步鉴定具有明显蒙古人种特征。（伊弟利斯·阿不都）

尼勒克县奴拉赛沟两千年前铜矿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新疆考古研究所

遗址在尼勒克县城南约3公里的天山奴拉赛沟，现已发现古代铜矿采矿遗址十余处，为竖井硐口，每个硐口大致5米见方。有一竖井，深达20米左右，宽约5米，矿壁陡峭。矿壁两侧横空支撑有许多水平原木，两端分别楔入矿壁内，但更多的原木则已塌折，与大量矿石、石器、泥土混杂在一起，形成了厚达4—5米的堆积层。从调查采集到的石器等遗物分析，并依据碳14测定年代，证明这一遗址距今已达2500年左右（相当于历史上的春秋时期）。（新疆考古研究所）

乌鲁木齐市乌拉泊古墓葬

发掘时间：1983—1984年
工作单位：新疆考古研究所第一研究室

墓葬在南郊乌拉泊水库旁，共发掘古墓四十六座，出土文物一百五十多件。随葬品以陶器为大宗，另有铜镜、铜刀、铜锥、金耳环、小铁器等。通过对这批墓葬的初步研究，证明两千年前乌鲁木齐南郊已居住着较多的人群，他们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相结合的经济活动。这批墓葬的发

掘，为乌鲁木齐城和其近郊区的人类活动，提供了较重要的资料。（新疆考古研究所）

和静县察吾呼沟口古墓群

发掘时间：1984年7—11月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

墓群位于和静县西约40公里的察吾呼沟口。这里在方圆约1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有很多古墓，比较集中的有三处，分别编为一、二、三号墓地。一号墓地在西，二号墓地在东，相距不到1公里；三号墓地在一号墓地之南，相距约1公里。一号墓地有墓葬六百余座，二号墓地有一百三十余座，三号墓地有三百三十多座。

1983年在一号墓地发掘了四十三座。1984年除继续在一号墓地发掘五十多座外，还在二号墓地发掘十八座，三号墓地发掘二十座。

1984年发掘的一号墓地的墓葬情况与1983年发掘的基本一致（见《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年）。

二号墓地的墓葬大多为石堆墓（即坟堆多用卵石堆成小圆丘），少数为石环墓（即坟堆用卵石围成一个圆环，环内不堆卵石）。墓室用卵石砌成，室壁较直，多呈长圆形。多丛葬，人骨少者二、三具，多者十数具或数十具，或完整，或散乱。有的石堆墓和石环墓的西北或北部有小孩墓和祭祀坑，坑内埋马头。随葬品主要是陶器，以单耳罐、单耳把杯、壶为最多，一号墓地的单耳带流罐和圜底鼓腹罐比较少见。另外，还有小件铜、铁器及毛织品等。

三号墓地的墓葬都有用小卵石堆成的长圆形坟堆，墓室大多是长方形或长圆形的竖穴土坑，少数为洞室墓。葬具有木棺或独木棺，少数还有类似尸床和木榨的葬具。葬式均为头东足西的仰身直肢葬，多为单人葬，少数为二人或三人合葬。随葬器物有铁器、青铜器、丝织器和陶器等。铁器主要有短剑和镞、小刀及包金饰品。青铜器有带扣、环和镜等。丝织品都残块，主要是绢。陶器很少，主要是小口鼓腹罐。此外，还有殉葬马头、马蹄及羊头等。

一号墓地的年代，据^{14}C测定的数据，大约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西周至春秋阶段。二号墓地的墓葬形制结构以及葬式和出土器物与一号墓地比较接近，但又有变化，其年代可能略晚于一号墓

地，或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战国前后。三号墓地无论是墓葬形制、结构还是葬具、葬式和随葬品，都和一、二号墓地有较大的区别。从普遍随葬铁器和丝织品以及出土的一面规矩镜分析，其年代大约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西汉时期。（孙秉根　陈戈）

轮台县群巴克古墓

调查时间：1984年12月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疆队

墓地位于轮台县西北约15公里的群巴克乡附近，东南距乡政府约2公里。墓地南北长约300、东西宽约100米。地势较平坦，表面覆盖一层砂石，数十座古墓葬错落其上。所有墓葬都有封土堆，多呈圆形或长圆形，有的顶部中间略有凹陷。大约直径10—15、高约1—1.5米；小者直径约3—4、高约0.2—0.3米。

1984年4月当地群众在修建公路时推开两墓，据说墓内有棺木和一具或两具尸体，随葬有陶罐和丝织品等。其年代可能为汉代前后，具体情况有待发掘。（孙秉根　陈戈）

和硕县那仁克古墓

调查时间：1984年12月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

古墓葬位于和硕县东北约100余公里的那仁克乡西侧附近的山前坡地上。估计约有七、八十座，大致分三排呈东西向链状排列。墓葬外形有两种：一种是用卵石堆成小圆丘，大者直径约8—10、高约0.4—0.5米；小者直径约1米左右，高约0.2—0.3米。另一种是用卵石围成长方形石围，大者长8、宽4米；小者长约3、宽约2米，卵石基本与地面平。从个别已坍陷的墓葬观察：墓室系用石块砌成，上面用几块扁平的大石板覆盖。其文化内涵及年代尚需发掘判断。

据当地群众介绍，自那仁克乡至包尔图牧场的路旁及牧场附近，也有同样类型的古墓葬数处，有的数量多达百余座。（孙秉根　陈戈）

新源、洛浦、和田、若羌等县分别发现两汉遗址、南北朝墓及藏文石刻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新疆文管会

（一）伊犁地区新源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七十一团一连渔塘砖窑工地发现两汉时期居住遗址。本年开挖清理面积共432平方米。发现房址十四处、灶七处、灰坑二十个、墓葬六座。出土文物有少量石器、铁器残片、铜渣、铜残器、陶残器等。出土的人头骨，眉骨上行至顶部较为平缓。

（二）洛浦县山普拉发现汉代至南北朝时期古代墓葬群。墓葬群位于县城南15公里处，墓葬分布在东西长约4公里、南北宽约1公里的范围内。1984年1月与10月先后两次清理发掘墓葬四十九座。墓葬分布较密集，葬式多样，有单体槽形木棺葬、船形木盆葬，母子合葬、百人以上大型墓室丛葬墓，多人合棺葬及殉马坑等。两次发掘出土文物约一千二百余件。主要有大量的毛丝织品，毛织中有多色平纹、斜纹，拉绒、缂毛等多种；衣帽，编织绑带、花边；印花棉布，刺绣、栽绒、拉绒地毯；毛褐，毡衣，皮革制品。还有花押、珠饰、手杖、摇扇，镜袋、铜镜，漆篦、木梳、香袋，陶器、木器以及弓箭、铁镰，纺轮、纺杆、冶炼鼓风风囊、狩猎工具袋、全套鞍鞯、鞍毯等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出土丝织品中的“飞凤纹”锦、“蔷薇纹”（即古代的“宝相花”）双面提花锦、“群猴对象纹”锦以及有汉文款识的镜带、“常宜富贵”铜镜、色彩斑烂的漆篦等，说明早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南北朝时期，当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交往频繁，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历史史实。

（三）和田县布扎克公社依玛木木沙卡孜木麻扎尔清理出土南北朝时期“四灵”彩绘木棺。棺上所绘“四灵”形象逼真、色彩艳丽。“四灵”排列方位正同棺木定向一致，（即按东（青龙）、南（朱雀）、西（白虎）、北（玄武）方位排列）。特别是出土覆面黄绫上写“夫人信富□宰相李旺儿”汉文题识，对古代于田历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四）若羌县藏文石刻发现于县南约700公里的阿尔金山祁漫自然保护区的草原上。文字阴刻在页岩的二面或砾石的四周，字大2—4厘米，刻文工整，已采

集到的一部分编号共三百三十九块。据文献记载，柴达木盆地北部通往新疆的祁漫塔格隘口——噶斯口，是公元七世纪初吐蕃入据南疆的孔道。这批藏文石刻可能是这个时期的遗物。（柳青文）

台湾省

恒春鹅銮鼻发现史前遗址

在恒春半岛的鹅銮鼻公园一带，台湾考古学者发现一处史前遗址，发掘出彩陶片、素面陶片、绳纹陶片和种类繁多的石器、骨器等。经^{14}C测定，年代最久者距今五千年以上。台湾考古学者认为，鹅銮鼻文化与大陆东部或东南部古代的文化有关，说明台湾与大陆在史前已有密切的关系，鹅銮鼻的先民，可能就是大陆移民。（明康）

考古研究、文博机构一览

中　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
中国历史博物馆
中国革命博物馆
故宫博物院
国际友谊博物馆
北京鲁迅博物馆
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
出国文物展览工作室
中国文物商店总店
文化部文物局
古文献研究室
文物出版社

北京市

北京市文物局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
首都博物馆
琉璃河商周遗址博物馆
大葆台汉墓博物馆
门头沟区博物馆
徐悲鸿纪念馆
智化寺文物保管所
大钟寺文物保管所
五塔寺文物保管所
白塔寺文物保管所
西黄寺文物保管所
东南城角楼文物保管所
德胜门箭楼文物保管所
顺义县文物管理所
平谷县文物管理所
通县文物管理所
大兴县文物管理所
昌平县文物管理所
房山县文物管理所
密云县文物管理所
延庆县文物管理所
怀柔县文物管理所
东城区文物管理所
西城区文物管理所
崇文区文物管理所
宣武区文物管理所
朝阳区文物管理所
海淀区文物管理所
丰台区文物管理所
门头沟区文物管理所
石景山区文物管理所
燕山区文物管理所
丰台区卢沟桥文物保管所
石景山区法海寺文物管理所

昌平县十三陵文物管理所

天 津 市

天津市文物管理处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天津市自然博物馆
天津市三条石历史博物馆
天津市战役天津前线指挥部旧址陈列馆
天津市觉悟社旧址陈列馆
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天津市革命活动纪念馆
天津市蓟县文物保管所
天津市河北区文物管理所

河 北 省

河北省文化厅文物局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河北省古建筑研究所
河北省博物馆
保定地区博物馆
张家口地区博物馆
邯郸市博物馆
承德市避暑山庄博物馆
定县博物馆
蔚县博物馆
围坊县博物馆
隆化县博物馆
留法勤工俭学博物馆
唐县白求恩纪念馆
冉庄地道战纪念馆
张寒辉纪念馆
西柏坡纪念馆
李大钊纪念馆
河间白求恩手术室纪念馆
石家庄地区文物保管所
邯郸地区文物保管所
保定地区文物保管所
承德地区文物保管所
廊房地区文物保管所
衡水地区文物保管所
邢台地区文物保管所
沧州地区文物保管所
石家庄市文物保管所
邯郸市文物保管所
张家口市文物保管所
唐山市文物保管所
邢台市文物保管所
保定市文物保管所
保定市古莲池管理处
承德市文物局
承德市外八庙文物保管所
承德市避暑山庄文物保管所
秦皇岛市山海关文物保管所
平山县文物保管所
赵县文物保管所
正定县文物保管所
井陉县苍岩山文物保管所
涉县文物保管所
临漳县文物保管所
永年县文物保管所
武平县文物保管所

大名县文物保管所
南和县文物保管所
隆尧县文物保管所
临城县文物保管所
柏乡县文物保管所
易县清西陵文物保管所
易县燕下都文物保管所
曲阳县文物保管所
磨县文物保管所
涞水县文物保管所
浑源县文物保管所
定兴县文物保管所
容城县文物保管所
隆化县文物保管所
围场县文物保管所
滦平县文物保管所
平泉县文物保管所
宽城县文物保管所
丰宁县文物保管所
兴隆县文物保管所
承德县文物保管所
遵化县清东陵文物保管所
遵化县文物保管所
乐亭县文物保管所
玉田县文物保管所
青龙县文物保管所
抚宁县文物保管所
霸县文物保管所
黄骅县文物保管所
秦邯郸市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
高邑县文物保管所
阳原县文物保管所
盐山县文物保管所
孟林回族自治区文物保管所
南皮县文物保管所
磁县文物保管所
易县文物保管所
黄粱梦文物保管所
涞源县文物保管所
唐县文物保管所
涿县文物保管所
洼水县文物保管所
安国县文物保管所
丰润县文物保管所
望都县文物保管所
滦南县文物保管所
迁安县文物保管所
宣化区文物保管所

山 西 省

山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
山西省博物馆
晋东南地区博物馆
运城地区博物馆
侯马市博物馆
大同市博物馆
长治市博物馆
临汾市博物馆
运城市博物馆
右玉县博物馆
天镇县博物馆
介休县博物馆
泌水县博物馆
永济县博物馆

芮城县博物馆
垣曲县博物馆
榆社县博物馆
襄汾县博物馆
浮山县博物馆
蒲县博物馆
平顺县博物馆
万荣县博物馆
稷山县博物馆
平陆县博物馆
高平县博物馆
代县博物馆
岢岚县博物馆
偏关县博物馆
五台县博物馆
汾阳县博物馆
孝义县博物馆
祁县民俗博物馆
灵石县博物馆
晋城县文物博物馆
屯留县文物博物馆
长子县文物博物馆
阳城县文物博物馆
陵川县文物博物馆
壶关县文物博物馆
黎城县文物博物馆
襄垣县文物博物馆
沁县文物博物馆
沁源县文物博物馆
洪洞县博物馆
临猗县博物馆
新绛县博物馆
闻喜县博物馆
绛县博物馆
河曲县博物馆
河津县博物馆
五台县松岩口白求恩纪念馆
定襄县西河头地道接待站
兴县蔡家崖晋绥边区旧址纪念馆
武乡县八路军总部旧址纪念馆
吉县文物工作站
雁北行署文物工作站
忻州行署文物管理处
吕梁行署文物工作室
晋中行署文物工作站
临汾行署丁村文物工作站
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太原市晋祠文物保管所
太原市双塔保管所
太原市蝈蝈文物保管所
太原市天龙山文物保管所
大同市云岗石窟文物管理所
榆次市文物管理所
晋城市文物馆
运城县解州关帝庙保管所
芮城县永乐宫保管所
应县佛宫寺保管所
浑源县恒山保管所
朔县崇福寺保管所
汾阳县太符观文物管理所
太谷县文物管理所
平遥县文物管理所
灵石县文物管理所
沁县文物馆
长子县文物管理所
洪洞县广胜寺保管所
隰县小西天保管理
侯马市文物管理站

古县文物工作站
阳曲县文物管理所
屯留县文物管理所
山阴县雁门关广武段文物管理所
灵邱县觉山寺文物管理所
沁源县圣寿寺文物管理所
和顺县文物管理所
山阳县文物管理所
太原市古交区文物管理所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考古研究室
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
哲里木盟博物馆
乌兰察布盟文物管理站
伊克昭盟文物管理站
锡林郭勒盟文物管理站
巴彦诺尔盟文物管理站
阿拉善盟文物管理站
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
兴安盟文物管理站
呼和浩特市文物管理处
包头市文物管理所
乌海市文物管理站
赤峰市文物管理站
巴林右旗文物管理站
鄂伦春旗文物管理所
奈曼旗文物管理所
赤峰市翁牛特旗文物管理所
赤峰市喀喇沁旗文物管理所
赤峰市克什克腾旗文物馆
赤峰市巴林左旗文物馆
赤峰市敖汉旗文物管理所
哲里木盟库伦旗文物管理所
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成吉思汗陵管理所
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文物管理所
赤峰市宁城县文物管理所

辽 宁 省

辽宁省文化厅文物处
辽宁省博物馆
朝阳市博物馆
沈阳市故宫博物馆
旅顺市博物馆
鞍山市博物馆
抚顺市博物馆
本溪市博物馆
锦州市博物馆
营口市博物馆
铁岭市博物馆
辽阳市博物馆
金县博物馆
复县博物馆
喀左县博物馆
铁岭市周恩来同志读书旧址纪念馆
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馆
抗美援朝纪念馆
辽沈战役纪念馆

铁岭地区文物工作组
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
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鞍山市文物工作组
本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阜新市文物工作组
辽阳市文物管理所
沈阳市新乐遗址文物管理所
旅顺市帝国主义侵华遗址保管所
海城县文物保管所
新宾县永陵文物保管所
东沟县孤山文物保管所
绥中县文物保管所
兴城县文物保管所
义县文物保管所
北镇县文物保管所
盖县文物保管所
法库县文物保管所
喀左县文物保管所
台安县文物保管所
本溪县文物保管所
恒仁县文物保管所
辽阳县文物保管所
灯塔县文物保管所
开原县文物保管所
昌图县文物保管所
康平县文物保管所
西丰县文物管理所
朝阳县文物管理所
凌源县文物管理所
建平县文物管理所
锦西县文物管理所
锦县文物管理所
黑山县文物管理所
营口县文物管理所
大洼县文物管理所
盘山县文物管理所

吉 林 省

吉林省文化厅文物处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吉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
吉林省考古研究室
吉林省博物馆
吉林省革命博物馆
四平地区博物馆
白城地区博物馆
延边自治州博物馆
吉林市博物馆
四平市博物馆
榆树县博物馆
龙中县民俗博物馆
集安县博物馆
伪皇宫陈列馆
杨靖宇将军纪念馆
长春市革命烈士展览馆
扶余县展览馆
大安县展览馆
白城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延边自治州文物管理委员会
长春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吉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四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辽源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浑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农安县文物管理所
永吉县文物管理所
集安县文物管理所
洮安县文物管理所
敦化县文物管理所
珲春县文物管理所
龙井县文物管理所
和龙县文物管理所
双阳县文物管理所
通榆县文物管理所
镇赉县文物管理所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
黑龙江省文物出版编辑室
北方文物杂志社
黑龙江省博物馆
海林县博物馆
宝清县博物馆
爱辉县爱辉展览馆
东北烈士纪念馆
毛周刘朱视察纪念馆
哈尔滨日本细菌工厂暴政展览馆
佳木斯市刘英俊纪念馆
黑河市爱辉历史陈列馆
黑河地区文物管理站
绥化地区文物管理站
合江地区文物管理站
嫩江地区文物管理站
大兴安岭地区文物管理站
松花江地区文物管理站
哈尔滨市文物管理站
齐齐哈尔市文物管理站
鸡西市文物管理站
鹤岗市文物管理站
双鸭山市文物管理站
伊春市文物管理站
佳木斯市文物管理站
牡丹江市文物管理站
宁安县文物管理站
阿城县文物管理站
肇东县文物管理站
依兰县文物管理站
加阴县文物管理所

上 海 市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上海博物馆
松江县博物馆
嘉定县博物馆
青浦县博物馆
崇明县博物馆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上海鲁迅纪念馆
韬奋纪念馆
中共代表驻沪办事处纪念馆

江 苏 省

江苏省文化局文物处
南京博物院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南京市博物馆
苏州市博物馆
无锡市博物馆
常州市博物馆
镇江市博物馆
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南通市博物馆
扬州市博物馆
泰州市博物馆
盐城市博物馆
淮阳市博物馆
连云港市博物馆
徐州市博物馆
武进县博物馆
丰县博物馆
镇江市茅山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组
南京市中央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
溧阳县水西村新四军旧址保管所
新四军黄桥战役革命历史陈列馆
盐城市新四军军部原址纪念馆筹备处
周恩来故居管理处
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无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常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扬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淮阴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扬州唐城遗址文物保管所
常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南通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宜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金坛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丹徒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丹阳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扬中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高淳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如皋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高邮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泗洪县明祖陵文物保管所
无锡市东林书院文物保管所
无锡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江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浙　江　省

浙江省文化厅文物局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浙江省博物馆
浙江省自然博物馆
安吉县博物馆
德清县博物馆
海宁县博物馆
桐乡县博物馆
平湖县博物馆
海盐县博物馆
临海县博物馆
嘉善县博物馆
新四军苏浙军区旧址纪念馆
解放一江山岛纪念馆
余姚县四明山纪念馆
平湖县地主庄园馆

嘉兴市南湖纪念馆
绍兴市鲁迅纪念馆
台州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舟山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金华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杭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杭州市园林文物局
宁波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宁波市保国寺文物保管所
宁波市天一阁文物保管所
温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绍兴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金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衢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椒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肖山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富阳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余抚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建德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临安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桐庐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淳安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桐乡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镇海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宁海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奉化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慈溪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象山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余姚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鄞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诸暨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上虞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新昌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嵊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舟山普陀山文物保管所
平阳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瑞安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文成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泰顺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黄岩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温峪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仙居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三门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玉环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天台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浦江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东阳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义乌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永康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常山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江山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兰溪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开化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武义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磐安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丽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龙泉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庆元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云和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遂昌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缙云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青田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青田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松阳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龙游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绍兴文化局文物处
永加县文化馆
乐清县文化馆

洞头县文化馆
苍南县文化馆
金华太平天国侍王府保管所

安 徽 省

安徽省文化厅文物局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安徽省博物馆
阜阳地区博物馆
六安地区博物馆
徽州地区博物馆
蚌埠市博物馆
安庆市博物馆
淮南市博物馆
淮北市博物馆
萧县博物馆
亳县博物馆
临泉县博物馆
寿县博物馆
金寨县博物馆
歙县博物馆
宣武地区文物管理所
宿县地区文物管理所
安庆地区文物管理所
巢湖地区文物管理所
滁县地区文物管理所
安庆市文物处
铜陵市文物管理组
合肥市文物组
阜阳市文物组
滁州市文物组
黄山市文物组
巢湖市文物管理所
屯溪市文物管理科
肥西县文物组
肥东县文物组
长丰县文物组
当涂县文物组
五河县文物组
固镇县文物组
怀远县文物组
芜湖县文物组
繁昌县文物组
青阳县文物组
南陵县文物组
九华山文物组
蒙城县文物组
阜南县文物组
太和县文物组
利辛县文物组
阜阳县文物组
颍上县文物组
涡阳县文物组
界首县文物组
六安县文物组
瞿邱县文物组
霍山县文物组
宣城县文物组
泾县文物组
金寨县文物管理所
无为县文物管理所
含山县文物管理所
和县文物管理所
郎溪县文物管理所
潜山县文物管理所

来安县文物组
嘉山县文物组
砀山县文物组
广德县文物组
宿县文物组
舒城县文物组
灵璧县文物组
泗县文物组
天长县文物组
全椒县文物组
黟县文物管理所
休宁县文物管理所
太平县文物管理所
凤阳县文物管理所
望江县文物管理所
岳西县文物管理所
桐城县文物管理所
贵池县文物管理所
宿松县文物管理所
枞阳县文物管理所
怀宁县文物管理所
太湖县文物管理所
东至县文物管理所

福 建 省

福建省文化厅文物博物馆处
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
福建省博物馆
泉州市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厦门市博物馆
邵武市博物馆
太宁县博物馆
武平县博物馆
惠安县博物馆
三明市（正顺庙）博物馆
古田会议纪念馆
福州林则徐纪念馆
厦门郑成功纪念馆
漳州市纪念馆
龙岩市纪念馆
南安县郑成功纪念馆
建宁县革命纪念馆
宁化县革命纪念馆
连城县新泉纪念馆
长汀县革命纪念馆
永定县革命纪念馆
上杭县革命纪念馆
才溪县革命纪念馆
晋江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龙岩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厦门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三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泉州市圣墓保管所
晋江县保管所

江 西 省

江西省文化厅文物处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
江西省博物馆
赣州地区博物馆

宜春地区博物馆
抚州地区博物馆
南昌市博物馆
景德镇市陶瓷历史博物馆
九江市博物馆
萍乡市博物馆
新余市博物馆
赣州市博物馆
吉安市博物馆
鹰潭市博物馆
宜春市博物馆
上饶市博物馆
抚州市博物馆
南昌县博物馆
修水县博物馆
九江县博物馆
大余县博物馆
安远县博物馆
宁都县博物馆
于都县博物馆
高安县博物馆
清江县博物馆
宜春县博物馆
上高县博物馆
广丰县博物馆
波阳县博物馆
婺源县博物馆
乐安县博物馆
广昌县博物馆
庐山县博物馆
德安县博物馆
瑞昌县博物馆
兴国县博物馆
会昌县博物馆
丰城县博物馆
奉新县博物馆
新干县博物馆
永丰县博物馆
泰和县博物馆
宜丰县博物馆
铅山县博物馆
余干县博物馆
上饶县博物馆
南城县博物馆
南丰县博物馆
乐平县历史文物陈列室
德安县历史文物陈列室
贵溪县文物陈列室
宜丰县文物陈列室
新干县历史文物陈列室
永丰县历史文物陈列室
万安县文物陈列室
临川县文物陈列室
玉山县陈列室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井岗山革命博物馆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
瑞金革命纪念馆
南昌“八大山人书画”纪念馆
修水“秋收起义”纪念馆
修水“黄庭坚”纪念馆
陶渊明纪念馆
赣鄂边游击战争纪念馆
上高县革命历史纪念馆
湘鄂赣纪念馆
吉安县革命纪念馆
吉安县第二次反围剿陈列室
“峡江会议”陈列室

遂川县革命纪念馆
永新县湘赣纪念馆
莲花“一支枪”纪念馆
宁岗县井岗山会议纪念馆
铜鼓“秋收起义”纪念馆
玉山县陈列室
吉安县“二七”纪念馆
上饶地区文物管理所
吉安地区文物管理所
景德镇市文物管理所
赣州市通天崖文物管理所
上饶市文物管理所
都昌县文物管理所
湖口石钟山文物管理所
星子县文物管理所
南城县文物管理所
庐山牯岭文物管理所
庐山日鹿洞书院文物管理所
吉安县文物办公室
安福县文物办公室

山　东　省

山东省文物事业管理局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室
山东省山旺古生物化石保管所
山东省博物馆
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
聊城地区博物馆
济南市博物馆
青岛市博物馆
淄博市博物馆
烟台市博物馆
潍坊市博物馆
临沂市博物馆
即墨县博物馆
掖县博物馆
莒县博物馆
胶南县博物馆
滕县博物馆
长岛县博物馆
益都县博物馆
诸城县博物馆
广饶县博物馆
临沂县博物馆
莒县博物馆
烟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潍坊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惠民地区文物所
德州地区文物室
临沂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荷泽地区文物展览馆
济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枣庄市文物管理站
济宁市文物管理处
泰安市文物局
历城县四门塔文物管理所
长清县灵岩寺文物管理所
蓬莱县蓬莱阁文物管理所
栖霞县文物管理所
嘉祥县文物管理所
曲阜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邹县文物管理所
莒南县文物管理所
长清县文物管理所
临沭县文物管理所
费县文物管理所

河　南　省

河南省文化厅文物局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河南省古建研究所
河南省博物馆
河南省石刻艺术馆
许昌地区博物馆
商丘地区博物馆
郑州市博物馆
开封市博物馆
洛阳市博物馆
洛阳市石刻艺术馆
安阳市博物馆
鹤壁市博物馆
新乡市博物馆
焦作市博物馆
南阳市博物馆
周口市博物馆
豫西博物馆
浚县博物馆
淅川县博物馆
武陟县博物馆
沁阳县博物馆
临汝县博物馆
洛阳市关林古代艺术馆
汤阴县岳飞纪念馆
新乡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商丘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洛阳地区文物队
许昌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周口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南阳地区文物工作队
信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驻马店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南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开封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安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新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三门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焦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信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洛阳市龙门保管所
洛阳市白马寺文物保管所
开封市相国寺管理所
信阳地区文物工作队
新郑县文物管理所
登封县文物管理所
巩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偃师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安阳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汤阴县文物管理所
淇县文物管理所
汲县文物管理所
沁阳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济源县文物管理所
温县慈胜寺保管所
辉县百泉文物保管所
永城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灵宝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临汝县风穴寺文物保管所
禹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淮阳县文物管理所

浙川县文物管理所
光山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新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淮滨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商城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罗山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息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信阳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潢川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固始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巩县文物管理所
新乡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封丘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延津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原阳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孟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鸡公山文物管理所
郑州市二七塔管理处
武陟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柘城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宁城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睢城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民权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商丘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于城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夏邑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宜阳县灵山文物保管所
郾城县文物保管所
鄢陵县文物管理所
确山县文物管理所
浙川县香严寺文物管理所
安阳市古建研究所

湖 北 省

湖北省文化厅文物处
湖北省博物馆
黄岗地区博物馆
孝感地区博物馆
咸宁地区博物馆
荆州地区博物馆
襄阳地区博物馆
郧阳地区博物馆
宜昌地区博物馆
鄂西自治州博物馆
黄石市博物馆
沙市博物馆
鄂州市博物馆
襄樊市博物馆
丹江口市博物馆
荆门市博物馆
随州市博物馆
鄂州自治州博物馆
铜绿山博物馆
孝感博物馆
安陆博物馆
咸丰博物馆
宜城县博物馆
黄梅县博物馆
红安县博物馆
沔阳县博物馆
天门县博物馆
潜江县博物馆
监利县博物馆
晋阳县博物馆
郧县博物馆
通山县博物馆

浠水县博物馆
广济县博物馆
大悟县博物馆
阳新县博物馆
大冶县博物馆
麻城县博物馆
江安县博物馆
鄂城县博物馆
洪湖县博物馆
钟祥县博物馆
京山县博物馆
云梦县博物馆
鹤峰县博物馆
武昌起义门纪念馆
辛亥革命纪念馆
盘龙城遗址陈列室
纪南城遗址陈列室
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陈列室
“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
“八七”会址纪念馆
“二七”工会纪念馆
董必武纪念馆
李时珍纪念馆
陈潭秋纪念馆
周老嘴革命历史纪念馆
兴山县昭君纪念馆
秭归县屈原纪念馆
龙港纪念馆
洪湖革命纪念馆
武汉市文物管理处
襄樊市文物管理处
襄樊市隆中文物管理处
宜昌市文物管理处
沙市文物管理处
黄岗县文物管理所
圻春县李时珍墓保管所
黄梅县五祖寺文物管理所
罗田县文物保管所
通山县李自成墓保管所
当阳县关陵文物管理所
宜昌县黄陵庙文物管理所
蒲圻县赤壁文物管理处
襄阳县文物管理所
随县文物管理所
宜城县文物管理所
枣阳县文物管理所
谷城县文物管理所
均县武当山文物管理所
当阳县玉泉寺文物管理所
宜昌市三游洞保管所
襄阳县鹿门寺保管所
襄阳县多宝佛塔保管所
应城县楚皇城保管所
南漳县水晶床保管所
谷城县承恩寺保管所
谷城县文物保管组
随州市擂鼓墩管理处
郧阳县武当山文物管理处
恩施县文物管理处
江陵县文物局
兴山县文物管理所
黄梅县文物管理所
红安县七里坪文物管理所
江陵县文物工作组
天门县文物工作组

湖 南 省

湖南省文化厅文物处
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湖南省博物馆
湘西自治州博物馆
岳阳地区博物馆
衡阳市博物馆
湘乡县博物馆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
中共湘区委员会纪念馆
衡阳市湖南学联纪念馆
雷锋纪念馆
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
浏阳县谭嗣同纪念馆
宁乡县刘少奇纪念馆
茶陵县纪念馆
醴陵纪念馆
郧县纪念馆
衡山县纪念馆
耒阳县蔡伦纪念馆
汨罗县屈原纪念馆
桂东县纪念馆
毛泽东同志青年时代革命活动陈列室
自修大学陈列馆
杨开慧旧居陈列馆
李立三故居管理所
彭德怀故居管理所
欧阳海纪念塔保管所
向警予故居管理所
任弼时故居管理所
岳阳地区文物工作队
常德地区文物工作队
益阳地区文物工作队
零陵地区文物工作队
邵阳地区文物工作队
郴州地区文物工作队
怀化地区文物工作队
娄府地区文物工作队
湘西自治州文物工作队
株州市文物工作队
岳阳市文物管理所
长沙市文物工作队
衡阳市文物工作队
湘潭市文物工作队
平江县文物保管所
桃花源文物保管所
南岳文物保管所
宁乡县文物保管所
永顺县文物保管所
桑植县文物保管所
汨罗县文物保管所
岳阳楼文物保管所
祁阳县浯溪文物保管所
永州市文物保管所
沣县文物保管所
沅陵县文物保管所
黔阳县芙蓉楼文物保管所

广 东 省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中山大学古文字学研究室

广东省博物馆
湛江地区博物馆
海南自治州博物馆
广州市博物馆
深圳市博物馆
佛山市祖庙博物馆
汕头市博物馆
潮州市博物馆
肇庆市博物馆
海口市博物馆（包括五公祠）
惠州市博物馆
梅县市博物馆
陵水县苏维埃旧址纪念馆
惠阳叶挺纪念馆
海丰县红宫红场纪念馆
东莞县虎门抗英纪念馆
鹤山县李铁夫画图纪念馆
惠阳地区文物室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汕头市文物管理站
陆丰县文物管理所
台山县文物室
博罗县文物所
潮州市韩文公祠文管所
韶关市博物馆
佛山市博物馆
中山市博物馆
茂名市博物馆
湛江市博物馆
清远县博物馆
顺德县博物馆
南海县博物馆
新会县博物馆
阳春县博物馆

揭阳县博物馆
普宁县博物馆
潮阳县博物馆
汀海县博物馆
揭西县博物馆
饶平县博物馆
惠来县博物馆
海康县博物馆
信宜县博物馆
广宁县博物馆
封开县博物馆
河源县博物馆
紫金县博物馆
东莞县博物馆
龙川县博物馆
丰顺县博物馆
大埔县博物馆
平远县博物馆
曲江县博物馆
英德县博物馆
南雄县博物馆
始兴县博物馆
和平县博物馆
开平县博物馆
澄海县博物馆
兴宁县博物馆
五华县博物馆
蕉岺县博物馆
电白县博物馆
高川县博物馆
罗定县博物馆
德庆县博物馆
连县博物馆
乐昌县博物馆

翁源县博物馆
阳山县博物馆
博罗县博物馆
惠东县博物馆
连平县博物馆
恩平县博物馆
廉江县博物馆
徐闻县博物馆
遂溪县博物馆
临高县博物馆
定安县博物馆
海南自治州黎族苗族民族博物馆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
广东民间工艺馆
广东美术馆
开平县华侨博物馆
南沃县边防史博物馆
鲁迅纪念馆
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
广州农讲所旧址纪念馆
黄埔军校纪念馆
广州起义旧址纪念馆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纪念馆
三·二九黄花岗起义指挥部旧址纪念馆
越南青训班旧址纪念馆
中山市中山故居纪念馆
肇庆市叶挺独立团旧址纪念馆
江门市陈白沙纪念馆
潮州市韩愈纪念馆
中共广东区委旧址纪念馆
洪秀全故居纪念馆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柳州市博物馆
桂林市博物馆
梧州市博物馆
凭祥市博物馆
钦州市博物馆
合浦县博物馆
那坡县博物馆
钦州县博物馆
防城县博物馆
浦北县博物馆
桂平县博物馆
融水县博物馆
灵山县博物馆
平果县博物馆
乐业县博物馆
靖西县博物馆
百色右江革命文物馆
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
甑皮岩陈列室
龙州红八军纪念馆
都安县文物馆
东兰县革命纪念馆
田东右江革命纪念馆
南宁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河池市文物管理所
玉林市文物管理所
南丹县文物管理所
河池县文物管理所
宜山县文物管理所
都安县文物管理所

三江民族自治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龙胜县文物管理所
恭城县文物管理所
永福县文物管理所
灌阳县文物管理所
兴安县文物管理所
平乐县文物管理所
藤县文物管理所
贺县文物管理所
钟山县文物管理所
富川县文物管理所
蒙山县文物管理所
昭平县文物管理所
平南县文物管理所
容县文物管理所
北流县文物管理所
博白县文物管理所
玉林县文物管理所
贵县文物管理所
陆川县文物管理所
上思县文物管理所
凌云县文物管理所
西林县文物管理所
靖西县文物管理所
灵山县文物管理所
阳朔县文物管理所
龙州县文物管理所
三江县民族文物委员会
来宾县文物管理所
鹿寨县文物管理所
金秀县文物管理所
象州县文物管理所
武宣县文物管理所
融安县文物管理所
北流县文物管理所
藤县文物管理所
仓州县文物管理所
横县文物管理所
德保县文物管理所
柳城县文物管理所
柳江县文物管理所
宁明县文物管理所

四　川　省

四川省文化厅文物处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四川省博物馆
宜宾博物馆
凉山州博物馆
甘孜州博物馆
重庆市博物馆
成都市博物馆
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
阿坝州文物管理所
雅安地区文物管理所
峨眉山文物管理所
成都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成都市文物管理处
成都市王建墓文物管理所
成都市武侯祠文物管理所
渡口市文物管理所
泸州市文物管理所
宜宾市文物管理所
绵阳市文物管理所
雅安市文物管理所
郭沫若旧居文物管理所

泸定桥文物管理所
成都市青白江文物管理所
成都市彭家珍祠文物管理所
成都市金牛区文物管理所
剑阁县文物管理所
射洪县文物管理所
江油县文物管理所
陈毅旧居文物管理所
白帝城文物管理所
屏山县文物管理所
大足县文物管理所
潼南县文物管理所
合川县文物管理所
新都县文物管理所
新津县文物管理所
邛崃县文物管理所
灌县文物管理所
灌县青城山文物管理所
荣县文物管理所
富顺县文物管理所
德阳县文物管理所
酉阳自治县文物管理所
忠县文物管理所
云阳县文物管理所
奉节县文物管理所
安岳县文物管理所
资中县文物管理所
夹江县文物管理所
仁寿县文物管理所
彭山县文物管理所
青神县文物管理所
梓潼县文物管理所
广元县文物管理所
江油县窦圌山文物管理所
平武县文物管理所
遂宁县文物管理所
射洪县金华山文物管理所
仪陇县文物管理所
达县文物管理所
通江县文物管理所
巴中县文物管理所
渠县文物管理所
芦山县文物管理所
会理县文物管理所
德格县文物管理所
泸定县文物管理所

贵州省

贵州省文化出版厅文物处
贵州省博物馆
遵义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遵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遵义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贵阳市文物管理所委员会
镇远县文物管理所
修文县文物管理所
安龙县文物管理所
桐梓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云南省

云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云南省博物馆
保山地区保山市博物馆
昭通市博物馆

昭通地区丽江县博物馆
昆明市晋宁县郑和纪念馆
昆明市嵩明县兰茂纪念馆
昭通地区威信县扎西纪念馆
曲靖地区寻甸县柯渡纪念馆
思茅地区孟连县宣抚司纪念馆
保山地区腾冲县艾思奇纪念馆
昭通地区文物管理所
曲靖地区文物管理所
保山地区文物管理所
临沧地区文物管理所
丽江地区文物管理所
思茅地区文物管理所
大理自治州文物管理所
西双版纳自治州文物管理所
红河自治州文物管理所
楚雄自治州文物管理所
文山自治州文物管理所
德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
怒江自治州文物管理所
东川市文物管理所
昆明市文物管理所
大理市文物管理所
禄劝县皎平渡文物管理所
剑川县石钟山石窟文物管理所
丽江县石鼓度文物管理所

西藏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文化局社文处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山南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萨迦寺文物管理委员会
扎什伦布寺文物管理委员会

陕西省

陕西省文物局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陕西省博物馆
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安康地区博物馆
西安半坡博物馆
秦俑博物馆
宝鸡市博物馆
铜川市博物馆
耀州窑博物馆
汉中市博物馆
咸阳市博物馆
宝鸡县博物馆
岐山县博物馆
旬阳县博物馆
洛南县博物馆
韩城县博物馆
耀县博物馆
扶风县博物馆
绥德县博物馆
商县博物馆
临潼县博物馆
咸阳市乾县博物馆
咸阳市唐家博物馆
乾陵博物馆
昭陵博物馆
茂陵博物馆

咸阳市秦都区博物馆
咸阳市白良村博物馆
延安市革命纪念馆
西安市八路军纪念馆
长安县马厂罪证馆
洋县阶级教育馆
咸阳孟店阶级教育馆
眉县扶眉烈士纪念馆
长安县杜甫纪念馆
毛主席在王家湾旧居
洛川会议旧址纪念馆
毛主席在堡安革命旧址纪念馆
延长毛主席旧居纪念馆
子长县瓦窑堡遗址
旬阳县红军纪念馆
米脂县杨家沟纪念馆
蒲城县杨虎城纪念馆
临潼华清池管理处
延安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榆林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咸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渭南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汉中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安康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商洛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西安市古建筑设计研究处
西安市大雁塔保管所
西安市小雁塔保管所
西安市钟鼓楼保管所
西安市青龙寺保管所
西安市大明宫保管所
西安市沣镐遗址保管所
西安市城墙管理所
铜川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铜川市玉华文物管理委员会
宝鸡市文物考古队
宝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周原扶风文物管理所
周原岐山文物管理所
咸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延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延安市清凉山文物管理所
延安市宝塔山管理所
延安市万花山管理所
渭南市文物管理所
韩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周至县八云台文物管理所
户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户县重阳宫文物管理所
蓝田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蓝田猿人遗址管理所
蓝田水陆庵文物管理所
临潼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凤翔雍城文物管理委员会
扶风县法门文物管理所
岐山县周公庙文物管理所
岐山县五丈原文物管理所
咸阳市顺陵文物管理所
三原县城隍庙文物管理所
彬县大佛寺文物管理所
长武县昭仁寺文物管理所
高陵县文物管理办公室
兴平县杨贵妃墓文物管理所
泾阳县安吴文物管理所
泾阳县重文塔文物管理所
泾阳文庙文物管理所
兴平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礼泉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志丹县文物管理所
子长县文物管理所
甘泉县文物管理所
富县文物管理所
黄陵县文物管理所
榆林县文物管理所
佳县白云山文物管理所
神木县二郎山文物管理所
靖边县统万城文物管理所
耀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米脂县文物管理所
耀县药王山文物管理所
华县高塘文物管理所
华阳县西岳庙文物管理所
华山玉泉院文物管理所
韩城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蒲城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蒲城县桥陵文物管理委员会
蒲城县泰陵文物管理所
白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澄城县文物管理所
富平县文物管理所
白水县苍颉庙文物管理所
城固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城固县张骞墓文物管理所
洋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南郑县圣水寺文物管理所
勉县武侯墓文物管理所
勉县武侯祠文物管理所
西乡县午子观文物管理所
略阳县灵岩寺文物管理所
留坝县张良墓文物管理所
南郑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汉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山阳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丹凤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临潼县骊山文物管理所
临潼县扁鹊墓文物管理所
周至县楼观台文物管理所
周至县仙游寺保护所
秦都区顺陵文物管理所
秦都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秦都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武功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泾阳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礼泉县建陵文物管理所
彬县彬塔文物管理所
宜君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延川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安塞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长安县文物管理处
高平县文物管理所
米脂县李自成文物管理所
府谷县文物管理所
定边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吴堡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清涧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靖边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靖边县长城文物管理所
华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商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商县龙山文物管理所
商县北宽坪文物管理所
洛南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商南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智果寺文物管理所
蔡伦墓文物管理所

龙岗寺文物管理所
西乡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榆林县城墙文物管理所
榆林县红石峡文物管理所
张良庙文物管理所
志丹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吴旗县文物管理所
富县文物管理所
黄龙县文物管理所

甘 肃 省

甘肃省文化厅文物处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
甘肃省博物馆
武威地区博物馆
天水地区博物馆
平凉地区博物馆
庆阳地区博物馆
临夏自治州博物馆
嘉裕关市博物馆
兰州市博物馆
平凉市博物馆
敦煌县博物馆
酒泉县博物馆
武威县博物馆
庆阳县博物馆
泾川县博物馆
宁县博物馆
兰州市文物管理处
嘉裕关市文物管理所
武威县文物管理所
甘谷县大象山文物管理所
天水县仙人崖文物管理所
天水县石门文物管理所

青 海 省

青海省文化厅文物处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
青海省文物考古队
青海省博物馆
湟源县博物馆
玉树自治州文成公主庙
海州市文物组
西宁市文物工作站
湟中县文物管理所
乐都县文物管理所
民和县文物组
化隆县文物组
乐都县曲坛寺文物管理所
乐都县西来寺文物管理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
固原县博物馆
银川市文物管理所
中卫县文物管理所
同心县文物管理所
固原县文物站
固原县须弥山文物管理所

彭阳县文物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博尔塔拉自治州博物馆
吐鲁番行署文物保管所
喀什市行署文物保管所
哈密市行署文物保管所
阿克苏市行署文物保管所
和田县行署文物保管所
伊黎自治州文物保管所
巴音郭楞自治州文物保管所
博尔塔拉自治州文物保管所
阿勒泰地区文物管理所
塔城地区文物管理所
乌鲁木齐市文物保管所
库车县文物保管所
拜城县文物保管所
霍城县文物保管所
昭苏县文物保管所
焉耆县文物保管所
吉木萨县文物保管所
奇台县文物保管所
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

《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勘误

1．129页倒数第六行“二里头工作队”应为“汉魏洛阳城队、河南二队”。

2．131页第十三行“铜镜”应为“铜铙”。

3．196页辽宁省博物馆名誉馆长应为杨仁恺，馆长应为姜念思。

4．218页陕西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孟顺发应为孟顺庆

5．222页甘肃省博物馆副馆长薛俊义应为薛俊彦。

6、234页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副主任应为曾骐。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文博机构简介）

地址：拉萨市西郊罗布林卡内
电话：22829
主任：甲央（藏）
副主任：仁增多吉（藏）、侯石柱、索朗旺堆（藏）、甲措（藏）

1960年，西藏成立文物组，根据当时中共西藏工委“集中起来保管好”的指示，将散失在全区各地的文物集中到拉萨保管。1965年，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下设业务科、博物馆科、编译科、文物商店、布达拉宫文物保管所等八个科室。1985年3月召开的全区第二次文物工作会议将西藏文物工作的方针调整为“积极保护，充分利用”。现文管会负责全区的文物保护、考古发掘、文物研究和展览等工作。文管会现有藏品三万余件，其中一级品七百余件；西藏已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十一处，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十二处。1978、1979年，与四川大学历史系合作，两次对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科学发掘，取得重大成果。1984年，又成立了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对山南、拉萨进行了文物普查，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两处，列山等吐蕃时期墓地二十余处近二千座墓葬，以及一批古建筑。二十多年来，先后举办了《西藏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工艺》、《劳动创造了人》、《西藏历史文物》、《西藏唐卡》等展览；出版了《昌都卡若》考古发掘报告和《西藏唐卡》、《布达拉宫》、《萨迦寺》等图录画册，以及藏文版《西藏宗教源流》、《吐蕃年鉴》；编译整理了藏文典籍六十万字，并正在编写山南、拉萨的《文物志》。

（程竹敏）

文物工作展览 学术会议

文物工作

全国文物工作会议

4月30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联合召开的全国文物工作会议在北京正式开幕。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主持大会，中宣部顾问廖井丹到会并讲了话。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宣传、文化（文物）部门负责同志，文物、考古、博物馆、文物商店、历史、古建筑以及公安、海关、工商、宗教、旅游、园林、城建等方面的代表二百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专题讨论了如何加强文物保护工作和博物馆事业建设的问题，研究确定了当前文物、博物馆工作的方针任务。会议提出当前加强博物馆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对现有博物馆进行整顿、改革充实和提高。要建立发展具有特色的纪念馆、专业馆和露天博物馆。会议强调了当前做好文物保护工作的关键是坚决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对于某些地方和单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导致文物的破坏必须依法追究，决不允许有任何部门和个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会议着重指出了做好文物保护工作的另一个关键，是各级党政领导同志要重视文物工作，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强对文物、博物馆工作的领导，带头执行《文物保护法》，支持文物工作，体谅文物考古工作者的艰辛，担负起领导文物博物馆工作的重任。同时要求凡涉及文物保护工作的重大问题时，切不可草率做出决定，要多听取和尊重文物工作专家、学者的意见。也就是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责任在身，当仁不让；据理力争，谨慎从事。"会议代表还就文物保护、管理研究工作以及文物与宗教、旅游、园林、城建等方面的关系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议充分肯定了近几年来广大文物、考古、博物馆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绩，指出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会议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王震、邓力群、胡

谷城、刘澜涛在中南海接见会议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邓力群同志做了重要讲话。会议五月七日圆满结束。（杨琳）

考古发掘工作汇报会议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文物保护法》关于考古发掘工作的各项规定，文化部文物局于1984年3月5日至14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了“考古发掘工作汇报会”，来自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考古工作者和有关的科研、高等教育部门的七十多位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夏鼐、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苏秉琦及文化部文物局顾问谢辰生等同志参加了会议，并分别在会议上讲了话。

会议听取了文化部1983年度批准的三百多项考古发掘项目的情况汇报。该年的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哈尔滨阎家岗旧石器地点，辽宁建平牛河梁红山文化大型陶塑女神像、河南偃师商城、广州象岗南越王墓等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均具有重大的科研意义。

与会代表在交流经验的同时，讨论了当前考古发掘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省、市、自治区文物考古专业机构工作条例》（征求意见稿）、《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草稿）提出了修改意见。会议认为：考古发掘工作必须不折不扣的履行报批手续，及时报告工作情况。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考古发掘工作要以配合基本建设为主，确保对国家重点项目的配合工作。会议特别强调为提高田野工作水平，要严格遵循工作规程，并逐步建立相应的检查、奖惩和培训考核制度。（王军）

文化部文物局举办十二期干部训练班 为了提高文博考古干部的业务水平，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从1980年起，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在成都、扬州、板仓、咸阳、郑州、泰安六个地方成立培训中心，短期培训干部。培训干部以理论结合实践为教学方针，课程主要由所在省的有一定理论修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文物考古干部担任，部分延请北京的专家讲授。1984年又委托一些高等学校创办学制两年的专修科，培养干部。

1984年，各培训中心举办了如下训练班：

成都培训中心：文物普查与征集保管训练班，六十九人；地（州、市）县有关领导干部学习班，四十五人；书画鉴定与管理训练班，七十四人。

扬州培训中心：文物摄影提高班，四十八人；陶瓷鉴定培训班，五十一人。

板仓培训中心：博物馆学训练班，六十三人。

郑州培训中心：考古学训练班，两期共九十九人。

泰安培训中心：博物馆学训练班，四十七人；古代石刻专业训练班，五十人。

咸阳培训中心：文博行政领导干部（馆长、所长）训练班，四十三人。

已审阅
子居 10-03-13，13:26

1984年干部专修科；上海复旦大学文博专修科，五十四人；天津南开大学博物馆学专修科，四十二人。

此外，还在山东兖州开办了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来自全国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二十人参加了培训。（张栖）

国内展览

全国出土文物珍品展览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由文化部文物局、故宫博物院共同举办全国出土文物珍品展览。展品为从1976至1984年（除台湾省外）来自全国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考古发掘的数十万件文物中遴选出来的八百二十件。

展出的河北磁山、甘肃秦安、浙江余姚河姆渡等出土文物，填补了我国新石器时代较早的历史空白。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和大批玉器、成组陶塑像是一次重要发现。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发掘的首批文物，是我国边远考古的一大收获。陕西扶风出土的墙盘，铭文长达二百八十四字，是一件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的重器。河南淅川春秋楚公子午墓出土的铜禁，是目前发现失蜡法最早的铸件。湖北江陵吴王夫差矛，是继越王勾践剑之后又一重要发现；相继出土的年代早、数量多，保存完好的马山一号墓的丝织品，堪称罕见的"地下丝绸宝库"。浙江绍兴铜质的房屋模型，屋内有六个铜质的舞乐人像。铜屋模型对建筑史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江苏盱眙出土金兽盖铜壶，壶内藏金版和金饼重近万克，是至今发现金器最多的一次。广州南越王墓的发掘，是继中山靖王刘胜墓之后又一重大发现，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山东临淄西汉墓内发掘的重达56.5公斤的连弧夔龙纹长方铜镜，是我国罕见珍品。宁夏固原李贤夫妇墓随葬的波斯萨珊王朝鎏金铜瓶，瓶腹饰浮雕式人物，神态逼真，造型优美，证明我国在北周时期与波斯的友好往来。近年江西高安窖藏出土大批元代瓷器，数量之多，造型丰富、精美，釉色莹润，是不可多得的瑰宝。（方国锦）

全国拣选文物展览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宣传拣选文物工作的重大成果，进一步推动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1984年8月10日至12月23日文化部文物局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联合举办了全国拣选文物展览。展品一千一百八十件，来自全国二十五个省市四百多个单位，其中重要的古代文物有：二里头时期的商代素爵，西周班簋、伯㺇簋，春秋战国的宋公差戈、郾王喜戈、吴王夫差剑，秦汉时期平都犁斛、常山宫鍾，以及宋代李纲锏，辽代烧酒锅，明代郑和钟等。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举行这种专题的全国规模的展览。共接待观众达十万人次。（刘东瑞）

陕西省博物馆调整充实珍贵文物展览 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陕西省博物馆对1982年6

月举办的珍贵文物展览调整充实后，于1984年10月1日重新开放。计展出二百七十三件珍品，其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新从全省各地汇集而来的。展览按青铜礼器、古兵器、石刻造像、瓷器和金银玉器等分类陈列在五个展间里。

这次珍贵文物展览是建国三十五年来陕西省文物考古工作成就的一次大检阅。展品中如商代汉水流域巴人的铜面具和虎纹钺，罕见的西周锯齿状"我"和五孔大刀，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长铍、佩剑和大型箭镞，西汉银嵌刻度望山弩机，神态姿式各异，栩栩如生的隋唐宋佛教石刻造像，琳琅满目、具有浓厚民间色彩的精美瓷器，汉武帝茂陵的大型青玉雕四神纹铺首，唐代晶莹的金塞兽首玛瑙杯、璀璨夺目的赤金莲瓣碗、构造精巧的镂雕银熏球，玲珑纤小的赤金走龙和刻有八幅画面的八棱金杯和八瓣鎏金银杯，宋代航海纹葵花形铜镜，明代犀角雕龙女及饶有趣味的民间工艺品"铜牛喝水"等文物，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西兴）

首都博物馆馆藏珍贵文物展览

为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首都博物馆于1985年10月1日—11月30日举办了馆藏珍贵文物展览。展览共分五个部分：金属工艺、陶瓷工艺、玉石雕刻工艺、织绣工艺、法书绘画。展品中不少都是首次公开展出的稀世珍品。除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堇鼎、伯矩鬲等青铜礼器外，还展出了良渚文化鸟纹青玉琮、永乐甜白小壶，宣德洒蓝大碗及西晋带乳钉纹玻璃钵等。丝织部分展出的元代刺绣礼佛图、缂丝蟒袍，不仅图案富丽，而且色彩典雅，针法细密，显示了我国丝织工艺的高超水平。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宋刻王献之书《洛神赋》十三行青玉版。这块玉版原藏于西湖岸边贾似道半闲堂中，宋亡时散失，明万历年间发现，清初传入宫廷，陈列于圆明园中，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再次散失，解放后才重见天日。另外，还有元代著名书法家鲜于枢行草《韩愈进学解》大字长卷等珍贵文物。（齐心）

天津市建国以来考古成果展览

为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天津市历史博物馆举办了天津市建国以来考古成果汇报展览。展览分十个部分：

一、沧桑多变的土地。介绍全新世海侵时的天津平原及其成陆过程。

二、最早的天津人。介绍天津地区发现的红山文化和龙山文化。

三、两种不同系统的商周时期文化。介绍燕山地区土著文化和周封召公后出现的姬燕文化在天津地区的融合消长过程。

四、天津平原的早期开发。介绍战国时期天津平原出现的迅速开发及其原因，以及燕齐赵角逐在平原上留下的风貌各异的文物。

五、西汉时期的县治遗迹。介绍渤海湾西岸的第一批县城及其出土文物。

六、影响深远的汉代海侵。介绍汉代海侵的遗迹及其影响，以及海侵后天津平原上出现的经济文化特点。

七、侈靡的东汉豪强地主。介绍天津平原周围发现的几处东汉大墓。

八、渔阳鼙鼓声中的天津。重点介绍"三会海口"军粮城和蓟州渔阳

的出土文物。

九、宋辽对峙，风物异趣。介绍宋地塘泺防线上出土的宋代木船，辽地独乐寺、白塔等寺塔建筑及其相关文物。

十、从砦铺到城市。以金—清各个时期的文物，反映从金朝直沽寨、元朝海津镇、明朝天津卫，直到清代天津成为国际性商埠的历史过程。

展览共展出文物六百六十一件。其中汉代书法瑰宝武清鲜于璜墓碑，以及汉代地主庄园缩影静海东滩头1号墓、满目琳琅的蓟县别山汉墓和独乐寺白塔文物，博得观众的赞叹。（韩嘉谷）

广东出土先秦文物展览 1984年9月21日至11月4日，由广东省博物馆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联合举办的广东出土先秦文物展览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展出。展品共一百件（组），丰富多采，以青铜器和陶器居多，也有石器、玉器、骨器和原始青瓷器，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研究价值，较全面地反映了广东地区自一万年前至秦统一之前的历史文化面貌。

香港总督尤德爵士夫人为展览的开幕式剪彩，香港中文大学马临校长和广东省文化厅徐恒彬副厅长在展览的开幕式上先后致词。

展览受到各界专家、学者和香港爱国同胞的热烈欢迎，参观人数超过该馆以往举办的任何一次展览。

配合展览还出版了精美的《广东出土先秦文物》专刊图录，举办了关于广东先秦史方面的学术讨论会。（古运泉）

广东省文物普查汇报展览 1984年10月1日—31日，广东省文管会和广东省博物馆联合举办广东省文物普查汇报展览。展出历史文物七百五十四件、近现代文物九十二件、华侨文物十五件、少数民族文物十七件。

展品中有许多文物是广东考古的新发现和新征集到的珍贵文物。例如，佛岗县出土的一件西周青铜甬钟，重15余公斤，是广东发现最早的一件青铜乐器；博罗县出土的七件一组春秋时期铜编钟，兴宁六件一组的战国时期铜编钟也均很难得。展品中还有广州沙河东汉墓中首次发现的反映东汉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饲养大牲畜的陶牛圈模型；电白县发现的广东历史名人冼夫人第六代孙墓所出的唐代瑞兽钮方形铜镜，以及海康、徐闻等地宋元墓葬出土的一批珍贵瓷器。（朱非素）

秦代兵马俑全国巡回展览 由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和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筹办的秦代兵马俑全国巡回展览，自1983年9月24日在黑龙江省博物馆正式展出后，至1984年10月25日又在吉林、辽宁、天津、河北、山西等六省市巡回展出，接待观众七十余万人次。展出的文物有：战车一组（四马、战车和三个武士俑），骑兵一组（骑兵一个、鞍马一匹），将军俑、跪射俑、战袍俑、铠甲俑以及剑、戈、矛、铍、镞等青铜兵器，另有一套大型照片。（张建中）

东晋王氏家族墓随葬文物陈列 1984年南京市博物馆举办的东晋王氏家族墓随葬文物陈列在盐城、徐州等

苏北城市展出。展览以曾经赴日展出的象山七号王氏大墓精华文物为基础，再选择象山其它王氏墓葬出土的一些典型文物，诸如王闽之墓志、铜镜、鸡头壶，王丹虎墓丹丸、玛瑙珠、铁剪等，不计丹丸共七十八件珍贵文物。这是建国以来，南方六朝文物以专题展览的形式第一次在江北展出。（南京市博物馆陈列部）

车轱山出土新石器时代文物专题陈列在岳阳展出 为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岳阳地区博物馆主办的车轱山出土新石器时代文物专题陈列于1984年10月1日在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地区博物馆展出。

车轱山遗址位于湘北华容县境内，1982年冬，1983年冬，湖南省博物馆和岳阳地区文物工作队在此做了两次发掘，清理墓葬三百多座，获得一大批距今6000—4000年前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以及“龙山”期文化的遗物。专题陈列展出的是第一次发掘出土的文物，共二百余件，有各类石、陶、玉制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及装饰品，分别表明了车轱山遗址发现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龙山”期文化的主要特征。此外还辅以照片、图片、复制品等，再现了车轱山原始居民种植水稻、鱼猎、纺织的生产情况和他们的居住建筑形式。配合展览还放映了实地拍摄的车轱山发掘现场、氏族墓地、房屋建筑、窖藏稻米、文物珍品的幻灯片。(郭胜斌)

中国古代妇女服饰资料展览

1984年3月15日至5月5日，中国历史博物馆在端门内东朝房举办了中国古代妇女服饰资料展览。展览以郭沫若同志关于中国古代服饰的题词开始，分战国、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六个部分。展览面积640平方米，展线长160米。展品有壁画摹本、古画原件及摹本、拓片、木俑、陶俑、石俑、画象砖、彩塑、影像、清代服饰原件等，共展出展品一百二十件，其中原件四十一件，其余为复制品或摹本。

展览以考古材料为主，结合一部分传世绘画与实物，展现了中国历代妇女服饰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演变情况，引起国内外观众的广泛兴趣。除一般观众外，还有学者、专家、电影、电视、戏剧工作者、舞蹈家、美术家、服装设计家以及艺术院校学生等专业人员前来参观或现场上课。共接待观众六万人次。

此后，中国古代妇女服饰展览于1984年7月13日至8月17日又在青岛市博物馆展出，共接待国内外观众一万二千人次。

国外展览

中国秦代兵马俑在日本巡回展出

1983年10月1日至1984年5月12日，为了纪念日本国大阪城建城四百周年，增进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中国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陕西省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中国对外文物展览公司联合主办

的中国秦代兵马俑展应日本大阪二十一世纪协会、读卖新闻社等单位的邀请，在日本的大阪、福冈、东京、静冈四城市展出。

展出文物三十六件，其中有：跪射俑、立射俑、御手俑、武官俑、战袍俑、铠甲俑、骑兵俑、车马、鞍马、战车模型及剑、弓弩、镞等青铜兵器；还有秦始皇帝陵园出土的跽坐俑、花纹砖、瓦当、砖、半两钱、陶罐、五角水道管、空心龙纹砖、虎符等。接待观众达二百万人次。（王志龙）

紫禁城珍藏的清代乐器在美国展出　1984年5至11月，紫禁城珍藏的清代乐器——中和韶乐在美国路易斯安娜的新奥尔良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上展出。这套乐器共五十件，是清代皇室举行庆典活动的仪仗。同时参加展览的有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亚、日本、埃及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古代文物的展出，使中国馆成为世界博览会内最具特色和吸引力的展馆，受到美国南部人民和华侨的热烈欢迎。（外）

云南博物馆藏青铜器在日本展出　1984年8月1日至10月17日，应日本泛亚细亚文化交流中心的邀请，云南省博物馆和中国对外文物展览公司主办的中国云南省博物馆青铜器展览在东京、名古屋展出。展品一百三十件。其中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地出土的铜鼓、铜贮贝器等铜器九十五件。中国驻日使馆文化参赞蔡子民及展览代表团七人和日本各界知名人士一百四十余人出席了开幕式。

配合展览，展览代表团的孙太初、胡振东、高宗裕、阚勇四人在东京古代东方博物馆分别作了题为《滇文化的衰落与梁堆文化的兴起》、《云南型铜鼓的传播与濮人的变迁》、《云南的社会化石——云南民族学与考古学的关系》、《云南新石器文化概论》和《滇西青铜文化综论》的学术演讲。日本考古学会会长、古代东方博物馆馆长江上波夫教授、梅光女学院大学国分直一教授、西南学院大学下条信行助教授和上智大学量博满教授也分别作了题为《东洋考古学与石寨山文化的关系》、《弥生时代的蛇灵、鸟灵信仰》、《稻作农耕的传来与弥生时代的开化》和《考古学文化与云南》的学术演讲。（阚勇）

中国古代文明展览在南斯拉夫展出　1984年9月2日至1985年1月6日，应南斯拉夫克罗地亚共和国的邀请，中国历史博物馆主办的中国古代文明展览在萨格布市展出。展览展出从新石器时代到唐代的展品一百六十件，其中有商代"妇好墓"的青铜器、玉器以及秦代的兵马俑，汉代的金缕玉衣等珍贵文物。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为展览题词，李先念主席和南克罗地亚共盟中央主席团主席米卡·什比里亚克出席了开幕式。展出期间，南联邦主席团主席久拉诺维奇等许多南中央和各共和国的高级领导人参观了展览。观众达四十五万人次。

中国历代陶俑在日本展出　1984年9月22日至1985年5月6日，应日本朝日新闻社、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要求，中国历代陶俑展览在日本的名古

屋、福冈、京都、东京四个城市巡回展出。该览展出陕西、山西、河南、四川四个省十三个博物馆收藏的从新石器时代到元代的中国历代陶俑一百五十四件（套）。这是迄今为止第一次在国外举办这样系统的专题性的陶俑展览。9月21日在名古屋市博物馆举行了盛大的开幕式。中国驻日本使馆文化参赞蔡子民、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吕济民等七人和日本政治、文化各界知名人士二百五十人出席了开幕式。展览受到日本各界人士的好评，认为这些展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

中国中山王墓出土文物在法国展出 1984年11月9日至1985年2月4日，根据中法文化交流计划，中国中山王墓出土文物展览在法国巴黎大宫殿国家画廊展出，中国文化代表团团长朱穆之和法国文化部部长亚克·郎格出席了开幕式。

展览展出文物一百四十六件，其中有象征中山王的大型山字形铜仪仗饰，列鼎和编钟，错金银虎噬鹿屏风插座，双翼神兽，人俑灯和十五连盏铜灯、炊器、帐架，精美的黑陶器，玉器，石刻等。整个展室按中山王墓的墓室形状布置，并且采用小型冷光灯照射展橱内的文物。这批精美文物是第一次在欧洲展出，接待观众十万人次。

上海博物馆珍藏六千年的中国艺术品在美国展出 1984年11月30日，上海博物馆赴美展出的“上海博物馆珍藏——六千年的中国艺术展”在华盛顿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闭幕。展览是1983年5月3日在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开幕的，上海市汪道涵市长和上海博物馆沈之瑜馆长出席了开幕式。展览还在休斯顿、芝加哥等城市展出。展品二百三十二件，观众达六十万人次。展览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外）

中国秦代兵马俑在瑞典展出 1984年12月4日中国秦代兵马俑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东方博物馆展出。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和王后西尔维亚以及各界著名人士三百多人出席了开幕式，在欧洲举办以秦代兵马俑为主题的展览还是第一次。（王志龙）

学术会议

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第二次会议 1983年12月27日至1984年1月2日，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第二次会议暨学术讨论会在云南省昆明市举行，来自全国十一个省、市、自治区文博、大专院校等单位的代表七十余人出席了会议。中共云南省委及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参加了开幕式。

大会收到论文五十余篇，代表们除继续对中国古代南方铜鼓的起源、类型及社会功能等问题，以新的材料、从新的角度探讨外，又特别提出了铜鼓的铸造工艺、音乐性能、造型美学原理和纹饰的阐释以及南方铜鼓与中原文化、江南文化、东南亚文化的关系等课题，并进行了热烈的讨

论。

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研究室对云南、广西出土的一百面铜鼓的合金成分进行了化学分析及金相鉴定，结果表明早期的万家坝型及石寨山型铜鼓主要是纯铜及锡青铜，而晚期各型铜鼓多为铅、锡青铜，这不但反映了冶铸技术的发展，而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铜鼓起源、发展与传播的过程。

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中国音乐研究所近年来对云南、贵州、广西出土的铜鼓进行了测音。研究结果表明，楚雄万家坝出土铜鼓的音律与中原商代铜铙及西周中期编钟一致；而滇池地区出土的铜鼓，其音律与山西侯马出土的春秋编钟一致，为探索古代南方与中原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大会改选了理事会，并为台湾省保留了理事名额。选举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夏鼐任名誉理事长，中央民族学院石钟健任名誉副理事长，中国历史博物馆陈乔等任名誉理事，四川大学历史系童恩正任理事长。（李先登）

江苏省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 1984年6月8日—13日，江苏省考古学会在南京召开了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同时召开了第四次年会。出席会议的省内外代表共110人。年会的学术讨论中心议题是六朝考古。

与会代表共向大会提出学术论文近六十篇，内容包括长江下游或某些局部地区的六朝墓葬的分期，六朝青瓷器的分期，六朝陶器的分期，南朝石刻艺术，砖印壁画的研究，以及六朝墓志、地券、建筑、井栏、青瓷器、陶俑、印章、钱币等方面的研究文章。

代表们还介绍了近年来江苏省各地六朝考古方面的重要新发现。其中南京市最近出土的东吴到西晋时期的青瓷釉下彩盘口壶，画面初步定名为"魂神升天图"，具有道教和佛教的双重意境，用笔洒脱飘逸，艺术水平也很高。这件器物的发现，把我国烧造釉下彩瓷器的历史提早到了三国时期。（纪仲庆　车广锦）

湖南省考古学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 湖南省考古学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于1984年6月21日至26日在衡阳市召开。出席会议的有省内外代表七十八人，其中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以及河南、湖北、江西、安徽、贵州、广西、广州等省、市的考古学会代表和研究人员。

大会收到论文、考古发掘报告、简报共五十六篇，主要内容有湖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石门皂市下层的细石器遗存、大溪文化陶器浅析、湖南商周时期青铜文化、春秋战国时期的越楚文化、湘西古代民族文化渊源探索、长沙楚墓新探、楚人进入湖南的时代及有关问题等等。

大会期间，北京大学考古系邹衡教授、严文明副教授，吉林大学历史系主任张忠培教授，相继作了学术报告。广州市博物馆馆长、南越王墓发掘主持人麦英豪同志，对南越王墓的发掘经过及有关学术问题，作了详尽的讲述，并放映了发掘现场的录象和文物幻灯片。

学会会员由原来的七十六人增加到一百三十六人。（吴铭生）

内蒙古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座谈会 1984年8月4—9日，内蒙古自治区考古学会在呼和浩特召开了内蒙古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座谈会。会议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吉林大学历史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甘肃省文物队和文物出版社等单位的十七名专家学者，以及区内各盟市文物站（所）的代表共六十余人参加。与会同志在内蒙古文物队和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考古研究室，参观了朱开沟、老虎山、黑岱沟、阿善、白泥窑子和大口等遗址出土的遗物标本，并实地考察了老虎山遗址。苏秉琦先生在会上作了题为《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工作新进展》的讲话。

座谈会讨论的地区范围，主要包括黄河河套南流两岸的包头市、准格尔旗、伊金霍洛旗、清水河县和凉城县等地区。与会同志就内蒙古西部地区原始文化的产生、发展序列，以及在不同时期与周围地区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广泛地讨论。认为，就内蒙古西部地区目前发现的遗存来看，大体上可分为九个大的发展阶段。其中仰韶时期四个阶段，龙山时期三个阶段，夏商时期二个阶段。一些同志认为，前二个阶段的遗存，基本上与陕、晋、冀北部同时代文化类型差别不大，此后有一段缺环。自第三阶段始，以河套地区为中心，逐渐表现出地区性的文化特征。有的同志认为，第一阶段的文化面貌与后岗一期文化较为接近；有的同志则认为，这一地区的文化应有自身的起源和发展序列。第四阶段遗存，是属仰韶向龙山时期过渡的具有浓厚地方风格的遗存。第五、六阶段遗存发现较少，一些同志认为这类文化遗存的某些因素，与河北、山西龙山时期遗存大体近似，但也表现出许多自身的特征，今后尚需做更多的工作。七、八、九三个阶段的遗存，主要发现于朱开沟遗址。其中第七阶段约当龙山晚期，第八、九阶段属夏商时期。一些同志认为，这处遗址发现的大量陶器、青铜器和卜骨等，构成了这一遗存强烈的文化特征（有的同志认为可命名为"朱开沟"文化），为探索鄂尔多斯青铜器的起源问题提供了线索，也为研究内蒙古西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编年奠定了基础。（魏坚）

河北省文物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及第一次年会 1984年9月20日至25日河北省文物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及第一次年会在石家庄召开。全省文物考古学界的代表和来自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吉林大学考古专业，以及北京、山西、辽宁、河南、天津等省、市的专家、教授共一百三十七人出席了会议。

会上收到论文六十二篇，这些论文涉及到从原始社会至清代我省及其周围地区文物考古研究中各个方面的问题，其中包括了不少新发现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充分展现了我省文物考古科研战线所取得的新成就。

会上，代表们讨论通过了《河北省文物考古学会章程》，民主协商、

选举产生了河北省文物考古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商定了《河北省文物考古学会1984—1985年度工作安排》。（河北文研所）

全国首次商史学术讨论会 1984年10月7—13日，全国第一次商史学术讨论会在河南安阳举行。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第二研究室和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省文物局、省文物所、省博物馆、安阳市文化局等单位联合发起召开的。全国六十多个单位一百多位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夏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胡厚宣、张政烺、李学勤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讲了话或作学术报告。会议期间收到论文五十四篇。

会议讨论了殷商考古学、商史和甲骨学领域的一些重大问题。

殷代考古学方面，主要讨论了河南偃师商城遗址的年代和性质，大家一致肯定偃师商城的发现是考古工作上的一个重大发现，对夏文化的探索和商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一种意见认为偃师商城建于商代二里岗下层之前，有可能属于二里头文化三期或四期，年代早于郑州商城，是目前所知我国早期城址中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一座城址，其时间和地望与文献上记载的商都西亳完全吻合，因此认为偃师商城即为历史上的商都西亳。另一种意见认为偃师商城建造和使用年代最早当在二里岗下层时期，而延用和繁荣于二里岗上层时期，应是与郑州商城基本上同时并存的商代早期的重要城址，但商都西亳应是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只是一军事重镇或商王朝的别都桐宫。

甲骨学方面，主要是1.对甲骨文的首先发现者问题进行了论辨；2.对部分甲骨文字进行了考释；3.对甲骨文中商族传说时代及天文历法进行了探讨。

商史研究方面，集中讨论了1.商代社会性质：有人主张商代后期尚处野蛮时代初、中级阶段为母系氏族；也有人认为处于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即原始社会末期；较多的同志认为商代已进入奴隶制社会。2.关于人殉和人祭：有人认为这是原始社会末期的现象，也有人认为这是奴隶制不发达，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反映；也有的同志指出，这是存在某些民族中的一种特殊的现象，既不能与生产力水平划等号，也不能同奴隶制发展相联系。

福建省崇安县汉城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学术座谈会 1984年10月16—20日，福建省文管会在建阳县召开崇安汉城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学术座谈会。会议邀请北京、陕西、湖北、广东、江苏、浙江、江西以及我省有关考古、历史、建筑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共三十余人参加。

崇安汉城遗址自1980年以来，先后经过多次勘探和发掘，城墙、城门及烽燧遗迹基本完好。城内外探明多处建筑群基址和冶炼、制陶作坊遗迹。在城内中部的高胡南坪揭露一组近1万平方米的建筑群基址。出土三千余件陶制生活用具、铜铁兵器、工具，以及大量印有绳纹的板瓦、筒瓦、

瓦当和排水陶管。会议主要讨论崇安城的性质、年代、建筑构造、文化特征等课题。

关于汉城的性质，多数同志认为，这座古城的城墙和城内建筑基址仍存，可以称得上是我国东南地区汉城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城内宫殿式基址的气魄宏大，规制超过郡县一级的衙署，可能是一座“王城”。

关于城址的兴废年代，从出土文物分析，可能兴建于西汉初年，系闽越国城邑，汉武帝灭闽越后这座古城继续使用至西汉末新莽时期废弃。

关于建筑群基址的结构问题，汉城的规划设计、平面布局和基本工程做法与中原宫殿建筑类似。但由于南北地理环境不同，南方潮湿多雨，因此在某些做法上表现出地方特点，崇安汉城依山而建，居高临下，不必像中原地区那样殿基要在平地上筑造高台。为避免潮湿，地面处理采用立短柱架垫地板的“干栏”式做法。（林钊）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和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4年年会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和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4年年会暨学术讨论会，于1984年10月21—27日在四川省邛崃县举行。

出席这次会议的理事、代表和列席代表共二百五十多人。他们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河北、山西、内蒙、吉林、辽宁、山东、安徽、江苏、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陕西、新疆、云南和四川等二十三个省、市、自治区的文博、研究所、科技工艺部门、高等院校和出版社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和教授。

提交这次年会讨论的论文、译文和资料共一百八十多篇。会议期间，代表们就有关邛窑、长沙窑、寿州窑的关系问题、四川彭县的白瓷问题及其它窑口的白瓷问题、古外销陶瓷问题等进行了学术交流。

同时，为配合这次年会的举行，还举办了全国著名窑口和有关窑口复制品、出土碎片标本展览，供与会代表共同观摩和研究。

会议期间，与会的全体代表实地参观考察了邛窑古窑址发掘现场。

这次年会正式成立了“中国古陶瓷和古外销陶瓷研究基金会”。（叶文程）

秦俑发现十周年及秦俑研究学术讨论会 会议由秦俑博物馆组织，于1984年10月23—26日在临潼召开。应邀参加大会的有来自中国军事科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陕西师大、陕西省文物局及所属各博物馆等单位的专家学者；秦俑考古队、秦俑博物馆的专业人员；西北大学、陕西师大历史系的研究生；《考古与文物》、《文博》、《史前研究》、《人文杂志》的编辑人员共九十六名。

大会收到论文三十八篇。这些论文对一些问题提出新的看法，如对兵马俑的研究涉及到阵法、兵种、爵级、装备等等。论文也涉及到秦陵的从葬工程，造型艺术，铜车马等方面。会上对秦俑属主问题进行了讨论。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兵马俑的属主只能是秦始皇帝。个别同志认为是宣太后。有的同志认为兵马俑是“表彰统一

全国的军功所树的纪念碑式的'封'"。有的同志认为它不是守卫陵园的军队，而是"王朝军队的象征"。（聂新民）

太湖流域古动物、古人类与古文化学术座谈会　1984年11月14—18日，太湖流域古动物、古人类与古文化学术座谈会在浙江省嘉兴市召开。这次座谈会是太湖流域六市博物馆（常州、无锡、苏州、嘉兴、湖州、上海自然博物馆）的考古与古人类学专业工作者发起，由六市博物馆联合组织的。参加会议的有太湖流域两省一市（江、浙、沪）从事考古和古人类工作的中青年专业人员，共三十余人。

会议讨论的内容主要是太湖流域考古文化问题。会上，各地代表交流了近几年来有关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新发现资料，仔细观看了在嘉兴首展的"太湖流域六市博物馆藏品联展"，实地察看了嘉兴双桥遗址和雀幕桥遗址。

会上苏秉琦先生作了题为《太湖流域的考古问题》的讲话。他指出太湖流域考古文化有自己的渊源，有共同特征，有自成体系的发展道路。他将太湖流域的考古文化分为马家浜诸文化、良渚文化和古吴越文化（即"后良渚文化"），时限从七千年至三千年前。

与会代表着重讨论了良渚文化，以及与继良渚文化之后的"后良渚文化"的衔接关系。大家认为：上海马桥类型文化和浙江高祭台类型文化对探讨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后裔提供了重要线索。有的同志认为：良渚文化和"后良渚文化"正处在文明时代的门槛内外，考古工作的深入，有可能阐明太湖地区从城邦到国家出现的具体过程。（陈晶　冯普仁）

江苏省吴文化第五次学术讨论会

江苏省吴文化研究会于1984年11月在镇江市举行第五次学术讨论会，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商承祚；理事刘敦愿、蒋若是，以及来自北京、山东、河南、浙江、山西、福建、广东及本省二十九个单位五十八位考古、史学工作者出席了会议。会议中心内容以吴文化青铜器为讨论专题，收到论文十八篇，会议期间参观了南京博物院等苏南七个博物馆在镇江举办的吴国青铜器联展，同时还参观了宜侯夨簋当年出土地点丹徒烟墩山和吴铜器分布密集的大港等地考古现场；浙江省长兴县博物馆也将当地出土的吴铜器参加了展出。

与会代表主要讨论了吴国强盛的军事因素、吴国青铜器的起源与发展、吴铜器的地方风格和与中原、越、楚、徐等国的影响关系，吴铜器的断代分期与工艺特征等问题。

会议期间，举行了吴文化研究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十一人组成的干事会，推选了陆九皋为总干事，张英霖、魏正瑾为副总干事，陈玉寅为秘书长，肖梦龙为副秘书长，研究会还设立了学术、编辑、资料三组，分别由邹厚本、冯普仁、吴奈夫三同志分工负责，并将不定期编印《吴文化研究》内部资料。（陈玉寅）

人类学国际性学术讨论会　我国

人类学第一次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于1984年12月11—16日在中山大学举行。

应邀参加这次学术讨论会，有来自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和我国内地及香港地区的人类学专家、学者、教授共八十多人。广东省副省长黄清渠、文化部文物局顾问谢辰生、校长李岳生和党委副书记吴文辉出席了开幕式。黄清渠副省长和吴文辉副书记在会上讲了话。我校人类学系主任梁钊韬教授致开幕词。

会议收到论文七十多篇，包括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和体质人类学等四个方面。我国人类学及有关学科专家杨成志、吴汝康、岑麒祥、高华年、秋浦、严学宭、石兴邦等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郑德坤教授，日本竹村卓二教授、王崧兴教授，美国顾定国副教授等在大会上作了学术报告和发言。代表们对人类学的体系和我国南方文化的特点及研究方法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考古组有三十一人出席，论文有二十六篇。

参加论文的重点和此次学术讨论的中心议题是我国南方文化的特点，大家一致认为近三十年来由于考古工作的广泛开展，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性，从河姆渡等遗址的发现说明南方文化亦有其源，而在其后的发展中，逐渐又形成各有特点、丰富多姿的不同系统的诸文化。这些文化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又互相融合，交织成一幅光采流离的瑰丽图景，为后来独特的灿烂的中国文明打下基础，同时也推动了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和巩固。

（商志𧃅）

北京人发现五十五周年纪念会

1984年是北京人第一个完整头盖骨发现五十五周年。12月20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历史学会、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会在北京民族宫联合举行纪念会，隆重纪念这个古人类学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方毅、周谷城、严济慈、肖华等和首都学术界二百余人出席了会议。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张弥曼、北京历史学会会长戴逸、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会会长周明镇、中国考古学会会长夏鼐、参加周口店工作的老一辈科学家贾兰坡等先后在会上讲话，介绍我国古人类学的发展历史、近年来在古人类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以及今后的展望。他们在讲话中指出：我国在古人类学研究方面的工作得到国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认为中国正在成为人类起源研究的新中心。方毅在会上也讲了话。他说，五十五年前发现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是我国在世界科学研究中拿到的第一块“金牌”。他提议要建立一个很好的博物馆，保护好这些珍贵的化石、文物，以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最后他提出要用现代科学方法加强人类学研究，并和世界各国进行学术交流。会上还首次展出了举世瞩目的禄丰古猿、北京人、蓝田人、马坝人等珍贵标本。（黄慰文）

元谋人发现二十周年纪念会

1984年12月，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

古人类研究所、云南省博物馆和北京自然博物馆等单位在云南省元谋县举行了元谋人发现二十周年纪念会。

会上就元谋人的年代问题进行了讨论。自从刘东生等人对元谋人的生存年代提出异议以来，各界对元谋人年代的争论抱着极为关注的态度。当年参加元谋人遗址工作的一些科学工作者，本着严肃认真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元谋人的地层，共生哺乳动物群等方面重新进行了观察，并采集了更为详细的样品进行古地磁测定。会上他们报导了他们新的观察结论，指出：第一，重新的观察并没有发现元谋组第四段（元谋人化石及石器的层位）与它下面的地层因构造运动而成断层接触的现象，从而排除了下部地层的动物化石混入元谋人层位的可能性。因此，元谋动物群作为华南早更新世动物群的代表之一的结论是可以成立的；第二，由于元谋组地层层序正常，新构造运动并未造成严重后果，因此重新解释元谋组磁性地层的根据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新的古地磁测定结果仍然确认元谋人生存于距今170万年前。（黄慰文）

吉林省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 吉林省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于12月20日至23日在集安召开。集安位于风景秀丽的鸭绿江畔，是高句丽历史名城。来自省内大专院校、社会科学院、文物考古单位的会员七十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邀请了辽宁省博物馆、旅顺博物馆、黑龙江省文管会、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北方文物》编辑部、黑龙江省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等单位的代表。参加会议的人数为九十八人，提交大会的论文四十余篇。

这次年会有两个内容。一是回顾和总结一年来我省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安排1985年学会的主要工作。代表们就吉林省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考古；高句丽、渤海考古；辽、金考古等专题，结合工作实际，进行了广泛的交流。比较集中的议题有：考古学理论与族属问题；我国古代文献中有关东北少数民族的记载与它们的考古文化等。结合对集安高句丽时期的壁画墓、好太王碑、将军坟等文物的参观和考察，也开展了一些较为深入的讨论。会议请辽宁、黑龙江两省的代表介绍了该省一年来考古主要收获，并做了诸如"旅大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专题报告。与会代表交流了经验，交换了信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另一个内容是根据省考古学会章程，鉴于第一届理事会任期已满，进行了新的选举。经过民主选举，产生了第二届理事会。这届理事会由二十七人组成。常务理事九人。理事长王承礼，副理事长张忠培、王健群，秘书长方起东。（王侠）

安徽省考古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 安徽省考古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于1984年12月21日至23日在合肥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各地、市、县及一些大学的代表八十余人。省政协副主席、省考古学会上届会长洪沛，省社联副主席俞运，省文化厅副厅长刘景龙，省文化厅顾问王亦耕出席了会议。

洪沛同志在开幕式上代表上届常务理事会作了关于学会自1979年3月

成立以来的工作情况报告及对今后工作的建议。俞远同志、刘景龙同志在会上讲了话。

这次会议主要任务是修改学会章程，选举第二届理事会和常务理事，经过充分酝酿协商，新的理事会由刘景龙等五十三人组成，理事会选举洪沛为名誉会长，殷涤非为会长，韩自强、杨立新为副会长，杨德标为秘书长，丁邦钧为副秘书长，庄增明、吴兴汉、陆勤毅、梅竣为常务理事。（苏明）

湖北省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

1984年12月27—30日，湖北省考古学会在黄石市大冶铜绿山矿举行了第五次年会。出席这次年会的理事和代表共六十三人，他们分别来自省内有关大专院校和我省、地、市(自治州)、县的文博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队也派代表参加。

年会收到论文三十一篇。会议期间，代表们参观了黄石市博物馆、大冶县博物馆和刚刚落成的我国第一座古铜矿遗址博物馆——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还到大冶草王嘴古城址进行了实地考察。会上代表们结合黄石、大冶、咸宁、阳新、鄂城和武昌县近年来调查、试掘的考古材料，对鄂东南地区自新石器时代至商周各时期的物质文化的特征、发展变化、大致分布范围及商周以来这一地区发达的铜矿开采、冶炼等学术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其他学术问题也进行了广泛的交流。通过这次学术讨论会，代表们对这一地区的古代文化与周围其他地区的文化关系，特别是与楚文化的关系，对这一地区丰富的古矿冶遗址与我国青铜文化的关系等等学术问题，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会议期间，理事会还审批吸收了二十五名新会员，至1984年底止，湖北省考古学会共拥有会员一百五十六人。（胡考秘）

对外学术交流

王仲殊等出席日本第七次古代史讨论会　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仲殊及副研究员徐苹芳、杨泓，于1984年3月14—23日前往东京，参加了由全日空、朝日新闻社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联合在东京举办的日本第七次古代史讨论会。本届讨论会的主题，是关于日本的三角缘神兽镜问题，兼论公元三世纪至五世纪日本与中国江南地区的文化交流关系。

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日本学者就主张日本发现的三角缘神兽镜是中国魏朝皇帝赠给日本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的礼物。这便是所谓"魏镜说"，六十多年来，在日本学术界占统治地位，几乎已成定说。但是，由于新的考古资料的不断增多，近十余年来，有些学者开始对"魏镜说"提出疑问。王仲殊根据中国方面的大量新资料进行研究，并在1981年访日时对三角缘神兽镜的实物进行仔细的观察以后，于同年8月发表论文，提出三角缘神兽镜不是魏镜，而是中国的吴的工匠东渡日本，在日本所制作。这一新的学说不仅对日本的考古学，而且对日本的古代史研究有重大的关系，在日本引起很大的反响。在这次讨论会上，王提出更多论据加以论证。徐、杨也根据中国考古的许多新资料充分论证，从各方面补充了王的论点。日本方面学者承认"王说"有大量的考古调查发掘新资料作根据，确实难于否定。

夏鼐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人类科学文化史》第一、二卷正副主编会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夏鼐，应邀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史》国际委员会下属第一卷编委和第二卷副主编，于1984年4月13日至23日前往巴黎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人类科学文化史》第一卷正、副主编会议。全书编委会主席C·穆拉塞和秘书长A·特拉俄勒参加会议和讨论。第一卷主编、比利时学者戴拉特主持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编写体例、初步拟定的编写提纲，以及提名和商洽撰写人名单等。

同年9月2日至13日又去巴黎出席第二卷正、副主编会议。这次会议由第二卷主编、巴基斯坦学者A·H·达尼主持。主要议题是订定全卷提纲，以便提交本书编委会。这部《人类科学文化史》曾于五十年代编成九卷本出版。这次是编写第二版，决定另组织班子，重新改写过，等于另写一本书。

中国文物考察组梁丹等去奥地利访问　应奥地利教育艺术部联邦文物

局的邀请，由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梁丹、北京市文物工作队主任赵迅组成的中国文物考察组于1984年4月7日至22日赴奥地利进行了访问。在奥期间，参观了数十座古代皇宫、教堂、名人故居和博物馆等文物保护单位。重点考察了奥地利古代建筑的修缮和文物保护状况。初步了解了奥联邦文物局机构的设置、方针、任务及奥地利文物保护法的立法规定和具体执行办法等。（外）

三上次男为团长的日本出光美术馆代表团来我国访问　应文化部的邀请，以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三上次男为团长的日本出光美术馆代表团一行六人于1984年4月来我国访问。来访期间，除在北京参观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等单位，进行学术交流外，还到西安、成都、上海等地活动。

加拿大考古学者史密斯夫妇来我国访问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加拿大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的学术合作协议，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考古学教授菲力普·史密斯及其夫人、麦吉尔大学考古学教授井川史子·史密斯，于1984年5月20日来我国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学术访问，除在北京参观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进行学术交流外，还曾去西安、成都、上海、长沙、广州等地活动。

国际古代纺织史研究中心副主席里布夫人在京作学术报告　长期侨居法国的印度纺织史专家、国际古代纺织史研究中心副主席克里施娜·里布夫人于1984年6月来我国进行私人访问。在此期间，她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夏鼐的约请，于6月6日和7日两次到考古研究所作学术报告。报告的题目分别为《汉代织物——新的事实和观点》及《从汉到唐的纺织品》。报告会由夏鼐主持。出席报告会的有考古研究所所长王仲殊、副所长安志敏以及考古研究所、历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及北京大学等单位的四十多位学者。印度驻华大使和夫人、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的夫人也到会听讲（报告内容，详见《考古》1984年11期）。

罗马尼亚考古、博物馆专家波巴·丹等来我国访问　1984年7月15—28日，根据中罗文化合作执行计划，罗马尼亚锡那亚市贝雷什博物馆馆长、历史学家波巴·丹和罗文化与教育委员会监察员、考古学家斯托依卡·科尔内利亚来我国参观访问。他们重点参观考察了北京、西安、南京的文物古迹和博物馆，并同文博界的同行见面，一同讨论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外）

美国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来我国讲学　1984年8至9月，北京大学考古系邀请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张光直教授作考古学专题讲授，内容有：1.中国考古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2.从世界古代史常用模式看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3.泛论考古学；4.谈考古分类；5.谈聚落形态考古；6.中国三

代社会的几个特征；7.台湾考古。听课的除北大考古系师生外，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学系和文物出版社等单位的部分同志。课后同北大考古系教师一起，就美国考古学界的情况和美国考古教学情况等问题举行了座谈。随后，张光直教授还在山东大学历史系作了四次学术演讲，参观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博物馆及泰安、曲阜、临淄、章邱等地的国务院和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被授予山东大学名誉教授。在北大的讲学内容已由北京大学考古系整理并经本人审阅，将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严文明）

日本陶艺家访华团圆城寺次郎等一行七人来我国访问 1984年8月28日至9月10日，应文化部文物局邀请，以日本经济新闻社顾问、日中文化交流协会顾问圆城寺次郎为团长的日本陶艺家访华团一行七人来华访问。代表团在华期间参观访问了北京、武汉、长沙、醴陵、广州、泉州、德化、福州、上海等地的名胜古迹、博物馆及古窑遗址，并与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的文物、陶瓷专家进行学术交流。文物局局长吕济民会见并宴请了访华团。（外）

安志敏出席环日本海国际学术讨论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安志敏，应环日本海（东海）国际讨论会实行委员会会长八田恒平的邀请，于1984年9月26日至10月5日参加在日本金泽市举行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者有日本、中国、苏联、美国和南朝鲜的学者。讨论会共有两个主题，第一分科为《日本海文化的源流和发展》，报告主要环绕考古、历史和民俗的角度来探讨日本列岛和亚洲大陆的文化联系。在这个分科会上，安志敏作了《史前时代海上的中日交流》的报告。第二分科为《环日本海地区城市问题的政策》，也有中国学者参加。

缅甸博物馆代表团耶突等一行五人来我国访问 1984年10月11—24日，根据1984年中缅文化交流计划，以缅甸文化部文化局局长耶突博士为团长的缅甸博物馆代表团一行五人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代表团先后参观了昆明、成都、西安、北京、广州等地的博物馆、图书馆、文物保护单位及民族学院，并游览了各地的名胜古迹。（外）

以江上波夫为团长的日本文化交流考古文物研究者访华团来我国访问

以日本著名考古学家、泛亚细亚文化交流中心会长江上波夫为团长的日本文化交流·考古文物研究者访华团一行五人，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于1984年10月来我国进行为期两周的参观访问。他们除在北京访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夏鼐、王仲殊、安志敏等进行座谈外，还曾去哈尔滨、阿城、牡丹江、长春、吉林、集安、沈阳、辽阳和锦州等地活动。

北京大学考古系高明副教授去美国访问 应加州大学东方语言学系的

邀请，北京大学考古系高明副教授于1984年10月以访问学者的名义去美国访问，将在该系进行研究工作，并讲授中国古文字学。1985年3月底将转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活动，约于5月底返国。（严文明）

法国考古小组让戴尔等三人来我国进行学术考察 根据中法社会科学交流项目，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P·让戴尔、助理研究员H·法兰克福和C·德巴娜组成的法国考古小组，于1984年11月1日至23日来我国进行学术考察访问。11月2日，他们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访问时，贾兰坡、吴汝康教授等同他们进行了座谈。11月5日，他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访问时，名誉所长夏鼐、所长王仲殊、副所长安志敏等同他们进行了座谈，并请他们参观了古物标本室和实验室。11月6日至20日，他们去新疆进行学术交流活动。曾在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就中亚考古有关问题作了三次学术报告：让戴尔《地理环境与史前考古学研究》；法兰克福和让戴尔《对印度河流域古代文化的研究》；法兰克福《中亚地区考古文化介绍》。考古小组还曾去吐鲁番、喀什两地进行了参观访问。回京以后，让戴尔和法兰克福又于11月22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作了《公元前3000—2000年帕米尔以西地区游牧民族和定点居民之关系》的学术报告。

澳大利亚考古学者贝尔伍德来我国访问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人文科学院的学术交流协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史前考古学和人类学系高级讲师贝尔伍德，于1984年11月25日来我国进行为期一月的学术访问。在京期间，曾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所长王仲殊、副所长安志敏及卢兆荫等进行了座谈，并于12月1日，在考古研究所作了题为《关于东南亚和太平洋史前史的研究近况》的学术报告，出席报告会的有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以及文化部文物局的三十多位学者。随后，还到西安、昆明、上海、杭州、广州等地参观访问。

本年逝世考古学家

于省吾

张亚初

著名古文字学家、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吉林大学历史系教授于省吾先生，于1984年7月17日在长春逝世，终年八十八岁。

于省吾字思泊，别号双剑誃主人、泽螺居士、夙兴叟，1896年12月23日诞生于辽宁省海城县西十五里中央堡的塾师家庭。1919年毕业于沈阳国立高等师范。1928年被张学良聘为萃升书院院监。“九·一八”事变前夕书院停办，他不甘受日寇奴役统治，移居北京，开始潜心于古器物、古文字研究。为辨别古器物、古文字的真伪，从事著述，曾收藏了珍贵的甲骨、铜器二百多件，因得吴王夫差剑和少虡剑，遂以“双剑誃”名斋。解放初期，将全部文物捐献国家。1931—1951年，先后任辅仁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校名誉教授，讲授古文字学和古器物学。1955年起，任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历史系教授。

于省吾从事古文字研究长达五十多年，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四十年代初出版的《双剑誃殷契骈枝》初、续、三编，考释出百余字，是继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以来释读甲骨文字最多的著作。此书以考释精审为学人所称道。1951年，曾受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之托，对郭沫若的《卜辞通纂》、《殷契粹编》二书进行再版校订。许多意见为作者采纳，录列眉端。1977年，中华书局约请主编《甲骨文字考释类编》，现已基本完稿。1979年，总结四十多年的研究成果，新释或纠正过去误释的约三百字，题名《甲骨文字释林》，是对甲骨文字研究的力作，为学术界所普遍推崇。它的序言是关于古文字研究的理论性的总结。

于省吾对金文方面的研究，也成绩斐然。三十年代出版的《双剑誃吉金文选》、《双剑誃吉金图录》、《双剑誃古器物图录》，对铭文的考释、研究及重要铜器的刊布，都曾起过积极作用。1957年出版的《商周金文录遗》，收录了六百余件铜器铭文拓本，对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一书作了重要的补遗。解放后，还撰写了研究铜器铭文的论文二十余篇。凡出土和传世的重要铜器，都曾撰文考述，并有重要创获。《鄂君启节考释》、《寿县蔡侯墓铜器铭文考释》、《墙盘十二解》等文，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近几年，继《甲骨文字释林》成书后，又开始撰写《吉金文

字释林》，拟对二百余条铭文字、词进行考释。可惜此书未能全部完稿。

于省吾学术贡献的另一重要方面，是用古文字材料来校勘古代典籍。他对《尚书》、《诗经》、《周易》及先秦诸子，分别作了“新证”。三、四十年代所著的《尚书新证》、《易经新证》、《论语新证》、《诸子新证》等书，在当时被誉为“新证派”的代表作。他对群经诸子、小学古史以及目录、版本等方面都有很深的修养，所以潜研古籍能左右逢源、多所发挥。六十年代中华书局再版了《双剑誃诸子新证》。1982年出版的《泽螺居诗经新证·泽螺居楚辞新证》，前一部分根据旧作删订增补而成。删订后的《诗经新证》除了用金文以证典籍外，还应用了考古学、民俗学等新材料解释古文献。他一贯主张“用同一时代或时代相近的地下所发现的文字和文物与典籍相证发”，因而大量地使用了晚周文字和文物资料，把“新证”工作推进到了一个更新的高度。

于先生六十年来的治学道路，似有一条脉络可寻。早年酷爱文学，尤喜桐城派古文，有《未兆庐文钞》刊行于世。1931年移居北京后，虽由词章之学转移到古文字和考据学方面来，所撰《双剑誃吉金文选》仍“尤重其文辞”，可以概见其从词章之学转向古文字学的途径。他在研究先秦古文字和文献时，对于乾嘉学派的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无征不信、谨严治学的态度最为推崇。对于孙诒让的文字偏旁分析方法，尤为服膺。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对其治学道路也影响甚大。他十分重视古代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工作，《从古文字方面来评判清代文字、声韵、训诂之学的得失》一文，是关于如何正确对待古代文化遗产的颇有指导意义的论文。

于先生从古文字考释和史料复原，进一步发展为研究古代史，利用甲骨文字的构形和甲骨文记载，对我国成文历史的开始，对我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进行了研究。《略论甲骨文“自上甲六示”的庙号及我国成文历史的开始》、《殷代的交通工具和驿传制度》、《商代的谷类作物》、《从甲骨文看商代的农田垦殖》、《释奴、婢》等文，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有些意见虽不能作为定论，但他是朝着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新史学方向不断地努力的。

于省吾先生治学以谨严著称，引用资料务求准确，论证问题无征不信、阙疑待问，论文总要屡经推敲、反复修改，力求“严丝合缝”。他从词章之学进而为考据之学，更进而以考据学的丰硕成果为史料学和殷周古代史的研究服务，使旧日的考据学走上新的道路。解放后，更是不断更新知识，扩大研究领域。“活到老，学到老”，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为后学的年青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考古学文献资料目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图书资料室

考古学书目

壹 总类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考古学专刊甲种第十七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文物出版社 1984年5月 文661页 插图104幅 彩色图版24页 黑白图版216页 16开

本书是对建国三十年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的一个综合性的叙述。书中所用资料起于1950年，迄于1980年（个别到1981年）。全书共分六章，纵的方面，从旧石器时代到明代，按历史发展序列论述；横的方面，石器时代按考古学文化的区域类型进行研究，商周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则概括为若干专题来探讨。国内少数民族地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也在各历史时代分别论到。

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 中国考古学会编 文物出版社 （1984)年12月 文372页 大32开

本书反映了1983年我国考古发现与研究的基本情况和动态。全书包括"考古学研究"、"考古文物新发现"、"考古研究文博机构简介"、"高等院校考古文博专业简介"、"考古学会简介"、"文物保护工作"、"对外学术交流"、"本年逝世考古学家"及"考古学文献资料目录"等九个部分。

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1981) 中国考古学会编 文物出版社 1984年4月 文279页 插图81幅 图版8页 16开

本书收集了1981年在杭州召开的第三次年会的三十四篇论文。以研究东南沿海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和南方青瓷及其窑址的论文为主，还有一些涉及先秦至隋唐各代的考古学问题的文章。

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 苏秉琦著 文物出版社 1984年6月 文338页 插图67幅 图版8页 16开

本书选录了苏秉琦从事考古工作五十年来的文章共二十三篇。全书分三部分：（甲）调查、发掘报告选；（乙）考古类型学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文选；（丙）关于考古事业建设的文选。其中，《陕西省宝鸡县斗鸡

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和《考古类型学的新课题》是第一次发表。书末附有俞伟超、张忠培二同志所写《编后记》。

南京博物院（中国博物馆丛书第四卷） 南京博物院编 文物出版社、日本讲谈社 1984年2月 文67页 彩色图版122幅 黑白图版60幅 8开

本书选录南京博物院藏文物精品一百六十七件，分为新石器时代、商周、汉代、三国两晋南北朝、唐代、宋元、明清文物，绘画和书法八个部分。魏采苹、张正祥、白英、罗宗真、王淮生、萧平、凌锡灿分别撰有专文，对各部分文物作了概述。书前有南京博物院院长姚迁的序，详细介绍了南京博物院的历史和藏品概貌。

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博物馆丛书第五卷）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 文物出版社、日本讲谈社 1984年10月 文85页 彩色图版146幅 黑白图版64幅 8开

本书选录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文物精品一百九十件，分为石器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金元、明清文物七个部分。王宏钧、石志廉、孙机、范世民所撰图版说明，对各部分文物作了论述。书前有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陈乔的序文，详细介绍了该馆的历史、机构设置、陈列和藏品概貌。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中国博物馆丛书第六卷）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编 文物出版社、日本讲谈社 1984年12月 文72页 彩色图版209幅 黑白图版72幅 8开

本书内容分为绘画、法书、玺印、砚台、玉器、瓷器、"泥人张"彩塑和"杨柳青"年画八类。反映了该馆藏品的精华和特色，除分类综述外，对每件器物都作了简要说明。卷前有天津市文化局顾问张映雪撰写的序，简要介绍了该馆的藏品情况和特色。

贰 田野考古资料

江陵雨台山楚墓（考古学专刊丁种第二十七号）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 文物出版社 1984年4月 文194页 插图112幅 彩色图版4页 黑白图版78页 16开

本书发表的是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于1975—1976年间在江陵县雨台山发掘的五百五十八座楚墓资料。全书共分六章：前言、墓葬综述、墓葬分类、随葬器物、分期和年代、结语。并有附表八种。

青海柳湾（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考古学专刊丁种第二十八号）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文物出版社 1984年5月 上册文408页 插图144幅 下册彩色图版4页 黑白图版212页

青海省乐都县柳湾墓地，是黄河上游迄今已知的规模最大、保存较完好的一处氏族公共墓地。本报告包括1974—1978年发掘的全

部墓葬材料，共一千五百座。其中包括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二百五十七座；马厂类型八百七十二座；齐家文化三百六十六座；辛店文化五座。全书除“前言”“结语”外，共分六章，对一千五百座墓葬的发掘资料作了全面报道。

叁 考古学分论

中国原始社会史稿 岑家梧著 民族出版社 1984年3月 文155页 插图5幅 大32开

本书是已故民族学家岑家梧的遗作。作者利用考古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等史料来阐明中国原始社会的发生、发展和解体过程。本书共分六章，作者仅写出四章，第五章《原始社会文化》和第六章《小结》，是由冯来仪撰写的。

原始社会史 林耀华主编 中华书局 1984年4月 文515页 插图55幅 图版24页 大32开

本书共分六章，主要运用国内各民族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资料，以及世界各地区各民族一些有关的最新研究成果，来阐述原始社会发展的规律，并勾画出了原始时代各个阶段的社会面貌。

元谋人——云南元谋古人类与古文化图文集 周国兴、张兴永主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4年4月 文195页 插图81幅 彩色图版16页 黑白图版16页 16开

本书主要汇集了自元谋人牙齿化石发现以来，我国各有关方面的专业人员对元谋人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成果。全书分文集和图版两部分，文集部分包括十六篇论文。

周口店发掘记 贾兰坡、黄慰文著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4年4月 文223页 图版29页 大32开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周口店的发掘史，其中有些照片和文件是从未发表过的。材料翔实，叙述流畅生动，既是考古学的珍贵史料，又可作为科普读物阅读。

楚文化考古大事记 楚文化研究会编 文物出版社 1984年7月 文185页 大32开

本书记录了楚文化主要的发现和发掘过程。所列条目，仅限于考古学上已确立的属于楚文化系统的重要遗址、墓葬、文物和有关的重要事件。《大事记》记事时间起自所见最早的历史记载，止于1982年底，兼有内容提要的作用。为便于检索，书末附有索引。索引分城址和遗址、墓葬、重要文物三部分。

汉代考古学概说（考古学专刊甲种第十六号） 王仲殊著 中华书局 1984年6月 文109页 插图128幅 图版36页 16开

本书包括九篇文章：前两篇是对长安和雒阳的研究，阐明了两个都城的形制、布局及其发展的情形；其后是五篇关于汉代农业和手工业的文章，最后两篇是关于汉代墓葬的文章，对葬制、葬俗和随葬品的演变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

肆 考古学专论

一 甲骨卜辞与古文字研究

西周甲骨探论 王宇信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年4月 文381页 大32开

本书共分七篇，全面总结了三十多年来西周甲骨的发现和研究，而且对人们所关心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诸如特征、与殷卜辞的关系、性质、分期、科学价值和今后研究应注意的问题等作了论述。此书还将已发现的全部有字西周甲骨、前人考释汇集一起，并作有文字索引和论著目录，以便利研究和检索。书前有李学勤的序言。

古文字学 姜亮夫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4年4月 文162页 图版6页 大32开

全书分四章，即汉字字形源流；汉字结构的基本精神；汉字结构分析；古代字书及检字法。

二 商周铜器及铭文

中国古代青铜器简说（文献百科知识丛书） 杜廼松编著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4年5月 文198页 插图38幅 图版30幅 32开

本书共分八章，对古代青铜器作了较全面的介绍，其中也努力反映解放以来新的考古发现和新的研究成果。

殷周金文集录 徐中舒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年2月 文575页 16开

本书摹录解放以来至1980年底国内出版的书刊中已著录的殷周有铭铜器及部分未著录的有铭铜器共九百七十三件。

商周青铜器纹饰 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编 文物出版社 1984年5月 文79页 图版1006幅 8开

本书搜集材料的时间自夏、商、西周、春秋，至于战国，其年代大约自公元前十六世纪以前至公元前221年，包括中国的青铜时代和初期铁器时代。全书分兽面纹、龙纹、凤鸟纹、动物纹、火纹、目纹、兽体变形纹、几何变形纹、半人半兽神人、人物画像等十个大类，共收纹饰一千零六幅。每类之前均有简短文字，对纹饰的出现及沿用时间，以及构图特征等作了简要说明。书前刊有马承源的《商周青铜器纹饰综述》一篇，对各种类别的青铜器纹饰作了全面分析，并回顾了商周青铜器纹饰发展的历程。

安徽青铜器——安徽省博物馆藏 安徽省博物馆编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4年2月 每套12张 44开

安徽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在形状和纹饰上都有浓厚的地方特点。本辑《安徽青铜器》明信片，按时代和地区特点精选十二件，并附有中、英文前言和目录。

三 碑刻

善本碑帖录（考古学专刊乙种第十九号） 张彦生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 中华书局 1984年2月 文214页 图版24页 16开

本书是一部善本碑帖的目录提要，收录碑帖近八百种。全书共四卷。前三卷为碑刻，自秦汉、六朝至唐宋而止。后一卷为宋元明刻丛帖，最后附有"各代单刻帖"二十五种。

千唐志斋藏志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洛阳地区文管处合编　文物出版社　1984年1月　2册　文45页　图版1360页　8开

千唐志斋在河南省新安铁门镇，是我国现存墓志石刻的集中地之一。那里珍藏着自西晋、北魏以来历代墓志一千三百多件，其中唐代墓志最为丰富，达一千二百余件。本书收录了千唐志斋藏志的全部拓片。书前有武志远、郭建邦所撰《千唐志斋概述》一篇。书后附有"图版目录"。

山东秦汉碑刻　山东省文物总店编　齐鲁书社　1984年1月　文32页　图版47页　8开

本书收录山东秦汉碑刻拓片三十九种，各石按时代顺序排列，并附有简要文字介绍。

好太王碑研究　王健群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4年8月　文241页　彩色图版12幅　黑白图版134页　大32开

全书共六章，记叙了好太王碑的建立、发现和现状，好太王碑的捶拓、调查、著录和研究及碑文的误读、考释和注释。书后有附录五种：高句丽世系表、好太王碑研究年表、国内诸家著述书影、国内外各家释文、各种拓本。

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　宁夏博物馆发掘整理　李范文编释　文物出版社　1984年11月　文88页　图版100页　16开

1972至1977年，宁夏博物馆在西夏陵墓区发掘帝陵一座、陪葬墓四座、清理帝陵碑亭两座，发现了许多记叙西夏历史的西夏文残碑，本书即选其精华，分专题加以考释。全书分两大部分，即西夏陵墓出土残碑考释、西夏陵墓出土残碑释文。

四　玺印、封泥

周叔弢先生捐献玺印选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编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4年3月　文14页　彩色图版206页　黑白图版10页　长24开

封泥汇编　吴幼潜编　上海古籍书店　1984年2月　文40页　图版186页　大32开

本书初版于1931年，基本上是依据正、续、再续《封泥考略》三编，去其印文重复者，印面过于损坏者，删去原书的考释文字，共得周、秦、两汉封泥一千一百一十五枚，为古来封泥汇录之冠。这次重印，书前刊有韩天衡的《封泥概说》（代前言）一篇，对封泥的学术价值、艺术价值等问题作了概述。

五　其他

汉简研究文集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4年9月　文513页　插图14幅　图版16页　大32开

本书是近年来汉简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共收文章十五篇，内容包

括某些新发现简册的考释与探讨；汉简中某些问题的专题和综合研究；汉简某些资料的辑补等。

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　林梅村、李均明编　文物出版社　1984年3月　文159页　插图10幅　大32开

本世纪初叶，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我国甘肃西部疏勒河流域调查并发掘了汉代长城遗址，获得了一大批汉代文书。这批材料曾先后经法国汉学家沙畹、马伯乐、中国学者罗振玉、王国维、张凤等人进行了考释。为了便于今后的研究，本书编者重新综合、编排了这批汉代竹简，并对前人的记录和研究进行了核正，对有些简文的释文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全书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疏勒河流域汉代边塞遗址概述；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释文；汉简出土地点编号与汉简著录编号一览表。

古钱新探　朱活著　齐鲁书社　1984年6月　文317页　插图364幅　16开

本书选收研究我国古代钱币的论文共十七篇。

中国古代车马　王今栋编绘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4年9月　图260页　24开

本书搜集了我国从商周至明清的历代车马资料，其中包括实物及绘画、雕刻、装饰纹样等各种图例，并按朝代分期整理编排，展示了历代车马的发展演变过程。

伍　美术考古

一　通论

常任侠艺术考古论文选集　常任侠著　文物出版社　1984年12月　文227页　图版13幅　大32开

本书选收作者四十多年来所著艺术考古论文二十五篇，共分四个部分：（一）石刻艺术；（二）壁画；（三）乐舞百戏；（四）中外文化交流。

东方艺术丛谈　常任侠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4年6月　新1版　文348页　彩色图版6幅　黑白图版9幅　大32开

本书分上下编和续编三个部分。上编是“古典艺术初探”，论述了我们祖先在艺术上所作出的伟大成就，其中包括绘画、雕刻、音乐舞蹈、杂技等；下编是“东方文艺交流”，论述东亚各民族间文化艺术的交流关系，分别讲到印度的石窟艺术、舞蹈、绘画、音乐、木刻、歌剧等；续编是近年来的新作。

二　古代雕塑与佛教美术

汉代画像石　吴曾德著　文物出版社　1984年6月　文182页　插图114幅　大32开

本书是普及性、知识性读物。作者从历史的角度，以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汉代画像石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它们所反映的汉代的生产水平、阶级关系、文化艺术等问题。

双林寺（中国文物小丛书）　平遥县文物保管所编　文物出版社　1984年1月　文34页　插图40幅　32开

本书简要介绍双林寺概况及天王殿、罗汉殿、释迦殿、菩萨殿、千佛殿、大雄宝殿中的塑像、壁画等。

紫金庵古塑罗汉（彩色图片）　江苏吴县东山紫金庵编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4年　每套20张　16开

大足石窟　大足县文物保管所编　文物出版社　1984年6月　文37页　彩色图版16幅　黑白图版105幅　16开

本图册编选大足各处石刻精华一百二十一幅。书前有李巳生的综述性文字《大足石窟》，并刊有北山佛湾石窟的总立面图。

庆阳北石窟　泾川南石窟（中国文物小丛书）　甘肃省博物馆、庆阳北石窟文物保管所编　文物出版社　1984年1月　文34页　插图44幅　32开

敦煌遗书论文集　王重民著　中华书局　1984年4月　文346页　大32开

本书辑录了作者1935—1963年间所撰有关敦煌遗书的论文二十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通论和序、跋等文章；下编是专题或单篇作品研究论文。附录包括"敦煌的古书"、"莫高窟记"等九篇短文和书信。

三　古代建筑

中国古代建筑史　刘敦桢主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4年6月　第2版　文423页　插图212幅　大16开

本书是一部关于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的理论著作，简要而系统地叙述了我国古代建筑的发展和成就，并引证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实物记录。本书曾于1980年10月出第一版，这次再版，插图有所放大。

科技史文集（第11辑建筑史专辑（4））《建筑史专辑》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4年3月　文184页　插图164幅　16开

本辑共发表专题论文十五篇，其中有汪之力的《略论中国古代建筑》、陈从周的《湘行勘古》、张驭寰的《南方古塔概观》、张家骥的《西周城市初探》等文章；并有大量实测图和照片。

梁思成文集（第二卷）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4年8月　文371页　插图56幅　图版253幅　16开

本卷编入梁思成三十至四十年代遗稿十一篇和解放初期的文章一篇。主要内容有：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闸口白塔，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建筑设计参考图集简说第一集至第五集有关台基、石栏杆、店面、斗栱（汉—清）、图集、北平文物必须整理与保存等。

刘敦桢文集（第二卷）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4年10月　文430页　插图84幅　图版191页　16开

本卷共编入刘敦桢三十年代的文稿十二篇，包括古建筑调查研究报告《石轴柱桥述要》、《定兴县北齐石柱》、《易县清西陵》、《河北省西部古建筑调查纪略》、《北平护国寺残迹》、《苏州古建筑调查记》、《河南省北部古建筑调查记》等八篇，

古建考证一篇，笔记二篇以及书评一篇。

中国园林艺术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编辑、出版 1984年11月 文55页 插图20幅 彩色图版209幅 8开

本书精选了三十七个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古典园林，包括皇家园林、私家园林、自然风景园林和寺庙园林等典范之作，加以介绍和论述。

江南园林志 童寯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4年10月 第2版 文59页 插图31幅 彩色图版5页 黑白图版117页 16开

本书写成于1937年，初版于1963年。文字部分分造园、假山、沿革、现况、杂识五章，从泛论我国传统的造园技术和艺术的一般原则入手，有重点地介绍了江南园林的结构特点、历史沿革、兴衰演变过程及当时概况。图片部分包括版画、国画、照片、平面图等三百四十余帧。这次再版增补了许多新的资料和图片，并收入著者近作《随园考》一篇及刘叙杰为本书所写的跋。

扬州园林品赏录 朱江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84年1月 文248页 图版14页 大32开

本书是一本具有学术性和资料性的专著，包括《扬州园林品赏》、《扬州园林史话》、《扬州园林实录》、《扬州园林载述》等四个部分，最后附录有关扬州园林的书目索引，便于读者查考。

塔尔寺（画册） 青海民族出版社编辑、出版 1984年7月 文25页 彩色图版112页 12开

本画册共收彩色照片一百八十多幅，从不同的侧面介绍了塔尔寺的位置、规模、布局以及历史沿革等情况，特别是分组介绍了主要殿宇、灵塔的建筑、装饰特点，并配有简洁的文字说明。

西藏古迹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编辑、出版 1984年8月 文53页 插图12幅 彩色图版169页 8开

本书以近二百幅精美的彩色照片，介绍了西藏地区的主要建筑古迹。全书共五章，包括古建筑遗迹、古代佛教寺庙、喇嘛教各派寺庙、黄教寺庙、达赖喇嘛的宫殿，说明了这些古迹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现状。

中国历代帝王陵寝（神州风物丛书） 罗哲文、罗扬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84年11月 文232页 图版8页 32开

本书主要介绍中国帝王陵寝的源流变迁和各个不同时代的特点。按年代顺序，从黄帝陵开始，列举我国各朝著名陵区二十余处。对各陵地面、地宫的建筑特征和艺术风格，一一详加介绍。附录：《中国历代帝王陵墓简表》。

四 陶瓷与窑址

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 文物编辑委员会编 文物出版社 1984年10月 文422页 插图284幅 图版16页 16开

本书共选载窑址调查和发掘报告四十一篇、专题讨论四篇、文献资料一篇。涉及浙江、江苏、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川等十四个省和自治

区。时代上自春秋，下至明代。反映了近年来陶瓷考古工作的新收获。对于了解中国陶瓷发展史、古代窑址分布、瓷窑之间相互影响、器物分期、烧制品种以及烧造工艺等，提供了大量可靠的实物资料。

《陶说》译注 （清）朱琰撰、傅振伦译注 轻工业出版社 1984年8月 文268页 大32开

《陶说》是清朝乾隆年间朱琰撰写的我国第一本陶瓷史。原书分六卷，包括四大部分，重点的"说今"和"说明"，叙述了明清两代的代表性官窑瓷器及其制造法；"说古"和"说器"则按陶瓷器的出现顺序作了历史性的介绍。本书参考了最早的鲍刻本和辛亥革命后流通较广诸本，校正其文字，注出重要异同，必要之处加上今注及译注者按语，并附有原文今译。

五 古代绘画

中国绘画史图录（下）（中国美术史图录丛书） 徐邦达编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4年4月 目录15页 图版457—913页 16开

《中国绘画史图录》分上下两册出版。下册从明代的宋克《万玉丛图卷》至清末吴俊卿的《石榴图轴》，共选画三百三十四件，包括明清时期主要画家一百八十余人。所选作品均有简明扼要的文字说明和画家介绍。其中不少作品系首次发表。

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2〉隋唐五代绘画） 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编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4年9月 文79页 插图144幅 彩色图版168页 黑白图版11页 10开

本卷介绍了隋唐五代时期流传有绪的与新出土的绘画珍品，并通过概况论述和图版说明，系统地介绍了当时的绘画发展的历史和艺术成就。

中国古代书画目录（第一册）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 文物出版社 1984年4月 文64页 大16开

由文化部文物局成立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对全国现存古代书画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鉴定，并编印《中国古代书画目录》，按鉴定地区的先后，陆续分册出版。本册目录（不附图版）收入北京地区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美术馆、北京市文物局、首都博物馆、北京画院等十二个有关单位收存的古书画，共计二千一百九十七件，是1983年8月从北京开始的首期鉴定工作成果。这是我国首次出版的介绍国内现存古书画的藏品目录。

中国古代书画精品录（一）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鉴选 文物出版社 1984年12月 文6页 彩色图版184页 黑白图版16页 8开

中国书画鉴定组于1983年秋开始全国书画鉴定工作，首期历时三个月，在北京地区鉴定了历代书画四千八百一十件。现从中选择一百零三件精品，彩色精印成册。本册所收历代书画，多是久被秘藏未曾公之于世的。如北宋前期祁序《江山放牧图》卷、元

黄公望《溪山雨意图》卷、元倪瓒《水竹居图》轴、晋王羲之书《钟繇千字文》卷等，均是举世瞩目的稀珍。另外还有不少明清诸名家的佳作。

中国古代版画百图 周芜编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4年5月 文100页 图100页 32开

本书是一本普及读物，选编了从唐至清具有代表性的版画作品百余件，通过文图对照，对作品的内容、时代、特点及其艺术性都作了简明的介绍，为了解中国古代版画艺术提供了简要的知识。

辽代壁画选 项春松编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4年6月 文10页 彩色图版5幅 黑白图版71幅 16开

本书收录的辽代绘画艺术资料，大多为解放后辽上京、辽中京附近辽墓中发现的壁画、石棺画、木棺画，以及近年来河北、山西、吉林、辽宁及北京等地发现的部分壁画和两幅轴画，大体分为五类：契丹游牧生活图、车骑出行仪仗图、契丹奴仆侍吏图、神兽瑞祥图、山水花鸟图。全书以图为主，并有简明的文字介绍。

叶茂台第七号辽墓出土古画考 杨仁恺著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4年6月 文31页 插图7幅 16开

全书包括五个部分，对叶茂台第七号辽墓出土的两轴古画作了考察，对两幅古画出土的意义、创作年代和画的内容、辽代绘画艺术的风格特点等各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六 古代书法

书法史话（中国历史小丛书） 萧燕翼编写 中华书局 1984年3月 文60页 图版16页 32开

秦石鼓文 《历代碑帖法书选》编辑组编 文物出版社 1984年10月 文51页 16开

本书据明锡山安氏十鼓斋本影印。

汉碑大观 (清)钱泳编 北京市中国书店 1984年8月 文536页 16开

本书据上海碧梧山庄影印本影印，共八集，收汉魏诸碑计五十二种。

七 古代工艺美术

中国历代服饰 上海市戏曲学校中国服装史研究组编著 学林出版社 1984年4月 文72页 插图152幅 彩色图版362页 黑白图版350页 8开

本书按朝代分为：上古、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明、清、近代等九个部分。每个部分之前均有论述文字，对历代的服饰沿革、服饰特点及服饰制度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并附录有关文献记载和大量图版及其说明文字。书后附有“中国服饰沿革简明图表”。

永乐宫壁画服饰图案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染织美术系编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4年7月 文4页 彩色图版38页 16开

目前在染织纹样史上，元代的资料甚少。

本书所收永乐宫壁画服饰图案资料十分可贵。《前言》详细介绍

了书中资料的来源及其艺术成就。

明代雕漆图案选 故宫博物院陈列设计组编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4年3月 文8页 图114页 24开

本书是从故宫藏品中整理摹绘的明代雕漆图案纹样，内容丰富，具有特点，是研究明代雕漆的艺术风格和明代的装饰艺术的重要资料。

陆 古代科学技术

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 陈维稷主编 科学出版社 1984年4月 文438页 插图411幅 彩色图版104幅 16开

本书共分三编，第一编为原始手工纺织时期，第二编为手工机器纺织形成时期，第三编为手工机器纺织发展时期。全书内容以截止本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出土文物和历代文献记载为依据，叙述了纺织技术在中国的萌芽、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并对历代学者对纺织技术的学术总结和概括，作了一些扼要介绍，力求阐明纺织技术在中国发展的特点及规律。

中国古籍印刷史 魏隐儒编著 印刷工业出版社 1984年5月 文245页 插图68幅 大32开

本书分三编，共十二章。从雕版印刷发明前的古籍图书，古籍雕版印刷发展史，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活字印书的发展等三个方面，对中国古籍印刷史作了详细介绍，并对古籍版本的演变规律和刻印特点提出了不少自己的见解。

柒 古代文化生活

中国舞蹈史（秦、汉、魏、晋、南北朝部分） 彭松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4年6月 文157页 插图65幅 大32开

本书是在原中国舞蹈史教材编写组编著的《中国古代舞蹈史长编》的基础上整理修改而成的，是一部我国的舞蹈通史。本书共二章，阐明了秦汉魏晋南北朝舞蹈艺术发展的脉络，尤其是补充了近年来发现的考古资料。

中国舞蹈史（宋、辽、金、西夏、元部分） 董锡玖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4年6月 文145页 插图80幅 大32开

本书共三章：两宋的舞蹈；辽、金、西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舞蹈；元代的舞蹈。

捌 名胜古迹

美哉中华（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四十四处） 《旅行家》杂志编辑部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4年7月 文329页 插图143幅 彩色图版48幅 32开

本书介绍了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四十四处，内容包括每一处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历史背景、风景特色、文物古迹、建筑艺术、传奇故事、动植物、土特产等方面。每处附有导游图，并附有一百七十多幅插图。

已审阅
子居 10-03-13，13:26

准噶尔的历史与文物 王宏钧、刘如仲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4年3月 文186页 彩色图版45幅 大32开

本书结合文献与文物，以重点历史事件为主要线索，对准噶尔的历史予以比较系统的探讨和简要的叙述。

关中八景史话 王聚保编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4年9月 文108页 图版8页 24开

作者对收藏在西安碑林内的关中八景石碑进行了实地参观和考证，参考有关史书中记载的古代长安园林和与其相关的大量诗文，编写成《关中八景史话》。书中对关中八景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

北宋都城东京 吴涛编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4年8月 文173页 图版4页 32开

本书以丰富的资料，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北宋东京一百六十年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风土人情、名胜古迹等概况。

桂林简史 曾度洪等编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4年3月 文256页 插图68幅 图版4页 大32开

本书共分九章，对历代桂林政治、经济、文化和旅游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梗概。

广州史话（地方史话） 徐俊鸣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年10月 文176页 插图59幅 32开

本书对广州历史的发展及名胜古迹作了全面介绍。

云南文物古迹（云南丛书） 李昆声编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4年8月 文232页 插图62幅 彩色图版4页 黑白图版4页 大32开

本书分为十二个部分，主要内容包括：云南的原始文化、商代至清代的重要遗址和墓葬、历代碑刻、佛教造型艺术、绘画艺术、古塔、古代建筑、古代城市和城址、古代乐舞等。

附：

1983年考古学书目补遗

壹 总类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博物馆丛书第二卷） 湖南省博物馆编 文物出版社、日本讲谈社 1983年12月 文66页 彩色图版123幅 黑白图版73幅 8开

本书主要内容分为：新石器时代陶器、商周青铜器、楚文物、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湘阴窑和长沙窑瓷器及其他文物等共六类。除分类综述外，对每件器物还作了简要的说明。卷前有湖南省博物馆副馆长高至喜撰写的序，简要地介绍了该馆的历史、现状和藏品情况。

辽宁省博物馆（中国博物馆丛书第三

卷） 辽宁省博物馆编 文物出版社、日本讲谈社 1983年12月 文66页 彩色图版129幅 黑白图版63幅 8开

本书选录辽宁省博物馆藏文物精品一百九十二件，分为青铜器、朝阳十二台营子等地青铜短剑墓葬出土文物、西丰西岔沟匈奴墓出土文物、北燕冯素弗及鲜卑墓葬出土文物、朝阳唐墓出土文物、辽墓和辽塔出土文物、绘画、书法、丝绣、陶瓷十个部分介绍。对每个部分的文物均有概述性说明，对每件文物的历史艺术价值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杨仁恺撰写的序言载于卷首，对辽宁省博物馆的历史及藏品情况作了介绍。

广州博物馆 广州博物馆编 文物出版社 1983年5月 文62页 插图48幅 32开

本书主要内容为《广州历史陈列简介》，书后附《广州历史大事简记（新石器时代晚期至1921年广州市成立）》。

敦煌县博物馆 敦煌县博物馆编 文物出版社 〔1983年〕 文1页 彩色图版10页 折叠32开

这是一本简介性的读物，介绍了该馆重点展出的敦煌境内的出土文物。

中国名胜词典（河南分册） 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主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3年6月 文68页 插图28幅 图版2页 32开

贰 田野考古资料

叁 考古学分论

山东古国考 王献唐著 齐鲁书社 1983年11月 文280页 插图31幅 16开

本书作者从研究铜器铭文出发，充分利用金石资料，广泛征引文献古籍，考察了商周时代山东的姜姓国族㠱国、莱国、纪国、淳于国和妘姓国族杞国、娄国、诸国，以及与薛同祖的邳国，对这些古国的兴起、变迁、衰亡，和它们的历史地理、社会制度，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推测。

满城陵山汉墓（中国文物小丛书） 河北省博物馆编 文物出版社 1983年10月 文34页 插图57幅 32开

本书简要介绍满城汉墓及其出土文物。书末附“西汉中山王世系简表”和英文内容提要。

肆 考古学专论

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 温少峰、袁庭栋编著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3年12月 文391页 16开

本书综述和研究了卜辞中所反映的殷代科学技术，全书共八章，包括：天文学、历法、气象学、农业、畜牧、交通与驿传、医学、手工业。

三代吉金文存 罗振玉编 中华书局 1983年12月 3册 文160页 图版2044页 16开

本书是罗振玉所藏金文拓本的汇集，共收商周青铜器铭文四千八百余器，鉴别精严，在学术界享有一定的声望。本书于1937年初版，这次重印采用罗氏原印本制版，一仍旧贯，不作任何更改。卷末附有孙稚雏的《三代吉金文存辨正》一文，对使用本书应注意的问题，逐项讨论，以便读者参考。

新出金文分域简目（考古学专刊乙种第二十二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 中华书局 1983年5月 影印本 文225页 16开

本书收录建国后至1981年底以前公开发表的各地新出土的殷周金文资料（包括战国时期）。每项资料，标明其出土地点、年代、出土情况、资料来源、参考文献，并照录每件铜器铭文的释文。对于传世铜器，出土地点可考者，分域列出，作为附录。解放后各文博单位新发表的出土地点不可考的传世铜器，以收藏单位为纲，一一列出，作为附录二。

秦刻十碣考释 罗君惕著 齐鲁书社 1983年12月 影印本 文322页 16开

本书分为正名、原流、字数、考异、释文、时代，共六个部分。

古图形玺印汇 康殷辑 河北美术出版社 1983年8月 文15页 彩色图版270页 长20开

本书包括：人物形玺印、兽畜形玺印、带纹饰的文字印、虫鸟篆文印五个部分。《前言》对古图形玺印的年代、范围、内容及其制法等问题作了概述。

古肖形印臆释 王伯敏编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83年9月 文127页 插图417幅 16开

本书选录古肖形印释文六十则。书后附有《古代肖形印概述》一文，对肖形印的形成、发展和用途进行了分析。附录二《古代肖形印缀编》，将所收肖形印分为四类：人事、走兽、飞禽、其他，对每方印的时代、形制、出处，按次标注于每辑之后。

二百兰亭斋古铜印存 （清）吴云编辑 西泠印社 1983年12月 文119页 16开

本书共收秦汉官私铜印七百余方，是研究我国印章发展历史及学习我国古代篆刻艺术的必备之书。

伍 美术考古

秦始皇陵兵马俑 陕西省秦陵考古队、中国旅游出版社合编 中国旅游出版社 1983年8月 文208页（内彩色图版218幅） 8开

本画册由二百余幅大帧彩色照片及六万字说明组成。内容分为：秦始皇陵兵马俑（概述）；骊山脚下的考古现场；秦兵马俑军阵；秦俑的雕塑、烧制和兵器制造；秦俑的艺术欣赏；漫话秦陵兵马俑等六个部分。其中大多数照片是第一次发表。画册的主要文字由秦陵考古队的研究人员撰写，书前有王朝闻写的前言。

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 刘志远等编著 文物出版社 1983年12月

文149页 插图149幅 图版8页 大32开

本书从六个方面对画像砖进行探讨：一、郡县生活的侧影；二、农业生活；三、城市、商业与水陆交通；四、地主官吏的生活；五、舞乐百戏；六、神话。

中国古建筑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3年10月 文30页 彩色图版144页 黑白图版72页 8开

全书有反映历代古建筑的图片近三百张，许多重点古建筑附有平、立面插图。图片大多为彩色照片，其中一些是初次发表的古建筑照片。图版前有专论一篇，论述了中国古建筑的历史概况和建筑技术与艺术的成就。书末附有古建筑大事年表。

中国陶瓷·定窑 中国陶瓷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3年9月 文24页 彩色图版166幅 8开

本书选收唐五代至现代定窑瓷器一百六十六件。文字部分包括冯先铭的《定窑》一文，简要论述了定窑的烧瓷历史、瓷器分期及特征、瓷器铭文等问题。书后的附录有《历代文献著录》和《各地出土定窑瓷器》。

中国陶瓷·越窑 中国陶瓷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3年9月 文20页 彩色图版210幅 8开

本书选收春秋战国时期至现代越窑陶瓷器二百一十件。文字部分有朱伯谦的《越窑》，全面介绍了越窑的开创年代、造型与装饰艺术、器形的演变等问题。

中国陶瓷·景德镇彩绘瓷器 中国陶瓷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3年9月 文17页 彩色图版169幅 8开

本书选收景德镇彩绘瓷器一百六十七件。文字部分有汪庆正的《景德镇彩绘瓷器》论述一篇。

中国陶瓷·广东陶瓷 中国陶瓷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3年9月 文22页 彩色图版183幅 8开

本书选收新石器时代至现代广东陶瓷一百八十三件。文字部分包括曾广亿、宋良壁的《广东陶瓷的历史》和陈衡的《广东现代陶瓷》两篇。

中国陶瓷·石湾窑 中国陶瓷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3年9月 文24页 彩色图版189幅 8开

本书选收石湾窑陶瓷作品一百八十八件。文字部分包括曾广亿的《古代石湾陶器》和何炽垣的《石湾窑的陶塑艺术》两篇。

中国历代绘画（故宫博物院藏画集〈Ⅳ〉元代部分） 故宫博物院藏画集编辑委员会编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3年12月 文22页 插图51幅 彩色图版85页 6开

本册收入的是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元代绘画精品。附录部分包括作品简介、题跋选印、历代著录资料。

龟兹壁画线描集 潘丁丁等绘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3年3月 文2页 图137页 24开

本画集所选集的，是作者在龟兹

地区石窟所描绘的一部分壁画的线描稿。

苏州瑞光塔北宋四天王像 苏州市博物馆编 文物出版社 1983年2月 彩色图版4幅 4开 盒装

在苏州瑞光塔发现的文物中，真珠舍利宝幢内木函外壁的四天王彩绘是宋画中不可多得的珍品。现藏于苏州市博物馆。

苏州瑞光塔北宋四天王像 苏州市博物馆编 文物出版社 1983年6月 彩色图版16幅 32开 套装

中国书法简史 包备五编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83年11月 文73页 图版32页 32开

本书讲述的内容，起于先秦，迄于清代。全书共分九个单元。在每个单元中，都先扼要地叙述这一时代的书法发展概况和特点或某些重大问题，然后介绍一些著名书法家，另外附带讲一些有代表性的碑帖。

颜真卿（第四册）（中国书法） 中国书法编辑组编 文物出版社 1983年1月 文277页 8开

本册有《工部尚书上蔡县开国侯臧怀恪碑》、《干禄字书》、《唐茅山元靖先生广陵李君碑》。

中国古代图案 北京纺织科学研究所编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3年3月 第2版 文1页 图129页 24开

本画册内容包括我国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图案资料。其中分为：陶瓷器图案、铜器图案、玉器图案、砖瓦石刻图案、漆器图案、织绣图案、其他图案，共七个部分。

陆 古代科学技术

古代经济专题史话（中国历史小丛书合订本） 中华书局编辑 中华书局 1983年10月 文342页 插图88幅 32开

本书是一本普及性历史知识读物。共分九个专题，即原来的九本小册子：《五谷史话》、《蚕业史话》、《丝绸史话》、《货币史话》、《邮电史话》、《漕运史话》、《古代桥梁史话》、《古代建筑史话》和《古代飞行的故事》。

造纸史话（中国科技史话丛书） 《造纸史话》编写组编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3年11月 文195页 插图98幅 彩色图版4页 32开

本书以史话的形式对我国古代造纸技术的发明、发展、传播和各种古纸的特点、制造方法、原料变迁、特种用途都作了介绍。

柒 古代文化生活

中国古代乐器（中国文物小丛书） 吴钊编 文物出版社 1983年10月 文48页 插图107幅 32开

本书以考古发掘出来的乐器为主，简明地介绍了乐器的产生、发展过程、音乐性能和制作工艺等。附有“我国主要古代乐器简目”和英文内容提要。

捌 名胜古迹

明十三陵 刘锋编 中国旅游出版社

1983年10月 文34页 插图13幅 40开

本书是一本通俗性小册子，简要介绍了十三陵的名胜古迹及定陵的第一、第二陈列室。

承德史话（地方史话） 金涛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年7月 文118页有照片 32开

本书介绍了承德市的历史沿革、热河避暑山庄的兴建、外八庙的政治意义、抗击沙俄侵略的历史丰碑、近代史上避暑山庄的衰落、解放后承德市的新生等内容。

中州胜迹概览 陈显泗著 中州书画社 1983年3月 文199页 32开

本书介绍了洛阳、开封、嵩山三个地区的名胜古迹。

郑州胜迹（河南名胜古迹丛书） 杨育彬、冯百毅编著 中州书画社 1983年9月 文71页 有照片 32开

本书介绍的是郑州市内及郊区的名胜古迹。其中包括原始社会村落遗址四处；商代都城；纪公庙；虎牢关；大周山上千尺塔；明代王陵和壁画墓；冷暖泉；二七纪念堂和纪念塔等。

汴京八景及其它 开封人民广播电台、开封市文管会合编 中州书画社 1983年5月 文69页 36开

本书以散文的笔法，介绍了古都开封历史上的风景与名胜。内容包括汴京八景、漫话龙亭、山陕会馆新貌、包公南衙、贡院春秋、相国寺琐谈、宋徽宗与太湖石、天波杨府、陈桥访古。

潮州揽胜 方慧生、蔡泽民编 花城出版社 1983年12月 文93页 插图8幅 彩色图版16页 32开

本书介绍的文化古迹中，有距今一千多年的艺术瑰宝唐开元寺，有明代的北阁、龙湫宝塔等等，显示了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高度成就。

考古学论文资料索引

（刊名后第一个数码是期，第二个是页）

壹 总类

一 综论

什么是考古学 夏鼐 考古10:931—935

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考古10:865—871

考古——跨入黄金时代 谷延 光明日报9月17日

马克思主义与考古学 许顺湛 中原文物1:42—47

中国考古学和中国科技史 夏鼐 考古5:427—431

回顾和展望——《考古》二百期纪念 夏鼐 考古5:385—387

关于考古学命名问题的讨论 夏超雄 考古与文物1:1—4

简论农业考古 陈文华 农业考古2:1—12

辛勤与欣慰——为《农业考古》创刊四周年而作 黄展岳 农业考古2:

13—14

农业考古与人类学研究 陈国强 农业考古2:16—17

原始农业考古的几个问题——为纪念《农业考古》创刊四周年而作 张忠培 农业考古2:18—20

农业考古与现代考古学 严文明 农业考古2:31—33

我国西南地区在考古学和古人类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贾兰坡 云南社会科学3:71—73

中国古人类学的迅速发展——纪念北京猿人第一头盖骨发现五十五周年 吴汝康 人类学学报3·4:297—303

古代中国人种成分研究 韩康信、潘其风 考古学报2:245—263

试论我国古城形制的基本模式 马世之 中原文物4:59—65

建国三十五年来陕西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 《考古与文物》编辑部 考古与文物5:1—9

光辉的历程巨大的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 本刊编辑部 文博2:1—5

云南考古三十五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而作 李昆声 云南社会科学5:30—39

中原地区古代文化发展序列的缩影——记登封告成地下古代文化遗存 安金槐 史学月刊3:1—8

白泥窑子考古新收获 崔璇、斯琴 内蒙古社会科学1:72—76

对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作考古学与历史学的考察 佟柱臣 社会科学战线1:189—197

建国三十五年来河南文物保护工作概述 河南省文化厅文物局秘书科 中原文物3:1—4

河南地下文物新发现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 河南省文化厅文物局地下文物科 中原文物3:5—13

河南地上文物放异彩 河南省文化厅文物局地上文物科 中原文物3:14—21

碳十四年代测定报告（五） 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碳十四实验室 文物4:87—91

碳十四年代测定报告（六） 北京大学考古系碳十四实验室（陈铁梅、原思训等） 文物4:92—96

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一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 考古7:649—653

二 纪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发表一百周年

《起源》对西方史前考古学的影响——纪念《起源》发表一百周年 孔令平 史前研究2:8—19

一部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世界观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著作——纪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发表一百周年 洪成得 史前研究3:1—7

恩格斯论氏族的起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有关论述学习札记 程德祺 史前研究3:8—13

《起源》是指导史前研究的光辉指南——纪念《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发表一百周年笔谈会 史前研究4:1—2

血族关系和阶级关系 日知 史前研究4:2—3

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史前学的奠基人

杨堃 史前研究4:3—5
学习《起源》，开创史前文化研究的新局面 石兴邦 史前研究4:5—7
学习《起源》，促进史前考古学的科学研究 佟柱臣 史前研究4:7—8
恩格斯的《起源》和郭沫若的《研究》 斯维至 史前研究4:8—9
谈《起源》对于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指导作用 李仰松 史前研究4:9—11
发展民族学和史前学研究的合作 宋恩常 史前研究4:11
实事求是，推进史前史研究 张忠培 史前研究4:11—12
科学原始社会史的伟大奠基人 刘士莪 史前研究4:12—13
史前考古学的理论基础 严文明 史前研究4:13—14
开创史前研究的新局面 宋兆麟 史前研究4:14—15
《起源》与原始社会研究 陈国强 史前研究4:15—16
史前史科研理论体系的探讨与血缘家庭的研究 刘达成 史前研究4:16—17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理论上的伟大贡献 何介钧 史前研究4:17—18
经济分析原始社会史的典范 范志文 史前研究4:18—20
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 齐鸣 史前研究4:20—22
试论中国古代的军事民主制——纪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发表一百周年 李仰松 考古5:432—438
关于我国奴隶制的起源问题 纪念恩格斯《起源》发表一百周年 宋兆麟 史学月刊5:7—14

三 考古学史与考古学家传记

义不苟生——甲骨文的发现者王懿荣 赵洛 文物天地2:21—22
尹达先生逝世周年祭 王震中 中原文物2:1—3
尹达同志与《史前研究》——纪念尹达同志逝世一周年 巩启明 史前研究3:100—101
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教授逝世 江汉考古3:34
学续段王谊深籍湜——悼念于思老 罗继祖 史学集刊4:1—3
怀念于省吾先生学习于省吾先生 姚孝遂、陈世辉等 史学集刊4:3—4
悼念于省吾先生 本刊编辑部 博物馆研究3:127—128
容庚教授著作书录及论述年表 陈修纮 中山大学学报3:137—148
容庚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治学方法 张振林 学术研究4:89—93
夏鼐教授接受瑞典皇家文学、历史、考古科学院外国院士证书 子明 考古3:285
夏鼐教授被授予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称号 子明 考古10:871
探索与追求（《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编后记） 俞伟超、张忠培 文物1:1—9
不当外行领导——记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张颔 安塞 人物4:86—91
河南考古小史 李绍连 中原文物1:48—52

四 文物政策、法令与文物保护工作

文化部最近发出通知 考古发掘要严

格执行报批手续　文汇报2月25日
全国文物工作会议强调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工作　光明日报5月8日
文物保护技术概论　周宝中　博物馆研究3：120—126
文物的科学保护　卓肺　文博1：97—100
浅谈文物利用与保护的关系问题　高和　文博3：91—92
文物环境质量评价问题　王翰章　文博2：101—105
文物是什么？　彭卿云　文物天地3：44—45
文物有哪些价值和作用？谢辰生　文物天地3：44—46
文物怎样分类？　史树青　文物天地3：46—47
文物摄影的特性　李昕　博物馆研究2：112

五　考古学方法与技术

遗址的磁气探查　（日本）田中琢·西村康·岩本圭辅　李秀琴译　文博3：93
考古遗物的保存法——以现场脆弱遗物的处理法为中心　（日本）沢田正昭、秋山隆保　王峻译　文博1：91—96
考古发掘中彩绘木器的清理和起取　王振江　考古3：278—282
墓室的密封性与文物保存状态　后德俊　江汉考古2：89—94
考古绘图的一点体会　李爱云　中原文物1：74—78
考古绘图浅谈　刘萱堂　博物馆研究2：105—111
铀子系法测定骨化石年龄的可靠性研究及华北地区主要旧石器地点的铀子系年代序列　陈铁梅、原思训等　人类学学报3·3：259—269
用自然科学方法进行农业考古研究的新途径　陈健　农业考古2：33—35
零散人肢骨材料在考古上的采用　刘振华　博物馆研究3：80—84
碳十三测定和古代食谱研究　蔡莲珍、仇士华　考古10：949—955
概率分析方法在考古学中的初步运用——以陕西渭南史家墓地的墓葬为分析对象　朱乃诚　史前研究1：85—104
用物料平衡法研究古代冶金遗址　刘云彩　中原文物1：70—73
战国曾侯乙编磬的复原及相关问题的研究　湖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研究所（冯光生、徐雪仙）文物5：60—65
鹿角马镳的清理和修复　阎桂珍　博物馆研究2：113—114
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形图拼接复原中的若干问题　张修桂　自然科学史研究3·3：266—274
摩尼殿壁画揭取、修复的技术操作　祁英涛、李士莲等　古建园林技术1：2—10

贰　考古学分论

一　人类起源及旧石器时代

人类起源的新争论　吴汝康　百科知识10：42—43
有关“露西”和人类进化系统的争论——两种解释和三个系统　吴汝康　自然杂志7·5：356
论人猿相揖别的变化条件——第四纪大冰期是古猿向人转化的外因　景

才瑞 华中师院学报（自然）1:93
Ursavus在中国的首次发现——并记禄丰古猿化石产地的其它熊类标本 祁国琴 人类学学报3·1:53—61
有关早期人科成员食性的几个假说和探讨方法 张银运 人类学学报3·1:76—80
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的形态特征及其系统关系——下颌骨的形态与比较 吴汝康、陆庆五等 人类学学报3·1:1—10
云南禄丰晚中新世的长臂猿类化石 吴汝康、潘悦容 人类学学报3·3:185—194
鄂西"南方古猿"和印尼早更新世若干人类化石 张银运 人类学学报3·2:85—92
五年来中国旧石器文化的研究——纪念北京猿人第一头盖骨发现55周年 张森水 人类学学报3·4:304—312
关于元谋人年代的两种不同意见 李平生 自修大学11:42
中国早期人类化石层位与黄土——深海沉积古气候旋回的对比 刘东生、丁梦林 人类学学报3·2:93—101
试论郧县猿人的生存时代 刘华才 江汉考古1:69—75
陕西化石人类及其文化遗存 巩启明 史前研究2:20—25
陕西蓝田锡水洞遗址自然环境研究 黄春长 西北大学学报(自然)1:71
锡水洞遗址古地理环境、用火遗迹及时代问题 黄春长 史前研究1:1—6
和县动物群与深海沉积物的对比 徐钦琦、尤玉柱 人类学学报3·1:62—67
和县猿人时代的气候 徐钦琦 人类学学报3·4:383—391
安徽巢县发现的人类枕骨化石和哺乳动物化石 许春华 张银运等 人类学学报3·3:202—209
鲤鱼桥与观音洞文化关系初探 范桂杰、胡昌钰 考古与文物4:39—41
论山西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规律 李壮伟 考古与文物3:43—48
广西古人类的发现与研究 蒋廷瑜、彭书琳 史前研究2:26—33
论华北旧石器晚期遗址的分布、埋藏以及地质时代问题 尤玉柱 人类学学报3·1:68—75
白莲洞遗址的发现及其意义 周国兴 史前研究2:109—110
柳州化石智人的身高 吴新智、张振标等 人类学学报3·3:210—211
广西柳江土博出土的人牙化石及共生的哺乳动物群 李有恒 吴茂霖等 人类学学报3·4:322—329
陕西乾县的旧石器 邱中郎 人类学学报3·3:212—214
资阳人B地点发现的旧石器 李宣民、张森水 人类学学报3·3:215—224
丽江木家桥新发现的旧石器 卫奇、黄慰文等 人类学学报3·3:225—233
黑龙江昂昂溪的旧石器 黄慰文、张镇洪等 人类学学报3·3:234—243
阳原石核的动态类型学研究及其工艺思想分析 盖培 人类学学报3·3:244—252
陕西黄龙人头盖骨的多元分析比较研究 王令红、冈特·布罗尔 人类学学报3·4:313—321

贵州普定县穿洞古人类化石及其文化遗物的初步研究　俞锦林　南京大学学报（自然）1:145

吉林前郭查干泡发现的人类化石与古态环境　尤玉柱、张振标等　史前研究4:70—74

论许家窑文化发现的学术意义　李壮伟　山西大学学报3:84—87

太原古交旧石器晚期遗存的发现　王向前、陈哲英　史前研究4:55—62

试论下川文化与小南海文化之间的关系　吴加安　考古与文物1:100—106

介绍台湾发现的古人类化石　李家添　史前研究4:104—105

关于石片台面的分类　李炎贤　人类学学报3·3:253—258

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弓箭？　贾兰坡　郑州大学学报4:1—4

二　新石器时代

综论

碳—14断代和中国新石器时代　安志敏　考古3:271—277

略论华北的早期新石器文化　安志敏　考古10:936—944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几个问题的探讨　张之恒　考古与文物1:86—91

关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几个问题　张之恒　史前研究3:57—62

试论横断山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几个问题　张建世　史前研究4:42—50

试论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途径　乔晓勤　史前研究3:41—46

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　严文明　史前研究1:36—44

我国考古材料中反映的原始社会　曾骐　中山大学学报3:63—67

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海岱历史文化区　高广仁　邵望平　史前研究1:7—25

释新石器时代的"割体葬仪"　容观夐　史前研究4:23—25

原始社会已经有骨、角、木、陶质器，为什么只称它是石器时代？　浩波　文物天地5:42

从原始人墓葬中可以看到当时社会制度的哪些方面？　申男　文物天地5:41

原始社会文化遗存指什么？　杨升南　文物天地5:40

史前先民的形象　知原　历史知识5:40—42

从文身看原始宗教和艺术　许良国　学术月刊　2:66—70

母权制时期私有制问题的考察　张忠培　史前研究1:26—35

谈谈同性埋葬习俗　夏之乾　史前研究4:98—103页

中国原始社会生物学思想的萌芽　甄朔南　史前研究1:77—84

投石器和流星索——远古狩猎技术的重要革命　宋兆麟　史前研究2:99—108

民族形成问题和新石器时代人们共同体的称谓　田继周　民族研究6:60—66

人类历史上究竟有没有木器时代　戴尔俭　史前研究3:47—56

黄河流域

陕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张瑞岭、范志文　人文杂志1:120—124

关于老官台文化的新认识——兼谈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存　郎树德、赵建龙　考古与文物6:56—63

公元前两千年以前黄河中上游彩陶文化的演变 华泉 史学集刊3:75—78
试论后岗仰韶文化的年代和分期 吴耀利 考古与文物6:69—74
试论大河村仰韶文化的分期及类型 郭引强、赵清 中原文物4:33—39
浅析仰韶文化早期的氏族制度 聂玉海 殷都学刊1:85—89
下王岗新石器时代居民的种族类型 张振标、陈德珍 史前研究1:68—76
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古城址试析——兼论登封王城岗遗址非夏都阳城 马世之 史前研究2:51—56
河南龙山文化的社会经济基础 叶万松、余扶危 中原文物3:81—85
汉水上游和渭河流域"前仰韶"新石器文化的性质问题 吴加安等 考古11:1012—1019
姜寨史前居民图腾初探 高强 史前研究1:63—67
半坡类型社会制度研究的进展 华泉 史学集刊1:73—78
从埋葬制度探讨社会制度的有益尝试——《元君庙仰韶墓地》读后 严文明 史前研究4:106—109
商县紫荆第四期文化遗存试析 梁星彭、陈超 考古与文物3:49—52
也谈客省庄二期文化的性质及其年代 高煦、吴宇 史前研究4:28—35
山西怀仁窑子头的细石器遗存 陈哲英、丁来普 史前研究4:63—69
龙山文化陶寺类型的年代与分期 高天麟、张岱海等 史前研究3:22—31
东下冯和南礼教龙山文化遗存初析 崇黛 史前研究4:36—41
《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读后 朱延平 考古9:833—836
东下冯"龙山文化早期遗存"的再认识 李健民 考古9:837—841
晋南庙底沟二期文化分期试探 张岱海、高天麟等 史前研究2:34—42
大汶口墓葬出土的酒器 李健民 考古与文物6:64—68
两城类型分期问题初探 吴汝祚 杜在忠 考古学报1:1—22
有关岳石文化的几个问题 赵朝洪 考古与文物1:92—99
胶东史前文化与莱夷的历史贡献 宋承钧、史明 东岳论丛1:84—87
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稷与大麻 西北师范学院植物研究所、甘肃博物馆（王庆瑞、郭德勇） 考古7:654—655
齐家文化起源探讨 梁星彭 史前研究3:32—40
寺洼文化墓葬葬式浅析 云翔 史前研究4:51—54
青海地区原始社会生活初探 陈国显等 青海社会科学1:68

长江流域

为什么说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民族文化摇篮 黄崇岳 文物天地6:35
对大溪文化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王杰 江汉考古1:61—68
试论安乡划城岗遗址的两个问题 孺兴 江汉考古3:49—55
浅谈大溪文化的陶支座 卢德佩 史前研究4:26—27
关于江汉地区新石器晚期文化类型的几点认识 范勇 史前研究2:43—50
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剖析 黄宣佩 史前研究3:14—21

江苏青墩古人生活时期的地理环境 黄赐璇等 地理学报39·1:97
浙江省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及其文化内涵 王心喜 杭州师院学报1:96
河姆渡文化——七千年长江流域的史迹 汪济英、孙志江 人民画报2:28—31
河姆渡文化"蝶形器"的用途和名称 王仁湘、袁靖 考古与文物5:64—69
良渚文化"玉敛葬"述略 汪遵国 文物2:23—36

东北地区

关于扎赉诺尔文化年代的一点意见 张森水 人类学学报3·4:392—394
座谈东山嘴遗址 俞伟超等 文物11:12—21
三星他拉红山文化玉龙考 孙守道 文物6:7—10
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 孙守道、郭大顺 文物6:11—17
试谈辽宁出土的环状石器与石棍棒头 许玉林 博物馆研究2:83—90
夏家店下层文化若干问题研究 李恭笃、高美璇 辽宁大学学报5:50—56
大连郭家村遗址的动物遗骨 傅仁义 考古学报3:331—334
我国东北地区的环状石器——考古工作札记之一 张绍维 黑龙江文物丛刊1:45—50

其他地区

广西贝丘遗址初探 何乃汉 考古11:1021—1029
南宁地区新石器时代墓葬剖析 覃彩銮 考古11:1030—1036
贵州高原的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康健文 贵州文史丛刊1:71—79
飞虎山洞穴遗址的试掘与初步研究 李衍垣、万光云 史前研究3:63—77

三 夏文化探索

近年来夏史与夏文化研究概述 曲英杰 中国史研究动态1:7—13
有关夏文化探索的几个问题 殷玮璋 文物2:55—62
二里头文化再探讨 殷玮璋 考古4:352—356
河南龙山、二里头与二里岗 方酉生 考古与文物3:53—57
登封王城岗与"禹都阳城" 杨宝成 文物2:63—66
禹居阳城与王城岗遗址 京浦 文物2:67—69
关于登封王城岗遗址几个问题的探讨 贾峨 文物11:63—68
王城岗城堡遗址分析 董琦 文物11:69—72
王城岗遗址出土的铜器残片及其它 李先登 文物11:73—75
夏文化的探索 安金槐、张建中 人民画报5:39—41

四 商代

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闭幕词 胡厚宣 中原文物4:115—116
商族的来源地望试探 王玉哲 历史研究1:61—77
商代城市初探 邵鸿 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113—121
偃师商城的发现及其意义 黄石林、赵芝荃 光明日报4月3日
偃师商城即太甲桐宫说 邹衡 北京大学学报4:17—19

关于偃师商城的年代和性质问题 郑杰祥 中原文物4:66—70
漫谈新发现的偃师早商古城 徐殿魁 中州今古5:27—28
藁城台西商代遗址 唐云明 河北学刊4:110—112
郑州的商代文化 李民 史学月刊2:7—16
关于郑州商代南关外期及其他 仇祯 考古2:178—182
殷墟墓葬发掘与研究 杨宝成 殷都学刊2:10—14
关于殷墟和武官村大墓的问题 辛夷 史学月刊5:101—103
殷墟都城与山西方国考略 张亚初 古文字研究 10:388—404
安阳小屯与甲骨 孟世凯 中州今古4:62—63
商代的粮食量器——对于商代陶大口尊用途的探讨 安金槐 农业考古2:312—322
殷周青铜镬论略 陈振中 江汉考古3:56—58
殷周的青铜锯 陈振中 考古1:77—82
商周青铜钺 陈旭、杨新平 中原文物4:71—75
商代铜尊、鱼钩和陶抵手 张吟午 江汉考古3:108—109
殷代车子的发现与复原 杨宝成 考古6:546—555
殷商牛耕说献疑 夏麦陵 农业考古2:139—143
试论铜铁合制器物的产生与消亡 吴大林 考古与文物3:109—112
湖南商周时期与文化的分区探索 何介钧 湖南考古辑刊2:120—127
宜昌地区长江沿岸夏商时期的一支新文化类型 林春 江汉考古2:29—38

五 西周

先周文化的初步研究 尹盛平、任周芳 文物7:42—49
漫话周原 孙移泰 教学与科研(哲社)2:101
从岐山凤雏村房基遗址看西周的家族公社 李西兴 考古与文物5:70—75
宗周与成周——兼探《何尊》"佳王初鄙宅于成周"的含义 刘蕙孙 人文杂志1:88—90
记北京琉璃河遗址出土的西周漆器 殷玮璋 考古5:449—453
黄陂鲁台山M30与西周康王时期铜器墓 刘启益 江汉考古1:50—60
论鲁台山西周墓的年代和族属 张亚初 江汉考古2:23—28
谈偃师南寨村出土的西周铜铲 蔡运章 中原文物3:86—88
谈青铜剑 刘旭 历史知识5:43—45

六 东周

试论吴文化的渊源 乔晓勤 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3—100
绍兴坡塘出土徐器铭文及其相关问题 曹锦炎 文物1:27—29
绍兴306号越墓刍议 牟永抗 文物1:30—35
绍兴306号墓小考 钟遐 文物1:36—37
"炉"与"卢" 陈伟 文物7:90
秭归官庄坪周代遗址初析 胡雅丽、王红星 江汉考古4:74—79
淅川下寺二号楚墓墓主小议 胡顺利 江汉考古3:69

浅谈江陵楚墓出土的青铜剑　陈耀钧　考古与文物2:78—82
楚铭刻中"陵、陲"的考辨及其相关问题　黄盛璋　安徽史学1:41—46
盱眙新出铜器、金器及相关问题考辨　黄盛璋　文物10:59—64
长沙出土楚服饰浅析　熊传新　湖南考古辑刊2:175—180
凤斗龙虎图象考释　张正明、滕壬生等　江汉考古1:96—100
试论楚国铁器　黄展岳　湖南考古辑刊2:142—157
曾国灭亡年代小考　刘彬徽、王世振　江汉考古4:91—92
纪、曩、莱为一国说　王恩田　齐鲁学刊1:71—77
莱国与莱夷古文化探略　杜在忠　东岳论丛1:74—77
刘家店子春秋墓琐考　罗勋章　文物9:11—13
田齐六陵考　张学海　文物9:20—22
试论中山国的族姓及有关问题　孙华　河北学刊4:72—76
戈戟之再辨　郭德维　考古12:1108—1113
湖南东周时期铜戈的分期及有关问题　金则恭　湖南考古辑刊2:158—166
带矛车軎与古代冲车　彭邦炯　考古与文物1:109—112
中国北方青铜短剑的分期及形制研究　郑绍宗　文物2:37—49
试论我国北方和东北地区的"触角式"剑　张锡瑛　考古8:744—751
丹东地区出土的青铜短剑　许玉林、王连春　考古8:712—714
试论西团山文化中的青铜器　刘景文　文物4:38—44
《史记》中所见秦早期都邑葬地　李零　文史第二十辑:15—23
先秦从死从葬制度初探　尚志儒　文博2:15—22

七　秦

阿房宫辨正　王学理　考古与文物3:74—78
"丽山"与"丽邑"　刘占成　文博3:78—82
敖仓故址考　荆三林、宋秀兰等　中原文物1:22—26
秦始皇陵园布局结构的探讨　杨宽　文博3:10—16
秦俑坑发掘记　屈鸿钧　文博1:74—76
秦始皇不是兵马俑坑的主人　孙特　光明日报10月10日
文物考古专家聚会西安得出结论秦俑坑的主人是秦始皇　文汇报11月1日
秦陵兵俑衔级试解　陈孟东　文博1:61—69
秦俑面形和表情　王玉清　文博1:70—73
秦俑发式和阴阳五行　林剑鸣　文博3:54—56
论秦俑与秦亡　吴于棠　文博3:57—59
秦始皇的铜车马　郭伯南　文史知识7:114—119
秦陵二号铜车马　张文立　人文杂志1:128
秦陵彩绘铜车结构规格　程学华、周柏龄　文博1:77—82
鞭与策　代冲　文物5:75
秦俑坑出土的古代链条　郭长江　文博2:75—77
秦始皇万里长城首起处遗迹求索　巩

如旭　西北史地2:97—103
甘肃境内秦长城遗迹调查及考证　陈守忠　西北史地2:88—96
秦汉瓦当管见　王丕忠　文博1:26—29
秦中央督造的兵器刻辞综述　袁仲一　考古与文物5:101—112
云梦睡虎地秦墓漆器针刻铭记探析——兼谈秦代"亭"、"市"地方官营手工业　肖亢达　江汉考古2:67—72
略论四川的秦人墓　宋治民　考古与文物2:83—90

八　两汉

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探讨　杨宽　文博1:19—24
长陵建制及其有关问题——汉刘邦长陵勘察记存　石兴邦、马建熙等　考古与文物2:32—45
长沙国述略　傅举有　求索3:106—113
试论长沙西汉中小型墓葬的分期　宋少华　湖南考古辑刊2:191—197
马王堆医书所见陵阳子明经佚说　饶宗颐　湖南考古辑刊2:181—182
谈西汉南越王国和最近发现的南越王墓　杨豪　光明日报2月1日
从南越王墓看南越王国　黄展岳　文史知识4:100
南越王墓和墓中出土的珍宝　吕烈丹　文物天地6:25—27
南越文王墓葬的人殉　黄新美　中山大学学报4:110—112
东汉刑徒墓　徐金星　中州今古2:30
略论两汉魏晋的帷帐　卢兆荫　考古5:454—467
简论武威雷台出土东汉铜马的名称问题　张永明　社会科学（甘肃）1:97—99
武威雷台汉墓出土铜奔马命名商榷　伍德煦、陈守忠　西北师院学报3:31—38
山东嘉祥汉安国墓祠题记太岁年释辨　胡顺利　考古与文物4:112
关于《嘉祥宋山汉安国墓祠题记释读》的意见　李发林　考古与文物6:105—106
汉中地区文化古迹多　武树帜　历史知识3:55—57
从汉《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中看褒斜栈道　郭荣章　历史知识3:58
威宁中水"西南夷"陶器　何凤桐、万光云　贵州文史丛刊3:92—103
贵州威宁中水汉墓出土陶器刻划符号初探　刘恩元　贵州社会科学5:76—81
西汉以前新疆和中原地区历史关系考索　王炳华　新疆大学学报4:19—29
西岔沟古墓群族属问题浅析　田耘　黑龙江文物丛刊1:29—34
汉代的"家"和家吏　傅举有　考古与文物3:79—86
西汉动物画中的杰作——定县出土金错狩猎纹铜车饰画象　刘敦愿　美术研究2:74—79
鸟粪石（磷酸镁铵）大单晶的发现　王守道　考古10:956—958
我国现存最早的纪年脊兽　丁安民　江汉考古1:109—110
汉武帝的姐姐随葬的两件珍宝　王兆麟　文物天地2:41—42
圭窬小识　张良皋　文物3:54—56
曹操宗族墓砖字书体考　李灿　中原文物1:91—94
汉代《徐胜买地券》真伪考　袁祖亮

郑州大学学报1:86—89

九 魏晋南北朝

中国古代马具的发展和对外影响 杨泓 文物9:45—54

关于《中国古代马具的发展和对外影响》的一点更正（杨泓） 文物11:21

李达地券的年代 荣孟源 考古9:864

李柏文书出土于LK说 侯灿 新疆社会科学3:118—124

麴氏高昌王国官制研究 侯灿 文史第二十二辑:29—76

新发现的高昌王阙首归和麴嘉年号考 侯灿 西北史地1:59—63

西魏大统十三年残卷与北朝均田制的有关问题 武建国 思想战线2:44—50

鲜卑石室的求索与发现 米文平 民族研究动态2:53

集安卷云纹铭文瓦当考辨 李殿福 社会科学战线4:67—75

著名历史考古学家谈宁夏文物——北周李贤墓座谈会侧记 张伯楷 宁夏日报8月20日

达茂旗出土的古代北方民族金饰件 陆思贤、陈棠栋 文物1:81—83

漫话"斗帐" 杨泓 文史知识12:64—67

一〇 隋唐五代

唐长安城历史与唐人生活习俗——唐代墓志铭札记之二 贺梓城 文博2:35—43

关于唐史中一些问题的纠正和补充——唐墓志铭札记之三 贺梓城 文博3:43—47

略谈隋唐时期的官仓制度 沧清 考古4:361—366

洛阳附近的古代粮仓 方孝廉 中原文物1:26—29

河南唐墓概说 赵会军 中原文物4:84—86

唐代乾陵 权奎山 自修大学10:42—43

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中"日本使节"质疑 云翔 考古12:1142—1144

西安发现的经卷 李域铮 文博1:102

四川大足宝顶山摩崖造像区的古代排水工程初探 李显文 考古与文物4:100—104

唐长安临皋驿 李健超 考古与文物3:91—92

从千寻塔文物看大理国与中原文化的联系 葛季芳 云南社会科学1:74—78

唐代妇女的服装与化妆 孙机 文物4:57—69

武则天金简 耿直 中州今古2:15

关于唐代白银地金的形制问题 朱捷元 文博3:50—53

西安市文管会收藏的几件珍贵文物 张达宏、王长启 考古与文物4:22—26

千年古槅 陈增弼 文物6:66—69

一一 宋辽金元及以后

回鹘译本《玄奘传》残卷五玄奘回程之地望与对音研究 黄盛璋 西北史地3:9—32

泉州湾宋代海船上贝类的研究 李复雪 海交史研究 6:101—109

泉州湾出土宋船中果品种子的研究

林更生 海交史研究6:110—114
关于江阴北宋墓的墓主孙四娘子 朱瑞熙 文物9:85—87
我市发现宋代的洪水标志和题记 龚廷万 重庆日报8月24日
契丹早期文化探索 张柏忠 考古2:183—186
辽朝别有一五台山 萧村 文物9:90—91
"大蕃天显"纪年文字砖考 齐心、刘精义 黑龙江文物丛刊2:23—25
辽代的语言和文字(上) 刘凤翥 博物馆研究2:62—71
辽代的语言和文字(下) 刘凤翥 博物馆研究3:41—58
契丹大字与传世的女真文字 和希格 内蒙古大学学报3:1—6
绥滨三号辽代女真墓群清理与五国部文化探索 于志耿、魏国忠 考古与文物2:59—69
哈尔滨附近金代墓地的最初发现 B·C·斯塔里科夫 黑龙江文物丛刊1:102—105
阿穆尔河下游女真文化的一些发现 (苏)B.E.麦德维杰夫 黑龙江文物丛刊2:106—112
略论东北地区金代石函葬 庞志国 黑龙江文物丛刊4:47—49
元安西王与宗教 温玉成 考古与文物4:95—97
元末红巾军首领韩林儿称帝的事迹与文物 洪静渊 内蒙古社会科学4:119
元代的"回回炮" 鲁人勇 宁夏日报8月12日
明都南京城垣略论 季士家 故宫博物院院刊2:70—81
明祖陵述略 刘聿才、刘新 考古与文物2:70—75
明万历帝及其两后的口腔情况 周大成 人类学学报3·2:102—106
明范氏一品夫人墓考析 江边 江汉考古2:39—43
清凉铜殿杂考 秦佩珩 郑州大学学报3:79—83

一二 其他

谈"饮食考古" 史树青 考古与文物6:103—104
读者来信一则 徐殿魁 考古9:863—864
论古代的食人之风——并附释寅、禽、醢、盍、烹、将、肴、屠、截、敢等有关古文字 夏禄 武汉大学学报4:73—80
吐鲁番访古 李天祜 西北史地2:73—77
对新疆古代文明的新认识 王炳华 百科知识1:19—22
河西考古之余 吴礽骧 百科知识1:23—26
东北访古随笔 陈连开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2:26—28
关于考古资料的引用——与《贵州古代史》作者商榷 宋世坤 贵州文史丛刊1:80—87
中国古尸寄生虫学研究之综述 李友松 人类学学报3·4:407—411
浅谈海洋考古学 邱克 海交史研究6:115—121
海洋考古学的发展史 (英)基思·马克尔瑞科学史译丛2:83—90
萧山朱氏旧藏珍贵家具纪略 王世襄 文物10:53—58

叁 考古学专论

一 甲骨文及古文字研究

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 胡厚宣 史学月刊5:15—22

甲骨文研究的过去、现状及今后的展望 陈炜湛 古文字研究(1984年)9:189—205

关于甲骨文最初发现情况之辨正 李先登 天津师大学报5:51—52

关于《殷墟书契考释》的写作问题 胡厚宣 社会科学战线4:108—109

小屯南地发掘与殷墟甲骨断代 林沄 古文字研究9:111—154

再论武乙、文丁卜辞 肖楠 古文字研究9:155—188

论《非王卜辞》与中国古代社会之差异——三评"非王卜辞"说 李瑾 华中师院学报6:57—68

甲骨文金文所见商周工官工奴考 陈建敏 学术月刊2:71—75

卜辞·"立事"说——兼谈商代的战法 杨升南 殷都学刊2:6—10

甲骨文所表现的牛耕 许进雄 古文字研究9:53—74

稻作史的一项珍贵史料——介绍一则卜辞 徐云峰 中国农史1:77—81

甲骨文所见第一人称代词辨析 陈炜湛 学术研究3:104—108

学习古文字琐记二则 夏渌 古文字研究10:101—107

商代卜辞四方神名、风名与后世春夏秋冬四时之关系 郑慧生 史学月刊6:7—12

干支纪年和十二生肖起源新证 李学勤 文物天地3:41—42

试论殷代简册的使用及其他——(一)释"册"(二)释"扁"(三)释"聿" 郭若愚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4:116—120

探索殷商物质文明的尝试 喜读《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 张明华 读书10:48—51

大放异彩的地下"档案库"——漫谈甲骨文 仁言 文物天地5:26—29

牢宰考辨 姚孝遂 古文字研究9:25—36

殷契䒼字说 张政烺 古文字研究10:15—22

令命的分化 洪家义 古文字研究10:122—126

释"𠫓" 范毓周 西北大学学报2:88—90

释"若" 马如森 东北师大学报5:97

说"外" 张玉春 东北师大学报5:98—106

问"鼎" (日)高嶋谦一 古文字研究9:75—95

殷墟卜辞中的令 陈复澄 考古与文物2:76—77

殷墟卜辞中"□"字考 徐锡台 人文杂志5:102—103

武丁时代"贞□卜辞"之再研究 高明 古文字研究9:37—52

释"御方" (美)夏含夷 古文字研究9:97—109

释甲骨文腥胜二字 刘昭瑞 河南师大学报2:95—98

甲文"楚"字辨——兼论正足不同源 王光镐 江汉考古2:52—63

周原甲骨文 周苏平 历史知识5:39

周原甲骨文 刘荣庆 人文杂志5:128

我国最早的微型刻字 陕西岐山县出土的西周甲骨文 刘亮 书法4:35
略论周原甲骨文的族属 高明 考古与文物5:76—85
古文字学的基础工作 李学勤 文史哲6:84—86
什么是古文字学 李学勤 文史知识10:52—56
文字起源之谜 李学勤 文史知识12:73—76
形音义 李学勤 文史知识11:55—58
循义定音、循音统形——释字要则 严学宭 古文字研究10:177—189
假借形声和先秦文字的性质 孙常叙 古文字研究10:327—349
古文字发展过程中的内部调整 赵诚 古文字研究10:350—365
释两 于省吾 古文字研究10:1—9
释肩 蔡运章 古文字研究10:53—62
说"皇" 单周尧 古文字研究10:70—77
龙字私议 罗福颐 古文字研究10:11—13
说繇 曾宪通 古文字研究10:23—36
释齐 刘敦愿 文史哲5:29—31
古代刻文记事 傅同钦 天津社会科学6:73—75
古文字琐记 张汉之 考古与文物6:83—84
释"麗" 秦永龙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6:47—50
古文字研究札记四则 尤仁德 考古与文物1:107—108
"众"、"庶人"并非奴隶论补证——兼说商周农民多于奴隶亦为奴隶社会问题 徐喜辰 东北师大学报2:34—41

二 青铜器与铭文研究

综论

《殷周金文集成》前言 夏鼐 考古4:357—360
北京图书馆所藏青铜器铭文拓本汇编序 徐自强、张亚初、刘雨 古文字研究9:439—444
金文释读中一些问题的探讨(续) 孙稚雏 古文字研究9:407—419
研究金文族徽的一种新方法及其重要成果 (澳)巴纳 古文字研究9:421—438
两周金文韵读辑遗 陈邦怀 古文字研究9:445—462
从青铜器谈到比较文明史——谈马承源《中国古代青铜器》 李学勤 读书2:38
试论中国古代青铜器的起源 李先登 史学月刊1:1—8
精美灿烂的古代青铜器 杜迺松 历史知识4:57—58
殷周青铜容器上鸟纹的断代研究 陈公柔、张长寿 考古学报3:265—285
商周青铜容器合金成份的考察——兼论钟鼎之齐的形成 李仲达等 西北大学学报(自然)2:22
谈谈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中牛的纹样问题 刘敦愿 考古与文物4:42—45
岐山县博物馆近几年来征集的商周青铜器 祁健业 考古与文物5:10—13
介绍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的四件青铜器 张维 考古与文物3:5—7
安陆馆藏的几件青铜器 余从新 江汉考古2:100

商殷

略谈商代青铜器纹饰 周苏平 历史知识6:44—46

谈鯱祖丁卣等三件商代长铭铜器 杜迺松 文物10:47—50

南阳市博物馆馆藏的商代青铜器 南阳市博物馆（艾延丁 崔庆明） 中原文物1:95—96

介绍几件新乡市博物馆藏青铜器 唐爱华 中原文物1:97—98

西周

试论陕西出土的西周钟 蒋定穗 考古与文物5:86—100

陕西凤翔出土的西周青铜器 曹明檀、尚志儒 考古与文物1:53—65

母子墩墓青铜器及有关问题探索 肖梦龙 文物5:11—15

何尊铭文补释 孙斌来 松辽学刊2:45—49

释康侯毁 周永珍 古文字研究9:295—304

敔卣、敔尊铭文考释 何琳仪、黄锡全 古文字研究9:373—389

敔毁铭文浅释 陈连庆 古文字研究9:305—320

师同鼎铭文考释 陈世辉 史学集刊1:1—5

穆公簋盖在青铜器分期上的意义 李学勤 文博2:6—8

论仲再父簋与申国 李学勤 中原文物4:31—32

陕西扶风县强家村出土虢季家族铜器铭文考释 于豪亮 古文字研究9:251—273

芮城柴村铜器铭文考释 戴尊德 古文字研究9:321—324

多友鼎"京自"地望考辨 刘桓 人文杂志1:125—126

秦人青铜文化初探——由四宗西周青铜器的族属谈起 尚志儒 文博1:13—18

曩仲壶 陈佩芬 文物6:21—23

论楚公冢钟和楚公逆鎛的年代 张亚初 江汉考古4:95—96

命父諆毁跋 陈邦怀 天津社会科学5:91

论湖南出土的西周铜器 高至喜 江汉考古3:59—68

西周金文中的月相与共和宣幽纪年铜器 刘启益 古文字研究9:207—249

《曶鼎铭文》再推敲 王德培 天津社会科学6:71—72

庠地与昭王十九年南征 卢连成 考古与文物6:75—79

西周金文联结词"以""用""于"释例 杨五铭 古文字研究10:367—378

说□ 秦建明、张懋镕 考古与文物6:80—82

夔纹铜禁及其他 王同立 天津社会科学3:70

漫话青铜禁 张正涛 历史知识4:60

东周

我国两周时期的越式鼎 彭浩 湖南考古辑刊2:136—141

"者旨于赐"考略 殷涤非 古文字研究10:214—220

《鄀大子伯辰鼎》及其铭文 高应勤、夏渌 江汉考古1:101—102

谈徐王炉铭文中的"闻"字 吴振武 文物11:84

舒城鼓座铭文初探 陈秉新 江汉考古2:73—78

也谈王子婴次炉 马世之 江汉考古1:76—80

关于许公买瑚的一点意见 浩文 江汉考古1:31
莱国𨽙铭试释及论有关问题 王锡平、孙敬明 东岳论丛1:77—79
陈公孙㾿父旅瓶考 陶正刚 古文字研究9:325—330
楚国有铭铜器编年概述 刘彬徽 古文字研究9:331—372
王子午鼎、王孙𦀚钟铭文考释 伍仕谦 古文字研究9:275—294
宋代出土的楚王酓章钟 李零 江汉考古1:88—89
寿县楚器集脰诸铭考释 郝本性 古文字研究10:205—213
鄂君启节释文 姚汉源 古文字研究10:199—203
楚鄬陵君三器考辨 何琳仪 江汉考古1:103—104
寿县蔡侯铜器的再研究 殷涤非 考古与文物4:60—62
古字新考 李裕民 古文字研究10:109—121
关于曾侯乙墓楚鎛铭文考释的商榷 钱伯泉 江汉考古4:93—94
曾侯乙钟铭文之管见 王文耀 古文字研究9:391—406
辨字小记 戴家祥 社会科学战线3:99—103
曾侯戈小考 李学勤 江汉考古4:65—66
中山王器考释拾遗 何琳仪 史学集刊3:5—10
战国玺印文字考释三篇 裘锡圭 古文字研究10:78—100
战国货币铭文中的“刀” 吴振武 古文字研究10:305—326
释卯篇——兼谈卯刀背文𠃊字 朱活 古文字研究10:292—303
战国文字考释（五则） 汤余惠 古文字研究10:281—291
兵器铭文中的“冶”非“工师”说 傅天佑 江汉考古1:110
释𢧵——兼说甲骨文不字 陈世辉 古文字研究10:37—45
金文札记三则 刘宗汉 古文字研究10:127—137
鸟虫书论稿 马国权 古文字研究10:139—176
释鉌 田宜超 江汉考古3:70—84
试论战国秦汉铭刻中从“酉”诸奇字及其相关问题 黄盛璋 古文字研究10:221—241
湖南出土战国以前青铜器铭文考 周世荣 古文字研究10:243—280
试论河南战国青铜器的画像艺术 张英群 中原文物2:4—12

秦汉及其以后

试论关中秦墓青铜容器的分期问题（上） 陈平 考古与文物3:58—73
试论关中秦墓青铜器的分期问题（下） 陈平 考古与文物4:63—73
谈文水出土的错银铭铜壶 李学勤 文物6:26—27
“阳信家”铜器铭文补释 李光军、王丕忠 人文杂志3:98—101
“阳信家”铜器铭文考订 秦进才 文物9:88—89
西汉馆陶家铜连鼎及王氏一斗鼎 李光军、张子波 文物10:51—52
一对最古的药酒壶之发现 周策纵 古文字研究 10:418—438
溪州铜柱铭文刍议 张耀业、彭道轩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2:24—25
元“一路连科”纹浮雕铜盘 吴顺平 黑龙江文物丛刊1:50—51

附：其他文字考释

论陶符兼谈汉字的起源 高明 北京大学学报6:47—60
考古中发现过原始社会的文字吗？ 杨升南 文物天地6:34
对几个古图文的辨识 白汝博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104—107
荥阳印陶考 牛济普 中原文物2:46—47
"孓盉"铭义初释及其有关历史问题 李步青、刘玉明 东岳论丛1:80—83
释恩 滕壬生 古文字研究10:46—52
曾侯乙墓匫器漆书文字初释 饶宗颐 古文字研究10:190—197
战国"亩（䵼）"字考察 吴振武 考古与文物4:80—87
释战国陶文中的"鼓" 曹锦炎 考古1:83—85
数占法与"周易"的八卦 徐中舒 古文字研究10:379—387
竹简、帛书与校雠学、辨伪学 郑良树 古文字研究10:405—417
洛阳西郊汉墓陶器文字补释 蔡运章 中原文物3:89—92
释"厍" 王克林 古文字研究10:63—69

三 碑刻

综论

南开大学图书馆所藏石刻拓本读记 胡月 南开学报3:73—80
碑林简史 王翰章 文博3:60—66
百泉碑廊概况 崔墨林 中原文物2:71—74
越山吉祥禅院的御书刻石 杨秉纶 福州历史与文物1:27
南山九日山摩崖石刻校记 李玉昆 泉州文史8:88
谈中州汉唐石刻分布与书法艺术 张清华 中原文物2:66—71

秦汉——南北朝

先秦石鼓简说 韩长耕 史学史研究3:74—80
石鼓文试读 程质清 书法3:18—32
秦"峄山刻石" 雒长安 文博2:100—101
"五凤刻石"刻文小考 放客 齐鲁学刊3:封三
《郙阁颂摩崖石刻》补正 杜白珣 贵州文史丛刊2:154—157
一块罕见的珍贵汉碑 岳国芳 新观察10:31
汉《韩仁铭》碑考释及历史价值 张明申、秦文生 中原文物2:62—65
东汉雁门太守鲜于璜碑铭考释 张传玺 北京大学学报2:47—60
一场早该结束的争论——蔡邕书石经是三种字体吗？ 跃进 文物天地4:44—46
繁城三绝碑 希声 中州今古4:56—58
高句丽好太王碑 耿铁华 文物天地6:9—11
北魏泾州二碑考 秦明智 西北史地3:33—39

隋唐五代

艺术丰碑——记登封《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碑的艺术成就 张家泰 中原文物2:104—108
茂汶点将台唐代题记标点勘误 温玉成 文物7:29
勉县武侯祠"唐碑"初考 陈显远 汉中师院学报1:111

武则天与升仙太子碑 林朴、徐金星 文物天地3:38—39
南昌出土《滕王阁序》碑 李科友等 光明日报8月8日
欧阳询书《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 王壮弘 书法6:21—27
唐刘沔碑 任赢 文博3:16
莱西发现题有颜真卿名款的《裴将军诗》石刻 齐鲁学刊2:封三
陕西高陵县耿镇出土唐《东渭桥记》残碑 董国柱 考古与文物4:110
读《风穴七祖千峰白云禅院记》碑后 温玉成、杨顺兴 中原文物1:35—38

两宋

跋宋德应侯庙碑记两通 傅振伦 文献15:233
大理五华楼新出宋元碑刻中有关云南地方史的史料（上） 方龄贵 云南社会科学5:89—97
大理五华楼新出宋元碑刻中有关云南地方史的史料（下） 方龄贵 云南社会科学6:107—116
黄鲁直南浦西山勒封院《题记铭》 江学礼 文物5:76—77
赵明诚题名和乡居青州考 于中航 文物6:90—95
《廉先生序》石刻考释——兼谈李格非、李清照里居问题 于中航 文物5:70—75
偃师缑氏永庆寺出土永泰陵采石记碑 李健永 文物4:79—80
黄庭坚《薄酒丑妇歌》碑 向文瑞 文物天地2:45—46
禹碑探迹 林冲 文物天地1:38
漫谈岳飞书诸葛亮出师表石刻 庞怀靖 中原文物1:84—86
凉州感应塔碑西夏文校译补正 史金波 西北史地2:47—51
一通题名碑复活了一座“死城” 景爱 文物天地3:39—40

辽、金、元

塔子城出土辽大安残刻三题 景爱 社会科学战线3:193—197
关于辽“大安七年”刻石的几点考证 田华 黑龙江文物丛刊3:37—39
辽碑结衔释例 林荣贵 民族研究4:47—50
从出土碑刻和文字资料看辽讳 毕素娟 文史22:246
女真文《大金得胜陀颂》碑校勘释读 道尔吉、和希格 内蒙古大学学报4:52—83
大金得胜陀颂碑文整理三得——兼对田村实造等有关文著的订正 王仁富 黑龙江文物丛刊1:10—17
大理五华楼元碑的发现及其史料价值 方龄贵 社会科学战线2:127—138
重庆明玉珍墓出土《玄宫之碑》 胡人朝 考古与文物4:37—38
《玄宫之碑》的“平成都”句解 薛新力 历史知识4:59
茂汶较场坝点将台元将题刻 陈世松 历史知识4:55—56
商王庙碑记 杨宝成 中原文物2:97—98

明清及其他

耀县药王山大顺政权耀州牧题诗碑 鲁深 陕西师大学报2:116—117
甘肃岷县文征明行书诗碑 李璘 文物 4:81
从少林寺的几方碑塔铭文看明代僧兵 曾维华、严耀中 上海师范学院学报2:75—77
明董其昌撰书《高忠宪公像赞》石刻 朱文杰 书法4:36

《明会川伯赵安铁券》跋 王继光 西北史地3:100—103
介绍记载明清水文、水利的两通石碑 魏忠策 中原文物3:53
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碑文选注之五，安远庙瞻礼 书事（有序一） 齐敬之 承德师专学报1:97
《安达礼碑》——清初殉葬制度的历史见证 李凤民 民族研究4:45—46
对长春出土咸丰八年《碑记》的研究 田志和 社会科学战线1:214—218
吉林敦化哈尔巴岭发现依克唐阿碑 刘忠义 黑龙江文物丛刊3:50—52
抚顺锡伯族石碑的发现与初步研究 吴扎拉克尧 社会科学辑刊4:106—108
锡伯家庙碑文考 赵志强、吴元丰 社会科学辑刊4:98—105
曹寅《尊胜院碑记》 卢茂村 文物7:64
清代"贡江碑"考证 邹世魁 黑龙江文物丛刊3:77—79
西宁市东关清真大寺两篇碑文述略 魏明章 社会科学参考11:20
墓志溯源 赵超 文史21:43—55
北魏刘贤墓志 曹汛 考古7:615—621
华阴潼关出土的北魏杨氏墓志考证 杜葆仁、夏振英 考古与文物5:17—27
刘懿墓志考辨 高维德 晋阳学刊2:75—77
郑仁泰墓志中的几个问题 孙迟 文史21:262—267
何文哲墓志考略 魏光 西北史地3:47—54
唐天山县南平乡令狐氏墓志考释 柳洪亮 文物5:78—79
《〈张建章墓志〉补考》补记一则 罗继祖 黑龙江文物丛刊1:28
慕容威墓志简介 马曼丽编写 西北史地4:16
《大唐故永泰公主志铭》新释及永泰公主之死 廖彩梁 文博3:48—49
唐代渤海国《贞孝公主墓志》研究（上） 王承礼 博物馆研究2:40—49转页
唐代渤海国《贞孝公主墓志》研究（中） 王承礼 博物馆研究3:28—36
合肥北宋任氏墓志 程如峰 安徽史学5:52—53
宋政和元年咸宁郡太夫人施氏墓志铭 陈柏泉 文史21:222
宋元祐二年洺州守王纯中墓志铭 陈柏泉 文史20:210
江西修水县新出黄庭坚撰书《王纯中墓志铭》 李放 书法2:34
《耶律延宁墓志》的契丹大字释读举例 刘凤翥、于宝林 文物5:80—81
辽王氏二方墓志考 向南 考古与文物3:93—97
《全辽文》韩瑜、韩橁墓志校记六则及《附跋》商榷 李锡厚 黑龙江文物丛刊4:44—46
契丹小字道宗哀册篆盖的解读 刘凤翥 民族研究5:76—80
"青蝇之污"与皇后之死——从辽西陵出土的哀册说起 景爱 文物天地5:30—32
金代韩詠墓志考 齐心 考古8:752—757
乌古论元忠等三墓志考略 贾敬颜 社会科学辑刊2:89—92
元后至元二年孺人韩氏圹记 陈柏泉

文史20:230
《䔲宪墓志》及其有关的几个问题 杜彤华 中原文物2:75—79
明代郝瑞墓志与简化字 程欣人 江汉考古3:100—101

四 简牍、帛书和写本

楚简及云梦秦简

楚简陵阳释文 刘操南 杭州大学学报增刊:49—51
信阳长台关楚简补释 彭浩 江汉考古2:64—66
关于睡虎地秦墓竹简 彝锋 历史知识3:59
《睡虎地秦墓竹简》译注斠补 栗劲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5:90—96
秦简"隶臣妾"确为奴隶说——兼与林剑鸣先生商榷 高敏、刘汉东 学术月刊9:66—71
从古代罪人收奴刑的变迁看"隶臣妾"、"城旦舂"的身份 徐鸿修 文史哲5:17—28
"隶臣妾"的身份复议 施伟青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83—88
"隶臣妾"是带有奴隶残余属性的刑徒 王占通、栗劲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69—76
关于秦代土地所有制的几个问题 杜绍顺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3:97—102
云梦秦简《语书》探析——秦始皇时期颁行的一个地方性法规 刘海年 学习与探索6:45—51
睡虎地秦简《编年记》作者及其政治态度——兼与陈直、商庆夫同志商榷 杨剑虹 江汉考古3:95—99
从云梦秦简看秦朝的会计管理 李孝林 江汉考古3:85—94
秦律赀罚甲盾与统一战争 石子政 中国史研究2:113—116
《睡虎地秦墓竹简》某些语法现象研究 冯春田 中国语文4:283—289
秦简的出土开辟了秦史研究的新天地 王云度 文物天地6:41—43

汉简

新出土汉简文书的整理与研究 何双全 中国史研究动态9:6—15
汉简史籍参证举例 薛英群 文献16:57
居延简中所见汉代《囚律》佚文考——《居延新简"责寇恩事"的几个问题》的订补 初师宾、肖亢达 考古与文物2:96—100
《居延汉简甲乙编》的出版与居延汉简研究（日）大庭修 中国史研究动态1:23—28
居延甘露二年御史书册考述补 初师宾、伍德煦 考古与文物4:74—79
居延新获建武秦胡册再析 吴礽骧、余尧 西北师院学报4:20—26
从居延汉简看西汉在西北的屯田 杨剑虹 西北史地2:22—33
居延汉简中的"社"及其源流 薛英群 兰州学刊3:75
汉简"辟火"解 李均明 文史20:40
阜阳汉简《诗经》 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安徽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汉简整理组 文物8:1—12
阜阳汉简《诗经》简论 胡平生、韩自强 文物8:13—21
银雀山汉简齐国法律考析 吴九龙 史学集刊4:14—20
从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看汉代的口钱、算赋制度 高敏 文史20:25—39

汉简所见一日十八时、一时十分记时制 李均明 文史22:21—27

江苏连云港市出土的汉代法律版牍考述 张廷皓 文博3:29—32

关于罗泊湾汉墓《从器志》的重文号 陆锡兴 文物4:56

汉简《士相见礼》今古文杂错并用说 沈文倬 杭州大学学报14卷增刊:179

帛书

战国楚帛书考 陈梦家遗著 考古学报2:137—158

帛书《周易》 于豪亮遗作 文物3:15—24

帛书《周易》释疑一例——"天行健"究应如何解释 韩中民 文物天地5:34—35

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 文物3:1—8

帛书《六十四卦》跋 张政烺 文物3:9—14

马王堆医书所见"陵阳子明经"佚说——广雅补证之一 饶宗颐 文史20:251—253

吐鲁番、敦煌文书

出土文书与穆斯林地理著作对于研究中亚历史地理的意义(上) 张广达 新疆大学学报1:57—64

出土文书与穆斯林地理著作对于研究中亚历史地理的意义(下) 张广达 新疆大学学报2:55—63

吐鲁番文书在解放前的出土及其研究情况 陈国灿 中国史研究动态6:19—29

关于隋薛道衡所撰《典言》残卷的几个问题 王素 考古与文物2:101—105

列宁格勒藏敦煌《长安词》写卷分析 柴剑虹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4:18—21

敦煌出土文学文献分类目录附解说(续) (日)金冈照光 李宁平、孙亚英译 社会科学(甘肃)1:87—92

敦煌写本丛残跋语 陈邦怀 史学集刊3:1—4

敦煌文书中的第四件《论语郑氏注》 王素 文物9:62—64

新疆藏文简牍考述及释例 王尧 文物9:55—61

敦煌写本《百行章》述略 邓文宽 文物9:65—66

《钢和泰藏卷》与西北史地研究 黄盛璋 新疆社会科学2:60—73

《蔡伯喈》与《刘希必》潮州出土的明代珍贵戏曲写本 刘念兹 文物天地1:39—40

五 玺印

战国——秦汉

古玺简介 智龛 书法4:45—47

楚玺两考 汤余惠 江汉考古2:50—51

楚国官印考释(四篇) 李家浩 江汉考古2:44—49

苍山县柞城故址发现铜印等文物 刘心健、刘自强 文物8:12

介绍一批古代官印 赵新来 中原文物2:112—114

汉印文字的源流和变化 王紫虹 书法研究1:99

关于防陵村出土汉印的印文 (日)末次信行、叶其峰 文物8:48

汉肖形印的内容及其艺术特色 叶其峰 故宫博物院院刊1:51—56

关于几方汉印的考释　郑洪春　穆银秀　文博1:30—32
关于"汉匈奴为鞮台耆且渠"印的若干问题　黄盛璋　西北史地1:9—13
"汉匈奴为鞮台耆且渠"印考释　唐嘉弘　人文杂志1:103—107
新莽官印鉴别例　叶其峰　文物3:92—96
汉魏洛阳故城发现六十余枚汉代官印　赵安杰　文物5:93
新疆尼雅遗址出土"司禾府印"　贾应逸　文物9:87
新疆各地发现的一部分历代印章　李遇春　文博2:64—70
四川、陕西、河南出土十方古代官印　胡人朝等　考古与文物1:82—85

隋唐及以后

谈隋唐官印之鉴别　罗慕鸿　博物馆研究1:108—115
"中书门下之印"小考　董学增　高素心　文物9:77—78
海盐出土宋朝军印初探　鲍翔麟　文物9:79—82
江西出土宋代"澂海"军印简释　孔繁敏　考古11:1049
岳阳发现宋丞相忠定赵周王印　张中一　湖南考古辑刊2:190
辽宁近年出土、征集的宋、辽、金官印选辑　武家昌　文物9:83—84
河北古代官印集释　郑绍宗　文物9:71—76
介绍几方宋、金、元代官印　刘东亚、李国灿　中原文物4:23—24
从皮室印的解读论说乣军　即实　黑龙江文物丛刊2:15—22
试解三颗契丹文印　即实　内蒙古大学学报4:86—92
吉林扶余县发现金代"利涉县印"　刘景文　考古11:1051—1052
金代副都统印　宋云亭　博物馆研究1:35
密县发现金代官印　魏殿臣　中原文物1:86
易县征集的金代铜印　刘铁军　文物5:65
辽宁建平发现四方金代官印　李殿福、李宇峰　黑龙江文物丛刊4:71—72
金代"义军副统之印"　曹子元　中州今古6:37
从"祥州站印"的出土看古代松嫩平原通往呼伦贝尔草原的交通线　张泰湘、程道宏　学习与探索4:138—144
花押印文"㊣"字小考　石语　博物馆研究2:118
湖北大悟县出土八思巴文元代铜印　段守己　考古11:1044
关于"漳州路军民都总管印"的商榷　叶其峰　文物11:95
红巾军的"元帅之印"　赵新来　中州今古5:45
呼伦贝尔发现元代"祥州站印"　程道宏　文物9:89
广东潮安出土元代铜印　陈历明　文物8:39
九江出土元代烧钞库印　卢亨风、王少华　文物10:41
从成讨温、塔山左卫印出土看明代对三卫的设置管辖　杨旸　博物馆研究2:79—82
明代敕赐乐都县瞿昙寺二印　白万荣　文物9:78
湖南澧县发现明"华阳王镇抚司之印"　曹传松　文物11:72

广西桂平发现明"浔州卫中千户所百户印" 平南县文化局 桂平县文化局 文物12:57
湖南永顺出土土司官印 向渊泉 文物7:78

六 钱币

综论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开展钱币研究工作 赵会元 中国钱币2:1—4
中国货币发展的基本特征 郭彦岗 中国钱币2:5—12
中国古代铜钱形制探源 俞进 中国钱币4:39
试论中国古代货币标准化 韩剑 中国钱币1:13—21
古币著录和有关问题的探讨 王贵忱 中国钱币1:42—47
介绍刘鹗的未刊稿《铁云藏货》 郭若愚 中国钱币3:2—10
古代货币研究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喻明高 中国钱币3:33—39
中国货币史的若干问题 叶世昌 上海金融研究6:26
关于货币理论史的商榷 叶世昌、潘连贵 中国钱币3:57—58
浅析"子母相权"论和《管子》"轻重"论 王一成、渠汇川 中国钱币1:22—24
我国贝币史话 秦子 百科知识8:34—37
"量名钱"与"年号钱" 郑有国 历史知识6:47—48
古钱读法 唐石父 中国钱币3:43—53
对钱币认识欠妥的三例 唐石父 考古8:765—766
我国古代钱币与通货膨胀 许树信 中国钱币2:13—15
我国古代铜钱的通货膨胀问题 叔欣 金融研究8:57
谈谈古钱币的清理 赵平 江苏金融研究7:27
古钱币珍藏方法简介——古钱币保养常识之一 阿祥 中国钱币3:79—80
试论建国以来河南出土钱币的学术价值 赵宁夫、汲津 中原文物2:99—103
西藏古代货币考 肖怀远 西藏农牧学院学报1:1

东周——汉

关于周代使用钱币的探索 郝本性 中国钱币4:1—6
再谈三晋货币 胡振祺 中国钱币1:70—72
中小空首布的发展 陆松麟 中国钱币2:16—23
春秋代布考 刘敬扬 中国钱币3:12—13
战国中山国"成帛"刀币考 陈应祺 中国钱币3:14—27
右明新货小布之再现 王一新 中国钱币3:28—29
山西省朔县出土"宋子"三孔布 朱华 中国钱币4:7—10
楚国金属货币的币材 赵德馨 江汉论坛2:73—78
鄗爰考 蔡远章 中国钱币3:11
读《先秦货币文编》札记 曹锦炎 中国钱币2:67—70
关于圆饼金币若干问题新考 黄盛璋 考古与文物6:85—90
也谈西汉的钱币铸造 蔡永华 中国钱币4:47—53
两汉铁钱考 傅举有 湖南考古辑刊

2:183—190
浅说小五铢 侯炯 中国钱币1:80
五铢钱的诞生与通行 周葆盛 中学历史教学参考3:5
关于厌胜钱的初步探讨 李翰 中国钱币2:37—40
宜阳出土的汉代厌胜钱 陈娟 中原文物3:21
略论新莽钱币 季长佑 中国钱币1:48—51
"货泉"初探——兼论莽钱制作特征的演变 戴志强、谢世平 中国钱币1:25—38
王莽布泉新探 袁林 中国钱币2:26—28
珍奇钱币——重笔"货泉" 徐达元 中原文物3:98
记北京市顺义县东汉窖藏货币——试谈"剪轮"五铢"綖环"五铢 高桂云、张先得 中国钱币2:61—63
从考古发现材料看三国时期的蜀汉货币 张勋燎 四川大学学报1:70—76

唐宋及以后

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钱币的研究 陈尊祥 中国钱币3:30—32
发现罕见开元通宝当十大钱 张甦 中国钱币4:66
南唐开元大钱 孙仲汇 中国钱币4:40
"皇宋通宝"非年号钱 杨兆飞 考古与文物4:112
"东坡元丰"还是"东坡元祐" 潘景行 中国钱币3:64
南宋商税银铤的再发现 杜金娥 中国钱币2:29—30
西夏钱币辩证 牛达生 陕西金融5:31
西夏钱币辨证 牛达生 中国钱币4:20—27
辽代的钱币 金融研究通讯增刊:1
试论辽代的货币经济 乔晓金 中国钱币1:52—61
辽钱图录 卫月望辑录 中国钱币1:62—69
浅谈金代的窖藏铜钱及货币制度 王禹浪 求是学刊6:90—95
金代的钱币 金融研究通讯增刊:7
金代币制考略 宋云亭 博物馆研究2:77—78
介绍一件金代"扑满" 张淑华 博物馆研究2:116—117
元代的钱币 金融研究通讯增刊:13
货币举异——面拉丁文背中文纪值钱初探 宣森 中国钱币4:54—56
明代云南的贡金 万揆一 昆明师范学报2:20
我国现存较早的铜雕母钱——明"嘉靖通宝"当十大钱 张旭华 中国钱币3:55
跑马崇祯钱 高桂云 中国钱币4:57
清代的钱币——溯源后金 金融研究通讯增刊:24
试论清朝的西藏钱币暨清廷维护西藏主权之措施 阎朋 中国钱币4:31—34
左宗棠督军新疆时铸造的货币及其治疆的经济措施 金诚 中国钱币4:35—38

纸币

谈中国古代的纸币 张秀秦 陕西金融研究7:29
中国货币文化宝库中的两颗明珠——两宋钞版新探 吴筹中、吴中亚 中国钱币1:39—41
关于北宋小钞的研究 潘连贵 中国

钱币4:58
宋代钞币"官交子""会子"质疑 乔晓金、卫月望 中国钱币3:59—63
四川交子的产生 姚朔民 中国钱币4:11—19
记元代昏烂钞印——简谈元代以前古钞的注销 唐石父 考古与文物4:93—94
元代纸币在西藏地方流通考 张虎婴 中国钱币4:28—30

七 铜镜

战国铜镜初探 杜迺松 故宫博物院院刊1:59—68
中国古镜装饰艺术概论 周到等 中原文物2:13—16
古镜艺术(二)——精致的汉镜 文众 中原文物1:99
景初三年和正始元年镜的铭文考释 王仲殊 考古12:1118—1124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铜镜 徐苹芳 考古6:556—563
唐镜选粹 刘向群、李国珍 人文杂志2:106—107
漫谈葡萄镜 王濂三、孙传贤 中原文物2:17—21
从唐大和元年铜镜谈传世"饭牛镜" 罗家容、文物7:70—71
北宋龙纹贡品镜小析 董学增、高素心 博物馆研究2:115—116
宋代"蛟龙闹海"铜镜 邓城宝 文物2:79
金代铜镜纹饰 吴顺平 黑龙江文物丛刊2:92—93
吴太平元年神兽镜 程长新、马希桂 文物9:70
洛阳博物馆收藏一件隋代画像镜 沈淑玲 中原文物1:98

八 铜鼓

论古代西南铜鼓与中原文化的关系 李先登 天津师大学报1:71—74
壮族古代铜鼓的铸造工艺 黄增庆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41
文山铜鼓 白天明 民族文化1:35
沙市博物馆馆藏铜鼓考证 彭锦华 江汉考古1:105—106

九 度量衡

我国古代权衡器简论 丘光明 文物10:77—83
东海县出土秦父子诏铜量 (李洪甫、许健) 文物11:96
唐代衡制小识 杨东晨、卢建国 文博1:107—110
天成元年铜权 罗显清 博物馆研究1:31
乾隆嘉量考——兼谈黄钟与度量衡的关系 丘光明 故宫博物院院刊3:41—45

一〇 玉器

故宫博物院藏的几件新石器时代饰纹玉器 周南泉 文物10:42—46
说颏和额带 丁乙 考古10:945—948
记商小臣觽玉 陈邦怀 天津社会科学2:72
延安市发现的古代玉器 姬乃军 文物2:84—87
明陆子冈及"子冈"款玉器 周南泉 故宫博物院院刊3:82—88
清代乾嘉时期宫廷玉器的造型艺术 张广文 文物11:91—95
仿古玉 杨伯达 文物4:70—76

一一 其他

锯镰辨析 云翔 文物10:65—68
云梯考略 蓝永蔚 江汉考古1:81—87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三） 沈从文 广东工艺美术3:34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四） 沈从文 广东工艺美术4:32

肆 田野考古资料

一 北京

打开千年地宫解决历史之谜 北京地区考古发掘成效显著 赵福生 北京日报9月18日
北京人及其遗址 周国兴 文物天地2:34—36
北京市拣选古代青铜器续志 程长新 文物12:35—38
1981—1983年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掘简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琉璃河考古队（王巍、黄秀纯） 考古5:405—416
北京发现又一件伯嘉父簋 刘俊琪 考古7:590
罕见的古代墓葬 韩锐、李淼 人民画报4:36—38
嵌金铁马镫 首都博物馆 文物4:49
辽韩佚墓发掘报告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黄秀纯、傅公钺） 考古学报3:361—380
北京市密云县元代壁画墓 张先得、袁进京 文物6:57—60

二 天津

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第二次发掘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队（李经汉） 考古8:698—705
天津出土两千多年前文物 汪诚彪 文汇报1月9日

三 上海

从出土文物看上海的历史 徐洁人 文汇报5月23日
上海福泉山古文化遗址发掘出罕见文物器件 光明日报1月15日
六千年上海尽收眼底——青浦福泉山古遗址出土文物印象记 文汇报6月27日
上海福泉山良渚文化墓葬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黄宣佩） 文物2:1—5
发掘福泉山遗址告一段落 文汇报2月24日
上海市郊上海县唐墓 上海博物馆（郑金星） 考古7:633—635

四 河北

河北武安洺河流域几处遗址的试掘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孙德海、刘勇） 考古1:1—14
蔚县夏商时期考古的主要收获 张家口考古队（孔哲生、张文军等） 考古与文物1:40—48
冀东地区商时期古文化遗址综述 文启明 考古与文物6:1—11
唐山市古冶商代遗址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文启明） 考古9:769—778
河北正定县新城铺出土商代青铜器 刘友恒、樊子林 文物12:33—34
河北新乐县中同村战国墓 石家庄地

区文物研究所（高英民） 考古11:971—973
西汉至金代古币十余万枚出土 光明日报9月11日
获鹿出土一批西汉至金代古币 文汇报9月11日
获鹿县发现窖藏十二朝古钱币 光明日报11月11日
河北省徐水县防陵村二号汉墓 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夏清海） 文物4:45—46
石家庄北郊东汉墓 石家庄市文物保管所 考古9:810—812
河北省吴桥四座北朝墓葬 河北省沧州地区文化局（王敏之） 文物9:23—38
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 磁县文化馆（朱全升、汤池） 文物4:1—9
黄骅县北齐常文贵墓清理简报 王敏之 文物9:39—42
河北磁县东陈村北齐尧峻墓 磁县文化馆（朱全升） 文物4:16—22
河北曲阳发现隋代墓志及瓷器 薛增福 文物2:16
河北大名县发现何弘敬墓志 邯郸市文管所（陈光唐） 考古8:721—725
正定天宁寺灵霄塔地宫发掘 河北省古建队灵霄塔勘测组（李士莲） 古建园林技术2:48—52
河北省雄县祁岗村发现古代地道 夏清海 文物6:96
辽中京至南京口外驿道调查 承德地区文化局辽驿调查组（成长福、李柏龄） 社会科学战线1:198—206

五 山东

山东日照沿海发现旧石器地点 徐淑彬、杨深富 人类学学报3·3:295
山东滕县北辛遗址发掘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山东省滕县博物馆（吴汝祚、万树瀛） 考古学报2:159—191
枣庄市南部地区考古调查纪要 枣庄市文物管理站（李锦山、文光） 考古4:289—301
山东潍县狮子行遗址发掘简报 潍坊市艺术馆、潍坊市寒亭区图书馆（曹元启、杨传德） 考古8:673—688
山东栖霞杨家圈遗址发掘简报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严文明、吴诗池等） 史前研究3:91—94
山东曲阜南兴埠遗址的发掘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何德亮） 考古12:1057—1068
山东滕县发现滕侯铜器墓 滕县博物馆（万树瀛、陈庆峰） 考古2:333—337
山东临沭出土的铜器 刘心健、王亮 考古4:351
山东日照崮河崖出土一批青铜器 杨深富 考古7:594—597
山东省淄博发现一个古墓群 人民日报7月27日
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出土高子戈 李剑、张龙海 考古9:815
齐故城五号东周墓及大型殉马坑的发掘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学海、罗勋章） 文物9:14—19
山东沂水刘家店子春秋墓发掘简报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沂水县文物管理站（罗勋章） 文物9:1—10
山东博兴出土齐国货币 常叙政 文

物10:64
山东博兴县出土齐国货币 李少南 考古11:1039—1040
山东博兴县出土铜镜和货币（李少南） 考古11:1041—1044
山东临沂金雀山周氏墓群发掘简报 临沂市博物馆（沈毅） 文物11:41—58
山东昌邑发现窖藏十万枚汉半两钱 曹元启 文物1:80
微型鎏金编钟出土 人民日报8月1日
纪国故城附近出土一批汉代铜器 寿光县博物馆（贾效孔） 考古1:93—94
山东嘉祥县发现二十三块汉画像石 人民日报4月4日
临淄北朝崔氏墓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苏玉琼、蒋英炬） 考古学报2:221—244
山东滕县金苏瑀墓 滕县博物馆（万树瀛、张耘） 考古4:349—351
山东滕县出土金代官印铁权 万树瀛 考古8:764
山东沂水县发现元代铜权 马玺伦 考古3:284
枣庄市出土一件明代铜腰牌 文光、李锦山 文物10:17
山东平邑出土银锭 刘心健、李常松 考古4:383
泰山文物 孙玉平 人民画报6:36—37

六 河南

1979年裴李岗遗址发掘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郑乃武） 考古学报1:23—52
河南新郑唐户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马洪路） 考古3:193—196
登封告成北沟遗址发掘简报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翟继才、司治平） 中原文物4:9—12
河南孟县西后津遗址发掘简报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丁清贤、汪秀锋等） 中原文物4:1—8
河南邓县房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及秦汉墓调查 南阳地区文物工作队、邓县文化馆（王建中） 考古1:91—92
偃师二里头遗址1980—1981年Ⅲ区发掘简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郑光、张国柱） 考古7:582—590
1981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墓葬发掘简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杨国忠） 考古1:37—40
偃师尸乡沟发现商代早期都城遗址 考古4:384
我国考古工作的一项重大发现 偃师发掘出商代早期都城遗址 人民日报3月4日
我国发现商代前期城址 光明日报2月23日
我国考古工作的一项重大发现 商汤的都城在偃师找到了 河南日报3月4日
河南发现商代早期都城遗址，很可能是商汤当年建都的西亳 文汇报3月4日
偃师商城的初步勘探和发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段鹏琦、杜玉生） 考古6:488—504
1983年秋季河南偃师商城发掘简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赵芝荃、徐殿魁） 考

古10:872—879

近年来郑州商代遗址发掘收获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工作站（杨育彬、郭培育等）　中原文物1:11—18

武陟县龙睡村北出土两件商代铜器　千平喜　中原文物4:22

殷墟西区发现一座车马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郑若葵、杨宝成）　考古505—509

安阳殷墟西区孝民屯西南地M1613车马坑的起取和组装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技术室（丁六龙）　考古9:842—845

河南舞阳县吴城北高遗址出土铜爵　朱帜　考古5:426

河南淇县鲍屯发现一件晚商青铜觯　耿青岩　考古9:851

洛阳东关五座西周墓的清理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余扶危等）　中原文物3:25—28

河南平顶山市出土西周应国青铜器　张肇武　文物12:29—31

洛阳近几年来搜集的珍贵历史文物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张剑）　中原文物3:76—80

南阳市北郊出土一批申国青铜器　崔庆明　中原文物4:13—16

河南临汝县出土西周铜匾　杨小栓　考古2:156

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发掘报告　河南信阳地区文管会、光山县文管会（欧潭生）　考古4:302—332

固始出土一批春秋时期楚国铜器　岳广辉、詹汉清　江汉考古1:100

洛阳市西工区203号战国墓清理简报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孙新科）　中原文物3:29—33

郸城县宁平公社出土一件"郑国"青铜戈　王好义　中原文物2:16

淇县赵沟发现两批战国铜器　耿青岩　中原文物2:117

河南淮阳马鞍冢楚墓发掘简报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曹桂岑等）　文物10:1—17

河南淮阳平粮台十六号楚墓发掘简报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淮阳县文物保管所(曹桂岑、张玉石)　文物10:18—27

伊川县发现战国晚期酒器　董昭武　人民日报3月12日

虞城王集西汉墓　商邱地区文管会、虞城县图书馆（阎根齐、翟建军）　中原文物1:19—20

洛阳西汉石椁墓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朱亮）　考古9:807—809

扶沟吴桥村发现汉代画像砖　郝万章　中原文物3:50—53

河南南阳县英庄汉画像石墓　南阳地区文物工作队、南阳县文化馆（赵成甫）　文物3:25—37

河南方城县城关镇汉画像石墓　南阳地区文物工作队、方城县文化馆(柴中庆)　文物3:38—46

项城县老城汉墓出土陶楼　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邓同德、张金云等）　中原文物3:106—107

偃师杏园村发现一座东汉壁画墓　赵芝荃、徐殿魁　光明日报8月12日

浚县出土东汉陶鞋　高同根　中原文物4:12

洛阳唐寺门两座汉墓发掘简报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张剑、余扶危）　中原文物3:34—42

洛阳东关夹马营路东汉墓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朱亮）　中原文物3:43

—49

南阳出土元兴元年铜镜 崔庆明、王振行 江汉考古3:110

河南淇县出土一件北魏铜双耳釜 耿青岩 考古3:277

西晋帝陵勘察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段鹏琦等） 考古12:1096—1107

洛阳涧水东岸发现一座北周墓葬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李德方） 中原文物3:54—55

荥阳发现一大批隋五铢 宋秀兰 中原文物4:58

隋唐东都城遗址出土一件龟形澄泥残砚 李德方 文物8:63

河南新安铁门镇发现的石雕像 赵跟喜 考古4:356

河南偃师杏园村的两座唐墓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徐殿魁、刘忠伏） 考古10:904—914

河南淇县靳庄发现一座唐墓（耿青岩） 考古12:1140—1141

洛阳纱厂路北宋砖瓦窑场遗址发掘简报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隋裕仁等） 中原文物3:59—63

洛阳北宋张君墓画像石棺 黄明兰、宫大中 文物7:79—81

河南巩县宋陵采石场调查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考古队、偃师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段鹏琦等） 考古11:980—985

郏县出土宋代卧童瓷枕 王书源、李俊 中原文物3:88

河南淇县出土白釉加彩童子骑牛 耿清岩、李树长 考古与文物1:112

豫西发掘宋代壁画墓 赵跟喜 文汇报2月13日

临汝县出土一批金代窖藏铜钱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李献奇、侯鸿钧） 中原文物3:64—72

洛阳东花坛三座明代墓葬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赵振华、谢新建） 中原文物3:73—75

荥阳二十里铺明代原武温穆王壁画墓 郑州市博物馆（谢遂莲） 中原文物4:25—26

洛阳首次出土"万历通宝"银钱 谢新建、赵振华 中国钱币3:69

七 山西

丁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80:01地点发掘报告 临汾行署文化局、丁村文化工作站（陶富海） 史前研究2:57—68

太原古交发现旧石器时代石器制造场 王向前、陈哲英 人类学学报3·1:82

山西新绛西马村发现旧石器 王向前 人类学学报3·1:82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首次发现铜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张岱海） 考古12:1069—1071

山西天镇县楼子町发现细石器 陈哲英、吴永春 考古与文物3:1—4

稷山县出土"甘丹"空首布 朱华 中国钱币2:24—25

山西屯留出土一批战国布钱 王进先 文物12:91

山西文水县上贤村发现青铜器 胡振祺 文物6:24—25

山西离石马茂庄汉画像石又有新发现 杨绍舜 文物10:93—94

平朔汉墓群又发现一批珍贵文物 人民日报9月20日

山西平陆出土的汉代农作物 卫斯 农业考古1:248

山西省整理从废铜中拣出的古钱 山西省博物馆整理古钱小组 中国钱币4:74

某部战士挖出北魏石雕 徐定祥 解放军报4月9日

山西找到淹没六百多年的西山大佛 光明日报2月13日

山西临猗发现两幅五代绢画 张献哲 文物7:53

山西长治市故漳金代纪年墓 长治市博物馆（王进先） 考古8:737—743

山西稷山县发现宋金杂剧砖雕 光明日报11月7日

山西浮山出土一组彩釉陶瓷陪葬品 张福有 文物2:95—96

八 内蒙古

内蒙古扎鲁特旗榆毛沟遗址调查（盖山林） 考古11:1037—1038

内蒙古包头市阿善遗址发掘简报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史研究所、包头市文物管理所（崔璇、斯琴等） 考古2:97—108

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发现玉龙 翁牛特旗文化馆（贾鸿恩） 文物6:6

内蒙古白岔河流域岩画调查报告 张松柏 刘志一 文物2:70—76

内蒙古发掘出古代村落遗址 人民日报8月20日

翁牛特旗大泡子青铜短剑墓 贾鸿恩 文物2:50—54

内蒙敖汉旗周家地墓地发掘简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杨虎、顾智界） 考古5:417—426

内蒙古赤峰地区发现的战国钱币 项春松 考古138—144

内蒙古准格尔旗发现"长乐未央"字砖 李三、张俊瑛 文物3:56

内蒙古凉城发现"大泉五铢"钱 师宝珍 中国钱币2:75

内蒙古白灵淖城圐圙北魏古城遗址调查与试掘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包头市文物管理处（张郁、常海等） 考古2:145—152

内蒙古哲里木盟发现的几座契丹墓 哲里木盟博物馆（张柏忠） 考古2:153—156

内蒙古昭乌达盟敖汉旗北三家辽墓 敖汉旗文物管理所（邵国田） 考古11:1003—1011

内蒙古霍林河矿区金代界壕边堡发掘报告 哲里木盟博物馆（邵清隆） 考古2:157—174

内蒙古发掘古老乐器霍比斯 光明日报8月9日

九 陕西

陕西省珍贵文物展览巡礼 石沉 文博3:105—106

陕北的历史文物 王翰章 人文杂志3:102—104

陕西韩城禹门口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 刘士莪、张洲 史前研究1:45—55

大荔人化石地点第二次发掘简报 张森水、周春茂 人类学学报3·1:19—29

陕西临潼白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六队（王仁湘等） 考古11:961—970

西安南殿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

西安半坡博物馆（高强）　史前研究1:56—62
咸阳市、高陵县古遗址调查简报　咸阳地区咸高文物普查队（孙德润等）　考古与文物1:34—39
铜川李家沟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西安半坡博物馆（张瑞岭、高强）　考古与文物1:5—33
陕西华阴南城子遗址的发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工作队（李遇春）　考古6:481—487
陕西旬邑县崔家河遗址调查记　咸阳地区文管会、旬邑县文化馆（曹发展、景凡）　考古与文物4:3—8
陕西岐山王家嘴遗址的调查与试掘　西安半坡博物馆（籍和平）　史前研究3:78—90
陕南发掘一处仰韶文化遗址　秦闻　文汇报2月8日
陕西庞崖马陵两遗址的出土文物　临潼县博物馆　考古1:88—90
陕西耀县北村商代遗址调查记　卢建国等　考古与文物1:49—52
绥德发现两件青铜器　马润臻　考古与文物2:112
陕西清涧县又发现商代青铜器　高雪　考古8:760—761
陕西武功郑家坡先周遗址发掘简报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任周芳、刘军社）　文物7:1—15
扶风刘家姜戎墓葬发掘简报　陕西周原考古队（尹盛平、王均显）　文物7:16—29
扶风北吕周人墓地发掘简报　扶风县博物馆（罗西章、张天恩）　文物7:30—41
长安沣西早周墓葬发掘记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发掘队（卢连成、陈昶）　考古9:779—783
1961—1962年沣西发掘简报　赵永福遗作　考古9:784—789
长安沣西马王村出土"鄦男"铜鼎　珠葆　考古与文物1:66—68
宝鸡县贾村塬发现矢王簋盖等青铜器　王光永　文物6:18—20
宝鸡贾村再次发现矢国铜器　高次若　考古与文物4:107
扶风新出土的青铜器　傅升岐　文博1:38
西周建筑基址勘查　郑洪春　文博3:1—5
陕西长武上孟村秦国墓葬发掘简报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负安志）　考古与文物3:8—17
1982年凤翔雍城秦汉遗址调查简报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焦南峰、马振智等）　考古文物2:23—31
泾阳发现秦望夷宫遗址　张鸿杰　陕西日报3月25日
安唐城郊发现秦代古墓葬　刘康利、李厚志　陕西日报4月10日
淳化县出土秦、汉"市"、"亭"陶文陶器　姚生民　考古与文物3:25—27
秦始皇陵园出土一批陶文　人民日报7月24日
一枚罕见的西汉五铢金币　陈颖　考古与文物4:108
1982—1983年西汉杜陵的考古工作收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杜陵工作队（刘庆柱、李毓芳）　考古10:887—894
西汉洪庆堡出土汉愍儒乡遗物　赵康民　考古与文物6:25—30
咸阳西汉墓清理简报　咸阳市博物馆

（薛恩光）　考古文物5：14—16
陕西勉县金寨新朝墓葬　郭清华　文物4：53—56
陕西黄龙发现四十四字铭文的汉镜　刘在时　文物7：96
陕西华阴县晋墓清理简报　夏振英　考古与文物3：36—42
隋罗达墓清理简报　李域铮、关双喜　考古与文物5：28—31
西安明城墙下发现唐城重要遗址　陕西日报5月11日
西安发现长安唐城遗址　文汇报6月21日
西安东郊出土唐代金银器　保全　考古与文物4：27—28
西安出土唐代李勉奉进银器　保全　考古与文物4：29—31
陕西发现一批罕见中唐古墓　人民日报3月12日
西安西郊出土唐代手写经咒绢画　陕西省博物馆（李域铮、关双喜）　文物7：50—52
陕西出土一幅罕见的唐代绢画珍品　人民日报2月7日
陕西出土一幅罕见的唐代绢画珍品　光明日报2月7日
西安出土一幅罕见的唐代绢画　文汇报2月7日
西安出土宣和通宝铁钱　张更生　中国钱币2：75
西安出土宣和通宝铁钱窖藏　张湘生　中国钱币4：74
汉中市北郊石马坡南宋墓清理记　刘长源　考古与文物5：56—62
扶风出土的宋金时代金银器　扶风县博物馆（罗西章）　考古与文物4：32—36
志丹新发现十三处石窟　陕西日报3月8日
黄陵县发现宋代瓷祖　杨元生　考古与文物3：92
绥德县出土的明五彩饕餮纹瓷方鼎　朱捷元　文物6：23
黄龙县发现大顺政权钱币　姬乃军　考古与文物5：63
陕西安塞发现吴三桂铸造的货币　姬乃军　考古与文物5：85

一〇　甘肃

甘肃泾川发现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　刘玉林等　人类学学报3·1：11—18
甘肃大地湾新石器文化遗址经科学发掘显露于世　光明日报11月17日
甘肃秦安王家阴洼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　甘肃省博物馆大地湾发掘小组（张朋川、阎渭清）　考古与文物2：1—17
甘肃临潭县出土鱼嘴形陶壶　李振翼　考古与文物4：109
甘肃临夏莲花台发现辛店文化遗物　石龙、李成瑞　文物9：94—95
甘肃永昌三角城沙井文化遗址调查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武威地区展览馆（蒲朝绂、赵建龙）　考古7：598—600
甘肃境内秦长城遗迹调查及考证　陈守忠　历史教学问题2：13
甘肃庆阳野林汉墓　庆阳地区博物馆　许俊臣、李红雄　文物4：47—49
铅制钱并非自五代十国始　兰州发现西汉古钱　武扬　文汇报2月13日
武威西郊发现西夏墓　宁笃学　考古与文物4：111

一一　青海

柴达木首次发现旧石器和南极石　人

民日报11月15日

我国西北首次发现有层位根据的旧石器 光明日报11月14日

青海龙羊峡达玉台遗址的打制石器 青海省文物考古队（王国道、刘国宁） 考古7:577—581

青海民和阳洼坡遗址试掘简报 青海省文物考古队 考古1:15—20

青海民和县阳山墓地发掘简报 青海省文物考古队（彭云） 考古5:388—395

青海湖环湖考古调查 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高东陆） 考古3:197—202

青海省哈龙沟、巴哈毛力沟的岩画 许新国、格桑本 文物2:80—83

一二 宁夏

宁夏发现三处匈奴古墓 人民日报1月29日

宁夏吴忠县关马湖汉墓 宁夏博物馆关马湖汉墓发掘组（许成） 考古与文物3:28—35

宁夏古长城概况 宁夏文化厅、宁夏博物馆长城联合调查组 宁夏日报2月29日

宁夏固原北魏墓清理简报 固原县文物工作站（韩孔乐、韩兆民） 文物6:46—56

宁夏发掘一座大型北周古墓 人民日报3月12日

宁夏发掘一座北周古墓 光明日报3月4日

北周李贤墓的发掘证明隋唐文化的渊源不是北齐而是北周 光明日报8月5日

一三 新疆

新疆哈密拉甫乔克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 王炳华 考古与文物4:105—106

新疆鄯善苏巴什古墓葬 吐鲁番地区文管所（柳洪亮、阿不里木） 考古1:41—50

天山南麓发现巨大古墓葬区 人民日报1月2日

新疆和田发现一处汉代墓葬群 光明日报3月24日

新疆考古所完成乌鲁木齐南郊一批古墓葬的发掘工作 胡祖源 光明日报5月2日

新疆焉耆汉—唐古城出土唐龟符（何休） 文物10:30

新疆拜城发现一座千佛洞 王学民 人民日报3月12日

新疆木垒县出土的石磨棒 戴良佐 考古1:40

一四 辽宁

辽宁发掘出古人类洞穴遗址 人民日报3月12日

旧石器时代的猿人骨化石辽宁营口金牛山遗址掘出 人民日报10月29日

营口发现一具较完整的猿人化石 人民日报11月29日

辽宁发现罕见猿人化石 夏竞峰、赵学文 文汇报11月15日

辽宁省发掘出小孤山洞穴遗址 光明日报1月24日

丹东市东沟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和试掘 丹东市文化局文物普查队（许玉林、高洪珠） 考古1:21—36

大连市郭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 辽宁省博物馆（许玉林、苏小幸） 考古学报3:287—328

辽宁建平县红山文化考古调查 李宇

峰 考古与文物2:18—22

辽宁阜新县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的发现 方殿春、刘葆华 文物6:1—5

辽宁发现五千年前原始神殿遗址 人民日报1月20日

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郭大顺、张克举） 文物11:1—11

辽宁大连新金县碧流河大石盖墓 旅顺博物馆（刘俊勇） 考古8:709—711

辽宁新金县花儿山张店出土马蹄金 许明纲 考古2:190—191

辽宁本溪晋墓 辽宁省博物馆（沈白文） 考古8:715—720

辽阳市发掘一座西晋大型家族合葬墓 人民日报1月2日

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等（李庆发） 文物6:29—45

（辽宁）阜新市两名工人挖到古铜钱五百斤 人民日报1月2日

辽宁锦州市张扛村辽墓发掘报告 刘谦 考古11:990—1002

辽宁朝阳县发现辽代张让墓志 李宇峰 考古5:480

辽宁北镇县发现辽代铜犁范（刘骊） 考古11:1050

辽阳市发现金代《通慧圆明大师塔铭》 邹宝库 考古2:175—177

一五 吉林

吉林大安县洮儿河下游右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王国范等） 考古8:689—697

梨树陈家屯遗址调查 刘景文 博物馆研究3:85—87

吉林通榆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 王国范 黑龙江文物丛刊4:50—59

通榆敖包山遗址调查 吴喜才、田广生 博物馆研究3:88—91

吉林怀德县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 赵广乐 考古8:759

东丰县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王洪峰、谷德平 东北师大学报3:封三

农安田家坨子遗址新出土几件陶器 万顺 博物馆研究2:116

吉林磐石吉昌小西山石棺墓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张英、王侠） 考古1:51—58

吉林永吉县乌拉街出土"触角式剑柄"铜剑 陈家槐 考古2:189

吉林乾安县大布苏泡东岸遗址调查简报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刘法祥） 考古5:396—404

长春市德惠县原始文化遗址调查述要 刘红宇 博物馆研究1:65—69

吉林双阳万宝山石棺墓 许彦文 黑龙江文物丛刊3:48—49

扶余一处窖藏出土的古钱 谷潜 博物馆研究3:92—95

吉林九台出土窖藏铜钱 谷潜 中国钱币1:78—79

集安高句丽国内城址的调查与试掘 集安县文物保管所（阎毅之、林至德） 文物1:47—54

汪清百草沟新出土的文物 侯莉闽 博物馆研究1:70—76

集安县上下活龙村高句丽古墓清理简报 集安县文物保管所（孙仁杰） 文物1:64—70

吉林、辽宁的高句丽遗迹 王承礼 考古与文物6:31—33

集安高句丽考古的新收获 吉林省考古研究室、集安县博物馆（方起

东、林至德） 文物1:38—46

吉林集安五盔坟四号墓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李殿福） 考古学报1:121—136

1976年集安洞沟高句丽墓清理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集安文管所（柳岚、张雪岩） 考古1:69—76

集安县新发现的两处高句丽墓群 集安县文物保管所（孙仁杰、迟勇） 博物馆研究1:77—78

集安县老虎哨古墓 集安县文物保管所（赵书勤）文物1:71—74

和龙县西古城及其附近渤海遗迹调查 严长录 博物馆研究1:79—36

珲春马滴达渤海塔基清理简报 张锡瑛 博物馆研究2:91—94

长白灵光塔维修中发现地宫 方舟 博物馆研究2:119

吉林通榆县团结屯辽墓 刘法祥、刘景文 考古9:859—861

吉林发现辽代银质符牌 文汇报4月1日

一六 黑龙江

桦川万里霍通原始社会遗址调查 郝思德 黑龙江文物丛刊1:35—40

鹤岗市郊梧桐河下游右岸的几处原始社会遗址 邹晗 黑龙江文物丛刊1:41—43

富拉尔基老龙头原始社会遗址调查 齐齐哈尔文物管理站（傅惟光、辛建） 黑龙江文物丛刊2:69—71

大庆市大同区考古调查 大庆市文物管理站（李俊武、唐国文） 黑龙江文物丛刊3:43—47

黑龙江富裕县小登科出土的青铜时代遗物 张泰湘、曲炳仁 考古2:187—188

黑龙江肇源小拉合、狼坨子青铜时代遗址调查简报 郝思德、李砚铁 黑龙江文物丛刊4:60—64

尚志县细鳞河大队出土一批窖藏铜钱 贺文章 黑龙江文物丛刊1:65

拉林河沿岸的辽金遗迹 庞志国、夏若英 黑龙江文物丛刊2:74—76

安达县昌德公社小南山墓群简介 安达县图书馆（郑春林） 黑龙江文物丛刊2:72—73

黑龙江发掘一座十三世纪金代古墓 学习与探索5期封三

哈尔滨王岗华滨金墓 景爱 黑龙江文物丛刊4:64—65

一七 江苏

江苏泗洪发现一千万年前古猿类化石 人民日报5月12日

江苏泗洪发现古猿类牙齿化石 光明日报5月12日

常州圩墩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 常州市博物馆 史前研究2:69—81

江苏昆山绰墩遗址的调查与发掘 南京博物院、昆山县文化馆（汪遵国、陈兆弘） 文物6:6—11

江苏武进寺墩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遗物 常州市博物馆（陈丽华） 文物2:17—22

1982年江苏常州武进寺墩遗址的发掘 南京博物院（汪遵国等） 考古2:109—129

江苏常熟良渚文化遗址 常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黄步青、徐振球） 文物2:12—16

江苏丹徒大港母子墩西周铜器墓发掘简报 镇江博物馆、丹徒县文管会（肖梦龙） 文物5:1—10

江苏丹徒县石家墩西周墓　镇江市博物馆（刘建国）　考古8:706—708

无锡庙山石室土墩墓　无锡市博物馆（钱屿）　考古与文物3:22—24

江苏吴县何山东周墓　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张志新）　文物5:16—20

江苏武进孟河战国墓　镇江市博物馆（肖梦龙）　考古2:135—137

徐州石桥汉墓清理报告　徐州博物馆（王恺、李银德）　文物11:22—40

东汉彭城相缪宇墓　南京博物院、邳县文化馆（尤振尧等）　文物8:22—29

镇江东吴西晋墓　镇江博物馆（刘建国）　考古6:528—545

江苏邗江发现两座南朝画像砖墓　扬州博物馆（吴炜）　考古3:243—248

江苏镇江发现六朝古城墙遗址　光明日报6月26日

扬州出土的唐代水盂和水注　周长源　考古8:726—729

扬州两次出土唐代船形银铤　韩荣福、周长源　中国钱币4:68

一八　安徽

安徽颍上县出土一批商周青铜器　马人权　考古12:1132—1133

安徽肥西县金牛春秋墓　杨鸠霞　考古9:852

安徽省和县发现古代窖藏铜钱　张宏明　考古12:1136—1137

安徽南陵县麻桥东吴墓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李德文）　考古11:974—978

安徽和县西晋纪年墓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和县文物组（杨立新、叶永相）　考古9:826—832

一九　浙江

浙江定海唐家墩又发现一批石器　王和平　考古1:86—87

浙江嘉善新港发现良渚文化木筒水井　陆耀华、朱瑞明　文物2:94—95

浙江衢州西山西周土墩墓　金华地区文管会（贡昌）　考古7:591—593

浙江衢州市发现原始青瓷　衢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金羽等）　考古2:130—134

浙江舟山地区出土的青铜农具和破土器　王和平　农业考古1:40—42

浙江鄞县出土春秋时代铜器　曹锦炎、周生望　考古8:762—764

绍兴30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绍兴地区文化局（牟永抗）　文物1:10—26

绍兴狮子山东汉墓　绍兴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沈作霖）　考古9:813—815

鄞县出土一批东汉文物　魏鸣　文汇报　1月7日

浙江海宁长安镇画象石　岳凤霞、刘兴珍　文物3:47—53

浙江衢州市三国墓　衢州市文管会（崔成实）　文物8:40—42

浙江常山县何家西晋纪年墓　贡昌　考古2:192

浙江奉化县南梁墓　周瑞燕等　考古9:855—856

浙江首次出土五铢铁钱　陈浩　中国钱币2:12

浙江金华古方六朝墓　金华地区文管会（贡昌）　考古9:816—825

浙江诸暨发现唐代铭文铜钟　方志良、张光助　文物12:92

浙江淳安县朱塔发现唐代窖藏银器 浙江省博物馆(张翔) 考古11:979

杭州三台山五代墓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林华东) 考古11:1045—1048

浙江永嘉发现宋代窖藏银器 金柏东、林鞍钢 文物5:82—85

钱塘江观潮古塔新发现地下一层 光明日报10月14日

二〇 福建

福建闽侯黄土仑遗址发掘简报 福建省博物馆(陈龙等) 文物4:23—37

福建发现一座目前江南罕见的汉城遗址 光明日报8月19日

福建莆田唐墓 林公务 考古4:378—380

泉州河市公社发现唐墓 黄炳元 考古12:1138—1139

泉州法石发现宋代碇石 陈鹏、杨钦章 考古10:903

福州琉球墓群 朱振声 福州历史与文物1:2

二一 江西

江西靖安出土西周甬钟 严霞峰 考古4:375

江西瑞昌墩北张出土战国铜器 刘礼纯 考古10:959

湘西古丈出土一批先秦文物 人民日报8月20日

〔江西〕高安县发现古墓群 人民日报8月1日

大余县出土西晋龙首凤尾青铜鐎斗 张小平 文物11:68

南昌市区清理一座东晋墓 陈定荣、许智范 考古4:376—377

江西赣县南齐墓 赣州市博物馆(薛翘) 考古4:345—348

江西永修南朝梁墓 杨后礼 考古1:95—96

江西九江市、乐安县发现宋墓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乐安县博物馆(李科友、梅绍裘) 考古8:733—736

江西铅山县莲花山宋墓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铅山县文化馆(王立斌、陈定荣) 考古11:986—989

江西丰城发现元影青雕塑戏台式瓷枕 丰城县历史文物陈列室(万良田) 文物8:82—84

明昭勇将军戴贤夫妇合葬墓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彭适凡、李科友) 文物10:927—930

二二 湖北

湖北王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 湖北荆州地区博物馆(张绪球等) 考古学报2:193—220

秭归龚家大沟遗址的调查试掘 湖北省博物馆考古部(陈振裕、杨权喜) 江汉考古1:3—20

湖北监利县柳关和福田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 荆州地区博物馆(张绪球) 江汉考古2:1—6

宜昌县杨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 宜昌地区博物馆等(余秀翠、王劲) 江汉考古4:27—37

天门龙嘴遗址调查 天门县博物馆(范学斌、周文) 江汉考古2:20—22

枣阳县雕龙碑遗址调查简报 襄阳地区博物馆(阎金安) 江汉考古3:14—18

大悟县几处古遗址的调查 孝感地区博物馆、大悟县博物馆(熊卜发) 江汉考古1:24—31

随州西花园、庙台子遗址发掘简述 武汉大学考古教研室（方殷） 江汉考古3：12—13

武昌县豹獬、湖泗古文化遗址调查简报 武汉市文物管理处文物普查队（姚晶华、郝钢以） 江汉考古1：21—23

襄阳三步两道桥遗址调查 湖北省博物馆（朱青平） 江汉考古2：17—19

房县七里河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 湖北省博物馆等（王劲、林邦存） 江汉考古3：1—11

西花园——庙台子遗址考古发掘喜获硕果 吴力 武汉大学学报4：29

大冶古文化遗址考古调查 黄石市博物馆 江汉考古4：8—16

湖北随县发现商周青铜器 随州市博物馆（王世振） 考古6：510—514

阳新县和尚垴遗址调查简报 咸宁地区博物馆、阳新县博物馆（彭明麒） 江汉考古4：17—26

沙市周梁玉桥商代遗址中的扬子鳄 李天元 江汉考古2：95—96

枣阳东赵湖再次出土青铜器 徐正国 江汉考古1：106

当阳磨盘山西周遗址试掘简报 宜昌地区博物馆（卢德佩） 江汉考古2：7—12

西陵山麓发现周代文化遗址 宝琳、定富 江汉考古3：58

湖北广济发现一批周代甬钟 湖北省博物馆、广济县文化馆（梁柱） 江汉考古4：38—47

秭归官庄坪遗址试掘简报 湖北省博物馆（胡雅丽、王红星） 江汉考古3：19—36

稀世文物"吴王夫差矛"出土 人民日报1月7日

稀世文物"吴王夫差矛"在湖北江陵出土 光明日报1月8日

大冶县发现草王嘴古城遗址 大冶县博物馆 江汉考古4：66

随州安居遗址初次调查简报 武汉大学荆楚史地与考古研究室（王光镐等） 江汉考古4：1—7

江陵溪峨山楚墓 湖北省博物馆江陵工作站（杨定爱） 考古6：515—527

湖北荆州砖瓦厂2号楚墓 荆州地区博物馆（刘德银） 江汉考古1：32—37

随州擂鼓墩砖瓦厂十三号墓发掘简报 随州市博物馆（王世振） 江汉考古3：37—41

江陵张家山701号楚墓清理简报 荆州地区博物馆（王从礼） 江汉考古2：13—16

大冶县发现一战国墓葬 大冶县博物馆 江汉考古4：16

湖北黄冈县禹王城出土一批铜蚁鼻钱和其它文物（吴晓松） 考古12：1095

汉川南河汉墓清理简报 汉川县文化馆（张远栋） 江汉考古4：48—57

湖北云梦瘌痢墩一号墓清理简报 云梦县博物馆（徐桥华等） 考古7：607—614

宜昌市六朝墓清理简报 宜昌市文物处（周之梅） 江汉考古1：38—40

鄂城两座晋墓的发掘 湖北省博物馆（贺中香） 江汉考古3：41—48

武汉测绘学院隋墓发掘简报 武汉市文物管理处（魏航空、郝钢以） 江汉考古1：41—44

黄石市新下陆一号唐墓 黄石市博物馆（龚长庚） 江汉考古1：45—49

江陵雨台山出土唐代云龙纹青铜镜 韩楚文 江汉考古1：102

安陆蒋家山发现宋代墓群　熊卜发等　江汉考古2:96

湖北襄樊羊祜山出土宋代银铤　崔新社　文物4:96

钟祥明显陵调查记　李登勤　江汉考古4:58—64

沔阳出土明代端砚　姚高悟　江汉考古2:98—99

淘取河沙喜获古钟　李金桥　江汉考古3:84

二三　湖南

湘乡岱子坪新石器时代遗址　湖南省博物馆（何介钧等）　湖南考古辑刊2:1—25

湖南华容县试掘车轱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郭胜斌　江汉考古1:68

湖南省华容县发现罕见的氏族墓　光明日报8月10日

沅江县漉湖石君山遗址（单先进、邓企华）　考古9:846—848

岳阳市新出土的商周青铜器　岳阳市文物管理所（张经辉，符炫）　湖南考古辑刊2:26—28

湖南耒阳县出土西周甬钟　蔡德初　文物7:49

长沙县出土春秋时期越族青铜器　湖南省博物馆（金则恭）　湖南考古辑刊2:35—36

祁东小米山发现春秋铜器　衡阳地区文物工作队　湖南考古辑刊2:203

衡阳市苗圃五马归槽茅坪古墓发掘简报　衡阳市博物馆（冯玉辉）　考古10:880—886

湖南慈利官地战国墓　高中晓、袁家荣　湖南考古辑刊2:78—80

湖南省湘西出土一批先秦文物　光明日报8月20日

湘西辰溪、溆浦发现青铜剑　陈启家等　湖南考古辑刊2:204

长沙树木岭战国墓阿弥岭西汉墓　湖南省博物馆（熊传新）　考古9:790—797

湖南溆浦马田坪战国西汉墓发掘报告　湖南省博物馆、怀化地区文物工作队（熊传新、向开旺）　湖南考古辑刊2:38—69

马王堆三号汉墓地形图古城邑的调查　周世荣　湖南考古辑刊2:81—86

湖南攸县发现西汉五铢钱铜范　李孔壁　文物1:46

攸县、澧县、邵阳发现古钱窖　湘茂等　湖南考古辑刊2:214—215

湖南新宁县出土汉代窖藏铜钱　杨平怀　考古12:1137

湘西吉首出土錞于　林时九　文物11:75

保靖县清理一座东汉墓　刘长治　湖南考古辑刊2:205

安乡余家台子发现东汉墓　雷明　湖南考古辑刊2:206—207

益阳羊舞岭战国东汉墓清理简报　益阳地区文物工作队（盛定国）　湖南考古辑刊2:70—77

湖南资兴东汉墓　湖南省博物馆（傅举有）　考古学报1:53—120

湖南望城县东吴墓　长沙市文物工作队（何强）文物8:43—45

湖南资兴晋南朝墓　湖南省博物馆（傅举有）考古学报3:335—359

衡阳县何家皂北宋墓　陈国安、冯玉辉　文物12:73—76

临澧县新合出土一批窖藏金银器　常德地区文物工作队（杨启乾）　湖南考古辑刊2:113—119

慈利县出土的元代铜镈　刘廉银　文

物5:81

湖南通道发现南明窖藏银器 怀化地区文物工作队、通道县文化局（舒向今等） 文物2:88—93

二四 四川

川西发现晚更新世人类化石 宗冠福、黄学诗 化石4:15

四川宜宾南部首次发现新石器时代遗物 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实习队（范勇等） 考古与文物4:1—2

四川盐源县轿顶山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 邹麟、刘世旭 考古9:849—850

四川荥经曾家沟战国墓群第一、二次发掘 四川省文管会等（赵殿增等） 考古12:1072—1084

四川荥经县烈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 李晓鸥、刘继铭 考古7:602—606

四川犍为县巴蜀墓发掘简报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王有鹏） 考古与文物3:18—21

四川甘孜发现大型古墓群 光明日报7月18日

四川涪陵西汉土坑墓发掘简报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涪陵县文化馆（范桂杰、胡昌钰） 考古4:338—344

重庆市发现西汉陶井圈 蒋万锡 考古与文物4:112

四川巫溪荆竹坝崖葬调查清理简报 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崖墓科研小组（王和平） 考古与文物6:22—24

四川宜宾县黄伞崖墓调查及清理简报 四川大学历史系七八级考古实习队、宜宾县文化馆（罗柏健等） 考古与文物6:12—21

四川西昌天王山十号墓清理简报 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黄承宗） 考古12:1092—1095

四川涪陵东汉崖墓清理简报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胡昌钰、黄家祥） 考古12:1085—1091

四川崇庆县五道渠蜀汉墓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崇庆县文化馆（陈显双） 文物8:46—48

四川绵阳出土鹿纹画像砖 何志国 考古4:301

西昌发现古代火葬墓 黄承宗 考古9:857—858

宜宾县双龙、横江两区岩穴墓调查记 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78级实习队、四川省宜宾县文化馆（刘豫川等） 考古与文物2:46—58

四川荣昌县沙坝子宋墓 四川省博物馆、荣昌县文化馆（李显文、陈显双） 文物7:72—78

四川德阳县发现宋代窖藏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德阳县文物管理所（范桂杰、胡昌钰） 文物7:82—84

四川江油县发现宋代窖藏 江油县文物保护管理所（黄石林） 考古与文物6:52—55

四川大邑县安仁镇出土宋代窖藏 大邑县文化馆（胡亮） 文物7:91—94

四川双流县出土的宋代银铤 成都市文物管理处（张肖马） 文物7:95—96

四川阆中县出土宋代窖藏 阆中县文化馆（张启明） 文物7:85—90

四川三台县发现一批宋镜 三台县文化馆（杨重华） 考古7:669

二五 贵州

贵州铜梓新发现的人类化石 吴茂霖 人类学学报3·3:195—201

贵州新发现一处古人类和旧石器遗址

曹波 人类学学报3·2:182—183

贵州新发现六个旧石器地点 蔡回阳 人类学学报3·4:413—414

贵州省松桃出土的虎钮錞于 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李衍垣） 文物8:67—68

二六 云南

禄丰古猿化石地点进行了第九期发掘 徐庆华 人类学学报3·2:182

云南沧源、河口发现旧石器 张兴永 人类学学报3·2:182

云南发现一处原始崖画 人民日报5月26日

云南发现两处原始崖画 光明日报1月8日

昆明上马村五台山古墓清理简报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王大道、马荫何） 考古3:213—221

云南祥云县检村石棺墓 （田怀清、杨德文） 考古12:1134—1135

云南姚安西教场黄牛山石棺墓 姚安县文化馆（郭开云） 考古7:667—668

昆明呈贡石碑村古墓群第二次清理简报 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胡绍锦） 考古3:231—242

二七 广东

广东出土两件原始石器 文汇报11月15日

广东廉江县出土新石器和青铜器 阮应祺 文物6:85

广东南海县灶岗贝丘遗址发掘简报 广东省博物馆（何纪生） 考古3:203—212

岭南考古的重大发现——南越王墓重见天日 越秀、李淼 人民画报8:32—35

西汉南越王墓发掘初步报告 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 考古3:222—230

广东揭阳东晋、南朝、唐墓发掘简报 广东省博物馆、汕头地区文化局等（杨耀林、陈瑞和） 考古10:895—903

广东阳春县发现南汉钱范 朱非素 考古4:381—382

广东阳春县发现南汉"乾亨重宝"钱范 阮应祺、刘鸿健 文物12:67

广东紫金县宋墓出土石雕 杨少祥 考古6:574—576

广东南雄宋代陶罐墓 雷时仲 考古7:601

高州县旧城"陈仓米"的初步调查 阮应祺 农业考古1:263

广东南雄县发现一座明墓 （雷时仲） 考古11:1053

二八 广西

广西百色地区打击石器地点复查 何乃汉 人类学学报3·3:294

近年来广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蒋廷瑜、兰日勇） 考古9:798—806

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县出土一批战国铜器 覃光荣 考古9:853—854

广西贵县风流岭三十一号西汉墓清理简报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何乃汉、张宪文） 考古1:59—62

广西柳州市九头村一号汉墓 柳州市博物馆（黄云忠等） 文物4:50—52

沥尾岛考古调查 覃义生 文物9:92—94

广西贺县两座东吴墓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兰日勇等） 考古与文物4:9—12

广西荔浦县发现汉—晋窖藏古铜钱（于凤芝）文物11:40

广西融安安宁南朝墓发掘简报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覃彩銮、郑超雄） 考古7:627—632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隋唐墓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韦仁义、佟显仁 考古3:249—263

二九 台湾

高雄出土新石器时代文物；再次证实史前台湾大陆先民一脉相承，百万年前台湾是与大陆相连的半岛 人民日报3月19日

高雄出土新石器时代文物 人民日报3月19日

三〇 西藏

西藏发现一批古墓群 人民日报10月3日

伍 美术考古

一 雕塑

阴山史前狩猎岩画研究 盖山林 内蒙古师大学报（自然）1:64

阴山人形岩画尾饰试析 盖山林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3—95

阴山岩画艺术赏析 盖山林 美术1:60—63

从图画记事谈阴山岩画 盖山林 黑龙江文物丛刊2:80—84

将军崖岩画考 陈履生 艺苑2:24—29

新发现的邱北、麻栗坡原始崖画 杨天佑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82

中国古代岩画中所见的原始宗教 周星 世界宗教研究1:113

新发现的贺兰山古代岩画 许成等 宁夏日报3月5日

库鲁克山的岩画 胡邦铸 新疆艺术1:17

新疆天山以北岩画述略 成振国、张玉忠 文物2:77—79

洛阳出土陶俑艺术概论 苏健、王绣 中原文物3:93—98

试论南乐出土东汉石砚的雕刻艺术 史国强 中原文物2:42—45

孔望山杯柈刻石考 丁义珍 文物8:30—33

笑颜常开—弥勒横眉怒目四天王——介绍开封大相国寺天王殿佛像艺术 中州今古4:44—45

隆兴寺悬塑观音和塑壁 陈耀林 美术5:57—58

西安发现唐代礼佛奏乐图石刻佛座 姜克任、刘炎 文物10:94

大足宝顶石刻“九龙浴太子图”浅析 胡文和 世界宗教研究1:78

大足石刻中新发现的鲁班像 邓之金等 四川日报8月18日

山东长清灵岩寺罗汉像的塑制年代及有关问题 济南市文管会、济南市博物馆等(周福森) 文物3:76—82

云南白族古代摩崖石刻简介 章虹宇 历史知识6:42

兴城祖氏石坊 林雨、陈白 辽宁大学学报4:封三

西藏明清雕塑与绘画 安旭 美术研究3:69—78

民间石雕艺术的一束鲜花 巩县康百万地主庄园石雕介绍 崔耕 中原文物2:80—83

对泉州湿婆雕像的探讨 杨钦章 南亚研究1:7

元代的木刻画——《中国古花刻画史

略》选刊（三） 郑振铎 版画世界5:28

二 画像石、砖

试谈汉画像石艺术 刘小敏 历史知识5:46—47
汉墓壁画、画像石题材内容试探 夏超雄 北京大学学报1:63—76
南阳汉画像石研究 王今栋 美术3:58—61
泗洪重岗汉代农业画像石刻研究 尤振尧、周晓陆 农业考古2:72—82
《山东汉画像石选集》中未详历史故事考释 刘敦愿 东岳论丛2:79—83
孝堂山石祠画像、年代及主人试探 夏超雄 文物8:34—39
汉代角抵戏初探——对汉画像石中的角抵戏的考察 孙世文 东北师大学报4:67—71
密县发现汉画像石题记 魏殿臣 中原文物2:65
河南汉画中的杂技艺术 吕品、周到 中原文物2:32—36
汉画像中马的艺术 王今栋 中原文物2:26—31
邙洛北魏孝子画像石棺考释 宫大中 中原文物2:48—53

三 陵墓雕刻

从洛阳出土北魏石棺和石棺床看世俗艺术中的石刻线画 黄明兰 中原文物1:87—90
兴宁陵石雕艺术 负安志 美术4:62—63
昭陵十四国君长石像考 孙迟 文博2:56—63
唐风余韵犹存人间——前蜀皇帝王建墓伎乐队石雕赏析 修海林 文物天地4:40—43

四 造像

曲阳修德寺遗址石造像出土三十周年有感 范登 故宫博物院院刊4:43—47
耀县药王山的佛道混合造像碑 韩伟、阴志毅 考古与文物5:46—51
固原县新集公社出土一批北魏佛教造像 固原县文物站（杨明） 考古与文物6:34—35
河南浚县大石佛年代考 贠玉成 考古与文物2:109—112
延安地区发现一批佛教造像碑 靳之林 考古与文物5:32—45
耀县药王山摩崖石刻造像 负安志、翟春玲 文博创刊号53—60
洛阳东马沟出土隋代石雕老君像 谢新建 中原文物3:108
洛阳徐村发现一批唐代石刻造像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梁晓景） 中原文物3:56—58
西安慈恩寺发现唐代线刻菩萨像残石 倪志俊 文物3:53
巴中水宁寺摩崖造像 负安志 文博3:6—9
关于唐朝元阁白石老君像的制作年代及作者问题 朱捷元、单玮 考古与文物4:98—99
洛阳魏唐造像碑摭说 宫大中 文物5:44—56
扶沟道清寺出土两尊石刻造像 郝万章、胡春长 中原文物1:100
山东博兴出土百余件北魏至隋代铜造像 李少南 文物5:21—31
谈山东博兴出土的铜佛造像 丁明夷 文物5:32—43
山东博兴的一处铜佛像窖藏 李少南

文物5:95—96

临潼出土一批南北朝鎏金铜佛 居顺、忠信等 陕西日报3月18日

山西省武乡县党城村出土七件北朝铜造像 李勇、刘军 文物5:57—59

陕西出土了二百多尊鎏金铜佛 光明日报3月26日

临潼发现二百多尊铜佛像 赵康民 文博创刊号52

千阳县发现大批唐代鎏金铜造像 樊晓祖、刘宝爱等 考古与文物5:52—55

陕西陇县发现鎏金造像 王光永 考古与文物3:98

五 石窟寺艺术

中国佛教石窟寺 贾梅仙 自修大学6:38—40

新疆克孜尔千佛洞分期问题浅探 朱英荣 新疆大学学报4:30—46

克孜尔新一窟试论 许宛音 文物12:5—13

新疆拜城克孜尔千佛洞1号窟 朱英荣 文物12:1—3

甘肃的石窟 宁山 地理知识4:15

从一条新资料谈藏经洞的封闭 贺世哲 西北史地3:83—86

深山瑰宝——炳灵寺石窟 黄成宝 文汇报1月4日

甘肃泾川王母宫石窟调查报告 甘肃省博物馆（张宝玺） 考古7:622—626

龙门奉先寺的开凿年代 （日）冈田健 美术研究2:60—65

《河洛上都龙门山之阳大卢舍那像龛记》注释 温玉成 中原文物3:99—100

武则天与龙门石窟 温玉成 历史知识6:40—41

黄河中游南岸发现北魏石窟 人民日报10月15日

河南巩县石窟寺再次发现造像龛 傅永魁 考古与文物4:13—21

巩县石窟寺 孙宪周 中州今古5:52—55

天龙山石窟艺术 沈海驹 美术6:58—60

响堂山石窟造像的特征 李文生 中原文物1:30—34

对《延安地区的石窟寺》一文的订正 靳之林 文物12:25—28

六 古代建筑

从巢穴到宫室——漫话原始社会的居住建筑 杨鸿勋 文物天地2:38—40

周原西周建筑基址概述 陈全方 文博创刊号5—12页；2:9—14

梁孝王墓地宫的建筑艺术 刘永信 中原文物2:84—87

汉太室阙"象"形新议 陈汉平 中原文物4:81

武陟县陶楼是四阿顶不是歇山顶——兼谈汉代的歇山屋顶 杨焕成 中原文物4:82—83

绚丽多彩的河南古代建筑艺术 杨焕成 中原文物2:88—92

渤海的建筑 魏存成 黑龙江文物丛刊4:36—43

关于渤海上京城出土的两件琉璃脊件名称 井庆升 古建园林技术2:55

我国伊斯兰寺院建筑艺术源流初探 孙宗文 古建园林技术1:44—49；2:25—30；3:39—46

千姿百态的古塔 翁一 民族画报2:34—37

河南安阳宝山寺北齐双石塔 杨宝顺

等 文物9:4—44
经大雁塔保管所考察认定大雁塔确是唐代原貌 贾文熙、孟西安 光明日报1月8日
北宋东京两名塔 徐伯勇 文物天地4:29—31
悟颖塔 杨焕成 中州今古4:36—37
北宋"料敌"用的定县开元寺塔 朱希元 文物3:83—84
农安古塔 庞志国、樊远生 博物馆研究1:87
吐鲁番的"苏公塔" 曾捷 西北史地4:121—122
关于泉州宋代洛阳桥的建筑年代 曾维华 文物9:91
甘泉发现一座元代石窟庙 高明尧、吴锦德 陕西日报3月19日
紫禁城钟粹宫建造年代考实 郑连章 故宫博物院院刊4:58—67
东山明代砖装修 李岳荣 古建园林技术3:18—22
明清建筑翼角的构造、制作与安装 北京市第二房屋修缮工程公司古建科研设计室 古建园林技术1:14—21；2:2—12
景仁宫正殿外檐装修 白丽娟 故宫博物院院刊3:95—96
清式建筑墙身摆砌技术 北京市第二房屋修缮工程公司古建科研设计室（张海清、尤贵友等） 古建园林技术3:2—7
垂花门的种类和构造 马炳坚、徐新伟 古建园林技术3:8—17
古建砖料及加工技术 北京市第二房屋修缮工程公司古建科研设计室 古建园林技术1:22—24
略谈古建筑的"倾壁" 张驭寰 古建园林技术1:11—13
浅谈古建筑彩画中龙凤的造型与装饰特点 高成良 古建园林技术3:23—24
要重视对古建筑的保护 张承佑 古建园林技术2:58—60
古建筑灰浆 北京市第二房屋修缮工程公司古建科研设计室 古建园林技术2:13—14
佛八宝 路长 古建园林技术2:56—57
古建筑的维护与加固问题 方复 古建园林技术1:31
古建筑的管理与保护 陈孟东 文博2:81—90
古建筑的维修 刘最长 文博2:91—99
我国文物保护工作有成绩七年修缮古建筑石窟千余处 文汇报5月8日
漫谈建国以来河南古建筑的保护工作 张家泰、杨焕成 中州今古6:38—39

七 陶瓷器与窑址

论述

裴李岗文化的陶器制作工艺 赵世纲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2:1—3
试析仰韶文化彩陶的泥料、制作工艺、轮绘技术和艺术 李湘生 中原文物1:53—59
浅谈山东龙山文化的陶器 吴诗生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2:4—7
龙山文化中出土的原始青瓷 黄石林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2:80—81
试谈商周青铜冶铸和原始青瓷起源的关系 田海峰 景德镇陶瓷（中国

古陶瓷研究专辑）2:82—86
初谈青瓷的起源　胡悦谦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2:95—100
关于宝鸡西周陶瓷碎片的初步探讨　杨根、周和平　自然科学史研究3·1:8—10
洛阳西周原始瓷器的探讨　张剑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2:87—94
原始瓷　冯先铭、黄韬鹏　人民画报2:44—45
江西青瓷发展初探　李科友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2:252—258
从原始瓷器到早期青瓷及其与印纹陶的关系　彭适凡　争鸣2:89—92
略论广东古代陶瓷工艺的制作和发展　莫稚　学术研究5:78—83
颜色釉的产生与发展　余谱保、余家栋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2:233—243
我国南方古代印纹陶制作工艺的探讨　彭适凡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2:8—20
闽侯商周时代印纹陶　陈龙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2:21—29
谈山西艺术陶瓷的历史渊源及其继承和发展（下）　翟志曼　山西工艺美术1:20
如何辨别陶瓷的款识——答读者来信　松屏　黑龙江文物丛刊1:99—101
试论我国古代的龙窑　朱伯谦　文物3:57—62
由秦砖汉瓦论及秦汉陶瓷　王家广　文博2:23—28
汉代釉陶的起源和特点　李知宴　考古与文物2:91—95
集安高句丽陶器的初步研究　耿铁华、林至德　文物1:55—63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陶瓷工艺成就（上）　叶宏明　河北陶瓷2:23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瓷器　侯奎山　自修大学5:45—46
略谈鄂城两晋青瓷　贺中香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　2:101—104
略谈清江出土的南朝青瓷　黄颐寿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2:105—109
武昌隋唐墓葬出土陶瓷器初析　全锦云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2:38—45
扬州唐城出土青花瓷的测定及其重要意义　张志刚、罗宗真等　中国陶瓷3:56—59
扬州新发现的早期青花瓷片的断代及其烧造工艺的初步研究　顾风　扬州师院学报2:81—85
江苏扬州出土的唐代陶瓷　蒋华　文物3:63—68
浅谈唐代长沙铜官窑的釉下绘画和雕塑小品　萧湘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2:46—48
关于"官""新官"款白瓷产地问题的探讨　李辉柄　文物12:58—63
试论鹤壁市民间古瓷窑业的兴衰　牛德学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2:207—211
湖南唐宋窑址分期与陶瓷的主要特点　周世荣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2:49—59
长沙出土唐五代白瓷器的研究　高至喜　文物1:84—93
略论唐代长沙铜官窑釉下彩的发明与

应用　萧湘　湖南考古辑刊2:198—202

巩县黄冶窑唐三彩玩具的艺术特点　刘建洲　中原文物2:58—61

北宋官瓷　李林河　光明日报11月21日

从禹县九十六处古钧窑遗址的调查浅谈钧台窑的艺术成就　田松山、晋佩章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2:177—188

钧台窑的兴起与昌盛　赵青云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2:169—176

从禹县古瓷窑址的调查看钧瓷窑址的分布特点和兴盛状况　曹子元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2:189—190

耀州青瓷漫话　乔留邦　中国陶瓷5:42—46

宋代汝、耀州窑青瓷的研究　郭演仪等　硅酸盐学报12・2:226

宋元黑釉茶具考　薛翘、刘劲峰等　农业考古1:164—176

广西北流河域的青白瓷窑及其兴衰　韦仁义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2:110—118

羊角山古窑紫砂残片的显微结构　孙荆、谷祖俊等　中国陶瓷2:63—70

成都太平横街南宋墓出土陶器浅析　陈德富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2:64—66

南宋郊坛官窑与龙泉哥窑的陶瓷学基础研究　陈显求等　硅酸盐学报12・2:208

宋元彩绘瓷　李德金、蒋忠义等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2:199—206

宋代定窑印花陶范　郭宝琛　中国陶瓷4:46

陶瓷装饰纹样——“吴牛喘月”考　杨静荣　故宫博物院院刊2:62—63

关于青花瓷器的起源和发展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2:216—222

釉上青花技术与青花的定义——兼论青花的起源　欧阳世彬　中国陶瓷1:59—62转页

略谈湖南元明清陶瓷　周世荣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2:67—79

元代青花瓷器的研究　陈尧成、郭演仪等　中国陶瓷4:55—63

文化瑰宝——青花瓷器　石坚　黑龙江文物丛刊4:74—77

明代景德镇民窑青花瓷器及其艺术成就　叶佩兰　故宫博物院院刊3:76—81

从我馆藏建瓷看其明代雕塑艺术　张云英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2:231—232

清代瓷器的装饰艺术　张柏、刘兰华　黑龙江文物丛刊3:97—102

谈康雍乾时期的珐琅彩瓷器——兼论珐琅彩与粉彩的关系　刘兰华　文物11:85—89

漫话古瓷　祖安、黄韬鹏　人民画报1:44

隋唐五代瓷　冯先铭、黄韬鹏　人民画报4:44—45

宋瓷（上）　冯先铭、黄韬鹏　人民画报5:44—45

宋瓷（下）　冯先铭、黄韬鹏　人民画报6:44

辽金瓷　冯先铭、黄韬鹏　人民画报7:44

元瓷　冯先铭、黄韬鹏　人民画报8:

44—45

明瓷（上） 冯先铭、黄韬鹏 人民画报9:44—45

明瓷（下） 冯先铭、黄韬鹏 人民画报10:44

清瓷 冯先铭、黄韬鹏 人民画报12:44

窑址调查发掘

广东普宁虎头埔古窑发掘简报 广东省博物馆、汕头地区文管站等（杨少祥等） 文物12:40—44

岳阳费家河商代窑址调查 吴洪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2:119—125

两座商代晚期龙窑在浙江出土 光明日报6月23日

高州县"鬼窑"址调查发掘简报 钟绍益、刘明宽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2:152—156

洛阳东周至唐宋时期的陶窑概论 叶万松、余扶危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2:30—37

合肥出土寿州窑早期产品 王业友 文物9:96

邛窑调查纪实 黄微曦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2:157—160

漫话古邛窑 余祖信 中国陶瓷3:60—61

曲阜宋家村古代瓷器窑址的初步调查 宋百川、刘凤君等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2:161—168

成都青羊宫窑址调查 翁善良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2:139—144

隋代邢窑遗址的发现和初步分析 杨文山 文物12:51—57

荥阳翟沟瓷窑遗址调查简报 张松林 中原文物4:17—22

河南巩县大、小黄冶村唐三彩窑址的调查简报 傅永魁 考古与文物1:69—81

河南巩县唐三彩窑遗址 傅永魁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2:126—130

福建建阳古瓷窑址调查简报 建阳县文化馆（林忠干、王治平） 考古7:636—648

湖南青瓷与青花古窑址调查报告 周世荣、冯玉辉等 湖南考古辑刊2:87—112

灌县马家古瓷窑址试掘记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灌县文物管理所（陈显双） 考古与文物6:36—51

五代北宋婺州窑的探讨 贡昌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2:131—139

耀县发现古瓷窑遗址 王明皋、刘文韬 文博3:109

宋代耀州窑 杨东晨 陕西师大学报4:80—83

略谈湖南益阳发现的古瓷窑址 盛定国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2:191—194

福建南平宋元窑址调查简报 林忠干、卢保康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2:144—151

浙江金华铁店村瓷窑的调查 贡昌 文物12:45—50

南丰白舍宋元古瓷窑址的探讨 花兴如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2:195—198

江西萍乡南坑古窑调查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陈定荣） 考古3:264—270转页

湖南古窑址调查之一——青瓷 （周

世荣等） 考古10:915—926
略谈河北“三大名窑” 李辉柄 考古与文物3:87—90

窖藏及其葬瓷器

四川大邑县出土两件东汉青瓷罐 丁祖春 文物11:62
淄博和庄北朝墓葬出土青釉莲花瓷尊 淄博市博物馆、淄川区文化局（张光明） 文物12:64—67
湘阴县南朝、隋墓出土的青瓷器 张中一 湖南考古辑刊2:208—209
淇县出土一件彩釉斑瓷壶 耿青岩 考古与文物4:106
石家庄市振头村发现唐代贴花人物瓷壶 孙启祥 考古3:283
长沙唐墓出土“官”字款白瓷器 宋少华 湖南考古辑刊2:210—213
成都市发现的一处南宋窖藏 成都市文物管理处（翁善良） 文物1:94—96
郫县出土的宋代瓷器窖藏 梁文骏 文物12:68—72
甘肃华池县发现一批宋瓷 庆阳地区博物馆、华池县文化馆（许俊臣） 文物3:69—73
浙江省武义县北宋纪年墓出土陶瓷器 李知宴、童炎 文物8:91—93转页
浅谈宿松纪年墓出土的北宋影青瓷器 王业友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 2:60—63
河南镇平出土北宋梅瓶 苏芳林 江汉考古2:97
皖西发现古代精雕瓷枕 陈继宗、桂仲德 文汇报4月5日2版
衡阳市出土宋代三彩俑 冯玉辉 湖南考古辑刊2:213
河北曲阳北镇发现定窑瓷器 妙济浩、薛增福 文物5:86—88
大邑近年出土的宋元瓷器 胡亮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 2:212—216
内蒙古宁城出土辽代三彩壶 白俊波 文物3:91
黑龙江肇源出土辽金瓷器 云薇 黑龙江文物丛刊4:69—70
叶县出土一件金代三彩枕 杨爱玲 中原文物3:55
扬州出土的磁州窑龙凤瓷罐 李文明、钱锋 文物6:28
内蒙赤峰大营子元代瓷器窖藏 唐汉三、李福臣等 文物5:89—93
景德镇出土明瓷珍品 人民日报7月14日
郑州古荥窖藏青花瓷器 谢遂莲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 2:222—227
江西南昌发现一批窖藏瓷器 余家栋 文物8:94—96

藏品介绍

两件反映道教内容的邛窑瓷碗 刘家琳 文物10:40—41
珍珠地划鹦鹉纹瓷枕 杨静荣 中国陶瓷1:63
两件元代釉里红玉壶春瓶 余请保 文物10:96
元代青花龙纹高足杯 阎素义 博物馆研究2:117
略谈故宫博物院藏明清瓷器 冯先铭 文物10:35—39
介绍明代德化窑的几件瓷器 林登翔 文物3:74—75
介绍我系馆藏宋元明清的几件瓷器 李立新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 2:227—230
明宣德洒蓝釉盔碗 李宗扬 紫禁城1:41

明成化青花串枝花瓷炉 黄颐寿 文物3:24
故宫的三件藏瓷 杨静荣 文物天地1:33—34
康熙青花凤尾尊 王健华 景德镇陶瓷1:58
雍正粉彩蟠桃天球瓶 耿宝昌 故宫博物院院刊1:36

八 绘画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洛阳汉墓壁画考略 苏健 中原文物2:22—25
"马马岩壁画"一解 唐莫尧 贵州文史丛刊2:151—154
克孜尔石窟壁画画法综考——兼谈西域文化的性质 吴焯 文物12:14—22
简谈艺术与宗教——从敦煌壁画看"宗教艺术"的基本演变规律 洪毅然 中国画1:53
敦煌莫高窟254窟《舍身饲虎图》 朔维 文物天地6:38
敦煌莫高窟的一组壁画 金向东 文物天地6:39
东魏茹茹公主墓壁画试探 汤池 文物4:10—15
北齐东安王娄叡墓的壁画和雕塑 陶正刚 美术研究1:54—64
北齐壁画札记 汤池 美术研究1:65—66
娄叡墓壁画的启示 萧望 美术研究1:67—69
曹家祥与杨子华风格 金维诺 美术研究1:37—53
北齐绘画的重大发现 王泷 中国画1:37
集安高句丽古墓壁画 董长富、文琳 文物天地6:11—13
陕西唐墓壁画之研究（上） 王仁波、何修龄等 文博创刊号39—52
陕西唐墓壁画之研究（下） 王仁波、何修龄等 文博2:44—55
安阳天禧镇宋墓壁画散乐图跋 周到 中原文物1:39—41
闻喜下阳金墓壁画简介 王泽庆 美术研究3:59—60
从美岱召壁画看元明以来的蒙古族服饰 金申 内蒙古社会科学2:116—120
明代寺院壁画当数此处第一——谈北京法海寺壁画 潘絜兹 旅游2:18
耀县药王山《四帝二后行乐图》年代的考订 徐建融 文物2:93
山西古代壁画拾零 章含 中国画研究3:192
西藏绘画与雕塑 (意)奇赛波·杜齐 张保罗节译 美术研究3:79—83
古代壁画颜料的x射线衍射分析 周国信 美术研究3:61—68
引魂之舟——楚帛画新解 萧兵 湖南考古辑刊2:167—174
固原北魏墓漆棺的发现 韩孔乐、罗丰 美术研究2:3—11
固原漆棺彩画 王泷 美术研究2:12—16
斯坦因《千佛图录》图版十三内容考释 孙修身 西北史地3:87—94
浅谈古书画的鉴别 晏霁 中原文物2:95—96
书画鉴别杂谈 吴焕章 中原文物2:93—94

九 法帖与书法

略谈中国书法艺术的继承和发展 翟本宽 郑州大学学报4:64—68
秦汉瓦当书法 陶润等 书法研究2:

81
《兰亭帖》的书法艺术特色 姚学贤 郑州大学学报1:41—42
隋唐五代的书法——《隋唐五代史》之一章 王仲荦 历史研究1:92—100
欧阳询及其书法艺术 戴公望 书法6:18—20
柳公权和他的书法 田醒农 文博3:67—68
论黄庭坚的书法 翁闿运 书法2:18—22
浅谈王铎的书法艺术 吴焕章 殷都学刊1:91—93
明黄辉行书册 于丁 书法4:37—39
读董帖札记 许宝驯 书法4:24—26
浅谈董其昌的书法 范祥雍 书法4:18—23
读帖考斠 曹宝麟 故宫博物院院刊1:69—73
《绛帖》辨 朱文钧遗作 文物10:75—76
《快雪堂法帖》校后记 马子云 故宫博物院院刊3:69—72
《三希堂法帖》记事二则 万依 故宫博物院院刊1:74—75

一〇 古代工艺美术

我国原始艺术的成就 李友谋 郑州大学学报1:79—85
原始社会的艺术明珠——仰韶文化彩陶 张朋川 文物天地2:37—39
大河村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 廖永民 中原文物4:40—48
器皿造型的形成和发展规律 石可 中国工艺美术2:4—6
大汶口—龙山文化原始艺术初探 吴家哲、李秀治等 史前研究4:75—80
中国古代缂丝及其艺术成就 施直 中国工艺美术1:12—13
缂丝始于何时 周朱流、孔桂珍 文物天地1:42
吐鲁番出土蜀锦的研究 武敏 文物6:70—80
明清宋锦 陈娟娟 故宫博物院院刊4:15—25
试制仿古宋锦总结报告 苏州织锦厂等 丝绸史研究1·1:43
古代丝织物用金的历史和艺术特色 郭向虹 姑苏工艺美术1:17
古老精湛的扎染工艺 区秋明 丝绸史研究1·1:27
常州北环新村宋墓出土的漆器 陈晶 考古8:730—732
试谈复色雕漆 夏更起 故宫博物院院刊1:57—58
鎏金工艺考 王海文 故宫博物院院刊2:50—58
试论古代镶嵌工艺美术品 李宗岳 北京工艺美术2:14
新疆出土古剪纸研究 陈竞 新疆社会科学4:116—121
元明清工艺美术总叙 杨伯达 故宫博物院院刊4:3—14
中国古代动物画艺术的细节表现 刘敦愿 美术9:53—56
古文物纹饰中龙的演变与断代初探 邢捷、张秉午 文物1:75—80

陆 古代科学技术

一 农业

略论东南亚及中国南部农业起源的若干问题——兼论农业考古研究方法

瞿恩正 农业考古2:21—30

中国农业的本土起源 何炳棣 农业考古2:43—51

中国原始农业的产生和发展 张之恒 农业考古2:36—42

亚洲稻作文化的起源 李昆声 社会科学战线4:122—130

试论原始农业的经济地位 黄崇岳 农业考古1:211—222

中国沿海地区的农业起源 张光直 农业考古2:52—57

我国新石器时代谷物加工方法演变试探 马洪路 农业考古2:90—98

我国粮仓的起源和发展 杜葆仁 农业考古2:299—307

福建农业考古概述 林蔚文 农业考古1:223—226

贵州农业考古概述 李衍垣 农业考古1:239—247

磁山遗址的原始农业遗存及其相关的问题 佟伟华 农业考古1:194—207

从考古材料看我国中原地区原始社会的农业生产 方酉生 农业考古1:208—210

试探我国高粱栽培的起源——兼论万荣荆村遗址出土的有关标本 卫斯 中国农史2:45—50

小谈齐家文化的农业遗存 郑乃武 农业考古2:58—59

从石铲看桂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农业 覃彩銮 农业考古2:60—65

江苏吴县出土的石犁 叶玉奇 农业考古1:49

楚国铁器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后德俊 农业考古2:66—71

湖南战国两汉农业考古概述 熊传新 农业考古1:227—238

试论我国传统农业工具的历史地位 陈文华 农业考古1:30—39

试谈安徽出土的青铜农具 卢茂村 农业考古1:43—48

河南古代铁农具 李京华 农业考古2:83—89

古代越国的农耕工具 沈作霖 农业考古2:100—103

湖南资兴出土战国农具 吴铭生 农业考古2:104—106

浙江定海县蓬莱新村出土战国稻谷 王和平 农业考古2:294—295

西汉京师仓储粮技术浅探 呼林贵 农业考古2:308—309

从出土文物看汉代枣庄地区的农业 李锦山、文光 农业考古1:249—253

从《农耕图》谈东汉时徐淮地区农业生产状况 尤振尧 中国农史2:31—36

说"耦"及其演变 党明德 中国农史2:75—81

洛阳唐安菩墓的一批与农牧业有关的文物 赵振华、朱亮 农业考古1:260—262

山东枣庄出土犁镜铜范 李锦山 农业考古1:57

金代农业生产工具 洪峰、德平 东北师大学报5:封三

二 水利

井渠法和古井技术 唐嘉弘 农业考古1:87—92

新疆米兰古灌溉渠道及其相关的一些问题 陈戈 考古与文物6:91—102

从水文考古调查看古代汉中地区的灌溉设施 唐金裕 文博2:113—118

汉代的犍犁及其发展 李趁友 农业考古1:93—95
汉代农田水利的布局及人工养鱼业 秦保生 农业考古1:101—102
葛洲坝工程的几个重要历史依据 陈淮 文物天地5:36—37

三 畜牧

从桂林甑皮岩猪骨看家猪的起源 覃圣敏 农业考古2:339
湖北天门县石家河遗址出土的泥塑小动物 刘安国 农业考古1:114—115
从出土文物看大连地区汉代以前养猪业 许明纲 农业考古1:116—118
江苏沛县出土汉代陶猪圈 训强、保亚等 农业考古1:118
谈西昌出土的陶猪模型 黄承宗 农业考古1:119—120

四 天文

大河村天文图象彩陶试析 彭曦 中原文物4:49—51
试论殷代历法的月与月相的关系 张培瑜、卢央等 南京大学学报1:65—72
关于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五星占" (日)薮内清 康小清译 易广居校 科技史译丛1:52—57
元代圭表复原探索 伊世同 自然科学史研究3·2:128—137
康熙朝地球仪 李迪、白尚恕 故宫博物院院刊2:64—66

五 矿冶

我国西周前期青铜铸造工艺之研究 叶万松 考古7:656—663
铜绿山春秋早期炼铜技术续探 卢本珊、张宏礼 自然科学史研究3·2:158—168
试论铜绿山古铜矿的生产水平 周保权 江汉考古4:67—73
铜绿山古矿冶遗址 孙志江 人民画报7:32—33
中国古代青铜兵器铸造技术发展的分析研究 田长浒 成都科技大学学报1:147
先秦用铅的历史概况 李敏生 文物10:84—88
沧州铁狮的铸造工艺 吴坤仪、李京华等 文物6:81—85
当阳铁塔铸造工艺的考察 孙淑云 文物6:86—89转页
荥阳楚村元代铸造遗址的试掘与研究 《中国冶金史》组、郑州市博物馆(吴坤仪、于晓兴) 中原文物1:60—70
中国古代的煤雕及其在煤炭开发利用史上的意义 煤炭工业部《中国煤矿史》编写组(吴晓煜) 自然科学史研究3·1:68—73

六 纺织

先秦时期中国养蚕业中心地区的变迁——再论中国养蚕起源于长江三角洲 魏东 丝绸史研究1·1:21
中国古代对家蚕生态生理的认识 蒋猷龙 江苏蚕业2:56
丝绸之路出土的丝织物 (日)佐藤武敏著 丝绸史研究1·1:48
广西丝绸史路 黄赞雄 丝绸史研究1·1:14
略述我国古代的纱织物 李英华 故宫博物院院刊2:85—88
浅谈衡阳县何家皂北宋墓纺织品 陈国安 文物12:77—81

已审阅
子居 10-03-13, 13:26

明代丝绸生产技术发展初探 区秋明等 浙江丝绸工学院学报1·2:60

七 交通

中国古代马车的系驾法 孙机 自然科学史研究3·2:169—176

先秦战车形制考述 杨英杰 辽宁师大学报2:35

西汉墓出土古车与古车初探 陈纪颜 公路交通编年史研究3:45

燕肃指南车造法补证 王振铎 文物6:61—65

论我国古代航海和造船技术的成就——兼评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汶江 海交史研究6:1—12

川扬河古船结构的特征及历史意义 王正书 考古7:664—666

八 医学

论殷人治疗疾病之方法 胡厚宣 中原文物4:27—30

考古发掘扩大了医学研究范围 侯良 江汉考古3:107—108

广西汉墓出土铁冬青 蒋廷瑜 农业考古1:106

祖国医药学史的重要文献——《吐鲁番出土文书》学习札记 戴应新 文博2:71—74

九 其它

试论东周时代皮甲胄的制作技术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技术室(白荣金等) 考古12:1127—1131

战国时期开创了我国涂料技术的新局面 周绍绳 涂料工业3:54

蔡伦发明造纸的历史不能否定(上) 韦承兴 中国造纸3·2:57

关于杨子器跋舆地图的管见 郑锡煌 自然科学史研究3·1:52—58

《乾隆京城全图》考略 杨乃济 故宫博物院院刊3:8—24

中国珠算盘渊源变革再探 张福汉 中华珠算6:24

古代保护纸质文物的药物防蠹技术 周宝中 中原文物4:87—92

柒 中外关系与文化交流

旧石器时代晚期中日交流的古地理证据 戴国华 史前研究1:105—108

长江下游史前文化对海东的影响 安志敏 考古5:439—448

我国古代西南地区与东南亚联系如何 童恩正通过综合研究提出新见解 陈儒珍 文汇报10月30日

"丝绸之路"南道中我国境内帕米尔路段调查 王炳华 西北史地2:78—87

中国与文莱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 季士家 文物天地5:42—44

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综论 王仲殊 考古5:468—479

吴、东晋、南朝的文化及其对海东的影响 杨泓 考古6:564—573

丝绸之路述论 张英莉、戴禾 思想战线2:51—57

我国铜鼓之海外传播 房仲甫 思想战线4:44—51

从倭人字砖论古代中国与日本的文化往来 李灿 汉中师院学报1:51

朝鲜发现渤海二十四块石建筑址 运铎 博物馆研究2:104

日本出土的王勃佚文木简 伯骅 文物天地4:39

从考古发现看唐代中日文化交流 王仁波 考古与文物3:100—108

宋元时期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陶瓷的外销 叶文程 海交史研究6:32—38

宋元时期我国陶瓷器的对外贸易 叶文程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46—52

宋元时期泉州港的陶瓷输出 李知宴、陈鹏 海交史研究6:39—48

地尽其利民殷国富——宋元之际泉州港兴盛的一个原因 福建日报2月6日

欧洲人是怎样发现瓷器的 王明侯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 2:244—251

两件正德朝阿拉伯文波斯文瓷器——兼谈伊斯兰文化的影响 李毅华 故宫博物院院刊3:49—51

苏禄王和苏禄王墓 刘如仲 文史知识5:112—115

浡泥国王墓和墓碑碑文略考 史原 福建论坛1:65

捌 宗教遗迹与遗物

西山灵泉寺始建考 高介华 江汉考古2:84—88

唐长安青龙寺密宗殿堂(遗址4)复原研究 杨鸿勋 考古学报3:383—400

略谈龙门奉先寺的几个问题 温玉成 中原文物2:53—57

巍山南诏寺观考察 王丽珠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2:29—33

礼泉赵村镇唐代鼓形经幢 张崇德 考古与文物2:95

从考古发现看摩尼教在高昌回鹘的封建化 林悟殊 西北史地4:9—16

"东京"古佛沧桑录 李兴盛 黑龙江文物丛刊3:96

试论泉州聂斯脱里教遗物 杨钦章 海交史研究6:82—90

我国仅存的摩尼教寺 杨湘贤 文物天地2:47

崇庆皇太后万寿庆典时期的五塔寺 向东 故宫博物院院刊1:87—92

大慧寺源流 马旭初 古建园林技术1:54

华严宗三祖法藏身世的新资料——兼述龙门石窟中的外国人造像 温玉成 法音2:35

香料之道上的伊斯兰史迹 马通 海交史研究6:91—100

龟兹佛教与石窟 姚士宏 新疆艺术2:13

民权白云寺 冯先铭 中州今古5:51

承德殊像寺与五台山殊像寺 孟繁兴 古建园林技术2:31—34

玖 历史地理与名胜古迹

关于上古至秦汉时期东北疆域的几个问题 陈芳芝、郑必俊 北京大学学报6:37—46

试论中国最早的城址 刘式今 河北大学学报1:148—152

武汉三千五百年前的古城——介绍商代盘龙城遗址(之一) 陈贤一 武汉春秋2:3

武汉三千五百年前的古城——介绍商代盘龙城遗址(之二) 陈贤一 武汉春秋3:7

西周营建成周考辨 史为乐 中国史研究1:145—152

"格氏"即"葛乡城"考 牛济普 中原文物1:21

楚都鄂补 殷崇浩 江汉考古1:90—95
美阳岐阳城域考 罗西章 文博3:69—77
论楼兰城的发展及其衰废 侯灿 中国社会科学2:155—171
从出土文物看古沙市位置的变迁 袁纯富、范志谦 江汉考古3:103—106
楚文化的摇篮——江陵古城 宋力夫 地理知识1:7—8
高句丽两都城——国内城和丸都山城 林至德、张雪岩 文物天地6:7—9
论别失八里 孟凡人 新疆社会科学1:117—129
祥州疏证 陈相伟 博物馆研究3:59—65
三说金末蒲鲜万奴东夏国的都城——答朴直爽同志 景爱 延边大学学报4:103—114
谈景爱同志《三说金末蒲鲜万奴东夏国的都城——答朴直爽》 朴直爽 延边大学学报4:115—123
绰尔城考古与历史地理余论 孙秀仁 黑龙江文物丛刊1:77—80
读《傣族历史上的籠川王都城城址考辨》质疑 刀永明、刘亚朝 民族研究2:58—61
大夏国都——统万城遗址 李丰业等 陕西日报5月15日
弥渡几座古城遗址考 张昭 群众文化2:61
西安州古城址与天都山石窟 许成等 固原师专学报1:100
喀拉墩古城 李吟屏 新疆日报8月16日
黄帝陵 吴子荣 文博1:101
李冰和都江堰 戴盛昌 文物天地1:35—37
仙游寺 李圣庭 考古与文物3:99
萨迦寺简介 罗桑旦增 西藏研究4:125
大相国寺天下雄 张盛智 文物天地4:31—33
屹立千年的独乐寺 马大东 文物天地6:4—5
成吉思汗陵巡礼 马骃骥 文物天地3:25—27
沈阳故宫和盛京三陵 侯刚、罗文发 人民画报7:29—31
故宫史话 单士元 中国科技史料2:51—53

拾 少数民族地区考古与民族志

古代的悬棺葬 唐嘉弘 文史知识10:68—72
瑶族历史上的悬棺葬习俗——兼与石钟健教授商榷 王时阶 学术论坛2:71—74
岷江上游石棺墓族属试探 曾文琼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85—89
大理地区石棺葬族属初探 田怀清 下关师专学报2:41
武夷船棺之谜 胡善美 化石1:20—21
从考古发现看南方民族美术的特色 张光福 民族文化1:14
从《壮族简史》所用考古资料谈壮族古代史上的几个问题 蒋廷瑜 学术论坛4:95—98
从文化遗存浅谈壮族古代文化特质 黄增庆 三月三 3:56
汉水上游巴文化的探讨 唐金裕 文博1:2—4

犍为巴蜀墓的发掘与蜀人的南迁　王有鹏　考古12:1114—1117

于越族源探索　辛士成、严晓辉　厦门大学学报3:124—130

古越族文化初探　张潮　江汉考古4:80—83

青铜时代的昆明人　张继　民族文化1:28

论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的渊源　乌恩　考古与文物4:59

肃慎和挹娄的考古文化　戚玉箴、孙进已　学习与探索5:129—136

略谈西团山文化的族属问题　董学增、李澍田　东北师大学报2:53—57

陕西匈奴文物简说　戴应新　人文杂志6:99—102

内蒙古桃红巴拉古墓和青海大通匈奴墓人骨的研究　潘其风、韩康信　考古4:367—375

关于晋宁石寨山青铜器上一组人物形象的族属问题　张增祺　考古与文物4:88—92

关于粟特人向东方发展的一个考古资料　(日)护雅夫著　陈翰译　西北史地4:103—108

渤海墓葬研究　郑永振　黑龙江文物丛刊2:4—14

禄丰火葬墓及其青花瓷器　葛季芳　文物8:85—90

云南沧源崖画族属试探　段世琳　昆明师院学报2:56

云南碧江县加车寨怒族制陶业调查——兼谈原始制陶业的几个问题　李根蟠、卢勋　中原文物4:52—58

解放前云南西盟佤族的概况——兼谈对龙山文化的一些看法　蔡葵　史前研究3:95—99

德宏傣族制陶术调查　郭瑜　民族调查研究1:62—64

从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谈起　秋浦　云南社会科学5:70—76

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时期的产物——"不落夫家"等习俗剖析　林蔚文　史前研究2:82—86

十九世纪尼夫赫人(费雅喀)的婚姻制度　孙运来　黑龙江文物丛刊1:59—65

傣族的婚礼及其试析　张元庆　民族调查研究1:82—87

黎族母系制残余试析　马建钊　社会科学战线4:227—232

那马人的丧葬习俗　刘龙初、修世华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2:49—54

中国北方民族的萨满教　蔡家麒　史前研究4:87—93

中国少数民族古文字概况　史金波　民族研究5:53—60

纳西族象形文字的分布与传播问题新探　朱宝田　云南社会科学3:74—79

拾壹　古代文化生活

一　音乐

我国古代的乐器(上)　李学忠　江苏画刊1:24

我国古代的乐器(下)　李学忠　江苏画刊2:24

原始社会末期的旋律乐器——甘肃玉门火烧沟陶埙初探　尹德生　西北师院学报3:39—43

考古所见商代的乐舞　夏麦陵　中原文物4:76—80

宁乡商代象纹大铙　高至喜　乐器2:

21转页

中国南方出土商周铜铙概论 高至喜 湖南考古辑刊2:128—135

湖南省博物馆馆藏西周青铜乐器 高至喜 湖南考古辑刊2:29—34

湖南出土的西周铜鎛 高至喜 乐器5:封底

錞于述略 李衍垣 文物8:69—72

编磬音时程特性的分析 徐雪仙、冯光生等 乐器3:1—3

编磬音时程特性的分析 徐雪仙、冯光生等 乐器4:1—2

长沙出土的战国琴 黄纲正 乐器1:20转页

羊角钮铜钟初论 蒋廷瑜 文物5:66—69

敦煌发现我国最古老的乐谱 光明日报1月22日

宋太平兴国禅院古钟 余天健、程前林 文物3:73

古磬与古舞 常任侠 百科知识6:28—29

二 戏剧

出土文物展现的汉代百戏艺术 苏健 文物天地5:25

温县宋墓杂剧雕砖考 廖奔 文物8:73—79

从山西洪洞明应王殿壁画浅析元杂剧的演出形式 李歆 山西师院学报1:57

山东鄄城发现三件清代戏剧雕砖 鄄城县文化馆(路明) 文物8:80—81

三 其他

大傩与角抵 常任侠 百科知识8:31—32

云南青铜文化中的乐舞艺术 吴开婉 民族文化1:17

鼓及盘鼓舞与古代宗教意识 费秉勋 西北大学学报2:81—87

古俑与古代舞人 常任侠 百科知识7:38—39

南宋时期杭州的杂技艺术 杨子华 杂技与魔术1:14

杂技戴竿考 韩顺发 中原文物2:37—41

拾贰 学术消息与文博工作

亚洲地区(中国)考古讨论会在西安闭幕 本刊通讯员 史前研究1:104

中国人类学会东北考古人类学座谈会在沈召开纪实 博物馆研究1:126

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四届年会纪要 大会秘书组 古文字研究9:1—14

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五届年会在西安召开 王辉 考古与文物6:107—108

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五届年会概述 宋镇豪、刘翔 中国史研究动态11:9—11

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第二次会议暨学术讨论会在昆明举行 李先登 历史教学6:61

铜鼓研究学术讨论会述要 范祖锜 思想战线3:92—95

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概述 王宇信、杨升南 中国史研究动态12:12—14

纪念秦兵马俑坑发现十周年秦俑学术讨论会在陕西临潼召开 本刊通讯员 文博3:53

中国钱币学会黑龙江分会正式成立 黑龙江分会秘书处 中国钱币3:75

河南省文物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　本刊通讯员　中原文物4:83

湖北省楚史研究会召开1983年年会　张胜琳　江汉论坛2:79

湖北省博物馆隆重庆祝建馆三十周年　刘长荪　江汉考古1:1—2

湖北省博物馆主持几项重大考古发现闻名中外，李先念为博物馆题词，文化部文物局致电表扬　丁炳昌等　光明日报1月1日

孝感地区召开文物工作会议　张学武、张远栋　江汉考古3:55

苏州市钱币研究会成立　陈佐鄂、刘龙海　中国钱币3:75

中国历代陶俑展在日本名古屋市隆重开幕　魏勇娥　文博3:108

秦兵马俑在国外展出引起巨大轰动　宋振兴　文博3:107

法国纺织史专家K·里布夫人谈汉代织物　沈落雁综述　国外社会科学8:76

著名纺织史专家里布夫人在京作学术讲演　本刊记者　考古11:1055—1056

拾叁　书刊评介

评介《中国文明之起源》　功猷　考古8:767—768

有益的探索·珍贵的资料——评《中国新石器时代陶器装饰艺术》　刘剑菁　艺苑1:57

《元君庙仰韶墓地》（黄河水库考古报告之四）评介　悟生　考古7:670—671

《曲阜鲁国故城》　王迅　考古12:1145—1146

灿烂的云南古代青铜文化——介绍大型图录《云南青铜器》　吴平　考古10:960

评《秦陵二号铜车马》　瓯燕　考古7:672

评介《山东汉画像石研究》　瓯燕　考古9:862

评介《山东汉画像石选集》　瓯燕　考古11:1054

两本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评介　杨际平、郑学檬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119—123

《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81）》　康捷　考古3:286—287

附：1983年考古学论文资料索引补遗

壹　总类

近二十年来东南亚地区的考古新发现及国外学者对我国南方古文明起源的研究　童恩正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3·3:17

贵州境盘江流域古文化遗存与文物保护　何凤桐　贵阳师院学报1983·3:25

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与发展　杜瑜　中国史研究1983·1:148—157

贰　考古学分论

贵州首次发现的古人类头骨化石　吴茂霖等　贵阳师院学报1983·3:11

贵州的新发现及其对我国旧石器考古学的意义　张森水　贵阳师院学报

1983・3:15
中原地区远古人类文化初探 王兵翔 中州今古1983・5:32
四川筠连人类牙齿化石的发现 游天星 成都地质学院学报1983・3:56
江西吴城青铜文化不是中原商文化的一支 彭适凡 江西社会科学 1983・5:112
周原考古对研究西周历史的意义 张辛 自修大学(文史哲经)1983・2:39
关于蜀文化的几个问题 宋治民 考古与文物1983・2:71—80
西团山文化墓葬类型及发展序列 刘景文 博物馆研究1983・1:57—64
太湖地区"石室墓葬"说质疑 张志新等 苏州大学学报1983・3:107
从历史地震看北京地区(东南部分)几条断裂带的活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地质局水文一大队地震考古组(杜玉生) 考古学集刊1983・3:233—252
浅谈唐代渤海的佛教 何明 博物馆研究1983・3:39—44

叁 考古学专论

北京图书馆藏石刻叙录(九)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 文献1983・16:203—206
好太王碑译注 王健群 博物馆研究1983・1:25—32; 3:32—37
渤海贞惠贞孝两公主的墓碑 罗继祖 博物馆研究1983・3:38
贞孝公主墓志反映出的儒家思想 邹秀玉 博物馆研究1983・3:44—47
大金得胜陀颂碑碑文简释 薛宪明、王仁富 博物馆研究1983・1:68—70
前郭县满蒙文碑调查与考释 包双山、张静岩 博物馆研究1983・3:89—91
热扎寺碑 仁欧罗桑 西藏研究1983・3:59
秦律中的"赀"与"赀赎" 吕名中 秦汉史论丛1983・2:296—303
汉代符信考述(上)——居延汉简研究 薛英群 西北史地1983・3:72
汉简史籍参证举例 薛英群 文献1983・16:57—72
新疆藏文简牍考述及释例 王尧 甘肃民族研究1983年增刊21
敦煌、新疆古藏文写本述略 陈践 甘肃民族研究1983・12:23
敦煌吐蕃文书第P、t1291号《战国策》藏文译文证补 王尧等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3・3:32
谈秦印 沙孟海 书法研究1983・3:1
东夏官印集释 张绍雄 博物馆研究1983・3:48—55
辽代的中书门下印和金代的中书门下印 王则 博物馆研究1983・1:75—77
足球纹铜镜的铸造年代 刘秉果 体育文史1983・3:44

肆 田野考古资料

东辽县石驿公社古代墓群出土文物 刘升雁 博物馆研究1983・3:84—88
和龙县龙海渤海墓葬 延边博物馆(郑永振) 博物馆研究1983・3:74—79
抚松县前甸子渤海古墓清理简报 庞志国、柳岚 博物馆研究1983・3:80—83
我省出土的三枚珍贵宋钱 谷潜 博

物馆研究1983·3:115—116
吉林省桦甸县白山镇出土一批金代遗物 陈家槐 博物馆研究1983·1:65—67

伍 美术考古

浅谈中国的石狮 徐华铛 杭州工艺美术1983·3:14
将军崖岩画里的太阳神象和天文图 陆思贤 淮阴师专学报1983·3
将军崖岩画题材刍议 盖山林 淮阴师专学报1983·3
将军崖岩画的民俗神话学研究 肖兵 淮阴师专学报1983·3
先秦古建筑概述 丁超 历史教学问题1983·5:59
长白灵光塔 邵春华 博物馆研究1983·1:73—74
为开创我国古陶瓷和古外销陶瓷研究的新局面而努力 冯先铭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1983·1:1—2
近几年中国古陶瓷研究现况 冯先铭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1983·1:3—5
浅谈我国古代的陶瓷雕塑 洪惠镇 浙江工艺美术1983·3:18
浅谈先楚时期的古陶 顾华、陈德宝 中国陶瓷1983·6:53—58
试论吉州窑 余家栋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1983·1:24—39
吉州窑的剪纸装饰 王莉英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1983·1:40—41
永和与吉州窑 刘文源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1983·1:41—46
吉州窑瓷器的特色及其外销 容散臻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1983·1:46—52
赣南黑釉瓷——兼谈宋元黑釉瓷中的几种茶具 薛翘等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1983·1:53—58
略谈我国南方黑釉陶瓷的兴衰与发展 唐昌朴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1983:1:59—64
浅谈建阳窑 耿宝昌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1983·1:65—66
建阳古瓷窑考察 林忠干、王治平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1983·1:67—78
石湾窑之研究及有关问题的讨论 曾广亿、张维持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1983·1:181—189
黑釉耀瓷 禚振西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1983·1:90—104
四川彭州窑制瓷工艺初探 丁祖春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1983·1:197—199
景德镇湖田窑的黑釉瓷 赵日斌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1983·1:105—109
山西古窑址中所见黑釉剔划花瓷器 水既生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1983·1:110—112
福州黑釉瓷与"建盏"的区别 郑国珍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1983·1:113—118
历代定窑白瓷的研究 李国桢、郭演仪 硅酸盐学报1983·3:306—313
窑神碑"柏林"问题考释 叶喆民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

辑）1983・1:177—181

宋、元钧瓷的中间层、乳光和呈色问题　陈显求等　硅酸盐学报1983・2:129—140

试谈四川天目　陈丽琼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1983・1:79—85

元代青花瓷的复制技术　陈孟龙等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1983・1:190—196

会理绿釉陶　钟俭昭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1983・1:200—201

吉州窑遗址发掘报告　余家栋、陈定荣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1983・1:5—23

广元黑釉瓷窑调查记　魏达议、高久诚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1983・1:85—89

甘肃、青海彩陶器上的蛙纹图案研究　陆思贤　内蒙古师大学报1983・3:39

简谈敦煌壁画的艺术本质及其现实意义　李浴　美苑1983・3:3

敦煌图案的组织结构与线纹样　乌密风　美苑1983・3:8

陆　古代科学技术

南宋楼璹《耕织图》上的提花机　张培高　中国纺织科技史资料1983・12:36

沿"丝绸之路"出土的纺织品初探　忻鼎新　中国纺织科技史资料1983・12:73；13:38

中国麻纺织史略　王裕中　中国纺织科技史资料1983・14:70

纺织机械发展史略　高汉玉等　中国纺织科技史资料1983・14:1

承前启后的元代船舶　杨熺　大连海运学院学报1983・9卷增刊105

柒　少数民族地区考古与民族志

百越文化在云南的考古发现　李昆声　民族学报1983年年刊:399—409

崖葬资料与武夷山地区古越人民族习俗的研究　刘诗中　福建论坛1983・5:92

古洞探幽　玄方　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3:86—88

独龙族的穴居和巢居　王均　民族调查研究1983・1:83—100

小凉山彝族的婚姻形态　彭强兴、张秀华　民族调查研究1983・1:101—112

阿细人的丧礼考察报告　杨镜骥　民族调查研究1983・1:113—118

捌　中外关系与文化交流

中国古陶瓷和古外销陶瓷学术讨论会纪要　叶文程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1983・1:202—210

中国古代瓷器在国外社会生活中的使用和影响　唐杏煌、苏垂昌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1983・1:132—137

古代广东石湾窑的外销陶器　邹华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1983・1:170—177

泉州的海外贸易和陶瓷输出　李知宴、陈鹏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1983・1:141—149

从出土陶瓷看古代中菲关系 张维持等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1983·1:164—169

肯尼亚出土的中国瓷器 马文宽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1983·1:156—163

明代我国瓷器销行东南亚的考察 叶文程等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1983·1:119—131

明代江西赣县瓷窑及其外销琉球产品的调查纪略 薛翘等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1983·1:137—140

蒙巴萨杰萨斯堡博物馆保存肯尼亚出土的有款识的中国瓷器 马希桂等 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1983·1:150—155

中国丝绸生产技术的外传及其影响 黄赞雄 中国纺织科技史资料 1983·14:49

日本国宝狩狮纹锦考证——追溯丝绸之路 （日）书上诚之助著 中国纺织科技史资料1983·13:106

新发表古代铭刻资料简目

（原形字、族徽用“□”号代替。期刊名称后第一个数码是期，第二个是页）

一 金文

殷代

爵（1314号）

鋬内铭二字：“父辛”。

（河南南阳市十里庙遗址出土 中原文物1:95）

爵

一柱外侧铭：“□”。

柱口与口沿下铭一字：“子”。

（1983年4月河南舞阳县吴城北高村出土 考古5:426）

爵

鋬内铭二字：“父辛”。

（1982年6月河南武陟县龙睡村出土 中原文物 4:22）

爵

铭二字：“子刀”。

（1982年7月河北正定县城岗征集 文物12:33）

卣

盖、器同铭一族徽

尊

铭一族徽

觶

铭一族徽

觶

铭一行三字：“己父□”。

爵

铭一族徽

爵

铭一族徽

（以上1982年1月河北正定县新城铺村墓葬出土 文物 12:33）

尊

铭三字：“大御□”。

（1965年湖北武汉市汉阳区东城垸出土 江汉考古3:108）

卣

铭一族徽及父丁二字。

尊

铭一族徽及父丁二字。

爵

铭二字："父丁"。

(以上1982年5月安徽颍上县王岗区郑家湾出土 考古12:1132)

簋

铭八字："俞乍父丁宝尊彝□"。

(广东省博物馆收藏品 考古与文物3:6)

西周

鼎(106:3)

铭二行五字："□父丙 且辛"。

觚(106:4)

铭三字："□父己"。

尊(106:5)

铭二字："乙父"。

爵(106:6)

铭三字："□父乙"。

觯(106:7)

铭二字："父戊"。

(以上1961—1962年陕西长安县张家坡村墓葬出土 考古9:785)

鼎

铭三字："□父乙"。

(1983年陕西长安县张家坡村墓葬出土 考古9:781)

簋

铭四行连重文共一六字："莫乍日辛 隣宝簋其 万年子子孙 永用□"。

(1961年陕西长安县马王村征集 考古9:788—789)

壶 二件

两器均铭一字："□"。

罍

铭一字："□"。

鄦(许)男鼎

铭四行连重文共一七字："□(鄦)男乍成姜趣女(母)朕(媵)尊 鼎子子孙孙永 宝用"。

(以上1967年陕西长安县马王村窖藏出土 考古与文物1:66—67)

簋

铭一字不甚清晰，似乎是亚字内有字。

(1973年8月陕西凤翔县河北村出土 考古与文物1:53)

爵

一柱侧铭"虢乍"二字，内铸"父癸虹"三字，铭文连读。

(1970年陕西凤翔县横水供销社收购站征集 考古与文物1:55)

甗

铭三字："□父乙"。

爵

铭二字："□□"。

(以上1978年5月陕西凤翔县化原村出土 考古与文物1:56—57)

爵

铭一字："鱼"。

觚

铭三字："甲女□"。

(以上1978年7月陕西凤翔县董家庄出土 考古与文物1:57)

对罍

铭八行连重文共二四字："对乍

文 考日癸宝尊彝 子子孙孙其万年永 宝用 眉寿 𣁋冬(终)□"。

(1973年3月陕西凤翔县劝读村出土 考古与文物1:57—59)

当卢 三件(凤23、24、25)

铭二字:"日"、"毛"。

铜泡(凤277)

铭二字:"日"、"毛"。

(1972年陕西凤翔县长青村出土 考古与文物1:61)

戈

铭二字:"新邑"。

(1981年春陕西岐山县祝家港村出土 考古与文物5:9)

鼎 二件

铭一字:"弓"。

(1957年陕西岐山县礼村出土 考古与文物5:9)

鼎

铭二字:"□□"。

铜泡 二件

泡纽两旁各铭一字:"□"。

(以上1956年陕西岐山县贺家村出土 考古与文物5:10)

伯好父簋盖

铭二行九字:"伯好父自铸 乍为旅簋"。

叔䜌父簋

铭三行连重文共一八字:"叔□父乍朕 文母剌考尊 簋子子孙孙永宝用"。

(以上1981年3月陕西岐山县刘家村出土 考古与文物 5:13)

簋

铭一行五字:"中州乍宝簋"。

(解放前陕西岐山县京当一带购得 考古与文物5:13)

尊

铭一字:"凡"。

(解放前陕西岐山县礼村出土 考古与文物5:11)

齐生鲁彝盖

盖铭六行连重文共五十字:"八年十又二月初 吉丁亥齐生鲁肇□(贾)休多赢朕文考乙 公永启余鲁用乍朕 文考乙公宝尊彝鲁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1981年春陕西岐山县流龙咀村出土 考古与文物5:11)

盘

铭二行连重文共一四字:"□乍宝□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解放前陕西扶风县黄堆附近出土 考古与文物5:12)

方罍

铭二行八字:"矢□乍宝 旅罍永用。"

(1983年1月陕西宝鸡县扶托墓葬出土 考古与文物4:107)

鼎

铭一行五字:"应事乍旅鼎"。

毁

盖、器同铭一行五字:"应事乍旅毁"。

爵

铭一行六字:"应事乍父乙宝"。

觶

铭一行六字:"应事乍父乙宝"。

(以上1982年11月河南平顶山市郊滍阳镇西门外出土 文物12:29)

仲再父鼎

铭三行连重文共一七字："中再父乍宝□(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用享孝"。

仲再父毁盖

盖铭六行连重文共四五字："南□(申)伯大宰中再父厥嗣乍其皇祖考□(夷)王监伯尊毁用享用孝用锡眉寿屯(纯)右(佑)康和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保用享"。

仲再父毁

盖、器同铭五行连重文共四四字："中再父宰南□(申)厥嗣乍其皇祖考□王监伯障毁用享用孝用锡眉寿屯右康和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享。"

(以上1981年2月河南南阳市郊砖瓦厂墓葬出土 中原文物4:14—15)

𧿒

铭三行连重文共二二字："□公大正叔良父乍淳𧿒其眉寿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1980年河南临汝县朝川出土 考古2:156)

戈(M1029:54)

内上两面各铭一字："匽""侯"。

爵(M1043:29)

一立柱外侧铭"鱼、鱼"，鋬内铭"父癸"二字。

鼎(M1026:2)

铭二行四字："员乍宝彝"。

觯(M1043:1)

铭三字："□父己"。

钩戟(M1029:52)

铭四字："匽侯舞戈"。

铜泡(M1029:36)

铭四字："匽侯舞易"。

(以上1981年—1983年北京市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出土 考古5:413—414)

鼎

盖、器同铭二行六字："滕侯乍宝尊彝"。

鬲

铭四行一一字："□乍宝尊鼎其万年用乡各"。

毁

铭二行八字："滕侯乍滕公宝障彝"。

(以上1982年3月山东滕县庄里西村墓葬出土 考古4:333)

鼎 二件

铭四行二〇字："郿季之伯归夷用其吉金自乍宝鼎子孙永宝用之"。

鬲 二件

铭文被刮掉，其一件口沿剩下可辨铭为："士孙伯□自乍"。

盘

铭三行连重文共一九字："郿子□伯□用其吉金自乍盥盘子子孙孙永宝"。

毁 二件

铭四行连重文共二六字："曾大保(?)□用吉金自乍腊(?)毁用□□□万年眉寿子子孙孙永用之"。

(以上1975年—1976年湖北随县周家岗墓葬出土 考古6:510—511)

尊

铭二行八字："匽侯弟□季乍旅彝"。

爵

铭三字："鱼父乙"。

(以上1975年湖北随县羊子山发现 考古6:512—513)

簋

铭二行五字："白乍宝 尊彝"。

(1982年9月江苏丹徒县母子墩墓葬出土 文物 5:4)

簋

铭二行八字："伯嘉父乍 喜姬障簋"。

(1982年11月北京市公安部门查获的走私品 考古7:590)

簋

铭三字："白乍彝"。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拣选品 文物12:35)

㠱仲壶

盖、器同铭四行一四字："㠱中(仲)乍倗生歙(饮)□(壶)匄三寿□(懿) 德万年"。

(1956年7月上海博物馆征集品 文物6:21—23)

卣

盖、器同铭二行七字："□乍父癸 宝障彝。"

(1983年5月河南洛阳市西工公安分局查获品 中原文物3:76—77)

簋盖

盖铭二行一〇字："康伯乍□用食□万年宝"。

(广东省博物馆收藏品 考古与文物3:7)

春秋

黄君孟鼎 二件

铭一行一四字："黄君孟自乍行器□子孙则永宝宝"。

黄君孟豆 二件

铭一行连重文共一五字："黄君孟自乍行器子子孙孙则永宝宝。"

黄君孟壶 二件

铭一行连重文共一五字："黄君孟自乍行器子子孙孙则永宝宝"。

黄君孟𦉥 二件

铭一行连重文共一五字："黄君孟自乍行器子子孙孙则永宝宝"。

黄君孟盘

铭三行连重文共一四字："黄君孟自乍 行器子孙孙 则永宝宝。"

黄君孟匜

铭三行一三字："黄君孟自 乍行器子孙则永宝宝"。

黄君孟戈

铭一行七字："黄君孟乍元□戈"。

鼎(G2:a1)

铭一周一四字："黄子乍黄甫(夫)人孟姬器则永宝𩁹□(冬、终)"。

鼎(G2:a2)

铭四行一六字："黄子乍黄 甫(夫)人行器则永宝宝 𩁹冬(终)𩁹后"。

鬲(G2:a4)

铭一周一六字："黄子乍黄甫(夫)人行器则永宝宝𩁹冬(终)𩁹后"。

鬲(G2:a5)

铭一周一〇字："黄子乍黄甫(夫)人孟姬器则"。

瓠形壶(G2:a6)

铭六行一六字："黄子乍 黄甫

(夫)人 行器则 永宝宝 霝冬(终)霝 后"。

豆(G2:a8—9)二件

铭三行一六字:"黄子乍黄甫(夫)人 行器则永宝 宝霝冬(终)䨓霝后"。

䨓(G2:a10—11)二件

铭二行一五字:"黄子乍黄甫(夫)人孟姬 行器则永宝宝霝"。

壶(G2:a14—15)二件

铭四行一六字:"黄子乍黄 甫(夫)人行器 则永宝宝 霝冬(终)霝后"。

盘(G2:a12)

铭二行一六字:"黄子乍黄孟姬行器 则永宝䨓霝冬(终)霝后"。

瓶(G2:a13)

器内有铭文,现仅隐约可见一个"黄"字。

小铜罐(G2:a3)

铭一周一六字:"黄子乍黄孟姬行器 则永宝宝霝冬(终)□□"。

铜方座(G2:a16)

铭三行一一字:"黄子乍黄 甫(夫)人孟姬器则永"。

(以上1983年4月河南光山县宝相寺上官岗砖瓦厂墓葬出土 考古 4:309—323)

簠(M1:25)

铭二字:"公簠"。

壶(M1:33)

铭三字:"公铸壶"。

盆(M1:41)

盖、器同铭五行连重文共二九字:"隹正月初吉丁亥 黄大子伯克乍其 □盆其眉寿 无疆子子孙孙永宝 用之"。

陈大丧史中高钟(M1:85—93)

栾和鼓面铭连重文二字共二三字:"陈大丧史中高作铃钟用祈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之。"

戈(M1:147)

援基铭二字:"□公"。

(以上1977年冬山东沂水县刘家店子村墓葬出土 文物 9:4—5)

鬲 四件

铭一周一三字:"釐伯□女子乍宝鬲子孙永宝用"。

(1976年3月山东日照县崮河崖村墓葬出土 考古7:595)

戈

铭五字:"滕侯昊之造"。

(1980年夏山东滕县西寺院村发现 考古4:337)

戈

铭三字:"□右□"。

(1975年山东临沭县收集 考古4:351)

戈

铭三字:"高子戈"。

(1970年山东淄博市临淄区文物管理所收集 考古9:815)

郐大子伯辰〔父〕鼎

铭四行二八字,由于鼎足缺落,使铭文三字成为空白,现存二五字:"唯五月初吉丁亥余(郐)大子伯辰〔父〕乍 为其好妻……□于□迎永宝用之。"

(1979年冬湖北枝江县问安发现 江汉考古1:101—102)

矛

铭一字:"王"。

(1976年12月浙江鄞县郑家

埭发现 考古8:762)

王孙遣者钟

铭八行连重文共四八字。

(广东省博物馆收藏品 考古与文物3:5—6)

战国

尹𬭚鼎(M306:采3)

盖、器同铭四五字:"隹正月吉日初庚郐(徐)□ 尹□自乍汤鼎□(宏)良圣 每余敢敬明(盟)祀□□涂 俗以知卹□寿□□子眉寿无期永保用之"。(盖铭)

炉(M306:采2)

铭三行一〇字:"郐(徐)王之宾(?)□□之少(小)□(炙)□(炉)"。

罍(M306:采4)

肩部铭一周,未能通读。

(以上1981—1982年浙江绍兴市狮子山墓葬出土 文物1:12—16)

盉

铭一行八字:"楚叔之孙途为之盉。"

(1980年7月江苏吴县何山墓葬出土 文物5:17)

壶

铭二行九字:"永用礼□ 受六□四□。"(见李学勤考释)

(1981年7月山西文水县上贤村出土,可能出自一墓葬。文物6:24—25)

鼎

铭二行一三字:"□易大□□□","王后左相室九□"。

(陕西子长县伍家园则发现 考古8:761)

戈

内中穿下铭一字,援和胡上有铭一五字,前三字为"廿二年",以下字体磨泐不清。

(1982年河南郸城县宁平出土 中原文物2:16)

敦

铭二行六字:"滕侯昊 之御□。"

(1982年4月山东滕县杜庄村发现 考古4:337)

矛

骹部正背两面刻铭,一侧为:"廿年寺工□攻(?)□丞□□工目";一侧为"□郡武库"。

(1978年湖南岳阳市郊东风湖畔出土 湖南考古辑刊2:28)

鼎

铭一行四字:"中脯(府)王鼎"。

矛

铭一行二字:"少府"。

(以上1979年湖南溆浦县马田坪墓葬出土 湖南考古辑刊2:50—51)

秦

铜量

铜量外腹部一侧竖刻铭秦始皇廿六年法度量诏书七行,每行六字,共四〇字。另一侧竖刻铭秦二世元年法度量的诏书一二行,每行四至六字,共六〇字。

(1982年江苏东海县竹墩出土 文物11:96)

鼎 二件

腹部近口处横刻四字:"中脯(府)王鼎"。

矛

纽下镌刻二字："少府"。

（湖南溆浦县罗家塘山丘上墓葬出土 湖南考古辑刊（1984年）2：49—52）

汉

南越王墓铜铙 八件

铭曰"文帝九年乐府工造"，"第一"至"第八"。

（1983年6月—11月广东广州市象岗山墓葬出土 考古3：226—227）

馆陶家铜连鼎

铭一行二〇字："铜连鼎四合容各三斗并重九十三斤馆陶家霸田。"

（1981年陕西咸阳市博物馆收集品 文物10：51）

王氏一斗鼎

一耳旁直刻四行一一字："王氏容一斗 重七斤 十一两"，另一耳旁刻"庚"字。器盖边缘一处横刻铭一行八字："王氏重一斤十四两"，另一处刻"庚"字。

（1969年陕西汉昭帝平陵附近的庞村收集 文物10：52）

铜鼎 三件

鼎（M2：1），上腹一侧卧刻"明光宫"三字，另一侧刻有"□□家"。

鼎（M2：85），上腹一侧卧刻"明光宫"三字，另一侧刻有"□一□家"。

鼎（M2：2），上腹一侧卧刻"明光宫"三字。

盖（残）

上卧刻"明光宫"三字，另一侧刻有"□□家"。

铜釜

铭二字："□君"。

铜釜

铭四字："王家尚食"。

铜镳 二件

镳（M2：62），铭六字："明光宫赵姬镳"。

镳（M2：63），圈足凿刻"明光宫"三字，器底刻一"明"字。

铜勺

铭三字："明光宫"。

行灯

铭三字："赵姬家"。

鎏金铜盘

铭四字："王后家□（盘）"。

（以上1982年10月江苏徐州市石桥石灰厂墓葬出土 文物11：23—28）

铜鼎

盖铭二行一〇字："彭阳重三斤四两 容三升"。

口沿铭四行一〇字："彭阳 重七斤 容一斗 三升"。

（1982年11月甘肃庆阳县野林墓葬出土 文物4：47—49）

铜鼎

口沿铭："□□□□□□□十二两"。

腹外沿铭："□□铜鼎容五升有盖并重四两"。

铜药臼

铭二字："李卿"。

（1974年湖南长沙市阿弥岭墓葬出土 考古9：792）

铜量

铭三字："都市平"。

（1982年四川郫县文物部门征集 四川文物4：62）

铜樽

铭二行吉祥语："郝氏之家大富贵 子孙千代皆阳遂。"

带钩

铭六字吉祥语："丙午钩君高迁"。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拣选 文物12：38）

东晋

弩机

铭："嘉禾六年十月〔匠〕陈太〔臂〕□生口直一万司马王循平"。

（江苏镇江市墓葬M6出土 文物资料丛刊8：21）

唐五代

铜钟

钟身以双线勾勒分为上下四格，方格外刻铭，曰："维唐广德元年岁次癸卯朔十一月廿日越州诸暨县石渎村檀越主僧道黻僧难陀奉为亡兄承之铸钟一口用铜卅五斤永充供养。"其余刻铭大多为经文，从略。

（1977年12月浙江诸暨县水口庵出土 文物12：92）

铜钟

铭"闽王曦永隆元年即晋天福四年"及其他铭文。

（1984年福建政和县第一中学发现 福建文博1：105）

宋

铜钟

钟中部铭四字一句，共二八句一一二字。铭曰"承议郎通判达州军州事赐紫徘袋朱伯坚朝散大夫权知达州军州事借紫翁子仲"及捐资人姓名二百余名。

（四川达县城外禅院发现 文物3：73）

元

铜权

权身正面铭："大德七年大都路造"，右侧为察合台文"星秤"，左侧为回鹘式蒙古文"秤石"；背面中部为"二十五斤秤"和八思巴文"一斤锤"，左侧为察合台文"二十五"。

铜权

权正背面分别铸铭："南京"、"皇甫"。

（以上1976年河北武清县东西仓村出土 文物资料丛刊 8：113—114）

铜权

权背面分别铸铭："益都路"、"至治元年"。

（1979年河北武清县泗村出土 文物资料丛刊8：113）

铜权

权正背面分别铸铭："南京"、"皇甫"。

（1972年河北武清县城上村出土 文物资料丛刊8：114）

铜权

权身正面铭："大德七年大都路造"，右侧为察合台文"什半锤"，左侧为回鹘式蒙古文"秤石（砣）"；背面中部为"三十五斤秤"和八思巴文"半斤锤"，右侧为回鹘式蒙古文"三十五"，左侧为察合台文"量秤"。

铜权

仅识权背面中部八思巴文"一斤锤"和右侧回鹘式蒙古文"秤石（砣）"。

铜权

权正面錾刻二行字："保定路较勘相同"，右侧小面錾刻"山三"；背面錾刻二行字"至正四年官造"。

铜权

权背面分别錾刻二行字："大都路至元二十四年造"、"市令司发四十五斤秤"。

铜权

权背面分别铸铭："济南路"、"官较同"。

（以上1978—1979年天津市地区拣铜中发现 文物资料丛刊8：113—114）

铜权

权正面铸铭："至元五年"，右上角铸一"廿"字，背面铸铭"益都路"。

（1981年秋山东沂水县城关供销社杂品收购门市部收集 考古3：284）

铜权

正面上部铭："天成元年"，另有"官正"二字。

（1980年吉林通化钢铁厂工地发现 博物馆研究1：31）

铜权

权背面分别铸铭二行："延祐二年七二"、"大都路□（较）同三十五斤秤"。

（1978年天津市北郊芦新村出土 文物资料丛刊8：113—114）

铜簋

铭四行三一字："大德乙巳靖州达鲁 花赤脱欢等知州 许武略判官田进义 吏目郭中等谨识云"。

（1981年5月湖南慈利县许家坊收集 文物5：81）

明

铜腰牌

正面铸铭："豹字叁佰肆拾壹号"；背面铸铭二七字："随驾养豹官军勇士悬带此牌无牌者依律论罪借者及借与者罪同"。

（山东枣庄市宋庄附近出土 文物10：17）

鼎 二件

楷书铭："弟曾守意为弗翁党老年台祝"。

盘 三件

盘（J：18），左上题诗："三公不换一日 万卷何假百城 自课养凫莳药 辟人载酒听莺"。

盘（J：20），中央铭一"寿"字，左右楷书署名，有"金学儒、梁养志"等。

盘（J：22），左右署名："周开新、俞汝台"等三〇余人。

爵

铭："丁亥仲夏祝弗翁党公祖寿治生胡尚益具"。

蟠桃杯 四件

杯（J：11），楷书铭："丙戌夏日奉祝党翁老大人宪台寿属下知县韦崇德具"。

杯（J：13），楷书铭："丙戌仲夏奉贺党太公祖老大人千秋治下廪监生高暹具"。

杯（J：14）楷书铭："共祝伍效忠胡国安徐中伦贾际贤冯淵"。

杯（J：15）楷书铭："治晚生林启祥为弗翁党道台寿。"

（以上1982年2月湖南通道县瓜地窖藏出土 文物2：88—89）

清

铁云版

正面正中自上而下铸一行铭："钦命二品衔黑龙江分守绥兰海兵备道松"；背面正中自上而下铸一行铭："大清龙飞光绪三十有一年岁次乙巳仲"。

（1979年7月黑龙江萝北县发现 黑龙江文物丛刊4:73）

附：金银器铭刻

唐

双鱼宝相莲瓣纹银盘

盘底錾刻铭四行五三字："朝仪大夫使持节都督洪州诸军 事守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江南西 道观察处置都团练守捉及莫徭 等使赐紫金鱼袋臣李勉奉进"。

黄鹂折枝花纹银盘

盘底錾刻铭："一十一两二分"。

（1975年陕西西安市南郊西北工业大学基建工地出土 考古与文物4:29）

乾符六年银铤

正面錾刻四行三二字："内库使臣王翱 文思使臣王彦珪 文思副使臣刘可濡 乾符六年内库别铸重卌两"；右侧錾刻"匠臣武敬容"五字。

（1977年11月陕西西安市东郊枣园村发现 考古与文物4:27）

宋

素面银碗

碗圈足外有划刻"山"字，另有"毛近"、"王"字戳记。

束腰银铤

下端左右两侧有"出门税"戳记各一，正面上端左右两侧有"马北头李二"戳记。

（以上1980年11月陕西扶风县西坡村出土 考古与文物4:35）

银文字牌 二件

一件錾刻北宋王禹偁所作《黄州竹楼记》全文三百四〇余字，载文时间为"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记"、"辛巳菊节志"。

一件为宋欧阳修所作《醉翁亭记》全文四百余字，载文时间为"辛巳菊节王××"。

（1977年9月江西乐安县东陂湾水库出土 文物资料丛刊8:119）

银铤

铭："宋伍拾两使司行人朱甫守甫杨原"。

（1981年4月山东平邑县蒙山前的古蒙祠遗址出土 考古4:383）

银铤

铭："解盐使司入纳银计重伍拾两□□□五禾库官王武□行人李中"。另银铤铭："南平军发庆元二年夏季经总艮二十五两专库张□□天库官邓行人楹林嵩看重二十六两六铢"。另银铤铭："张家信实记留侯世家"。

（1981年5月四川成都市双流县加禾村出土 文物7:95—96）

银铤

1号银铤錾刻铭："潮州发绍兴三十年分纱价银"、"赴广州"、"提举衙交纳"、"右从政郎司理参军郑公弼"、"专知林规"。

"银匠罗瑞"。

2号银铤錾刻铭："阆州通判□秋季重五十两"、"霜"、"天七"、"专车大□□"、"兴元府团并到银伍拾两"、"左朝散郎通判阆州军州事胡邦直"。

(1976年湖北襄樊市羊祜山基建中出土 文物4:96)

鎏金银钗

银钗多件，分别刻有："兴贤吴铺"、"京溪供铺记"、"京溪供铺工夫"、"陈宣教"、"余宣钱"、"任七秀才造"、"马千一□"、"施八郎"、"林瑞□"、"城南周□□"、"余定毅"、"北山仕"、"冯将仕工夫"。

鎏金银簪

刻铭"定安"二字。

(以上1983年3月浙江永嘉县山下出土 文物5:82—84)

二 玺印

(凡未注明质料者均为铜印)

战国

荼大夫之玺

(山东苍山县柞城出土 文物8:12)

干

(1974年湖南长沙市树木岭墓葬出土 考古9:791)

汉

南越王墓印

"文帝行玺"（金）、"右夫人玺"（金）、"左夫人印"（鎏金）、"泰夫人印"（鎏金）、"□夫人印"（鎏金）、"赵蓝"（象牙）。另有封泥戳记"泰官"二字。

(1983年6—11月广东广州市象岗山墓葬出土 考古3:225)

弄狗厨印

校尉丞印

强弩司马

军司马印

假司马印

别部司马

军曲侯印

骑部曲将

骑部曲督

部曲督印

大祝令印

(河南省博物馆收藏 中原文物2:112—113)

部曲将印 六三枚

(1981年1月河南孟津县金村出土 文物5:93)

部曲将印

(河南社旗县县日杂废旧公司收购 考古与文物1:83)

军假司马

(1980年5月河南邓县房山果园出土 考古1:96)

广乡亭侯

(1973年河北保定市出土)

安平乡印

(1967年10月河北保定市出土 以上文物9:71)

妾刘（?）俭（?）

(1981年7月河北徐水县大因墓葬出土 文物4:45—46)

周宽信印（M11:13）

周少翁、周遂（双面印）（M12:6）

周宽之、周□（双面印）（M14:36）

(以上1978年山东临沂市金

雀山墓葬出土）

偏将军印章

（1982年12月四川重庆市嘉陵江旁发现 考古与文物 1:82）

汉叟仟长

汉夷土部之章

（四川芦山县文物管理所征集 四川文物4:61）

李守私印

邓克私印

（1978年9月—1980年湖南资兴县木根桥等地墓葬出土 考古学报1:95）

司禾府印

（1959年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 文物9:87）

居延丞印

（1980年新疆哈密县扣门子天山公社农牧场地发现 文博2:64）

魏晋

镇南军假司马

魏率善羌仟长

魏率善羌佰长

晋率善羌邑长

宁朔将军章

（河南省博物馆收藏 中原文物2:113—114）

殿中都尉

（1964年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土）

关中侯印（三国）

（1965年河北石家庄市出土 以上文物9:71）

部曲将印

（1972年12月广东广州市郊龙生岗墓葬出土 文物资料丛刊8:62—63）

部曲督印

（1972年广东广州市北郊流花桥墓葬出土 文物资料丛刊8:61）

东晋印章

印分六面，下面刻"南帝三郎"，侧面刻"三五将君"、"东治三师"、"大一三府"、"□□王氏"，钮顶面刻"民侨"。

（江苏镇江市东晋墓群出土 文物资料丛刊8:27）

兰陵太守章

（江苏镇江市墓葬出土 文物资料丛刊8:21）

常宜□印

（1977年新疆新和县勒合满古城中发现 文博2:65）

西秦

归义侯印

（1976年甘肃泾川县太阳墩窖藏出土 文物资料丛刊8:75）

宋辽金

都元帅府之印

纽右刻"甲申年九月□日"，左刻"规措所造"。

（1965年河北石家庄市出土）

兴中总管都元帅府印

印上部立侧面刻相同款识，纽右刻"规措所造"，左刻"乙酉年十一初一"。

（1954年河北保定市征集）

合札左监军印

纽右刻"甲申年闰八月日"，左刻"规措所造"，印右侧面刻楷书"合札监军印"。

（1954年河北保定市征集）

元帅府监军印

（1954年河北保定市征集）

元帅左监军印

（1954年河北保定市征集）

左监军印

（1965年冬河北海河施工中发现）

元帅左都监印

（1954年河北保定市征集）

御用后总领都提举印

（1954年河北保定市征集）

左司提控之印

（1953年河北保定市征集）

提控之印

（1965年河北满城县出土）

都统所印

纽右刻"贞祐元年十二月"，左刻"礼部造"，印背上侧立面刻"都统所印□非"。

（1970年河北栾城县赵李庄发现）

副统之印

（1953年河北保定市征集）

宝坻监判官印

印上部立侧面刻"宝坻监制印"，纽右刻"天赐元年"，左刻"礼部造"。

"天赐"为金代农民起义军领袖刘永昌年号。

（1965年5月河北丰南县柏各庄农场发现）

都统府印

纽右刻"天赐二年正月"，左刻"都统所印"。

（1966年河北满城县中南韩村出土）

涿州节度使印

纽右刻"癸未年七月二十一日"，左刻"规措所造"。

（1954年河北保定市征集 以上文物9:71—76）

总领军马之印

（1980年6月陕西子长县贺家沟村出土 考古与文物1:82）

枣阳县新铸印

钮两侧刻二行九字款："太平兴国五年九月铸"。

（河南省文物商店拣选收购 中原文物4:23）

中书门下之印

（1983年1月吉林舒兰县嘎呀河旁辽金古城发现 文物9:77—78）

神射第十二指挥第四都记

印背刻："端拱元年五月铸"。

（1972年辽宁凌源县北炉出土）

启圣军节度使之印

（1972年辽宁阜新县娘娘营子出土）

契丹文小字官印

（1972年辽宁盖县高台出土）

契丹文大字官印（西夏）

（1964年辽宁凤城县乌骨城出土）

西夏文官印

（1968年辽宁省博物馆收集）

副总领印

（1968年辽宁省博物馆收集 以上文物9:83—84）

雄节第一指挥第三都朱记

印背铭"元祐五年六月少府监铸"。

殿前司平江府许浦驻扎水军第一将印

印背铭"开禧元年文思院铸"。

嘉兴府澉浦驻扎殿前司水军第一将印

印背铭"嘉定十六年文思院铸"。

金山防海水军第二将印

印背铭"淳祐七年文思院铸"。

嘉定府澉浦驻扎殿前司水军第四将印

印背铭"开庆元年文思院铸"。

沿海制置司定海水军第一将之印

印背铭"景定元年文思院铸"。

嘉兴府金山防海军统领印

印背铭"景定元年文思院铸"。

嘉兴府驻扎殿前司金山水军第二将印

印背铭"德祐元年文思院铸"。

嘉兴府驻扎殿前司金山水军统制印

印背铭"德祐元年文思院铸"。

（以上1978年冬浙江平湖县澉浦施工中发现　文物9:79—81）

行军万户天字号之印

监军之印

都统之印

（以上河南省文物商店收购　中原文物4:23—24）

义军都统之印

印背左侧铭"行部造"，右侧铭"天兴元年"。

（1972年河南密县平陌供销社收购　中原文物1:86）

都提控印

（1981年5月河南社旗县丁庄乡张花村出土　考古与文物1:83）

都提控印

（1982年5月河南社旗县青台乡董庄村出土　考古与文物1:83）

总领之印

（1983年4月河南内黄县马头村发现　考古与文物1:85）

都统之印

印背款两行，右铭"正大六年十月日"，左铭"行在部造"。

宣字副统之印

印背款两行，右铭"正大四年九月"，左铭"行宫礼部造"。

都统之印

（以上1983年3月陕西安康县金川村发现　考古与文物1:84）

万户所印

印背铭楷书"贞祐四年万户所造"。

万户所印

印背铭楷书"贞祐五年中都路经略使司造"。

（以上1983年1月河北易县文化馆文物组征集　文物5:65）

元帅左监军印

印背刻楷书"山东行部造"。

（1980年8月山东滕县龙泉禅寺塔附近发现　考古8:764）

批字号行军万户所印

（1975年山东临沭县收集　考古 4:351）

利涉县印

印背右刻"正隆二年正月"，左刻"内少府监造"。

（1981年4月吉林扶余县双龙泉征集　考古11:1051）

上京路副统出字号印

印背刻"贞祐四年二月日"、"上京行六部造"。

（1980年7月吉林榆树县石

羊出土 博物馆研究1:35)

提控之印

(1976年春辽宁建平县农场平房分场兰家园子发现)

行军万户所印

(1978年春辽宁建平县高杖子村发现)

管勾所记

(1978年春辽宁建平县房山村发现)

□司□记

(1981年4月辽宁建平县嘎海吐村发现 以上黑龙江文物丛刊 4:72)

元明清

蒙古侍卫亲军千户所印(八思巴文)

(河南省文物商店收购 中原文物4:24)

后卫屯田百户印

纽左侧刻汉文两行,“中书礼部造”,“至元二十一年八月日”。

(1964年河北徐水县大王店出土)

蒙古军百户之印

纽左侧刻汉文两行,“中书礼部造”,“至元二十九年四月”。

(1954年河北保定市征集 以上文物9:76)

东上阁门使印

(1977年辽宁凤城县凤凰山中出土)

兵马都提控印

印背右刻“□巳年六月□七日”。

(1968年辽宁省博物馆收集 以上文物9:84)

祥州站印

印文为八思巴文。印背镌刻汉字楷书,右侧为“祥州站印”。左侧为“中书礼部造 皇庆元年九月日”。

(1981年4月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左旗乌尔逊河河口发现 文物9:89)

应城县等处千户所印

印文为八思巴文。印背为汉字“应城县等千户所印”,左侧为“至正十八年造”。

(1981年秋湖北大悟县刘湾发现 考古11:1044)

江西等处行中书省烧钞库印

印文为八思巴文。印背左侧直刻汉字两行,“中书礼部造”、“至元卅年七月日”。

(1983年6月江西九江市区山川岭基建工地发现 文物10:41)

潼州路军民都总管印

印文为八思巴文。印背刻汉字两行“潼州路军民都总管印”、“礼部 至元十六年五月”。

(1979年广东潮安县庵斗山一土洞中发现 文物8:39)

浔州卫中千户所百户印

印背左刻两行“礼部造”、“洪武二十九年四月日”。

(1976年3月广西桂平县铜锣塘山发现 文物12:57)

华阳王镇抚司之印

印背右侧刻“隆武二年五月初八日给王臣”,左侧刻“华阳王镇抚司之印礼部造”。

(1983年2月湖南澧县文物管理所征集 文物11:72)

真修无碍

宣德二年

广慧悟法净觉妙善翊国衍教灌顶戒定西天佛子大国师印

印背左刻"礼部造成化二十二年十二月"。

(以上青海乐都县文化局文物管理段收藏 文物9:78)

援剿营总兵官关防印

印背刻"礼部造 大顺二年十二月日"，侧刻"大字一千二百四号"。

大顺政权为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所建立

(四川甘孜州文化馆收藏 四川文物4:60)

永顺等处军民宣慰使司印

印文一半汉字一半满文。印背刻"永顺等处军民宣慰使司印 礼部造 康熙十九年二月日 康字五千二百十六号"。

(1981年4月湖南湘西永顺老司城出土 文物7:78)

三 墓志

汉

东汉相缪宇墓志

首行："故彭城相行长史事吕长缪宇字叔异"。

和平元年(150年)七月七日卒。

(1982年江苏邳县青龙山南麓出土 文物8:22—29)

南北朝

北魏刘贤墓志

碑首："刘戍主之墓志"。

承平元年(452年)三月后卒。

(1965年9月辽宁朝阳县西上台发现 考古7:615)

北魏杨颖墓志(缺盖)

首题："魏故华州别驾杨府君墓志铭"。

永平四年(511年)五月二十七日卒。

北魏杨阿难墓志(缺盖)

首题："魏故中散杨君墓志铭"。

永平四年(511年)十一月十七日卒。

北魏杨播墓志(缺盖)

首题："魏故使持节镇西将军雍州刺史华阴庄伯墓志铭"。

延昌二年(513年)十一月十六日卒。

(以上解放后陕西华阴县五方村出土 考古与文物5:17)

北魏杨泰墓志

首题："魏故朔州刺史华阴伯杨君墓志铭"。

熙平二年(517年)五月三日卒。

西魏杨泰妻元氏墓志(缺盖)

首题："魏故平西将军汾州刺史华阴伯杨保元妻华山郡主元氏墓志铭"。

大统十五年(549年)卒。

(以上解放后陕西华阴县孟塬迪家出土 考古与文物5:17)

魏故杨胤季女墓志(有盖)

首题："魏故华荆秦济四州刺史杨胤季女之墓志"。

神龟二年(519年)卒。

(解放后陕西潼关县管南出土 考古与文物5:17)

东魏茹茹公主墓志

首题："魏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长广郡开国公高公妻茹茹公主闾氏墓志铭"。

武定八年(550年)四月七日

卒。

(1976年—1979年河北磁县大冢营村出土 文物4:1—9)

北朝崔鸿墓志(有盖)

首题:"魏故使持节镇东将军督青州诸军事度支尚书青州刺史崔文贞侯墓志铭"。

孝昌元年(525年)十月九日卒。

崔鸿是《十六国春秋》的作者。

北朝崔鸿妻张玉怜墓志

与夫崔鸿合葬。

天平三年(536年)卒。

北朝崔鹔墓志(缺盖)

首题:"有魏使持节冠军将军济州刺史崔使君墓志铭"。

武泰元年(528年)四月十四日卒。

北朝崔混墓志(有盖)

首题:"魏故镇远将军秘书郎中崔君墓志铭"。

元象元年(538年)二月五日卒。

北朝崔德墓志(有盖)

盖题未详。

河清四年(565年)二月一日卒。

北朝崔博墓志(缺盖)

首题未详。

武平四年(573年)卒。

(以上1973年冬山东淄博市临淄区窝托村出土 考古学报2:225—238)

北齐尧峻墓志(有盖)

盖题:"齐故仪同尧公墓志铭"。

天统二年(566年)六月七日卒。

北齐尧峻妻吐谷浑静媚墓志(有盖)

盖题:"齐故尧公妻吐谷浑墓志之铭"。

天统元年(565年)卒。

北齐尧峻妻独孤思男墓志(有盖)

志文漫漶不清。

武平二年(571年)七月卒。

(以上1975年4—6月河北磁县东陈村出土 文物4:16—22)

北齐常文贵墓志(有盖)

武平二年(571年)葬。

(1977年3月河北黄骅县西才元村出土 文物9:39—42)

隋唐五代

隋罗达墓志(有盖)

首题:"大隋使持节行军总管齐州刺史巴渠伯罗府君墓志铭"。

开皇十六年(596年)卒。

(1982年6月陕西西安市东郊郭家滩出土 考古与文物5:28—31)

隋尉仁弘墓志

大业八年(612年)二月一日卒。

(1982年河北曲阳县王家弓村出土 文物2:16)

唐李延祯墓志(有盖)

盖题:"大唐故李君墓志之铭"。

垂拱元年(685年)卒。

(1984年春河南偃师县杏园村出土 考古10:907—908)

唐孙□□墓志

首题:"唐故云麾将军□太常卿乐安孙公墓志铭"。

元和七年(812年)十一月十六日卒。

(1954年春河北石家庄市郊区振头村出土 考古3:283)

唐陈琳墓志

首题:"唐故陈府君墓志铭并序"。

太和四年(830年)九月六日卒。

唐陈琳妻施氏墓志

首题:"唐故施氏夫人墓志并序"。

太和四年（830年）十月十五日卒。

（以上1978年9月上海市上海县林家桥出土 考古7:633）

唐李存墓志（有盖）

盖题："唐故渤海李参卿墓铭"。

会昌五年（845年）卒。

墓中出土一玉石羊，座底刻一"存"字。另有一铜印，印文为"渤海图书"四字。

（1984年春河南偃师县杏园村出土 考古10:910—914）

唐何弘敬墓志（有盖）

盖题："唐故魏博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中书令赠太师庐江何公墓志铭"。

咸通六年（865年）卒。

（1973年河北大名县万堤农场出土 考古8:721）

唐何文哲墓志

首题："唐故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守右领军卫上将军兼御史□□上柱国庐江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赠太子少保何公墓志铭并序"。

卒年未详。

（1966年陕西西安市西郊西安钢厂基建中发现 西北史地3:47）

宋

宋陶仁哲墓志（缺盖）

首题："大宋国故寻阳陶府君十九郎墓志铭并序"。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七月六日卒。

（1983年1月江西九江市汤桥出土 考古3:734）

宋任氏墓志（缺盖）

首题："宋故尚书刑部郎中充龙图阁待制赠兵部尚书钟离夫公人寿安县太君任氏墓志铭并序"。

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六日卒。

（1973年夏安徽合肥市大蜀山东柏树郢出土 安徽史学5:52—53）

宋王纯中墓志（有盖）

宋黄庭坚撰书。

首题："宋故朝奉郎知洺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上骑都尉借紫王君墓志铭"。

元祐二年（1087年）十二月葬。

（1973年江西修水县出土 书法2:34）

宋吴氏墓志

首题："宋故金公夫人吴氏墓铭并序"。

元丰八年（1085年）十二月十三日卒。

（1983年5月江西铅山县王家坂村出土 考古11:986—989）

宋施氏墓志（缺盖）

首题："宋咸宁郡太夫人施氏墓志铭"。

大观三年（1109年）十二月十一日卒。

（1972年江西鄱阳县出土 文史20:222）

宋洪觉顺墓志（缺盖）

嘉泰四年（1204年）六月二十二日卒。

（1982年9月江西乐安县金鸡山出土 考古8:734—736）

宋陆氏墓志

宝祐元年(1253年)二月一日卒。

（1984年江苏吴县斜塘琼姬墩出土 文博通讯（江苏)1:100

辽金元

辽韩佚墓志（缺盖）

首题："大契丹国故始平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崇禄大夫检校太保使持节辽州□军事行辽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昌黎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韩公墓志铭。"

统和十三年（995年）六月一日卒。

辽韩佚妻王氏墓志（有盖）

盖题："故韩公夫人墓志之铭"。

统和二十九年（1011年）六月十二日卒。

（以上1981年6月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院墙内出土 考古学报3:370—372）

辽张让墓志

乾统五年（1105年）卒。

（1974年秋辽宁朝阳县马家房框子出土 考古5:480）

元韩氏墓志（缺盖）

首题："元故孺人韩氏圹记"。

至元元年（1264年）十二月卒。

（1973年江西清江县出土 文史20:230）

元慕完墓志（有盖）

盖题："大元故侍御史赠参知政事慕公墓志铭"。

至正五年（1345年）九月卒。

（1974年前河南新乡市近郊菇岗出土 中原文物2:75）

夏明玉珍墓志

碑首："大夏太祖钦文昭武皇帝玄宫碑"。

1366年卒。

墓主为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建立了大夏政权。

（1982年四川重庆市江北基建中发现 考古与文物4:37—38）

明清

明朱朝垥墓志（有盖）

盖题："明册封周藩原武温穆王圹志铭"。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卒。

明朱朝垥妻张氏墓志（有盖）

盖题："明册封周藩原武温穆王元配张太妃合葬圹志铭"。

卒年未详。

（以上河南荥阳县二十里铺乡瓦屋孙村出土 中原文物4:25—26）

明戴贤及妻徐氏合葬墓志（有盖）

戴贤墓志未详。

徐氏墓盖题："大明昭勇将军都指挥佥事戴公淑人徐氏墓志铭"。

卒年未详。

（1981年3月江西南昌市永和门外江西省二机局工地出土 考古10:926—930）

明郝瑞墓志（缺盖）

首题："赠故庠生南麟郝公瑞墓志铭"。

万年□酉年（1573—1609年）十二月五日卒。

（1964年12月湖北汉阳县张家渡出土 江汉考古3:100）

附一：墓石刻铭

汉画像石题记

画像石题记已残，残高26厘米。现存十二行，行七字，共计七十六字。残文中有"合天之道"、"先古之恩德"、"子孙而终"等语。

（1975年河南密县老城邵沟

村墓葬出土 中原文物2:65)

北齐宝山寺双石塔

西塔门楣楷书题铭："宝山寺大论道凭法师烧身塔"。西塔塔门东侧前壁楷书题记："太齐河清二年三月十七日"。

(河南安阳宝山寺发现 文物9:43—44)

唐方塔题记

塔身第一层正面刻题记，凡十行，每行一至十一字不等，共九十三字。此塔是埋葬遗骨的。

神龙二年刊立。

(1976年冬河南洛阳市郊徐村发现 中原文物3:57)

宋朱松墓碑

碑首："显祖朱献靖公墓"。

据碑文记载，此碑系居住在建阳考亭氏十二世孙朱凌等于明嘉靖甲辰年(1554年)清明所立。

(福建崇安县寂历山上发现 福建文博1:110)

宋墓题记

墓室右壁上有阴刻题记五十字，记载修墓人及年款。

(1980年6月四川荣昌县许溪地区墓葬发现 文物7:72)

金纪名石一方

长方形石上镌楷书二六字："苏琐之虚大金承安四年(1199年)岁次己未十月有八日故男进副苏敬记"。

(1981年9月山东滕县城新兴南跑体育场墓葬出土 考古4:349)

金《通慧圆明大师塔铭》刻石

金世宗母李氏贞懿皇后《通慧圆明大师塔铭》刻石，刻于金正隆六年(1161年)六月，李彦隆撰书，未署其子东京留完颜褎(即金世宗颜雍)建塔立石。

(1981年6月辽宁辽阳市东王家庄农民家中发现 考古2:175—177)

附二：买地券

东吴叶敦买地券

赤乌八年(245年)

(1978年11月安徽南陵县麻桥东风出土 考古11:978)

东吴黄甫买地券

五凤元年(254年)

(1979年—1980年江苏南京中央门外幕府山出土 文物资料丛刊8:3)

西晋李达买地券

元康元年(291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江苏句容县出土 考古6:540—541)

宋买地券

地券表面剥蚀较重，仅见"维政和八年……"

政和八年(1118年)。

(四川成都市双流县永福乡陈志青家出土 成都文物1:98—99)

宋景□墓券

券首为："宋故府君丞事景公墓券谨记"。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十二月。

(1978年5月陕西汉中市东方红砖厂出土 考古与文物5:60—61)

四 碑刻

孔望山石刻

一石上镌有隶书“砚石”二字。

（江苏连云港市海州锦屏山东北发现 文物8:30—33）

大岯山寺之记

残碑有“大周显德五年”（958年）等字样。

（河南浚县大石佛处发现 考古与文物2:110—112）

唐《东渭桥记》残碑

碑身似经幢，为六棱柱形，下部残断，余四百三十五字。

开元九年（721年）立。

（1978年8月陕西高陵县周家发现 考古与文物4:110）

唐颜真卿书《裴将军诗》石刻

《裴将军诗》为一首五言绝句。

（1984年山东莱西县老朱东村发现 齐鲁学刊2:封三）

唐《重建净土寺碑》

碑已残。

（河南巩县石窟寺发现 考古与文物4:20）

宋元碑刻

宋元碑刻以元碑最多，元碑五十八通，宋碑仅三通，另有不著年代的梵文字碑八通，共六十九通。其内容多为元代云南地方史的史料，也往往涉及南诏、大理以及南诏以前的历史。

（1972年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县五华楼出土 云南社会科学5:89 6:107）

宋山崖题记六处

第一、二、四、五、六处题记字迹漫漶不清，唯第三处题记字迹清晰，文曰：“曾孝□麦文□奉泰陵被 旨提举采石与 僚属孙熙谢□□宗师黄□□ 寻泉于此元符三年（1100年）二月十九日”。

（河南巩县宋陵牛心山采石场发现 考古11:980—985）

宋《大观碑》

额行书题“大观圣作之碑”为宋徽宗书，碑已残，楷书二十八行，行六十八字。

（1982年江苏句容县城镇第一小学发现 文博通讯（江苏）1:43—46）

宋赵明诚等泰山石刻题记

山东长清县灵岩寺题记，“东武赵明诚德甫，东鲁李擢德升、跃时升，以大观三年（1109年）九月十三日同来，凡留两日乃归”。“后四年，德父复自历下将如奉高过此。政和三年（1113年）闰月六日。”，“丙申三月四日复过此德父记”。

泰山题记：“太原王贻公与□□□□兴天水赵明诚德父政和三年闰月八日同登”。

（文物6:93）

宋《廉先生序》石刻

李清照父李格非撰写，序文之后还有李清照堂兄李迥跋语。

（山东章丘县廉坡村发现 文物5:70）

宋赵明诚等仰天山罗汉洞题记

仰天山罗汉洞题记：“余以大观戊子之重阳，与李擢德升同登兹山。己丑端午，又与家兄导甫及德升、于肇元阙（？）、谢克明如晦同来。今岁中秋，复来游，预会三人：王蔚文□、李续神举、傅察公

晦。政和辛卯（1111年）中秋赵明诚德父题”。“卢格之、赵仁甫、德甫、能父、谢叔子同游。宣和辛丑（1121年）夏四月廿六日”。水帘洞题记：“卢彦承、赵守诚、明诚、克诚、谢克明，辛丑四月廿五日同游”。“赵仁约子文、赵明诚德父、谢克明叔子”。

（山东益都县仰天山 文物6:90）

宋《永泰陵采石记》碑

碑文二二行，每行二六字，字书楷书。碑文记述了修筑宋哲宗赵煦陵寝采石的经过。

（1980年10月河南偃师县缑氏镇永庆寺旧址发现 文物4:79）

辽题名残碑

残碑存一百五十余字。

大安七年（1091年）建塔。

（1956年黑龙江塔子城出土 社会科学战线3:193）

辽石刻

石刻为：“大康八年（1082年）九月十日□十差到通引官行首直属□ □今□新来一十人四 □十八万古永记”。

（河北古北口大十八盘梁道侧发现 社会科学战线1:199）

明文徵明行书诗碑二通

二碑各刻《上巳》、《九日》诗一首。

（甘肃岷县文化馆收藏 文物4:81）

清《夹荒十一十二十四十五甲纳租报竣章程碑记》

咸丰八年（1858年）十月一日刻立。

（1982年8月吉林长春市西四道街清代财神庙遗址出土 社会科学战线1:214）

清《陈家场地震碑》

碑已残断。

咸丰九年（1859年）立。

（1978年4月四川重庆市长安桥发现 四川文物4:18）

清曹寅《尊胜院碑记》

这是曹寅的一篇佚文。《尊胜院碑记》记载自元朝至正年间到清朝前期三百多年间尊胜禅院（吉祥庵）所经历的兴衰过程。

（近年来安徽来安县舜歌山山麓发现 文物7:64）

清《御制泸定桥碑记》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二月十日立。

（四川泸定县泸定桥东桥头侧发现 四川文物3:55）

清《依克唐阿碑》

上款为：“钦命帮办吉林边务事宜镇守珲春副都统升任黑龙江将军法什尚阿巴图鲁恩宪依公德政碑”。

下款为：“靖边右路统领副□□拉林花翎协领保成率中左马步兵营文武官弁等敬立光绪十六年（1890年）二月上浣谷旦”。

（1978年夏吉林敦化县哈尔巴岭发现 黑龙江文物丛刊3:50）

清《邑侯徐公疏渠筑堤碑记》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刊立。

清《赵公修沟渠桥梁碑记》

道光四年（1824年）刊立。

（河南新野县存 中原文物3:53）

附：造像刻铭

北魏太和二年王上造像

床足上刻造像记："太和二年新台县人王上为亡父母造多宝像一躯……"。

北魏太和二年落陵委造观世音像

床足上刻造像铭："太和二年□□□□落陵委为亡父母造观音像一躯……"。

北魏太和八年造像

床上三面刻造像记："太和八年四月三日原郡……"。

北魏太和九年程晕造像

床足刻造像铭："太和九年岁在乙卯二月六日高□母程晕为亡母造像一躯……"。

北魏二十一年丁花造像

造像背面刻铭，残文为："太和廿一年十二月十日□……赵□妻丁花……"。

北魏景明元年石景之造像

四条床足刻造像铭："景明元年二月六日佛弟子石景之为亡父母造像一躯"。

北魏正始二年朱德元造像

背面刻造像铭："正始二年十一月二十日乐陵县朱德元为父造像一躯……"。

北魏正始四年张铁武造像

背面刻造像铭："正始四年十二月六日阳信县张铁武造多宝像一躯……"。

北魏永平四年明敬武造观世音像

床足前、左、右三面刻造像铭："永平四年正月六日佛弟子明敬武……造观音像一躯……"。

北魏熙平二年刘□□造弥勒像

床足左、后两面刻造像铭："熙平二年一月三十日刘□□造弥勒像一躯"。

北魏正光四年项寄造像

背面刻造像铭："正光四年二十八日佛子项寄造像一躯"。

北魏永安二年纪和遵造像

背面刻造像铭："永安二年清信士佛子纪和遵造像一躯"。

北魏永安三年孙容造观世音像

床足右、后面刻造像铭："永安三年五月三日孙容为自己身造观世音像一躯"。

北魏普泰二年孔雀造弥勒像

背面刻造像铭："普泰二年四月八日佛弟子孔雀为亡妻马□造弥勒像一躯"。

北魏太昌元年冯贰郎造观世音像

背面刻造像铭："大魏太昌元年十一月十四日清信士阳信县人冯贰郎为父母造观世音像一躯"。床足前、后、左面分别刻造像人姓名。

东魏兴和二年薛明陵造像

背面刻造像铭："兴和二年五月薛明陵造……"。

东魏兴和四年项智坦造像

床足四面刻造像铭："兴和四年五月二十日项智坦敬造像一躯……"。

东魏武定三年程次男造观世音像

背面刻发愿文："大魏武定三年岁次乙丑五月己卯朔廿日庚子青州乐陵郡乐陵县人马祠伯妻程次男敬造观音像一躯"。

北齐天保五年薛明陵造像

背面刻造像铭："天保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孔雀妻薛明陵敬造"。

北齐河清三年造像

床足前、右两面刻造像铭："河清三年四月三日佛□□思保造像一躯"。

北齐河清三年孔昭俤造弥勒像

背面刻造像铭："河清三年四月八日乐陵县孔昭俤……造弥勒像一躯"。

北齐武平元年孙天稍造观世音像

床足刻造像铭："武平元年十一月九日孙天稍为亡父母造观世音像一躯"。

北齐武平二年刘树瑶造观世音像

床足上刻造像铭："武平二年五月十日主刘树瑶愿造观世音像一躯"。

单身佛造像

背面刻造像铭："□□四年岁在丁亥广平郡人□□□造弥勒一尊……"。似为北魏正始四年作品。

张嘉喜造像

床足刻造像铭，残文为"四月八日佛弟子张嘉喜为亡父母亡兄造像一躯"，应为东魏北齐间的作品。

（以上1983年9月山东博兴县崇德村发现　文物5：21—31）

佛弟子常岳等一百余人造像碑

碑阴题记从略。

造像刊经碑

碑两侧和碑阴刊刻佛经，字迹漫漶，从略。

北魏正光五年汝南王元悦修治古碑碑铭

文中纪年和造碑者为："大魏正光五年闰月十日威烈将军汝南王侍郎宋善带作"。

北齐天保五年造像碑

龛外侧刊刻榜题："弥勒主赵庆祖"六字。碑右侧四层小龛。一层龛上方榜题"惠远"、"赵□"、"兴□"，四层龛右侧榜题漫漶，仅"慧□一心侍佛时"依稀可见。碑阴为造像题记和发愿人一百七十二人名单，纪年为"大齐天保五年岁在甲戌十一月甲申朔八日辛卯就"。

道民大都宫主马寄造像碑

碑正中央一圭形，刊"道民大都宫主马寄"八字。造像题名十余人，字迹剥蚀过甚。

（以上解放后河南洛阳市附近郊县收集　文物5：44—51）

东魏武定六年造像

下层床架左、右侧和后面阴刻铭文二十三字："武定六年二月廿二日佛弟子郭买祚□□□□□□一躯"。

北齐天保二年造像

下层床架左、右侧和后面阴刻铭文二十一字："天保二年六月廿八日佛弟子郭买祚□身造像一躯"。

北齐天保四年造像

床架左、右侧和后面阴刻铭文二十四字："天保四年二月二日弟子郭□珍为父母合□大小造像一躯"。

北齐皇建二年造像二件

床架左侧和后面阴刻铭文一九字："皇建二年四月十九日佛弟子郭义造□像一躯"。

床架四面阴刻铭文三十七字："皇建二年四月十九日佛弟子□义□□父造□□像一躯上为七世父母见在大小□□平安"。

北齐天统三年造像

床架左侧和后面阴刻铭文二十三字："天统三年九月十五日佛弟子

郭也□母弟罗□造像一躯”。

天□三年造像

床架左侧和后面阴刻铭文二十五字：“天□三年六月八日佛弟子郭□珍为父母敬造观音像一躯”。

（以上1983年4月山西武乡县党城村发现 文物5:57—59）

北魏始光元年魏文朗造像碑

北魏雷小豹造像碑

无发愿文。推定为北魏年间凿。

北周武成元年绛阿鲁碑

北周保定二年李昙信碑

七十人造像残碑

此碑无纪年。

夏侯僧碑

此碑无纪年。

（以上陕西耀县药王山石刻 考古与文物5:46—51）

北魏永安三年李黑城造像碑

碑身正面刻发愿文。

西魏大统十二年法龙造像碑

碑正面下半部刻发愿文。

北周建德二年郭乱颐造像碑

龛右侧刻发愿文。

（以上1981年—1982年陕西洛川县鄜城村发现 考古与文物5:32—34）

北周建德三年杨广娼造像碑

（1981年—1983年陕西洛川县严家庄发现 考古与文物5:34—36）

西魏大统十四年似先难造像碑

碑正面下部刻发愿文。

（1978年陕西黄陵县西峪村发现 考古与文物5:41—42）

北朝任要好造像碑

碑三面均有铭刻。年代推定为北朝。

北朝符茂造像碑

碑四面下部均有铭刻。年代推定为北朝晚期。

（以上1982年陕西黄陵县索罗湾发现 考古与文物5:42—43）

后晋天福三年王弘谏造像碑

碑阴刻发愿文。

（1983年陕西甘泉县许家圪坨村发现 考古与文物5:43）

北魏建明二年金神庆造像

造像左侧及背部铭刻四十二字：“使持节假镇西将军镇军将军西征都督泾州□□安〔戎〕县开国子金神庆敬造石像二躯建明二年二月十七”。

（1981年宁夏固原县新集出土 考古与文物6:34）

隋开皇七年造像

床右后足缺，其余三足存铭刻，纪年为：“开皇七年八月四日……”。

隋开皇十一年孔钺造老子像

床足前、右面刻造像铭：“开皇十一年十月道民孔钺造老子像一躯□德”。

隋仁寿元年张见造观世音像

背面刻铭：“仁寿元年九月八日张见为亡者敬造观世音像一躯”。

（以上1983年9月山东博兴县崇德村发现 文物5:30—31）

隋石雕老君像题记

像背面为发愿文，铭六行，满行十六字，共八十三字。

（1980年7月河南洛阳市老城西马沟村出土 中原文物3:108）

隋开皇九年造像碑

榜题分别刊刻："供养主张元国"、"供养主傅丘真"、"都邑主□□"，造像题记为发愿人名单。龛右侧残留："主王贵光、□刘女足、□□□男、□□和颜"，纪年为"开皇九年十月辛酉□二日壬戌"。

唐总章元年造像碑

碑座正面刊造像题记，纪年为"总章元年九月十八日成就"。

唐景云二年造像碑

龛下造像题记作楷书，纪年为"大唐景云二年岁次辛亥九月癸酉朔廿八日庚子建"。

唐先天元年造像碑

龛下造像题记残毁，纪年为"大唐先天元年壬子九月十五日建成"。

（以上解放后河南洛阳市附近郊县收集　文物5:50—53）

唐王普贤造像题记

龛左侧下部题记，凡七行，满行十五字，共九十三字。

（1983年5月河南洛阳市郊区徐村出土　中原文物3:56）

唐神龙二年造像题记

造像下部刻题记，云为佛弟子骆思慎阵亡而造像。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文物12:23）

唐造像题记

1号龛，题记为："大唐龙朔三年五月廿日桂州都督□参军事仇任懋敬造阿弥陀像一区〔并〕二菩萨上为皇帝又为师僧及七代父母并法界众生并愿□出苦门，俱登正觉"。

2号龛，题记为："大唐龙朔三年五月廿三日桂州始安县人朱罗汉敬造阿弥陀像一躯并二菩萨上为皇帝又为师僧并七代父母并法界众生并愿俱登正觉"。

3号龛，题记为："大唐乾封二年二月廿五日张士妻□□患□病仰凭诸佛敬造像一龛上为皇帝下及苍生亲眷属合家大小一心供养"。

10号龛，题记为："大唐龙朔□年六月□四日周□将为之□俭一敬〔造〕阿弥陀佛像一躯并二菩萨合家供养"。

11号龛，题记不清，仅能辨认出"大唐乾封元年"等字样。

东魏造像题记

12号龛，题记为："天平三年中赵胜荣愿身平安，敬造像一躯愿一切众生普蒙斯福"。

西魏造像题记

16号龛，有"大统四年三月十日"题记。

17号龛，题记为："天保二年三月廿四日比丘戒为亡父母敬造观音像一躯愿舍恶□□神非妙境"。

18号龛，题记为："大统四年三月八日佛弟子魏文男为身病患，愿造像一躯愿百病永除众邪弥散上为父母下为妻子眷属并一切众生共成佛道"。

唐代造像题记

19号龛，题记为："大唐乾封二年三月廿日比丘僧法□敬造□皇帝又为师僧父母十方施主愿……"。

20号龛，题记为："大唐乾封元年十二月十八日魏玄德母宋〔氏〕为亡男玄□及东行男玄德愿平安早□，敬造像一龛，合家供养"。

21号龛，题记为："大唐乾封元

年十二月十三日□□□□弟□仰为亡父母敬造阿弥陀像并二菩萨阿难迦叶合家眷属一心供养”。

25号龛，题记为：“大唐龙朔二年二月三日造□佛弟子仲海云妻王及女比丘尼果儿造像一躯今得成就合家大小一心供养”。

26号龛，题记模糊，仅能辨认出“大唐乾封元年八月卅日”。

27号龛，题记为：“大唐乾封元年十二月十八日，□洪道及妻□种土达□舍衣资□□□□敬造阿弥陀像并二菩萨合力供养”。

29号龛，题记为：“大唐麟德二年八月二日为魏弁□为弟妇王身故为敬造释迦佛并二菩萨合家一心供佛”。

30号龛，题记为：“大唐麟德二年八月二日杨四郎为亡□及之女敬造阿弥陀像并二菩萨合家内外眷属供养佛”。

31号龛，题记为：“大唐麟德二年八月二日孙奉义妻勒敬造阿弥陀像一龛及男行一女妹□行妻并外孙李行寿□供养”。

33号龛，题记为：“大唐乾封元年十二月十八日贾父相母及相妻吴共舍□□为亡男□□敬造阿弥陀像并二菩萨阿难迦叶合家供养”。

北齐造像题记

36号龛，题记为：“天统二年七月十九日□为皇帝目内□病后及师僧父母正身门徒普为一切众生同升常□比丘明藏敬写供养”。

（以上河南巩县石窟寺发现 考古与文物4：13—20）

宋治平四年穆文昌造像碑

碑阴碑额上有铭刻。

（陕西甘泉县寺沟村众宝寺发现 考古与文物5：43—44）

明嘉靖十四年造像题记

像背面下部刻有造像题记，落款为：“大明嘉靖十四年十二月吉旦”。

（1979年10月河南扶沟县道清寺村出土 中原文物1：100）

五 有砖铭

汉砖铭

方砖格内铭“长乐未英”四字。

（1983年5月内蒙古伊盟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征集 文物3：56）

东汉砖铭

砖铭“雒城”、“雒官城墼”。

（1983年底—1984年1月四川广汉县南门外导航站出土 四川文物3：50）

东汉墓砖铭

砖铭“建安元年六月造作”八字。

（1973年11月四川大邑县盐店墓葬出土 文物11：62）

三国墓砖铭

砖上分别刻有“甘露二年”、“甘露卿相”、“将军□功二千石”、“工甲大吉”。

（浙江金华市古方砖瓦厂墓葬出土 考古9：816—817）

吴墓砖铭

墓砖文字有“天册元年七月十八日臾侯师李椎作壁”、“天册元年七月”、“臾侯”。

（1979年11月江苏江宁县梭角山墓葬出土 文物资料丛刊8：10）

晋墓砖铭

砖铭"太康六年唐□造"。

(1978年5月—1980年12月湖南资兴县旧市等墓葬出土 考古学报3:340—341)

晋砖铭

砖铭"晋元康五年八月廿五日李氏造"、"元康五年太岁乙卯黄氏造"。

(江苏句容县出土 考古6:540)

晋墓砖铭

砖铭"太康八年八月造"。

(1978年8月浙江常山县何家墓葬出土 考古2:192)

晋墓砖铭

砖铭"太康二年八月"。

(浙江金华市古方砖瓦厂墓葬出土 考古9:819)

晋墓砖铭

砖一端铭"永康九月廿日",据推定应为永康元年。

(1973年—1974年浙江新昌县小垄山墓葬出土 文物资料丛刊8:54)

晋墓砖铭

砖铭"太康九年九月二日□周明造作"。

(1983年4月安徽和县小周墓葬出土 考古9:828)

晋墓砖铭

墓砖侧面铭"李宜官二千石"。

(1980年1月湖南益阳市郊桃花仑山坡出土 文物资料丛刊8:45)

东晋墓砖铭

四座墓有纪年砖铭:M1为太和六年,M2为太元十年,M4为太元十四年,M3为升平四年。

(1978年秋浙江瑞安县国营瑞安钾氮肥厂施工中发现 文物资料丛刊8:50—51)

东晋墓砖铭

墓砖侧面铭"大兴二年七月三日造之"、"周世"、"周"三种。还有一种花纹图样中印出"周叡师"三字。

(1972年12月广东广州市北郊流花桥墓葬出土 文物资料丛刊8:60)

东晋墓砖铭

两座墓砖铭"隆安元年太岁丁酉八月二十四日故记"。

(1976年2月浙江新昌县道场山墓葬出土 文物资料丛刊8:59)

东晋墓砖铭

一墓砖铭"太元十八年"。

一墓砖铭"太元十八年八月六日梁孜"。

(1978年3月浙江新昌县象鼻山墓葬出土 文物资料丛刊8:56)

东晋墓砖铭

砖铭"大兴三年八月十日董公雅伯七世郎"。

(1976年8月浙江新昌县云居寺墓葬出土 文物资料丛刊8:55)

东晋墓砖铭

不同墓分别有砖铭"咸和八年二月一日造切"、"咸康元年作"、"徐司马"。

(江苏镇江市墓葬出土 文物资料丛刊8:20)

东晋墓砖铭

砖铭有“永嘉六年壬申富且寿考”、“永嘉六年壬申宜子保孙”、“永嘉中天下灾但江南尚康平”等三种，前二种铭文铭的侧面印有“陈”字。

（广西梧州市富民坊一号墓出土 文物资料丛刊8:40）

东晋画像砖铭

砖左右两侧铭“晋隆安二年造立冢郭”、“颍阳山子纡安寿万年”。

（江苏镇江市东晋墓群出土 文物资料丛刊8:26）

东晋墓砖铭

砖铭“临淮谢氏”。

（江苏镇江市M19出土 文物资料丛刊8:24）

东晋刘剋墓砖铭

砖铭“东海郡郯县都乡容丘里刘剋，年二十九字彦成晋故升平元年十二月七日立”。

（江苏镇江市墓葬出土 文物资料丛刊8:24）

北朝墓砖铭

残砖二块，分别阴刻楷书“宝铭”、“刘神”。

（1973年冬山东淄博市临淄区窝托村9号墓出土 考古学报2:240—241）

南朝墓砖铭

砖侧面铭“齐故建元四年镇西参军事南阳张”。

（1980年1月湖南益阳县赫山庙城关基建工地墓葬出土 文物资料丛刊8:48—49）

南朝墓砖铭

六块素面砖分别铭“一别不相见以言录年（书）春夫客（容）半天上怜子遠愁云廿字诗”、“书来得音□□□恒不叙今得邻去附果定在人识廿字诗”、“此是和僧□庭须等会得”、“苛人同”、“下乐村营家边”、“黄总广念”。

（1978年冬江苏扬州地区邗江县高小墓葬出土 考古3:243—245）

南朝墓砖铭

墓砖分别铭“元嘉廿年太岁癸未月癸已屈氏”、“孝建三年七月五日程氏作”、“大明六年太岁壬寅七月九日夏氏”、“大明七年太岁癸卯九月一日作”、“永明五年岁丁卯”。

（近年来湖南湘阴县濠河重华城墓葬出土 湖南考古辑刊2:208）

南朝墓砖铭

砖铭“元嘉十七年八月丙辰□（朔？）廿旦□□立塚公故记之也”。

（1978年4月福建福州市省体委军事体育学校墓葬出土 文物资料丛刊8:127—129）

南朝墓砖铭

有纪年墓六座，M3、M4、M9砖铭“元嘉廿七年”、M12砖铭“永明六年”、M5砖铭“永明十年”、M6砖铭“建武三年”。

（1979年6月江西清江县塘源熊村墓葬出土 文物资料丛刊8:68）

南梁墓砖铭

砖铭“天监□年”。

（1973年3月浙江奉化县山厂墓葬出土 考古9:856）

南朝墓砖铭

砖铭“庚寅岁桓葆□”。

（浙江金华市古方砖瓦厂墓葬出土 考古9:824）

南齐墓砖铭

砖铭有“齐建武四年七月”、“方建武四年”、“建武四年”、“万凌”、“凌钝”、“利小”、“中柱”等铭文。

（1980年12月江西赣县官村营墓葬出土 考古4:345）

唐墓砖铭

砖铭“□富贵吉利”及“咸享贰年”。

（1978年春福建泉州市杉宫山墓葬出土 考古12:1138）

唐纪年砖

砖铭“上元三年十月□”。

（1978年秋福建莆田县下郑村墓葬出土 考古4:378）

宋砖铭

砖铭“淳祐乙巳东窑城砖”、“淳祐乙巳西窑城砖”。

（四川重庆市发现 四川文物3:45—46）

宋砖铭

砖一面铭“水军修城砖”、“水军广州修城砖”两种。个别的还有在砖的一侧印有“番禺县”三字。

（1972年7月广东广州市区越华路发现 文物资料丛刊8:136—137）

明墓砖铭

砖铭“大明崇祯三年三月廿二日福府瓦匠孙尚喜张嘉猷孙尚进周天梁”。

（1983年春河南洛阳市东花坛立体交叉桥墓葬出土 中原文物3:73—75）

六 瓦当和瓦削文字

秦汉瓦当铭

瓦当铭分别为：“蕲年宫当”、“年宫”、“棫阳”、“巨杨冢当”、“万岁冢当”、“长生未央”、“无□□□”。

（1982年陕西凤翔县秦雍城遗址附近采集 考古与文物2:23—24）

西汉瓦当铭

瓦当铭：“齐园”、“齐园宫当”、“齐一宫当”等。

（1970年—1976年陕西西汉长陵陪葬墓出土 考古与文物2:37）

西汉筒瓦纪年铭

瓦内壁铭“元光元年”四字

（1960年湖北沙市郊徐家台出土 江汉考古1:109）

七 陶器文字

战国陶文

豆柄上有“亳”字戳记。

残豆盘上有“亳”字，还有“十一年目（以）差”五个小字。

（河南郑州黄河医院出土 中原文物1:11）

秦汉陶器戳印铭

陶缶、陶鼎、陶罐、陶坛、陶甑、陶釜、陶盆、陶壶均有戳印“云市”二字。

陶坛有戳印“云亭”二字。

陶壶有戳印“咸直里□”四字。

（1979年—1980年陕西淳化县马家山村出土 考古与文物3:25—27）

秦陶文

陶罐、陶盆等五件铭刻“正”字。

陶盆铭刻“棍”字。

汉陶文

陶盆铭“日利”陶工姓名。

陶瓮铭“□□”陶工姓名。

陶瓮三处铭“葆不津”陶工姓名。

陶罐铭“公”字。

（以上1978年陕西临潼县油王村出土 考古与文物6:25—28）

西汉南越王墓陶器铭

陶瓮上有戳印文字“长乐宫器”。

（1983年6月—11月广东广州市象岗山墓葬出土 考古3:228）

西汉滑石模型器刻铭

灶外壁上铭“造”、“造屋”，灶台上置甑和釜，均在腹部上刻有“甑”、“釜”。釜盖上刻有“温盖”二字。

井腹部上刻有一字，不识。

仓一侧框边上刻有“万石仓”三字。

鼎腹部刻有“鼎”字，盖上刻“鼎盖”二字。

磨腹部刻有“磨”字。

（1974年湖南长沙市阿弥岭西汉墓出土 考古9:792—793）

西汉陶文

瓦上或砖上的陶文多为印记，计有“宫二”、“宫三”、“宫十四”、“宫二十”、“六四”、“大三十”、“大三十一”、“大四十二”、“右校”、“右三十”等。

（1970年—1976年陕西西汉长陵陵邑、陵园发现 考古与文物2:42）

东汉陶屋铭刻

陶屋前墙上刻有“大”、“七”，左侧墙上刻有“又大”等。

（1978年9月—1980年湖南资兴县木根桥等地墓葬出土 考古学报1:88）

东汉陶器铭刻

在二十一件陶器上刻有文字，内容有人名、容量、长度、吉祥语等。计有“邓巨”、“周少良”、“五升”、“八寸”、“贩有则”、“大”、“又大”、“大利”以及“白”、“十”、“功”、“予”、“黄”、“女”、“铜指”等。

（1978年9月—1980年湖南资兴县木根桥等地墓葬出土 考古学报1:71）

陶器刻铭

陶罐底部阴刻“人平”二字。另一陶罐底部阴刻“舆”字。

（1982年陕西凤翔县马家庄采集 考古与文物2:30）

宋陶罐刻铭

器盖上刻铭“绍圣四年四月十六日钟博士谨记”。

（1980年2月广东南雄县莆石发现 考古7:601）

宋筒形陶器刻铭

腹壁刻铭“九政自造火□元丰六年八月十九日元”。

（1976年浙江武义县岩坞墓葬出土 文物8:91）

附：1972—1982年中国考古学书目

壹 总类

一 考古学通论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 文物编辑委员会编 文物出版社 1979年11月 文413页 插图322幅 图版32页 16开

考古工作手册（考古学专刊丙种第三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文物出版社 1982年12月 464页 大32开

工农考古基础知识 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编 文物出版社 1978年3月 233页 插图210幅 16开

凡将斋金石丛稿 马衡著 中华书局 1977年10月 387页 大32开

金石学 朱剑心著 文物出版社 1981年9月 新1版 影印本 301页 有图 32开

郭沫若书简（致容庚） 曾宪通编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1年5月 177页 大32开

云南考古 汪宁生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0年6月 文231页 插图80幅 图版104页 大32开

二 论文集

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1979） 中国考古学会编辑 文物出版社 1980年12月 文461页 插图149幅 图版16页 16开

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1980） 中国考古学会编辑 文物出版社 1982年6月 文233页 插图72幅 图版12页 16开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编著 文物出版社 1981年11月 文211页 插图210幅 图版16页 16开

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一卷） 郭沫若著 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 科学出版社 1982年9月 影印本 462页 插图85幅 16开

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九卷） 郭沫若著 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 科学出版社 1982年9月 影印本 342页 插图178幅 16开

出土文物二三事 郭沫若著 人民出版社 1972年8月 文48页 彩色图版1页 黑白图版14页 大32开

出土文物二三事 郭沫若著 人民出版社 1973年10月 第2版 文79页 图版26页 大32开

考古学和科技史（考古学专刊甲种第十四号） 夏鼐著 科学出版社 1979年4月 文150页 插图58幅 彩色图版8页 黑白图版22页 16开

地震与地震考古 孟繁兴等著 文物出版社 1977年9月 185页 插图69幅 32开

水文、沙漠、火山考古 重庆市博物馆等著 文物出版社 1977年7月 文186页 插图78幅 图版16页 32开

金石论丛 岑仲勉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11月 483页 大32开

摹庐丛著七种 陈直著 齐鲁书社 1981年1月 622页 大32开

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一） 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79年2月 273页 32开

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二）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1年1月 338页 32开

三 历史图谱、博物馆陈列说明和藏品图录

简明中国历史图册（第一册原始社会）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1978年9月 161页 插图324幅 32开

简明中国历史图册（第二册奴隶社会）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1979年4月 225页 插图445幅 32开

简明中国历史图册（第三册封建社会—战国）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1979年4月 185页 插图348幅 32开

简明中国历史图册（第四册封建社会·秦汉）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1979年12月 243页 插图500幅 32开

简明中国历史图册（第五册封建社会·三国两晋南北朝）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1年5月 188页 插图306幅 32开

简明中国历史图册（第六册封建社会·隋唐）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0年10月 207页 插图370幅 32开

简明中国历史图册（第七册封建社会·五代宋辽金元）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0年11月 214页 插图333幅 32开

简明中国历史图册（第八册封建社会·明清）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0年10月 251页 插图371幅 32开

简明中国历史图册（第九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上〉）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1979年7月 166页 插图245幅 32开

简明中国历史图册（第十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下〉）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1979年12月 186页 插图256幅 32开

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通史陈列说明）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辑 文物出版社 1976年 45页 插图31幅 32开

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通史陈列说明）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 文物出版社 1976年 文79页 插图91幅 彩色图版5幅 22开

半坡遗址（中英文对照） 西安半坡博物馆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78年12月 文2页 图15页 24开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砚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编 文物出版社 1979年12月 文20页 彩色图版8页 黑白图版128页 8开

笔墨纸砚图录 上海博物馆工艺美术研究组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1年3月 文14页 图版120页 20开

清代帝王陵寝（彩色图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档案出版社 1982年 84页 12开

四 工具书

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1949—196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 文物出版社 1978年12月 348页 16开

文物考古学文献目录（1925—1980） 谢端琚等编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1年9月 72页 32开

辞海（历史分册：世界史·考古学） 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辑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78年10月 348页 附索引27页 有插图 大32开

中国古代青铜器小辞典 杜迺松编 文物出版社 1980年8月 95页 插图161幅 32开

贰 田野考古资料

一 调查发掘报告

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遗址） 贾兰坡、王建著 文物出版社 1978年12月 文85页 彩色图版7幅 黑白图版22幅 16开

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编 文物出版社 1974年12月 文164页 插图94幅 图版111页 16开

殷虚妇好墓（考古学专刊丁种第二十三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文物出版社 1980年12月 文241页 插图110幅 彩色图版40页 黑白图版188页 16开

藁城台西商代遗址 河北省博物馆等编 文物出版社 1977年10月 91页 插图65幅 32开

随县曾侯乙墓 湖北省博物馆编 文物出版社 1980年4月 文16页 彩色图版26幅 黑白图版32幅 16开

铜绿山——中国古矿冶遗址 湖北省黄石市博物馆等编 文物出版社 1980年9月 文5页 彩色图版11页 黑白图版13页 12开

曲阜鲁国故城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 齐鲁书社 1982年9月 文228页 图版135页 16开

云梦睡虎地秦墓 《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编著 文物出版社 1981年9月 文143页 图版168页 16开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简报 湖南省博物馆等编 文物出版社 1972年7月 文17页 图版32页 16开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下集）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文物出版社 1973年10月 上集文162页 插图114幅 下集彩色图版76幅 黑白图版216幅 8开

长沙马王堆汉墓 湖南省博物馆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9年8月 文8页 彩色图版9页 黑白图版20页 32开

满城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专刊丁种第二十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合编 文物出版社 1980年10月 上册文451页 插图242幅 下册彩色图版30页 黑白图版270页 16开

满城汉墓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仪器厂工人理论组编写 文物出版社 1978年2月 文81页 图版18幅 大32开

广州汉墓（考古学专刊丁种第二十一

号）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合编 文物出版社 1981年12月 上册文530页 插图284幅 下册图版174页 16开

西安郊区隋唐墓（考古学专刊丁种第十八号）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科学出版社 1966年6月 文142页 插图77幅 彩色图版2页 黑白图版48页 16开

唐长安城郊隋唐墓（考古学专刊丁种第二十二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文物出版社 1980年9月 文89页 彩色图版8页 黑白图版104页 16开

福州南宋黄昇墓 福建省博物馆编 文物出版社 1982年3月 文145页 彩色图版8页 黑白图版77页 16开

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 文物编辑委员会编 文物出版社 1981年2月 140页 插图157幅 16开

北京出土文物（北京史地丛书） 天戈编 北京出版社 1980年7月 文86页 插图45幅 彩色图版4页 32开

津门考古 天津文物管理处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年4月 文90页 插图2幅 图版10页 大32开

山西历史文物简介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73年11月 文50页 图版59幅 32开

内蒙古文物古迹简述 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77年6月 文95页 插图34幅 图版16页 大32开

黑龙江古代文物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编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79年3月 155页 插图38幅 大32开

历史的见证——黑河地区文物考古普查文集 《历史的见证》编写组编写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78年4月 文105页 图版2页 32开

宁夏文物述略 钟侃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0年12月 118页 有图 32开

新疆历史文物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 文物出版社 1977年11月 文131页 插图32幅 图版49幅 大32开

西沙文物（中国南海诸岛之一西沙群岛文物调查） 广东省博物馆编 文物出版社 1974年9月 文31页 插图3幅 彩色图版2页 黑白图版23页 16开

夜郎故地上的探索（贵州文物考古介绍） 李衍垣编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0年1月 文120页 插图43幅 彩色图版2页 32开

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 人民出版社编辑 人民出版社 1972年9月 文81页 插图33幅 彩色图版8页黑白图版8页 大32开

二 出土文物图录

新中国出土文物 外文出版社编辑 外文出版社 1972年 文2页 图版217幅 8开

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第一辑） 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编 文物出版社 1972年2月 图版152页（附说明1册15页） 8开

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彩色明信片） 文物出版社编辑 文物出版社 1973年4月 每套12张 50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展品选

集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工作委员会编 文物出版社 1973年 图版167幅 12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工作委员会编 文物出版社 1974年 68页 插图52幅 22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选（中英文对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工作委员会编 文物出版社 1976年8月 文53页 彩色图版28幅 黑白图版100幅 12开

天津出土文物（中英文对照彩色明信片辑） 天津市文物管理处编选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1979年2月 每套10张 50开

上海出土文物（中英文对照彩色明信片）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3年3月 每套10张 50开

上海古代历史文物图录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1年11月 117页 16开

河北省出土文物选集 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编 文物出版社 1980年5月 文83页 彩色图版16页 黑白图版240页 16开

辽宁出土文物（明信片） 辽宁人民出版社编辑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76年7月 每套12张 50开

山东出土文物 山东人民出版社编辑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75年7月 每套10张 44开

湖北出土文物（彩色明信片） 湖北省博物馆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77年3月 每套12张 50开

马王堆出土文物（中英文对照彩色明信片） 湖南省博物馆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9年3月 每套10张 50开

文化大革命期间陕西出土文物 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73年8月 文8页 图版48页 20开

文化大革命期间陕西出土文物（明信片） 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73年8月 每套10张 50开

陕西出土文物（彩色摄影明信片） 陕西省博物馆编 文物出版社 1976年12月 每套10张 50开

新疆出土文物（汉、维文对照）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 文物出版社 1975年10月 文2页 图版141页 8开

广西出土文物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著 文物出版社 1978年8月 文6页 图版209幅 图版说明23页 8开

云南出土文物（明信片） 云南省博物馆供稿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75年12月 每套12张 50开

叁 考古学分论

一 原始社会

人是从哪里来的？ 《人是从哪里来的》编写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年5月 99页 插图63幅 32开

人怎样认识自己的起源——人类起源研究史话（上册） 周国兴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7年12月 文232页 插图110幅 彩色图版2幅 32开

人怎样认识自己的起源——人类起源研究史话(下册) 周国兴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0年8月 文359页 插图190幅 彩色图版8幅 32开

人类发展史 吴汝康等著 科学出版社 1978年1月 文363页 插图141幅 图版3页 32开

人类的起源和发展 吴汝康著 科学出版社 1980年2月 第2版 文122页 插图53幅 黑白图版4页 32开

中国原始社会（历史知识读物） 张景贤著 中华书局 1973年8月 58页 有插图 32开

中国原始社会 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编 文物出版社 1977年2月 111页 插图51幅 32开

中国原始社会参考图集 上海博物馆《中国原始社会参考图集》编辑小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年6月 74页 16开

古人类论文集——纪念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写作一百周年报告会论文汇编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编 科学出版社 1978年9月 文162页 插图61幅 图版17页 16开

中国古人类画集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古人类画集》编制组编著 科学出版社 1980年6月 图版174页 10开

中国大陆上的远古居民 贾兰坡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78年9月 文147页 图版30页 大32开

蓝田猿人 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管会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73年10月 文41页 图版5幅 32开

蓝田人（中国历史小丛书） 黄慰文著 中华书局 1982年4月 43页 插图6幅 32开

周口店——“北京人”之家（北京史地丛书） 贾兰坡编著 北京出版社 1978年9月 57页 插图23幅 32开

北京人（历史知识小丛书） 贾兰坡著 中华书局 1979年2月 33页 32开

“北京人”的故事 刘后一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79年5月 65页 有插图 32开

“山顶洞人”的故事 刘后一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79年5月 86页 有插图 32开

旧石器时代人类和主要文化遗址分布图（中国历史教学参考挂图）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辑 地图出版社 1979年12月 1幅 全开

中国历史的童年（中国历史小丛书合订本）中华书局编辑 中华书局 1982年11月 216页 插图54幅 32开

全书篇目：一、蓝田人，二、北京人，三、仰韶文化，四、半坡村遗址，五、龙山文化，六、夏代文化，七、郑州商代城遗址，八、安阳殷墟。

新石器时代 尹达著 三联书店 1979年2月 第2版 文256页 图版34页 大32开

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编 齐鲁书社 1979年11月 322页 插图13幅 大32开

中国新石器时代论集 安志敏著 文物出版社 1982年12月 文273页 插图55幅 图版24页 16开

七千年前的奇迹——我国河姆渡古遗址 梅福根、吴玉贤编写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2年7月 92页 插图59幅 32开

半坡氏族公社——考古资料反映的我国古代母系氏族社会制度 石兴邦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79年8月 169页 插图36幅 大32开

半坡人的故事 刘后一编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79年10月 148页 32开

西安半坡 西安半坡博物馆编 文物出版社 1982年10月 文9页 图版130幅 16开

二 商周时代

中国奴隶社会 许顺湛编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0年11月 165页 有插图 32开

夏代文化（中国历史小丛书） 李民著 中华书局 1980年10月 26页 插图9幅 32开

从考古资料中看商周奴隶社会的阶级压迫 顾维勤编写 中华书局 1975年12月 44页 插图14幅 32开

商周考古(考古专业教学参考书)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编著 文物出版社 1979年1月 文278页 插图226幅 彩色图版5页 黑白图版58页 16开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 邹衡著 文物出版社 1980年10月 文367页 图版56页 16开

郑州商代城遗址（中国历史小丛书） 陈显泗著 中华书局 1981年8月 28页 插图7幅 32开

殷墟（奴隶社会的一个缩影） 河南省安阳市文化局编 文物出版社 1976年8月 96页 插图64幅 32开

楚文化新探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1年9月 文216页 图版4页 32开

三 汉及以后各代

汉书新证 陈直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79年3月 第2版 497页 大32开

马王堆汉墓 何介钧、张维明编写 文物出版社 1982年1月 文167页 插图59幅 彩色图版6幅 黑白图版26幅 大32开

马王堆汉墓研究 湖南省博物馆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年8月 文413页 图版4页 16开

丝绸之路（历史知识小丛书） 陈振江著 中华书局 1980年8月 36页 插图4幅 32开

丝绸之路 杨建新、卢苇编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1年1月 141页 大32开

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 常任侠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年4月 文264页 图版40页 大32开

肆 考古学专论

一 殷墟卜辞

甲骨文合集(第一册第一期1—1139) 郭沫若主编 中华书局 1982年10月 文16页 彩色图版8页 黑白图版312页 8开

甲骨文合集（第二册第一期1140—4974） 郭沫若主编 中国社会科

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中华书局 1978年10月 图版313—742页 8开

甲骨文合集（第三册第一期4975—7771） 郭沫若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中华书局 1978年12月 图版743—1173页 8开

甲骨文合集（第四册第一期7772—11479） 郭沫若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中华书局 1979年8月 图版1175—1644页 8开

甲骨文合集（第五册第一期11480—14821） 郭沫若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中华书局 1979年10月 图版1645—2114页 8开

甲骨文合集（第六册第一期14822—19753） 郭沫若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中华书局 1979年12月 图版2115—2565页 8开

甲骨文合集（第七册第一期附19754—22536） 郭沫若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中华书局 1980年8月 图版2567—2932页 8开

甲骨文合集（第八册第二期22537—26878） 郭沫若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中华书局 1981年1月 图版2933—3313页 8开

甲骨文合集 （第九册第三期26879—29695） 郭沫若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中华书局 1981年6月 图版3315—3630页 8开

甲骨文合集（第十册第三期29696—31968、第四期31969—32977） 郭沫若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中华书局 1981年12月 图版3631—4056页 8开

小屯南地甲骨（上册第一分册、第二分册）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中华书局 1980年10月 第一分册文72页 图版400页 第二分册图版401—834页 附册，原大图47幅 8开

殷虚文字记 唐兰著 中华书局 1981年5月 影印本 127页 16开

甲骨文字释林 于省吾著 中华书局 1979年6月 471页 16开

甲骨文史话 萧艾著 文物出版社 1980年6月 103页 插图13幅 32开

殷墟甲骨文简述 孟世凯著 文物出版社 1980年11月 132页 插图25幅 32开

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 王宇信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年3月 文266页 图版16页 大32开

甲骨文选读 李圃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1年6月 326页 16开

甲骨探史录 胡厚宣等著 三联书店 1982年9月 手抄影印本 494页 大32开

二 商周铜器及铭文

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 郭宝钧著 文物出版社 1981年12月 文217页 插图42幅 图版96页 16开

中国古代青铜器 马承源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年2月 文154页 图版88页 大32开

中国古青铜器选 文物出版社编著 文物出版社 1976年2月 文34页 彩色图版12幅 黑白图版96幅

12开

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一）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编 文物出版社 1979年10月 文17页 图版199页 16开

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二）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编 文物出版社 1980年6月 文23页 图版207页 16开

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三)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编 文物出版社 1980年12月 文32页 图版192页 16开

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一） 《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编辑组编 文物出版社 1981年9月 文60页 彩色图版8幅 黑白图版377幅 16开

中国青铜器（中英文对照彩色摄影明信片）（第一辑） 文物出版社编辑 文物出版社 1976年12月 每套10张 50开

中国青铜器（中英文对照彩色摄影明信片）（第二辑） 文物出版社编辑 文物出版社 1976年12月 每套10张 50开

中国青铜器（中英文对照彩色摄影明信片）（第三辑） 文物出版社编辑 文物出版社 1977年3月 每套10张 50开

中国青铜器（中英文对照彩色摄影明信片）（第四辑） 文物出版社编辑 文物出版社 1977年4月 每套10张 50开

中国青铜器（中英文对照彩色摄影明信片）（第五辑） 文物出版社编辑 文物出版社 1977年6月 每套10张 50开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青铜器（中英文对照彩色摄影明信片）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 文物出版社 1977年6月 每套10张 50开

河北出土文物（战国时期中山国青铜器）（中英文说明彩色明信片）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79年2月 每套12张 50开

上海博物馆藏铜器选辑（英汉文对照彩色摄影图片） 上海博物馆编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78年4月 每套10张 44开

南京博物院藏青铜器（中英文对照彩色摄影明信片） 南京博物院编 文物出版社 1977年2月 每套10张 50开

云南青铜器 云南省博物馆编 文物出版社 1981年12月 文50页 彩色图版116幅 黑白图版133幅 8开

云南青铜器（彩色摄影明信片） 云南省博物馆编 文物出版社 1976年12月 每套10张 50开

云南青铜器论丛 《云南青铜器论丛》编辑组编 文物出版社 1981年2月 文210页 插图117幅 图版22页 16开

金文著录简目 孙稚雏编 中华书局 1981年10月 412页 16开

西周金文语法研究 管燮初著 商务印书馆 1981年10月 手抄影印本 212页 16开

中山王𰯼器文字编 张守中撰集 中华书局 1981年5月 158页 插图45幅 16开

三 简牍、帛书及写本，附文字学

侯马盟书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编

已审阅
子居 10-03-13，13:27

文物出版社 1976年12月 文323页 插图21幅 彩色图版2幅 黑白图版101幅 8开

睡虎地秦墓竹简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 文物出版社 1977年9月 7册 1—2册彩色图版2页 黑白图版54页 3—7册文179页 线装

睡虎地秦墓竹简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 文物出版社 1978年11月 文321页 插图3幅 图版2页 大32开

云梦秦简初探 高敏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79年1月 247页 32开

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 高敏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1年7月 第2版 347页 大32开

云梦秦简研究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中华书局 1981年7月 363页 大32开

汉简缀述（考古学专刊甲种第十五号） 陈梦家著 中华书局 1980年12月 317页 16开

居延汉简甲乙编（上册）（考古学专刊乙种第十六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中华书局 1980年7月 文3页 甲编图版189页 乙编图版293页 8开

居延汉简甲乙编（下册）（考古学专刊乙种第十六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中华书局 1980年12月 345页 有插图 8开

银雀山汉墓竹简（壹）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 文物出版社 1975年7月 10册 文314页 彩色图版2页 黑白图版38页 线装

孙膑兵法（银雀山汉墓竹简）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 文物出版社 1975年2月 文154页 插图10幅 图版8页 大32开

孙子兵法（银雀山汉墓竹简）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 文物出版社 1976年10月 文161页 图版8页 大32开

武威汉代医简 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县文化馆编 文物出版社 1975年7月 1册 文23页 图版10页 线装

马王堆汉墓帛书（壹）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 文物出版社 1974年9月 2册 文117页 彩色图版2页 黑白图版29页 线装

马王堆汉墓帛书（壹）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 文物出版社 1980年3月 文124页 彩色图版2页 黑白图版46页 8开

马王堆汉墓帛书（叁）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 文物出版社 1978年7月 3册 文114页 彩色图版2页 黑白图版10页 线装

老子（马王堆汉墓帛书）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 文物出版社 1976年3月 文137页 图版2页 大32开

经法（马王堆汉墓帛书）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 文物出版社 1976年5月 文189页 图版2页 大32开

战国纵横家书（马王堆汉墓帛书）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 文物出版社 1976年12月 文201页 图版2页 大32开

古地图（马王堆汉墓帛书）（附《古地图论文集》一册）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 文物出版社

1977年3月　地图4幅　2开　论文集65页　16开

导引图（马王堆汉墓帛书）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　文物出版社　1979年4月　彩色图版2张　全开

帛书五行篇研究　庞朴著　齐鲁书社　1980年7月　文88页　图版10页　大32开

竹简帛书论文集　郑良树著　中华书局　1982年1月　363页　大32开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　文物出版社　1981年1月　文221页　图版4页　大32开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二册）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　文物出版社　1981年10月　文378页　图版4页　大32开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　文物出版社　1981年12月　文374页　图版4页　大32开

中国文字学　唐兰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年9月　新1版　192页　32开

古文字学导论（增订本）　唐兰著　齐鲁书社　1981年1月　449页　插图38幅　大32开

文字形义学概论　高亨著　齐鲁书社　1981年2月　新1版　330页　大32开

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辑）　四川大学学报编辑部、四川大学古文字研究室编辑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年5月　434页　插图74幅　16开

古文字类编　高明编　中华书局　1980年11月　658页　附“引书目录”、“引器目录”55页　“检字索引”、“合文索引”61页　16开

汉语古文字字形表（上中下）　徐中舒主编　汉语古文字字形表编写组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年8月　3册　568页　附检字表34页　参考书目10页　线装

汉语古文字字形表　徐中舒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年8月　568页　16开

汉字史话（中国历史小丛书）　胡双宝编著　中华书局　1980年5月　42页　有插图　32开

古文字中所见之火烛　王献唐著　齐鲁书社　1979年7月　223页　18开

四　碑刻

增补校碑随笔　（清）方若原著　王壮弘增补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81年7月　674页　32开

石鼓文研究诅楚文考释（考古学专刊甲种第十一号）　郭沫若著　科学出版社　1982年10月　影印本　文342页　图版155页　16开

南京出土六朝墓志　南京市博物馆收藏　文物出版社　1980年8月　1册　有图版　线装

房山云居寺石经　中国佛教协会编　文物出版社　1978年4月　142页　图版66幅　8开

秦始皇金石刻辞注　《秦始皇金石刻辞注》注释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年8月　47页　32开

吐蕃金石录　王尧编著　文物出版社　1982年10月　文206页　图版16页　16开

陕西历史碑石选辑　陕西省博物馆供稿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79年7月

150页 8开

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 李华编 文物出版社 1980年6月 文207页 图版8页 大32开

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史资料丛刊） 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年6月 文513页 图版8页 大32开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 苏州历史博物馆等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1年2月 405页 有照片 大32开

少林寺日本两禅师撰书三碑 河南省开封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编 文物出版社 1981年10月 57页 插图6幅 16开

桂林石刻选 桂林市文管会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0年12月 60页 有图版 16开

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石刻碑文集 广西民族研究所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2年9月 188页 16开

五 货币

中国古代货币通考（上中下） 王献唐著 齐鲁书社 1979年8月 1852页 插图493幅 20开

货币史话（中国历史小丛书） 俞沛铭著 中华书局 1981年1月 45页 插图8幅 32开

中国货币发展简史和表解 千家驹、郭彦岗合著 人民出版社 1982年3月 文100页 图版28页 大32开

古钱大辞典 丁福保编 中华书局 1982年12月 影印本 2册 文1543页 图879页 16开

六 印玺

玺印概论 罗福颐编 文物出版社 1981年12月 133页 插图875幅 16开

古玺汇编 罗福颐主编 文物出版社 1981年12月 520页 16开

古玺文编 罗福颐主编 故宫博物院编 文物出版社 1981年10月 590页 16开

汉印文字征 罗福颐编 文物出版社 1978年9月 1册 16开

汉印文字征补遗 罗福颐编 文物出版社 1982年12月 1册 16开

汉印分韵合编 上海古籍书店编 上海古籍书店 1979年10月 影印本 437页 大32开

近百年来对古玺印研究之发展 罗福颐作 西泠印社 1982年5月 92页 32开

故宫博物院藏古玺印选 罗福颐主编 文物出版社 1982年12月 174页 16开

上海博物馆藏印选 上海书画出版社编辑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79年8月 150页 16开

黑龙江古代官印集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1年12月 文210页 插图75幅 图版27页 大32开

西夏官印汇考 罗福颐等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2年2月 影印本 95页 插图177幅 16开

七 其他

殷虚玉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文物出版社 1982年3月 文50页 图版121幅 16开

中国“透光”古铜镜的奥秘 阮崇武、毛增滇合著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2年10月 49页 32开

铜鼓史话　蒋廷瑜编写　文物出版社　1982年4月　143页　插图36幅　32开

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　文物出版社　1982年4月　文218页　插图44幅　图版4页　16开

中国古兵器论丛　杨泓著　文物出版社　1980年6月　文153页　图版28页　16开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动植物标本的研究　文物出版社编辑　文物出版社　1978年8月　104页　插图158幅　16开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纺织品的研究　上海市纺织科学研究院、上海市丝绸工业公司文物研究组编著　文物出版社　1980年6月　文126页　插图94幅　彩色图版38幅　16开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古尸研究　湖南医学院主编　文物出版社　1980年10月　文346页　插图148幅　彩色图版21页　黑白图版40页　16开

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墓西汉古尸研究　武忠弼主编　湖北省西汉古尸研究小组编　文物出版社　1982年12月　文292页　插图265幅　彩色图版16页　16开

伍　美术考古

一　通论

中国美术史略（修订本）　阎丽川编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0年12月　文370页　图版80页　大32开

中国美术史论集　金维诺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1年3月　文433页　图版54页　大32开

中国美术史　张光福编著　知识出版社　1982年11月　文478页　图版20页　大32开

二　雕塑

秦陵兵马俑（中国历史小丛书）　王学理著　中华书局　1981年9月　文30页　插图2幅　图版13幅　32开

秦始皇陵与兵马俑（陕西历史文物丛书）　无戈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2年10月　文93页　插图43幅　彩色图版9幅　黑白图版15幅　大32开

中国古代雕塑百图　王子云编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1年3月　文100页　图版106页　32开

洛阳西汉画像空心砖（中国古代美术作品介绍）　黄明兰编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2年5月　40页　16开

南阳汉代画像石刻　闪修山等编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1年2月　文3页　图版70幅　16开

山东汉画像石选集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齐鲁书社　1982年3月　文54页　图版240页　8开

山东汉画像石研究　李发林著　齐鲁书社　1982年10月　文108页　图版18幅　16开

嘉峪关画像砖（魏—晋）（彩色明信片）　甘肃省博物馆编　文物出版社　1976年9月　每套10张　50开

南朝陵墓石刻　姚迁、古兵编著　文物出版社　1981年4月　文11页　图版138幅　16开

六朝艺术 姚迁、古兵编著 文物出版社 1981年5月 文6页 图版307幅 8开

洛阳唐三彩 洛阳市博物馆编 文物出版社 1980年12月 文5页 图版129幅 8开

洛阳唐三彩（彩色明信片） 洛阳博物馆编 文物出版社 1976年9月 每套10张 50开

吐鲁番出土彩色雕塑（彩色明信片） 新疆人民出版社编辑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0年6月 每套15张 50开

大同寺庙塑像 丁洁因编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2年6月 46页 16开

辽塑（大同下华严寺）（中英法文对照彩色明信片） 山西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编 文物出版社 1973年8月 每套10张 50开

飞来峰石刻造像（中英文说明彩色明信片） 浙江人民出版社编辑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79年3月 每套12张 48开

白马寺罗汉 白马寺汉魏故城文物保管所编 文物出版社 1982年 每套18张 32开

三 石窟寺

敦煌莫高窟（第一卷） 敦煌文物研究所编 文物出版社 1982年12月 文60页 插图76幅 彩色图版197幅 8开

敦煌石窟艺术 敦煌文物研究所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79年9月 58页 有照片 32开

敦煌的艺术宝藏 敦煌文物研究所编辑 文物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80年10月 文42页 插图97幅 彩色图版200幅 10开

敦煌莫高窟艺术 潘絜兹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年1月 第2版 文121页 插图40幅 彩色图版6页 大32开

敦煌艺术（中国历史小丛书） 郭宗纾著 中华书局 1982年4月 第3版 35页 插图21幅 32开

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 敦煌文物研究所整理 文物出版社 1982年11月 242页 16开

敦煌研究文集 敦煌文物研究所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2年3月 文383页 图版155幅 大32开

敦煌彩塑 敦煌文物研究所编 文物出版社 1978年10月 文16页 图版94幅 16开

敦煌彩塑 敦煌文物研究所编 文物出版社 1978年12月 文14页 彩色图版85幅 8开

敦煌彩塑（中英文对照彩色明信片）（1—3辑） 敦煌文物研究所编 文物出版社 1978年12月 每辑11张 50开

敦煌壁画（汉英文对照彩色摄影明信片）（1—2辑） 敦煌文物研究所编 文物出版社 1979年12月 每辑10张 44开

敦煌壁画速写 邢永川绘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0年7月 88页 24开

煌敦飞天 中国旅游出版社编 中国旅游出版社 1980年7月 文6页 彩色图版97幅 8开

敦煌装饰图案 刘庆孝、诸葛铠编绘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2年2月 136页 24开

云冈石窟　山西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编　文物出版社　1973年　30页　插图27幅　32开

云冈石窟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编　文物出版社　1977年12月　文20页　图版107幅　12开

云冈石窟（汉英文对照摄影明信片）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编　文物出版社　1977年8月　每套33张　50开

云冈石窟（中国文物小丛书）　山西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编著　文物出版社　1981年12月　30页　有插图　32开

龙门石窟　河南龙门文物保管所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73年　文5页　图版26幅　32开

龙门石窟　龙门文物保管所编　文物出版社　1980年3月　文17页　图版说明17页　图版206幅　16开

龙门石窟（中国文物小丛书）　龙门文物保管所编著　文物出版社　1981年1月　文34页　插图41幅　彩色图版4页　32开

龙门石窟艺术　宫大中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年4月　文314页　图版20页　大32开

龙门（河南名胜古迹丛书）　宫大中著　中州书画社　1981年8月　文63页　图版3页　16开

炳灵寺石窟（中国文物小丛书）　甘肃省博物馆、永靖炳灵寺文物保管所编　文物出版社　1982年2月　文35页　插图40幅　彩色图版4幅　32开

炳灵寺石窟　甘肃省博物馆、炳灵寺石窟文物保管所编　文物出版社　1982年8月　文20页　图版95幅　16开

麦积山石窟（中英文对照摄影明信片）（1—3辑）　麦积山文物保管所编　文物出版社　1978年12月　每套11张　50开

麦积山石窟　麦积山文物保管所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1年5月　55页　32开

剑川石窟　陈兆复编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0年7月　文76页　图版8页　32开

延安石窟艺术（中国古代美术作品介绍）　靳之林编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2年5月　图版46页　16开

西湖石窟探胜　王士伦、赵振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年11月　文65页　插图17幅　图版8幅　32开

四　建筑

中国古代建筑史　刘敦桢主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0年10月　418页　插图492幅　16开

中国建筑史（高等学校教学参考书）　《中国建筑史》编写组编写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2年7月　290页　16开

建筑史论文集（第四辑）　清华大学建筑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80年12月　155页　插图106幅　16开

建筑史论文集（第五辑）　清华大学建筑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81年9月　156页　插图119幅　折图7张　16开

科技史文集（第二辑建筑史专辑）　《建筑史专辑》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79年10月

文138页 插图105幅 图版4页 16开

科技史文集（第五辑建筑史专辑(2)） 《建筑史专辑》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0年7月 文156页 插图179幅 图版4页 16开

科技史文集（第七辑建筑史专辑(3)） 《建筑史专辑》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1年6月 135页 插图104幅 16开

建筑历史与理论（第一辑）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历史学术委员会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1年4月 195页 插图206幅 16开

建筑历史与理论（第二辑）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历史学术委员会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2年1月 177页 插图104幅 16开

梁思成文集（一） 梁思成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2年12月 文367页 插图281幅 图版27页 16开

刘敦桢文集（一） 刘敦桢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2年11月 390页 有图 16开

营造法式大木作研究（上下集） 陈明达著 文物出版社 1981年10月 上集文264页 下集图版49幅 16开

清式营造则例 梁思成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1年12月 新1版 文171页 插图71幅 彩色图版4页 黑白图版24页 12开

中国古建筑（画册）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82年6月 255页 8开

古建筑图案 田兆琪编绘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79年10月 123页 32开

古建筑游览指南（一） 《建筑师》编辑部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1年9月 188页 插图286幅 32开

古建筑游览指南（二） 《建筑师》编辑部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1年11月 271页 插图361幅 32开

古建筑游览指南（三） 《建筑师》编辑部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1年11月 208页 插图282幅 32开

怎样鉴定古建筑 祁英涛著 文物出版社 1981年6月 64页 插图25幅 32开

中国城市建设史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教研室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2年12月 215页 插图125幅 16开

中国古代都城概况 李洁萍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1年11月 272页 插图42幅 32开

郑韩故城 马世之著 中州书画社 1981年3月 33页 有照片 32开

紫禁城宫殿 于倬云主编 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 1982年9月 文85页 插图97幅 彩色图版276幅 黑白图版191幅 8开

中国古代苑囿 刘策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79年12月 144页 插图70幅 16开

中国园林艺术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编辑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2年9月 240页

（内彩色照片209幅） 8开

圆明园（北京史地丛书） 王威著 北京出版社 1980年1月 73页 32开

圆明园（第一集） 中国圆明园学会筹备委员会主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1年11月 231页 插图105幅 16开

苏州古典园林 刘敦桢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79年10月 文79页 图版401页 8开

中国古塔 刘策编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1年9月 110页 有图 16开

应县木塔 陈明达编著 文物出版社 1980年9月 第2版 文85页 插图33幅 实测图35页 彩色图版2幅 黑白图版140幅 8开

应县木塔（中国文物小丛书） 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山西省应县木塔保管所合编 文物出版社 1982年5月 文34页 插图30幅 彩色图版4幅 32开

桥梁史话（中国科技史话丛书） 金大钧等编写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79年3月 文320页 图版50幅 32开

赵州桥史话（中国历史小丛书） 张彬编写 中华书局 1979年5月 第2版 22页 插图6幅 32开

中国赵州桥 黄梦平、李晋栓著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1年11月 文39页 插图27幅 图版4页 32开

古代桥梁史话（中国历史小丛书） 潘洪萱编 中华书局 1982年12月 文38页 图版8页 32开

华严寺 山西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编 文物出版社 1980年12月 文8页 图版95幅 16开

独乐寺（彩色明信片） 天津市文物管理处、蓟县文物保管所编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1年1月 每套10张 50开

灵隐寺（中英文说明彩色明信片） 浙江人民出版社编辑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79年3月 每套12张 48开

塔尔寺 李志武、刘励中编 文物出版社 1982年11月 文35页 图版197幅 16开

大同古建筑（中英法文对照彩色明信片） 山西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编 文物出版社 1973年8月 每套10张 50开

五 陶瓷与窑址

中国陶瓷史 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 文物出版社 1982年9月 文457页 彩色图版32页 黑白图版32页 16开

中国古陶瓷论文集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 文物出版社 1982年12月 文321页 图版52页 16开

陶瓷史话（中国科技史话丛书） 《陶瓷史话》编写组编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2年1月 文203页 插图61幅 彩色图版18幅 32开

中国古陶瓷科学浅说 叶喆民编著 轻工业出版社 1982年1月 文149页 彩色图版16幅 黑白图版26幅 32开

中国新石器时代陶器装饰艺术 吴山编著 文物出版社 1982年5月 文67页 插图75幅 图版289页 16开

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艺术（中国古代美术作品介绍） 李纪贤编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2年10月 文14页 插图22幅 图版31页 16开

甘肃彩陶 甘肃省博物馆编 文物出版社 1979年12月 文8页 彩色图版40幅 黑白图版170幅 16开

青海彩陶 青海省文物考古队编 文物出版社 1980年10月 文37页 图版185幅 16开

江苏彩陶 南京博物院编 文物出版社 1978年10月 文5页 图版66幅 16开

江苏六朝青瓷 南京博物院编 文物出版社 1980年6月 文9页 彩色图版8幅 黑白图版120幅 16开

潮州笔架山宋代窑址发掘报告 广东省博物馆编 文物出版社 1981年5月 文64页 图版41页 16开

上海博物馆藏瓷选集 上海博物馆藏 文物出版社 1979年7月 文30页 彩色图版100幅 6开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瓷器（中英文对照彩色摄影明信片）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 文物出版社 1977年6月 每套10张 50开

南京博物院藏瓷器（中英文对照彩色摄影明信片） 南京博物院编 文物出版社 1977年3月 每套10张 50开

河北出土陶瓷（汉英文对照彩色摄影明信片） 河北省博物馆编 文物出版社 1977年10月 每套10张 50开

六 绘画

中国绘画史 王伯敏著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2年12月 747页 插图664幅 32开

古书画鉴定概论 徐邦达著 文物出版社 1981年5月 文83页 插图30幅 图版96页 16开

书画鉴定简述 王以坤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1年5月 文122页 彩色图版4幅 黑白图版69幅 大32开

中国历代绘画（故宫博物院藏画集〈Ⅰ〉东晋、隋、唐、五代部分） 故宫博物院藏画集编辑委员会编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78年12月 文18页 彩色图版100页 6开

中国历代绘画（故宫博物院藏画集〈Ⅱ〉宋代部分〈一〉） 故宫博物院藏画集编辑委员会编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1年10月 文15页 彩色图版132页 6开

中国历代绘画（故宫博物院藏画集〈Ⅲ〉宋代部分〈二〉） 故宫博物院藏画集编辑委员会编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2年12月 文13页 彩色图版98页 6开

中国历代绘画图录 林树中、周积寅编著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1年12月 文194页 图版194幅 16开

中国绘画史图录（上） 徐邦达编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1年11月 文5页 图455页 16开

中国古代绘画百图 天津艺术学院美术理论教研组编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78年2月 文100页 图100幅 32开

长沙楚墓帛画 文物出版社编辑 文物出版社 1973年8月 每套5张 8开

汉画选 张万夫编 天津人民美术出

版社 1982年3月 212页 16开

西汉帛画 文物出版社编辑 文物出版社 1972年9月 每套12张（附"说明"1册3页） 4开

和林格尔汉墓壁画 盖山林编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77年7月 文102页 插图25幅 彩色图版2幅 大32开

和林格尔汉墓壁画 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编著 文物出版社 1978年6月 文40页 插图43幅 彩色图版50幅 黑白图版44幅 8开

汉唐壁画 外文出版社编 外文出版社 1974年 文6页 图版96幅（附日文说明1册25页） 8开

唐李贤墓李重润墓壁画 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辑 文物出版社 1974年11月 唐李贤墓壁画 文7页 彩色图版50幅 唐李重润墓壁画 文8页 彩色图版40幅 4开

唐李贤墓壁画 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辑 文物出版社 1974年10月 文8页 彩色图版50幅 8开

唐李重润墓壁画 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辑 文物出版社 1974年12月 文10页 彩色图版40幅 8开

稷益庙壁画（中国古代美术作品介绍） 王泽庆、梁子明编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2年9月 文10页 插图34幅 图版35页 16开

岱庙天贶殿壁画 山东人民出版社编辑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2年11月 图版18页 12开

永乐宫壁画 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78年7月 每套12张 8开

永乐宫壁画 鲁迅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师生临摹 辽宁美术出版社编辑 辽宁美术出版社 1979年11月 20页 12开

永乐宫壁画线描稿 杨德树等临摹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0年9月 每套16张 4开

古帝王图（中国古代美术作品介绍） 金维诺编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2年9月 文7页 插图10幅 图版14页 16开

名画鉴赏（虢国夫人游春图）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79年2月 文4页 图版7幅 8开

韩熙载夜宴图（中国古代美术作品介绍） （五代）顾闳中作、李松著文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79年11月 19页 插图10幅 16开

清明上河图（中国古代美术作品介绍） （宋）张择端作、张安治著文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79年11月 20页 插图8幅 16开

宋李公麟维摩演教图卷（故宫博物院藏画介绍） 故宫博物院编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0年10月 每套7张 8开

名画鉴赏（文姬归汉图） 吉林省博物馆供稿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0年12月 文4页 图版5幅 8开

两宋名画册 文物出版社编辑 文物出版社 1979年10月 文12页 彩色图版60幅 8开

宋人花鸟 上海博物馆藏 文物出版社 1979年4月 文2页 彩色图版10幅 6开

故宫博物院藏花鸟画选 文物出版社

编辑 文物出版社 1965年12月（1981年9月重印） 彩色图版100幅 4开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画集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编辑 文物出版社 1982年10月 1册 239页 线装

辽宁省博物馆藏画集（续集） 辽宁省博物馆编辑 文物出版社 1980年4月 2册（上册文6页 图版112页 下册文10页 图版120页） 线装

沈阳故宫博物馆藏画选（汉英文对照彩色摄影明信片） 辽宁美术出版社编辑 辽宁美术出版社 1980年4月 每套10张 44开

七 法帖、书法

碑帖叙录 杨震方编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2月 文281页 图版16页 大32开

中国古代书法展览展品选辑 上海博物馆编 上海书画社 1973年9月 37页 插图32幅 12开

秦铭刻文字选 上海书画社编辑 上海书画社 1976年8月 48页 插图23幅 16开

秦汉石刻的篆书（中国古代美术作品介绍） 崇善、周志高编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2年9月 45页 16开

东汉碑刻的隶书（中国古代美术作品介绍） 王靖宪编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0年5月 45页 插图39幅 16开

汉石门颂（历代法书萃英） 上海书画出版社编辑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79年3月 62页 8开

明拓汉张迁碑 故宫博物院藏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80年11月 1册 25页 线装

汉史晨前后碑 文物出版社编辑 文物出版社 1978年5月 影印本 58页 12开

汉杨统碑 甘肃省博物馆供稿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79年12月 32页 16开

汉西岳华山庙碑 故宫博物院藏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80年6月 影印本 1册 线装

石门铭（历代法书萃英） 上海书画出版社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82年4月 79页 8开

龙门二十品（中国书法） 中国书法编辑组编辑 文物出版社 1980年5月 209页 8开

龙门四品 北京图书馆、龙门文物保管所编 文物出版社 1979年6月 46页 8开

颜真卿（第一册）（中国书法） 中国书法编辑组编辑 文物出版社 1981年3月 290页 8开

颜真卿（第二册）（中国书法） 中国书法编辑组编 文物出版社 1981年9月 332页 8开

颜真卿（第三册）（中国书法） 中国书法编辑组编 文物出版社 1982年6月 288页 8开

唐颜真卿书多宝塔碑 故宫博物院藏 文物出版社 1978年12月 影印本 44页 12开

唐颜真卿书东方朔画赞 上海书画社编辑 上海书画社 1979年1月 影印本 104页 8开

颜真卿书裴将军诗（宋拓忠义堂法帖之一） 浙江省博物馆藏 西泠印社 1980年12月 27页 12开

颜真卿书清远道士诗（宋拓忠义堂法帖之二） 浙江省博物馆藏 西泠印社 1980年12月 15页 12开

柳公权（第一册）（中国书法） 中国书法编辑组编辑 文物出版社 1980年6月 212页 8开

柳公权（第二册）（中国书法） 中国书法编辑组编辑 文物出版社 1980年12月 244页 8开

敦煌本柳公权书金刚经 文物出版社编辑 文物出版社 1979年12月 图版59页 8开

明拓唐褚遂良雁塔圣教序 故宫博物院藏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80年6月 1册 30页 线装

唐褚遂良雁塔圣教序（历代法书萃英） （唐）褚遂良书 许宝驯、王壮弘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80年9月 54页 12开

宋拓麓山寺碑并阴（历代法书萃英） （唐） 李邕书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79年9月 影印本 90页 8开

宋拓麓山寺碑并阴 上海书画出版社编辑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79年11月 影印本 1册 43页 线装

唐明征君碑 南京市博物馆藏 文物出版社 1980年5月 影印本 64页 8开

元赵孟頫书仇锷墓碑铭（历代法书萃英） 上海书画出版社编辑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79年1月 77页 8开

王羲之传本墨迹选 上海书画社编辑 上海书画社 1975年12月 14页 8开

唐人摹兰亭序墨迹三种 上海书画社编辑 上海书画社 1973年9月 影印本 11页 8开

大观帖卷六（历代法书萃英） （晋）王羲之书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79年8月 50页 8开

宋拓怀仁集王书圣教序（陕西名碑拓片选之三） 陕西省博物馆供稿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77年9月 影印本 33页 8开

宋拓怀仁集王书圣教序 陕西省博物馆供稿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78年9月 1册 线装

宋拓怀仁集王书圣教序 陕西省博物馆藏 文物出版社 1978年5月 文2页 图版38页 12开

米芾墨迹三种 上海书画社编辑 上海书画社 1973年10月 54页 8开

米芾的书法艺术（中国古代美术作品介绍） 沈鹏编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0年11月 58页 16开

上海博物馆藏明清法书 上海博物馆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81年8月 45页 16开

八 工艺美术

中国历代装饰画研究 庞薰琹著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2年5月 文141页 图版45幅 16开

中国图案作法初探 雷圭元著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79年6月 117页 插图193幅 16开

中国古代图案 北京纺织科学研究所编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79年10月 文1页 图129页 24开

中国古代图案选（画册） 张道一编选、保彬等摹绘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0年3月 217页 16开

唐代图案集 故宫博物院陈列设计组编绘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2年5

月 104页 24开

丝绸之路（汉唐织物）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编 文物出版社 1972年2月 彩色图版66幅（附"说明"1册8页） 8开

丝绸史话（中国历史小丛书） 陈娟娟、黄能馥著 中华书局 1980年12月 第2版 44页 插图15幅 32开

故宫博物院藏工艺品选 故宫博物院编辑 文物出版社 1974年5月 文3页 彩色图版100幅 12开

故宫博物院藏工艺品选（汉英文对照彩色摄影明信片）（1—3辑） 故宫博物院编 文物出版社 1978年2月 每套10张 50开

沈阳故宫博物馆工艺品选（中英文说明彩色摄影明信片） 辽宁美术出版社编辑 辽宁美术出版社 1980年4月 每套10张 50开

凉山彝族文物图谱（漆器） 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编绘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2年9月 69页 16开

陆 科学技术

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 杜石然等编著 科学出版社 1982年8月 372页 有插图 大32开

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 杜石然等编著 科学出版社 1982年8月 371页 有插图 大32开

中国古代科技成就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8年3月 707页 插图166幅 32开

中国天文学史 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编著 科学出版社 1981年5月 265页 有插图 16开

中国古代天文文物图录（考古学专刊乙种第十七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文物出版社 1980年6月 文29页 彩色图版14页 黑白图版94页 8开

科技史文集（第一辑天文学史专辑） 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编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78年11月 102页 插图18幅 16开

科技史文集（第六辑天文学史专辑〈2〉） 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编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0年8月 文148页 插图12幅 彩色图版15幅 黑白图版21幅 16开

中国天文古迹 崔振华、徐登里编著 科学普及出版社 1979年12月 79页 有插图 32开

科技史文集（第三辑综合辑）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0年8月 文168页 图版4页 16开

科技史文集（第九辑技术史专辑〈1〉）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技术史组主编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2年10月 文144页 插图93幅 图版2页 16开

中国科技史资料选编（陶瓷、琉璃、紫砂） 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研究组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81年12月 100页 大32开

中国冶金简史 北京钢铁学院《中国冶金简史》编写小组编 科学出版社 1978年2月 264页 插图67幅 32开

中国古代冶金 北京钢铁学院《中国古代冶金》编写组编 文物出版社 1978年12月 文110页 图版25页 大32开

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 夏湘蓉等编著 地质出版社 1980年7月 442页 插图87幅 大32开

云南冶金史 陈吕范等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0年3月 文228页 图版8页 32开

汉代叠铸（温县烘范窑的发掘和研究） 河南省博物馆《中国冶金史》编写组著 文物出版社 1978年12月 文42页 图版12页 16开

中国化学史话 曹元宇编著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1979年12月 320页 插图40幅 32开

农业史话（中国科技史话丛书） 李长年编著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1年7月 225页 有插图 32开

中国古代农业科技 《中国古代农业科技》编纂组编 农业出版社 1980年12月 474页 插图53幅 大32开

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简明图表（中国农史研究丛书） 陈文华编绘 农业出版社 1978年9月 78页 插图118幅 大32开

中国古农具发展史简编（中国农史研究丛书） 犁播编 农业出版社 1981年2月 128页 插图134幅 大32开

蚕业史话（中国历史小丛书） 章楷编写 中华书局 1979年6月 第2版 41页 插图7幅 32开

纺织史话（中国科技史话丛书） 上海市纺织科学研究院《纺织史话》编写组编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78年1月 238页 有插图 32开

中国水利史稿（上册）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水利电力科学研究院《中国水利史稿》编写组编 水利电力出版社 1979年8月 307页 插图64幅 大32开

造船史话（中国科技史话丛书）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市造船工业局《造船史话》编写组编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79年9月 172页 插图106幅 32开

中国古代造纸史话 刘仁庆编著 轻工业出版社 1978年7月 86页 插图36幅 32开

中国造纸技术史稿 潘吉星著 文物出版社 1979年3月 252页 插页134幅 16开

中国的印刷 刘国钧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年6月 第2版 文63页 图6页 32开

活字印刷史话（中国历史小丛书） 张秀民、龙顺宜编写 中华书局 1979年7月 第2版 28页 有插图 32开

书的历史 孙宝林、唐乃兴合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79年2月 106页 有插图 32开

中国书的故事 刘国钧、郑如斯合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9年8月 115页 有插图 32开

中国书的历史 庄葳编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年2月 106页 有插图 32开

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 国家计量总局主编 文物出版社 1981年10月 文57页 彩色图版11幅 黑白图版254幅 8开

柒 文化生活

中国古代音乐史稿 杨荫浏著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1年2月 2册

1070页 插图134幅 大32开

嘉峪关魏晋墓砖壁画乐器考 牛龙菲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1年5月 文97页 图44幅 大32开

中国古代舞蹈史话（舞蹈知识丛书） 王克芬编著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0年1月 94页 插图84幅 大32开

唐代舞蹈 欧阳予倩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年8月 文182页 图20页 大32开

捌 历史地理与名胜古迹

西北史地论丛 黄文弼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年5月 354页 插图19幅 大32开

古代的巴蜀 童恩正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79年4月 文175页 图版8页 大32开

中国长城建置考（上编） 张维华著 中华书局 1979年2月 159页 有插图 大32开

长城史话（中国历史小丛书） 罗哲文著 中华书局 1980年12月 第2版 文36页 图6页 32开

长城（北京史地丛书） 罗哲文著 北京出版社 1982年2月 文126页 插图13幅 图版20页 32开

万里长城（中国文物小丛书） 罗哲文编著 文物出版社 1980年11月 文34页 插图44幅 彩色图版4页 32开

长城（汉英文对照） 郁进编 文物出版社 1980年8月 文6页 图版68页 16开

长城（中英文说明彩色明信片） 韩德洲等摄影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79年1月 每套8张 44开

万里长城·山海关（附：秦皇岛·北戴河） 秦皇岛市文化局编 文物出版社 1979年9月 31页 插图24幅 32开

万里长城—嘉峪关 高凤山著 文物出版社 1982年6月 30页 插图45幅 32开

北京史话（中国历史小丛书） 阎崇年著 中华书局 1982年3月 72页 插图15幅 32开

丰镐—长安—西安 马正林编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78年6月 文120页 图版6页 32开

西安历史述略 武伯纶编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79年8月 文280页 插图39幅 彩色图版4页 大32开

西安史话 武伯纶、武复兴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年7月 文225页 图版8页 32开

古都西安 王崇人编著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1年7月 文242页 插图66幅 图版90页 大32开

西安史话（中国历史小丛书） 武复兴著 中华书局 1982年12月 58页 插图13幅 32开

西汉长安 刘运勇著 中华书局 1982年12月 140页 插图9幅 32开

洛阳史话（中国历史小丛书） 苏健、蔡运章著 中华书局 1980年12月 51页 插图5幅 32开

绍兴史话（地方史话） 陈桥驿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年9月 文134页 插图37幅 图版14幅 32开

大理城史话 李昆声编写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0年6月 64页 插图

14幅 32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介绍（一） 文物出版社 1982年6月 142页 插图58幅 32开

中国名胜词典 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主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1年10月 文1146页 索引46页 图版16页 32开

中国名胜词典（京、津、沪分册） 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主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2年12月 文93页 插图40幅 图版4幅 32开

中国名胜词典（河北、内蒙古分册） 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主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2年12月 文70页 插图27幅 图版4幅 32开

中国名胜词典（江苏分册） 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主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2年12月 72页 有插图32开

中国名胜词典（浙江分册） 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主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2年12月 62页 有插图 32开

中国名胜词典（安徽分册） 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主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1年12月 文59页 插图22幅 图版2页 32开

中国名胜词典（福建、台湾分册） 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主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1年12月 68页 有插图 32开

中国名胜词典（山东分册） 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主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1年12月 71页 有插图 32开

中国名胜词典（四川分册） 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主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1年12月 56页 有插图 32开

中国名胜古迹概览（上） 程裕祯等编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1982年12月 128页 大32开

明十三陵（北京史地丛书） 商传编写 北京出版社 1978年9月 59页 有插图 32开

漫话十三陵 金世绪编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1年5月 文35页 图版16页 32开

定陵—地下宫殿 定陵博物馆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3年8月 41页 插图24幅 32开

定陵—地下宫殿（北京史地丛书） 定陵博物馆编写 北京出版社 1978年11月 第2版 46页 有插图 32开

定陵（中英文说明彩色明信片） 定陵文物管理处编 文物出版社 1979年7月 每套11张 50开

故宫（中英文对照彩色明信片）（1—3辑） 故宫博物院编 文物出版社 1976年6月 每套10张 50开

颐和园（北京史地丛书） 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写 北京出版社 1978年11月 文78页 图版16页 32开

颐和园 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编 文物出版社 1979年6月 图80幅 16开

芦沟桥（革命文物丛书） 彭成编 文物出版社 1979年5月 30页 插图29幅 32开

清东陵与西陵（北京史地丛书） 俞进化著 北京出版社 1981年9月 文100页 图版2页 32开

避暑山庄和外八庙 承德避暑山庄管理处编 文物出版社 1976年1月 24页 插图18幅 32开

避暑山庄外八庙（彩色摄影明信片） 承德避暑山庄管理处编 文物出版社 1976年6月 每套10张 50开

承德避暑山庄 承德市文物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合编 文物出版社 1980年8月 文253页 插图68幅 彩色图版2幅 大32开

避暑山庄与外八庙（北京史地丛书） 袁森坡编 北京出版社 1981年9月 文134页 图版12页 32开

承德名胜（中国旅游丛书） 张平一、田野编写 中国旅游出版社 1980年12月 文74页 图8页 32开

避暑山庄史话（中国历史小丛书） 郭秋良、刘建华合著 中华书局 1982年12月 46页 插图15幅 32开

正定隆兴寺（中英文说明彩色明信片辑） 河北人民出版社编辑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79年2月 每套12张 50开

晋祠 晋祠文物保管所编 文物出版社 1978年12月 30页 插图28幅 32开

晋祠（中英文说明彩色明信片）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省晋祠文物保管所编 文物出版社 1979年7月 每套10张 50开

晋祠 柴泽俊撰文、高礼双摄影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年10月 1册 16开

晋祠 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晋祠文物保管所合编 文物出版社 1981年12月 文14页 图版101幅 16开

玄中寺（中国文物小丛书）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编著 文物出版社 1980年8月 文34页 插图29幅 彩色图版4页 32开

沈阳故宫（汉英文对照彩色摄影明信片辑） 辽宁美术出版社编辑 辽宁美术出版社 1980年4月 每套10张 50开

北陵（中英文对照彩色明信片） 辽宁人民出版社编辑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73年10月 每套10张 50开

清初三陵（永陵·福陵·昭陵） 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编 文物出版社 1982年12月 文34页 插图37幅 彩色图版4页 32开

上海名胜古迹 杨嘉祐编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81年12月 29页 插图17幅 24开

上海豫园 上海豫园办公室编写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年9月 46页 插图37幅 32开

南京文物与古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易家胜撰文、姚文涛摄影 文物出版社 1982年8月 93页 插图109幅 32开

明孝陵 南京博物院编 文物出版社 1981年1月 文9页 图版112幅 16开

普陀山 朱洪斌编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1981年12月 文54页 插图1幅 图版7幅 32开

岳飞墓（中国文物小丛书） 岳飞墓文物保管所编 文物出版社 1982年1月 29页 32开

九华山 项有彬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1980年11月 文78页 图版8页 32开

东南第一山——九华山（中国名胜地质丛书） 孙毓飞等编著 地质出版社 1982年6月 66页 插图47幅 大32开

泉州名胜古迹 晋江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泉州名胜古迹》编写组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0年9月 文86页 图版12页 28开

江西名胜 杨建云、刘会庆编写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1年6月 116页 32开

东岳泰山 徐本坚编著 科学出版社 1982年8月 文97页 彩色照片10幅 32开

曲阜名胜古迹 曲阜县文管会、曲阜县文化馆供稿 齐鲁书社 1981年4月 70页 有插图 48开

曲阜名胜古迹 曲阜县文管会、曲阜县文化馆供稿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2年2月 新1版 70页 有插图 48开

孔庙孔府孔林——游览介绍 曲阜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济宁地区出版办公室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2年6月 新1版 15页 有图版 32开

孔庙孔府孔林（中国文物小丛书） 山东省曲阜县文物管理委员会编 文物出版社 1982年7月 文34页 插图43幅 彩色图版8幅 32开

四门塔与神通寺 济南市博物馆编 文物出版社 1981年8月 32页 插图23幅 32开

洛阳名胜古迹 洛阳博物馆编 中州书画社 1982年7月 82页 有照片 32开

洛阳关林（河南名胜古迹丛书） 陈长安、宫大中合编 中州书画社 1982年8月 文55页 图版3页 32开

白马寺（中国文物小丛书） 白马寺汉魏故城文物保管所编著 文物出版社 1980年10月 文34页 插图25幅 彩色图版4页 32开

白马寺（河南名胜古迹丛书） 米士诚、陈长安编写 中州书画社 1981年3月 41页 32开

古都开封（河南名胜古迹丛书） 开封市博物馆编 中州书画社 1982年8月 文94页 图版3页 32开

古都开封（导游手册） 河南师范大学地理系编 中国旅游出版社 1982年10月 文112页 图版4页 32开

巩县石窟寺、北宋皇陵、杜甫故里（河南名胜古迹丛书） 傅永魁、周到著 中州书画社 1981年8月 72页 32开

宋陵（中国文物小丛书） 河南省开封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省巩县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著 文物出版社 1982年10月 文34页 插图53幅 彩色图版5幅 32开

中岳名胜（河南名胜古迹丛书） 张爱国、王鸿钧编写 中州书画社 1981年8月 66页 32开

少林寺（河南名胜古迹丛书） 张家泰著 中州书画社 1981年10月 文87页 图版15幅 32开

少林寺（中国文物小丛书） 河南省登封县文保所编 文物出版社 1982年12月 文36页 插图34幅 彩色图版3幅 32开

岳飞与岳庙（河南名胜古迹丛书） 金亭等编 中州书画社 1981年12月 文43页 图版4页 32开

四川名胜（第一辑） 沈怀石编 四

已审阅
子居 10-03-13，13:24